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 隋唐五代史

下册

 **BOOK**  
网络资源 中华书局

## 第七章 唐末农民大起义与唐王朝的衰亡

### 第一节 唐王朝的衰乱

**懿宗咸通的政治** 唐懿宗即位后，西北边境的情况，最为乐观。懿宗咸通四年（公元八六三年）三月，归义军节度使张义潮以兵七千收复凉州（镇姑藏，今甘肃武威县）。咸通七年（公元八六六年），又使北庭回鹘仆固后收复了西州（治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县东南）、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破城子）、轮台（今新疆米泉县境）、清海镇（北庭西七百里，今新疆纳玛斯西）等地。咸通八年（公元八六七年）二月，张义潮入朝长安，留居不返敦煌，命其族子张淮深守归义。咸通十三年（公元八七二年），张义潮病死，由沙州长史曹义金继任归义节度使。“是后中原多故，朝命不及，回鹘陷甘州（治张掖，今甘肃张掖县），自余州隶归义者，多为羌胡所据”（《资治通鉴》唐懿宗咸通十三年）。

大中十三年（公元八五九年）十二月，懿宗即位仅数月，浙东就爆发了裘甫领导的农民起义。起义军攻破象山（今浙江象山县），屡败官军，军锋指向剡县（今浙江嵊县），迫使“明州（治鄞县，今浙江宁波市南）城门书闭”，“浙东骚动”（《资治通鉴》唐大中十三年）。咸通元年（公元八六年）正月，起义军乘胜攻克剡县，“开府库，募壮士，众至数千人”（《资治通鉴》唐咸通元年）。这时浙东“人不习战，甲兵朽钝，见卒不满三百”。浙东观察使（治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市）郑祗德，徵调新卒五百，开往剡县，与起义军战于剡西，官军中伏大败，损折几尽。活跃于山林海岛的各路义军以及各地逃亡农民，四面云集，众至三万，分为三十二队，裘甫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建元为罗平，铸印曰“天平”。大聚资粮，召募良工制造器械，“声震中原”。

浙东观察使郑祗德一方面上表朝廷报告形势危急，一方面向邻道求援。浙西观察使（治丹徒，今江苏镇江市）、宣歙观察使（治宣城，今安徽宣城县）各遣牙将率兵赴援。宰相夏侯孜推荐前安南都护王式为浙东观察使，前往镇压起义。

王式入朝，懿宗问以镇压裘甫的方略，王式说，但得兵，裘甫必可破。有宦官在旁，提出异议，说：“发兵，所费甚大。”王式回答说：兵多，裘甫速破，“其费省矣”。若兵少不能胜甫，“延引岁月”，甫“势益张”，则江淮间将蜂起应甫。“国家用度尽仰江淮，若[漕连]阻绝不通”，则上下“皆无以供给，其费岂可胜计哉！”（《资治通鉴》唐咸通元年）。懿宗接受王式的意见，下诏调发忠武（镇许州长社，今河南许昌市）、义成（镇滑州白马，今河南滑县）、淮南（镇扬州江都，今江苏扬州市）三镇兵救援浙东。

咸通三年（公元八六二年）三月间，裘甫派遣起义军攻破了台州的唐兴县（今浙江天台县）。自己率领主力万余人，破上虞（今浙江上虞县东南），入余姚（今浙江余姚县），破慈溪（今浙江慈溪县），入奉化（今浙江奉化县），抵宁海（今浙江宁海县），所到之处，杀其令长丞尉，吸收少壮补充起义队伍。如果起义军领导集团在战略部署上措置适当，战争的前途还是非常乐观的。

起义军内部对战略部署有两种不同意见。起义军副帅刘晔主张：“今朝

廷遣王中丞（王式）将兵来，……不四十日必至。兵马使（指裘甫）宜即引兵取越州，凭城郭，据府库，遣兵五千守西陵（今西兴），循浙江筑垒以拒之，大集舟舰。得间，则长驱进取浙西，过大江，掠扬州货财以自实，还，修石头城（在今江苏南京市清凉山）而守之，宣歙、江西必有响应者，遣刘从简以万人循海而南，袭取福建。如此，则国家贡赋之地尽入于我矣。”进士出身的王辂持反对意见，他说：“如刘副使（刘晔）之谋，乃孙权所为也。彼乘天下大乱，故能据有江东；今中国无事，此功未易成也。不如拥众据险自守，陆耕海渔，急则逃入海岛，此万全策也”（《资治通鉴》唐懿宗咸通元年）。裘甫犹豫不决，致使起义军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王式到达越州后，集结了诸道援军和土团子弟兵共五千人，又募居住在江淮一带的吐蕃、回鹘降人，配以二百匹马，组成骑兵。于是兵分两路，东路军自上虞趋奉化，解象山之围，又连下宁海、唐兴；南路军也连拔沃州（今浙江新昌县东南）、新昌（今浙江新昌县）两寨，直指唐兴。裘甫想把起义队伍拉入海岛，王式先已封锁宁海一带海口，烧了起义军所有船只。裘甫从黄罕岭（在奉化县西北，剡县之东，其路深险，度黄罕岭，则平川四十里入剡）突围，退到剡县。官军围攻剡城，“三日，凡八十三战”（《资治通鉴考异》引《平剡录》）。咸通元年六月，浙东的农民起义最后终于失败了。裘甫、刘晔等农民领袖大都壮烈牺牲。困守剡县的起义军大将刘从简，率五百壮士，突围退至大兰山（今浙江奉化县西北），据险自守，到七月间也终于失败牺牲。

裘甫起义虽然失败，唐王朝却开始趋于崩溃。

懿宗的生活，奢靡无度。懿宗“好音乐宴游，殿前供奉乐工常近五百人。每月宴设不减十余，水陆皆备，听乐观优，不知厌倦，赐与动及千缗。曲江、昆明、灞漭、南宫（即兴庆宫）、北苑（在大明宫之北）、昭应（有华清宫）、咸阳（有望贤楼），所欲游幸即行，不待供置。有司常具音乐、饮食、幄帟”。“每行幸，内外诸司扈从者十余万人，所费不可胜纪”（《资治通鉴》唐咸通七年）。

懿宗有爱女同昌公主，宠妃郭淑妃所生，咸通十年（公元八六九年），嫁与左拾遗韦保衡为妻。懿宗“倾宫中珍玩以为资送。赐第于广化里，窗户皆饰以杂宝，井栏、药臼、槽匱亦以金缕为之，编金银为箕筐。赐钱五百缗，他物称是”（《资治通鉴》唐咸通十年）。韦保衡不到两年，从起居郎累迁为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势动天下”。咸通十一年（公元八七〇年）八月，同昌公主病死，懿宗痛悼爱女，杀医官韩宗劭等二十余人，悉收捕其亲族三百余人系京兆狱。

唐玄宗后期，误国的奸相有李林甫、杨国忠，德宗时的误国奸相有元载和卢杞，懿宗时误国的奸相有路岩和韦保衡。路岩也是由翰林学士承旨于咸通五年（公元八六四年）提升为宰相的。“岩奢靡，颇通赂遗，左右用事”（《资治通鉴》唐咸通十年）。他的亲吏边咸，搜括的钱财，可赡养全国军队（九十九万人）二年。路岩和韦保衡本来表里为奸，后来因争权遭韦保衡排挤，出任西川节度使。僖宗即位后贬官，旋勒令自杀。

韦保衡被任命为宰相后，恃恩弄权，排斥异己。宰相王铎是韦保衡贡举时的座主，起居舍人萧遘是韦保衡同年进士，两人都看不起韦保衡，先后遭到摈斥。刘瞻、于琮，都做过宰相，保衡因其不礼于己，贬琮为韶州（治曲江，今广东曲江市东北）刺史，诬刘瞻“与医官通谋，投毒药”（《资治通

鉴》唐咸通十一年），毒死同昌公主，累贬欢州司户。咸通十四年（公元八七三年）七月，懿宗病死。九月，韦保衡坐罪免职，贬为贺州（治临贺，今广西贺县）刺史；十月，再贬崖州澄迈（今广东海南岛澄迈县）令，并勒令自杀。唐懿宗一朝，不是没有好的宰相，但不能重用，而对路岩、韦保衡之辈，奢侈骄佚，排斥异己，却大大加以信任，唐朝的政治就日益滑向下坡路了。

唐懿宗时，南诏曾两陷安南都护府，并侵逼邕州（治宣化，今广西南宁市）。唐政府任命高骈为安南都护，逐走了南诏的军队，稳定了安南的局面。咸通十年（公元八六六年），南诏自安南撤走，把兵锋转向西川，连陷嵩州（治越嵩，今四川西昌县）、黎州（今四川海源县北）、雅州（治岩道，今四川雅安）、邛州（治临邛，今四川邛崃县）、嘉州（治通义，今四川眉山县），次年进围成都，为唐军民击退。僖宗乾符元年（公元八七四年），南诏军又犯西川，唐任高骈为西川节度使，出兵反击，局面才稳定下来。

懿宗于咸通十四年（公元八七三年）病死，年四十一。左神策护军中尉刘行深、右神策护军中尉韩文约立懿宗第五子普王俨为皇帝，是为僖宗，年才十二岁，大权完全落在宦官手里。

**僖宗继位** 从懿宗时起，唐王朝的政治已极其黑暗。咸通十年六月，陕州（治陕县，今河南陕县）民向观察使崔莒“诉旱。莒指庭树曰，‘此尚有叶，何旱之有？’杖之。民怒，放逐之。莒逃于民舍，渴求饮，民以溺饮之”（《资治通鉴》唐咸通十年）。官民关系紧张到这种程度，农民大起义的爆发自不可避免的了。

僖宗乾符元年正月，翰林学士卢携上言：“臣窥见关东去年旱灾，自虢（州治宏农，今河南灵宝县）至海，麦才半收，秋稼几无，冬菜至少，贫者磴蓬实为面，蓄槐叶为齑，或更衰羸，亦难收拾。常年不稔，则散之邻境。今所在皆饥，无所依投，坐守乡间，待尽沟壑。其蠲免余税，实无可徵，而州县以有上供及三司（户部、转运，盐铁为三司）钱，督趣甚急，动加捶撻，虽撤屋伐木，雇妻鬻子，止可供所由酒食之费，未得至于府库也。或租税之外，更有他徭；朝廷傥不抚存，百姓实无生计。乞敕州县，应所欠残税，并一切停徵，以俟蚕麦；仍发所在义仓，亟加赈给。至深春之后，有菜叶木芽，继以桑椹，渐有可食；在今数月之间，尤为窘急，行之不可稽缓”（《资治通鉴》唐乾符元年）。唐王朝的整个官僚机构已经腐烂了，卢携的奏疏，徒为空文，不见切实措施。僖宗乾符二年（公元八七五年）七月，飞蝗自东而西，所过食草木叶及五谷皆尽。而京兆尹杨知至却妄奏：“蝗入京畿，不食稼，皆抱荆棘而死。”僖宗居然相信，以为是真的事，“宰相皆贺”（《资治通鉴》唐乾符二年）。

僖宗“年少，政在臣下（宦官），南牙、北司，互相矛盾。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歛愈急，关东连年水旱，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流散或成饿殍），无所控诉”，相聚起义，“所在蜂起”（《资治通鉴》唐乾符元年）。爆发农民大起义的时机成熟了。

## 第二节 唐末农民大起义

**桂林戍卒起义** 懿宗咸通九年（公元八六八年），爆发了庞勋为首的桂林戍卒起义。

唐代徐州一带，“风土雄劲，甲士精强”。唐王朝为了加强西南边防力量，曾调遣一部分徐州兵戍守岭南，其中八百人驻扎在桂州（治始安，今广西桂林市）。初约三年轮换，后来因调防费用大，到咸通九年（公元八六八年），戍卒戍守桂州已达六年，超期三年。徐州都押牙尹戡言于徐泗观察使崔彦曾，“以军帑空虚，发兵所费颇多，请更留戍卒一年”。消息传到桂州，群情愤怒，戍卒摧粮料判官庞勋为都将，夺取监军院的兵甲，自行北归。庞勋率戍卒至湖南，乘船沿江东下，过浙西（镇江市），入淮南，经泗州（今江苏盱眙县）渡淮。路上招纳逃亡兵士和农民，匿于舟中，众至千人。渡过淮河以后，庞勋向戍卒宣称：“吾辈擅归，思见妻子耳。今闻已有密敕下本军，至则支分灭族矣。丈夫与其自投罗网，为天下笑，曷若相与戮力同心，赴蹈汤火……况城中将士，皆吾辈父兄子弟，吾辈一唱于外，彼必响应于内矣！”（《资治通鉴》唐咸通九年）士众欢呼称善。

当时徐州城内只有四千三百名士卒，徐泗观察使崔彦曾乃命都虞候元密统兵三千人拒庞勋。又命宿州出兵五百扼守符离（今安徽宿县北符离集）。庞勋军队开抵符离，与官军激战于睢水之上，官军望风奔溃。庞勋回军进攻宿州（今安徽宿县），宿州已是一座空城，即时攻下。庞勋“悉聚城中货财，令百姓来取之，一日之中，四远云集，然后选募为兵”，“自旦至暮，得数千人”，起义队伍迅速扩大，庞勋自称兵马留后。过了两天，元密引官军围攻宿州，庞勋搜集城中大船三百艘，备载资粮，乘流而下，冲出重围，在汴河沿岸，选择有利地形，设下埋伏。元密驱兵追击，遭到起义军夹攻，官军大败，元密战死士卒约死千人，残部归附庞勋，无一人得还徐州。庞勋知徐州空虚，乘胜直趋徐州城下。起义军已有六七千人，“鼓噪动地。民居在城外者”，勋“皆慰抚，无所侵扰，由是人争归之”。很快攻下徐州城，囚崔彦曾，杀掉民愤很大的都押牙尹戡、教练使杜璋、兵马使徐行俭等人。城中愿意参军的，一日至万余人。附近诸州的逃亡农民“远近辐凑”、“闻溢郭郭”。“庞勋募人为兵”，人“争赴之，至父遣其子，妻勉其夫，皆断钁首而锐之，执以应募”（《资治通鉴》唐咸通九年）。起义军的人数，激增到十万以上（《旧唐书·懿宗纪》作二十万）。

庞勋遣将命师，分兵略地，先后攻取淮南道的濠州（治钟离，今安徽凤阳县西北）、滁州（治清流，今安徽滁县）、和州（治历阳今安徽和县）。还动员了一万余人围攻“当江、淮之冲”的泗州，严重地威胁了江淮漕运，切断了唐王朝的经济命脉。唐王朝着慌了，任命康承训为义成节度使（即徐州节度使）、徐州行营都招讨使，王晏权为徐州北面行营招讨使，戴可师为徐州南面行营招讨使，率诸道军及沙陀、吐谷浑等族部众，镇压起义军。

官军尚未集中，戴可师先率三万士兵，渡淮增援地当江淮要害的泗州。当时，泗州东南的都梁城（今江苏盱眙县东南）已落入义军手中。官军围攻都梁城，起义军夜中撤出。第二天，官军进入都梁城，这不过是一座空城，戴可师恃胜不设备，适值大雾，起义军数万疾趋而至，纵击官军。官军不能成列，遂致大败，将士得免者才数百人，器械、资粮、车马丧失殆尽，戴可师和监军使（宦官）也被起义军所杀。

戴可师被杀，官军三万全歼。庞勋为了进一步鼓励士气，“作露布，散示诸寨及乡村，于是淮南士民震恐，往往避地江左”。淮南节度使令狐綯，是一个老奸巨猾的官僚，他怕起义军进入淮南，即施行缓兵之计，派人向庞勋表示，代为向朝廷奏请徐州节度使节钺，庞勋乃息兵待命，丧失了进击淮南的战机。

这时汴河已被切断，“江淮往来皆出寿州”（治寿春，今安徽寿县）。庞勋乘胜围寿州，取诸道贡献及商人财货。这时庞勋便骄傲起来，自以为无敌于天下，“日事游宴”。当时集中在徐州的起义军有数万人，资粮匮竭乃斂富室及商旅财帛，什取其七八。与庞勋一同起义的桂州戍卒更为骄暴，“夺人资财，掠人妇女”，不听庞勋约束。“由是境内之民皆厌苦之”（《资治通鉴》唐咸通九年）。

从戴可师覆师后，官军也重新作了部署。徐州北面行营招讨使王晏权作战不力，唐朝廷把他撤换了，改以兖海节度使曹翔为徐州北面招讨使。魏博节度使（镇魏州元城，今河北大名县北）何全皞也派遣魏博大将薛尤统兵一万三千人，开赴徐州前线。曹翔的军队，驻扎在滕（今山东滕县）、沛（今江苏沛县）；薛尤的军队，驻扎在丰（今江苏丰县）、萧（今江苏萧县西北），采用口袋战术，逐渐往东向徐州外围收缩。康承训统率的官军主力七万余人屯于柳子（今安徽宿县西北临涣集北）之西，还有附塞的沙陀部落三千精骑由其酋长朱邪赤心率领，配合唐军作战。

起义军将领王弘立率主力三万，前去抵挡官军。弘立引兵渡过涣水，夜袭鹿塘寨（今安徽宿县西北临涣集之西北），次日黎明时包围了鹿塘寨，不料遭到沙陀军和官军的夹击，起义军大败，几乎全军覆没，“委弃资粮，器械山积”。康承训既破王弘立，进逼柳子，与起义军柳子守将姚周一月之间激战数十次，姚周战败。官军包围柳子寨，四面纵火，起义军放弃柳子寨，沙陀军以精骑邀击，屠杀殆尽。姚周冲出重围，只带领麾下数十人南奔宿州。宿州守将梁丕因私嫌杀姚周。庞勋责怪梁丕擅杀姚周，把他撤换，另派徐州旧将张玄稔代理宿州州事。

庞勋经过几次挫败，接受了谋士周重的意见，于咸通十年四月，杀前徐泗观察使崔彦曾及徐州监军张道谨等，表示与唐王朝的决裂。于是拣选丁壮，得三万人，更造旗帜，装备以精良兵器。起义军共推庞勋为天册将军。

庞勋的战略部署，认为要避免两线作战，先得解除从西北面向滕、丰方面来的威胁，然后全军南下与官军主力决战。庞勋留父亲庞举直和首义将领许佶等留守徐州，自己亲率大军袭击包围丰县的魏博军。魏博五寨军队，不战自溃。唐徐州北面招讨使曹翔方围滕县，闻魏博军败，引兵退保兖州。西北面的威胁解除后，庞勋引兵南下，直趋柳子寨，准备与官军主力决战。不料作战计划泄露，康承训秣马整众，设伏等待，起义军陷入官军重围，损折了数万人。勋收散卒三千人，退入徐州。庞勋起兵时，下邳（今江苏睢宁县西北）土豪郑谔，聚众三千，自备资粮器械，响应起义军，至是以下邳降唐。蕲县（今安徽宿县南）土豪李袞亦杀起义军守将，举城降唐。沛县裨将朱玖趁起义军守将李直赴彭城议事，举城降唐。宿州守将张玄稔杀起义军将领张儒等，开城门降唐。宿州城内有精兵三万人，康承训配以精骑数百，直趋符离，符离守军不知道张玄稔已叛变，开门延纳，玄稔既入，斩将收兵，复得万人，北趋徐州。

庞勋败后，接受宿州守将张实的建议，引兵西击宋州（州治宋城，今河

南商丘县南)、亳州(州治谯县,今安徽亳县),打算吸引官军西进,解宿州之围。咸通十年九月,庞勋率起义军二万西出,袭破宋州南城,又渡汴水,南攻亳州。康承训引步骑八万,使沙陀部落朱邪赤心率数千骑马前锋,追击庞勋于亳州,起义军大败,全军覆灭,生脱者才千人,庞勋也在此役中牺牲。

在庞勋军败之前,张玄稔进围徐州,崔彦曾故吏路审中开城迎接官军,庞举直、许佶等悉被杀害,官军悉捕桂州戍卒亲族,死者数千人。轰轰烈烈的庞勋领导的戍卒起义,就这样失败了。

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但其影响却是非常深远的,《新唐书·南诏传赞》称:“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桂林戍卒起义,实际拉开了唐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

庞勋的“余党犹相聚于闾里”,或者“散居兖、郓、青、齐之间”(《资治通鉴》唐咸通十一年),后来又参加到王仙芝、黄巢起义军里去了。

**王郢海上举兵** 浙西狼山(今江苏南通市南狼山)镇遏使王郢等六十九人有战功,镇海节度使(镇丹徒,今江苏镇江市)赵隐赏以职名而不给衣粮,郢等论诉不获,遂于乾符二年(公元八七五年)四月举兵反唐。部众近万人,攻破苏(州治吴,今江苏苏州市)、常(州治武进,今江苏常州市),乘船往来,泛江入海,转攻二浙(浙东、浙西),南及福(州治侯官,今福建福州市)、建(州治建安,今福建建瓯县),严重地威胁了唐江南东道的沿海航行安全,也影响了漕运的海上转输。乾符三年(公元八七六年),王郢通过温州(治永嘉,今浙江温州市)刺史鲁寔,求为望海镇(今浙江镇海县)使,寔为郢论奏,唐朝廷以郢为太子率府率,郢拒不赴职。乾符四年(公元八七七年)正月,王郢诱执鲁寔。二月,郢攻破望海镇,掠明州(治鄞,今浙江宁波市南),又破台州。朝廷下诏二浙、福建各出舟师进行追讨。

王郢把主力引向浙西,镇海节度使裴璩一面严兵设备,而避免正面作战;一面秘密招降王郢部将朱实,散其徒六七千人。同年四月,郢收余众东至明州,为唐兵射杀。王郢的海上起义,就此失败。

**王仙芝、黄巢起义** 唐僖宗乾符元年(公元八七四年)冬末,濮州(治鄄城,今山东鄄城县北)人王仙芝,聚众数千人,在长垣(今河南长垣县)首义。乾符二年(公元八七五年)正月初三日,王仙芝传檄诸道,“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资治通鉴考异》引《续宝运录》)。不久,就攻陷了濮州、曹州(治济阴,今山东定陶县西北),起义队伍发展到数万人。冤句(今山东菏泽县西南)人黄巢聚众数千人响应王仙芝的起义。“巢少与仙芝皆以贩私盐为事,巢善骑射,喜任侠,粗涉书传,屡举进士不第”,兼有士人和豪侠的身份。他聚众起义后,与王仙芝协同作战,“横行山东,民之困于重斂者争归之,数月之间,众至数万”(《资治通鉴》唐乾符二年)。当时小股的农民起义队伍到处都是,北自濮曹,南至淮南,多者千余人,少者数百人。唐政府密诏宣武(镇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市)、感化(镇徐州彭城,今江苏徐州市)节度使、泗州防御使(治临淮,今江苏盱眙县北),选精兵数百人于巡内游弈,防卫纲(漕运)船,可见农民起义已威胁到唐漕运的畅通,所以唐政府不得不动调各道军队加强运河沿线的防务。

乾符二年十二月,王仙芝在进攻沂州(治临沂,今山东临沂县)时,见唐军向运河全线集中,为避免和唐军决战,遂挥兵西向,乘虚袭击东都洛阳外围地区,接连攻下了阳翟(今河南禹县)、郟城(今河南郟县)。唐军增

强了洛阳和陕州（治陕县，今河南三门峡市）、潼关的军事力量。王仙芝转而南下，于乾符三年（公元八六七年）九月攻克汝州（治梁县，今河南临汝县），活捉汝州刺史王镣。汝州离开洛阳只有一百六十里地，汝州的陷落，使洛阳震惊，士民纷纷挈家外逃。鉴于东都受到严重威胁，唐政府使出诱降花招，宣布赦免王仙芝及其部将尚君长，并将除官授职。王仙芝并不理会，率众北攻郑州（治管城，今河南郑州市）不利，南向转攻唐（州治比阳，今河南泌阳县）、邓（州治穰县，今河南邓县）。十一月，连下郢（州治京山，今湖北京山县）、复（州治沔阳，今湖北沔阳县西南）二州，转战申（州治义阳，今河南信阳县）、光（州治定阳，今河南潢川县）、庐（州治合肥，今安徽合肥市）、寿（州治寿春，今安徽寿春县）、舒（州治怀宁，今安徽潜山县）、蕲（州治蕲春，今湖北蕲春县北）等州。由于扬州唐军兵力集中，所以王仙芝军队不再向东推进，暂时驻军蕲州郊外。

被王仙芝所俘虏的汝州刺史王镣，是宰相王铎的堂弟；蕲州刺史裴偓，又是王铎知举时的门生。王镣为王仙芝写信给裴偓，表示愿意接受“招安”。裴偓据以上奏朝廷，王铎固请“招安”，唐政府便任命王仙芝为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仙芝有意接受，黄巢却十分愤怒，说：“当初共立大誓，横行天下。如今你去左神策军做官，众多士卒将何处安身？”他和部众坚决反对投降，迫使王仙芝放弃唐政府授予的官职。一部分起义军由王仙芝、尚君长统率，另一部分起义军由黄巢率领，“分道而去”。黄巢挥兵北上，乾符四年（公元八七七年）正月，攻克郢州，杀天平节度使薛崇；三月，又攻破沂州，最后把军队拉入查牙山（今河南遂平县西），和尚君长弟尚让合军。一度围攻宋州（治宋城，今河南商丘县北），企图切断运河交通，由于唐军堵击，又折而南略蕲、黄（州治黄冈，今湖北新洲县），北扑濮州（治鄆城，今山东鄆城县北）、滑州（治白马，治河南滑县东），进攻洛阳外围的叶（今河南叶县南）、阳翟（今河南禹县）。唐政府为了保卫东都，调动重兵来东都一带布防，黄巢就又挥兵南下了。

王仙芝和黄巢分道扬镳以后，一度过江攻下鄂州（治江夏，今湖北武汉市），但其主力还在江北。义军连破安州（治安陆，今湖北安陆县）、随州（治随，今湖北随县），又向郢（州治京山，今湖北京山县）、复（州治沔阳，今湖北沔阳县西南）一带作战略的转移。这时唐招讨副使、都监、宦官杨复光派人去劝诱王仙芝投降，王仙芝派尚君长等去邓州见杨复光，中途为唐平卢节度使（镇青州益都，今山东益都县）、招讨使宋威所劫取，宋威谎报是临阵生擒，复光奏称尚君长等实系投降，非威所擒。唐政府派御史就地审讯无结果，把尚君长解往长安斩首。

乾符五年（公元八七八年）正月，王仙芝攻入江陵外郭，有沙陀兵五百骑从襄阳驰援江陵，王仙芝兵败撤走。同月，唐把作战不力的宋威撤回青州，任命曾元裕为招讨使。黄梅（今湖北黄梅县西北）决战，义军五万壮烈牺牲，王仙芝也战死在沙场。王仙芝的余部王重隐一支，攻破洪州（治豫章，今江西南昌市），转略湖南。重隐的别将另一义军将领曹师雄向东进军宣（州治宣城，今安徽宣城县）、润（州治丹徒，今江苏镇江市）。宣、润是江淮的重镇，江南的粮食在此集中，唐政府急派招讨使曾元裕、副使杨复光调遣重兵驻防宣、润。曹师雄掉转兵锋进攻湖州（治乌程，今浙江吴兴县）。镇海节度使裴瓌遣兵击退曹师雄。洪州方面，王重隐战死，义军另一将领徐唐莒继续驻守洪州。唐政府为了加强浙西方面的力量，调高骈充任镇海军节度使。

**黄巢起义军的南下与北征** 在王仙芝战死的时候，黄巢正在攻打亳州（治谯县，今安徽亳县），尚未攻下。王仙芝一死，王仙芝在长江以北的余部由尚让率领，和黄巢军会合。王仙芝的失败，尚君长的被杀，使黄巢为首的起义军将领觉悟到和唐王朝绝无妥协的余地，决定建立军政府，公推黄巢为主，号冲天大将军，改元“王霸”，署置官属。在战略部署方面，唐的重兵，集结在东都附近和运河全线以及长江北岸西起江陵东抵扬州沿线，义军不当留滞在这些地区和官军作战，应该向唐军力量薄弱地区进军。乾符五年三月，黄巢的起义军，就作战略上的转移，渡江而南了。起义军连续攻下虔（州治赣县，今江西赣州市）、吉（州治庐陵，今江西吉安市）、饶（州治鄱阳，今江西波阳县）、信（州治上饶，今江西上饶市）四州。八月，攻宣州不克，乃引兵攻浙东，开山路七百里（由衢州至建州建瓯凡七百另五里，路线是由衢县至浦城、建瓯，不经过仙霞岭），进入福建。十二月，攻下福州，观察使韦岫弃城逃走。乾符六年（公元八七九年），又由福州出发，进军岭南。唐统治阶级镇压不成，酝酿“招安”，黄巢提出任命他为广州节度使，唐政府因广州是海外贸易大港和财源重地，不肯让黄巢占有，只任命他为太子率府率。黄巢大怒，急攻广州，即日攻克，活捉节度使李迢。

起义军在岭南因水土不服，士卒遇上瘴疫（大概是恶性疟疾），病死的很多。黄巢接受部下的意见，决定北还以图大事。乾符六年十月，黄巢自号义军百万都统，发表檄文，宣称即将入关，历数唐王朝宦官专权、官吏贪暴、考选不公等弊政，禁止刺史积攒私财，县令犯赃者族诛。义军自桂州（治始安，今广西桂林市）乘大筏，沿湘江顺流而下，经衡州（州治衡阳，今湖南衡阳市）、永州（治零陵，今湖南零陵县），直抵潭州（治长沙，今湖南长沙市）城下，一天就攻下潭州城。尚让乘胜进逼江陵，众号五十万。当时江陵唐兵不满万人。荆南节度使（镇江陵）、南面行营招讨都统王铎留部将刘汉宏守江陵，自己率众退往襄阳。王铎刚离开江陵，刘汉宏就大掠江陵，焚荡殆尽，士民逃窜山谷，碰上大雪，僵尸满野。在刘汉宏焚烧江陵城之后的十多天，义军占领了江陵。

这年十一月，黄巢率军北趋襄阳。唐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和江西招讨使曹全晷联军驻扎荆门（今湖北荆门县），设伏逆战，义军中伏大败，损折较重。义军就转从江陵市渡长江，向东推进，攻破鄂州外郭，转战饶、信、池（州治秋浦，今安徽贵池县）、宣、歙（州治歙县，今安徽歙县）、杭（州治钱塘，今浙江杭州市）等州，人数很快又发展到二十万人。唐王朝加强了江淮的军事部署，调任镇海节度使高骈为淮南节度使，旋任马诸道行营都统，以周宝为镇海节度使。高骈因兼任诸道兵马都统，一方面传檄徵调天下兵，一方面自行召募，得土（淮南道）、客（诸道）兵共七万人，藉以扩大声势。

广明元年（公元八八一年）四月，高骈部将张璘渡江进攻黄巢，巢退保饶州，义军将领常宏率众数万降敌。璘进陷饶州，黄巢退保信州。义军在信州又遇疾疫，士卒患病、死亡的很多，战斗力大为削弱。张璘乘机急攻，黄巢用大量黄金贿赂张璘，表示要向高骈投降，高骈信以为真，答应向唐政府保奏，替黄巢谋求节度使的职位。当时昭义（泽潞）、感化（徐泗）、义成（镇滑州白马，今河南滑县东）等兵马数万，集中在淮南，高骈怕诸道平分他的功绩，奏称黄巢不日可以平定，不烦诸道兵，请悉遣归。唐政府果然把三道兵马各遣归本镇。这么一来，义军就从劣势转变为优势，趁机和唐军决战，结果唐军大败，张璘阵亡。六月，义军分兵攻破睦州（治建德，今浙江

建德县东)、婺州(治金华,今浙江金华县)。义军主力在黄巢亲自指挥下,攻下宣州。七月,自宣州的采石矶(今安徽马鞍山市长江东岸)渡江,进围六合(今江苏六合县)、天长(今江苏天长县),兵势甚盛。高骈畏怯不敢出兵,一再上表告急,朝廷失望,下诏谴责,高骈索性假装风病发,但求自保而已。唐新任命的天平节度使兼东西副都统曹全晷率军六千退屯于泗水之上,被义军一举击溃。九月,“黄巢遂悉众渡淮,所过不虏掠,惟取丁壮以益兵”(《资治通鉴》唐广明元年)。

**黄巢起义军进占长安** 黄巢起义军渡淮之后,攻下申州(治义阳,今河南信阳市),转战颍(州治汝阴,今安徽阜阳县)、宋(州治宋城,今河南商丘县)、徐(州治彭城,今江苏徐州市)、兖(州治瑕丘,今山东兖州县)诸州境界,所到之处,官吏逃溃,如履无人之境。广明元年十一月,黄巢大军进入汝州(治梁县,今河南临汝县)境内,逼近东都洛阳了。黄巢自称天补大将军,发布檄文通告唐诸道:“各宜守垒,勿犯吾锋!吾将入东都,即至京邑,自欲问罪,无预众人。”十一月十一日,唐僖宗开延英殿商讨对策,当权宦官军容使田令孜奏请拣选左右神策军弓弩手防守潼关,同时作逃蜀的准备。唐僖宗于是选调神策军弓弩手二千八百人,任命左神策军马军将军张承范为把截潼关制置使,去把守潼关。十四日,义军轻而易举地攻克洛阳,唐东都留守刘允章率百官迎谒,黄巢入城,劳问而已,闾里晏然。二十一日,义军又攻下虢州(治宏农,今河南灵宝县北),已经逼近潼关了。

唐神策军士皆长安富家子弟,由于贿赂宦官窜名军籍,平时只知华衣怒马,凭势使气,未尝经历战阵;一旦听说要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贫人代行,他们往往不能操刀持枪,唐军的战斗力就可想而知了。十二月初一日,张承范率神策军到达潼关,和唐前线溃军一万多人汇合,但两军皆绝粮,士卒没有斗志。同一天,义军前锋进抵关下,白旗满野,不见边际。一会儿,黄巢亲临战场,举军大呼,声振河、华。接战结果,唐军大败。初二日,义军急攻潼关,关左有一山谷,平日禁止行人来往,谓之“禁阨”,谷中灌木寿藤(万岁藤),茂密如织。义军乘夜进入禁谷。初三日晨,前后夹攻潼关,关上唐兵溃散,张承范变服逃走。田令孜闻义军已破潼关,乃谗过于坚持主张镇压起义军的宰相卢携,免去其职务,携服药自杀。十二月初五日,田令孜率神策军五百人奉唐僖宗逃出长安城,只有少数皇族和妃嫔从行,宰相和百官都不知道。

初五日中午,义军前锋将柴存进入长安,金吾大将军张直方帅唐文武数十人迎黄巢于灞上。义军号称六十万,“甲骑如流,辎重塞途,千里络绎不绝。民夹道聚观,尚让历谕之曰:‘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义军将士见到穷苦市民往往施与财物。十二月十二日,黄巢即皇帝位于含元殿(大明宫正殿),“击战鼓数百以代金石之乐。登丹凤楼,下赦书,国号大齐,改元金统”(《资治通鉴》唐广明元年)。黄巢任命尚让为太尉、中书令,赵璋为侍中,崔璆(唐前浙东观察使)、杨希古并同平章事,孟楷、盖洪为左右仆射、知左右军事,费传古为枢密使。除了崔璆以外,大齐朝的军政大权紧紧地掌握在农民起义军将领手中。

黄巢占领长安后,“杀唐宗室在长安者无遗类”。并命令唐官三品以上一律停职;四品以下留任,不过要到赵璋府第投递名衔(名片),才得复官。唐宰相豆卢瑑、崔沆及左仆射于琮、右仆射刘邺、太子少师裴谔(裴度子)等,逃匿民间,被搜获后全都处死。金吾大将军张直方虽领銜到灞上迎降,

但是他的永宁里府第，多匿公卿，藏于复壁，黄巢发觉后，杀掉直方一家。

唐僖宗从长安逃往兴元（梁州南郑，今陕西汉中市），翌年正月又逃奔成都。唐凤翔节度使（镇岐州雍县，今陕西凤翔县）郑畋在凤翔“完城堑，缮器械，训士卒，密约邻道合兵”拒巢，“邻道皆许诺发兵，会于凤翔。时〔神策〕禁兵分镇关中者尚数万”，闻唐僖宗逃蜀，“无所归，畋使人招之，皆往从畋，畋并分财以结其心。军势大振”。河中节度使（镇河中府河东县，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王重荣开始伪降于黄巢，后来因黄巢的军政府“调财不已，又将徵兵”，河中吏民杀巢使臣，黄巢遣弟黄邺、大将朱温率兵进攻河中，反为重荣所败。义武节度使（镇定州安喜，今河北定县）王处存亲自率部入援。夏绥节度使（镇夏州朔方，今内蒙古乌审旗白城子）拓跋思恭也纠合夷、夏之兵，会鄜延节度使（镇鄜州洛交，今陕西富县）李孝昌联军同盟拒巢。唐王朝任命郑畋为京城四面诸军行营都统，畋奏以泾原节度使（镇泾州安定，今甘肃泾水县北）程宗楚为副都统，前朔方节度使唐弘夫为行军司马。唐军结集得很快。黄巢在中和元年（公元八八一年）二月，命尚让率众五万进攻凤翔，结果，义军中伏失利，损折过半。四月，唐军向长安推进，唐弘夫屯渭北，王重荣屯沙苑（今陕西大荔县南），王处存屯渭桥，拓跋思恭屯武功（今陕西武功县西北），郑畋也进驻整屋（今陕西周至县）。

四月初五日，唐弘夫率军进逼长安，黄巢率众撤出长安，唐弘夫、程宗楚、王处存三军进入长安，得到官僚、地主和富裕市民的欢迎。进入长安的唐军，纷纷放下兵器，闯入第舍，抢掠金帛妇女。义军侦知城中混乱情况，出兵自诸门分入，与唐军展开剧烈巷战，唐弘夫、程宗楚战死，唐军死者什八九。王处存收余众退出长安，还营渭桥。初十日，黄巢回到长安，“怒民之助官军，纵兵屠杀，流血成川，谓之洗城”（《资治通鉴》唐中和元年）。包围长安城的各路唐军，遭此挫败，只得撤围。

**黄巢的退出长安与起义军的最后失败** 黄巢领导的起义军，从转战中原，到远征岭南，又从岭南北返，渡淮以后，直指长安。起义军利用唐各地藩镇军事势力的不平均，有时乘虚，如略地福建，进军岭南；有时攻坚，如破江陵，越淮南；以至破东都，破潼关，入长安，从战略部署来讲，都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要摧毁旧势力容易，要建立新秩序困难。黄巢转战全国，攻城略地，获得一城，放弃一城，不知道建立根据地，起义军的队伍虽壮大发展，从二十万发展到六十万，军队不集中，力量就要分散；军队一集中，给养可就困难了。给养一困难，军队的纪律很难维持，人民正常生活没有保障，新秩序就无法建立起来。

唐王朝的经济命脉，主要依靠扬州和益州。唐僖宗逃蜀，就是依靠益州的资源来养兵养官。高骈割据淮南，偃蹇不臣；周宝据浙西，控制两浙，江淮粮食自然不会供应关中、洛阳。关中和洛阳失去扬、益的经济支援，处境就十分艰难了。

黄巢击败唐军，再次进入长安。他不趁兵力全盛的时候，转移阵地，这是最大的失策。困守是待援，困守而无援可待，要这座长安孤城何用呢？取得长安，并不是农民革命最后的成功，应该及时扩大控制地区，建立稳固的根据地，然而黄巢却依旧留恋长安，只能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唐军在长安巷战失败之后，藩镇内部还是矛盾重重。武宁节度使（镇徐州彭城，今江苏徐州市）支详为其部将陈璠所杀，另一部将时溥又杀璠，后被任命为武宁节度使。凤翔行军司马李昌言利用凤翔仓库虚竭，“粮馈不继”，

激怒士兵，还袭府城，逼迫凤翔节度使、西面诸军行营都统郑畋出走，畋西奔成都，由李昌言出任凤翔节度行营招讨使。唐政府在中和二年（公元八八二年）正月，任命首相王铎充任诸道行营都都统，兼义成节度使（镇滑州白马，今河南滑县东），指挥调度关中全线军事。王铎统率西川、东川、梁州（山南西道）三路兵马，驻军于盩厔（今陕西周至县），泾原节度使（镇泾州安定，今甘肃泾川县北）张钩的军队驻扎在京西，易定节度使王处存和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两军驻扎在渭北，凤翔节度使李昌言的军队驻扎在兴平，鄜坊节度使李孝昌和夏绥节度使拓跋思恭的军队驻扎在渭桥，忠武节度（镇许州长社，今河南许昌市）的军队，由监军（宦官）杨复光带领，攻下邓州（治穰县，今河南邓县），并把兵锋推进到蓝田关（今陕西蓝田县东南），进屯武功（今陕西武功县西）。唐军缩紧了对长安的包围，起义军中的动摇分子开始在动摇了。

黄巢大将同州防御使朱温见义军兵势日蹙，知黄巢将亡，九月间杀监军严实，以同州投降王重荣。大齐华州刺史李详也想降唐，为监军告发，黄巢杀李详，以弟黄思邺为华州刺史。唐僖宗见到朱温降表，以朱温为右金吾大将军、河中行营招讨副使，并赐名全忠。唐政府尽量采用收买政策，收买义军叛徒，分化义军队伍。

这时西突厥余部沙陀部落酋长李赤心，附塞后，帮助唐王朝镇压庞勋起义有功，官至振武节度使（治单于都护府，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后来为吐浑大同节度使赫连铎所袭，逃奔塞外的达靼部落。其子李克用骁勇善战，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和行营都监杨复光向都都统王铎进言，调用这支部队来镇压屠杀农民军。中和二年（公元八八二年）十二月，唐王朝任命李克用为雁门节度使（镇代州雁门，今山西代县），令其带领军队四万人，开至河中。中和三年（公元八八三年）正月，李克用败黄巢弟黄揆于沙苑（今陕西大荔县东南）。王铎承制以李克用为东北面行营都统。这时十军兼十二卫观军容使田令孜怕王铎抢立头功，在唐僖宗面前说了王铎坏话，攻击王铎讨黄巢久无功，罢免其都都统的职务，任命他为义成节度使（镇滑州白马，今河南滑县东）。任命都都监西门思恭为右神策护军中尉，充诸道租庸兼催促诸道进军等使，代替王铎，指挥全线战事。

二月，李克用进军乾阨（今陕西大荔县西），与河中（王重荣）、易定（王处存）、忠武（杨复光以监军将忠武军）三道联军，同农民军决战。这时农民军集结在梁田陂（今陕西华县西）一带，约有十五万人，决战结果，农民军损失惨重。李克用进围华州（今陕西华县）。黄巢命尚让率军增援华州，李克用、王重荣联军击败尚让军，进拔华州，华州守将黄揆弃城撤退。

农民军一再失利，粮食复尽，准备放弃长安，先发兵三万扼守蓝田道。农民军与李克用及诸道军再次大战于渭南（今陕西渭南县），又大败。四月初八日，沙陀、忠武、河中等军进入长安，农民军焚宫室向蓝田关撤退。唐军入城后，把长安劫掠一空，“长安室屋及民所存无几”（《资治通鉴》唐中和三年）。黄巢经过蔡州（治汝阳，今河南汝南县），唐蔡州节度使秦宗权战败，称臣降巢，和巢联军。黄巢经过陈州（治宛丘，今河南淮阳县），使其骁将孟楷进攻陈州，楷战败被杀，黄巢大怒，率众围攻陈州。从中和三年六月，直到中和四年（公元八八四年）四月，包围陈州达三百天之久。黄巢的退军路线，在战略上来讲，并没有错误，出蓝田关，经蔡州，然后经过陈州、亳州，到达徐泗，取淮南道作根据地，再来和唐一决胜败。可是黄巢

围攻陈州三百天，大小数百战，不但士卒疲惫不堪，而且迁延时日，使淮南北的方镇有了准备，唐军又跟踪追击，这是严重的失着。黄巢不得不撤围东走。五月，大雨，平地水深三尺，农民军营寨为大水所漂。黄巢引兵东北直指大梁，身为宣武节度使的朱温，赶紧向沙陀酋长李克用求救。李克用追及黄巢军于中牟（今河南中牟县）北王满渡，乘农民军渡河时发起攻击，农民军大败。大将尚让率军万余人，向徐州方向转移，投降武宁节度使时溥。其余将领李愬、葛从周、张归霸等也背叛黄巢，率部投降朱温。

李克用率沙陀兵紧紧追击黄巢，经过封丘（今河南封丘县）、胙城（今河南延津县北三十里）、匡城（今河南长垣县南），直到冤句（今山东菏泽县西南），昼夜行军，人马疲乏，粮尽，乃还汴州。

黄巢率余众东奔兖州（治瑕丘，今山东兖州县），唐武宁节度使时溥遣部将李师悦率兵万人，会同叛徒尚让尾追不舍。六月十五日，瑕丘一战，黄巢身边人马丧亡殆尽，黄巢退至狼虎谷（在泰山东南莱芜界）。六月十七日，黄巢见自己已无路可走，谓外甥“林言曰：‘汝取吾首……可得富贵，毋为他人利’”（《新唐书·黄巢传》）。“外甥再三不忍下手，黄巢乃自刎过与外甥”（《资治通鉴考异》引《续宝运录》）。林言乃将黄“巢及二弟邺、揆等七人首并妻子函送徐州”（《旧唐书·黄巢传》）。路遇沙陀、博野军，杀林言，夺黄巢等首级，送往徐州献给时溥请赏。

黄巢死后，巢从子黄浩率领义军余部七千，转战江湖间，自号“浪荡军”。昭宗天复（公元九一—九四年）初，攻破浏阳（湖南浏阳县），“欲据湖南”（《新唐书·黄巢传》）。湘阴（今湖南湘阴县西）土豪邓进思设伏山中，浩遭到狙击，被杀害。

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从乾符元年（公元八七四年）十二月，王仙芝起义濮州，至中和四年（公元八八四年）六月，黄巢在狼虎各牺牲，前后十年，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唐王朝也从此分崩离析，终究趋于覆亡了。中国封建社会划分时期的话，从魏晋到唐五代，应该属于一个阶段。这阶段又有三个较大的变化，从魏黄初九品中正制的实施，部曲佃客制度的出现，到隋代的废除九品中正制，唐的发展科举制，世家大族政治垄断地位的逐渐动摇，这是第一个变化。从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七八年）租庸调制度的废除，和两税法的实行，标志着封建经济发生较大变化，部曲佃客的隶属地位也在发生变化，庶族田庄经济正在发展，这是第二个变化。唐末农民大起义，终于使《唐律》废弃了（当然其中有些条文还是被后来的封建法典继承下来，在《大明律》里还能找到它的痕迹），把《氏族志》确定的世家大族的地位冲淡了，这是第三个变化。这些连续不断的变化，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向更高阶段发展，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 第三节唐王朝的覆亡

**僖宗的弊政** 唐僖宗即位时，年才十二，委政事于枢密使、神策军中尉田令孜，呼令孜为“阿父”。令孜“多巧数，招权纳贿，除官及赐绯（四品服深绯，五品服浅绯），紫（三品以上服紫），皆不关白于上”。“上与内园小儿狎昵，赏赐乐工、伎儿，所费动以万计，府藏空竭”（《资治通鉴》唐乾符二年）。

僖宗“好骑射、剑槊、法算，至于音律、蒲博，无不精妙；好蹴鞠、斗鸡”，“尤善击球。尝谓优人石野猪曰：‘朕若应击球进士举，须为状元’”（《资治通鉴》唐广明元年）。僖宗专事游戏，不亲政事。西川是唐王朝的命脉所在，和江淮一样，只要扬益两地掌握在唐王朝手里，唐王朝就能苟延残喘的。广明元年，当黄巢从岭南出兵攻下江陵之际，僖宗听从宦官田令孜的建议，免去崔安潜的西川节度使职位，任命左神策大将军陈敬瑄（田令孜兄，令孜本姓陈）为西川节度使，并以左神策大将军杨师立为东川节度使，牛勛为山南西道节度使。据说他们奉命以“击球赌三川”，西川最富庶，陈敬瑄击球得第一筹，所以被任命为西川节度使。

西川在崔安潜任节度使的时期，治安情况比较好，人民也较能安居乐业。到了陈敬瑄代替崔安潜充任西川节度使，继而僖宗逃蜀，蜀人的剥削负担加重，蜀地也日益多事。陈敬瑄多遣人历县镇歷（刺探）事，谓之“寻事人”，到处诈取财物。中和二年（公元八八二年），有两个寻事人到了资阳镇（今四川资阳县），独无所求。两人离开后，资阳镇将谢弘让心里疑惧，亡命深山。捕盗使杨迁诱使弘让出山自首，却执送至节度使府，诡称讨击擒获以求功。敬瑄不加讯问，杖弘让脊二十，钉于城西十四日，煎油泼之，又以胶麻掣其疮，备极惨酷。又有邛州（治临邛，今四川邛崃县）牙官阡能，因公违期，避杖亡命，闻弘让之冤，大骂杨迁，集众起义。逾月，众至万人，立部伍，署职级，转战邛、雅（州治严道，今四川雅安县）二州间，攻夺城邑。蜀人罗浑擎、句胡僧、罗夫子、韩求各聚众数千人响应阡能。陈敬瑄遣牙将杨行迁等率兵五千，与阡能战于乾溪（今四川双流县界内），官军大败。行迁等恐无功获罪，多执村民为俘送府，日数十百人，敬瑄不问，悉斩之。其中亦有老弱及妇女，观者或问之，都说：“我方治田绩麻，官军忽入村，系虜以来，竟不知何罪”（《资治通鉴》唐中和二年）。陈敬瑄用恐怖屠杀的手段，来镇压西川人民，阡能的势力便从邛、雅发展到蜀州（治晋原，今四川崇庆县）。陈敬瑄最后还是调动了劲旅，改派西川节度押牙高仁厚为都招讨指挥使，镇压起义群众，剿抚兼施。结果，韩求和罗夫子在战斗中牺牲，阡能、罗浑擎等被俘后惨遭杀害。

这时又有韩秀昇、屈行从起兵，截断长江三峡通路。陈敬瑄选点兵士三千人，由押牙庄梦蝶押领，前往镇压，反为韩秀昇所败，退保忠州（今四川忠县）。江淮贡赋，皆为所阻。云安（今四川云阳县）至涪井（今四川珙县西）间路又不通，民间乏盐。陈敬瑄又派遣高仁厚出兵镇压，擒韩秀昇、屈行从。仁厚诘问他们：“何故反？”秀昇答：“自大中皇帝（指唐宣宗）晏驾，天下无复公道，纽解纲绝。今日反者，岂惟秀昇，成是败非，机上之肉，惟所烹醢耳”（《资治通鉴》唐中和三年）。这几句话，道出了官逼民反的政治现实。

高仁厚平阡能、韩秀昇，立了大功。陈敬瑄曾对他说，“成功而还，当奏天子，以东川相赏。”东川节度使杨师立听说后，难免有怨言。田令孜藉口杨师立对韩秀昇的起兵防范不力，徵师立为尚书右仆射，免除他的东川节度使职位。杨师立大怒，历数陈敬瑄十条罪状，举兵讨伐陈敬瑄。陈敬瑄又荐高仁厚为东川留后，率兵进攻师立，东川兵败，鄆县被围，师立自杀。高仁厚遂出任东川节度使。可是陈敬瑄后来又猜忌高仁厚，光启二年（公元八八六年），还是把他杀害了。

秦宗权，蔡州上蔡（今河南上蔡县）人，本来是许州（治长社，今河南许昌市）的衙将。黄巢入长安，秦宗权拥有劲卒万人，忠武（镇许州）监军杨复光要利用他，提拔他为蔡州节度使（又名奉国军节度使，镇汝阳，今河南汝南县）。中和三年（公元八八三年），黄巢退出长安，经过蔡州时，秦宗权逆击农民军，遭到惨败，就转而又和黄巢连和，只是想保持地盘而已。黄巢起义失败以后，秦宗权的势力却得到发展，四出掠地，“所至屠翦焚荡，殆无孑遗”。“北至卫、滑，西及关辅，东尽青、徐，南出江淮”，“极目千里，无复烟火”（《资治通鉴》唐光启元年）。光启元年（公元八八五年），秦宗权还在蔡州自称皇帝，署置百官。到文德元年（公元八八八年）才失败，被部将囚禁起来，降于朱温，朱温把他送往长安处死。秦宗权作乱，前后历时六年，给中原地区带来了很大的破坏。

唐僖宗于光启元年（公元八八五年）三月，回到长安。长安经过两次巷战和官军的烧掠，破坏不堪，“荆棘满城，狐兔纵横”。朝廷号令所行，惟河西、山南、剑南、岭南数十州而已。唐僖宗在成都时，田令孜曾招募新军五十四都，每都千人，分隶左右两神策军。又南牙、北司官共万余员。当时藩镇各专租税，度支惟收京畿、同、华、凤翔等数州租税，不能赡养军队。赏赉不时，士卒有怨言。原先属榷盐使管辖的蒲州安邑、解县（皆在今山西运城县境内）盐池，中和以来，都归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所擅有，每年献盐三千车，以供国用。田令孜奏请唐僖宗，尽收两池盐利以赡军，并任命自己兼两池榷盐使。又把河中节度使王重荣调充泰宁节度使（镇兖州）。王重荣不肯去兖州，和太原节度使李克用联合在一起，声讨田令孜。田令孜也结好邠宁节度使（镇邠州新平，今陕西彬县）朱玫、凤翔节度使（镇岐州雍县，今陕西凤翔县）李昌符来对抗李克用、王重荣。沙苑会战，朱玫、李昌符大败，京城危急，田令孜与唐僖宗逃往凤翔。李克用、王重荣同表请大驾还宫，并请诛田令孜。田令孜乃劫唐僖宗往宝鸡（今陕西宝鸡市），又自宝鸡度大散关（今大散关）逃至兴元（今陕西汉中市）。朱玫、李昌符也不愿受田令孜利用，反而联合李克用、王重荣反对田令孜。田令孜到了兴元以后，自知不为藩镇所容，自任为西川监军使，推说有病，到成都求医，依靠他的哥哥西川节度使陈敬瑄去了。另一大宦官枢密使杨复恭兼任左神策中尉、观军容使。唐朝廷的权力，这时不在南牙，而在北司，由田令孜转移到杨复恭手里。

光启二年（公元八八六年）四月，朱玫召集凤翔百官，拥立唐肃宗之子襄王儂的曾孙襄王焜为主，初称“权监军国事，承制封拜指挥”。玫率百官迎焜回长安。同年十月，焜即皇帝位。朱玫自加侍中，兼左右神策十军使，诸道盐铁转运等使。朱玫拉拢淮南节度使高骈，任命他兼中书令，充江淮盐铁转运等使，诸道行营兵马都统，同时任命高骈的左右手淮南右都押牙、和州刺史吕用之为岭南东道节度使，大行封拜，以取悦藩镇。

朱玫虽然拥立襄王焜，又自为宰相，以号令藩镇。但襄王焜终究是远房

宗室，没有号召力，朱玫的兵力又有限，无法挟天子以令诸侯，所以很快就失败了。凤翔节度使李昌符原是和朱玫合谋拥立襄王煊的，既而见朱玫自为宰相专权，怏怏失望，拒绝接受襄王煊加封他的官号，更通表兴元。兴元方面，唐僖宗又遣使笼络王重荣，重荣听命，表献绢十万匹，且请讨朱玫以自赎。李克用也移檄邻道，声讨朱玫谎称僖宗晏驾，擅立襄王煊的罪行。僖宗因命扈从军会同重荣、克用军，共讨朱玫。

光启二年（公元八八六年）十二月，朱玫为部将王行瑜所杀，京城大乱。襄王煊逃奔河中，为王重荣所杀。

僖宗于光启三年（公元八八七年）三月，由兴元返至凤翔，因长安破坏严重，宫室未完，暂时驻蹕凤翔。文德元年（公元八八八年）二月，僖宗发病，从凤翔回到长安。三月，病危，大宦官杨复恭请立皇弟寿王杰，僖宗下诏立寿王杰为太弟，监军国事。僖宗旋即病死，年二十七。寿王杰即皇帝位，更名敏，是为昭宗。

**王建得蜀** 田令孜离开唐僖宗身边，藉口到西川去寻医养病。因为民愤太大，另一大宦官杨复恭擅政，下诏削夺田令孜官爵，长流端州（治高要，今广东肇庆市）。令孜依靠其兄西川节度使陈敬瑄势力，置之不理，朝廷也无奈何他。

昭宗为寿王时，随僖宗逃蜀，徒行至山谷中，足痛，求令孜给一马。令孜以鞭鞭之使前。寿王顾而不言，心衔之。昭宗即帝位，恨田令孜、陈敬瑄误国，文德元年（公元八八八年）六月，任命韦昭度为西川节度使，徵召陈敬瑄入京。陈敬瑄治兵完城，拒绝韦昭度入川。

王建，陈州项城（今河南沈丘县）人，出身忠武镇（镇许州长社，今河南许昌市）牙将。忠武监军杨复光抽调忠武军八千人，立为八都，每都一千人，后来八都围攻黄巢于长安，王建是八都中的一个都头。杨复光病死（在中和三年，即公元八八三年），王建随另一都头鹿晏弘至山南西道的兴元（今陕西汉中市），据有其地。晏弘自称节度留后，以王建为属郡刺史，但还是率领军队，没有实际地盘。唐僖宗在成都时，田令孜派人去游说王建，王建等五个都头率众数千，逃奔成都，田令孜都把他们收为养子，“拜诸卫将军，使各将其军，号随驾五都”（《资治通鉴》唐中和四年）。唐僖宗第二次逃奔兴元，王建时为神策军使，护驾有功。杨复恭上台后，因为王建是田令孜的养子，杨复恭不愿意他带领禁军，外放王建为利州（治绵谷，今四川广元县）刺史。

僖宗光启三年（公元八八七年），杨复恭以养子杨守亮为山南西道节度使，镇兴元。守亮忌王建骁勇，要将王建调回兴元，王建惧怕为守亮所杀，召募当地酋豪，有众八千，沿嘉陵江而下，袭据阆州（治阆中，今四川阆中县），自称东川防御使。王建和东川节度使顾彦朗曾同在神策军共事，王建据有阆州之后，彦朗时时接济军粮，王建也不侵犯东川地界。陈敬瑄怕顾彦朗和王建合兵进图西川，同田令孜商议这事。田令孜谓建系养子，可以招致麾下，就作书召王建。王建大喜，率军进至鹿头关（今四川德阳县北）。陈敬瑄却在西川参谋李义规劝下，派人劝止王建，且增守备。王建大怒，攻破鹿头关，连拔汉州（治雒县，今四川广汉县）及德阳县（今四川德阳县），直抵成都城下。攻城不下，退屯汉州。

昭宗即位，免除陈敬瑄西川节度使职务，另派韦昭度为西川节度使，割邛（州治临邛，今四川邛崃县）、蜀（州治晋原，今四川崇庆县）、黎（州

治在今四川汉源县北)、雅(州治严道,今四川雅安县)四州置永平军,以王建为节度使,治邛州。王建与韦昭度会师围攻成都有三年之久,韦昭度意欲撤兵,王建令部将杀韦昭度亲吏,诬其私盗军粮,昭度大惧,托疾东归,把印节授与王建。当时成都城中乏食,饿殍狼藉,王建围攻益急。大顺元年(公元八九一年)八月,田令孜自携西川印节授建,王建遂入成都。唐政府任命王建为西川节度使。过了二年,王建杀陈敬瑄于新津(今四川新津县);下田令孜于狱,不给食,令孜饿死。

昭宗乾宁四年(公元八九七年),王建发兵攻下梓州,兼并东川。昭宗天复二年(公元九〇二年),王建以假道勤王为名,进占兴元,取得山南西道。这样,三川都归王建统治了。

**高骈、周宝的败亡与江淮的战乱** 高骈是唐宪宗时期平刘辟的西川节度使高崇文的孙子,家世仕禁军。骈累历右神策军都虞侯。懿宗咸通五年(公元八六四年),出为安南都护。以功迁天平军节度使。僖宗乾符元年(公元八七六年)移镇成都,为西川节度使。他在乾符三年(公元八七六年)筑成都罗城,周二十五里,不到四个月,城就筑成,转为荆南节度使。乾符四年(公元八七七年),又迁镇海节度使(即浙江西道,镇润州丹徒,今江苏镇江市)。乾符六年(公元八七九年),迁淮南节度使,兼江淮盐铁转运使,诸道兵马都统。

黄巢起义军自岭南北上,由采石渡长江,又由泗州渡淮,长驱直入长安。高骈保存实力,不敢出战,威望大损。中和元年(公元八八一年),高骈移檄四方,声称将入讨黄巢,悉发巡内兵八万,舟二千艘,旌旗甲兵甚盛。实际却是虚张声势,托故不发。高骈与镇海节度使周宝俱出神策军,其后封壤相邻,数争细故,遂有隙。高骈檄周宝入援京师,周宝治舟师以俟之,怪其久不行,访诸幕客,或谓“高骈有并吞江东的野心,声称入援,其实别有企图”。会高骈使人约周宝面会瓜洲(时尚在长江中流)商议军事,周宝怀疑高骈要杀害他,辞疾不往。两人关系更为紧张,高骈责周宝轻侮大臣,周宝谩骂道:“彼此夹江为节度使,汝为大臣,我岂坊门卒邪!”由是遂为深仇。

高骈好迷信,以为神仙可致。信任方士吕用之,受其愚弄。筑道院,炼金烧丹,糜费以巨万计。用之又言神仙好楼居,说高骈筑迎仙楼,又作延和阁,高八丈。高骈倚用之如左右手,公私大小之事皆决于用之,退贤进不肖,淫刑滥赏,淮南政事于是大坏。用之知上下怨愤,请置巡察使,募险狃者百余人,纵横闾巷间,谓之“察子”。民间呵妻骂子,靡不知之。用之欲夺人财货,掠人妇女,辄诬以叛逆,掳掠取服,所破灭者数百家。用之又请选募诸军骁勇之士二万人,号左,右莫邪都。器械精利,衣装华洁,用之与其党张守一为左、右莫邪军使,署置将吏如帅府。用之想隔绝高骈和外界的接触,劝说高骈“绝俗累”,以期招致神仙。高骈乃悉去宾客,谢绝人事。由是用之得专行威福,无所忌惮。

镇海节度使周宝在朱玫拥立襄王煊时,接受襄王煊的旨意,杀田令孜派遣到江南的使臣沈诰和苏州刺史赵载。襄王煊失败,镇海军将士和周宝的衙军后楼都作乱,周宝放弃润州,出奔常州;后依钱鏐,卒于杭州。

高骈部下的宿将,多为吕用之所杀。僖宗光启三年(公元八八七年),高骈闻秦宗权要来攻打淮南,派淮南左厢都知兵马使毕师铎率兵出屯高邮(今江苏高邮县)。毕师铎疑惧,以为吕用之迟早要杀害他,“祸在旦夕”,乃在高邮起兵,合众千人,回攻广陵。吕用之以麾下劲兵,出城力战,师铎退

屯山光寺（在广陵城北），以广陵城坚兵多，一时不能攻下，乞师于宣歙观察使秦彦，且许以克城之日，迎彦为帅。秦彦遣将率兵三千渡江至扬子（今江苏扬州市南）助师铎，攻下广陵。吕用之、张守一出走，投奔庐州刺史（治合肥，今江苏合肥市）杨行密。不久，杨行密就把吕用之、张守一处死了。

毕师铎入广陵，囚高骈，迎秦彦过江。秦彦将宣歙兵三万余人，乘竹筏沿江而下，进入广陵，自称权知淮南节度使，以毕师铎为行军司马。杨行密用援救高骈的名义，率军围攻广陵，秦彦遣毕师铎将兵八千出城作战，兵败，士卒死者什七八。城中乏食，樵采路绝。秦彦、毕师铎再度出兵一万二千人出城作战，又大败，积尸十里，沟渎皆满。外围益急，秦彦等怕高骈旧部充当内应，于是杀骈，并其子弟甥侄，无少长皆死，同埋一坎。杨行密得到这个消息，命士卒缟素，向府城大哭三日。杨行密围广陵且半年，秦彦、毕师铎大小数十战，多不利。城中无食，米斗值钱五十缗（五万），草根本实皆尽，以葑泥（黏土）为饼食之，饿死者大半。秦彦、毕师铎放弃广陵城出走，杨行密进入广陵。当时城中遗民只有数百家，饥羸不成人形。杨行密入广陵后，自称淮南留后，有众一万五千。

在蔡州（治汝阳，今河南汝南县）自称皇帝的秦宗权，见淮南动乱，以为有机可乘，遣其弟秦宗衡、大将孙儒将兵万人，渡淮经略淮南。秦彦、毕师铎就带领残部，和秦宗衡联军。不久，秦宗权召秦宗衡、孙儒还军，抵抗朱温。孙儒知秦宗权必然失败，杀秦宗衡，掠地淮南，众至数万。杨行密困守广陵，形势不利，便将和州（治历阳，今安徽和县）和庐州的军队撤出广陵，以期保存实力。不久，孙儒攻下广陵，自称淮南节度使。杨行密退回庐州，出兵南渡长江，攻下池州（治秋浦，今安徽贵池县）、宣州（治宣城，今安徽宣城县），被唐王朝任命为宣歙观察使。不久改任宁国节度使。杨行密在淮南道的庐州，却又被孙儒攻占去了。

昭宗大顺元年（公元八九一年），杨行密从宣州出兵，攻下润州（治丹徒，今江苏镇江市）、常州，又取钱氏所据的苏州。未几，润州等城均为孙儒所攻占。大顺二年（公元八九一年），孙儒焚掠苏、常，进逼宣州。钱鏐乘虚复取苏州。杨行密求救于钱鏐，鏐助以兵器、粮食。杨行密举兵反攻，夺取常州、润州，并攻取淮南道的和州（治历阳，今安徽和县）和滁州（治清流，今安徽滁县），屡败孙儒兵，断其粮道。孙儒食尽，士卒多患疫病，结果大败。杨行密擒斩孙儒，乘胜克复扬州。唐王朝任命杨行密为淮南节度使，以行密部将田頔为宣歙留后，安仁义为润州刺史。

先是，扬州富庶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二。及经秦彦、毕师铎、孙儒、杨行密兵火之余，江淮之地，东西千里扫地尽矣！

杨行密部下的孙儒降兵，多蔡人。行密挑选其中勇健者五千人，以皂衣蒙甲，号“黑云都”，专用来冲锋陷阵。行密驰射武伎，皆非所长，而善抚御将士，与同甘苦，推心待物，无所猜忌。淮南被兵六年（自光启三年即公元八八七年至景福二年即公元八九三年），士民转徙几尽。行密选用州县守令，招徕流民，奖励农桑，轻徭薄敛。几年以后境内逐渐富庶起来。

景福二年（公元八九三年），杨行密取庐州、舒州（治怀宁，今安徽潜山县），乾宁元年（公元八九四年）取黄州（治黄冈，今湖北新洲县），二年（公元八九五年）又取濠州（治钟离，今安徽凤阳县）、寿州（治寿春，今安徽寿县）、蕲州（治蕲春，今湖北蕲春县）、光州（治定城，今河南潢山县），全有淮南之地。

**董昌的割据越州及其失败** 董昌，杭州临安（今浙江临安县）人，初为石镜镇将（《临安志》：石镜镇在临安县南一里），被镇海节度使周宝保荐为杭州刺史，屡破浙东观察使刘汉宏的军队。光启二年（公元八八六年）。董昌部将钱鏐攻拔越州，刘汉宏逃奔台州（治临海，今浙江临海县），台州刺史杜雄诱执汉宏，送与董昌，董昌杀汉宏徙镇越州。唐王朝以董昌为浙东观察使，以钱鏐为杭州刺史。光启三年（公元八八七年），又于越州置“威胜军”，以董昌为威胜军节度使。

浙东地区比较富裕，董昌尽量搜括财富，以充贡献及中外馈遗。每旬发一纲，金万两，银五千锭，越绫一万五千匹，贡奉居藩镇之首，深得朝廷好感。由是宠命相继，官至司徒、同平章事，爵陇西郡王。董昌求为越王，朝廷不许。乾宁二年（公元八九五年）二月，董昌被袞冕登越州子城（内城）门楼，即皇帝位。自称大越罗平国，改元顺天，署城楼曰“天册之楼”，令群下谓己曰“圣人”。董昌移书钱鏐，告以称帝改元事。钱鏐覆书称：“与其闭门作天子，与九族、百姓俱陷涂炭，岂若开门作节度使，终身富贵邪！及今后悔（悔改），尚可及也”（《资治通鉴》唐昭宗乾宁二年）。董昌不听。钱鏐认为这正是兼并浙东的好机会，一再上表朝廷，以为董昌僭逆，主张出兵讨伐。朝廷下诏削除董昌官爵，并任命钱鏐为浙东招讨使。乾宁三年（公元八九六年），钱鏐攻下越州，杀董昌。浙东巡属明、衢、处、婺、温、台六州，都归钱鏐管辖了。昭宗景福二年（公元八九三年），曾将润州的镇海军（原名浙江西道）徙治杭州，以钱鏐为镇海节度使；平董昌后，又将越州的威胜军改为镇东军，钱鏐兼为镇海、镇东两镇节度使。

**成汭的割据荆南及其失败** 成汭，青州（治益都，今山东益都县）人。少时纵酒杀人，亡命为僧。后来参加蔡州秦宗权的部队。又亡命投荆南节度使（镇江陵，今湖北江陵县）陈儒，被署为衙官。陈儒败，成汭结千人袭取归州（治秭归，今湖北秭归县），自称刺史。僖宗末，淮南将王建肇据江陵，成汭出兵击走王建肇。文德元年（公元八八八年），诏以成汭为荆南节度留后。时江陵兵荒之余，止有一十七家，励精为治，抚集雕残，通商务农，居民将近万户。朝廷以为荆南节度使。

乾宁三年（公元八九六年），成汭溯江略地，尽取滨江州县，南取黔州（治彭水，今四川彭水县），西取万州（治南浦，今四川万县）、涪州（治涪陵，今四川涪陵县）、渝州（治巴县，今四川重庆市）。乾宁四年（公元八九七年），王建收复渝州、涪州，控制了江路。只有忠州以下还属于荆南。

天复三年（公元九〇三年），杨行密遣大将李神福围攻鄂州，成汭出兵救鄂州，且欲侵江淮之地以自广，发舟师十万，沿江而下。汭作巨舰，三年而成，制度如府署，谓之“和舟载”，其余谓之“齐山”、“截海”、“劈浪”之类甚众。成汭大军未至鄂州，湖南马殷遣舟师万余人，武陵雷彦威遣舟师三千余人，会于荆江口，乘虚袭陷江陵，尽掠其人及货财而去。荆南将士亡其家，皆无斗志。淮南大将李神福率众数千，逆击汭于君山（在洞庭湖中），因风纵火，焚其舰，士卒皆溃，汭投水死。淮南获其战舰二百艘。

王建闻成汭败死，遣部将王宗本将兵下三峡，宗本顺流而下，攻陷了夔（州治奉节，今四川奉节县）、忠（州治临江，今四川忠县）、万（州治南浦，今四川万县）、施（州治清江，今湖北恩施县）四州。以瞿唐（在夔州东）为蜀之险要，乃弃归、峡（州治夷陵，今宜昌市），屯军夔州。这样荆南巡属，只有荆（江陵）、归（秭归）、峡（宜昌）三州了。

昭宗的受制于宦官、藩镇与唐王朝的灭亡 陈敬瑄、田令孜的据有西川和王建的割据三川，说明唐的后院三川已经落入藩镇手中，长安有变，昭宗已无退往兴元和成都的余地了。江淮的战乱和动荡，切断了唐王朝经济命脉。扬、益的和唐分离，实际宣告唐王朝已经瓦解了。

史称昭宗“体貌明粹，有英气，喜文学。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复前烈之志。尊礼大臣，梦想贤豪”（《资治通鉴》唐文德元年），“素疾宦官”。大宦官杨复恭总宿卫兵，专制朝政，所为多不法。诸假子或典禁兵，或为方镇。复恭以假子守立为天威军使，守信为玉山军使，守贞为龙剑节度使（镇龙江油，今四川平武县东南），守忠为武定节度使（镇洋州西乡，今陕西西乡县），其余假子为州刺史者甚众，号“外宅郎君”。又养子六百人，监诸道军。宦官的势力，比以前更为强大。

昭宗任命其母舅王瓌为黔南节度使，行至利州益昌县吉柏津（今四川广元县西南），杨复恭令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复恭从弟复光假子）覆其舟于嘉陵江中，宗族宾客皆溺死。昭宗知道是复恭主使，出复恭为凤翔监军。复恭称病求致仕，与假子守信密谋作乱，事败，逃往兴元，联络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武定节度使杨守忠、龙剑节度使杨守贞、绵州（治巴西，今四川绵阳县）刺史杨守厚，举兵抗拒朝廷。不久，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攻陷兴元，杨复恭率杨守亮等退保阆州（治阆中，今四川阆中县）。后来西川王建、兴元李茂贞二镇不断进攻阆州，杨复恭、杨守亮、杨守信自商山逃奔河东，至乾元（今陕西柞水县），为华州巡逻兵擒获，斩于长安。李茂贞破山南时，获杨复恭致杨守亮的信，信中有这样几句话，引人注目：“大侄（指杨守亮）但积粟训兵，勿贡献。吾于荆榛中立寿王（昭宗本封寿王），才得尊位，废定策国老，有如此负心门生天子！”（《资治通鉴》唐乾宁元年）

当杨复恭逃往兴元的时候，凤翔节度使李茂贞等表请出兵讨伐山南，乞加李茂贞以山南西道招讨使的名号。唐朝廷考虑到茂贞已得凤翔，倘再得山南，不可复制，所以下诏和解，不允许出兵。李茂贞不听，遂自出兵进攻山南，唐昭宗不得已，任命李茂贞为山南西道招讨使。李茂贞攻取兴元以后，自请镇守兴元，唐政府便任命李茂贞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另外任命宰相徐彦若为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是要兼有山南西道、凤翔两镇，不接受诏书，且上表讥毁昭宗，辞语不逊。景福二年（公元八九三年），昭宗决意用兵，征调禁军三万人，送凤翔节度使徐彦若赴镇，首相杜让能负责军事调度。李茂贞联合邠宁节度使（镇邠州新平，今陕西彬县）王行瑜，两镇共有六万军队，都是身经百战的边兵，禁军多系新募市井少年。兴平会战，禁军望风奔溃，京城大震。昭宗被迫命令首相杜让能自杀，斩观军容使西门君遂、内枢密使李周潼、段诩，两镇这才退兵。朝廷又任命李茂贞为凤翔节度使，兼山南西道节度使，于是茂贞尽有凤翔、兴元、洋（武定节度）、陇秦（天雄军）等四镇十五州之地。

乾宁二年（公元八九五年），河中节度使（镇河中府河东县，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王重盈病死，军中请立行军司马王珂（重盈弟重荣子）为留后，保义军节度使（即陕虢节度使，镇陕州陕县，今河南三门峡市）王珙（重盈子）与绛州（治新平，今山西新绛县）刺史王瑶（珙弟）举兵击王珂，上表言王珂非王氏子，不应袭职。王珂是李克用的女婿，所以李克用上表请赐王珂河中节钺。王珙厚结邠宁节度使王行瑜、凤翔节度使李茂贞、镇国军节度使（镇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韩建，要求朝廷任命王珂为陕虢节度使，王

珙为河中节度使。河中有盐池之富，同时又是要害地区，李克用坚持由王珂出任节度使。朝廷为了安抚李克用，不同意两镇易帅的要求。王行瑜、李茂贞、韩建竟各率数千精兵入朝，杀宰相韦昭度、李溪，要挟昭宗改任王珙为河中节度使。李克用闻讯，亲率蕃汉军南下，声称讨伐三镇。王行瑜等匆忙还镇。河东军至绛州，擒杀刺史王瑶，遂长驱直入同州（治冯翊，今陕西大荔县）。克用进驻渭桥（在今陕西西安市东北），遣大将李存信等屡破邠宁兵于黎园寨（在今陕西泾阳县西北），进逼邠州（治新平，今陕西彬县）。王行瑜兵败出走，被部下所杀。李克用还军渭北，欲乘胜进讨凤翔，朝廷恐李克用势大难制，婉言劝止，克用乃引兵东归。

李克用既去，李茂贞骄横如故，河西州县，多为所据。乾宁三年（公元八九六年），昭宗置殿后四军，选补军士数万人，使延王戒丕等分别率领以卫近畿，李茂贞认为是对付他的，他就发兵进占长安，自中和四年（公元八八四年）以来历年修葺的宫室、市肆，燔烧俱尽。

昭宗在韩建固请下，前往华州。韩建强迫昭宗遣散诸王所领军士，撤销殿后四军。到了乾宁四年（公元八九七年）的八月，韩建和枢密刘季述矫制发兵围十六宅诸王第，诸王被髮，或缘垣，或升屋，大呼“宅家（唐末宫中称皇帝为宅家）救儿”。韩建竟诬诸王谋反，将延王戒丕、通王滋等十一王驱至石隄谷（在华州西）杀死。光化元年（公元八九八年）八月，昭宗才从华州回到长安。

昭宗本来就厌恶宦官，刘季述配合韩建杀十一王，使他更加愤恨。昭宗常与宰相崔胤谋去宦官。由是南北司益相憎嫉。各结藩镇以相倾夺。昭宗自华州回长安，多纵酒，喜怒无常。于是左军中尉刘季述、右军中尉王仲先、枢密使王彦范、薛齐偓（所谓四贵）等密谋道：“主上轻佻多变诈，难奉事；专听任南司（宰相），吾辈终罹其祸。不若奉太子立之，尊主上为太上皇，引岐（凤翔李茂贞）、华（华州韩建）兵为援，控制诸藩，谁能害我哉！”光化三年（公元九〇一年）十一月，昭宗猎于苑中，因置酒夜宴，醉后归来，手杀黄门、侍女数人。翌日上午，尚醉卧宫中，宫门不开。刘季述乘机陈兵殿廷，威胁百官连名署状，将昭宗幽禁于少阳院（东宫），立太子裕为帝。宰相崔胤外恃朱温为援，内结左神策指挥使孙德昭等，于光化四年（公元九〇一年）正月元旦，杀王仲先、刘季述、王彦范、薛齐偓，迎昭宗复位。一场宦官发动的宫廷政变，不到两个月就失败了。

朱温自灭秦宗权后，军势更盛。昭宗景福二年（公元八九三年）自将汴军破徐州，感化节度使时溥自焚死。乾宁四年（公元八九七年），汴军连破郓州（治须昌，今山东东平县西北）、兖州（治瑕丘，今山东兖州市），取天平军（镇郓州须昌）、泰宁军（镇兖州瑕丘）。朱温又欲取河中以制河东，光化四年，进兵攻克河中，杀王珂。讽使朝廷任命自己为宣武（镇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市）、宣义（镇滑州白马，今河南滑县东）、天平、护国（即河中）四镇节度使。佑国节度使（镇河南府洛阳）张全义、昭义节度使（镇潞州上党，今山西长治市）丁会、河阳节度使（镇孟州孟县，今河南孟县南）孟迁，原来都是朱温的部将。于是关东诸镇，多属朱温。朱温就把注意力转移到对唐朝廷的控制上了。

唐朝廷内部的冲突，愈演愈烈。刘季述、王仲先既死，枢密使韩全诲、凤翔监军使张彦弘为左、右中尉，韩全诲也做过凤翔监军，两人与李茂贞关系密切。崔胤以宦官典兵，终为肘腋之患，密谋尽诛宦官，乃致书朱温，令

发兵迎昭宗出京。天复元年（公元九〇一年，是年四月改元）十月，朱温从大梁（即汴州）发兵。十一月，韩全诲等便将昭宗劫往凤翔。朱温率大军过华州，迫使韩建请降。随后入长安，旋即进军凤翔。李茂贞向李克用求援。李克用乃出兵进攻河中，连破汴军。汴军主力十多万人还击河东军，进围晋阳，因大疫退兵。天复二年（公元九〇二年）六月，朱温再次进兵凤翔城下，李茂贞屡战屡败。西川节度使王建乘机以假道勤王为名，攻占山南西道。是年冬大雪，凤翔城中食尽，冻饿而死者不计其数，军士多缢城出降汴军。朱温一面围城，一面派兵攻取关中诸州镇。茂贞困守无援，谋诛宦官，与朱温和解，得到昭宗的赞许。天复三年（公元九〇三年），昭宗派宦官率凤翔士卒杀韩全诲等四贵及其党羽多人，而围犹未解。于是凤翔城内继续捕杀宦官，先后杀七十二人。朱温又密令京兆尹捕杀留京宦官九十人，这才撤兵解围，命兄子朱友伦统兵护送昭宗回长安。昭宗回京后，朱温、崔胤又杀宦官七百余人，止留黄衣（品秩最低的宦官）幼弱三十人，以备洒扫。宰相崔胤兼管六军十二卫事务。唐代宦官典兵预政的局面结束了。

唐昭宗加封朱温为梁王。当时神策军已解散，朱温留步骑一万人驻神策军旧营，以朱友伦为左军宿卫都指挥使，又以亲信将领为宫苑使、皇城使、街使，接管了皇宫和整个京城的禁卫任务，然后辞归大梁。

崔胤依靠朱温兵力，诛灭宦官，排除异己，专权自恣。朱温破李茂贞后，兼并关中州镇，挟制昭宗，威震朝野，意图篡夺。崔胤大懼，奏请昭宗重建六军，每军步兵六百人，骑兵一百人，共六千六百人，由京兆尹郑元规负责招募军士，缮治兵仗。朱温猜疑崔胤建立这支军队，是用来对付汴军的。未几，宿卫都指挥使朱友伦与人击球，坠马暴死，朱温又疑这是崔胤策画的，改命兄子友谅代掌宿卫，决计杀死崔胤，并迁昭宗于洛阳。天复四年（公元九〇四年。是年四月，改元天祐）正月，朱温密告崔胤“专权乱国，离间君臣”，旋命朱友谅率兵杀崔胤、郑元规，崔胤所募兵一概遣散。同时借口邠、岐兵侵逼京畿，强迫昭宗和百官、士民迁往洛阳。汴将张弘范为御营使，督兵役拆毁长安宫室、官廨、民宅，取得建筑材料，浮渭沿河而下，使长安成为丘墟。士民号哭满路，扶老携幼，月余不绝。昭宗路过华州，对夹道呼万岁的百姓说：“勿呼万岁，朕不复为汝主矣！”他在行宫里又对待臣说：“鄙语云：‘纆干山头冻杀雀，何不飞去生处乐。’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说罢大哭。这时候他才知道自己危在旦夕。这年四月，昭宗到达洛阳，左右侍从全是朱温私人。至八月，朱温便命养子朱友恭等派人入宫，杀害昭宗，立昭宗第九子辉王祚为皇帝，更名祝，是为昭宣帝，年仅十三岁。朱温见昭宗被杀，佯作不与闻其事，痛哭流涕道：“奴辈负我，令我受恶名于万代”（《资治通鉴》唐天祐元年）。勒令朱友恭等自杀。

天祐二年（公元九〇五年）二月社日（立春后第五个戊日），朱温使心腹蒋玄晖置酒九曲池，邀昭宗子德王裕等九王饮酒，酒酣，一一缢杀，投尸池中。六月，朱温又杀旧宰相裴枢、独孤损、陆扆等三十余人于白马驿（在滑州白马县，今河南滑县东）。朱温的谋臣李振屡试进士，竟不中第，故深恨朝官，对朱温曰：“此辈常自谓清流，宜投之黄河，使为浊流”（《资治通鉴》唐天祐二年）。朱温含笑听从。

梁开平元年（公元九〇七年）四月，唐昭宣帝被迫退位，唐亡。朱温在大梁即皇帝位，是为梁太祖。国号大梁。梁废唐昭宣帝为济阴王，迁往曹州居住，居处围之以棘。次年，梁派人酖杀济阴王，追谥为唐哀皇帝。

与朱温称帝同时，王建在成都自称蜀帝，李克用在晋阳称晋王，李茂贞在凤翔称岐王。西川仍用唐昭宗的天复年号，晋阳、凤翔、淮南仍用天祐年号。

唐王朝的灭亡，亡于藩镇与宦官，亡于扬、益的战乱与脱离中央，亡于以宣武授朱温，以晋阳授李克用。

## 第八章 五代十国的政治与经济

### 第一节 五代的更替

**后梁王朝的建立与灭亡** 后梁太祖朱温，宋州砀山（安徽砀山县）人，少孤贫、长兄全昱，次兄存，温排行第三。唐僖宗乾符二年（公元八七五年），黄巢起义曹、濮，朱温和次兄朱存，都参加了农民起义军。朱温以力战屡捷，得补为队长。朱存从黄巢攻广州时战死。黄巢取长安，以朱温为同州（治冯翊，今陕西大荔县）防御使。及唐军包围长安，朱温见兵势日蹙，知黄巢将亡，中和二年（公元八八二年）九月，举同州降唐。唐僖宗任命朱温为右金吾大将军，河中行营招讨副使，赐名全忠。

中和三年（公元八八三年）二月，李克用联合河中、易定、忠武军，大败农民军于梁田陂（今陕西华县西），进逼长安。唐朝廷于三月间任命朱温为宣武节度使（镇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市），令攻克长安后赴镇。四月，农民军退出长安。七月，朱温率部到达汴州。“时汴宋连年阻饥，公私俱困，帑廩皆虚。外为大敌所攻，内则骄军难制，交锋接战，日甚一日，人皆危之”（《旧五代史·太祖纪》），朱温逐步扭转了这种局面。

中和四年（公元八八四年）五月，黄巢部将尚让以骁骑五千，进逼大梁。朱温遣使告急于李克用，李克用亲率沙陀精骑，击败黄巢的军队，回军大梁，营于城外。朱温固请李克用入城，就驿置酒，礼貌甚恭。克用乘酒使气，语颇侵之。温愤愤不平，发兵围驿而攻克用。克用亲兵薛志勤等，保护克用登汴城南门，缒城得出。太原士兵三百余人，皆为汴人所杀。从此李克用和朱温便成了仇敌。

光启二年（公元八八六年）冬，滑州（治白马，今河南滑县东）军乱，义成节度使安师儒为部下所杀，朱温乘机出兵，袭取了滑州。

这时秦宗权据蔡州称帝，兵力十倍于朱温。朱温以诸军都指挥使朱珍为淄州（治淄川，今山东淄博市西南淄川镇）刺史，募兵得万余人，获马千匹。又使牙将郭言募兵于河阳、陕、虢，得万余人。实力日益充实，屡败秦宗权。到了唐昭宗龙纪元年（公元八八九年），秦宗权被部将执送至汴州，投降朱温，温送秦宗权至长安斩首。淮西镇又给朱温兼并了。

在此前一年，即文德元年（公元八八八年），李克用发兵攻河阳（今河南孟县南），河南尹兼领河阳节度使张全义闭城自守，城中食尽，求救于朱温。朱温出兵败河东军，分兵欲断太行路（在河阳北），河东军怕后路被切断，赶紧退军。从此洛阳、河阳也落入朱温手中，朱温无复西顾之忧，得以专意经营东方了。

张全义复为河南尹。时东都残破，仅存坏垣而已，居民不满百户。全义乃于麾下选十八人，谓之屯将，使诣十八县故墟落中，植旗张榜，招怀流散，劝之树艺。惟杀人者死，余但笞杖而已，无严刑，无租税，民归之者如市。又选壮者，教之战阵，大县屯兵至七千人，小县不下二千人。“数年之后，都城坊曲，渐复旧制，诸县户口，率皆归复、桑麻蔚然，野无旷土”。全义“为政宽简，出见田畴美者，辄下马，与僚佐共观之，召田主，劳以酒食；有蚕麦善收者，或亲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赐以茶彩衣物”。“有田荒秽者，则集众杖之”。“由是邻里有无相助，故比户皆有蓄积，凶年不饥，遂成富庶焉”（《资治通鉴》唐光启三年）。

淮南久经战乱，唐朝廷于光启三年（公元八八七年）一度任命朱温兼淮南节度使。朱温以宣武行军司马李璠为淮南留后，率兵千人前往淮南。兵过泗州，感化节度使（镇徐州彭城，今江苏徐州市）时溥出兵袭击，李璠返回汴州，徐、汴二镇开始结下仇怨。朱温连年进攻徐、泗、濠三州，民不得耕获。复值水灾，人死者十六七。景福二年（公元八九三年）四月，朱温终于攻下徐州，时溥举家登燕子楼，自焚而死。徐、泗、濠三州同时被朱温兼并了。

朱温既兼有徐州，又欲夺取兖、郓，天平节度使（镇郓州须昌，今山东东平西北）朱瑄，瑄弟泰宁节度使（镇兖州瑕丘，今山东兖州市）朱瑾并力抵抗，长期攻战，“民失耕稼，财力俱弊”（《资治通鉴》唐乾宁二年）。最后在乾宁四年（公元八九七年），朱温终于攻下郓、兖，朱瑄被杀，朱瑾逃奔淮南。当时郓、齐（州治历城，今山东济南市）、曹（州治济阴，今山东定陶县西南）、棣（州治厌次，今山东惠民县东南）（以上四州属天平镇）、兖、沂（州治临沂，今山东临沂县）、密（州治诸城，今山东诸城县）（以上三州属泰宁镇）、徐、宿（州治甬桥，今安徽宿县）（属感化镇）、陈、许（二州属忠武镇）、郑（州治管城，今河南郑州市）、滑、濮（州治鄆城，今山东鄆城县北）（以上三州属宣义镇），凡十四州都被朱温兼并了。

朱温几度想进占淮南，但被杨行密击退。杨行密还堰淮水以灌汴军，朱温大败，行密遂保有江淮。

朱温经营东方告一段落，提兵西向，在唐昭宗天复元年（公元九〇一年）取河中（镇蒲州河东，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占领同、华，翌年进击关中州镇，然后专意围攻凤翔，迫使李茂贞同意杀宦官，迎唐昭宗返回长安。

天复三年（公元九〇三年），朱温又进军淄青（即平卢，镇青州益都，今山东益都县），平卢节度使王师范力竭出降，朱温取淄（州治淄川，今山东淄博市西南）、青、登（州治蓬莱，今山东蓬莱县）、莱（州治掖县，今山东掖县）、齐（州治历城，今山东济南市）等州，朱温的统辖地区，就东至于海了。

唐昭宣帝天祐二年（公元九〇五年），朱温调动大军，进攻山南东道节度使（镇襄州襄阳，今湖北襄樊市）赵匡凝，攻破襄、唐（州治比阳，今河南泌阳县）、邓（州治穰县，今河南邓县）、复（州治沔阳，今湖北沔阳县西南）、郢（州治京山，今湖北京山县）、随（州治随州，今湖北随县）、均（州治武当，今湖北均县西北）、房（州治房陵，今湖北房县）八州，赵匡凝弃镇沿汉水逃往扬州依杨行密。匡凝弟荆南节度使（镇江陵，今湖北江陵县）赵匡明也弃荆（州治江陵）、峡（州治夷陵，今湖北宜昌市）、归（州治秭归，今湖北秭归县）三州，逃奔成都。

魏博镇（天佑元年号天雄军，镇魏州贵乡，今河北大名县东北）自田承嗣以来，选募六州（魏、博、相、卫、贝、澶六州）骁勇五千人作为牙军，厚其给赐以自卫，为腹心，自是父子相继，亲党胶固，岁久益骄横，小不如意，辄族旧帅而易之。唐昭宗光化初，罗绍威为节度使，心恶牙军而力不能制。他和朱温是亲家，倾心附结朱温，想利用汴军来诛牙军，昭宣帝天佑三年（公元九〇六年），朱温女（绍威子廷规妻）病死，朱温选骁卒千人，诈称会葬前往魏州，与罗绍威合击牙军，阖营殪杀，凡八千家，婴孺无遗。罗绍威既杀牙军，天雄诸军疑惧，牙将史仁遇聚众起事，天雄巡属诸县纷纷响应，均

被汴军镇压下去。朱温统兵坐镇魏州半载，魏博蓄积为之一空，兵力亦自是衰弱。绍威悔之，谓人曰：“合六州四十三县铁，不能为此错也（言铸成此‘错’字）”（《资治通鉴》唐天祐三年）。从此魏博名义上半独立，实际完全受朱温支配了。

梁开平元年（公元九 七年）四月，朱温更名晃，即皇帝位国号大梁，改元开平。以汴州为开封府，命曰东都。以故东都洛阳为西都。废故西京（长安），以京兆府为大安府。废枢密院，以其职事归崇政院，不用宦官，改由士人知崇政院事，后改称院使，地位要比宰相更亲近皇帝。朱温“以宣武掌书记、大府卿敬翔知崇政院事，以备顾问，参谋议，于禁中承上旨，宣于宰相而行之。宰相非进对时有所奏请及已受旨应复请者，皆具记事因崇政院以闻，得旨则复宣于宰相”（《资治通鉴》梁开平元年）。

朱温出身穷苦，参加过农民起义军，虽然中途叛变，但民间的疾苦，他还是了解一些，所以宣武镇的租赋比较轻，人民略得安生。《旧五代史·食货志》称：朱温“以夷门（指汴州）一镇，外严烽候、内辟汗莱，厉以耕桑，薄以租赋，士虽苦战，民则乐输，二纪（十二年为纪）之间，俄成霸业。及末帝与[后唐]庄宗对垒于河上，河南之民，虽困于辇运，亦未至流亡，其义无他，盖赋敛轻而丘园可恋故也”。

当然，朱温背叛农民军以后，以武力兼并诸方镇，频繁战争带给人民的灾难是深重的。

朱温为宣武四镇节度使时，用法严峻，将校有战没者，所部兵悉斩之，谓之“跋队斩”。士卒失主将，多亡逸不敢归。朱温乃命军士皆文（刺）其面以记军号。军士或思乡里逃去，关津辄执之送所属，无不死者，其乡里亦不敢容。由是逃亡者皆聚山泽为盗。朱温即位后，下诏赦其罪，自今虽文面，而听还乡里。

晋王李克用成为朱温的大敌。朱温于开平元年五月，派遣大将康怀贞将兵八万进攻晋的潞州（治上党，今山西长治市）。晋潞州守将李嗣昭固守待援，李克用派大将周德威率蕃汉军往援潞州，击败梁军。朱温改命李思安为潞州行营都统。李思安在潞州城下，更筑重城，内以防守军奔突，外以拒援兵，谓之“夹寨”，调山东民夫馈运军粮。晋将周德威遣轻骑抄袭，“排墙填堑，一昼夜间数十次，梁兵疲于奔命，于是闭壁不出”。开平二年（公元九 八年）正月，李克用病死，子李存勖嗣为晋王、河东节度使。李存勖与诸将商议，认为“上党，河东之藩蔽，无上党，是无河东”，亲率大军驰援潞州。五月，晋军直抵夹寨。适值黎明大雾，梁军无斥候。不意晋军之至，将士尚未起。李存勖分兵为二道，一攻西北隅，一攻东北隅，填堑烧寨，鼓噪而入。梁兵大溃，伤亡将校士卒以万计，委弃资粮、器械，宛如山积。朱温闻夹寨失守，惊叹道：“生子当如李亚子（李存勖小名），克用为不亡矣！至如吾儿，豚犬耳”（《资治通鉴》梁开平二年）。潞州围守历时一年，士民多半冻饿而死，市里萧条。李嗣昭劝课农桑，宽租缓刑，数年之间，军城复完。

开平三年（公元九 九年），朱温迁都洛阳。

朱温自夹寨大败后，猜忍日甚。佑国节度使（镇长安）王重师镇长安数年，朱温“怒其贡奉不时”，听谗勒令自尽。忠武节度使（朱温改匡国军为忠武军，镇同州）刘知俊见王重师无罪被诛，居不自安，乃据同州附于凤翔李茂贞。

成德节度使（镇镇州真定，今河北正定县）、赵王王镕，虽不向朱温“输常赋，而贡献甚勤”。朱温怀疑王镕私通李存勖，出兵谋攻镇、定，王镕向李存勖求援，李存勖亲率大军前往援救。柏乡（今河北柏乡县）一役，梁兵大败，僵尸蔽地，所弃粮食、资财、器械不可胜计。乾化二年（公元九一二年）二月，朱温率大军号称五十万，出征镇、定，命大将杨师厚围枣强（今河北枣强县东），枣强城小而坚，梁军昼夜急攻，终于攻入城中，不问老幼，一概杀戮。朱温督杨师厚军五万，进击藁县（今河北景县），驻军城西。驻屯赵州（治平棘，今河北赵县）的晋军先锋六百骑，伪装成梁兵，黄昏时冲入梁营，纵火鼓噪，梁军大乱，有人大呼“晋军大至”，朱温大惊，烧营夜遁，急奔一百五十里，损失军资、器械无数。既而朱温得知晋兵只是少数游骑，不胜惭愧，扶病回到洛阳。他对近臣说：“我经营天下三十年（朱温于中和三年即公元八八三年，出镇宣武，至乾化二年即九一二年，恰三十年），不意太原余孽（指李存勖）更昌炽如此！吾观其志不小，天复夺我年，我死，诸儿非彼敌也，吾无葬地矣”（《资治通鉴》梁乾化二年）。

朱温为黄巢同州刺史时（唐僖宗中和二年，公元八八二年），娶山富室女张氏为妻。张氏“贤明有礼”，温“深加礼异”，“每军谋国计，必先延访。或已出师，中途有所不可，张氏一介请旋，如期而至，其信重如此”（《北梦琐言》）。唐昭宗天祐元年（公元九一四年），张氏病死，朱温开始“纵意声色”，“帷薄荒秽”。乾化二年六月，朱温病危，召养子博王友文（本姓康名勣）于汴京，而把亲生子郢王友圭外放为莱州刺史。朱温病中喜怒难测，是时左迁者多半被诛，友圭大惧，乃与左龙虎军统军韩勣合谋，伏兵宫中，至夜半闯入寝殿，刺杀朱温，推说是友文遣兵突入大内，使朱温受到惊吓，病势危殆，矫诏杀友文。友圭在洛阳自即皇帝位。朱温死时，年六十一。

友圭杀父夺位，梁群臣不服。乾化三年（公元九一三年）二月，朱温第三子均王友贞，得北面都招讨使、天雄节度使杨师厚支持，在大梁起兵，朱温女婿赵岩、外甥袁象先为内应。汴兵未至洛阳，袁象先等已率禁兵起事，友圭穷迫自杀，洛阳诸军十余万，大掠都市。友贞即位于大梁，更名鎰，后又更名瑱，是为末帝。

均王友贞这次政变成功，天雄节度使杨师厚出力最多，赐爵为邺王。师厚晚年矜功恃众，擅割财赋，选军中骁勇，置银枪效节都数千人，给赐优厚，有复活旧日牙兵之势。友贞虽外加尊礼，内实忌之。贞明元年（公元九一五年）三月，师厚病卒，梁廷私相庆贺。租庸使赵岩等认为魏博地广兵强，朝廷不能制，主张分六州（魏、博、贝、卫、澶、相）为两镇，削弱其实力。友贞乃以贺德伦为天雄节度使，管魏（州治贵乡，今河北大名县东北）、博（州治聊城，今山东聊城市东北）、贝（州治清河，今河北清河县西北）三州；又于相州置昭德军，以张筠为昭德节度使，管相（州治安阳，今河南安阳市）、澶（州治顿丘，今河南清丰县西）、卫（州治汲县，今河南汲县）三州。友贞还派遣开封尹刘浚将兵六万，送贺德伦、张筠二人赴镇。

魏博的军队，皆父子相承数百年，族姻磐结，不愿分徙，应行者皆嗟怨，连营聚哭。“相与谋曰：‘朝廷忌吾军府强盛，欲设策使之残破耳。吾六州历代藩镇，兵未尝远出河门（魏州城外有河门旧堤），一旦骨肉流离，生不如死’”（《资治通鉴》梁均王贞明元年）。于是魏兵乘夜作乱，攻破牙城，杀贺德伦亲兵五百人，劫持德伦，迫使德伦降晋。

晋王李存勖亲率大军入魏州，自兼天雄节度使，收银枪都为亲军。梁将刘鄩统兵与晋军相持，欲以持久制晋；梁主友贞则要求速战速决，派中使前去督战。贞明二年（公元九一六年）二月，刘鄩出兵攻魏州，与晋军会战，梁兵大败，刘鄩引数十骑突围出走，收散卒自黎阳（今河南浚县）渡河，退保滑州（治白马，今河南滑县东）。全军步卒七万，损失殆尽。晋兵陆继攻下河北诸州，梁仅保有黎阳一地。

李存勖取得河北，便以魏州为基地，谋画进攻黄河以南地区。贞明三年（公元九一七年）冬，黄河冰冻，李存勖引步骑渡河，攻占梁河防要津杨柳城（今山东东阿县北杨村）。次年春，梁将谢彦章率部数万反攻杨柳城，掘开黄河口，大水弥漫，阻止晋军前进。至六月，李存勖率亲军涉水渡河，大破梁军，河水被染成赤色。是年秋，李存勖集结全部兵力，从杨柳城循河而上，立营麻家渡。梁将贺瑰、谢彦章率大军屯驻濮州（州治鄆城，今山东鄆城县北）北行台村，与晋军相持百余日。贺瑰忌谢彦章，竟诬以通敌，擅加杀害。李存勖乘机率主力西进，欲直趋汴梁。行至胡柳陂（今山东甄城县西南），贺瑰弃营追踵而来。两军激战，双方损失惨重。晋军失败后胜，但已无力大举进攻。贞明五年（公元九一九年）春，晋将李存审在澶州南面的德胜，夹黄河两岸筑南北两城（德胜北城，即今河南濮阳县城，当时在黄河北岸），以利攻守。从此，德胜继杨柳城之后，成为晋军攻梁的据点。梁也发兵五万自黎阳渡河，掩击魏、澶二州，不能得手，乃在德胜上游十八里处杨村、夹河筑垒，造浮桥通南北。晋军也造船桥连德胜两城。两军大小百余战，互有胜负。

朱友谦是朱温的养子，朱友圭杀朱温，朱友谦以河中镇降晋，以后又反侧于梁、晋两国之间。梁主友贞命大将刘鄩进攻河中，刘鄩败归。刘鄩和朱友谦是儿女亲家，梁朝的近臣诬蔑刘鄩徇私，“逗遛养寇”，友贞信以为真，命人加以酖杀。刘鄩是后梁的名将，友贞信谗，轻易地把他杀了，自剪羽翼，加深了政权的危机。

梁天平节度使（镇郓州须昌，今山东东平县西北）戴思远率郓州兵屯杨村，郓州城内守兵不满千人，郓州守将卢顺密投奔李存勖，把军情告知李存勖。李存勖命大将李嗣源率精兵五千，沿黄河北岸，自德胜北城而东至杨刘渡口，夜渡河至郓州城下，攻下郓州。这一次奇袭胜利，使李存勖在河南又取得一个重要军事据点，对灭亡后梁起了重要作用。

梁主友贞知郓州失守，大梁垂危，于是以大将王彦章为北面招讨使，指挥全局。后唐同光元年（公元九二三年），王彦章引精兵数千自杨村循河南岸，攻下德胜南城。又引十万众攻杨刘，百道俱进，昼夜不息，连巨舰九艘，横互河津以绝援兵。王彦章的战略是想切断黄河南北两岸的联系，然后回军反攻郓州，消灭李嗣源的军队。李存勖一方面亲率大军救援杨刘，一方面命部将郭崇韬率精兵万人急趣博州（治聊城，今山东聊城县东北），渡河筑城，使郓州和河北的联系不至中断。

王彦章为了使自己的军队不被敌人牵制住，解杨刘围，退保杨村。梁主友贞轻易听信近臣建议，撤消了王彦章的北面招讨使职务，叫他率兵万人，去反攻郓州，改任段凝为北面招讨使。后梁的军队人数，不为不多，但分散在各个战场，不能发挥军事优势。所谓“梁兵聚则不少，分则不多”（《资治通鉴》后唐同光元年）。这个分析，是完全正确的。段凝为人“智勇俱无”，绝不是大将之才。叫这种人任主帅，梁的失败是注定的了。

同光元年十月，李存勖自杨刘渡河，至郢州，以李嗣源为先锋，连破梁兵，擒王彦章。当时作战方针有二，一是进攻段凝河上大营，歼灭梁军主力；一是奇袭梁的心脏，一举灭梁。适值梁将康延孝来奔，密告梁军数道出兵，大梁空虚，要求乘虚袭取大梁，郭崇韬和李嗣源也都主张直趋大梁。李存勖采取了这个方针，命李嗣源率前军昼夜兼程，向大梁挺进。八天的时间，就直抵大梁城下。梁主友贞彷徨无计，命亲军将领杀死自己。李嗣源、李存勖不战而入大梁，梁百官纷纷迎降。段凝也率全军五万，解甲请降。梁三主，前后十七年而亡。

**后唐庄宗的兴起与覆亡** 后唐的祖先，西突厥别部处月部落之后，驻帐沙陀碛（今新疆吉尔班通古特沙漠），因此当时人们称之为沙陀突厥。其部落酋长姓朱邪氏。

唐德宗时，有朱邪尽忠，居北庭之金满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贞元（公元七八五至八四年）中，吐蕃赞普攻陷北庭，沙陀向东迁移，居盐州（治五原，今陕西定边县），隶河西节度使范希朝。范希朝移镇太原，朱邪尽忠子朱邪执宜徙居太原之北定襄（今山西定襄县）神武川之新城。部落万骑，皆骁勇善骑射，号沙陀军。执宜子朱邪赤心，唐赐姓名曰李国昌，累官大同军（驻马邑，今山西朔县西北）防御使。沙陀的兵力，“北据蔚（州治灵丘，今山西灵丘县）、朔（州治善阳，今山西朔县），南侵忻（州治秀容，今山西忻县）、代（州治雁门，今山西代县）、（州治宜芳，今山西县北）、石（州治离石，今山西离石县），至于太谷（今山西太谷县）焉”（《新五代史·唐本纪》）。

唐懿宗咸通十年（公元八六九年），李国昌率沙陀军随康承训镇压庞勋起义军，以力战有功，唐僖宗乾符元年（公元八七四年），迁振武节度使（镇单于都护府，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李国昌子克用为沙陀副兵马使，戍蔚州（治灵丘，今山西灵丘县）。唐僖宗乾符五年（公元八七八年），云州（治云中，今山西大同市）沙陀将士迎克用，杀防御使段文楚。唐政府调李国昌为大同节度使（驻云州云中），国昌、克用欲父子并据两镇，拒不受命。唐政府调动大军进攻沙陀兵，国昌父子退保蔚州。广明六年（公元八八八年），国昌、克用兵败，北入达靺部落。达靺的部落酋长害怕李国昌并兼其部落，怀有戒心。李克用知道达靺部落这种心理，“时与豪帅游猎，置马鞭、木叶或悬针，射之无不中，豪帅心服。又置酒与饮，酒酣，克用言曰：‘吾得罪天子，愿效忠而不得。今闻黄巢北来，必为中原患，一旦天子若赦吾罪，得与公辈南向共立大功，不亦快乎！人生几何，谁能老死沙碛邪！’达靺知无留意”（《资治通鉴》唐广明元年），不担心李国昌父子会兼并他们了。

黄巢入长安，李克用率众南据忻（州治秀容，今山西忻县）、代（州治雁门，今山西代县），以勤王为号召，唐以李克用为雁门节度使，令其率兵四万，配合唐军，围攻黄巢。“克用军皆衣黑，故谓之黑军”（《资治通鉴》唐中和二年）。唐军收复长安，黄巢起义军战败，李克用的沙陀军战功最多。唐政府以李克用为河东节度使（镇太原），以李国昌为代北节度使，镇代州（治雁门，今山西代县），父子并据两镇。唐僖宗光启三年（公元八八七年），李国昌病死，代州一带还是处于李克用的控制之下。唐昭宗大顺元年（公元八九八年），唐宰相张浚率众五万，讨伐李克用，结果张浚战败，师徒死亡殆尽。李克用乘胜北收云州。从此沙陀的势力遍布于山西的中部和北部一带，

开始南面争夺潞（州治上党，今山西长治市）、泽（州治晋城，今山西晋城县）、邢（州治龙冈，今河北邢台市）、洺（州治永年，今河北永年县东南），东北面进迫幽（州治蓟县，今北京市）、镇（州治真定，今河北正定县）了。唐昭宗乾宁二年（公元八九五年），李克用进爵晋王。

朱温自立为梁皇帝，李克用与朱温有深仇，仍用唐天祐年号。梁开平二年（公元九〇八年），李克用病死，年五十三。子李存勖嗣晋王位，存勖小名亚子，即后来的后唐庄宗。他嗣位之初，大将李嗣昭被梁军围困在潞州，将近一年，李存勖亲率大将周德威等救援潞州，夹寨交战的结果，梁兵大溃，潞州围解。李存勖回晋阳，厉行改革，“命州县举贤才，黜贪残，宽租赋，抚孤寡，伸冤滥，禁奸盗”。又加强训练士卒，于是“境内大治”，“士卒精整”（《资治通鉴》梁开平二年）。

成德节度使（镇恒州真定，今河北正定县）王镕、义武节度使（镇定州安喜，今河北定县）王处直，反覆于梁、晋二大之间。梁开平四年（公元九一〇年），朱温命大将王景仁、韩勣等统兵屯魏州，谋攻镇、定。李存勖遣周德威往援，驻兵赵州（治平棘，今河北赵县）。王景仁等进军柏乡（今河北柏乡县），李存勖乃亲赴赵州。次年（公元九一一年）正月，晋兵大破梁军，斩首二万级，缴获粮食、资财、器仗不可计数。

唐昭宗乾宁元年（公元八九四年），李克用曾攻取幽州（治蓟，今北京市），以降将刘仁恭为卢龙留后，旋为本镇节度使。仁恭逐步扩充实力，摆脱李克用的控制。唐乾宁四年（公元八九七年），李克用率兵征讨刘仁恭，在木瓜涧（今河北涿源县东南）中伏大败。从此，刘仁恭利用晋、汴两大势力的矛盾，乘隙扩张地盘。唐光化元年（公元八九八年），刘仁恭攻并义昌军（镇沧州清池，今河北沧县东南），兼有幽、沧两镇。遂欲并吞河朔，次年发兵进攻魏州（治贵乡，今河北大名县东北），为汴军所败。至唐昭宣帝天祐三年（公元九〇六年），朱温以幽、沧首尾相倚为患，亲率大军围攻沧州，刘仁恭屡战屡败，令境内能执兵器者悉数从军，刺其面称“定霸都”；士人在腕、臂上刺“一心事主”，得兵十万。复遣使求救于河东，前后百余人。李克用乃释嫌与仁恭言和，联兵攻取朱温控制下的河东屏藩潞州（治上党，今山西长治市）。朱温闻潞州失守，方才解沧州围而去。刘仁恭骄奢贪暴，其子守光淫虐更甚。梁开平元年（公元九〇七年），仁恭为守光所囚，守光自为卢龙节度使。守光兄守文为义昌节度使，镇沧州，兄弟交恶，互相攻击。开平三年（公元九〇九年），守文战败，为守光所囚，不久被杀。守光自称燕王。守光残虐成性，“每刑人，必置诸铁笼，以火逼之；又为铁刷刷人面”（《资治通鉴》梁乾化元年）。乾化元年（公元九一一年），守光自称皇帝，国号大燕。同年十一月，守光将兵二万，攻易（州治易县，今河北易县）、定（州治安喜，今河北定县），义武节度使王处直告急于晋，晋王李存勖命大将周德威率兵攻燕，以救易、定。乾化三年（公元九一三年），晋军破幽州城，擒刘仁恭；刘守光逃亡，途中被擒。李存勖杀仁恭、守光父子。幽州为晋所有。

梁贞明元年（公元九一五年），分魏博六州（魏、博、贝、卫、澶、相）为两镇，从而引起魏博的兵变，变兵请降于晋，李存勖乘机举兵东进。贞明二年（公元九一六年），李存勖大败梁援军，消灭梁军精锐七万，河北除黎阳一地外，尽为晋有。

梁贞明三年（公元九一七年），李存勖攻下杨刘城（今山东东阿县北杨

柳村)。贞明四年（公元九一八年），晋于澶州之南筑德胜北城（即今河南濮阳县城），于黄河之南筑德胜南城。李存勖知郓州（治须昌，今山东东平县西北）守备单薄，命大将李嗣源率精兵五千，袭取郓州。后唐同光元年（公元九二三年）十月，李存勖亲率大军自杨刘渡河，至郓州和李嗣源合军，费了八天的时间，径取大梁。大梁降，梁末帝朱友贞自杀，梁就此灭亡了。

李存勖在攻下大梁之前，于魏州（治元城，今河北大名县北）即皇帝位，国号大唐，史称后唐，改元同光（公元九二三年）。李存勖即后唐庄宗。既灭后梁，取大梁，从张全义请，迁都洛阳。改梁东京开封府为宣武军汴州。遣使宣谕诸道，梁所除授节度使五十余人皆上表入贺。

庄宗以沙陀部落精兵于马上取天下，但是不懂政治，不知与民休息。庄宗幼善音律，故宠信伶人。每自傅粉墨，与优人共戏于庭，优名“李天下”。诸伶恃宠怙势，出入宫掖，侮弄朝官。四方藩镇争以货赂结好伶官。最为蠹政害人的伶官名叫景进，被庄宗委以耳目，专替庄宗探听宫外的事情。景进经常单独奏事，由是得以干预政事，将相大臣都忌惮他。“军机国政，皆与参决。三司使孔谦兄事之，呼为八哥”（《新五代史·伶官传》）。庄宗还用宦官作心腹。唐末诛宦官，宫内各执事都用土人代替。后梁也用土人。庄宗迁都洛阳后，恢复唐旧制，宫内各执事和诸道监军都用宦官。他听从宦官的建议，“分天下财赋为内外府，州县上供者入外府，充经费；方镇贡献者入内府，充宴游及给赐左右。于是外府常虚竭无余而内府山积”（《资治通鉴》后唐同光二年）。洛阳宫殿宏邃，宦官想大增宫女，诈称宫中空屋太多，所以夜里鬼怪游荡。庄宗便命宦官王允平、伶官景进采择民间女子，远至太原、幽、镇，不下三千人。同光三年（公元九二五年），他从魏州回到洛阳，抢掠魏州诸营妇女千余人，“载以牛车，累累盈路”（《资治通鉴》后唐同光三年）。

后梁大将段凝，统兵五万，在黄河上抵御后唐军队，后梁亡，段凝全军降唐。他通过伶官景进纳赂于刘夫人（后为庄宗皇后），因此受到优宠，庄宗任命他为泰宁军节度使（镇兖州瑕丘，今山东兖州县）。后梁宋州节度使（镇宋城，今河南商丘县）袁象先，是朱温的外甥，后唐灭梁，象先运珍货数十万，偏赂刘夫人及权贵、伶官、宦官，不久，中外争誉。名义上黄河南北是统一了，实际政权并没有巩固下来。

荆南节度使高季昌闻唐庄宗灭梁，改名季兴（避李国昌讳），入朝洛阳。他为了转移后唐的兵锋，以蜀道艰险劝庄宗伐蜀，谓“蜀土富饶，又主荒民怨，伐之必克。克蜀之后，顺流而下，取吴如反掌耳”（《资治通鉴》后唐同光元年）。庄宗接受他的意见，决意伐蜀。同光三年（公元九二五年），庄宗以魏王继岌（庄宗子）充西川四面行营都统，大臣郭崇韬充东北面行营都招讨制置等使，骁将康延孝为先锋排阵斩斫使。魏王继岌都统下置中军，由工部尚书任圆、翰林学士李愚参预都统军机。另派供奉官李从袭充中军马步都指挥监押，高品李延安、吕知柔充魏王府通谒。李从袭、李延安、吕知柔三人都是宦官。郭崇韬将出兵，先向庄宗保荐有荐引旧恩的北都（即太原府）留守孟知祥为未来的西川节度使。

唐军六万，同光三年九月十八日从洛阳出发，长驱入蜀，到十一月二十八日克成都，蜀主王衍出降。唐军从出兵到灭蜀，历时仅七十天，这说明前蜀政权腐朽已极，不堪一击；然而后唐统治也面临深重的危机。

唐伐蜀之役，魏王李继岌虽为都统，军中制置部署，一概出于郭崇韬，

崇韬终日决事，将吏宾客趋走盈庭，蜀之降官争以宝货、妓乐赂遗崇韬及其子廷诲。都统府牙门索然，魏王所得不过匹马、束帛、唾壶、尘柄而已。李从袭等随继发入蜀宦官，内心嫉恨不平。郭崇韬素来厌恶宦官，曾告诫继发说：“大王他日得天下，驢马（骗马，即阉马）亦不可乘，况任宦官，宜尽去之，专用士人”（《资治通鉴》后唐同光三年）。这话被吕知柔窃听到，由是宦官都切齿痛恨。蜀人见郭崇韬权大，联名请求李继发留崇韬镇蜀。宦官乘机进谗，继发遂与崇韬相互猜疑。这时成都虽下，而蜀中盗贼群起，布满山林，崇韬命任圜、张筠分道招讨，大军因之淹留未还，庄宗遣宦官向延嗣促令班师。向延嗣到了成都，嫌郭崇韬态度傲慢，与李从袭串通一气，回洛阳诬告郭崇韬父子有异心。适逢庄宗查阅蜀中府库簿籍，怪所藏珍宝不多，延嗣又说珍宝尽入郭家。庄宗愠怒，欲除郭崇韬而犹豫未决。刘皇后竟出手教，密令李继发杀郭崇韬父子。西川节度使孟知祥随后赶到成都，接管蜀中军政事务，李继发乃部署诸军北返。

河中节度使朱友谦本来是朱温养子，朱友圭杀朱温篡位，也要杀朱友谦，朱友谦降附李存勖，赐姓名为李继麟。后唐统一黄河南北，因友谦以河中归附而无后顾之忧，友谦亦自恃有功，苦于伶官、宦者“求勺无厌”，遂拒而不与，结果得罪了伶官、宦者。郭崇韬被冤杀，伶官景进诬告朱友谦和郭崇韬合谋造反，唐庄宗又杀朱友谦全家一百余口。

李继发大军从成都出发，康延孝率一万二千人作为后军。延孝所部多河中兵，闻朱友谦无罪族诛被杀，河中将士大哗。军至剑州（治普安，今四川剑阁县），延孝拥兵西还成都，自称西川节度使，李继发在利州（治绵谷，今四川广元县）闻讯，署任圆为副招讨使，将兵追讨，孟知祥遣西川兵，董璋率东川兵，会攻叛军，很快就把康延孝的叛乱镇压下去了。李继发才引兵倍道而东。

后唐庄宗的失败，同杀害郭崇韬关系很大。后唐的精锐部队六万人，均随郭崇韬入蜀。魏王李继发轻信谗言杀害了郭崇韬，他又控制不住这支大军，危亡的形势，立刻显现了。同时当时朝廷经济拮据，如果西川掌握在朝廷手中，经济情况尚可改善，李继发一离开成都，东西川的统治权力落入董璋、孟知祥手中，中原的经济危机，也就更为严重了。

同光三年（公元九二五年）大饥，民多流亡，老弱往往饿死；租赋不充，东都仓廩空竭；军士乏食，有雇妻鬻子者。翌年三月，以军食不足，河南府豫借夏秋税，民不聊生。租庸使又以仓储不足，朘刻军粮，军心动摇。宰相请发内库贍给诸军。刘皇后出妆具及三银盆，并皇幼子三人于外廷，说宫中别无蓄积，请鬻以贍军。宰相惶惧而退。到了四方兵起，庄宗不得不出金帛给赐诸军，枢密宣徽使及供奉内使景进等皆献金帛以助给赐，军士诟詈道：“我等妻子已饿死，要金帛何用！”人心涣散，无法挽救危亡的局面了。

魏博军队是梁唐之际的劲旅，庄宗以魏博银枪效节都为亲军，攻取汴、洛，银枪都屡立战功，灭梁之后，庄宗不念旧劳，反而加以猜忌。天成元年（公元九二六年）二月，戍守瓦桥关（今河北雄县西南）的魏博士兵，期满回镇，到达贝州（治清河，今河北清河县西北）。庄宗以邺都（治魏州，今河北大名县东北）空虚，恐兵至为变，命令他们留屯贝州。魏博兵士皇甫晖因人心浮动，率众哗变，杀魏博指挥使杨仁晷，奉银枪效节指挥使赵在礼为帅，焚掠贝州，兼程南下，攻破邺都。庄宗得到消息，派骁将元行钦率骑兵三千前往招抚，乱军守陴拒战，行钦攻城失利。庄宗不得已起用宿将李嗣源，

率领一支亲军进讨邺都。亲军号称“从马直”，是庄宗挑选军中骁勇士卒组成的。指挥使郭从谦，认郭崇韬为叔父。郭崇韬遭冤杀后，郭从谦涕泣不平，用私财结交从马直军校，鼓动亲军作乱。天成元年三月初六日，李嗣源率亲军至邺都城下，次日下令军中，明晨攻城。当夜从马直军士哗变，拥李嗣源入城。城中不接受外兵，皇甫晖击散乱军，赵在礼亲率诸校迎李嗣源入城。李嗣源藉口收抚外兵，出城至魏县，收镇州（治真定，今河北正定县）兵五千；南趣相州（治安阳，今河南安阳市），得马数千匹，始能成军。

元行钦从邺都退保卫州（治汲县，今河南汲县），上奏庄宗，说李嗣源和邺都叛兵通谋，以后嗣源屡次上表申诉，都被元行钦扣留。李嗣源的女婿石敬瑭向李嗣源建议：“夫事成于果决而败于犹豫，安有上将（指嗣源）与叛卒入贼城（邺都），而他日得保无恙乎！大梁，天下之要会也，愿假三百骑先往取之；若幸而得之，公宜引大军亟进，如此始可自全”（《资治通鉴》后唐明宗天成元年）。石敬瑭挥兵渡河，突入大梁。三月二十六日，李嗣源也率领大军进入大梁。

庄宗率扈从兵二万五千，也从洛阳东往大梁，至万胜镇（在中牟县），闻李嗣源已经占领大梁，神色沮丧，登高叹息道：“吾不济矣！”即命旋师。士卒逃散，只剩一万多人。庄宗路过罍子谷（在当时汜水县西），山路狭窄，每遇卫士，便用善言安抚，许以厚赏。回答说：“陛下赏赐太晚，谁也不会感恩。”庄宗刚回到洛阳，四月初一日，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发动兵变，帅所部兵攻入兴教门（皇宫南面三门，左曰兴教门）。庄宗率宿卫军校十余人力战，被流矢射中身死，年四十二。身经百战统一黄河南北的后唐庄宗就这样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结束了他的生命。

洛阳兵变，庄宗中流矢而死。刘皇后携带金宝，逃往晋阳。诸军大掠都城。李嗣源引军入洛阳，称监国。魏王继岌率征蜀大军至兴平，进退失据，行至渭南，被宦官李从袭杀害。任圜代领全军二万六千人，归降李嗣源。宗室请王多被李嗣源部下所杀，庄宗诸幼子下落不明，李克用家族几乎灭绝。刘皇后在晋阳为尼，也被李嗣源派人杀死。

庄宗晚年，命宦官为诸道监军。李嗣源下令罢诸道监军使，以庄宗由宦官亡国，命诸道尽杀宦官。在洛阳兵变时逃出洛阳的数百名宦官，藏匿山林，或落发为僧。有七十余人逃到晋阳，全部被捕杀。四川行营都监李从袭，也在华州被杀。发动兵变的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外调为景州（州治弓高，今河北景县东北）刺史，刚到景州就被李嗣源杀了，并诛其族。

后唐明宗的得国与后唐王朝的灭亡 后唐明宗，少名邈佶烈，也是沙陀部落人。初以骑射事李克用，李克用收为养子，乃姓李，名嗣源。

嗣源在庄宗世累立战功，曾以五千骑渡河取郢州，庄宗因之取大梁，灭后梁建后唐，累迁宣武节度使（镇大梁），兼蕃汉内外马步军总管（三军统帅），徙镇成德节度使（镇镇州真定，今河北正定县）。庄宗晚年，军食不足，谣言四起，李嗣源位高名重，遭到庄宗的疑忌，入朝洛阳，遂留居洛阳。邺都兵变，庄宗命李嗣源率亲军北讨而亲军哗变，李嗣源被迫引军渡河，占领汴州（大梁城）。随后进军洛阳，自称监国。旋即皇帝位，仍以唐为国号，改元天成。

李嗣源即位后，下令废除夏秋两税省耗。什么叫省耗呢？旧例，夏秋两税，“先有省耗，每斗一升，今后止约正税数，不量（收）省耗”（《五代会要》卷二十五）。天成二年（公元九二七年），“蔚（州治灵丘，今山西

灵丘县)、代(州治雁门,今山西代县)缘边,粟(小米)斗不过十钱”(《资治通鉴》后唐明宗天成二年)。天成三年(公元九二八年),“东都(洛阳)民有犯私曲者,留守孔循族之。或请听民造曲,而于秋税亩收五钱”(《资治通鉴》后唐天成三年)。诏曰:“应三京(指洛阳、大梁、太原)、邺都、诸道州府乡村人户,自今年七月起,于秋田苗上,每亩纳曲钱五文足陌,一任百姓自造私曲,酝酒供家,其钱随夏秋徵纳。其京都及诸道州府县镇坊界内,应逐年买官曲酒户,便许自造曲,酝酒货买。仍取天成二年正月至年终一年逐户计算都买曲钱数内,十分只纳二分,以充榷酒钱。”“榷酒户外,其余诸色人,亦许私造酒曲供家,即不得衷私卖酒,如有故违,便即纠察,勒依中等酒户纳榷。其坊村一任沽卖,不在纳榷之限。”长兴元年(公元九三年)二月赦书节文:“诸道州府人户,每秋苗一亩上,元徵曲钱五文,今后特放二文,只徵三文。”长兴二年诏曰:“乱离日久,贫下户多”,“各务耕田凿井,孰能枕麴藉糟?既随例以均摊,遂抱虚而输纳,渐成雕敝,深可悯伤”。“应在京诸道苗亩所徵麴钱等,便从今年夏并放。其麴官中自造,委逐州减旧价一半,于在城扑断货卖。除在城不得私造外,乡村人户或要供家,一任私造”(《旧五代史·食货志》)。

长兴二年(公元九三一年)六月,命诸道均民田税。十二月,“初听百姓自铸农器并杂铁器,每田二亩,夏秋输农具三钱”(《资治通鉴》后唐长兴二年)。

明帝在位八年,“年谷屡丰,兵革罕用,校于五代,粗为小康”(《资治通鉴》后唐长兴四年)。

后唐明宗也是残酷的统治者。天成元年,诏发汴州控鹤指挥使张谏等三千人戍瓦桥。军士出城复还,焚掠坊市,杀权知州、推官高逖。马步都指挥使李彦饶尽杀张谏及乱兵四百人。明宗命枢密使孔循知汴州,复诛兵士三千家。

同年,滑州都指挥使于可洪等纵火作乱,诏斩可洪于都市。其首谋滑州左崇牙全营族诛,右崇牙将校百人亦族诛,死者当在数千人以上。

天成二年三月,明宗发魏州牙兵三千五百人,使军校龙暉率领,戍芦台军(今天津宁河县)以备契丹,龙暉所部兵杀河北道副招讨使乌震,戍守芦台的骑兵杀乱兵,得免者什无一二。四月,明宗命令芦台乱兵在营家属并满门处斩。于是邺都驱杀三千五百家凡万余人于石灰窑,永济渠为之变色。

明宗目不识书,四方奏章皆令枢密使安重诲诵读。重诲粗通文墨,也不能尽通,因奏请选用文臣以备应对,明宗乃命翰林学士冯道、赵凤为端明殿学士。

安重诲少事明宗,原为成德军中门使,明宗监国时任枢密使,参决大小机务,是明宗创业的“佐命功臣”。但是恃功矜宠,专权自恣。天成元年,明宗以任圜为宰相。任圜“简拔贤后,杜绝侥幸,暮年之间,府库充实,军民皆足,朝纲粗立”(《资治通鉴》后唐天成元年)。因与安重诲议论不合,天成二年斥居磁州,不久被安重诲借故杀害。

长兴元年(公元九三年),董璋据东川,孟知祥据西川,同拒朝廷。明宗派石敬瑭率唐军伐蜀,“川路险阻,粮运甚艰,每费一石,而致一斗。自关以西,民苦输送”(《新五代史·安重诲传》)。石敬瑭主张退兵。安重诲自请前往督战。重诲日驰数百里,督运钱帛、刍粮,日夜不绝,人畜死亡无数,远近惊骇。明宗遂召重诲还京。石敬瑭以战事失利,粮运不继,引

兵北归。安重海在还京途中被解除枢密使职务，为护国节度使。重海惶恐不安，请求致仕，终遭明宗疑忌而被杀。任圜刚复，安重海专横，但都尽忠职守。两人相继身死，奸佞得势，祸乱就不可遏止了。

明宗长子从璟，为庄宗所杀。次子秦王从荣，长兴公元（公元九三一年）为河南尹，兼判六军诸卫事，四年（公元九三三年）又加封天下兵马大元帅，虽未立为太子，实际是皇位的继承人。三子宋王从厚，长兴末出镇邺都。四子从益，年幼。长兴四年（公元九三三年）十一月，明宗病重，从荣以为明宗已死，率河南府牙兵千人列阵天津桥，准备入宫。宫中骑兵出击，从荣逃至府第被杀。明帝经此大变，病情加剧，后数日病卒。宋王从厚至洛阳即位，是为闵帝。

明宗养子从珂骁勇善战，少从明宗征伐，积功为凤翔节度使，封潞王。朝廷猜忌潞王，命移镇河中，潞王拒命。闵帝以西都（长安）留守王思同为西面行营马步军都部署，率禁军合六镇兵围攻凤翔。羽林指挥使杨思权率诸军譁变，拥潞王为主。潞王允许事成后以杨思权为节度使。“悉斂城中将吏士民之财以犒军，至于鼎釜皆估直以给之”。潞王整众而东，至长安，西都副留守刘遂雍迎谒。闵帝亦在洛阳慰问宿卫将士，“空府库以劳之，许以平凤翔，人更赏二百缗。军士益骄，无所畏忌，负赐物，扬言于路曰：‘至凤翔更请一分’”（《资治通鉴》后唐清泰元年）。朝廷前后所发诸军，遇西军皆迎降。西军长驱入陕州（州治陕，今河南三门峡市），迫近洛阳。

闵帝闻潞王将至，欲奔魏州，至卫州（治汲县，今河南汲县）驿遇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入朝，敬瑭部下牙内指挥使刘知远尽杀闵帝左右五十骑。不久潞王使人至卫州缢杀闵帝。闵帝孔妃及四子，在洛阳亦被杀。潞王即皇帝位，是为后唐末帝。

潞王从凤翔出兵时，允许入洛后军士每人赏钱百缗。既至洛阳，阅实库中金帛不过三万两、匹，而犒军费需要五十万缗。三司使百般搜括京城民财。凡输财稽违者，下狱督责，狱中人满，贫民多赴井自尽，或投环自经。尽管这样，犒军费依然不敷。当时尽括左藏旧物及诸道贡献，以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也不过二十万缗。潞王无法，只好减少赏金，禁军将领杨思权等各赐二马、一驼，钱七十缗；军士钱二十缗；在京军士钱十缗。军士怨望，流言说：“除去菩萨（闵帝小字菩萨），扶立生铁（指潞王）。”五代的骄兵悍将，为了邀功请赏，升官发财，发动兵变拥立皇帝，这是为祸最烈的一次。

石敬瑭自太原入朝，“山陵既毕，不敢言归。时敬瑭久病羸瘠，太后（曹太后，魏国公主母）及魏国公主（石敬瑭妻）屡为之言，而凤翔将佐多劝帝留之”，“帝亦见其骨立，不以为虞”，“乃复以为河东节度使”（《资治通鉴》后唐潞王清泰元年）。“敬瑭至太原，于宾客前自称羸瘠，不堪为帅，冀朝廷不之忌”。时契丹屡攻北边，敬瑭“求益兵运粮”，“诏镇州输绢五万匹于〔河东〕总管府，余军粮”，“又诏魏博市余。时水旱民饥，敬瑭遣使督趋严急，山东（太行山、常山之东）之民流散，乱始兆矣”（《资治通鉴》后唐潞王清泰元年）。

石敬瑭想窥测李从珂意图，“累表自陈羸疾，乞解兵柄（谓北面马步军都总管），移他镇。帝（李从珂）与执政议从其请，移镇郢州”，群臣皆以为不可。天福元年（公元九三六年）五月，从珂与枢密直学士薛文遇议河东事，文遇曰：“以臣观之，河东移亦反，不移亦反，在旦暮耳，不若先事图之。”李从珂接受了这个意见，以石敬瑭为天平节度使（镇郢州），以宋审

虔为河东节度使，代敬瑭。敬瑭称病，不受代，上表：“帝养子，不应承祀，请传位许王”（明宗幼子许王从益）。李从珂下制削夺敬瑭官爵，以张敬达兼太原四面排陈使、兵马都部署、知太原行府事，包围太原。张敬达将兵三万营于太原晋祠南晋安寨。石敬瑭遣使求救于契丹。九月，契丹主耶律德光将五万骑入援，大败后唐军，步兵死者近万人。不久，晋安寨兵乱，张敬达被杀，契丹遂与石敬瑭联军而南，李从珂率家属登洛阳玄武楼自焚，后唐亡。李从珂死时，年五十一。

后晋高祖的建国兴契丹灭晋 石敬瑭，沙陀部落人。后唐明宗妻以爱女，以力战功，历官宣武节度使、天雄节度使、河东节度使。潞王欲敬瑭徙镇天平，敬瑭不受代，并求援于契丹，“草表称臣，且以父礼事”契丹主，约事捷之日，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与之。刘知远谏曰：“称臣可矣，以父事之太过。厚以金帛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许以土田，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无及。”敬瑭不从。表至契丹，契丹主大喜，“乃为复书，许俟仲秋倾国赴援”。后晋天福元年（公元九三六年）“九月，契丹主将五万骑，号三十万，自扬武谷（在今山西崞县）而南”，至晋阳。石“敬瑭引兵会契丹围晋安寨，置营于晋安之南，长百余里，厚五十里”。唐晋安寨“士卒犹五万人，马万匹”，完全和外界消息隔绝，“声问不复通”（《资治通鉴》后晋高祖天福元年）。

天福元年十一月，“契丹主作册书，命敬瑭为大晋皇帝”，敬瑭即皇帝位于柳林。“割幽（州治蓟，今北京市西南）、蓟（州治渔阳，今河北蓟县）、瀛（州治河间，今河北河间县）、莫（州治莫县，今河北任丘县北）、涿（治范阳，今河北涿县）、檀（州治密云，今河北密云县）、顺（州治怀柔，今河北顺义县）、新（州治永兴，今河北涿鹿县）、妣（州治怀戎，今沦为官厅水库）、儒（州治妣水，今河北延庆县）、武（州治文德，今河北宣化县）、云（州治云中，今山西大同市）、应（州治金城，今山西应县）、寰（州治寰清，今山西朔县东）、蔚（州治灵丘，今山西蔚县）十六州以与契丹，仍许岁输帛三十万匹”（《资治通鉴》后晋高祖天福元年）。

被围困在晋安寨的唐军，经过数月之久，“刍粮俱竭”，军心动摇，统帅张敬达为部将张光远所杀。张光远率全军投降于石敬瑭。时晋安寨尚有马五千匹、铠仗五万件，契丹主悉收取以归其国，降卒五万，悉归石敬瑭指挥。石敬瑭和契丹主联军俱南。

和石敬瑭向契丹称臣同时，幽州节度使赵德钧及其子宣武节度使赵延寿（也是后唐明宗的女婿），也遣使厚赂契丹主金帛，并密书契丹主云：“若立己为帝，请即以见兵南平洛阳，与契丹为兄弟之国，仍许石氏常镇河东”（《资治通鉴》后晋高祖天福元年）。契丹主权衡利害，以为援立石敬瑭为帝，较援立赵德钧为有利。时赵德钧父子均驻军潞州，契丹主过潞州，赵德钧父子迎谒，契丹主遂锁德钧、延寿父子，送归其国。德钧郁郁，不一年病死。延寿为契丹谋主，甚见信任。

契丹主至上党（今山西长治市），北返，石敬瑭率兵南下，唐主李从珂登洛阳玄武楼自焚而死。

石敬瑭“新得天下，藩镇多未服从，或虽服从，反仄不安。兵火之余，府库殫竭，民间困穷，而契丹徵求无厌”。宰相兼枢密使桑“维翰劝帝推诚弃怨以抚藩镇，卑辞厚礼以奉契丹，训甲缮兵以修武备，务农桑以实仓廩，通商贾以丰货财。数年之间，中国稍安”（《资治通鉴》后晋高祖天福二年）。

天福二年（公元九三七年），契丹改元会同，国号大辽，公卿庶官，皆仿中原，参用汉人，“以赵延寿为枢密使，寻兼政事令”（《资治通鉴》后晋高祖天福二年）。天福三年（公元九三八年），石敬瑭“上尊号于契丹主及太后”，秋七月，“以冯道为太后册礼使，左仆射刘煦为契丹主册礼使，备卤簿、仪仗、车辂，诣契丹行礼，契丹主大悦。帝事契丹甚谨，奉表称臣，谓契丹主为父皇帝”。“岁输金帛三十万以外，吉凶庆吊，岁时赠遗，玩好珍异，相继于道”。契丹太后、太子、诸王、大臣等，“皆有赂遗”。“晋使者至契丹，契丹骄傲，多不逊语。使者还，以闻，朝野咸以为耻，而帝事之曾无倦意，以是终帝之世与契丹无隙。然所输金帛不过数县租赋，往往托以民困，不能满数。其后契丹主屡止帝上表称臣，但令为书称儿皇帝如家人礼”（《资治通鉴》后晋高祖天福三年）。

天福三年十月，石敬瑭以大梁舟车所会，便于漕运，于是建都于大梁，号大梁曰东京，置开封府，以洛阳为西京，于长安置晋昌军节度。

“成德节度使（镇真定，今河北正定县）安重荣耻臣契丹，见契丹使者，必箕踞慢骂，使过其境，或潜遣人杀之”，契丹主遣使责问石敬瑭，石敬瑭“为之逊谢”。安重荣又上表“数千言，大抵斥帝父事契丹，竭中国以媚无厌之虏”。并与朝贵书，云“已勒兵，必与契丹决战”。桑维翰是主降派。他密上疏石敬瑭说：“臣窃观契丹数年以来，士马精强，吞噬四邻，战必胜，攻必取，割中国之土地，收中国之器械；其君智勇过人，其臣上下辑睦，牛羊蕃息，国无天灾，此未可与为敌也。且中国新败，士气雕沮，以当契丹乘胜之威，其势相去甚远。又和亲既绝，则当发兵守塞，兵少则不足以待寇，兵多则馈运无以继之。我出则彼归，我归则彼至，臣恐警卫之士疲于奔命，镇、定之地无复遗民。今天下粗安，疮痍未复，府库虚竭，蒸民困弊，静而守之，犹惧不济，其可妄动乎！契丹与国家恩义非轻，信誓甚著，彼无间隙，而自启衅端，就使克之，后患愈重；万一不克，大事去矣。议者以岁输缙帛谓之耗蠹”，“殊不知兵连而不休，祸结而不解，财力将匮，耗蠹孰甚焉！”“臣愿陛下训农习战，养兵息民，俟国内无忧，民有余力，然后观衅而动，则动必有成矣”（《资治通鉴》后晋高祖天福六年）。石敬瑭完全同意桑维翰的看法，坚持和契丹的和亲。

天福六年秋七月，石敬瑭任命刘知远为河东节度使，加强了太原的防务。八月，石敬瑭离开大梁，亲至邺都。十一月，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起兵于襄州，不久失败，安从进举族自焚。十二月，成德节度使安重荣也“大集境内饥民，众至数万，南向邺都，声言入朝”（《资治通鉴》后晋高祖天福六年）。宗城（今河北威县东三十里）会战，重荣大败，退回镇州，一共损折了三万多兵士，后镇州为杜重威所破，安重荣被杀。

天福七年（公元九四二年）六月，石敬瑭在邺都病死，年五十一。敬瑭子重睿年幼，大臣以国家多难，宜立长君，乃拥立敬瑭兄敬儒子齐王重贵为帝。

重贵即位，得到大将河阳节度使、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景延广的拥戴，因此重用景延广。景延广请致书契丹时，称孙而不称臣，契丹主大怒，遣使来责问。“契丹卢龙节度使赵延寿欲代晋帝中国，屡说契丹击晋，契丹主颇然之”（《资治通鉴》后晋高祖天福七年）。契丹回图使（经管契丹后晋间的贸易称回图务）乔荣往来贩易后晋和契丹之间，置邸（堆栈）大梁，景延广说重贵囚乔荣，尽夺邸中堆积的货物。不久又把乔荣释放回去。临行，延广

对乔荣说：“归语而主，先帝为北朝所立，故称臣奉表。今上（指重贵）乃中国所立”，“为邻为孙，足矣，无称臣之理。北朝皇帝（指契丹主）勿信赵延寿诳诱，轻侮中国。中国士马，尔所目睹。翁（指契丹主）怒则来战，孙（重贵）有十万横磨剑，足以相待”（《资治通鉴》后晋齐王天福八年）。乔荣回到契丹，以告契丹主，契丹主大怒，决定对晋用兵。

天福八年（公元九四三年），“春夏旱，秋冬水，蝗大起，东自海墉，西距陇坻，南逾江、淮，北抵幽、蓟，原野、山谷、城郭、庐舍皆满，竹叶俱尽。重以官括民谷，使者督责严急，至封碓磳，不留其食，有坐匿谷抵死者”。“民饿死者数十万口，流亡不可胜数”（《资治通鉴》后晋齐王天福八年）。

开运元年（公元九四四年）正月，契丹前锋将赵延寿统兵五万人攻陷贝州（治清河，今山东清河县），旋又攻下博州（治聊城，今山东聊城市东北）。契丹的前锋在契丹主从弟麻答的率领下，推进到马家口，遭到晋军袭击，“契丹大败，乘马赴河溺死者数千人，俘斩亦数千人”。三月，契丹主“自将兵十余万陈于澶州（治顿丘，今河南清丰县西）城北，东西横掩之两隅，登城望之，不见其际”。“契丹主以精兵当中军而来，帝（重贵）亦出陈以待之”。契丹主“以精骑左右略陈，晋军不动，万弩齐发，飞矢蔽地。契丹稍却；又攻晋陈之东偏不克。苦战至暮，两军死者不可胜数。昏后，契丹引去”。“契丹主自澶州北分为两军，一出沧、德，一出深、冀而归。所过焚掠，方广千里，民物殆尽”（《资治通鉴》后晋齐王开运元年）。

由于契丹军队深入河北，由于军兴，国用愈竭，朝廷“复遣使者三十六人分道括率民财，各封剑以授之。使者多从吏卒，携锁械、刀仗入民家，小大惊惧，求死无地，州县吏复因缘为奸”。又下“诏诸州所籍乡兵，号武定军，凡得七万余人。时兵荒之余，复有此扰，民不聊生”（《资治通鉴》后晋齐王开运元年）。

开运元年冬、开运二年春，契丹又大举攻邢（州治龙冈，今河北邢台市）、洺（州治永年，今河北永年县东南）、磁（州治滏阳，今河北磁县）三州，“杀掠殆尽”。晋军反攻，阳城（今河北完县东南）会战，契丹精骑“四合如山”，晋军力战拒敌，契丹主退至幽州。

开运三年（公元九四六年），晋主重贵将北御契丹，以天雄节度使（镇魏州元城，今河北大名县北）邺城留守杜威为北面行营都指挥使（即元帅），以天平节度使、侍卫马步都指挥使李守贞为兵马都监（即副帅），在邺都会合，整军北行，晋主重贵把所有禁军都调拨给杜威和李守贞指挥，以致大梁宿卫空虚。契丹、后晋两军对峙在恒州真定城南滹沱河两岸，“契丹遥以兵环晋营，内外断绝，军中食且尽”。杜威和李守贞密遣腹心至契丹主牙帐，表示愿意投降，并邀求重赏。“契丹主给（用言欺骗）之曰：‘赵延寿威望素浅，恐不能帝中国。汝（谓杜威）果降者，当以汝为之。’”（《资治通鉴》后晋齐王开运三年），这样，杜威就召集诸将，出示降表，使诸将署名，不战而降。河北州镇相继降于契丹。契丹主命后晋将领张彦泽率二千骑，渡白马津（今河南滑县），径取大梁。这时大梁禁兵卫才五百人，当然无法抵抗，大梁城破，“城中大扰”。

晋帝重贵“于宫中起火。自携剑驱后宫十余人将赴火，为亲军将薛超所持。俄而彦泽自宽仁门（大梁皇城东门）传契丹主与太后书慰抚之”。“帝乃命灭火”。“帝坐苑中，与后妃相聚而泣，召翰林学士范质草降表，自称

‘孙男臣重贵，祸至神惑，运尽天亡。’”都监傅住儿“入宣契丹主命，帝脱黄袍，服素衫，再拜受宣，左右皆掩泣”。张彦泽纵兵大掠，贫民乘之，亦争入富室，杀人取其货，二日方止，都城为之一空。彦泽所居宝货山积，自谓有功于契丹，昼夜以酒乐自娱，出入骑从常数百人，其旗帜皆题‘赤心为主’，见者笑之”。“张彦泽迁帝于开封府，顷刻不得留，宫中恸哭。”（《资治通鉴》后晋齐王开运三年）。

张彦泽杀桑维翰。契丹主见景延广，诘之曰：“十万横磨剑安在！”欲送景延广至契丹国，延广自杀。

天福十二年（公元九四七年），契丹主至大梁，杀张彦泽及傅住儿于大梁北市，以平民愤。

契丹主迁晋主及其家人于封禅寺，“时雨雪连旬”，“上下冻馁。太后使人谓寺僧曰：‘吾尝于此饭僧数万，今日独无人相念邪！’”僧辞以契丹意不可测，“不敢献食，晋主阴祈守者，乃稍得食”。契丹主又迁晋主于黄龙府（今吉林农安县）。不久，李太后（后唐明宗女，石敬瑭妻）、安太妃（石敬瑭妻，重贵生母）均在东北病死，据《新五代史·晋家人传》云：“周显德（公元九五四至九五九年）中，有中原人自契丹亡归者，言见帝及皇后、诸子皆无恙，后不知其所终。”

契丹灭晋前，契丹翰林承旨、吏部尚书张砺言于契丹主曰：“今大辽已得天下，中国将相宜用中国人为之，不宜用北人及左右近习。苟政令乖失，则人心不服，虽得之，犹将失之。契丹主不从”（《资治通鉴》后晋齐王开运三年）。

契丹主既入洛阳，“广受四方贡献，大纵酒作乐，每谓晋臣曰：‘中国事，我皆知之；吾国事，汝曹不知也。’”“赵延寿请给上国兵廩食，契丹主曰：‘吾国无此法。’乃纵胡骑四出，以牧马为名，分番剽掠，谓之‘打草谷’。丁壮毙于锋刃，老弱委于沟壑，自东、西两畿（大梁为东畿，洛阳为西畿）及郑（州治管城，今河南郑州市）、滑（州治白马，今河南滑县东）、曹（州治济阴，今山东定陶县西南）、濮（州治鄆城，今山东鄆城县北），数百里间，财畜殆尽。契丹主谓判三司刘煦曰：‘契丹兵三十万，既平晋国，应有优赐，速宜营办。’时府库空竭，煦不知所出，请括借都城（大梁）士民钱帛，自将相以下皆不免。又分遣使者数十人诣诸州括借，皆迫以严诛，人不聊生。”“于是内外怨愤，始患苦契丹，皆思逐之矣”（《资治通鉴》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

“契丹主召晋百官悉集于庭，问曰：‘吾国广大，方数万里，有君长二十七人；今中国（指中原）之俗异于吾国，吾欲择一人君之，如何？’皆曰：‘天无二日。夷、夏之心。皆愿推戴皇帝。’如是者再。契丹主乃曰：‘汝曹既欲君我，今兹所行，何事为先？’对曰：‘王者初有天下，应大赦。’”天福十二年（公元九四七年）“二月，丁巳朔，契丹主服通天冠、绛纱袍，登正殿，设乐悬、仪卫于庭。百官朝贺，华人皆法服，胡人仍胡服，立于文武班中间。下制称大辽会同十年，大赦”。赵延寿以求为帝不得，“心怏怏，令李崧言于契丹主曰：‘汉天子所不敢望，乞为皇太子。’崧不得已为言之。契丹主曰：‘我于燕王（赵延寿封燕王），虽割吾肉，有用于燕王，吾无所爱。然吾闻皇太子当以天子儿为之，岂燕王所可为也！’因令为燕王迁官。时契丹以恒州（治真定，今河北正定县）为中京，翰林承旨张砺奏拟燕王中京留守、大丞相、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枢密使如故。契丹主取笔涂

去‘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而行之”（《资治通鉴》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

“初置乡兵”，号武定军，后改“号天威军，教习岁余，村民不闲军旅，竟不可用，悉罢之，但令七户输十千，其铠仗悉输官。而无赖子弟，不复肯复农业，山林之盗，自是而繁。及契丹入汴，纵胡骑打草谷；又多以其子弟及亲信左右为节度使、刺史，不通政事，华人之狡狴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威福，倍敛货财，民不堪命。于是所在相聚为盗，多者数万人，少者不减千百，攻陷州县，杀掠吏民”（《资治通鉴》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东方农民不断起义，攻陷宋（州治宋城，今河南商丘县）、亳（州治谯，今河南亳县）、密（州治诸城，今山东诸城县）三州。围绕在徐州城下有李仁恕为首的农民军数万人，各地农民起义军风起云涌，迫使契丹主放弃大梁，向北撤退。

契丹主诏晋之百官“有职事者从行，余留大梁”。“复以汴州为宣武军，以萧翰为节度使。翰，述律太后之兄子，其妹复为契丹主后”。三月十七日，“契丹主发大梁，晋文武诸司从者数千人，……宫女、宦官数百人，尽载府库之实以行”（《资治通鉴》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

濠阳（今河北磁县）人梁晖据相州（治安阳，今河南安阳市），杀契丹兵数百。契丹主过相州，四月初四日，“命蕃汉诸军急攻相州，食时克之，悉杀城中男子，驱其妇女而北”，“留高唐英守相州，唐英关城中，遗民男女得七百余，其后节度使王继弘敛城中髑髅瘞之，凡得十余万”（《资治通鉴》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

“契丹主以船数十艘载晋铠仗，将自汴沂河归其国”，命武行德“将士卒千余人部送之。至河阳（今河南荣阳县东北），行德与将士谋曰：‘今为“虜”所制，将远去乡里。人生会有死，安能为异域之鬼乎！“虜”势不能久留中国，不若共逐其党，坚守河阳……岂非长策乎！’众以为然。行德即以铠仗授之，相与杀契丹监军使。会契丹河阳节度使崔廷勋以兵送耿崇美之潞州（治上党，今山西长治市），行德遂乘虚入据河阳（今河南孟县南），众推行德为河阳都部署”（《资治通鉴》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行德遣使奉蜡表间道诣晋阳，刘知远任命武行德为河阳节度使。

“契丹主闻河阳乱，叹曰：‘我有三失，宜天下之叛我也！诸道括钱，一失也；令上国人（契丹人）打草谷，二失也；不早遣诸节度使还镇，三失也。’”“契丹主至临城（今河北临城县），得疾，及乐城（今河北乐城县），病甚，苦热，聚冰于胸腹手足”。二十一日，“至杀胡林而卒。国人剖其腹，实盐数斗，载之北去，晋人谓之‘帝羴’”（《资治通鉴》后汉高祖天福二年）。

赵延寿恨做不到皇帝，“谓人曰：‘我不复入龙沙矣。’即日，先引兵入恒州，契丹永康王兀欲及南北二王，各以所部兵相继而入”。“时契丹诸将已密议奉兀欲为主，兀欲登鼓角楼受叔兄拜，而延寿不之知”。“恒州诸门管钥及仓库出纳，兀欲皆自主之。延寿使人请之，不与”。“或说赵延寿曰：‘契丹诸大人日聚谋，此必有变。今汉兵不下万人，不若先事图之。’延寿犹豫未决”。五月初一日，永康王兀欲召延寿及张砺等饮酒。“兀欲妻素以兄事延寿，兀欲从容谓延寿曰：‘妹（兀欲之妻）自上国来，宁欲见之乎？’延寿欣然与之俱入。良久，兀欲出，谓砺等曰：‘燕王谋反，适已锁之矣。’又曰：‘先帝在汴时，遗我一筹，许我知南朝军国。近者临崩，别

无遗诏。而燕王擅自知南朝军国，岂理邪！’”“后数日，集蕃、汉之臣于府署，宣契丹主遗制，其略曰：‘永康王，大圣皇帝（阿保机）之嫡孙，人皇王（东丹王突欲）之长子，太后钟爱，群情允归，可于中京即皇帝位’”（《资治通鉴》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

“契丹述律太后闻契丹主自立，大怒，发兵拒之”。太后兵大败，“契丹主幽太后于阿保机墓，改元天禄，自称天授皇帝”。“契丹主慕中华风俗，多用晋臣，而荒于酒色，轻慢诸酋长，由是国人不附，诸部数叛，兴兵诛讨，故数年之间，不暇南寇”（《资治通鉴》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

萧翰守大梁，闻刘知远自太原南下，“欲北归，恐中国无主，必大乱，己不得从容而去。时唐明宗子许王从益与王淑妃在洛阳”，翰遣使迎之，“矫称契丹主命，以从益知南朝军国事，召己赴恒州。淑妃、从益匿于徽陵（明宗陵）下宫，不得已而出。至大梁，翰立以为帝，帅诸酋拜之”。“百官谒见淑妃，淑妃泣曰：‘吾母子单弱如此，而为诸公所推，是祸吾家也。’翰留燕兵千人守诸门，为从益宿卫”。五月十八日，萧翰离开大梁北返，王淑妃“召大臣谋之曰：‘吾母子为萧翰所逼，分当灭亡。诸公无罪，宜早迎新主（指刘知远），自求多福，勿以吾母子为意！’”乃“遣使奉表称臣迎帝（刘知远），请早赴京师，仍出居私第”。六月，刘知远至洛阳，遣将“先入大梁清宫，密令杀李从益及王淑妃。淑妃且死，曰：‘吾儿为契丹所立，何罪而死！何不留之，使每岁寒食，以一盂麦饭洒明宗陵（徽陵）乎！’”（《资治通鉴》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

契丹主兀欲北返，以麻答为中京（恒州）留守。萧翰至恒州，与麻答共守。“麻答贪猾残忍，民间有珍货、美妇女，必夺取之。又捕村民，诬以为盗”，“杀之，欲以威众”。契丹留恒州兵不满二千，“麻答令所司给万四千人食，收其余以自入”，“众心怨愤”。闻刘知远入大梁，“皆有南归之志。前颍州防御使何福进，控鹤指挥使太原李荣，潜结军中壮士数十人”，“约以击佛寺钟为号”。“契丹主兀欲遣骑至恒州”，召冯道、李崧、和凝等，“会葬契丹主德光于木叶山。道等未行，食时，钟声发。汉兵夺契丹守门者兵击契丹”，“因突入府中。李荣先据甲库，悉召汉兵及市人，以铠仗授之，焚牙门，与契丹战”。“烟火四起，鼓噪震地。麻答等大惊，载宝货家属，走保北城。而汉兵无所统一”。契丹复“自北门入，势复振，汉民死者二千余人”。“李谷恐事不济，请冯道、李崧、和凝至战所慰勉士卒，士卒见道等至，争自奋。会日暮，有村民数千噪于城外”，“契丹惧而北遁”，麻答“奔定州”（《资治通鉴》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

后汉王朝的建立与灭亡 刘知远，沙陀部落人，世居太原，和后晋高祖石敬瑭俱为偏将事后唐明宗。石敬瑭为太原节度使，知远为押衙。石敬瑭为皇帝，知远以佐命功，天福六年（公元九四一年）拜河东节度使、北京留守。

石敬瑭病死，石重贵即帝位。重贵与契丹绝盟，后晋亡，晋主石重贵北迁，契丹主入居大梁。刘“知远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轶”遣将“王峻奉三表诣契丹主：一，贺入汴；二，以太原夷、夏杂居，戍兵所聚，未敢离镇；三，以应有贡物，值契丹将刘九一军自土门入屯于南川，城中忧惧，俟召还此军，道路始通，可以入贡。契丹主赐诏褒美”。刘知远又遣北都副留守白文珂“入献奇缯、名马。契丹主知知远观望不至，及文珂还，使谓知远曰：‘汝不事南朝，又不事北朝，意欲何所俟邪？’”“或劝知远举兵进取，知远曰：‘用

兵有缓有急，当随时制宜。今契丹新降晋兵十万，虎据京邑，未有他变，岂可轻动哉！且观其所利，止于货财，货财既足，必将北去。况冰雪已消，势难久留，宜待其去，然后取之，可以万全。’”天福十二年（公元九四七年）二月，刘知远于太原即汉皇帝位，国号汉，史称后汉。

天福十二年四月，契丹主北归，中途病死。刘知远取晋（州治临汾，今山西临汾县）、绛（州治正平，今山西新绛县）路，至陕州（治陕，今河南三门峡市）、新安（河南新安县）、洛阳，又东至大梁。河南州镇，相继归附，河北州镇，也不断挣脱契丹的统治，依附后汉。只有天雄节度使兼中书令杜重威据邺都（治元城，今河北魏县东）不肯归附，刘知远亲率大军攻围，从九月围攻到十一月，杜重威才出降，“城中馁死者什七八，存者皆尪瘠无人状”。杜重威归降后，仍官太傅兼中书令。但契丹的入主中原，后晋的覆亡，中原的遭受兵祸，是和杜重威的前线倒戈投降契丹，几万军队同时解甲这一事件分不开的。由于杜重威民愤很大，“重威每出入，路人往往掷瓦砾诟之”（《资治通鉴》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过了一年之后，刘知远终于把杜重威杀了。

刘知远才把黄河流域统一，就在乾祐元年（公元九四八年）正月病死了，年五十四，庙号高祖。子承祐即皇帝位，时年十八岁，是为隐帝。

赵延寿子赵匡赞为晋昌节度使（镇长安），后汉初，入朝大梁，不久，朝廷又徵赵匡赞牙兵去大梁，牙兵很怕，军校赵思綰发动兵变，打开长安军库，取铠仗，据长安城，“集城中少年，得四千余人，缮城隍，葺楼堞，旬日间，战守之具皆备”。凤翔知军州事王景崇和护国节度使（即河中节度使，镇蒲州）李守贞，也“招纳亡命，养死士，治城堑，缮甲兵”，联合起兵，李守贞自称秦王。

朝廷任命“郭威为四面军前招慰安抚使，诸军皆受威节度”。“郭威与诸将议攻讨，诸将欲先取长安（赵思綰）、凤翔（王景崇）。镇国节度使扈从珂曰：‘今三叛连衡，推守贞为主，守贞亡，则两镇自破矣。若舍近而攻远，万一王（王景崇）、赵（赵思綰）拒吾前，守贞倚吾后，此危道也。’威善之”。于是郭威自陕州（治陕，今河南三门峡市），白文珂、刘词自同州（治冯翊，今陕西大荔县），常思自潼关，分三路围攻河中。从乾祐元年的七月围攻到乾祐二年的七月，整整一年，终于把河中攻下，李守贞自焚死。同月，赵思綰释甲出降，也被收杀，同年十二月，王景崇也在攻围之中举家自焚。河中、长安、凤翔三镇相继被郭威攻下，奠定了郭威在军事方面的很高威信。

在刘知远驱逐契丹势力中，史弘肇收复失地的功绩为多。后来史弘肇官做到宰相兼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权力极大。“都辖禁军，警卫都邑，专行刑杀，略无顾避”。在他担任禁军指挥之后，“不问罪之轻重，理之所在，但云有犯，便处极刑，枉滥之家，莫敢上诉。巡司军吏，因缘为奸，嫁祸胁人，不可胜纪。时太白昼见（金星昼见，迷信传说下有兵祸），民有仰观者，为坊正所拘，立断其腰领”（《旧五代史·史弘肇传》）。故相李崧自恒州逃归，他的邸宅先在汴、洛，已由刘知远赐与宰相苏逢吉。后来李崧从契丹归来，李崧的二个弟弟认为苏逢吉侵占他家的第宅，和苏逢吉兄弟饮酒之间，口出怨言。苏逢吉叫人说动李崧家部曲诬告李崧以蜡丸私通契丹，史弘肇替苏逢吉撑腰，逮捕杀害了李崧全家数十口取其小女为婢，真是暗无天日，最大冤枉。

“逢吉为人，文深好杀”，刘知远为太原节度使时，逢吉为节度判官，刘知远“尝令静狱（使之决遣系囚）以祈福，逢吉尽杀狱囚还报”。刘知远初定河南，下“敕：‘盗贼毋问脏多少皆抵死。’时四方盗贼多，朝廷患之，故重其法，仍分命使者逐捕。苏逢吉自草诏，意云：‘应贼盗，并四邻同保，皆全族处斩。’众以为：‘盗犹不可族，况邻保乎！’逢吉固争，不得已，但省去‘全族’字。由是捕贼使者张令柔杀平阴（今山东平阴县）十七村民”（《资治通鉴》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被杀的人数，大概在数千人以上。

隐帝承祐即位以后，“枢密使、右仆射、同平章事杨邠总机政，枢密使兼侍中郭威主征伐，归德节度使、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兼中书令史弘肇典宿卫，三司使、同平章事王章掌财赋”。“是时承契丹〔入汴，中原〕荡覆之余，公私困竭，章捃摭遗利，吝于出纳，以实府库”。“宿兵累年而供馈不乏”，“以是国家粗安。章聚敛刻急。旧制，田税每斛更输二升，谓之‘雀鼠耗’，章始令更输二斗（明宗天成时只输一斗），谓之‘省耗’”。 “有犯盐、矾、酒麴之禁者，锱铢涓滴，罪皆死，由是百姓愁怨”（《资治通鉴》后汉隐帝乾祐三年）。

王章尝“于其第张酒乐，时〔史〕弘肇与宰相、枢密使及内客省使阎晋卿等俱会。酒酣，为手势令，弘肇不熟其事，而阎晋卿坐次弘笔，屡教之。苏逢吉戏弘肇曰：‘近坐有姓阎人，何忧罚爵！’弘肇妻阎氏，本酒妓也，弘肇谓逢吉讥之，大怒，以丑语诟逢吉。逢吉不校，弘肇欲殴逢吉，逢吉策马而去。弘肇遽起索剑，意欲追逢吉。杨邠曰：‘苏公是宰相，公若害之，致天子何地，公细思之。’邠泣下。弘肇索马急驰而去，邠虑有非常，连辔而进，送至第而还。自是将相不协如水火矣”（《旧五代史·史弘肇传》）。

契丹不断入边，“横行河北，〔河北〕诸藩镇各自守，无捍御之者，议以郭威镇邺都，使督诸将以备契丹”。“制以〔郭〕威为邺都留守、天雄节度使，枢密使如故”（《资治通鉴》后汉隐帝乾祐三年）。郭威率大军出屯邺都。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王殷，也配合郭威，领兵出屯澶州（治顿丘，今河南清丰县西），以防契丹。

隐帝左右嬖幸枢密承旨聂文进、飞龙使后匡赞、翰林茶酒使郭允明，“皆有宠于帝，久不迁官，共怨执政”，太后弟李业求为宣徽使，杨邠、史弘肇认为外戚不宜居此职，也没有满足他的要求。隐帝三年除丧之后，要想亲政，“厌为大臣所制。邠、弘肇尝议事于帝前，帝曰：‘审（仔细）图之，勿令人有言！’邠曰：‘陛下但禁声（禁口不言），有臣等在。’帝积不能平，左右因乘间譖之于帝云：‘邠等专恣，终当为乱。’”宰相苏逢吉和史弘肇交恶，也经常用言语挑动李业、聂文进等。

乾祐三年（公元九五 年）十一月十三日，杨邠、史弘肇、王章等入朝，有甲士数十人自永福殿出，杀杨邠、史弘肇、王章于东庑下，分遣使臣收捕杨邠等三家，阖门诛杀。另外又遣使诛郭威、王殷两家。诛郭威全家时，“极其惨毒，婴孺无免者”（《资治通鉴》后汉隐帝乾祐三年）。隐帝遣使带密诏至邺都杀郭威，往澶州杀王殷。十四日，郭威知道全家被杀，即日起兵。十五日，郭威亲自统率大军继发，至澶州，与王殷合兵渡河。十七日，至滑州（治白马，今河南滑县东，时在黄河之南）。十九日，郭威军至大梁城外。二十日，两军相遇而不战。二十一日，两军相接触，南军大败。二十一日，隐帝逃亡至赵村，下马入民家，为乱兵所杀。郭威进入大梁城，朝见太后，与大臣议立刘知远之侄武宁节度使（镇徐州）刘贇，刘贇尚未赶到大梁，郭

威已被士兵拥立为皇帝了。

后周郭威的建国 郭威，邢州尧山（今河北唐山市）人，徙家太原，早年父母双亡，由姨母抚养长大。“尝游上党（今山西长治市），有市屠壮健，众所畏惮”，郭威“因醉命屠割肉。小不如意，叱之。屠者怒，袒腹谓帝曰：‘尔敢刺我否？’帝即割其腹”（《旧五代史·周太祖纪》），威因此亡命。后事汉高祖刘知远，刘知远驱契丹，入大梁，以郭威为枢密副使。知远死，隐帝嗣位，拜枢密使。隐帝杀杨邠、史弘肇、王章及郭威、王殷五家，这时郭威、王殷统兵在邺都和澶州，即日率兵南向大梁，杀隐帝。时镇、定二州入奏，契丹又大入，河北诸州告急，郭威又率大军北御契丹，至澶州，兵变，请郭威为天子。诸军遂拥帝南行，直趋大梁。

广顺元年（公元九五一年）正月，郭威即皇帝位于大梁，国号周，史称后周。规定“凡仓场、库务掌纳官吏，无得收斗余、称耗；犯窃盗及奸者，并依晋天福元年（公元九三六年）以前刑名，罪人非反逆，无得诛及亲族，籍没家赀”。“初，唐衰，多盗，不用律文，更定峻法，窃盗赃三匹者死；晋天福中，加至五匹。奸有夫妇人，无问强、和，男女并死。汉（后汉刘氏王朝）法，窃盗一钱已上皆死；又罪非反逆，往往族诛、籍没。故帝即位，首革其弊”（《资治通鉴》后周太祖广顺元年）。

时周初建，“四方多故”，宰相“王峻夙夜尽心，知无不为，军旅之谋，多所裨益。范质明敏强记，谨守法度。李谷沉毅有器略，在帝前议论，辞气慷慨，善譬喻以开主意”（《资治通鉴》后周太祖广顺元年）。这个领导班子，对巩固初期的后周政权，起了有益作用的。

汉法，犯私盐、曲，无问多少抵死。“郑州民有以屋税受盐于官，过州城，吏以为私盐，执而杀之，其妻讼冤”。后周太祖广顺二年（公元九五二年）六月，“始诏犯盐、曲者以斤两定刑有差”（《资治通鉴》后周太祖广顺二年）。“时敕诸色犯盐、曲，所犯一斤已下至一两，杖八十，配役；五斤已下，一斤已上，徒三年；五斤已上，重杖一顿，处死”（胡三省《资治通鉴》注）。

广顺二年十一月，“敕：‘约每岁民间所输牛皮，三分减二；计田十顷，税取一皮，余听民自用及卖买，惟禁卖于敌国。’先是，兵兴以来，禁民私卖买牛皮，悉令输官受直。唐明宗之世，有司止偿以盐；晋天福（公元九三六至九四二年）中，并盐不给。汉法，私犯牛皮一寸抵死，然民间日用实不可无。帝素知其弊，至是，李谷建议，均于田亩（在田亩税中摊派），公私便之”（《资治通鉴》后周太祖广顺二年）。

“前世屯田皆在边地，使戍兵佃之。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营田以耕旷土；其后又募高赀户使输课佃之，户部别置官司总领，不隶州县，或丁多无役，或容庇奸盗，州县不能诘。梁太祖击淮南，掠得牛以千万计，给东南诸州农民，使岁输租。自是历数十年，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至是“敕：‘悉罢户部营田户，以其民隶州县，其田、庐、牛、农器，并赐见佃者为永业，悉除租牛课。’是岁，户部增三万余户，民既得为永业，始敢葺屋植树，获地利数倍”（《资治通鉴》后周太祖广顺三年）。

在周世宗即位之后，显德三年（公元九五六年），帝“谓侍臣：‘近朝徵敛谷帛，多不俟收获纺绩之毕。’乃诏三司，自今夏税以六月，秋税以十月起徵，民间便之”（《资治通鉴》后周世宗显德三年）。

以上周太祖、周世宗在刑法、营田和徵敛方面的一些改革，对五代残酷

的刑法有所减轻，对经济方面的剥削有所缓和，为后周和北宋的统一全国，创造了有利条件。

泰宁节度使（镇兖州）慕容彦超系汉高祖刘知远的异父同母弟。郭威自邺都向大梁，彦超受命御郭威，兵败，走归兖州。彦超在郭威称帝后，“发乡兵入城，引泗水注壕中，为战守之备；又多以旗帜授诸镇将，令募群盗，剽掠邻境”（《资治通鉴》后周太祖广顺二年）。广顺二年（公元九五二年）正月，郭威发兵讨慕容彦超，设长围，进攻兖州。四月，郭威下诏亲征，五月，发大梁，至兖州城下。“彦超性贪吝，官军攻城急，犹瘞藏珍宝，由是人无斗志”。城破，彦超赴井死。兖州的攻下，进一步巩固了后周政权。

王殷，后汉隐帝时为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因契丹大入，领兵出屯澶州，从郭威入大梁。郭威即皇帝位后，王殷为天雄军节度使，权力极大，“凡河北征镇有戍兵处，咸禀殷节制”。广顺三年（公元九五三年）冬十二月，王殷入朝大梁，诏令王殷依旧内外巡警。“殷出入部从不下数百人，又以仪形魁伟，观者无不耸然。一日，遽入奏曰：‘郊礼在近，兵民大集，臣城外防警，请量给甲仗，以备非常。’太祖难之。时中外以太祖婴疾，步履稍难，多不视朝”，“殷有震主之势，颇忧之。太祖乃力疾坐于滋德殿，殷入起居，即命执之，寻降制流窜，及出都城，遽杀之，众情乃安”（《旧五代史·王殷传》）。

在杀王殷以前，先杀了王峻。王峻，后汉隐帝末，郭威出镇邺都，峻为监军，随威南取大梁，充枢密使。郭威即皇帝位，王峻兼右仆射、门下侍郎平章事。“为性轻躁，举措率易”，“每有启请，多自任情，太祖从而顺之，则忻然而退，稍未允可，则应声而愠，不逊之语，随事而发”。太祖“每优容之”（《旧五代史·王峻传》）。郭威的家族，都为后汉隐帝所杀害，威无子，以妻柴氏之侄柴荣为子，郭威即位，以柴荣为澶州节度使。柴荣以郭威年老多病，请求内调，王峻百般阻止。广顺三年（公元九五三年），王峻“奏请以端明殿学士颜衎、枢密直学士陈观代范质、李谷为相，帝曰：‘进退宰辅，不可仓猝，俟朕更思之。’峻力论列，语浸不逊，日向中，帝尚未食，峻争之不已，帝曰：‘今方寒食，俟假（有寒食假前后五天）开，如卿所奏。’峻乃退。”过了寒食假，“帝亟召宰相、枢密使入，幽峻于别所。帝见冯道等，泣曰：‘王峻陵朕太甚，欲尽逐大臣，翦朕羽翼。朕惟一子（柴荣），专务间阻，暂令诣阙，已怀怨望。岂有身典枢机，复兼宰相，又求重镇（兼平卢节度使）！观其志趣，殊未盈厌。无君如此，谁则堪之！’”“贬峻商州（治上洛，今陕西商县）司马，制辞略曰：‘肉视群后（视朝臣如机上肉），孩抚朕躬（抚天子如婴孩）。’”王峻不久以腹疾病死于商州。王峻、王殷的相继贬斥诛死，给柴荣的继位称帝，铺平了道路。

王峻既贬，柴荣由澶州节度使入为开封尹，封晋王。继承人的地位确定下来了。显德元年（公元九五四年）四月，“加晋王荣兼侍中，判内外兵马事。时群臣希得见帝，中外恐惧，闻晋王典兵，人心稍安”。郭威初在邺都，“奇爱小吏曹翰之才”，及即帝位，“使之事晋王荣，荣镇澶州，以为牙将。荣入为开封尹，未即召翰，翰自至，荣怪之。翰请问言曰：‘大王国之储嗣，今主上寝疾，大王当入侍医药，奈何犹决事于外邪！’荣感悟，即日入止禁中”。郭威病笃，戒晋王曰：“魏仁浦勿使离枢密院。”又命“草制，以端明殿学士、户部侍郎王溥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宣制毕，左右以闻，帝曰：‘吾无恨矣’”（《资治通鉴》后周太祖显德元年）。郭威病死，年

五十一，庙号太祖。晋王荣即皇帝位，是为世宗。

后周世宗柴荣生于后梁均王龙德元年（公元九二一年），显德元年（公元九五四年）即帝位时，年三十四岁。

后周世宗 周世宗刚即位，要认真对待的头桩大事，是抗击北汉。先是刘知远自太原出兵，驱逐契丹（公元九四七年），以其从弟刘崇为太原尹、北京留守，刘知远即帝位以后，又以刘崇兼河东节度使。到了刘知远病死，史弘肇、郭威等擅权，刘崇和郭威有隙，开始在太原“选募勇士，招募亡命，缮甲兵，实府库，罢上供财赋，皆以备契丹为名，朝廷诏令，多不禀承”（《资治通鉴》后汉高祖乾祐元年）。

后汉隐帝被杀，刘知远另一子刘勰病废，郭威迎立刘崇子武宁节度使（镇兖州）刘贇为帝，至宋州（治宋城，今河南商丘县），又把他杀害，威自立为帝。刘崇闻刘贇被杀，在广顺元年（公元九五一年）正月，即皇帝位于晋阳（今山西太原市），史称北汉。拥有并（州治晋阳）、汾（州治隰城，今山西汾阳县）、忻（州治秀容，今山西忻县）、代（州治雁门，今山西代县）、岚（州治宜芳，今山西岚县北）、宪（州治楼烦监，今山西静乐县西南）、隆（治所未详，其地在岢岚、岚县之间）、蔚（州治灵丘，今山西灵丘县）、沁（州治沁源，今山西沁源县）、辽（州治辽山，今山西左权县）、麟（州治新泰，今陕西神木县北）、石（州治离石，今山西离石县）十二州之地。刘崇做了皇帝，对他臣下说：“‘朕以高祖（刘知远）之业一朝坠地，今日位号，不得已而称之。顾我是何天子，汝曹是何节度使邪！’由是不建宗庙，祭祀如家人，宰相月俸止百缗，节度使止三十缗，自余薄有资给而已”（《资治通鉴》后周太祖广顺元年）。

郭威即位后，北汉主刘崇联合契丹，侵扰后周的黄河以北及汾水流域诸藩镇，但皆不能得手。契丹主兀欲又想调动大军举国南下，契丹贵族反对南下，杀契丹主兀欲，诸部酋长推立前契丹主耶律德光之子耶律述律为帝，“契丹主年少，好游戏，不亲国事，每夜酣饮，达旦乃寐，日中方起，国中谓之睡王”（《资治通鉴》后周太祖广顺元年）。

契丹主曾动员奚、契丹兵五万，会合北汉主刘崇兵二万，进攻后周的晋州（治临汾，今山西临汾县），结果败退。契丹士马也什丧三四。“北汉土瘠民贫，内供军国，外奉契丹。赋役繁重，民不聊生”（《资治通鉴》后周太祖广顺元年）。

郭威病死，北汉主刘崇以为进攻后周的机会到了，刘崇亲率大兵三万，契丹大将杨衮也统率万余骑，联军南趋潞州（治上党，今山西长治市）。周世宗亲率大军往御，群臣都劝阻周世宗不必亲自前去。“帝曰：‘〔刘〕崇幸我大丧，轻朕年少新立，有吞天下之心，此必自来，朕不可不往。’冯道固争之，帝曰：‘昔唐太宗定天下，未尝不自行，朕何敢偷安！’道曰：‘未审陛下能为唐太宗否？’帝曰：‘以吾兵力之强，破刘崇如山压卵耳！’道曰：‘未审陛下能为山否？’帝不悦，惟王溥劝行，帝从之”（《资治通鉴》后周太祖显德元年）。

北汉主刘崇军过潞州，不攻，越潞州而南，军于高平（今山西高平县）南之巴公原（在今山西晋城县东北），两军相遇。后周大将白重进、李重进将左军居西，樊爱能、何徽将右军居东，向训、史彦超将精骑居中央，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郭威的女婿）将禁兵保卫周世宗，周世宗亲临前线督战。两军合战，后周右军樊爱能、何徽引骑兵先退，右军溃，右军步兵千余人解

甲投降北汉。周世宗见军势危急，自引亲兵犯矢石督战，“士卒死战，无不一当百，北汉兵披靡。北汉主刘崇听得周世宗亲临前线，更调动了精悍部队由骁将张元徽率领，乘胜进兵。元徽略阵，马倒被杀，”“北军由是夺气”，周兵血战，北汉兵大败，北汉主弃大军自雕窠岭（今山西高平县西北）遁归，“昼夜北走，所至，得食未举箸，或传周兵至，辄苍黄而去。北汉主衰老力惫，伏于马上，昼夜驰骤，殆不能支，仅得入晋阳”（《资治通鉴》后周太祖显德元年）。

周右军将领“樊爱能、何徽引数千骑南走，控弦露刃，剽掠辎重，役徒惊走，死亡甚多。帝遣近臣及亲军校追谕止之，莫肯奉诏，使者或为军士所杀，扬言‘契丹大至，官军败绩，余众已降虏矣。’”周世宗驻兵潞州，“欲诛樊爱能等以肃军政，犹豫未决”。帝“昼卧行宫帐中，张永德侍侧，帝以其事访之，对曰：‘爱能等素无大功，忝冒节钺，望敌先逃，死未塞责。且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军法不立，虽有熊罴士，百万之众，安得而用之！’帝掷枕于地，大呼称善。即收〔樊〕爱能、〔何〕徽及所部军使以上七十余人，责之曰：‘汝曹皆累朝宿将，非不能战；今望风奔遁者，无他，正欲以朕为奇货，卖与刘崇耳！’悉斩之”。“自是骄将惰卒，始知所惧，不行姑息之政矣”（《资治通鉴》后周太祖显德元年）。

过了二个多月，周世宗又调集了大军十来万，扬威晋阳城下，值久雨，士卒疲病，不利作战，大军引退。“初，宿卫之士，累朝相承，务求姑息，不欲简阅，恐伤人情，由是羸老者居多；但骄蹇不用命，实不可用，每遇大敌，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国，亦多由此”。周世宗经过“高平之战，始知其弊”，曾“谓侍臣曰：‘凡兵务精不务多，今以农夫百未能养甲士一，奈何浚民之膏泽，养此无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众何所劝！’乃命大简诸军，精锐者升之上军，羸者斥去之。又以骁勇之士，多为藩镇所蓄，诏募天下壮士，咸遣诣阙”，命殿前都虞候赵匡胤（即宋太祖皇帝）“选其尤者为殿前诸班，其骑步诸军，各命将帅选之。由是士卒精强，近代无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选练之力也”（《资治通鉴》后周太祖显德元年）。

周世宗在漕运、铸钱各方面，也作了一些变革。周世宗“以漕运自晋（后晋）、汉（后汉）以来，不给斗耗，纲吏多以亏欠抵死，诏自今每斛给耗一斗”。周世宗又以政府“久不铸钱，而民间多销钱为器皿及佛像，钱益少”。乃下“敕，始立监采铜铸钱，自非县官法物、军器及寺观钟磬钹铎之类听留外，自余民间铜器、佛像，五十日内悉令输官，给其直”，熟铜每斤官给钱一百五十，生铜每斤一百。“过期隐匿不输，五斤以上其罪死”（一两至一斤徒二年，一斤至五斤处死）。周世宗还下“敕天下寺院，非敕额（敕赐寺额）者悉废之。禁私度僧尼”，“惟两京、大名府、京兆府、青州听设戒坛”。“是岁（显德二年，即公元九五五年），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废者三万三百三十六，见僧四万二千四百四十四，尼一万八千七百五十六”。周世宗对他左右侍臣道：“卿辈勿以毁佛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于善，斯奉佛矣。彼铜像岂所谓佛邪！且吾闻佛在利人，虽头目犹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资治通鉴》后周世宗显德二年）。

周世宗愤慨唐末以来，藩镇割据，中国分崩离析，“及高平之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会秦州民夷有诣大梁献策请恢复旧疆者，帝纳其言”。周世宗“谓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寝食不忘。又自唐、晋以来，吴、蜀、幽、并皆阻声教，未能混一。宜命近臣著《为君难为臣不易论》’”

及《开边策》各一篇，朕将宽焉。’比部郎中王朴献策，以为：‘中国之失吴、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观所以失之之原，然后知所以取之之术。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骄民困，奸党内炽，武夫外横，因小致大，积微成著。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为而已。夫进贤退不肖，所以收其才也；恩隐（卹）诚信，所以结其心也；赏功罚罪，所以尽其力也；去奢节用，所以丰其财也；时使（使民以时）薄敛，所以阜其民也。俟群才既集，政事既治，财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后举而用之，功无不成矣！彼之人观我有必取之势，则知其情状者愿为间谍，知其山川者愿为向导，民心既归，天意必从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与吾接境几二千里，其势易扰也。扰之当以无备之处为始，备东则扰西，备西则扰东，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间，可以知其虚实强弱，然后避实击虚，避强击弱。未须大举，且以轻兵扰之。南人懦怯，闻小有警，必悉师以救之。师数动则民疲而财竭，不悉师则我可以乘虚取之。如此，江北诸州将悉为我有。既得江北，则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则岭南、巴蜀可传檄而定。南方既定，则燕地必望风内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惟河东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诱，当以强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败，力竭气沮，必未能为边患，宜且以为后图，俟天下既平，然后伺间，一举可擒也。今士卒精练，甲兵有备，群下畏法，诸将效力，膏年之后可以出师，宜自夏秋蓄积实边矣。’”“时群臣多守常偷安，所对少有可取者，惟朴神峻气劲，有谋能断，凡所规画，皆称上意”（《资治通鉴》后周世宗显德二年）。王朴的《开边策》成为此后后周、北宋次第削平诸国的蓝图，只有幽燕为契丹所占，不能复取，这正像诸葛亮的《隆中对》一样，以后关羽失守荆州，这是始料所不及的。

这时，契丹方强，北汉又是周的死敌，鉴于后唐庄宗用兵取蜀，把六万精锐部队陷在巴蜀战争中，以致中原空虚，魏博兵变，庄宗身死国亡。周世宗决定留重兵保卫大梁，对南唐首先用兵。

在对南唐用兵之前，必须先取后蜀秦（州治成纪，今甘肃秦安县西北）、凤（州治梁泉，今陕西凤县东北凤州）、成（州治上禄，今甘肃西和县西）、阶（州治皋兰镇，今甘肃武都县东（诸州，巩固关陇防务。周世宗于显德二年（公元九五五年），任命凤翔节度使王景为西南行营都招讨使，宣徽南院使向训为行营兵马都监。景等屡败蜀兵，取下秦、凤、成、阶四州，蜀主震恐，聚兵粮于剑门、白帝，为守御之备”（《资治通鉴》后周世宗显德二年）。

南唐与后周以淮水为界。周世宗命李谷为淮南道前军行营都部署，显德二年十一月，周军自正阳（今安徽颖上县西南）渡淮，十二月，败唐兵于寿州（今安徽寿县）城下。显德三年（公元九五六年）正月，周世宗下诏亲征，周军渡淮，与南唐军合战于正阳东，大破南唐军，斩唐将北面行营都部署刘彦贞，“斩首万余级，伏尸三十里，收军资器械三十余万。是时江淮久安，民不习战，彦贞既败，唐人大恐”。周世宗亲率大军围攻寿州，并徵发淮北民夫数十万人轮流攻城，昼夜不息。南唐清淮节度使（镇寿州）刘仁贍坚守待援。周世宗一方面命赵匡胤倍道袭清流关（今安徽滁县西南二十余里），并攻下滁州（今安徽滁县）；一方面又知扬州空虚，命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袭取扬州，并东下泰州（今江苏泰州市）。同时周军又西面攻下光州（治定城，今河南潢川县）和舒州（治怀宁，今安徽潜山县）。是年四月，淮南久雨，周世宗围攻寿州久不攻下，“营中水深数尺，攻具及士卒死亡颇多，粮运不继”，“乃议旋师”（《资治通鉴》后周世宗显德三年）。

“初，唐人以茶盐强民而徵其粟帛，谓之博（博易）徵，又与营田于淮南，民甚苦之；及周师至，争奉牛酒迎劳，而将师不之恤，专事俘掠，视民如土芥；民皆失望，相聚山泽，立堡壁自固，操农器为兵，积纸为甲，时人谓之‘白甲军’周人讨之，屡为所败，先所得唐诸州，多复为唐有”（《资治通鉴》后周世宗显德三年）。可见后周军事上虽有所得，政治上却跟不上，因此后周取得的淮南诸州，又相继失守。

周军从显德二年十一月起，围攻寿春，到显德四年（公元九五七年）三月，没有把寿春攻下，但城中食尽，守将清淮节度使刘仁贍病危已不识人。周世宗训练了水军数千人沿淮而下，至赵步（寿春东百余里），和唐军会战，“唐兵战溺死及降者殆四万人，获船舰粮仗以十万数”（《资治通鉴》后周世宗显德四年）。周世宗在大捷以后，耀兵寿春城北，寿春城内知外援已绝，只得开城出降了。

四年十一月，周世宗再至淮南，到了显德五年（公元九五八年）三月，唐主上表称臣，“请献江北庐（州治合肥，今安徽合肥市）、舒（州治怀宁，今安徽潜山县）、蕲（州治蕲春，今湖北蕲春县）、黄（州治黄冈，今湖北新州县）四州，岁输贡物十万。于是江北悉平，得州十四，县六十”（《资治通鉴》后周世宗显德五年）。这十四州，谓光（州治定城，今河南潢川县）、寿、庐、舒、蕲、黄、滁（州治清流，今安徽滁县）、和（州治历阳，今安徽和县）、濠（州治钟离，今安徽凤阳县西北）、泗（州治临淮，今安徽盱眙县北）、楚（州治山阳，今江苏淮安县）、扬（州治江都，今江苏扬州市）、泰（州治海陵，今江苏泰州市）、通（州治静海，今江苏南通市）。

在淮南取得前后，周世宗疏理了淮南北漕运水路。“汴水自唐末溃决，自埇桥（今安徽宿县）东南，悉为污泽”，周世宗命武宁节度使（镇徐州）武行德发民夫，因故堤疏导之，东至泗上《资治通鉴》后周世宗显德二年）。“时淮滨久无行人，葭苇如织，多泥淖沟堑”。显德四年（公元九五七年），“诏疏汴水北入五丈河（河自大梁历曹州、郟州、济州，其广五丈，旧名五丈河），由是齐鲁舟楫皆入于大梁”（《资治通鉴》后周世宗显德四年）。显德五年（公元九五八年）三月，“浚汴口，导河流达于淮，于是江淮舟楫始通”（《资治通鉴》后周显德五年）。

周世宗“欲引战舰自淮入江，阻北神堰（在楚州，今淮安县北五里，淮水低，沟水高，舟行渡堰入淮，今号为平水堰），不得渡。遣使行视，还言地形不便，计功甚多”。周世宗亲到其地视察，“授以规画，发楚州民夫浚之，旬日而成，用功甚省，巨舰数百艘皆达于江，唐人大惊以为神”（《资治通鉴》后周世宗显德五年）。显德六年（公元九五九年）二月，周世宗“命王朴如河阴（今河南荣阳县北）按行河堤，立斗门于汴口”。命侍卫都指挥使韩通“发徐、宿、宋、单等州丁夫数万浚汴水”。“命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自大梁城东导汴水入於蔡水，以通陈、颍之漕，命步军都指挥使袁彦浚五丈渠，东过曹、济、梁山泊，以通青、郟之漕，发畿内及滑、亳丁夫数千以供其役”（《资治通鉴》后周世宗显德六年）。河道漕运的沟通畅达，给大梁城成为全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创造了有利条件。周世宗在进攻南唐的时候，契丹乘虚进攻河北，后周取得南唐的淮南之后，周世宗自扬州北还至。大梁城，派遣大将抗击契丹。显德六年（公元九五九年），周世宗亲至沧州（治清池，今河北沧州市东南），帅步骑数万，直趋契丹之境。周世宗命大将韩通治水道，补坏防，开游口三十六。周世宗“御龙舟，沿流

而北，舳 相连数十里”，至益津关（在河北文安县境内），契丹守将以城降，“自是以西，水路渐隘，不能胜巨舰”，周世宗乃舍舟登陆。大军先至瓦桥关（今河北雄县），契丹守将举城降。契丹莫州（治莫县，今河北任丘县北）刺史刘楚信和瀛州（治河间，今河北河间县）刺史高彦晖相率举州降，瓦桥关以南之地，尽为后周所攻克。

周世宗取得瀛、莫诸州以后，还想麾兵北上，直取幽州，命先锋都指挥使刘重进提兵先发，进据固安（今河北固安县），西北至燕京一百二十里。周世宗因身体不适，乃在数日后，自瓦桥关南还，回到大梁。六月，周世宗病危，卒年三十九，子梁王宗训嗣位为皇帝，时年七岁，是为恭帝。

显德七年（公元九六 年）正月，镇定二州驰奏，契丹大兵南下，与北汉合兵，周帝命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统兵往御，赵匡胤掌军政已六年，从周世宗征伐，屡著功绩。这时主少国疑，人心浮动，将士阴谋推戴。军次陈桥驿，一天清早，“诸将擐甲执兵，直叩寝门曰：‘诸将无主，愿策太尉（时匡胤检校太尉）为天子！’匡胤惊起，未及应，即被以黄袍，呼万岁”。（《续资治通鉴》宋太祖建隆元年）。诸将翼戴赵匡胤入大梁城，诣崇元殿行禅代礼，诏定国号曰宋，改元建隆。

宋建隆三年（公元九六二年），迁周恭帝宗训居房州（治房陵，今湖北房县）。开宝六年（公元九七三年）宗训死于房州。周世宗三子熙谨卒于乾德二年（公元九六四年）其余二子熙让、熙诲，史称“不知其所终”，大盖也是被杀害而死的。

五代帝王世系 后梁太祖温 公元九 七至九一二年 郢王朱友珪 公元九一三年均王朱友贞 公元九一三至九二二年后唐太祖李克用——庄宗李存勖 公元九二三至九二六年 魏王李继岌……明宗李嗣源 公元九二六至九三三年 闵帝李从厚 公元九三四年年许王李从益 末帝李从珂 公元九三四至九三六年后晋高祖石敬瑭 公元九三六至九四二年 齐王石重贵 公元九四三至九四六年 后汉高祖刘知远 公元九四七至九四八年 隐帝刘承祐 公元九四九至九五 年 后周太祖郭威 公元九五一至九五四年 世宗柴荣 公元九五五至九五九年 恭帝柴宗训 公元九六 年

## 第二节 十国割据

吴杨氏的建国及其消亡 唐昭宗乾宁三年（公元八九六年），杨行密全有淮南之地。乾宁四年（公元八九七年），兖州节度使朱瑾留大将康怀贞守兖州。朱温“遣葛从周将兵袭兖州，汴兵奄至”，康怀贞降，兖州失守。朱瑾只得率兖州军民渡淮，投奔杨行密。“淮南旧善水战，不知骑射，及得河东、兖、郢兵，军声大振”（《资治通鉴》唐昭宗乾宁四年）。

朱温“既得兖、郢，甲兵益盛，乃大举击杨行密，遣庞师古以徐、宿、宋、滑之兵七万壁清口（泗水入淮之口，今江苏淮阴县西），将趋扬州；葛从周以兖、郢、曹、濮之兵壁安丰（今安徽寿县南），将趋寿州（今安徽寿县）”；朱温“自将屯宿州（今安徽宿县），淮南震恐”。“杨行密与朱瑾将兵三万拒汴军于楚州（治山阳，今江苏淮安县），别将张训自涟水（今江苏涟水县）引兵会之，行密以为前锋。庞师古营于清口，或曰：‘营地汗下，不可久处。’不听。师古恃众轻敌，居常弈棋。朱瑾壅淮上流”，又“将五千骑潜渡淮，用汴人旗帜，自北来，趣其中军，张训逾栅而入，士卒苍黄拒战，淮水大至，汴军骇乱。行密引大军济淮，与瑾等夹攻之，汴军大败，斩师古及将士首万余级，余众皆溃。葛从周营于寿州西北”，“闻师古败，奔还”。于淝水（今淝河）半济，“淮南兵击之，杀溺殆尽”，诸军“济淮，凡四日不食，会大雪，汴卒缘道冻馁死，还者不满千人”。“行密由是遂保据江、淮之间”，朱温“不能与之争”（《资治通鉴》唐昭宗乾宁四年）。

唐昭宗景福元年（公元八九二年），杨行密始任淮南节度使，当时宣州（治宣城，今安徽宣城县）节度留后田頔和润州刺史安仁义，都是杨行密所亲信的大将。景福二年（公元八九三年），升州（治江宁，今江苏南京市）刺史张雄病死，由冯弘铎继任升州刺史。昭宗天复二年（公元九〇二年），宁国节度使（镇宣州）田頔造战舰，出击冯弘铎时，冯弘铎时为武宁节度使，镇江宁），会战于曷山（今芜湖市南四十余里），冯弘铎大败，逃奔杨行密，杨行密署冯弘铎为淮南节度副使，从此升州并入杨行密的版图。

田頔为宁国节度使以后，天复二年，吴越钱氏的中军武勇右都指挥使徐绶、武勇左都指挥使许再思（他们原来是孙儒的部下，孙儒失败，孙儒的士卒逃奔浙西，钱鏐爱其骁悍，以为中军，号武勇都）谋反，杭州大乱。钱鏐伯田頔出兵援助徐绶、许再思，命大将顾全武出使杨行密，并以子钱传璪为质于杨行密，杨行密以女妻传璪，并答应把田頔召回。田頔从杭州撤军时，也要钱鏐以一子为质，钱鏐以次子传瓘为质于田頔，田頔以女妻传瓘。

天复三年（公元九〇三年），宁国节度使（镇宣州）田頔联合润州（治丹徒，今江苏镇江市）团练使安仁义举兵反对杨行密，并遣使至寿州（治安徽寿县）约寿州刺史朱延寿共图行密。“行密夫人，朱延寿之姊也”。延寿“阴与田頔通谋”，“谋颇泄。杨行密诈为目疾，对延寿使者多错乱所见（见甲以为乙，见犬以为猫），或触柱仆地。谓夫人曰：‘吾不幸失明，诸子皆幼，军府事当悉以授三舅。’夫人屡以书报延寿，行密又自遣〔使〕召之”，“延寿至广陵，行密迎及寝门，执而杀之”（《资治通鉴》唐昭宗天复三年）。杨行密又命大将李神福自鄂州（治江夏，今湖北武汉市）乘战舰东下，连败田頔水师于皖口（皖水入江之口，今安徽安庆市西），田頔将水军逆战，李神福“临江坚壁不战，遣使告行密，请发步兵断其归路”。行密遣部将台蒙将

兵击颢。“田颢闻台蒙将至，自将步骑逆战，留其将郭行惊以精兵二万”“屯芜湖，以拒李神福”。台蒙连败田颢，进围宣州。田颢出城作战被杀。不久，杨行密又攻陷润州，杀安仁义，宣、歙、升、润诸州，又完全为杨行密所控制。

唐昭宗天复二年（公元九〇二年）十月，杨行密被封为吴王，承制封拜。唐昭宣帝天祐二年（公元九〇五年），杨行密病死，年五十四，子杨渥几位为淮南节度使，东南诸道行营都统、弘农郡王。天祐三年（公元九〇六年），杨渥遣将攻拔洪州（今江西南昌市），自兼镇南节度使（镇洪州）。杨渥取得江西之后，“骄侈益甚”，“将佐皆不自安”。“渥居丧，昼夜酣饮作乐，燃十围之烛以击球，一烛费钱数万。或单骑出游，从者奔走道路，不知所之。左右牙指挥使张颢、徐温泣谏，渥怒曰：‘汝谓我不才，何不杀我自为之！’二人惧。渥选壮士，号‘东院马军’，广署亲信为将吏，所署者恃势骄横，陵蔑勋旧”。颢、温潜谋杀渥。“渥父行密之世，有亲军数千营于牙城之内，渥迁出于外，以其地为射场，颢、温由是无所惮。渥之镇宣州也，命指挥使朱思勳、范思从、陈璠将亲兵三千；及嗣位，召归广陵。颢、温使三将”“戍洪州，诬以谋叛，命别将陈祐往诛之”。“渥闻三将死，益忌颢、温，欲诛之”。一日，“渥晨视事，颢、温帅牙兵二百，露刃直入庭中，渥曰：‘尔果欲杀我邪？’对曰：‘非敢然也，欲诛王左右乱政者耳！’因数渥亲信十余人之罪，曳下，以铁挝击杀之，谓之‘兵谏’。诸将不与之同者，颢、温稍以法诛之，于是军政悉归二人，渥不能制”（《资治通鉴》后梁开平元年）。

后梁开平二年（公元九〇八年）五月，张颢遣其党纪祥等杀杨渥于寝室，诈云暴薨。年二十三。张颢“集将吏于府庭，夹道及庭中、堂上各列白刃，令诸将悉去卫从然后入。颢厉声问曰：‘嗣王已薨，军府谁当主之？’三问，莫应，颢气色益怒。幕僚严可求前密启曰：‘军府至大，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今日则恐太速。’颢曰：‘何谓速也？’可求曰：‘刘威（在庐州）、陶雅（在歙州）、李遇（在宣州）、李简（在常州），皆先王之等夷，公今自立，此曹肯为公下乎？不若立幼主辅之，诸将孰敢不从。’颢默然”。于是拥立杨渥次弟杨隆演为淮南节度留后、东面诸道行营都统。“颢以徐温为浙西观察使，镇润州（治丹徒，今江苏镇江市）。严可求说温曰：‘公舍牙兵而出外藩，颢必以杀君之罪归公。’温惊曰：‘然则奈何？’可求曰：‘颢刚复而暗于事，公能见听，请为公图之。’”时淮南行军“副使李承嗣参预军府之政”，可求往说承嗣，承嗣深然之，可求又说动张颢取消温出外藩之令。“温与可求谋诛颢，可求曰：‘非钟泰章不可。’”“温使亲将翟虔告之。泰章闻之喜，密结壮士三十人”，清旦，“直入，斩颢于牙堂，并其亲近。温始暴颢杀君之罪，轘（车裂）纪祥等于市”。“隆演以温为左、右牙都指挥使，军府事成取决焉”（《资治通鉴》后梁太祖开平二年）。

徐温“性沉毅，自奉简俭，虽不知书，使人读狱讼之辞而决之，皆中情理。先是，张颢用事，刑罚酷滥，纵亲兵剽夺市里。温谓严可求曰：‘大事已定，吾与公辈当力行善政，使人解衣而寝耳。’乃立法度，禁强暴，举大纲，军民安之。温以军旅委严可求，以财赋委支计官骆知祥，皆称其职，淮南谓之‘严、骆’”（《资治通鉴》后梁太祖开平二年）。

后梁开平二年（公元九〇八年），淮南将吏推杨隆演为淮南节度使、东面诸道行营都统、弘农王。淮南的政权，实际都操在徐温手中，杨隆演不过是傀儡而已。

徐温“以金陵形胜，战舰所聚，乃自以淮南行军副使领升州（治江宁，今江苏南京市）刺史，留广陵（今江苏扬州市），以其假子元从指挥使知诰为升州防遏兼楼船副使，往治之”（《资治通鉴》后梁太祖开平三年）。初，杨行密“掠得徐州人李氏之子，生八年矣，行密养以为子，行密长子渥憎之。行密谓其将徐温曰：‘此儿质状性识，颇异于人，吾度渥必不能容，今赐汝为子。’温名之曰知诰”。知诰长，“喜书善射，识度英伟。行密常谓温曰：‘知诰俊杰，诸将子皆不及也’”（《资治通鉴》唐昭宗乾宁二年）。这个徐知诰，后来复姓李，改名升，就是南唐的开国皇帝，庙号烈祖。

后梁开平三年（公元九〇九年），抚州（治临川，今江西抚州市）刺史危全讽联结袁州（治宜春，今江西宜春县）刺史彭彦章、吉州（治庐陵，今江西吉安市）刺史彭、信州（治上饶，今江西上饶市）刺史危仔倡，号十万人，争夺洪州（治豫章，今江西南昌）。全讽屯兵象牙潭（今江西金溪县东北），淮南大将周本疾趣象牙潭，大败危全讽之军，生擒全讽，“于是江西之地尽入于杨氏”（《资治通鉴》后梁太祖开平三年）。

后梁乾化二年（公元九一二年），徐温取宣州，执李遇，以养子徐知诰为升州（治江宁，今江苏南京市）刺史。“时诸州长吏多武夫，专以军旅为务。不恤民事；知诰在升州，独选用廉吏，修明政教，招延四方士大夫，倾家货无所爱”（《资治通鉴》后梁太祖乾化二年）。淮南将吏推嗣吴王杨隆演为太师、吴王，以徐温领镇海节度使、淮南行军司马”。徐温团结淮南旧将刘威、陶雅，“待之甚恭”，“雅等悦服”，徐温的政治地位也更加巩固起来。

后梁贞明三年（公元九一七年），徐温把镇海节度使的治所由润州（今镇江）移到升州（今南京），让养子徐知诰改镇润州，而把广陵的一切政治权力交给徐知训负责。徐知训是徐温的亲生儿子，为人“骄倨淫暴”，平日“狎侮吴王，无复君臣之礼。尝与王为优，自为参军，使王为苍鹞（僮奴），总角弊衣执帽以从。又尝泛舟浊河，王先起，知训以弹弹之。又尝赏花于禅智寺，知训使酒悖慢，王惧而泣，四座股栗。左右扶王登舟，知训乘轻舟逐之，不及，以铁挝杀王亲吏。将佐无敢言者，父温皆不之知”。后梁贞明四年（公元九一八年）六月，前兖州节度使朱瑾杀徐知训，徐温部下阖门讨瑾，瑾自杀。徐知诰在润州（今镇江）闻朱瑾杀徐知训，即日引兵渡江，接管政权，徐温就命徐知诰代徐知训执政。以后徐温一度回到广陵，不久又“还镇金陵，总吴朝大纲，自余庶政，皆决于知诰。知诰悉反知训所为，事吴王尽恭，接士大夫以谦，御众以宽，约身以俭。以吴王之命，悉蠲天祐十三年（后梁贞明二年，即公元九一六年）以前逋税，余俟丰年乃输之（谓天祐十四年逋租）。求贤才，纳规谏，除奸猾，杜请托。于是士民翕然归心，虽宿将悍夫，无不悦服。先是，吴有丁口钱，又计亩输钱，钱重物轻，民甚苦之”。徐知诰“以为‘钱非耕桑所得，今使民输钱，是教民弃本逐末也。请蠲丁口钱，自余税悉输谷帛，絀绢匹直千钱者当税三千。’”“由是江、淮间旷土尽辟，桑柘满野，国以富强”（《资治通鉴》后梁均王贞明四年）。

梁贞明五年（公元九一九年）四月，徐温请杨隆演为吴国王，隆演以徐温为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诸道都统、东海郡王，以徐知诰为左仆射、参政事兼知内外诸军事。

后梁贞明六年（公元九二〇年），杨隆演病卒，年二十四。徐温立隆演弟溥为吴王。后唐天成二年（公元九二七年）十一月，吴王杨溥即皇帝位，

追尊父杨行密为武皇帝，庙号太祖，兄杨渥为景皇帝，庙号烈祖，杨隆演为宣皇帝，庙号高祖。

后唐天成二年十月，吴大丞相徐温病卒，年六十六。温子知询仍归金陵，温养子知诰仍在广陵秉吴政。徐知询“自以握兵据上流，意轻徐知诰，数与知诰争权，内相猜忌”。后唐天成四年（公元九二九年）十一月，知询入朝广陵，知诰留知询，不遣返金陵，“知诰自是始专吴政”（《资治通鉴》后唐明宗天成二年四年）。

后唐长兴二年（公元九三一年），“吴中书令徐知诰表称辅政岁久，请归老金陵；乃以知诰为镇海（今南京市）、宁国（今安徽宣城县）节度使，镇金陵，余官如故，总录朝政，如徐温故事。以其子兵部尚书、参政事景通（即后来的南唐元宗）为司徒、同平章事，知中外左右诸军事，留江都（今扬州）辅政”（《资治通鉴》后唐明宗长兴二年）。后唐长兴四年（公元九三三年），“宋齐丘劝徐知诰徙吴主都金陵，知诰乃营宫城于金陵”（《资治通鉴》后唐明宗长兴四年）。后唐清泰元年（公元九三四年），“徐知诰别治私第于金陵”，知诰“迁居私第，虚府舍以待吴主。”“吴人多不欲迁都者，都押牙周宗言于徐知诰曰：‘主上西迁，公复须东行，不惟劳费甚大，且违众心。’”“吴主遣宋齐丘如金陵，谕知诰罢迁都。先是，知诰久有传禅之志，以吴主无失德，恐众心不悦，欲待嗣君，宋齐丘亦以为然。一旦，知诰临镜镊白髭，叹曰：‘国家安而吾老矣，奈何！’周宗知其意，请如江都，微以传禅讽吴主，且告齐丘。齐丘以宗先己，心疾之，遣使驰诣金陵，手书切谏，以为天时人事未可，知诰愕然。后数日，齐丘至，请斩宗以谢吴主，乃黜宗为池州副使。久之，节度副使李建勋、行军司马徐玠等屡陈知诰功业，宜早从民望，召宗复为都押牙。知诰由是疏齐丘”（《资治通鉴》后唐潞王清泰元年）。

后唐清泰二年（公元九三五年），吴加中书令徐知诰太师、大元帅，进封齐王。后晋天福元年（公元九三六年），“吴主诏齐王知诰置百官，以金陵府为西都。”后晋天福二年（公元九三七年），吴主禅位于徐知诰，知诰即皇帝位于金陵，史称南唐。

吴让皇杨溥退位后，徙居润州丹阳宫，后晋天福三年（公元九三八年），以幽死，年三十八。后晋天福七年（公元九四二年），南唐主李昇（即徐知诰）迁杨氏子孙居海陵（今江苏泰州市），“严兵守之，绝不通人，久而男女自为匹偶”（《新五代史·吴世家》）。

后周显德三年（公元九五六年），南唐失去淮南，南“唐主遣园苑使尹延范如泰州，迁吴让皇之族于润州，延范以道路艰难，恐杨氏为变，尽杀其男子六十人”（《资治通鉴》后周世宗显德三年）。杨氏遂绝。

自唐大顺二年（公元八九一年），杨行密始有淮南之地，至后晋天福二年（公元九三七年）杨溥退位，凡传四主，四十七年而亡。

南唐李氏的建国及其灭亡 南唐主李昇，是徐温的养子，上面已经讲到过了。

徐温，海州朐山（今江苏连云港市西）人，少以贩盐为业，后隶杨行密帐下，和刘威、陶雅之徒，号三十六英雄。行密死后，徐温拥立杨渥。渥被杀，徐温又拥立杨隆演，遂擅吴政。温病死，政权落入温养子徐知诰手中。知诰称帝后，为了以唐正统作号召，复姓李氏，改名曰昇，是谓南唐烈祖。昇尊徐温为义祖，表示不忘义父养育之恩，自己又伪造世系，说是唐玄宗第

六子永王璘之后。

南唐主李昇即位之后，“江淮比年丰稔，兵食有余，群臣争言‘陛下中兴，今北方多难，宜出兵恢复旧疆’。唐主曰：‘吾少长军旅，见兵之为民害深矣，不忍复言。使彼民安，则吾民亦安矣，又何求焉。’”（《资治通鉴》后晋高祖天福六年）。

后晋天福七年（公元九四二年），“吴越国火，焚其宫室、府库，甲兵皆尽，群臣请乘其弊攻之，昇不许，遣使问，厚调其乏。钱氏自吴时（杨氏）素为敌国，昇见天下乱久，常厌用兵，及将篡国，先与钱氏约和，归其所执将士，钱氏亦归吴败将，遂通好不绝。昇客冯延巳好论兵，大言，尝谓曰：‘田舍翁安能成大事！’而昇志在守吴旧地而已，无复经营之略也。然吴人亦赖以休息”（《新五代史·南唐世家》）。

南唐主“性节俭，常躡蒲屨，盥頰用铁盥，暑则寝于青葛帷，左右使令惟老醜宫人，服饰粗略。死国事者，皆给禄三年。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税，民间称其平允。自是江淮调兵兴役及他赋敛，皆以税钱为率”（《资治通鉴》后晋高祖天福六年）。

后晋天福八年（公元九四三年），唐主疽发于背，谓齐王“璟曰：‘吾饵金石，始欲益寿，乃更伤生，汝宜戒之’”（《资治通鉴》后晋齐王天福八年）。卒年五十六。子璟嗣位，是为元宗。

自徐知诰（即李昇，南唐烈祖）相吴，“禁压良为贱（买良人子女为奴婢），令买奴婢者通官作券。冯延巳及弟礼部员外郎延鲁，俱在元帅府，草遗诏听民卖男女，意欲自买姬妾，萧俨駁曰：‘此必延巳等所为，非大行（自汉以行，天子初死，梓宫在殡，称大行皇帝）之命也。昔延鲁为东都（江都）判官，已有此请，先帝访臣，臣对曰：‘陛下昔为吴相，民有鬻男女者，为出府金，赎而归之，故远近归心。今即位而反之，使贫人之子为富人厮役，可乎？’先帝以为然……先帝斜封延鲁章，抹三笔，持入宫。请求诸宫中，必尚在。’齐王命取先帝时留中章奏千余道，皆斜封一抹，果得延鲁疏。然以遗诏已行，竟不之改”（《资治通鉴》后晋齐王天福八年）。

冯延巳、延鲁、魏岑、陈觉、查文徽，党附宋齐丘，“更相汲引，侵蠹政事，唐人谓觉等为五鬼”。“延鲁自礼部员外郎迁中书舍人、勤政殿学士”。又“以岑及文徽皆为枢密副使”（《资治通鉴》后晋齐王天福八年）。

后晋开运三年（公元九四六年），南唐出兵取建州（治建安，今福建建瓯县）。开运三年（公元九四六年），陈觉、冯延鲁又矫用南唐主命进攻福州，吴越钱氏发水军自海道救福州，大败唐军，南唐兵士死者二万余人，“委弃军资器械数十万，府库为之耗竭”（《资治通鉴》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唐主以陈觉、冯延鲁矫诏败军，议斩二人以谢中外，由于宋齐丘为他二人说情，还是赦而不杀。当南唐福州失利的时候，正是契丹入主中原的时候，由于南唐精兵都用在江西、福建一带，无法把兵锋转而北向，把收复中原的最好机会，白白放过了。

后周郭威称帝，后汉主刘知远同母弟慕容彦超不肯臣周，据兖州抗周，并求援于南唐，南唐主“发兵五千，军于下邳（今安徽睢宁县西北），以援彦超，闻周兵将至，退屯沐阳”（今江苏沐阳县）。后周“大破唐兵，杀溺死者千余人，获其将燕敬权”。郭威释燕敬权归南唐，南“唐之言事者犹献取中原之策，中书舍人韩熙载曰：‘郭氏有国虽浅，为治已固，我兵轻动，必有害无益’”（《资治通鉴》后周太祖广顺二年）。

南唐主李璟“好文学，故[韩]熙载与冯延巳、延鲁、江文蔚、潘佑、徐铉之徒皆至美官”。“当时唐之文雅，于诸国为盛，然未尝设科举，多因上书言事拜官，至是，始命翰林学士江文蔚知贡举，进士庐陵（今江西吉安市）王克贞等三人及第。唐主问文蔚：‘卿取士何如前朝？’对曰：‘前朝公举、私谒相半，臣专任至公耳！’唐主悦”。“时执政皆不由科第，相与沮毁，竟罢贡举”（《资治通鉴》后周太祖广顺二年）。

周世宗于显德三年（公元九五六年），对南唐用兵，显德四年（公元九五七年），再次亲征，到了显德五年（公元九五八年），淮南之地尽为后周所得。同年，南唐主李璟下令去帝号，称南唐国主，凡天子仪制皆有降损，去年号，用周正朔。“初，冯延巳以取中原之策说唐主，由是有宠。延巳尝笑烈祖（李昇）戢兵为龌龊，曰：‘安陆（晋高祖天福五年李承裕安州之败事）所丧才数千兵，为之辍食咨嗟者旬日，此田舍翁识量耳，安足与成大事。岂如今上暴师数万于外，而击毬宴乐无异平日，真英主也。’延巳与其党谈论，常以天下为己任，更相唱和。翰林学士常梦锡屡言延巳等浮诞不可信，唐主不听。梦锡曰：‘奸言似忠，陛下不悟，国必亡矣！’及臣服于周，延巳之党相与言，有谓周为大朝者，梦锡大笑曰：‘诸君常欲致君尧舜，何意今日自为小朝邪！’众默然”（《资治通鉴》后周世宗显德五年）。

“唐主以金陵去周境才隔一水，洪州险固居上流，集群臣议徙都之”，“乃命经营豫章（今江西南昌市）为都城之制”（《资治通鉴》后周世宗显德六年）。不久，就更命洪州为南昌府，号曰南都。宋建隆二年（公元九六一年），南唐主迁都南昌，留太子从嘉（即后主）于金陵。“南唐主至南昌，城邑迫隘，宫府营廨，十不容一二”。“群臣日夜思归，南唐主北望金陵，郁郁不乐”（《续资治通鉴》宋太祖建隆二年）。六月，南唐元宗卒于南昌，年四十六。丧归金陵，太子从嘉即位，改名煜。

煜字重光，元宗第六子，五兄皆早死，故煜得立。“善属文，工书画”（《新五代史·南唐世家》）。《清异录》称：“后主善书，作颤笔，穆曲之状，迺劲如寒松霜竹，谓之金错刀。”知音律。

南唐建国之初，有屯田使，至是“罢诸路屯田使，委所属令佐与常赋俱徵，随所租入，十分锡一，谓之率分，以为禄廩；诸朱胶牙税视是”（《十国春秋》）。

宋乾德二年（公元九六四年）三月，始行铁钱。陶岳《货志录》曰：“韩熙载请以铁为钱，其钱之大小，一如开元通宝，文亦如之，徐铉篆其文。比于旧钱稍大，而轮郭深阔。既而铁钱大行，公私便之。”每十钱，以铁钱六而铜钱四而行，逮民间止用铁钱，遂藏铜钱靳弗出，末年铜钱一直铁钱十，比国亡，诸郡所积铜钱累六十七万缗”（《十国春秋》）。

南唐后酷信佛法，中书舍人张洎每见辄谈法，当时大臣亦多蔬食持戒以奉佛。宋开宝二年（公元九六九年），“普度诸郡僧”。开宝三年，“命境内崇脩佛寺”（《十国春秋》）。“建康城中僧徒迨至数千，给廩米缗帛以供之”（马令《南唐书》）。南唐主与小周后“顶僧伽帽衣袈裟，诵佛经拜跪顿颡”（《十国春秋》）。

宋开宝八年（公元九七四年），宋太祖出兵，十一月，下金陵，南唐亡。南唐建国于后晋天福二年（公元六三七年），亡于宋开宝八年，凡传三主，共三十九年而亡。

闽王氏的建国及其灭亡 王潮，光州固始（今河南固始县）人，家世

业农，后来王潮出任佐史。唐僖宗光启元年（公元八八五年），“秦宗权责租赋于光州刺史王绪，绪不能给”，“悉举光（州治定城，今河南潢川县）、寿（州治寿春，今安徽寿县）兵五千人，驱吏民渡江”，“转掠江（州治浠阳，今江西九江市）、洪（州治豫章，今江西南昌市）、虔（州治赣县，今江西赣州市）州”，又“陷汀（州治长汀，今福建长汀县）、漳（州治漳浦，今福建漳浦县）二州”。“王绪至漳州，以道险粮少，令军中‘无得以老弱自随，犯者斩！’唯王潮兄弟扶其母董氏崎岖从军，绪召潮等责之曰：‘军皆有法，未有无法之军。汝达吾令而不诛，是无法也。’三子（王潮及弟王审邽、王审知）曰：‘人皆有母，未有无母之人；将军奈何使人弃其母！’绪怒，命斩其母。三子曰：‘潮等事母如事将军，既杀其母，安用其子，请先母死。’将士皆为之请，乃舍之。有望气者谓绪曰：‘军中有王者气。’于是绪见将卒有勇略逾己及气质魁岸者皆杀之”。“众皆自危”。行至南安（今福建南安县），王潮与前锋将合谋，“伏壮士数十人于篁竹中，伺绪至，挺剑大呼跃出，就马上擒之”，“军中皆呼万岁”，推王潮为将军。潮“约其属，所过秋毫无犯。行及沙县（今福建沙县），泉州（治晋江，今福建泉州市）人张延鲁等以刺史廖彦若贪暴，帅耆老奉牛酒遮道，请潮留为州将，潮乃引兵围泉州”（《资治通鉴》唐僖宗光启元年）。光启二年（公元八八六年），王潮攻拔泉州，福建观察使陈岩表王潮为泉州刺史。“潮沉勇有智略，既得泉州，招怀离散，均赋缮兵，吏民悦服”（《资治通鉴》唐僖宗光启二年）。

“福建观察使陈岩疾病，遣使以书召泉州刺史王潮，欲授以军政，未至而岩卒。岩妻弟都将范晖讽将士推己为留后”（《资治通鉴》唐昭宗大顺二年）。“范晖骄侈失人心，王潮以从弟彦复为都统，弟审知为都监，将兵攻福州，民自请输米饷军，平湖洞（今福建莆田县界）及滨海蛮夷皆以兵船助之”（《资治通鉴》唐昭宗景福元年）。王审知攻福州久不下，“董昌发温（州治永嘉，今浙江温州市）、台（州治临海，今浙江临海县）、婺（州治金华，今浙江金华县）州兵五千救之”，王审知白王潮，欲且停攻福州，王潮不许，报曰：“兵尽添兵，将尽添将，兵将俱尽，吾当自来”（《资治通鉴》唐昭宗景福二年）。由于王潮坚决要攻下福州，景福二年（公元八九三年）五月，范晖终于放弃福州，在逃亡途中，为将士所杀，自此王潮遂据有七闽之地。唐朝任王潮为福建观察使。“潮遣僚佐巡州县，劝农桑，定租税，交好邻道，保境息民，闽人安之”（《资治通鉴》唐昭宗乾宁元年）。

唐昭宗乾宁三年（公元八九六年）九月，升福建为威武军，以观察使王潮为节度使。乾宁四年（公元八九七年）十二月，王潮病死，弟王审知自称福建留后。昭宗光化元年（公元八九八年）三月，以王审知为威武留后。十月，以王审知为威武节度使。梁朱温开平三年（公元九〇九年），以王审知为闽王。

审知“为人俭约，好礼下士。王淡，唐相溥之子；杨沂，唐相涉从弟；徐寅，唐时知名进士，皆依审知仕官”（《新五代史·闽世家》）。“唐学士韩偓挈族来奔”（《十国春秋》）。审知“又建学四门，以教闽士之秀者，招来海中蛮夷商贾”（《新五代史·闽世家》）。

后唐同光三年（公元九二五年）四月，王审知病危，以其子节度副使王延翰权知军府事，十二月，王审知病卒，年六十四，子延翰自称威武节度留后。后唐天成元年（公元九二六年）九月，任命王延翰为威武节度使。十月，

延翰“自称大闽国王，立宫殿，置百官，威仪文物，皆仿天子之制，群下称之曰殿下”（《资治通鉴》后唐明宗天成元年）。

延翰“袭位才逾月，出其弟延钧为泉州（治晋江，今福建泉州市）刺史。延翰多取民女以充后庭，采择不已。延钧上书极谏，延翰怒，由是有隙。父审知养子延禀（本周姓）为建州（今福建建瓯县）刺史，延翰与书使之采择，延禀复书不逊，亦有隙”（《资治通鉴》后唐明宗天成二年）。十二月，延禀、延钧合兵袭破福州，杀延翰，延禀推延钧为威武节度留后。天成二年（公元九二七年）正月，延禀还返建州，临行，“谓延钧曰：‘善守先人基业，勿烦老兄再下。’延钧逊谢甚恭而色变”（《资治通鉴》后唐明宗天成二年）。后唐天成三年（公元九二八年），“闽王延钧度民二万为僧，由是闽中多僧”（《资治通鉴》后唐明宗天成三年）。

后唐长兴二年（公元九三一年）四月，闽奉国节度使（镇建州）王延禀闻闽王王延钧有疾，率水军袭福州，延禀兵败被擒，延钧见延禀曰：“果烦老兄再下。”延钧斩延禀于市，复其姓名曰周彦琛。延禀子继昇，时留守建州，知延禀败，逃奔吴越。

“闽王延钧好神仙之术，道士陈守元”等“共诱之作宝皇宫，极土木之盛”。守元谓“延钧曰：‘苟能避位受道，当为天子六十年。’延钧信之”，“命其子节度副使继鹏权军府事”（《资治通鉴》后唐明宗长兴二年）。长兴四年（公元九三三年），闽王延钧“诣宝皇宫受册，备仪卫，入府，即皇帝位，国号大闽，大赦，改元龙启，更名璘”。“闽主自以国小地僻，常谨事四邻，由是境内差安”。闽主“大作宫殿，极土木之盛”。闽主“喜奢侈”，“福建中军使薛文杰，性巧佞”，“以聚敛求媚”，闽主“以为国计使，亲任之。文杰阴求富民之罪，籍没其财，被榜捶者胸背分受，仍以铜斗火熨之。建州土豪吴光入朝，文杰利其财，求其罪，将治之，光怨怒，帅其众且万人叛奔吴”。“吴光请兵于吴，吴信州（今江西上饶市）刺史蒋延徽不俟朝命，引兵会光攻建州，闽主遣使求救于吴越”（《资治通鉴》后唐明宗长兴四年）。

闽主“好鬼神，巫盛韬等皆有宠”。许“文杰恶枢密使吴勛，勛有疾，文杰省之，曰：‘主上以公久疾，欲罢公近密，仆言公但小苦头痛耳，将愈矣。主上或遣使来问，慎勿以他疾对也。’勛许诺。明日，文杰使[盛]韬言于闽主曰：‘适见北庙崇顺王讯吴勛谋反，以铜钉钉其脑，金椎击之。’”闽主遣使问之，“果以头痛对，即收下狱，遣文杰及狱吏杂治之，勛自诬服，并其妻子诛之，由是国人益怒”。闽“亲从都指挥使王仁达有擒王延禀之功，性慷慨，言事无所避。闽主恶之，尝私谓左右曰：‘仁达智有余，吾犹能御之，非少主臣也。’至是，竟诬以叛，族诛之”（《资治通鉴》后唐明宗长兴四年）。

吴信州刺史蒋延徽“败闽兵于浦城（今福建浦城县），遂围建州”，闽主遣大将“将兵万人救建州”，“军及中途，士卒不进，曰：‘不得薛文杰，不能讨贼。’”“国人震恐”，乃囚文杰“槛车送军前”杀之，“并诛盛韬”。蒋“延徽亦闻闽兵及吴越兵将至，引兵归，闽人追击，败之，士卒死亡甚众”（《资治通鉴》后唐潞王清泰元年）。

后唐清泰二年（公元九三五年），闽太子继鹏杀闽主，即皇帝位，改名昶。谥闽主延钧（即璘）曰惠帝，庙号太宗。

继鹏称皇帝后，内宣徽使、参政事叶翘屡进谏言，继鹏批其进表纸尾后云：“一叶随风落御沟。”叶翘遂归老永春（今福建永春县）。

继鹏也和他父亲一样，信巫，拜道士谭紫霄为正一先生，又拜陈守元为天师，非常信重他们，“乃至更易将相，刑罚选举，皆与之议。守元受贿请托，言无不从，其门如市”（《资治通鉴》后唐潞王清泰二年）。

后晋天福二年（公元九三七年），闽主继鹏“脩紫微宫，饰以水晶，土木之盛，倍于宝皇宫。又遣使散诣诸州，伺人隐慝”。“方士言于闽主，云有白龙夜见螺峰，闽主作白龙寺。时百役繁兴，用度不足”，“除官但以货多少为差，闽主又以空名堂牒使医工陈究卖官于外，专务聚敛，无有盈仄。又诏民有隐年者杖背，隐口者死，逃亡者族。果菜鸡豚，皆重征之”（《资治通鉴》后晋高祖天福二年）。

陈守元教闽主“起三清台三层，以黄金数千斤铸宝皇及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像，日焚龙脑、薰陆诸香数斤，作乐于台下，昼夜声不辍，云如此可求大还丹。[天福]三年（公元九三八年）夏，虹见其宫中，[妖巫]林兴传神言：‘此宗室将为乱之兆也。’乃命兴率壮士杀审知子延武、延望及其子五人”（《新五代史·闽世家》）。

闽太宗（王延钧）“以太祖（王审知）元从为拱宸、控鹤都，及康宗（王继鹏）立，更募壮士二千为腹心，号宸卫都，禄赐皆厚于二都。或言二都怨望，将作乱，闽主欲分隶漳、泉二州，二都益怒。闽主好为长夜之饮，强群臣酒，醉则令左右伺其过失”。“屡以猜怒诛宗室”。“闽主数侮拱宸、控鹤军使永泰朱文进、光山连重遇，二人怨之。会北宫火，求贼不获，闽主”“疑重遇知纵火之谋，欲诛之”。重遇帅二都兵攻闽主，使人迎闽主叔父王延羲（王审知幼子）为主，“复召外营兵共攻闽主，独宸卫都拒战”，“宸卫都战败”，闽主为人所执，并妻子俱死，“宸卫余众奔吴越。延羲自称威武节度使、闽国王，更名曦”。“赦系囚，颁赆中外”。上继鹏庙号康宗，“遣商人间道奉表称藩于[后]晋。然其在国，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资治通鉴》后晋高祖天福四年）。

“连重遇之攻康宗也，陈守元在宫中，易服将逃，兵人杀之”。“闽王曦既立，遣使诛林兴于泉州”（《资治通鉴》后晋高祖天福四年）。

“闽王曦既立，骄淫苛虐，猜忌宗族，多寻旧怨。其弟建州刺史延政数以书谏之，曦怒，复书骂之”，“由是兄弟积相猜恨”。曦“遣亲吏业翹监建州军”，“一日，翹与延政议事不叶，翹诃之曰：‘公反邪！’延政怒，欲斩翹”，翹奔福州。闽主曦遣大将“将兵四万击延政”，“延政求救于吴越”，吴越遣将兵四万救之，王延政连败闽王曦军，“自是建州之兵始盛”。吴越兵至建州，时建州围已解，吴越兵营于建州西北，不肯班师。“会久雨，吴越军食尽”，“延政遣兵出击，大破之，俘斩以万计”（《资治通鉴》后晋高祖天福五年）。吴越军夜遁。

后晋天福五年（公元九四〇年），闽主曦度民为僧，民避重赋多为僧，凡度万一千人。

后晋天福六年（公元九四一年），闽主曦以建州为镇安军，以王延政为节度使，封富沙王。延政又改镇安军为镇武军。闽主曦疑其弟汀州刺史王延喜与延政通谋，命将至汀州执延喜归福州。闽主曦闻王廷政以书招泉州刺史王继业，闽主召继业还，赐死于福州郊外，并杀其子于泉州。杨沂丰，唐相杨涉从弟，仕闽官至司徒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时年八十余，人告沂丰与继业同谋，闽主诛沂丰，并夷其族。“自是宗族勋旧相继被诛，人不自保”。“曦淫侈无度，资用不给”。“令欲仕者，自非荫补，皆听输钱即授之，以

资望高下及州县户口多寡定其直，自百缗至千缗”（《资治通鉴》后晋高祖天福六年）。

“闽主曦自称大闽皇，领威武节度使，与王延政治兵相攻，互有胜负，福建[二州]之间，暴骨如莽”。“闽主曦恶泉州刺史王继严得众心，罢归，酖杀之”（《资治通鉴》后晋高祖天福六年）。

后晋天福六年（公元九四一年），闽主曦即皇帝位，王延政自称兵马元帅。天福七年（公元九四二年），闽富沙王延政攻汀州，四十二战，不胜而归，后来在尤口（尤溪口，今福建南平市东南）会战，王延政军大败闽主曦军。“闽主曦遣使以手诏及金器九百、钱万缗、将吏敕告六百四十通，求和于富沙王延政，延政不受”。闽主曦以余廷英为泉州刺史，“廷英贪秽，掠人女子，诈称受诏采择以备后宫，事觉”，“廷英惧，诣福州自归”，“献买宴钱万缗。曦悦，明日召见，谓曰：‘宴已买矣，皇后贡物安在？’廷英复献钱于李后，乃遣归泉州，自是诸州皆别贡皇后物。未几，复召廷英为相”（《资治通鉴》后晋高祖天福七年）。

闽主曦“荒淫无度，当夜宴，[翰林学士、吏部侍郎李]光准醉忤旨，命执送都市斩之，吏不敢杀，系狱中。明日视朝，召复其位。是夕又宴，收翰林学士周维岳下狱。吏拂榻待之，曰：‘相公昨夜宿此，尚书勿忧。’醒而释之。他日，又宴，侍臣皆以醉去，独维岳在。曦曰：‘维岳身甚小，何饮酒之多？’左右或曰：‘酒有别肠，不必长大。’曦欣然，命粹维岳下殿，欲剖视其酒肠。或曰：‘杀维岳，无人复能侍陛下剧饮者。’乃舍之”（《资治通鉴》后晋高祖天福七年）。

后晋天福八年（公元九四三年），“闽富沙王延政称帝于建州，国号大殷”，改元天德。“延政服赭袍视事，然牙参及接邻国使者，犹如藩臣礼。殷国小民贫，军旅不息。杨思恭以善聚敛得幸，增田亩山泽之税，至于鱼盐蔬果，无不倍征，国人谓之‘杨剥皮’”（《资治通鉴》后晋齐王天福八年）。

后晋天福八年（公元九四三年），“殷吏部尚书、同平章事潘承祐上书陈十事，大指言：‘兄弟相攻，逆伤天理，一也。赋敛烦重，力役无节，二也。发民为兵，羁旅愁怨，三也。杨思恭夺民衣食，使归怨于上，群臣莫敢言，四也。疆土狭隘，多置州县，增吏困民，五也。除道裹粮，将攻临汀，曾不忧金陵（南唐）、钱塘（吴越）乘虚相袭，六也。括高赀户，财多者补官，逋负者被刑，七也。延平诸津，征果菜鱼米，获利至微，敛怨甚大，八也。与[南]唐、吴越为邻，即位以来，未尝通使，九也。宫室台榭，崇饰无度，十也。’殷主延政大怒，削承祐官爵，勒归私第”（《资治通鉴》后晋齐王天福八年）。

“闽拱宸都指挥使朱文进、閤门使连重遇，既弑康宗（王继鹏），常惧国人之讨，相与结婚以自固。闽主曦果于诛杀”，“尝酒酣诵白居易诗云：‘惟有人心相对间，咫尺之情不能料。’因举酒属二人”，“二人大惧”。“会[李]后父李真有疾”，“曦如真第问疾，文进、重遇使拱宸马步使钱达弑曦于马上，召百官集朝堂，告之曰：‘太祖昭武皇帝（王审知）光启闽国，今子孙淫虐，荒坠厥绪。天厌王氏，宜更择有德者立之。’众莫敢言，重遇乃推文进升殿，被袞冕，帅群臣北面再拜称臣。文进自称闽主，悉收王氏宗族延喜（闽主弟）以下少长五十余人，皆杀之。葬闽主曦”，“庙号景宗。以重遇总六军”。“文进下令，出宫人，罢营造，以反曦之政”（《资治通鉴》后晋齐王开运元年）。

泉州散员指挥使留从效谓同辈“曰：‘朱文进屠灭王氏，遣腹心分据诸州，吾属世受王氏恩，而交臂事贼，一旦富沙王克福州，吾属死有余愧！’众以为然”。从效等乃操白梃，夜窬垣入刺史衙，杀泉州刺史黄绍颇。“朱文进闻黄绍颇死，大惧，以重赏募兵二万，遣统军使林守谅、内客省使李廷锷将之攻泉州，钲鼓相闻五百里”。“留从效开门与福州兵战，大破之，斩守谅，执廷锷”。殷主王“廷政遣统军使吴成义帅战舰千艘攻福州，朱文进遣子弟为质于吴越以求救”。“福州南廊承旨林仁翰”“帅其徒三十人被甲趣连重遇第”，“仁翰执槊直前刺重遇，杀之”。又斩文进（《资治通鉴》后晋齐王开运元年）。

“闽之故臣共迎殷主延政，请归福州，改国号曰闽。延政以方有唐兵，未暇徙都”。南唐发大兵攻建州，延政婴城自守。闽旧将李仁达据福州，拥立雪峰寺僧卓岩明为帝，兵权尽归李仁达，“卓岩明无他方略，但于殿上噉（含水而喷之为噉）水散豆，作诸法事而已”。开运二年（公元九四五年）八月，南唐兵破建州，闽主延政降。自唐昭宗景福二年（公元八九三年），王潮得福州，至后晋开运二年（公元九四五年），延政降南唐，传七主，凡五十三年而亡。

后晋开运三年（公元九四六年）泉州都指挥使留从效自领军府事，南唐主以从效为泉州刺史，遂据有漳、泉。后来南唐置清源军，以留从效为清源节度使。

李仁达据福州，南唐兵围攻之，吴越发兵救之，大破南唐兵，南“唐兵死者二万余人，委弃军资器械数十万，府库为之耗竭”（《资治通鉴》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

从此福州并入吴越版图，建州（今福建建瓯县）、剑州（今福建南平市）、汀州（今福建长汀县）并入南唐版图，泉州、漳州（今福建漳州市）由留从效割据。留从效在漳、泉，“专以勤俭养民为务，常衣布衣，置公服于中门，出视事则服之，入则复衣敝布，自言我素贱，不可忘本也。民甚爱之。”“每岁取进士明经，谓之秋堂”（《十国春秋》）。宋乾德二年（公元九六四年）七月，留从效病死，年五十有七。由从效兄子绍鎡嗣位，未几，统军陈洪进执绍鎡，推立副使张汉思为留后，自为副使。汉思年老不能治事，军务皆决于洪进。南唐以陈洪进为清源军节度使。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公元九七八年），洪进入朝大梁，遂留大梁不归，病卒于大梁。

吴越钱氏的建国及其附宋 钱鏐，杭州临安（今浙江临安县）人，唐僖宗乾符（公元八七四至八七九年）中，石镜（石镜山在临安县南一里）镇将董昌组织土团，抵抗农民军，募各县乡兵八千人，每千人为一都，置一都将，号杭州八都。鏐以骁勇，积战功，为石镜都知兵马使。时有刘汉宏者，据越州（治会稽，今浙江绍兴县），董昌命钱鏐率八都兵攻围越州，杀汉宏。董昌为浙东节度使兼越州刺史，以钱鏐为杭州刺史。鏐以战功，勋名日著。唐朝廷以鏐为杭州防御使，又立威胜军于越州，以浙东节度使董昌为威胜军节度使。景福二年（公元八九三年），又以鏐为镇海军节度使、润州（治丹徒，今江苏镇江市）刺史。唐昭宗乾宁二年（公元八九五年），董昌在越州称大越罗平国皇帝，鏐起兵讨昌，乾宁三年（公元八九六年），破越州杀昌。两浙士庶，上章唐王朝，请以钱鏐兼领两浙，唐改威胜军为镇东，乃命钱鏐兼领镇海（浙西，时治杭州）、镇东（浙东，治越州）两镇。

钱鏐既兼两镇，精兵三万，所部杭、越、苏、湖、温、台、明、处、衢、

婺、睦、秀十二州（后来又加入福州）。唐昭宗天复二年（公元九〇二年），钱鏐进爵越王。钱鏐至衣锦营（临安的的钱鏐故宅），其部将武勇右都指挥使徐绶、武勇左都指挥使许再思在杭州举行兵变，进攻牙城，并引宣州节度使田頔共袭杭州，“鏐激励军士，一战败之，生擒徐绶，田頔遁走”（《旧五代史·钱鏐传》）。

唐昭宗天祐元年（公元九〇四年），钱鏐更封吴王。后梁朱温称帝，封鏐吴越国王。“鏐于临安故里兴造第舍，穷极壮丽，岁时游于里中，车徒雄盛，万夫罗列”（《旧五代史·钱鏐传》）。鏐妻吴氏每岁春必归衣锦营，鏐语之曰：“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钱鏐在杭州垂四十年，穷奢极贵。钱塘江旧日海潮逼州城，鏐大庀工徒，凿石填江（捍海石塘，上起六和塔，下抵艮山门外），又平江中罗刹石，悉起台榭，广郡郭（杭州城）周三十里，邑屋之繁会，江山之雕丽，实江南之胜概也”（《旧五代史·钱鏐传》）。

在五代时，吴越和吴杨氏、南唐李氏时战时和，互有胜负。中间两国曾一度休兵息民，两国人民安居乐业者二十余年。

钱鏐在唐明宗长兴三年（公元九三二年）病卒，年八十一，子元瓘嗣位吴越国王。下令“除民田荒绝者租税”（《资治通鉴》后唐明宗长兴三年）。后晋天福六年（公元九四一年）。元瓘病死，子弘佐嗣位。弘佐“躬勤政务”，“民有献嘉禾者，弘佐问仓吏：‘今蓄积几何？’对曰：‘十年。’王曰：‘然则军食足矣，可以宽吾民。’乃命复其境内税三年”（《资治通鉴》后晋高祖天福六年）。

弘佐“幼好书，性温恭，能为五七言诗，凡官属遇雪月佳景，必同宴赏，由此士人归心。其班品亦有丞相已下名籍，而禄给甚薄，罕能自济，每朝廷降吏，则去其伪官，或与会则公府助以仆马。”“然航海所入，岁贡百万，王人（北使）一至，所遗至广，故朝廷宠之，为群藩之冠”（《旧五代史·钱鏐传》）。

后汉天福十二年（公元九四七年），弘佐病卒，遗令以弟弘侗袭吴越国王位。同年，吴越内牙统军使胡进思帅亲兵百人囚弘侗于私第，别立弘侗弟弘俶为吴越国王。

弘俶迁故王弘侗于衣锦军私第（在临安），遣匡武都头薛温将亲兵卫之。潜戒之曰：“若有非常处分，皆非吾意，当以死拒之。”胡“进思屡请杀废王弘侗以绝后患，弘俶不许。进思诈以王命密令薛温害之，温曰：‘仆受命之日，不闻此言，不敢妄发。’进思乃夜遣其党方安二人窬垣而入，弘侗阖户拒之，大呼求救，温闻之，率众而入，毙安等于庭中。入告弘俶，弘俶大惊曰：‘全吾兄，汝之力也。’弘俶畏忌进思，曲意下之。进思亦内忧惧，未几，疽发背卒。弘侗由是获全”（《资治通鉴》后汉高祖乾祐元年）。

后汉乾祐二年（公元九四九年），“吴越王弘俶募民能垦荒田者，勿收其税，由是境内无弃田。或请纠民遗丁以增赋，仍自掌其事；弘俶杖之国门，国人皆悦”（《资治通鉴》后汉隐帝乾祐二年）。

《新五代史·吴越世家》云：“钱氏兼有两浙几百年，其人比诸国号为怯弱，而俗喜淫侈，偷生工巧，自繆世常重繆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鸡鱼卵鷄，必家至而日取。每笞一人以责其负，则诸案吏各持其簿列于廷，凡一簿所负，唱其多少，量为笞数，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犹积数十，多者至笞百余，人尤不胜其苦。又多掠得岭海商贾宝货。”

宋兴，荆楚诸国相次归附，吴越王弘俶“始倾其国以事贡献”。宋太祖时，弘俶“益以器服珍奇为献”，“太祖曰：‘此吾帑中物尔，何用献为！’太平兴国三年（公元九七八年），诏弘俶来朝，弘俶举族归于京师，国除”（《新五代史·吴越世家》）。自唐昭宗乾宁三年（公元八九六年），钱鏐为镇海、镇东节度使，至宋太平兴国三年（公元九七八年）国除，凡五主，八十三年。

**楚马氏的建国及其衰亡** 马殷，许州扶沟（今河南扶沟县）人，少为木工。秦宗权据蔡州，马殷应募从军，后随孙儒渡淮，略地淮南，及孙儒宣州（今安徽宣城县）败没，马殷随别将刘建峰转攻江西，略地洪（州治豫章，今江西南昌市）、鄂（州治江夏，今湖北武汉市）、潭（州治长沙，今湖南长沙市）、桂（州治始安，今广西桂林市）等州。唐昭宗授刘建峰为湖南节度使。建峰戏亲兵妻，为亲兵所杀，诸将欲立行军司马张佖，佖骑马伤髀，乃改立马殷为潭州刺史、判湖南军府事，时唐昭宗乾宁三年（公元八九六年）。数年之间，马殷遣将攻下连（州治桂阳，今湖南连县）、邵（州治邵阳，今湖南邵阳市）、郴（州治郴县，今湖南郴县）、衡（州治衡阳，今湖南衡阳市）、道（州治营道，今湖南道县西）、永（州治零陵，今湖南零陵县）六州，尽有湖南之地，时唐昭宗光化二年（公元八九九年）也。光化三年（公元九〇〇年），又尽取桂管属州。

唐天复元年（公元九〇一年），以殷为武安军节度使。梁开平元年（公元九〇七年），封马殷为楚王。

唐昭宗天复三年（公元九〇三年），成汭败亡，成汭的岳州（治巴陵，今湖南岳阳县）刺史郭进忠改附马殷。到了唐昭宣帝天祐三年（公元九〇六年），岳州为淮南所攻下，淮南以陈知新为岳州刺史。梁开平元年（公元九〇七年），淮南发水军三万击楚，楚王殷亦发水军三万应战，大败淮南兵，拔岳州，杀岳州刺史陈知新。

成汭败亡之后，澧（州治澧阳，今湖南澧县东南）朗、（州治武陵，今湖南常德市）节度使雷彦恭“断江、岭行商之路，殷与高季兴（荆南）合势攻彦恭于澧、朗，数年，擒之，尽有其地”，“由是兵力雄盛”（《旧五代史·马殷传》）。

后梁开平四年（公元九〇一年），朱温从马殷之请，以殷为天策上将军，开天策府，置十八学士。

马殷既据有湖南，“不征商旅，由是四方商旅辐凑。湖南地多铅铁，殷用军都判官高郁策，铸铅铁为钱，商旅出境，无所用之，皆易他货而去，故能以境内所余之物易天下百货，国以富饶。湖南民不事桑蚕，郁命民输税者，皆以帛代钱，未几，民间机杼大盛”（《资治通鉴》后唐庄宗同光三年）。又“自京师（大梁）至襄、唐、郢、复等州，置邸务以卖茶，其利十倍”。“又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而收其算”（《新五代史·楚世家》）。“于中原卖茶之利，岁百万计”（《旧五代史·马殷传》）。后唐明宗天成二年（公元九二七年），后唐册礼使至长沙，以马殷为楚国王，“殷始建国，立宫殿，置百官，皆如天子，或微更其名。翰林学士曰文苑学士，知制诰曰知辞制，枢密院曰左右机要司，群下称之曰殿下，令曰教”（《资治通鉴》后唐明宗天成二年）。又有左右丞相、司徒、司空、仆射、判机要司等官名。

后唐明宗长兴元年（公元九三一年），马殷病死，年七十九，谥曰武穆王。子希声（殷次子）袭位。长兴三年（公元九三二年），希声病死，弟希

范（殷第四子）嗣位。后晋天福七年（公元九四二年），“楚王希范作天策府，极栋宇之盛，户牖栏槛皆饰以金玉，涂壁用丹砂数万斤；地衣，春夏用角簟，秋冬用木棉，与子弟僚属游宴其间”（《资治通鉴》后晋高祖天福七年）。“楚地多产金银，茶利尤厚，由是财货丰殖。而楚王希范，奢欲无厌，喜自夸大。为长枪大槩，饰之以金，可执而不可用。募富民年少肥泽者八千人，为银枪都。宫室、园囿，服用之物，务穷侈靡。作九龙殿，刻沉香为八龙，饰以金宝，长十余丈，抱柱相向；希范居其中，自为一龙，其袂头脚长丈余，以象龙角”（《资治通鉴》后晋齐王天福八年）。

“用度不足，重为赋歛。每遣使者行田，专以增顷亩为功，民不胜租赋而逃”。希范“曰：‘但令田在，何忧无穀！’”命营田使邓懿文籍逃田，募民耕艺（耕种）出租。民舍故从新，仅能自存，自西徂东，各失其业。又听人入财拜官，以财多少为官高卑之差。富商大贾，布在列位。外官还者，必责贡献。民有罪，则富者输财，强者为兵，惟贫弱受刑。又置函，使人投匿名书相告讦，至有灭族者。”又“用孔目官周陟议，令常税之外，大县贡米二千斛，中千斛，小七百斛，无米者输布帛”（《资治通鉴》后晋齐王天福八年）。

后晋末，“契丹灭晋，中国大乱，希范牙将丁思颢谏希范曰：‘先王（马殷）起卒伍，以攻战而得此州，倚朝廷（指后梁、后唐、后晋）以制邻敌，传国三世，有地数千里，养兵十万人。今天子囚辱（指后晋齐王重贵），中国无主，真霸者立功之时，诚能悉国之兵出荆、襄以趋京师，倡义于天下，此桓、文之业也。奈何耗国用而穷土木，为儿女之乐乎？’”楚的国力，已经耗竭，马希范更无北伐之志，只有等待邻国出兵来消灭他了。后晋开运四年（公元九四七年），马希范病死，年四十九，谥曰文昭王。弟希广（殷第三十五子）嗣位。

希广兄希萼（殷第三十子）为朗州（治武陵，今湖南常德市）节度使，想夺取希广的楚王王位，“悉调朗州丁壮为乡兵，造号静江军，作战舰七百艘，将攻潭州”，“引兵趣长沙”。结果战败，损失战舰三百艘，希萼“轻舟遁归”（《资治通鉴》后汉隐帝乾祐二年）。希萼败归之后，“乃以书诱辰（州治沅陵，湖南沅陵县）、澍（州治澍浦，今湖南澍浦县）州及梅山（在长沙云西）蛮，欲与共击湖南。蛮素闻长沙帑藏之富，大喜争出兵赴之，遂攻益阳（今湖南益阳县），楚王希广遣指挥使陈璠拒之，战于淹溪，璠败死”，“潭人震恐”（《资治通鉴》后汉隐帝乾祐三年）。希萼为了要推倒希广，并遣使称藩于南唐，乞师进攻长沙。

楚王马希广遣将进攻朗州，被希萼杀得大败，士卒战及溺死者数千人；由龙阳（今湖南汉寿县）退到益阳（今湖南益阳市），在益阳决战中，希广又损折了九千人之多。

希萼悉发朗州之兵趣长沙，军于湘水之西，步兵及蛮兵军于岳麓；马希广召水军指挥使许可琼帅战舰五百艘屯城北津，属于南津。许可琼受到马希萼的收买，全军向希萼投降，长沙攻陷。“朗兵及蛮兵大掠三日，杀吏民，焚庐舍，自武穆王（马殷）以来所营宫室，皆为灰烬，所积宝货，皆入蛮落”（《资治通鉴》后汉隐帝乾祐三年）。希广为希萼所杀，希萼自称楚王。

希萼既取长沙，“多思旧怨，杀戮无度，昼夜纵酒荒淫，悉以军府事委马希崇。希崇复多私曲，政刑紊乱。府库既尽于乱兵，藉民财以赏赉士卒，或封其门而取之，士卒犹以不均怨望。虽朗州旧将佐从希萼来者，亦皆不悦，

有离心。”希萼遣掌书记入贡于唐，南唐主很优待他，“光辅密言：‘湖南民疲主骄，可取也。’唐主乃以营屯都虞侯边镐为信州刺史，将兵屯袁州（治宜春，今江西宜春县），潜谋进取”（《资治通鉴》后周太祖广顺元年）。

“希萼以府舍焚荡，命朗州静江指挥使王逵、副使周行逢帅所部兵千余人治之，执役甚劳，又无犒赐，士卒皆怨，窃言曰：‘囚免死则役作之。我辈从大王出万死取湖南，何罪而囚役之！且大王终日酣歌，岂知我辈之劳苦乎！’逵、行逢闻之，相谓曰：‘众怨深矣，不早为计，祸及吾曹。’”乃“帅其众各执长柯斧、白梃，逃归朗州。”希萼遣将帅千余人追之，逵等伏兵纵击，尽歼其众。逵等至朗州，黜希萼子留后马光赞，以希萼兄子光惠知州事，后又推立为武平节度使。光惠“愚懦嗜酒，不能服诸将”，王逵、周行逢等废光惠，送于南唐，别立辰州（治沅陵，今湖南沅陵县）刺史刘言为主。后周广顺元年（公元九五一年）八月，长沙诸将卒囚希萼，立希崇为主，刘言闻希崇自立，遣兵趣长沙。“希崇既袭位，亦纵酒荒淫，为政不公，语多矫妄，国人不附”（《资治通鉴》后周太祖广顺元年）。希崇知道部下不拥护他，恐为部下所杀，求援于南唐，南唐主命大将边镐将兵万人，自袁州西趣长沙。既至长沙，希崇帅弟侄迎镐，望尘而拜。“时湖南饥馑，镐大发马氏仓粟赈之，楚人大悦。”边镐促马希崇帅其族人入朝，马氏聚族相泣，号恸登舟。马希萼也从衡山入朝南唐，南唐主以马希萼为江南西道观察使，仍封楚王，住洪州，以马希崇为永泰军（镇舒州）节度使，居扬州。自唐昭宗乾宁三年（公元八九六年）马殷据湖南，至后周广顺元年（公元九五一年），马希萼、马希崇降南唐，凡六主，五十六年而楚亡。

南唐主以边镐为武安节度使，镇长沙。镐“昏懦无断，在湖南，政出多门，不合众心”（《资治通鉴》后周太祖广顺二年）。时刘言据朗州，以大将王逵、周行逢等为指挥使，将兵长沙，“边镐婴城自守，救兵未至，城中兵少”，镐夜“弃城走，吏民俱溃。醴陵门（长沙城东门）桥折，死者万余人。”“唐将守湖南诸州者，闻长沙陷，相继遁去。刘言尽复岭北故地，惟郴（州治郴县，今湖南郴县）、连（州治桂阳，今湖南连县）入于南汉”（《资治通鉴》后周太祖广顺二年）。

后周郭威以刘言为武平节度使，镇朗州武陵（今湖南常德市），以王逵为武安节度使，镇潭州长沙，以周行逢为武安行军司马，以何敬真为静江节度使，镇桂州始安（今广西桂林市）。后周广顺三年（公元九五三年）王逵将兵袭破朗州，杀武平节度使刘言。后周显德元年（公元九五四年），王逵改镇朗州，而以周行逢知潭州事。“是岁，湖南大饥，民食草木实。”“知潭州事周行逢开仓以赈之，全活甚众。行逢起于微贱，知民间疾苦，励精为治，严而无私，辟署僚属，皆取廉介之士，约束简要，吏民便之。其自奉甚薄，或饥其太俭，行逢曰：‘马氏父子穷奢极靡，不恤百姓，今子孙乞食于人，又足效乎！’”（《资治通鉴》后周太祖显德元年）。

周世宗攻南唐，为了配合作战，诏以武平节度使王逵为南面行营都统，使攻唐之鄂州（治江夏，今湖北武汉市）。“逵引兵过岳州（治巴陵，今湖南岳阳县），岳州团练使潘叔嗣厚具燕犒，奉事甚谨，逵左右求取无厌，不满望者潘叔嗣于逵，云其谋叛，逵怒形于词色，叔嗣由是惧而不自安。”“潘叔嗣属将士而告之曰：‘吾事令公（王逵兼中书令，故称为令公）至矣，今乃信谗疑怒，必击我，吾不能坐而待死，汝辈能与汝西乎？’众愤怒，请行，叔嗣帅之西袭朗州。逵闻之，还军追之，及于武陵（常德）城外，与叔嗣战，

逵败死。”“或劝叔嗣遂据朗州，叔嗣曰：‘吾救死耳，安敢自尊，宜以督府（时湖湘以朗州为督府）归潭州太尉（谓周行逢），岂不以武安见处乎（谓行逢必将以潭州处己）！’乃归岳州。”行逢召叔嗣，叔嗣至潭州，行逢以叔嗣杀主帅之罪诛叔嗣，这样，周行逢取得了湖南地区的统治权。显德三年（公元九五六年）七月，周“以周行逢为武平节度使，制置武安、静江等军事。行逢既兼总湖湘，乃矫前人之弊，留心民事，悉除马氏横赋，贪吏猾民为民害者皆去之，择廉平吏为刺史、县令。朗州民夷杂居，刘言、王逵旧将多骄横，行逢一以法治之，无所宽假。”“行逢多计数，善发隐伏，将卒有谋乱及叛亡者，行逢必先觉，擒杀之，所部凛然。”“行逢媚唐德求补吏”，行逢“与之耕牛、农具而遣之”（《资治通鉴》后周世宗显德三年）。

宋太祖建隆三年（公元九六二年），周行逢病死，子保权嗣位，衡州刺史张文表举兵攻下潭州，保权乞师于宋，又命杨师璠将兵进攻文表。文表战败被执。宋师至朗州，保权举族入朝大梁，国除。刘言据湖南三年，王逵据湖南三年，周行逢、保权父子据湖南八年，至此地入于宋。

南汉刘氏的建国及其灭亡 刘谦，父安仁，彭城刘氏，世居上蔡（今河南上蔡县），其后徙居泉州之马铺。谦，唐懿宗咸通（公元八六 至八七三年）中，为广州牙将。故相韦宙出为岭南节度使，见谦气貌殊常，宙乃以兄女妻谦。谦后以军功拜封州（治封川，今广东苍梧县东南）刺史、贺江（贺水）镇遏使，有兵万人，战舰百艘。唐昭宗乾宁元年（公元八九四年）冬，谦病卒。岭南节度使刘崇龟召谦子隐，补右都押牙，兼贺水镇使，不久，又表为封州刺史。

刘崇龟病死，唐王朝以薛王知柔为清海军节度使（即岭南节度使）。乾宁三年（公元八九六年），知柔至湖南，“广州牙将卢瑑、谭弘玘据境拒之，使弘玘屯兵端州”（治高要，今广东市），刘隐自封州“夜入端州，斩弘玘，遂袭广州，斩瑑。具军容迎知柔入视事，知柔表隐为行军司马”（《资治通鉴》唐昭宗乾宁三年）。唐光化元年（公元八九八年）冬，“韶州（治曲江，今广州韶关市）刺史曾宪举兵攻广州，州将王瑰帅战舰应之，清海行军司马刘隐一战破之”（《资治通鉴》唐昭宗光化元年）。光化三年（公元九一年），薛王知柔病死，唐任故相徐彦若为清海节度使。天复元年（公元九一年），徐彦若病死，遣表荐行军司马刘隐权清海节度留后。天祐二年（公元九五年），刘隐遣使重赂朱温，朱温奏以刘隐为清海节度使。后梁开平四年（公元九一年），封南海王。

后梁朱温乾化元年（公元九一一年），刘隐病死，年三十八，由其弟节度副使刘岩权知节度留后。五月，梁以刘岩为清海节度使。时中原战乱，“中朝士人以岭外最远，可以避地，多游焉。唐世名臣谪死南方者，往往有子孙，或当时仕宦遭乱不得还者，皆客岭表。王定保、倪曙、刘濬、李衡、周杰、杨洞潜、赵光裔之徒，隐皆招礼之。定保容管巡官，曙唐太学博士，濬崇望之子，以避乱往；衡德裕之孙，唐右补阙，以奉使往。皆辟置幕府，待以宾客。”杰“唐司农少卿，以避乱往”，“洞潜初为邕管巡官，秩满客南海”（《新五代史·南汉世家》）。刘岩把中朝士人延置幕府，或出为刺史，刺史无武人。

刘岩求婚于楚，楚王马殷以女妻之，后梁贞明元年（公元九一五年），岩亲至长沙迎妇。是年，岩以钱鏐已封为吴越国王，而已求封为南越国王，梁帝不许，乃“谓僚属曰：‘今中国纷纷，孰为天子！安能梯航万里，远事

伪庭乎！’自是贡使遂绝”（《资治通鉴》后梁均王贞明元年）。

后梁贞明三年（公元九一七年）七月，刘岩即皇帝位于番禺，国号大越。贞明四年（公元九一八年）十一月，越主岩改国号曰汉，史称南汉。岩初名陟，后改名岩，后改名龚，又改名葵（音俨）。岩称帝之后，“广聚南海珠玕，西通黔蜀，得其珍玩，穷奢极侈，娱僭一方，与岭北诸藩岁时交聘”（《旧五代史·刘陟传》）。“长和（即南诏，唐末称大礼，后又改长和）骠信（国主）郑旻遣其布燮郑昭淳求婚于汉，汉主以女增城公主妻之”（《资治通鉴》后唐庄宗同光三年），加强了岭南和南诏之间的联系。

后梁贞明四年（公元九一八年），岩从兵部侍郎杨洞潜之请，始立学校，“置选部贡举，放进士、明经十余人，如唐故事，岁以为常”（《新五代史·南汉世家》）。

汉主岩“惟厚自奉养，广务华靡，末年起玉堂珠殿，饰以金翠碧羽，岭北行商，或至其国，皆召而示之，夸其壮丽。每对北人，自言家本咸秦，耻为蛮夷之主。又呼中国帝王为‘洛州刺史’，其妾自尊大，皆此类也”（《旧五代史·刘岩传》）。“末年尤猜忌，以士人多为子孙计，故专任宦官，由是其国中宦者大盛”（《资治通鉴》后晋高祖天福七年）。

后晋天福七年（公元九四二年），汉主岩病死，年五十四，庙号高祖，子玠嗣位。

天福八年（公元九四三年），汉主玠为其弟晟所杀，死时年二十四。晟立，尤忌诸弟，几年之间，把诸弟翦戮殆尽。又“遣巨舰指挥使暨彦贇以兵入海，掠商人金帛。作离宫游猎，故时刘氏有南宫、大明、昌华、甘泉、玩华、秀华、玉清、太微诸宫，凡数百，不可悉纪”（《新五代史·南汉世家》）。

后汉乾祐三年（公元九五 年），汉主晟“以宫人卢琼仙、黄琼芝为女侍中，朝服冠带，参决政事。”又“宦官林延遇等用事，外向专恣”（《十国春秋》）为杀戮，帝不复省。常夜饮大醉，以瓜置伶人尚玉楼项，拔剑斩之以试剑，因並斩其首。明日酒醒，复召玉楼侍饮，左右白已杀之，晟叹息而已”（《新五代史·南汉世家》）。

“南汉甘泉宫使林延遇，阴险多计数，南汉主倚信之，诛灭诸弟，皆延遇之谋也。”后周显德三年（公元九五六年）三月，延遇病卒，“国人相贺。延遇病甚，荐内给事龚澄枢自代，南汉主即日擢澄枢知承宣院及内侍省”（《资治通鉴》后周世宗显德三年）。

显德五年（公元九五八年）八月，南汉主晟病死，年三十九，子鋹嗣位，时年十七。“国事皆决于宦官玉清宫使龚澄枢及女侍中卢琼仙等，台省官备位而已”（《资治通鉴》后周世宗显德五年）。南汉主“以龚澄枢为左龙虎观军容使、内太师，军国之事，皆取决焉。凡群臣有才能及进士状头，或僧道可与谈者，皆先下蚕室，然后得进，亦有自宫以求进者，由是宦者近二万人。贵显用事之士，大抵皆宦者也，谓士人为门外人，不得预事，卒以此亡国”（《资治通鉴》后周世宗显德六年）。

宋太祖开宝三年（公元九七 年），发兵取南汉，四年（公元九七一年），南汉主鋹从龚澄枢等言，“尽焚其府库宫殿”，“以海舶十余，悉载珍宝、嫔御，将入海，宦官乐范窃其舟以逃归”（《新五代史·南汉世家》），鋹为宋军所俘，南汉亡。自唐天祐二年（公元九 五年）刘隐为岭南节度使，至宋开宝四年（公元九七一年）国灭，凡五主，六十七年而亡。

南平高氏的建国及其灭亡 高季兴，陕州硤石（今河南三门峡市东南）

人。本名季昌，避后唐庄宗祖父李国昌讳，改为季兴。幼为大梁富人李七郎家僮，梁太祖朱温收李七郎为养子，赐姓名朱友让，温见季兴，命友让收季兴为养子。后以战功，官宋州（治宋城，今河南商丘县）刺史。累迁颍州（治汝阴，今安徽阜阳市）防御使，朱温令复姓高氏。

唐末，朱温攻下江陵，荆南节度使赵匡明帅水军二万奔成都。天祐三年（公元九六年），以高季兴为荆南留后，镇江陵。梁太祖开平元年（公元九七年），以高季兴为荆南节度使。“荆南旧统八州（荆州治江陵，今湖北江陵县；归州治秭归，今湖北秭归县；硤州治夷陵，今湖北宜昌市；夔州治奉节，今四川奉节县；忠州治临江，今四川忠县；万州治南浦，今四川万县市；澧州治澧阳，今湖南澧县东南；朗州治武陵，今湖南常德市），乾符（公元八七四至八七九年）以来，寇乱相继，诸州皆为邻道所据，独余江陵。”季兴到官，“城邑残毁”，季兴“安集流散，民皆复业”（《资治通鉴》后梁太祖开平元年）。

“进士梁震，唐末登第，至是归蜀，过江陵”，高季兴爱其才识，留之，欲奏为判官。震耻之，欲去，恐及祸，乃曰：‘震素不慕荣宦，明公不以震为愚，必欲使之参谋议，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何必在幕府！’”季兴许之，“以为谋主，呼曰先辈”（《资治通鉴》后梁太祖开平二年）。

后梁乾化三年（公元九一三年），赐高季兴爵渤海王。时高季兴“造战舰五百艘，治城堑，缮器械，为攻守之具。招聚亡命，交通吴、蜀，朝廷浸不能制”（《资治通鉴》后梁均王乾化三年）。

后梁龙德元年（公元九二一年），高季兴以卒万人修江陵外郭。

后唐庄宗同光元年（公元九二三年），季兴闻后唐灭梁，“欲自入朝，梁震曰：‘唐有吞天下之志，严兵守险，犹恐不自保，况数千里入朝乎！且公朱氏旧将，安知彼不以仇敌相遇乎！’季兴不从。”遂入朝洛阳。“高季兴在洛阳，帝左右伶官求货无厌，季兴忿之。帝欲留季兴，郭崇韬谏曰：‘陛下新得天下，诸侯不过遣子弟将佐入贡，惟高季兴身自入朝，当褒赏以劝来者，乃羁留不遣，弃信亏义，沮四海之心，非计也。’乃遣之。季兴倍道而去，至许州（治长社，今河南许昌市），谓左右曰：‘此行有二失：来朝一失，纵我去一失。’过襄州，节度使孔勣留宴，中夜，斩关而去。”“至江陵，握梁震手曰：‘不用君言，几不免虎口。’又谓将佐曰：‘新朝（后唐）百战方得河南，乃对功臣举手云：‘吾于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则他人皆无功矣，其谁不解体！又荒于禽色，何能久长，吾无忧矣。’乃缮城积粟，招纳梁旧兵，为战守之备”（《资治通鉴》后唐庄宗同光元年）。

初，季兴入朝洛阳，后唐庄宗“待之甚厚，从容问曰：‘朕欲用兵于吴蜀，二国何先？’季兴以蜀道险难取，乃对曰：‘吴地薄民贫，克之无益，不如先伐蜀。蜀土富饶，又主荒民怨，伐之必克。克蜀之后，顺流而下，取吴如反掌耳。’”（《资治通鉴》后唐庄宗同光元年）。及庄宗命郭崇韬灭蜀，“高季兴闻蜀亡，方食，失匕箸，曰：‘是老夫之过也。’梁震曰：‘不足忧也。唐主得蜀益骄，亡无日矣，安不知其为吾福。’”（《资治通鉴》后唐庄宗同光三年）。后唐庄宗封高季兴为南平王。

高季兴闻后唐庄宗被杀，益重梁震。梁震荐孙光宪于高季兴，“使掌书记。季兴大治战舰，欲攻楚（马殷），光宪谏曰：‘荆南乱离之后，赖公休息士民，始有生意，若又与楚国交恶，他国乘我之弊，良可忧也。’季兴乃止”（《资治通鉴》后唐明宗天成元年）。

蜀亡，高季兴表求把夔、忠、万三州拨归荆南，为其巡属，并请三州刺史不由朝廷除授，由其子弟担任刺史，并趁夔州刺史潘炕罢官，季兴袭占夔州。后唐庄宗子“魏王继岌遣押牙韩珙等部送蜀珍货金帛四十万，浮江而下，季兴杀珙等于〔西陵〕峡口，尽掠取之。朝廷诘之，对曰：‘珙等舟行下峡，涉数千里，欲知覆溺之故，自宜按问水神。’”后唐明宗大怒，命将率步骑四万进讨季兴，并命蜀兵沿江东下，蜀军取下夔、忠、万三州，高季兴只得保有荆、峡、归三州。唐军进攻江陵，“江陵卑湿，复值久雨，粮道不继，将士疾疫”（《资治通鉴》后唐明宗天成二年）。明宗也只得撤回军队，停止围攻。

天成三年（公元九二八年）十二月，高季兴病死，年七十一，子从诲嗣位为荆南节度使，南平王。

从诲“性明达，亲礼贤士，委任梁震，以兄事之，震常谓从诲为郎君。楚王〔马〕希范好奢靡，游谈者共夸其盛。从诲谓僚佐曰：‘如马王可谓大丈夫矣。’孙光宪对曰：‘天子诸侯，礼有等差。彼乳臭子骄侈僭怙，取快一时，不为远虑，危亡无日，又足慕乎！’从诲久而悟，曰：‘公言是也。’他日谓梁震曰：‘吾自念平生奉养，固已过矣。’乃捐去玩好，以经史自娱，省刑薄赋，境内以安。梁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属我。今嗣王能自立，不坠其业，吾老矣，不复事人矣。’遂固请退居。从诲不能留，乃为之筑室于土洲”。震“自称荆台隐士，每诣府，跨黄牛至听事。从诲时过其家，四时赐与甚厚。自是悉以政事属孙光宪”（《资治通鉴》后唐潞王清泰二年）。“荆南介居湖南、岭南、福建之间，地狭兵弱，自武信王季兴时，诸道入贡过其境者，多掠夺其货币。及诸道移书诘让，或加以兵，不得已复归之，曾不为愧。及从诲立，晋、唐、契丹、汉更据中原，南汉、闽、吴、蜀皆称帝，从诲利其赐予，所向称臣。诸国贱之，谓之高无赖”（《资治通鉴》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

后汉乾祐元年（公元九四八年），荆南节度使、南平王高从诲病死，年五十八，子保融嗣位。保融，从诲第三子。

“保融性迂缓，无材能，而事无大小，皆委其弟保勳”（《新五代史·南平世家》）。宋建隆元年（公元九六〇年）保融病死，年四十一。弟保勳嗣位为荆南节度使。宋建隆三年（公元九六二年），保勳病死，年三十九，以保融子继冲嗣位。

宋建隆四年（公元九六三年），宋太祖赵匡胤命大将慕容延钊出兵取湖南，假道荆南，孙光宪“因劝继冲去斥候，封府库以待。”“延钊军至，继冲出逆于郊，而前锋遽入其城。继冲亟归，见旌旗甲马，布列衢巷，大惧，即诣延钊纳牌印，太祖优诏复命继冲为节度使”（《新五代史·南平世家》）。

宋乾德元年（公元九六三年）九月，继冲率其将吏宗族五百余人朝于京师，国除。自梁开平元年（公元九〇七年），高季兴为荆南节度使，至宋乾德元年（公元九六三年）国除，凡传五主，五十七年而灭。

前蜀王建的称帝及前蜀的灭亡 王建取得东西川和山南西道，又略取了荆南的夔、施、忠、万四州，势力全盛。“西川诸将劝王建乘李茂贞之衰，攻取凤翔。建以问节度判官冯涓，涓曰：‘兵者凶器，残民耗财，不可穷也。今梁（朱温）晋（李克用）虎争，势不两立，若并而为一，举兵向蜀，虽诸葛亮复生，不能敌矣。凤翔，蜀之藩蔽，不若与之和亲，结为婚姻，无事则务农训兵，保固疆场，有事则观其机事，观衅而动，可以万全。’建曰：‘善！’

茂贞虽庸才，然有强悍之名，远近畏之，与全忠（朱温）力争则不足，自守则有余，使为吾藩蔽，所利多矣。’乃与茂贞修好。”建以女妻茂贞侄继勋，“茂贞数求货及甲兵于建，建皆与之。王建赋敛重，人莫敢言。冯涓因建生日献颂，先美功德，后言生民之苦。建愧谢曰：‘如君忠谏，功业何忧！’赐之金帛。自是赋敛稍损”（《资治通鉴》唐昭宗天祐元年）。

唐亡，梁开平元年（公元九〇七年）九月，王建用安抚副使掌书记韦庄之谋，于成都即大蜀皇帝位，明年改元武成，以韦庄为左散骑常侍、判中书门下事。王建“虽目不知书，好与书生谈论”。“是时唐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蜀主礼而用之，使修举故事，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资治通鉴》后梁太祖开平元年）。后梁太祖开平二年（公元九〇八年）正月，蜀以韦庄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冬十月，“蜀主讲武于星宿山，步骑三十万”（《资治通鉴》后梁太祖开平二年）。王“建谓左右曰：‘吾为神策军将时，宿卫禁中，见天子夜召学士，出入无间，恩礼亲厚如寮友，非将相比也。’”故建待翰林学士等恩礼尤异，其余唐名臣世族之后“百余人，并见信用”（《新五代史·前蜀世家》）。

“唐末宦官典兵者多养军中壮士为子以自强，由是诸将亦效之，而蜀主（王建）尤多”，惟卫王宗仁（建长子）、遂王元膺（建次子）、懿王宗轸（建三子）、赵王宗纪（建四子）、韩王宗智（建五子）、宋王宗泽（建六子）、鲁王宗鼎（建七子）、信王宗杰（建八子）、薛王宗平（建九子）、莒王宗特（建十子），后主衍（第十一子），皆王建亲生之子，其余如王宗鑑，王建从子。王宗寿、王宗裕皆王建族子，王宗翰姓孟，王建姊子，王宗范姓张，其母周氏为蜀主妾，“自余假子百二十人，皆功臣，虽冒姓连名而不禁婚姻”（《资治通鉴》后梁太祖开平四年）。

后梁乾化三年（公元九一三年）七月七夕，蜀太子元膺杀少保唐道袭，蜀主发兵讨为乱者徐瑶、常谦并杀太子，于是立幼子宗衍为太子，宗衍母徐贤妃有宠，故超次立为太子，王建命太子判六军，开天策府，置僚属。

后梁贞明元年（公元九一五年），蜀岐会战，蜀攻下秦（州治成纪，今甘肃秦安县西北）、凤（州治梁泉，今陕西凤县西北）、成（州治上禄，今甘肃礼县南）、階（州治皋兰镇，今甘肃武都县东）四州，把兵锋一直推到大散关险隘。这是前蜀的最大版图了。

王建从梁贞明二年（公元九一六年）以来，“得疾，昏瞽”，至贞明四年（公元九一八年），疾病大重。前蜀“内飞龙使唐文宸久典禁兵，参预机密，欲去诸大臣。”马步都指挥使王宗弼等三十余人日至朝堂，“不得入见。文宸屡以蜀主之命慰抚之，伺蜀主殂（死），即作难。”“宗弼等排闥入，言文宸之罪。”蜀主“召太子入侍疾”，杀唐文宸及翰林学士承旨王保晦，保晦，附会文宸者。以宦官宋光嗣为内枢密使，与王宗弼并受遗辅政。“蜀主虽因唐制置枢密使，专用士人，及唐文宸得罪，蜀主以诸将多许州故人，恐其不为幼主用，故以光嗣代之，自是宦者始用事”（《资治通鉴》后梁均王贞明四年）。

王建不问儿子的贤愚，立幼子为太子和安排由宦官担任枢密，得使宦官擅权，成为前蜀亡国的两大因素。

贞明四年六月，王建病死，太子衍即皇帝位。以内枢密使宋光嗣判六军诸卫事，宿卫兵的指挥权也交给宋光嗣，宋光嗣的权力更大了。是时王宗弼“为六军使，总外任”，宋光嗣“为枢密使，总内任”（《旧五代史·王衍

传》)。“宗弼纳贿多私，上下咨怨”。宋光嗣希旨迎合，蜀政衰乱。“蜀主奢纵无度，日与太后、太妃游宴于贵臣之家，及游近郡名山，饮酒赋诗，所费不可胜纪。仗内教坊使严旭强取士民女子内宫中”，“以是累迁至蓬州（治大寅，今四川仪陇县南）刺史。太后、太妃各出教令卖刺史、令（县令）、录（录事参军）等官，每一官阙，数人争纳赂，赂多者得之”（《资治通鉴》后梁均王贞明五年）。

蜀主衍“以礼部尚书兼成都尹长安韩昭为文思殿大学士，位在翰林承旨上。昭无文学，以便佞得幸，出入宫禁。就蜀主乞通（州治通川，今四川达县）、渠（州治流江，今四川渠县）、巴（州治化城，今四川巴中县）、集（州治难江，今四川南江县）数州刺史卖之，以营居第，蜀主许之。识者知蜀之将亡”（《资治通鉴》后梁均王贞明六年）。

后梁贞明六年（公元九二二年）闰七月，“蜀主下诏北巡”。八月，蜀主发成都，“被金甲，冠珠帽，执弓矢而行，旌旗兵甲，亘百余里。”十二月，“蜀主至利州”（治绵谷，今四川广元县），“泛江（嘉陵江）而下，龙舟画舸，辉映江渚，州县供办，民始愁怨。”“至阆州（治阆中，今四川阆中县），州民何康女色美，将嫁，蜀主取之，赐其夫家帛百匹，夫一恟而卒”（《资治通鉴》后梁均王贞明六年）。又至梓州（治郪县，今四川三台县），由梓州返成都。

“蜀主常列锦步障，击球其中，往往远适而外人不知。爇诸香，昼夜不绝。”“结缯为山，及宫殿楼观于其上，或为风雨所败，则更以新者易之”。“山前穿渠通禁中，或乘船夜归，令宫女秉蜡炬千余居前船，却立照之，水面如画”（《资治通鉴》后梁均王龙德元年）。“蜀主好为微行，酒肆、娼家，靡所不到，恶人识之，乃下令士民皆著大裁帽”（《资治通鉴》后梁均王龙德二年）。

“蜀主以文思殿大学士韩昭、内皇城使潘在迎、武勇军使顾在珣为狎客，陪侍游宴，与宫女杂坐，或为艳歌相唱和，或谈嘲谑浪，鄙俚褻慢，无所不至。”“时枢密使宋光嗣等专断国事，恣为威虐，务徇蜀主之欲以盗其权。宰相王锴、庾传素等各保宠禄，无敢规正”（《资治通鉴》后唐庄宗同光元年）。

后唐同光二年（公元九二四年）三月，“蜀主宴近臣于怡神亭，酒酣，君臣及宫人皆脱冠露髻，喧譁自恣。知制诰京兆李龟祜谏曰：‘君臣沉湎，不忧国政，臣恐启北敌之谋。’不听”（《资治通鉴》后唐同光二年）。

在前蜀，阶级矛盾已经非常尖锐，前蜀的统治阶级为了巩固统治，曾使用一套严密的特务政治，来镇压人民。《太平广记》卷一二六引《王氏见闻》云：“伪蜀有寻事团，亦曰中团，小院使萧怀武主之，盖军巡之职也。怀武自所团捕捉贼盗，多年，官位甚隆，积金巨万，第宅亚于王侯，声色妓乐，为一时之冠。所管中团百余人，每人各养私名十余辈，或聚或散，人莫能别，号之曰狗。至于深坊僻巷，马医酒保，乞丐佣作，及贩卖童儿辈，并是其狗。民间有偶语者，官中罔不知。又有散在州郡及勋贵家当庖看，御车执乐者，皆是其狗。公私动静，无不立达于怀武，是以人怀恐惧，常疑其肘臂腹心，皆是其狗也。怀武杀人不知其数。”尽管特务组织这样严密，由于前蜀政治腐败，人心涣散，还是无法挽救它的危亡。

后唐同光二年，庄宗“遣客省使李严使于蜀”，“李严还，初，帝因严入蜀，令以马市宫中珍玩，而蜀法禁锦绮珍奇不得入中国（指中原），其粗

恶者乃听入中国（中原），谓之‘入草物。’严还，以闻，帝怒曰：‘王衍宁免为入草之人乎！’严因言于帝曰：‘衍童騃荒纵，不亲政务，斥远故老，昵比小人。其用事之人王宗弼、宋光嗣等，谄谀专恣，黠货无厌，贤愚易位，刑赏紊乱，君臣上下专以奢淫相尚。以臣观之，大兵一临，瓦解土崩，可翘足而待也’”（《资治通鉴》后唐庄宗同光二年）。庄宗听了李严的报告，决定对前蜀用兵。

“蜀宣徽北院使王承休（宦官）请择诸军骁勇者万二千人，置驾下左右龙武步骑四十军，兵械给赐皆优异于他军，以承休为龙武军马步都指挥使，以裨将安重霸副之。”重霸“以狡佞贿赂事承休，故承休悦之”（《资治通鉴》后唐庄宗同光二年）。

唐末“僖、昭之世，宦官虽盛，未尝有建节者。蜀安重霸劝王承休求秦州节度使，承休言于蜀主曰：‘秦州多美妇人，请为陛下采择以献。’蜀主许之。”乃以承休为秦州节度使，“封鲁国公，以龙武军为承休牙兵”（《资治通鉴》后唐庄宗同光二年）。

同光三年（公元九二五年），后唐庄宗决定伐蜀，以魏王继岌为伐蜀都统，以郭崇韬为东北面行营都招讨制置等使，军事一委崇韬，将兵六万伐蜀。

“安重霸劝王承休请蜀主东游秦州。承休到官，即毁府署，作行宫，大兴力役，强取民间女子教歌舞”。“又献花木图，盛称秦州山川土风之美。蜀主将如秦州，群臣谏者甚众，皆不听。”“王承休妻严氏美，蜀主私焉，故锐意欲行。”冬十月，“蜀主引兵数万发成都”，“至汉州（治雒县，今四川广汉县）。武兴节度使（镇凤州梁泉，今陕西凤县西北）王承捷告唐兵西上，蜀主以为群臣同谋己，犹不信。”“在道与群臣赋诗，殊不为意。”唐军“倍道趣凤州”，“王承捷以凤、兴、文、扶四州印节降，得兵八千，粮四十万斛。”“蜀主至利州”（治绵谷，今四川广元县），“始信唐兵之来”（《资治通鉴》后唐庄宗同光三年）。十一月，蜀主赶回成都，时前蜀方镇相继降唐，王宗弼也放弃利州逃回成都。唐军前锋直抵汉州，王宗弼劫迁蜀主及太后、诸王于西宫，杀内枢密使宋光嗣、文思殿大学士韩昭等以悦唐。魏王继岌大军入成都，凡七十日而唐军取蜀，前蜀自唐昭宗大顺二年（公元八九一年），王建取蜀，至后唐庄宗同光三年（公元九二五年）蜀亡，凡传二主，三十五年而亡。

后唐同光四年（公元九二六年，是年四月改元天成）正月，后唐魏王继岌遣李继、李严部送王衍及其宗族百官数千人诣洛阳。二月，王衍一行至长安，有诏住长安，不使至洛阳。三月，后唐庄宗从伶官宦官等言，“王衍族党不少”，“恐其为变，不若除之”。庄宗“乃遣中使向延嗣赍敕往诛之，敕曰：‘王衍一行，并从杀戮。’己印画（印者，用中书印；画者，画可。敕文又用御玺），枢密使张居翰覆视，就殿柱揩去‘行’字，改为‘家’字，由是蜀百官及衍仆役获免者千余人。延嗣至长安，尽杀衍宗族于秦川驿”（《资治通鉴》后唐明宗天成元年）。

前蜀亡，同年，后唐庄宗亦亡国。不久孟知祥得蜀，建立后蜀。

**后蜀孟氏的建国及其衰亡** 后蜀主孟知祥，邢州龙冈（今河北邢台市）人，祖察，父道，世为郡校。伯父方立，终于邢洛节度使，从父迁，位至泽潞节度使。知祥留居太原，晋王李克用以弟李克让之女妻知祥。知祥妹，嫁李克用幼弟李克宁为妻。故孟知祥为李存勖所信任。庄宗统一中原，以太原为北京，由孟知祥出任太原尹、北京留守。

孟知祥曾推荐郭崇韬当机要官。因此郭崇韬非常感激他，郭崇韬率兵伐蜀，临行，对庄宗说，蜀平，如果选择西川节度使人选，没有比孟知祥更合适了。同光三年（公元九二五年），前蜀平，庄宗任命孟知祥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这一年，孟知祥年五十二岁。

知祥接到新的任命，驰至洛阳，庄宗对这位堂姊夫，是非常亲密的，“戒有司盛供帐，多出内府珍奇诸物以宴劳之。酒酣，语及平生，以为笑乐，叹曰：‘继岌前日乳臭儿尔，乃能为吾平定两川，吾徒老矣，孺子可喜，然益令人悲尔！吾忆先帝弃世时，疆土侵削，仅保一隅，岂知今日奄有天下，九州四海，珍奇异产，充物吾府。’因指以示知祥曰：‘吾闻蜀土之富，无异于此，以卿亲贤，故以相付’”（《新五代史·后蜀世家》）。这一次是两人（后唐庄宗、后蜀高祖）的最后诀别，李存勖、孟知祥郎舅之间，可以推心置腹的亲密关系，也充分地表示了出来。

同光四年（即天成元年，公元九二六年）正月，孟知祥赶到成都，郭崇韬已被杀害了，庄宗急于叫魏王继岌把入蜀军带回到洛阳去，稳定动荡的政局。史称：“孟知祥至成都，时新杀郭崇韬，人情未安，知祥慰抚吏民，犒赐将卒，去留帖然”（《资治通鉴》后唐明宗天成元年），显出了孟知祥的才干来。同年四月，庄宗在洛阳被杀，魏王继岌在渭南被害，明宗入立为帝，时局变化得那么快，孟“知祥乃训练兵甲，阴有王蜀之志”（《新五代史·后蜀世家》）。“阅库中，得铠甲二十万，置左右牙等兵十六营。凡万六千人，营于牙城内外”。又云：“初，郭崇韬以蜀骑分左右骁卫等六营，凡三千人；步兵分左右宁远等二十营，凡二万四千人。”后来孟知祥又“增置左右冲山等六营，凡六千人，营于罗城内外；又置义宁等二十营，分戍管内州县就食又置左右牢城四营，凡四千人，分戍成都境内”。孟知祥又“置左右飞棹营，凡六千人，分戍滨江诸州，习水战以备夔峡”（《资治通鉴》后唐明宗天成元年）。

唐明宗取得政权之后，财政拮据。知平蜀时，尚有犒赏钱二百万缗，遣盐铁判官、太仆卿赵季良前往提取，同时转运州县租税，输往洛阳。孟知祥表示：“府库他人所聚（即指二百万缗），输之可也。州县租税，以贍镇兵十万，决不可得”（《资治通鉴》后唐明宗天成元年）。孟知祥和赵季良本来是故旧，以后就把赵季良留在西川，从此成为他的佐命功臣。

后唐明宗的亲信安重诲以孟知祥据西川，董璋据东川，“皆据险要，拥强兵，恐久而难制”，“阴欲图之”。乃“以李严为西川都监”（监军），“朱弘昭为东川节度副使”（《资治通鉴》后唐明宗天成元年）。“孟知祥闻李严来监其军，恶之；或请奏知之，知祥曰：‘何必然，吾有以待之。’遣吏至绵（州治巴西，今四川绵阳县东北）、剑（州治普安，今四川剑阁县）迎候。”李严抵达成都，“孟知祥礼遇李严甚厚，一日谒知祥，知祥谓曰：‘公前奉使王衍，归而请兵伐蜀，庄宗用公言，遂致两国俱亡（谓前蜀灭，后唐亦以空国伐蜀，根本虚而致国亡）。今公复来，蜀人惧矣。且天下皆废监军，公独来监吾军，何也？’严惶怖求哀，知祥曰：‘众怒不可遏也。’遂揖下，斩之。”“因诬奏：‘严诈宣口敕，云代臣赴阙，又擅许将士优赏，臣辄已诛之。’”“朱弘昭在东川，闻之，亦惧，谋归洛；曾有军事，董璋使之入奏，弘昭伪辞然后行，由是得免”（《资治通鉴》后唐明宗天成二年）。

孟知祥镇蜀，遣使迎其家属，天成二年（公元九二七年），知祥妻琼华长公主及其子昶至成都。

天成二年十二月，孟知祥发民丁二十万修成都城。

西川孟知祥屡与东川董璋争监利，董“璋诱商旅贩东川监入西川，知祥患之，乃于汉州（治雒县，今四川广汉县）置三场重征之，岁得钱七万缗，商旅不复之东川”（《资治通鉴》后唐明宗天成三年）。

后唐明宗将祀南郊，令西川献钱一百万缗，东川五十万缗；皆辞以军用不足，西川献五十万缗，东川献十万缗”（《资治通鉴》后唐明宗天成四年）。“安重诲疑知祥有异志”，“用己所亲信分守两川管内诸州。每除守将，则以精兵为其牙队，多者二三千，少者不下五百人，以备缓急。是岁（天成四年），以夏鲁奇为武信军节度使（镇遂州方义，今四川遂宁县）；分东川之阆州（治阆中，今四川阆中县）为保宁军，以李仁矩为节度使；又以武虔裕为绵州（治巴西，今四川绵阳县）刺史。仁矩与东川董璋有隙，而虔裕，重诲表兄，由是璋与知祥皆惧，以为唐将致讨。自璋镇东川，未尝与知祥通问，于是璋始遣人求婚以自结”（《新五代史·后蜀世家》），知祥派赵季良至东川修好，合谋并力以拒朝廷。长兴元年（公元九三一年），“孟知祥、董璋同上表言：‘两川闻朝廷于阆中建节，绵、遂益兵，无不忧恐。’”明宗下诏书慰谕，东西川见没有停止增兵的希望，只有积极备战了。“秋七月，两川以朝廷继遣兵屯遂、阆，复有论奏，自是东北商旅少敢入蜀。”（《资治通鉴》后唐明宗长兴元年）。

“董璋之子光业为宫苑使，在洛阳，璋与书曰：‘朝廷割吾支郡为节镇，屯兵三千，是杀我必矣。汝见枢要为我言，如朝廷更发一骑入斜谷，吾必反！与汝诀矣。’光业以书示枢密承旨李虔徽”，“虔徽以告安重诲，从诲不从。璋闻之，遂反。”孟知祥亦“遣使约董璋同举兵”。董璋会孟知祥兵攻阆州，孟知祥也出兵进攻遂州，不久，东西川兵攻下阆州，杀节度使李仁矩。长兴二年（公元九三一年）正月，西川兵攻陷遂州，杀节度使夏鲁奇。后唐明宗派爱靖石敬瑭为东川行营都招讨使，入大散关，攻克剑门。孟知祥听说剑门失守，调动了一万五千人去夺回剑门，又调遣了四千人去防守龙州（治江油，今四川平武县东南），以防唐兵沿邓艾故道进兵袭击。两川经过苦战，终于夺回剑门，在利州（治绵谷，四川广元县）一带相持。石敬瑭知两川一时不可攻下，“使者自军前来，多言道险狭，进兵甚难，关右之人，疲于转饷，往往窜匿山谷，聚为盗贼。”石敬瑭乃“累表奏论，以为蜀不可伐”（《资治通鉴》后唐明宗长兴元年）。于是撤兵停止伐蜀。

孟知祥乘战胜之威，在长江沿岸攻陷了夔、忠、万三州，又大败东川兵，杀董璋，兼并了东川。长兴四年（公元九三三年），孟知祥为东西川节度使、蜀王。后唐潞王清泰元年（公元九三四年）四月，中原战乱，山南西道节度使（镇南郑，今陕西汉中市）张虔钊、武定节度使（镇洋州西乡，今陕西西乡县）孙汉韶举两镇之地，降于孟知祥，大散关以南之地，也不久收复，孟昶即位初年，又取得秦、成、阶、凤四州之地，从此后蜀的版图和前蜀的全盛时期几乎相同了。

后唐清泰元年（公元九三四年）正月，蜀王孟知祥在成都即皇帝位。以赵季良为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以王处回为枢密使。知祥得风疾踰年，至是增剧。六月，立子昶为太子。同月知祥死，年六十一，庙号高祖。太子即位，年十六。

蜀大将李仁罕，屡立战功，蜀主死，赵季良教枢密使“王处回见李仁罕，审其词旨，然后告之。处回至仁罕第，仁罕设备而出，遂不以实告。”孟昶

即位之后，“李仁罕自恃宿将有功，复受顾托，求判六军”，“蜀主不得已”，“加仁罕兼中书令，判六军事。”蜀主左右近臣“素怨李仁罕，共譖之，云仁罕有异志”，蜀主“因仁罕入朝，命武士执而杀之”（《资治通鉴》后唐潞王清泰元年）。

蜀自建国以来，大臣多领节度使，身留成都，“委僚佐知留务，专事聚敛，政事不治，民无所诉。蜀主知其弊”（《资治通鉴》后晋高祖天福六年），罢免赵廷隐兼领的武德节度使（即东川节度使），罢免王处回的武信节度使（镇遂州方义，今四川遂宁县），罢免张公铎的保宁节度使（镇阆州阆中，今四川阆中县）等兼职。另选专人，使之知节度事。到了后晋开运元年（公元九四四年），后蜀又以将相遥领节度使。

李仁罕外甥张业为后蜀司空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兼判度支。“性豪侈，强市人田宅，藏匿亡命，于私第置狱，系负债者或历年，至有瘐死者”（囚徒病，律名为瘐）。昶与奉圣控鹤指挥使安思谦谋，执而杀之。“籍没其家。枢密使王处回亦专权贪纵，卖官鬻狱，四方馈献，皆先输处回，次及内府，家货巨万。”“张业既死，蜀主不忍杀处回，听归私第。”“蜀主欲以普丰库使高延昭、茶酒库使王昭远为枢密使，以其名位素轻，乃授通奏使，知枢密院事。昭远，成都人，幼以僧童从其师入府，蜀高祖（孟知祥）爱其敏慧，令给事蜀主左右，至是，委以机务，府库金帛，恣其取与，不复会计”（《资治通鉴》后汉高祖乾祐元年）。

安思谦谋尽去旧将，又譖卫圣都指挥使兼中书令赵廷隐谋反，夜，发兵围其第。会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廷珪入朝，极言廷隐无罪，乃得免。廷隐因称疾，固请解军职”，“蜀主许之”。蜀主以赵廷隐为太傅，赐爵宋王”，就第慰问。“王处回请老，以太子太傅致仕。”“蜀主以张业、王处回执政，事多壅蔽”，“始置匭函，后改为献纳函”（《资治通鉴》后汉高祖乾祐元年）。

后周广顺元年（公元九五一年），蜀通奏使高延昭固辞知枢密院，蜀主昶乃以伊审徵为通奏使，知枢密院事。审徵，蜀高祖妹褒国公主之子也。少与蜀主相亲狎，及知枢密，政之大小，悉以咨之。审徵亦以经济为己任，而贪侈回邪，与王昭远相表里，蜀政由是浸衰”（《资治通鉴》后周太祖广顺元年）。

蜀左匡圣马步都指挥使“安思谦譖杀张业，废赵廷隐，蜀人皆恶之”；蜀主使安思谦将兵救凤翔节度使王景崇，“思谦逗挠无功”。“自张业之诛，宫门守卫加严，思谦以为疑己，言多不逊。思谦典宿卫，多杀士卒以立威。蜀主阅卫士，有年尚壮而为思谦所斥者，复留隶籍，思谦杀之，蜀主不能平。思谦三子，宸、嗣、裔，倚父势暴横，为国人患。翰林院王藻屡言思谦怨望，将反。”“思谦入朝，蜀主命壮士击杀之，及其三子。藻亦坐擅启边奏，并诛之”（《资治通鉴》后周太祖显德元年）。

后周在对淮南用兵之前，先用兵秦陇，取得后蜀的秦、凤、成、阶四州。蜀人多言左右卫圣马步指挥使“李廷珪为将败覆，不应复典兵；廷珪亦自请罢去”。“蜀主罢去其军职。李太后（孟昶生母）以典兵者多非其人，谓蜀主曰：“吾昔见庄宗跨河与梁战（李太后本庄宗宫人），及先帝在太原，平二蜀，诸将非有大功，无得典兵，故士卒畏服。今王昭远出于厮养（僧童），伊审徵、韩保贞、赵崇韬（赵廷隐子）皆膏粱乳臭子，素不习兵，徒以旧恩置于人上，平时谁敢言者，一旦疆场有事，安能御大敌乎！以吾观之，唯高

彦侁太原旧人，终不负汝，自余无足任者。’蜀主不能从”（《资治通鉴》后周世宗显德四年）。

“蜀右补阙章九龄见蜀主，言政事不治，由奸佞在朝。蜀主问奸佞为谁，指李昊、王昭远以对。蜀主怒，以九龄为毁斥大臣，贬维州（治薛城，今四川理县东北）录事参军”（《资治通鉴》后周世宗显德五年）。

后周显德五年（公元九五八年），蜀主闻周世宗谋将伐蜀，动员了六万兵士，分屯要害，准备抵抗。宋太祖在乾德元年（公元九六三年）取得湖南、荆南之后，便积极准备进兵后蜀。

宋太祖乾德二年（公元九六四年），蜀知枢密院事王昭远说蜀主和北汉通好，令发兵南下，蜀兵自子午谷北上，共同攻宋，蜀给北汉的蜡丸帛书为宋所获。宋主曰：“吾西讨有名矣。”乃发步骑六万，分路进兵。蜀主任王昭远为西南行营都统，率兵拒战，“昭远手执铁如意，指挥军事，自比诸葛亮，酒酣，谓〔李〕昊曰：‘吾之是行，何止克敌，当领此二三万雕面恶少儿，取中原如反掌尔！’”蜀主“昶又遣太子玄喆率精兵数万守剑门。玄喆辇其爱姬，携乐器伶人数十以从，蜀人见者皆窃笑”（《新五代史·后蜀世家》）。宋军在大将王全斌的统帅下，连续攻下兴州（治顺政，今陕西略阳县）、利州（治绵谷，今四川广元县），蜀军焚吉柏江浮桥（今四川广元县西南），退守剑门，不久剑门失守，蜀军损折万余人，太子玄喆逃归成都，王昭远被俘擒。宋南路的水军，也攻下夔门。蜀兵所在奔溃，将帅多被擒获。孟昶知道亡势已成，“叹曰：‘吾与先君以温衣美食养士四十年，一旦临敌，不能为吾东向放一箭，虽欲坚壁，谁与吾守者邪！’”乃命草降表降于宋。王全斌杀蜀降兵于成都夹城，凡二万七千人，这是一次惊人的屠杀事件。

孟昶在乾德三年五月，到达大梁，六月病卒。自后唐同光三年（公元九二五年）孟知祥据蜀，至宋乾德三年（公元九六五年）蜀灭，传二主，凡四十一年。

**北汉刘氏的建国及其灭亡** 北汉主刘崇，是汉主刘知远的亲弟弟。刘知远镇太原，以刘崇为马步都指挥使。刘知远南下，驱契丹，取大梁，以刘崇为太原尹、北京留守。刘知远病死，隐帝嗣位，政治权力实际掌握在史弘肇和郭威等权臣手中，而刘崇和郭威之间，矛盾却非常尖锐，刘崇“为自全计”，多“选募勇士，招纳亡命，缮甲兵，实府库，罢上供财赋，皆以备契丹为名：朝廷诏令，多不禀承”（《资治通鉴》后汉高祖乾祐元年）。

隐帝遇害，郭威立崇子贇为帝，未即位，郭威又害贇。刘崇乃在晋阳即皇帝位，史称北汉。崇谓代州防御使李存瑰、马步军都指挥使张元徽曰：“朕以高祖（刘知远）之业一朝坠地，今日位号，不得已而称之；顾我是何天子！汝曹是何节度使邪！”由是“宰相月俸止百缗，节度使止三十缗，自余薄有资给而已”（《资治通鉴》后周太祖广顺元年）。

后周广顺元年（公元九五一年），北汉拨步骑万人，和契丹联军进攻晋州（治临汾，今山西临汾县），结果死伤甚众，久攻不下，只得退走。“北汉土瘠民贫，内供军国，外奉契丹，赋繁役重，民不聊生”（《资治通鉴》后周太祖广顺元年）。

显德元年（公元九五四年），郭威病死，北汉主自将兵三万，契丹大将杨兖率骑一万，过潞州，军于高平（今山西高平县）之南，与周世宗接战，周军先败后胜，北汉伤亡惨重，退守太原。后周进兵太原，周世宗亲至晋阳城下。会久雨，士卒疫病，遂引军还。

北汉主崇于显德元年十一月病死，年六十。谥曰神武皇帝，庙号世祖。子承钧嗣位，是为孝和帝。承钧“勤于为政，爱民礼士，境内粗安”（《资治通鉴》后周太祖显德元年）。承钧上表于契丹主称男，契丹主赐之诏，谓之“儿皇帝”。

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九六一年），昭义节度使（镇潞州上党，今山西长治市）李筠不肯臣宋，结北汉主同举兵，泽州（治晋城，今山西晋城县）会战，李筠败死，承钧全军返回晋阳。

北汉“地狭产薄，以岁输契丹〔金币〕，故国用日削，乃拜五台山僧继顒为鸿胪卿。继顒，故燕王刘守光之子，守光之死，以孽子得不杀，削发为浮图，后居五台山。为人多智，善商财利。”“继顒能讲《华严经》，四方供施，多积蓄以佐国用。五台当契丹界上，继顒常得其马以献，号添都马，岁率数百匹。又于柏谷置银冶，募民凿山取矿，烹银以输，刘氏仰以足用”（《新五代史·东汉世家》）。

宋太祖赵匡胤“尝因界上谍者谓承钧曰：‘君家与周氏（后周）为世讎，今我与尔无所间，何为困此一方之人也？若有志于中国（指中原），宜下太行以决胜负。’承钧遣谍者复命曰：‘河东土地兵甲，不足以当中国之什一，然承钧家世非叛者，区区守此，盖惧汉氏之不血食也。’太祖哀其言，笑谓谍者曰：‘为我语承钧，开尔一路以为生。’故终其世不加兵”（《新五代史·东汉世家》）。

宋开宝元年（公元九六八年）七月，北汉主承钧病死，养子（外甥）继恩嗣位。九月，继恩为其左右所杀，迎立其弟继元（亦承钧外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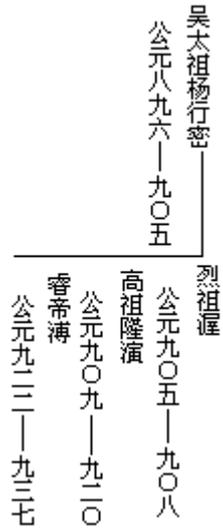
开宝二年（公元九六九年）三月，宋太祖亲率大军围攻太原，决晋祠水灌城。闰五月，太原南城又为汾水所陷，“水穿外城，注城中，城中大惊扰。”“水口渐阔”，“俄有积草自城中飘出，直抵水口而止”，“北汉人因以施功，水口遂塞”。时宋军“顿甘草地中，会暑雨，多被腹病”。于是议班师。“北汉主籍所弃军储，得粟三十万，茶、绢各数万，丧败罄竭，赖此少济”（《续资治通鉴》宋太祖开宝二年）。

六月，北汉主“决城下水注之台骀泽，水已落而城多摧圮。契丹使者韩知璠时在太原，叹曰：‘王师（宋师）之引水浸城也，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若先浸而后涸，则并人无类矣’”（《新五代史·东汉世家》）。

宋太平兴国四年（公元九七九年），太宗亲攻太原。五月，北汉主刘继元穷窘出降，北汉亡。北汉自后周广顺元年（公元九五一年）刘崇称帝，至宋太平兴国四年，凡传四主，二十八年而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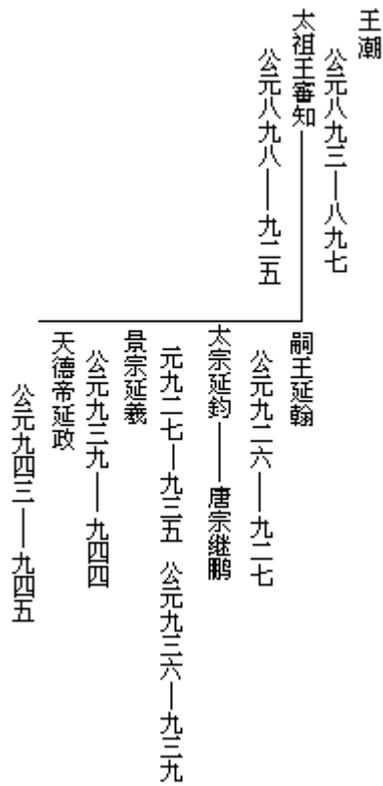
北汉既亡，宋太宗以晋阳城险固，容易为割据所凭藉，乃毁旧晋阳城，更筑并州新城。历史上著名的晋阳城，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古邺城一样，被彻底破坏而从地图上消失了。过去的晋阳城，在汾河以西，现在的太原市中心区在汾河以东，完全变了样，只有晋祠，古迹尚在，还可根据它的位置，来凭吊一下古晋阳城遗址。

吴杨氏世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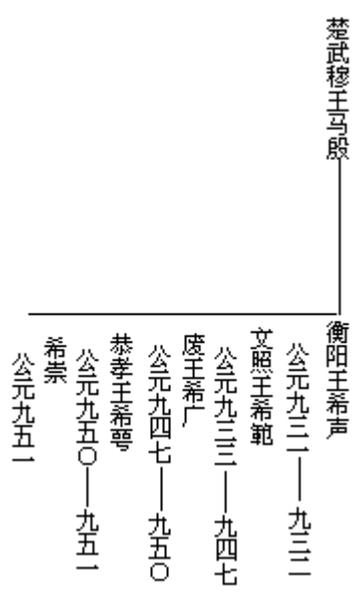
南唐李氏世系

闽王氏世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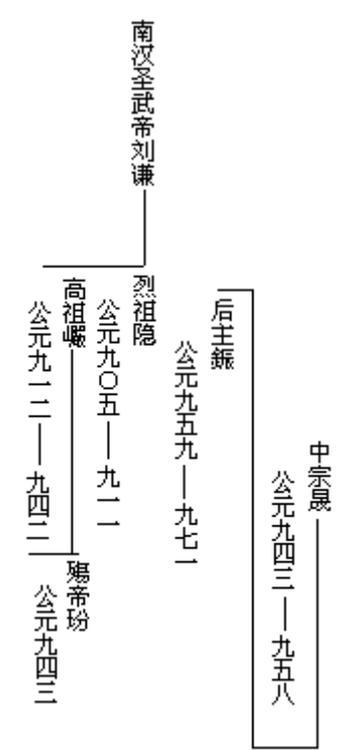


吴越钱氏世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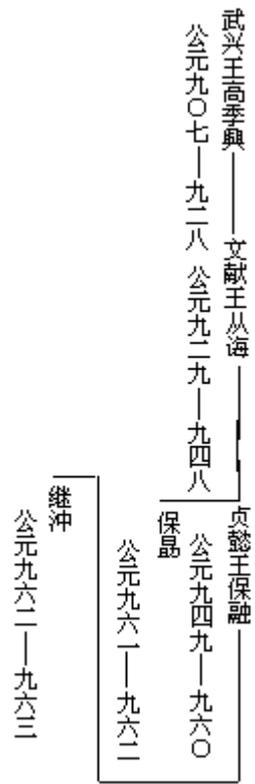
楚马氏世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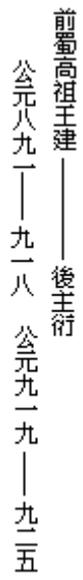
南汉刘氏世系



荆南高氏世系



前蜀王氏世系



后蜀孟氏世系

北汉刘氏世系

北汉刘崇  
公元九五二—九五四

湘陰公齊

睿宗承鈞

公元九五五—九六八

少帝繼恩

公元九六八

英武帝繼元

公元九六八—九七九

### 第三节 五代十国的社会经济

五代十国时期，在北方，太平的日子短，战争的时间多；在南方，太平的时间长，苛暴的统治都不太长，所以北方的经济破坏得比较厉害，南方的经济反而有所发展。

**北方的河患** 整个唐王朝统治，黄河安澜，没发生过重大的决口事件。到了五代之初，梁唐在大河两岸对峙，利用河水，以邻国为壑，河患开始严重起来。后唐庄宗同光元年（公元九二三年），梁晋相持于河上，八月，“梁主命于滑州（治白马，今河南滑县）决河，东注曹（州治济阴，今山东定陶县西南）、濮（州治鄆城，今山东鄆城县北）及郓（州治须昌，今山东东平县西北）以限唐兵”（《资治通鉴》后唐庄宗同光元年）。从此河患加深，同光二年（公元九二四年），“梁所决河连年为曹、濮患”，七月甲辰，“命右监门上将军娄继英督汴、滑兵塞之，未几复坏”（《资治通鉴》后唐庄宗同光二年）。《水浒传》上的梁山泊，大概就在这开始形成。

后唐庄宗同光三年（公元九二五年）正月，“诏平卢节度使符习治酸枣（今河南延津县西北）遥堤以御决水”（《资治通鉴》后唐庄宗同光二年）。胡三省《通鉴注》曰：“遥堤者，远于平地为之，以捍水患。”很像今天的黄河二道坝、三道坝之类。

后晋高祖天福四年（公元九三九年）闰七月，河决博州（治聊城，今山东聊城县东北）。天福六年（公元九四一年）九月，河“决滑州，兖（州治瑕丘，今山东兖州县）、濮（州治鄆城，今山东鄆城县西北）州界皆为水漂溺”（《五代会要》）。齐王开运元年（公元九四四年）六月，“滑州河决，浸汴、曹、单（州治今山东单县）、濮、郓五州之境，环梁山合于汶。诏大发数道丁夫塞之”（《资治通鉴》后晋齐王开运元年）。开运三年（公元九四六年）九月，“河决澶州临黄”（今河南濮阳县东临黄集，山东范县南）（《资治通鉴》后晋齐王开运三年）。后汉高祖乾祐元年（公元九四八年）五月，“滑州言河决鱼池”（《资治通鉴》后汉高祖乾祐元年）。乾祐三年（公元九五一年）六月，“河决郑州”之原武（今河南原阳县西北）（《资治通鉴》后汉隐帝乾祐三年）。

后周太祖显德元年（公元九五四年）十月，“河自杨刘（今山东东阿县北杨柳村）至于博州（治聊城，今山东聊城县东北）百二十里，连年东溃，分为二派，汇为大泽，弥漫数百里，又东北坏古堤（前代所筑防河古堤）而出，灌齐（州治历城，今山东济南市）、棣（州治厌次，今山东惠民县西南）、淄（州治淄川，今山东淄博市西南淄川镇）诸州，至于海涯，漂没民田庐不可胜计，流民采菰稗、捕鱼以给食，朝廷屡遣使者不能塞”。十一月，“帝遣李穀诣澶、郓、齐按视堤塞，役徒六万，三十日而毕”（《资治通鉴》后周太祖显德元年）。李穀所修治的黄河决口，据《读史方輿纪要》称“西自阳穀（今山东阳穀县）抵张秋口”（今山东东阿县西南六十里），大概只是指决口的一小部分地区。

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九五九年）六月，“郑州奏河决原武，命宣徽南院使吴延祚发近县二万余夫塞之”（《资治通鉴》后周世宗显德六年）。

黄河自后梁末，由于战争，引起河决，一直到后周末，自郑州原武起，到棣州止，不知决口了多少次。影响最严重的，在濮州、郓州一带，梁山水

泊，一片泛滥，黄河下游人民，家室流离，生活维艰。

黄河下游，河患频仍，但黄河中上游，水利灌溉事业仍有所发展。《读史方輿纪要》陕西灵州守御千户所下云：“五代唐长兴（公元九三三至九三三年）初，朔方（宁夏灵武县西北）帅张希崇引河渠，兴屯田，以省漕运，民便爱之。”《五代会要》云：“周显德五年（公元九五八年）十一月，尚书司勋郎中何幼冲为关西渠堰使，于雍、耀二州界，疏泾水以溉田。”

**南方的水利事业** 在南方，由于政局稳定的时间比较长，一般多达三四十年，所以水利事业的发展，要比北方较为发达。

南唐的水利灌溉，除了寿州（治今安徽寿县）的芍陂继续不断扩展灌溉面积以外，“升元（公元九三七至九四三年）中”又浚治丹阳（今江苏丹阳县）的练湖，练湖亦称曲阿后湖，幅圆四十里，唐韦损又扩大为八十里，南唐时，“复作斗门，以通灌溉”（《读史方輿纪要》）。

吴越时，国都杭州之钱塘，“西湖在城西，周回三十里，三面环山，溪谷缕注，潴而为湖”。先是“唐大历中，刺史李泌于湖北为石函桥，置水闸以洩湖水，溉田无算。长庆初，刺史白居易复筑堤捍湖，蓄洩其水，溉田千顷；又引入运河以利漕。久之，湖葑蔓合，湖渐堙塞。吴越时，置拨湖兵士千人，芟草濬泉。又引湖水为涌金池，以济运河”（《读史方輿纪要》）。

浙江钱塘江，“唐大历八年（公元七七三年），大风潮溢，垫溺无算。咸通二年（公元八六一年），潮水复冲击奔逸入城，刺史崔彦曾乃开外沙、中沙、裹沙三沙河以决之，曰沙河塘，近南曰霸头，其在城东二里者，曰捍海塘。光化二年（公元八九九年），浙江又溢坏民居”（《读史方輿纪要》）。“五代梁开平四年（公元九一年），筑捍海石塘，广杭州城，由是钱塘富盛于东南。皇朝（指宋朝）郡县志云：号捍海石塘，吴越钱鏐所筑，在候潮门外。潮水冲击，版筑不就，因命强弩数百，以射潮头，既而潮水渐向西陵（今西兴镇），遂造竹笼，积石植木，堤岸既成，遂为城邑，今之平陆，皆昔之浙江也”（《輿地纪胜》）。潮水决不是箭锋所能挡住的，但却反映了人民和海潮搏斗的决心与毅力。

在王氏七闽，有六印江，在今福建福安县南百里，“中有六小屿”，“其下流为甘棠港”，“在〔福安〕县东南百六十里”。“先有巨石，屹立波间，舟多覆溺。唐乾宁五年（公元八九八年），王审知欲凿之，忽风雨大作，别开一港，甚便舟楫”，闽人“名曰甘棠港”（《读史方輿纪要》）。

在楚马氏湖南，有沅水，唐贞元十一年（公元七九五年），朗州（治武陵，今湖南常德市）江溢，江指沅江。《水利考》“郡当沅江水流，故多水患。”“后唐同光（公元九二三年至九二六年）初，马氏筑城，东南及西南二隅，俱筑石柜，以障城垣”（《读史方輿纪要》）。潭州（治长沙，今湖南长沙市）东二十里有龟塘，“因诸山之泉，筑堤潴水”，“溉田万顷”（《宋书·食货志》）。

“南平国高氏，于江陵北四里开漕河，皇朝（指宋朝）郡县志云，高季兴于城西柳门及子城置仓，开漕入仓步。高从诲又以龙山门近城开白割河，水入城北向东漕河”（《輿地纪胜》）。又寸金堤在江陵府城龙山门外，“五代时，高氏将倪可福筑，以捍蜀江激水，谓其坚厚，寸寸如金，因名”（《读史方輿纪要》）。后周显德二年（公元九五八年），“高保融自西山分江流方五、七里，筑堤而居之，谓之北海”（《輿地纪胜》）。又今潜江县西北五里有高氏堤，“五代时，高氏所筑，起自荆门州绿麻山，至县南沱埠渊，

延亘一百三十里，以障襄、汉二水，后屡经增筑”（《读史方輿纪要》）。

蜀彭山县（今四川彭山县）西北四十里，有大堰一，小堰十，自成都新津口引渠南下，灌溉彭山眉州沿江之地，凡百二十里，计田千六百顷。“五代时，张琳复自新修觉山濬故址至州西南，合于汶江，其利尤博”（《读史方輿纪要》）。后蜀在褒中“凿大沔以导泉源，溉田数千顷”（《九国志·武璋传》）。

南方水利事业的发展，有利于农业产量的提高，交通运输的畅通，可以说，五代十国时期，北方生产相对停滞，而南方则有所发展。

**南方的植茶事业** 在十国中，南唐、闽、吴越、楚、南平、蜀各国，植茶事业都有所发展。

在南唐统治地区，和州（治历阳，今安徽和县）土产茶，楚州山阳县（今江苏淮安）有茶陂。舒州（治怀宁，今安徽潜山县）土产开火茶。庐州（治合肥，今安徽合肥县）土产开火新茶。蕲州（治蕲春，今湖北蕲春县）土产茶，“出当州蕲山二县北山”。又云：“茶山在蕲水县北深川，每年采造贡茶之所”（《太平寰宇记》）。安州（治安陵，今湖北安陆县）土产茶。信阳军（今河南信阳市）土产茶。鄂州（治江夏，今湖北武汉市）土产茶，《茶谱》云：“鄂州之东山、蒲圻（今湖北蒲圻县）、唐年县（今湖北崇阳县西南），产茶，黑色如韭叶，极软，治头疼”（《太平寰宇记》）。兴国军（今湖北阳新县）土产茶。宣州宁国县（今安徽宣城县）“鸦山出茶，尤为时贵”，《茶经》云：“味与蕲州同”（《太平寰宇记》）。宣州太平县（今安徽当涂县），“上泾、下泾，邑图云：产茶，味与黄州同”（《太平寰宇记》）。广德军（今安徽广德县）土产茶。歙州（治歙县，今安徽歙县）土产茶。池州（治秋浦，今安徽贵池县）土产茶。筠州（治高安，今江西高安县）土产黎源茶。饶州（治鄱阳，今江西波阳县）土产茶。浮梁（今江西景德镇市北新平），“《郡国志》云：斯邑产茶，赋无别物”（《太平寰宇记》）。吉州（治庐陵，今江西吉安市）土产茶。抚州（治临川，今江西抚州市）土产茶。茶树的种植，普及全境。

在吴越统治地区，常州土产茶。宜兴出紫笋茶。顾渚在湖州长兴县西北三十里，在唐代就是著名的茶产地，“渚者墟名”。“今崖谷林薄之中，多产茶茗，以充岁贡。”越州余姚县瀑布岭，“《茶经》云，越州余姚，茶生瀑布岭者曰仙茗，大者殊异，小者与襄州同”（《太平寰宇记》）。

在七闽统治地区，福州土产茶。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市）“茶有六般，白乳、金字、蜡面、骨子、山挺、银子。”建州（治建阳，今福建建阳县）土产茶，“《茶经》云，建州方山之芽及紫笋，片大，极硬，须汤浸之，方可碾极。治头疾，江东老人多味之。”“茶山在建安郡（今福建建安县）北，民多植茶于此山，涉冬翠茂，俯瞰城廓”（《太平寰宇记》）。漳州（治漳浦，今福建漳浦市）土产茶。汀州（治长汀，今福建长汀县）土产茶。

在湖南楚国统治地区，潭州（治长沙，今湖南长沙市）土产茶，“长沙之石楠，其树如棠柎，采其芽谓之茶。湘人以四月摘杨桐叶，捣其汁，伴米而蒸，犹蒸麩之类，必啜此茶，乃其风也。尤宜暑月饮之。”“潭、邵（州治邵阳，今湖南邵阳市）之间有渠江，中有茶，乡人每年采撷，不过十六七斤，其色如铁，而芳香异常，烹之无滓也”（《太平寰宇记》）。衡州（治衡阳，今湖南衡阳市）土产茶。播州（治遵义，今贵州遵义市）土产生黄茶。思州（治务川，今贵州沿河县）土产茶。马令《南唐书》云：“自京师至襄、

唐、郢、复等州，置邸务以卖茶，其利十倍”。 “又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而收其算，岁入万计，由是地大力完”。可见湖南的茶利，非常可观。

在南平国的统治地区，“荆州松滋县（今湖北松滋县西北）出碧涧茶，沈子曰，茶饼、茶芽，今贡”（《太平寰宇记》）。峡州（治夷陵，今湖北宜昌市）土产茶。归州土产白茶。

在前蜀、后蜀的统治地区，植茶更是普遍。彭州（治九陇，今四川彭县）土产茶，“按《茶谱》云，彭州有蒲村、棚口、灌口，其园名仙崖、石花等，其茶饼小而布嫩芽如六出花者尤妙。又《茶经》云，茶出彭州九陇县马鞍山至德寺棚口镇者，与襄州茶同味。”眉州土产茶，“按《茶经》云，眉州洪雅（今四川洪雅县西）、丹棱（今四川丹棱县），其茶如蒙顶，制饼茶法，其散者叶大而黄，味颇甘苦，亦片甲蝉翼之次也。”邛州（治临邛，今四川邛崃县）土产茶，“按《茶经》云，临邛数邑，茶有火前、火后乃嫩绿、黄芽等号。又有茶饼曰火番饼，每饼重四十两，入西番，党项重之，如中国之名山者，其味甘苦。”蜀州（治晋原，今四川崇庆县）土产茶，“按《茶经》云，青城县有散茶、末茶尤好。又《茶谱》云，蜀州晋原、洞口、横源、味口、青城。其横源雀舌、鸟嘴、麦颖，盖取其嫩芽所造，以其芽似之也。又有片甲者，即是早春黄芽相抱如片甲；蝉翼者，其翼嫩薄如蝉翼，皆散茶之最上者也。”雅州（治严道，今四川雅安）土产茶，“《茶谱》云：雅州百丈、名山二处尤佳。”蒙山在名山（今四川名山县）西七十里，“言雨露常蒙，因以为名，山顶受全阳气，其茶芳香。按《茶谱》云，山有五岭，有茶园，中岭曰上清峰，所谓蒙岭茶也，为天下之最。”渝州（治巴县，今四川重庆市）土产茶，“《茶谱》云，南平县（即江州县，今重庆市）狼獾山，茶黄黑色，渝人重之，十月采贡。”泸州（治泸川，今四川泸州市）土产茶，“按《茶经》云，泸州之茶树，僚常携瓢具穴其侧，每登树采摘芽茶，必含于口，待其展，然后置于瓢中，旋塞其窍，归必置于暖处，其味极佳。又有龕者，其味辛而性热，彼人饮之，疗风，呼为泸茶。”巴州（治化城，今四川巴中县）土产茶，“按《广雅》云，荆（江陵）、巴、阆（治阆中，今四川阆中县）采茶作饼，煮饼令色赤，捣末置瓷器中，以汤覆之，用葱姜芼之，即茶始说也”（《太平寰宇记》）。茶树在南方，已普遍种植，这类经济作物的普遍推广，是有益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

**手工业商业的发展** 五代时期，南方的瓷器制造业，在唐代的基础上又有了发展。主要是秘色瓷。

秘色瓷是越窑青瓷系统，《高齐漫绿》云：“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清波杂志》云：“玉牒防御使仲揖居饶（饶州景德镇）得数种，云比定州红瓷器尤鲜明。越土秘色器，钱氏有国日供奉之物，不得臣下用，故曰秘色。”然唐季诗人陆龟蒙已有《秘色越器》之诗，则云秘色瓷器出自南唐李王，又云出吴越钱王皆不可据。唐末诗人徐夔有《贡余秘色茶盏》诗：“揆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巧剞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古镜破苔当席上，嫩荷涵露到江滨。中山竹叶醅初发，多病那堪中十分。”这种秘色瓷的先进技艺，不但为江南吴越地区所掌握，也逐渐传到北方。《曝书亭词注》云：“后周时，请瓷器式，世宗（柴荣）批其上曰：‘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即今之这般）颜色做将来。’”秘色瓷从此又蒙上柴窑的称号。后周制成的柴窑，天青色滋润细媚，有细纹，足多粗黄。《事物纪原》云：“柴窑制精色异，为诸窑之冠。”《博物要览》云：

“昔人论柴窑曰：‘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七颂堂识小录》云：“近出一洗，圆而椭，面径七寸，黝然深沉，光色不定，雨后天青，尚未足形容。”雨过天青，清翠欲滴，大概是柴窑的特色。

在染练手工业方面，在南唐出现了一种天水碧。《南唐拾遗记》云，“江南李重光（后主煜）染帛多为天水碧。”《宋史》：“煜伎妾常染碧，经夕未收，令露下，色鲜明，煜爱之，自是宫中竞收露水染碧以衣之，谓之水天碧。”《五国故事》云：“建康市中，染肆之傍，多题曰天水碧。”

在矿冶业方面，南汉的岭南地区盛产金银，至用金银作殿衣、地衣。楚国湖南地区盛产铅铁，马殷取铅铁铸为铁币，行使国内。湖南境内，又盛产丹砂，一次山崩，“涌出丹砂，委积如丘陵”。马希范利用丹砂涂壁，“凡用数十万斤”（《五代史补》）。

成都在唐末，商业就很发达，“成都城中鬻花果、蚕器于一所，号蚕市；鬻香药于一所，号药市；鬻器用者号七宝市”（《资治通鉴》唐僖宗乾符六年）。后蜀孟氏时，蜀中经过三四十年的安定休息。《蜀檮杌》云：“[孟昶广政十三年（公元九五一年）]九月，令城上植芙蓉，尽以幄幙遮护。是时蜀中久安，赋役俱省，斗米三钱”。“村落闾巷之间，弦管歌颂，令筵社会，昼夜相接。府库之积，无一丝一粒入于中原，所以财币充实。城上尽种芙蓉，九月间盛开，望之皆如锦绣。昶谓左右曰：‘自古以蜀为锦城，今日视之，真锦城也。’”从此，成都又蒙上蓉城的称呼。

南唐的扬州，吴越的杭州、越州、明州（今浙江宁波市），闽国的福州、泉州，南汉的广州，都是当时国际性的城市，国际贸易都非常发达，海舶云集。内地的楚国长沙、常德，南平的江陵，也都地处南北枢要，长江上下游交叉点，商业的繁荣，更是不用说了。

## 第九章 隋唐五代的学术与宗教

### 第一节 经学、史学与地理著作

**经学著述** 经学著述，首先得讲《五经正义》。孔颖达，任至国子司业、国子祭酒。唐太宗贞观中，受诏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等撰《五经正义》，作为国子学的法定教科书。《五经正义》是指《周易正义》十卷，用王弼、韩康伯注；《尚书正义》二十卷，用孔安国传；《毛诗正义》四十卷，用毛萇传，郑玄笺；《礼记正义》六十三卷，用郑玄注；《春秋左传正义》六十卷，用杜预注。《五经正义》严格遵守“注”不违“经”，“疏”不破“注”的汉学家法，如果“注”这样解释，“疏”文就沿着“注”的内容，加以诠释，绝不自搞一套，绝不和注文唱对台戏，治学的态度，是非常拘谨而严肃的。

《五经正义》是孔颖达奉诏撰述的，因此只能在指定的注文基础上，加以诠释，别无选择。《五经》中《毛诗》、《礼记》，都经过郑玄的笺注，《左氏传》也经过杜预的注释，不失为善本，孔颖达等撰成《正义》，在原来的笺注上，加以诠释，文字平易清淡，说理清楚明白，在六朝隋唐骈俪文风靡一世的时代，出现这类朴素平实的文风，使人读了产生一种清新的感觉，这是值得称道的。当然《五经正义》也有不足的地方，如王弼、韩康伯的《周易注》，已经是清谈盈篇，《周易正义》诠释注文也是“多用空言，不能如诸经正义，根据典籍，原委粲然，则由王[弼]注扫弃旧文，无古义之可引”（《四库全书总目·周易正义》），可见《周易正义》失之于空洞。又如《尚书正义》问题更多。由于古文《尚书》已经散佚，真本古文《尚书》篇目已经留存不多，《虞书》存《尧典》（包括本来是《尧典》的《舜典》），《夏书》的《禹贡》、《甘誓》，《商书》的《盘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周书》的《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康王之诰》、《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这二十七篇，经过清代学人的考证，确定是真的；其它很多篇包括孔安国注，都是晋人用伪撰来补足的。但唐政府却决定采用这样一个真伪杂陈的本子来作为全国使用的标准教本，孔颖达也只好奉诏就这样一部真伪杂陈的《尚书》来加以诠释，对真伪漫不别白，以致贻误后学，历千年之久。

与孔颖达同时，有贾公彦，位终太学博士。他尽毕生之力，成《周礼疏》四十二卷，用郑玄注；《仪礼疏》五十卷，亦用郑玄注。又有徐彦（唐元和、长庆以后人）成《公羊传疏》二十八卷，用何休《解诂》。杨士勋，贞观时人，官四门博士，成《谷梁传疏》二十卷，用范宁《集解》。实际九经注疏在唐中叶已经大体完成了。

除了上面的九经注疏以外，尚有唐开元以后人李鼎祚著《周易集解》十七卷；史徵著《周易口诀义》六卷；郭京著《周易举正》三卷；成伯璵著《毛诗指说》一卷；陆淳（唐大历诗人，官至给事中）著《春秋集传纂例》十卷，《春秋微旨》三卷，《春秋集传辨疑》十卷；五代蜀冯继先著《春秋名号归一图》二卷；唐玄宗御注《孝经》一卷，以上都是四库所著录的。

与孔颖达同时，有陆德明，贞观中，为国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著《经典

释文》三十卷，收有《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公羊》、《谷梁》、《孝经》、《论语》、《老子》、《庄子》、《尔雅》十四种书，“经注毕详，训义兼辩”（《经典释文》序），对于音读反切，尤多斟酌。对于经学的传授次第、注解的著述先后，也非常详细。唐朝以老子为玄元皇帝，《老子》书称为《道德经》，《庄子》书称为《南华真经》，列之学官，所以《经典释文》也把它收入，列为经典之一。独有一点应该注意的，韩愈捧《孟子》，皮日休上书请列《孟子》于学官，到北宋时才列《孟子》于学官，在唐代《孟子》还是儒家子部著作，所以《经典释文》没有把《孟子》收入。《经典释文》采用“汉魏六朝音切凡二百三十余家，又兼载诸儒之训诂，证各本之异同，后来得以考见古义者，注疏以外，惟赖此书之存真，所谓残膏剩馥，沾溉无穷者也”（《四库全书总目·经典释文》）。

小学著述方面，颜师古，贞观时官至秘书监，著《匡谬正俗》八卷，“前四卷凡五十五条，皆论诸经训诂音释，后四卷凡一百二十七条，皆论诸书字义字音及俗语相承之异，考据极为精密”（《四库全书总目·匡谬正俗》）。南唐徐锴著《说文系传》四十卷，锴有所发明，皆徵引经传，前人诧为惊人秘笈。锴又著有《说文解字篆韵谱》五卷，以四声部分，编次成书。唐颜元孙，颜杲卿父，历官滁、沂、濠三州刺史，赠秘书监，著《干禄字书》一卷，“是书为章表书判而作，故曰‘干禄’，其例以四声录字，又以二百六部排比字之后先，每字分俗通正三体，颇为详核”（《四库全书总目·干禄字书》）。张参，唐大历时人，官国子司业，著《五经文字》三卷。唐元度，唐开成中人，官翰林待诏，著《九经字样》一卷。

在《大藏经》音义部中，著录玄应《一切经音义》二十五卷，希麟《续一切经音义》十卷，慧琳《一切经音义》百卷。虽是注释佛经的，因为都是唐代僧侣的作品，反映了唐代的制度文物很多，所以也可以作为参考。

唐朝一代，是诗歌最发达的时代，从而音韵学也特别讲究。唐天宝十载（公元七五一年），有陈州司法参军孙緌在陆法言的《切韵》基础上，撰成《唐韵》五卷，他广徵博采，凡“州县名号，……其有异闻，奇怪传说，姓氏原由，土地物产，山河草木，鸟兽虫鱼，备载其间，皆引凭据，随韵编纪，添彼数家，勒成一书”（孙緌《唐韵》序）。《唐韵》不仅是一部南北朝以来在声韵学方面的总结性著述，同时它又是一部带有类书性质的参考著作，其学术价值是很高的。现在流传的《广韵》，就是陈彭年等在宋真宗景德四年（公元一〇七二年），受诏把《唐韵》略加修订，改名而成的。

**正史的编纂** 先讲唐初的修撰八史。

南北朝时期，纪传体的正史，大都是由私家来撰述的，褒贬笔削之权，自然操之于执笔的士大夫手里，中央政府多未顾问。到了隋唐，天下一统，王权加强，从隋文帝起，就想把编纂国史的权力，掌握在政府的手里，故在开皇十三年（公元五九三年）下令：“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隋书·高祖纪》）。如王劼“在家著《齐志》，时制禁私撰史，为内史侍郎李元操所奏，上怒，遣收其书”（《北史·王慧龙传五世孙劼附传》）。大概隋文帝读了王劼的《齐志》，觉得这部书的内容，没有毁谤隋朝，对皇帝的神圣权力也没有什么大的抵触，就对王劼不再继续追究下去了。但自此国史的修撰，逐渐掌握在政府的手里了。

晋朝的历史，至唐初尚存十八家，然而十八家之中，大部分不是以西晋

为断限，便是仅记东晋之事，而且都是未完成的史稿，只有臧荣绪和萧子云两家之书，纪、录、志、传，比较完备。而萧子云之书，原来一百二卷，到了唐、初修撰《隋书·经籍志》时，已残缺不全，只剩下十一卷了。即使硕果仅存的臧荣绪所著《晋书》，也不能够把两晋和十六国这样一个变动极大的时代充分反映出来，所谓“前后晋史十有八家，制作虽多，未能尽善”（《史通·古今正史篇》）。因此唐太宗在贞观十八年（公元六四四年）敕令房玄龄、褚遂良等重撰《晋书》，其实际执笔者则有令狐德棻等人，贞观二十年（公元六四六年）书成。其中载记部分，又据《十六国春秋》抄撮而成，今《十六国春秋》已亡佚，考十六国史者也只有依靠《晋书·载记》了。

陈吏部尚书姚察在陈世撰《梁书》、《陈书》，未及完成，其子姚思廉在隋世继其父业。唐贞观三年（公元六二九年），始正式命姚思廉修撰《梁书》、《陈书》，贞观十年（公元六三六年）撰成。

隋世李德林私撰《北齐书》，德林死，子李百药继其遗业。唐贞观初，百药受诏撰《北齐书》，使它成为合法化的史书。惜自北宋以后，渐见散佚。近日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由武汉大学唐长孺教授负责点校《北齐书》，所谓残缺不全者，皆详为考订，成为《北齐书》最好的版本。

令狐德棻贞观初奉诏撰《周书》，撰成后颁为正史。北宋后，日就散佚，后人或以《北史》补之。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点校《周书》时，对那些是令狐德棻的《周书》原文，那些是后人以《北史》补的，也都有考订。

《隋书》，由魏徵领衔监修，秉笔者为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等，贞观三年（公元六二九年）起修，贞观十年（公元六三六年）书成。官修正史的缺点，不仅对本朝（唐）的事情，多所讳饰，而且于同时朝廷贵臣，不得不加以敷衍，为这些贵臣们的父祖编撰佳传。如长孙无忌，贞观时为宰相，又是唐太宗的妻弟，故《隋书》在写长孙无忌父长孙晟传时，把他写成隋代第一流的外交家；房彦谦仕隋，位不过令长、州司马，徒以其子房玄龄贞观时为宰相，故《隋书》为房彦谦立传，且辞多溢美。这些缺点，私修正史时，已经很严重了，到了官修史书，更为突出。

当唐贞观初，官修《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五朝的历史时，同时为《五代史志》，凡十志，合为三十卷。五史先定稿，五代史志（十志）至高宗显庆中才定稿，来不及分插到五代史里去，所以别行，俗呼为《五代史志》，后来又把它附在《隋书》之中行世，所以就称之为《隋志》了。参加修撰十志的有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令狐德棻、敬播等人，大都是专家通人，所以《隋志》的编纂工作，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李延寿继承了其父李大师的遗业，编成《南史》和《北史》，他除了参考《宋书》、《南齐书》、《魏书》等旧史以外，并参考杂史千余卷。当时《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未出，李延寿以参与《五代史志》的编纂工作，在史局留心抄录这方面的资料，并加以撰录。书成，《南史》起宋迄陈亡，合八十卷；《北史》起魏迄隋亡，合一百卷。

《南北史》史事多而文省，阅读起来，又前后贯串，因此书成之后，流布甚速，压倒八史。除《宋志》、《南齐志》、《魏志》、《隋志》外，读八史的人愈来愈少，《北齐书》、《周书》的残缺也愈来愈厉害（因为当时还没有印刷，都是用手抄写的），后人整理南北八史，反而不得不靠《南北史》来校补它了。

南朝的何法盛著《晋中兴书》，把江东琅邪王氏、陈郡谢氏的头面人物集中为传，称为《琅邪王录》、《陈郡谢录》；在李延寿的《南史》和《北史》里，“《南史》以王谢分支，《北史》亦以崔卢系派”，“惟以姓为类，分卷无法”（《四库全书总目·北史》），说是国史，实际无异于家传。这个现象的出现，我认为是正常的，它正反映了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垄断政治的社会现实。

上面讲的是唐初所修八史，下面讲的是唐、五代正史。

《旧唐书》二百卷，五代后晋刘煦奉敕修撰。《崇文总目》称：“初吴兢撰唐史，自创业迄于开元，凡一百一十卷。韦述因兢旧本，更加笔削，为纪、志、列传一百二十卷。至德、乾元以后，史官于休烈又增《肃宗纪》二卷；史官令狐峒等复于纪、志、传随篇增辑，而不加卷帙，为《唐书》一百三十卷。”是《唐书》旧稿，实出吴兢，虽众手增补，规模未改，刘煦等修史时用作蓝本，故具有典型。后晋开运二年（公元九四五年），刘煦等撰成进呈。自穆宗长庆以后，史失其官，煦等没有善本可据，因此就受到读者的攻击了。

《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宋欧阳修、宋祁等奉敕修撰，宋仁宗嘉祐三年（公元一〇五八年）成书，书中纪、志、表题修名，列传题祁名。然《宰相世系表》吕夏卿所撰，而书中仍题修名，则仍以官高者为主，和前代官修诸书，出入不大。本书自称“事增于前，文省于旧”，刘安世《元城语录》则谓“事增文省，正新书之失”。可见《新唐书》有它的不足之处，并不能完全代替《旧唐书》，因此两书还是同时并行下来。

《旧五代史》，宋开宝六年（公元九七三年）四月开修，七年闰十月成书，薛居正领衔修撰，其后欧阳修别撰《新五代史》，于是两书并行。及金章宗泰和七年（公元一二一七年），诏学官止用《新五代史》，于是《旧五代史》日就散佚。清修四库全书，始命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吾乡邵晋涵于《旧五代史》辑佚工作，用力至勤；近陈垣氏又重加搜辑，用《册府元龟》校勘，收获较多。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时，采用陈氏校本，这是一个最好的校本了。

《新五代史》七十五卷，宋欧阳修皇祐五年（公元一〇五三年）撰成。唐以后所修诸史，惟此书为私撰。

唐朝当代的历史记录，有起居注，有时政记或日历，有实录等等。起居注、日历，是实录的长编；实录又是后来官修正史的长编。裴庭裕《东观奏记》序所谓：“国朝故事，以左右史修起居注外，又置日历。至修实录之日，取信于日历，起居注，参而成之。”

唐高祖武德之初，工部尚书温大雅撰《大唐创业起居注》三卷。上卷记李渊起兵太原至出兵太原四十八日之事，中卷记自太原至长安一百二十六日之事，下卷记李渊摄政至受隋禅一百八十三日之事，首尾完具，无所佚阙。李渊起兵之初，大雅为渊记室参军主文檄，可以说此书是第一手资料，史料价值较高。唐玄宗时，有《开元起居注》三千六百八十二卷，无撰人姓名，《修时政记》四十卷，姚璿撰，二书均已散失。

唐皇帝每朝皆有实录，据《新唐书·艺文志》载：

《高祖实录》二十卷 敬璿撰

《今上（指太宗）实录》二十卷 敬璿、顾胤撰

《贞观实录》四十卷 长孙无忌撰

《皇帝（指高宗）实录》三十卷 许敬宗撰  
《高宗后修实录》三十卷 令狐德棻、刘知几、吴兢撰  
《高宗实录》三十卷韦述撰  
《高宗实录》一百卷题武后撰  
《则天皇帝实录》二十卷魏元忠等撰  
《圣母神皇实录》十八卷宗秦客撰  
《中宗实录》吴兢撰  
《太上皇（指睿宗）实录》十卷刘知几撰  
《睿宗实录》五卷吴兢撰  
《今上（指玄宗）实录》二十卷张说、唐颖撰  
《开元实录》四十七卷失撰人名  
《玄宗实录》一百卷令狐峘撰  
《肃宗实录》三十卷元载监修  
《代宗实录》四十卷令狐峘撰  
《建中（德宗年号）实录》十卷沈既济撰  
《德宗实录》五十卷蒋乂、樊绅、林宝、独孤郁撰  
《顺宗实录》五卷韩愈、沈传师、宇文籍撰  
《宪宗实录》四十卷沈传师等撰  
《穆宗实录》二十卷苏景胤等撰  
《敬宗实录》十卷陈商、郑亚撰  
《文宗实录》四十卷卢耽等撰  
《武宗实录》三十卷韦保衡监修

唐昭宗大顺（公元八九 至八九一年）中，诏修宣宗、懿宗、僖宗实录，以日历、注、记亡缺，因徵宣宗政事奏记于监修国史杜让能，“让能乃奏上，选中朝鸿儒硕学之士十五人，分修三圣实录，以吏部侍郎柳玘、右补阙裴庭裕、左拾遗孙泰、驾部员外郎李彻、太常博士郑光庭专修宣宗实录”。由于时局不平静，“甯岁条例竟未立”（《东观奏记》序）。所以终唐之亡，宣宗以下四朝实录竟未完成。到了宋代，宋敏求据杨徽之（敏求父宋绶之外祖父，是有名的收藏家）及父宋绶的遗书故记，私撰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四朝实录一百四十八卷，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并多次加以引用。

研究隋唐五代政治史，必需精熟阅读司马光《资治通鉴》的隋唐五代部分，这部杰出的通史编年体著作，其重要意义不次于《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因为这一点尽人皆知，所以我就不多讲了。

《通典》与《唐会要》、《五代会要》 唐玄宗开元十年（公元七二二年），起居舍人陆坚受诏修撰《六典》，玄宗手书白麻纸上，分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六司，令以类相从，撰录以进。后宰相又以其事委徐坚，经年莫能定。又委母瓌、徐钦、韦述修撰，始以令式入六司，其沿革并入注中。后宰相张九龄又委苑咸，二十三年书成而未上，二十四年，九龄罢相，开元二十七年（公元七三九年），宰相李林甫上其书，即今本《唐六典》是也。这本书的内容，本书在介绍唐政府组织时，已经详细介绍，所以这里就不再介绍了。

《唐律疏议》，我们也有专节介绍，这里也不多讲了。

现在先介绍《通典》。刘知几第四子刘秩，在唐玄宗开元末年，撰《政

典》三十五卷。到了唐德宗世，杜佑以为《政典》未尽，把它加以扩充，成二百卷，称之曰《通典》。佑字君卿，唐德宗贞元十九年（公元八三三年），由淮南节度使出任宰相，一直到唐宪宗元和七年（公元八一二年）罢相，居相位有九年之久。

《通典》凡二百卷，分九门，“食货”十二卷，“选举”六卷，“职官”二十二卷，“礼”一百卷，“乐”七卷，“兵”十五卷，“刑”八卷，“州郡”十四卷，“边防”十六卷。《通典》上起三代，下迄安史之乱，但在经济方面，有时也以德宗建中元年（公元七八年）两税法的实施为下限。

这一部政书，它不仅广泛收罗史料，内容巨细咸包，丰赡宏博，而且也表现了编著者对各种政治经济制度方面的一定识见。如以前修纂的正史《史记》有《平准书》，《汉书》、《魏书》、《晋书》、《隋书》有《食货志》，很多正史就不立《食货志》，原因很简单，不是史臣不想做，而是经济史料分散，收集困难，不容易做。可是《通典》却以《食货》冠九典之首，这就是杜佑的卓识之处。《通典》全书二百卷，而《礼典》占一百卷，占全书的二分之一。从姬周《三礼》，到《大唐开元礼》，当时人就是重礼，因此《礼典》的卷数就多了。在《通典·礼典》里，又特别致详于丧服，这也是符合当时社会现状的，它最好地反映了魏晋南北朝以来世家大族所重视的亲疏中外远近和繁文缛节。在《选举》、《职官》、《刑》、《州郡》各典中，也真实地反映了政治制度和州郡布置以及历代发展演变的大势。在《边防典》里，详细地记录了欧、亚、非古代国家和我国国内少数兄弟族的历史资料，如杜环《经行记》之类，是当时记载大食帝国的第一手资料，史料价值极高。

《通典》除了九典以外，不别立祥瑞、五行各典，不崇尚迷信，不替统治阶级画光环，尤见得《通典》作者的高明卓识之处。《通典》九典中，只有《兵典》，不记载列代兵制的沿革，而致详于兵法，书生纸上谈兵，终不免有些迂腐。总之，《通典》这部书尽管有它的缺点，但优点是主导的，这一部书对后代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

苏冕，在元和世，曾编次高祖至德宗九朝之事，成《会要》四十卷，宣宗大中七年（公元八五三年），又下诏命杨绍复等编次德宗以后事，成《续会要》四十卷。唐宣宗以后，政治动荡，不闻有修会要之事。宋初宰相王溥，监修国史，因此复搜辑宣宗至唐末事绩续其书，为《新编唐会要》一百卷。全书分目五百十四门，于唐代沿革损益之制，极其详赅。这一部书到现在还流传着，是研究唐代历史的重要资料。

《五代会要》三十卷，宋宰相王溥撰。五代干戈扰攘，百度陵夷，然五十年间，典章制度，尚略具于累朝实录。王溥因寻检旧史，条分件系，辑成《五代会要》，可以和《五代史》相辅而行。如书籍镂版，肇于长兴（公元九三一至九三三年，后唐明宗年号），《五代史》失记，而《五代会要》具载其事，所以《五代会要》的资料价值也是很高的。

除了会要等书以外，宋宋敏求官至龙图阁直学士，他继承他父亲宋绶的遗业，辑成《唐大诏令集》一百三十卷。这部《唐大诏令集》虽已阙佚二十三卷，但材料丰富，收采的又都是第一手资料，资料价值也是非常高的。

刘知几的《史通》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代，在这样一个特定环境里，为了保存种姓，强调民族大义，就自然会出现许多优秀的历史著作。到了隋唐统一全国，继承这个优良传统，产生了一部出色的关于讨论历史编纂学方面的专门著述——刘知几的《史通》。

刘知几，字子玄，生于唐高宗龙朔元年（公元六六一年），卒于唐玄宗开元九年（公元七二一年）。他从青年时代起，就一直住在长安、洛阳两处，这两地政府的藏书和私家的藏书，都非常丰富，他就想法借阅。《史通·自叙篇》称“至于一代之史，分为数家；其间杂记小书，又竞为异说”，他于是“恣情披阅”，“莫不钻研穿凿，尽其利害”。后来有人知道他在史学方面有专长，就把他推荐到史馆去工作，他从武则天时代预修国史起，曾“三为史臣，再入东观”，前后做了将近三十年的史官。由于他阅读过很多历史书籍，在三十年史馆生活中，又看到了大量民间难得看到的宝贵史料。他对编纂史书，有他自己的看法。可是他的见解常常不为“监领国史”的大臣们所采纳，他感受到工作不容易展开的痛苦，于是根据自己的实际经验和研究结果，对过去的正史作了总结性的分析批判，在唐中宗景龙四年（公元七一零年），写成了《史通》这部名著。

刘知几在《史通·六家》和《二体》里，叙述了我国古代史学史的发展概貌。当时还没有纪事本末一体的出现，所以只归纳为“二体”。刘知几认为六家、二体，互有胜负得失，应该并存，“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史通·二体》）。

刘知几在《史通》里说明他对编纂正史的理论 and 主张。他认为要写出一部出色的历史书，必须“徵求异说，采摭群言”（《史通·采撰》），广泛地进行史料的收集。无论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一〕，以及经子之书，都应该在采择之列。他注重历史的真实性，最反对把神话传说和迷信故事收入到正史里去。他举了许多例子，其中一个例子是：

刘敬叔《异苑》，称晋武库失火、汉高祖斩蛇剑穿屋而飞，其言不经。……及萧方等撰《三十国史》，乃刊为正文，既而……唐徵晋语，近凭方等之录，编简一定，胶漆不移，故令俗之学者……谈蛇剑穿屋，必曰晋典明文，摭彼虚词，成兹实录。（《史通·杂说》中）

此外如封“禹生启石，伊产空桑，海客乘槎以登汉（银河），姮娥窃药以奔月”，“王乔飞凫，出于《风俗通》；左慈羊鸣，传于《抱朴子》”〔二〕，这些神怪传说，如果史家“朱紫不别”，加以搜编的话，真是可以说“污南、董之片简，沾班、晔之寸札”（《史通·采撰》）了，他是非常严肃地加以驳斥的。他认为“怪力乱神，宣尼不语，而事鬼求福，墨生所信。故圣人于其间，若存若亡而已”。即对鬼神的说法，既不肯定他有，也不说他定无，采取一种保留的态度。但刘知几有一个界限，即认为不应把这些迷信的事情，渗透到史学的领域里来。他批判了“王隐、何法盛之徒，所撰《晋史》，乃专访州闾细事，委巷琐言，聚而编之，目为鬼神簿录”（《史通·书事篇》）。这一点，他是非常坚持的。

刘知几非常称赞王劭《齐志》和宋孝王《关东风俗传》两书，认为这两部书，“抗词正笔，务存直道，方言世语，由此毕彰”（《史通·言语篇》）。有人问他，“王劭《齐志》，多记当时鄙言，为是乎？为非乎？”（《史通·杂说》中）刘知几认为《齐志》中“言多滓秽，语伤浅俗”，这并不是王劭所闭门杜撰的，而正是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他还说：“近有裴子野《宋略》、王劭《齐志》，此二家者，并长于叙事，无愧古人，而世人议者，皆雷同誉裴而共诋王氏。”刘知几认为：“夫江左事雅，裴笔所以专工；中原迹秽，王文由其屡鄙。且几原（裴子野字）务饰虚词，君懋（王劭字）志存

实录，此美恶所以为异也。设使丘明重出，子长（司马迁字）再生，记言于贺六浑（高欢的鲜卑名字）之朝，书事于士尼干（高洋的鲜卑名字）之代，将恐辍毫（笔）栖牍，无所施其德音”（《史通·叙事》）。“夫本质如此，而推过史臣，犹鉴者（照镜子的人）见嫫姆多嗤，而归罪于明镜也”（《史通·言语》）。

刘知几还把《齐志》和《周书》来作比较，认为王劭的《齐志》，在叙事记言方面，不知道要比牛弘和令狐德棻的《周书》高出多少倍。这两个王朝，汉化都比较浅，所谓“睹周、齐两国，俱出阴山”。而王劭之“载齐言也，则浅俗如彼”；牛弘之“载周言也，则文雅若此。夫如是何哉？非两邦有夷夏之殊，由二史有虚实之异故也”（《史通·杂说》下）。他称赞王劭在《齐志》里，忠实地记载了当时口语，“若中州名汉，关右称羌，易臣以奴，呼母云姊”（《史通·杂说》中）〔三〕，这些当时流行的口语，王劭都原封不动地记载了下来，使人读了，对那一时期的历史，在感性认识方面，增长了真切之感。可是牛弘和令狐德棻的《周书》，却是“妄益文彩，虚加风物，援引《诗》《书》，宪章《史》《汉》”，虽然他们的“记言之体，多同于古”，而实际却是“枉饰虚言，都损实事”（《史通·言语》）。如《周史》述“太祖（宇文泰）论梁元帝曰：‘萧绎，可谓天之所废，谁能兴之者乎？’又宇文测为汾州，或谮之，太祖怒曰：‘何为间我骨肉，生此见锦！’此并六经之言也。……其余言皆如此，岂是宇文之语邪？”（《史通·杂说》下）文雅到这样程度，历史的真实性，反而打了折扣，刘知几是特别不赞成的。他认为“裴政《梁太清实录》称：元帝使王琛聘（西）魏，长孙俭谓宇文曰：‘王琛眼睛全不转。’公（宇文泰封安定公）曰：‘瞎奴使痴人来，岂得怨我哉？’此言……可谓真宇文之言，无愧于实录矣。”（同上）在“裴景仁《秦记》，称苻坚方食，抚盘而诟；王劭《齐志》，述〔万俟〕受洛干感恩，脱帽而谢”，而崔鸿在《十六国春秋》中，“易抚盘以推案”，李百药在《北齐书》中，又“变脱帽为免冠”。刘知几认为这就不真实，因为“近世通无案食，胡俗不施冠冕”（《史通·叙事》），时俗不同，古今有异，都不应该轻易把它改去的。宇文泰，原名黑獭，可是《周书》讳而不书；北魏时，代北复姓如万纽于、库狄之类，史书撰修时，也皆改从单姓，刘知几对这些也加以反对。

刘知几认为在撰写史书的时候，可以向前人学习，学习他们的写作技巧，但不能死板地模仿，应该要求貌异而心同，力避貌同而心异。譬如“譙周撰《古史》，思欲摈抑马记（《史记》），师仿孔经（《春秋》）。其书李斯之弃市也，乃云‘秦杀其大夫李斯’。以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拟《春秋》，所谓貌同而心异也”（《史通·模拟》）。他对这种形式上的模拟，是竭力反对的。

刘知几主张史笔要力求简要，繁辞一定要删得干净，他在《史通·点繁》里，举了不少的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譬如《汉书·张苍传》有“年老口中无齿”这样一句话，他认为可以删去“年”“口中”三个字，只要保存“老无齿”三个字，意义就已经明显了。刘知几对史笔的要求是：“夫史之叙事也，当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史通·鉴识》）。可是齐梁以来，文体的骈俪化，也扩展到了史笔的范畴里来了。史书的作者，往往“芜音累句，云蒸泉涌。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蔽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

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裁”（《史通·叙事》）。而且他们又喜欢使用典故，如“论逆臣则呼为问鼎，称巨寇则目以长鲸，邦国初基，皆云草昧；帝王兆迹，必号龙飞”（同上）。“绮扬绣合，雕章缛彩，欲称实录，其可得乎？”（《史通·鉴识》）刘知几主张用较朴素的文体来写历史，反对用浮靡华丽的骈俪文体来写历史。他认为如像徐陵、庾信那一类轻薄而流宕的文体，就不适宜去叫他们撰写史传。他还说，听说徐陵本来想写一部梁史，照他的看法，这部书亏得没写成，“嗟乎！以徐公文体，而施诸史传，亦犹灞上儿戏，异乎真将军”（《史通·核才篇》）。

刘知几最注重据事直书，无所隐讳。他称赞宋孝王所撰的《关东风俗传》，王劭所撰的《齐志》；认为在南北朝世家大族全盛时期，在所谓“河朔王公，箕裘未陨；邺城将相，薪构犹存”（《史通·直书》）的情况下，宋孝王、王劭两人却能“叙述当时，亦务在审直”，“书其所讳，曾无惮色”，这才配得上称历史家。

在魏、晋、南北朝世族地主的全盛时期，刘知几一方面认为有不少世族地主，“生无令闻，死无异迹”，在国史上不应该给他们立传，“虚班史传，妄占篇目”（《史通·列传》）。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江外（江东）山东，人物（世族）殷凑，其间高门素族，非复一家，郡（中）正、州都，世掌其任，凡为国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史通·书志篇》），以记录这些世家大族。这些都是他见识的卓越之处。

除了主张增加《氏族志》以外，刘知几还主张增添《都邑志》和《方物志》。他的建议，也有合理的地方。因为《都邑志》多少可以反映出都邑的结构和面貌来，《方物志》也必然会详细地记述各地的物产和封建剥削负担，如果真的把以上三志写成的话，对后世研究当时的社会经济和阶级结构，都是有一定好处的。但是刘知几又反对《魏书》的创立《释老志》，《汉书》的创立《艺文志》，尤其反对《五代史志》（即《隋书》之志）中的创立《艺文志》，这是他的偏执的地方。因为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两种志还是有它巨大的史料价值，不能片面地菲薄它。

唐初官修前朝史书时，往往为当时在朝大臣的父祖撰立列传，而这些列传的人物往往又是职位很低，行能无闻的；刘知几对此也加以反对。

刘知几对当时史馆里史官们的工作效率之低，也加以抨击。他说：“近代趋竞之士，尤喜居于史职，至于措辞下笔者，十无一二焉”（《史通·史官建置》）；当时史馆中，“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头白可期，而汗青（杀青成书）无日”（《史通·忤时》）。他还说：“彼史曹者，崇峻峻宇，深附九重，虽地处禁中，而人同方外，可以养拙，可以藏愚，绣衣直指（御史），所不能绳，强项中尉，所不能及，斯固素食之窟宅，尸禄之渊藪也”（《史通·辨职篇》）。他对监修国史的官吏，也抨击得非常尖锐，说：“顷史官注记，多取稟监修，故杨令公（杨再思）则云‘必须直词’，宗尚书（宗楚客）则云‘宜多隐恶’。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何在？”（《史通·忤时》）幸而一史经过几个得力的史官执笔写成了，可是领衔者，还是杨令公、宗尚书之流，实际真正执笔的人，后世连他们的名字都无法知道。所以他说：“书成缮写，则署名同献；爵赏即行，则攘袂争受，遂使是非无准，真伪相杂”（《史通·史官建置》）。他对这种现象，也是非常不满。

刘知几在《史通》的《疑古》、《惑经》等篇里，还用汲冢发现的《竹

书纪年》等书中所讲到的“舜放尧于平阳”，“益为启所杀”，“太甲杀伊尹”，来考证古代的历史，并认为《尚书·舜典》的舜“五十载陟方乃死”，注云：“死苍梧之野，因葬焉。”当时苍梧是极荒僻的地区，“兼复二妃不从，怨旷生离，万里无依，孤魂湔尽”（《史通·疑古》）。因此怀疑舜之陟方，也是由于禹把他废放而造成的。他对儒家经典上的传统说法，提出自己的不同见解来，尽管对古代的社会阶段及民俗学，无法了解。因此不可能获得正确的结论，但他那种大胆怀疑的精神，在当时说来，有其一定的进步意义。

在封建社会里，刘知几是一个杰出的历史批评家，他的《史通》是一部出色的历史批评著作。不过如刘知几在《史通·曲笔》里，斥班固、陈寿为“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可以“肆诸市朝，投畀豺虎”，这些话，语气不免有过火的地方。

此外，刘知几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很大局限。如他认为蔡文姬“受辱虏庭”，《后汉书》不应该把她收入《列女传》。又认为有一些“事关军国，理涉兴亡”的迷信故事，如“吞燕卵而商生，启龙漉而周灭”（褒姒灭周），“江使返璧于秦王，杞桥授书于汉相（张良）”（《史通·书事》）等神怪传说，还是可以写进史书里去的，这就使自己的论点，陷进矛盾的境地。

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 隋炀帝大业（公元六 五至六一八年）中，命虞茂等撰成《隋区宇图志》一百二十九卷，又时人郎蔚立撰成《隋诸州图经集》一百卷，时又有人撰成《隋诸郡土俗物产》一百五十一卷，失撰人名。这些书，由于只有抄本，没有刻本，《新唐书·艺文志》中尚见著录，此后便不见著录，大概很快就散失了。

《五代史志》中有《地理志》（即今《隋书·地理志》），记载梁、陈、北齐、周、隋的地理，在地理志中算是精详的。清杨守敬又为《隋书地理志考证》，世称博洽。唐太宗子魏王泰命著作郎萧德言、秘书郎顾胤、记室参军蒋亚卿、功曹参军谢偃、苏勳等撰《括地志》五百五十卷，《序略》五卷，原书已佚，但今有辑本。武则天时，有梁载言，历官凤阁舍人、知制诰、怀州刺史。他撰成《十道志》十六卷，全书已佚，清王谟有辑本。唐德宗时，杜佑著《通典》，已见前述。《通典》中有《州郡典》十四卷，对唐代前期的州郡沿革和布局，讲得扼要详细，可资参考。唐宪宗元和八年（公元八一三年），宰相李吉甫奉诏撰成《元和郡县图志》四十卷，每镇皆有图，其后图已散失，又缺第十九卷、第二十卷、第二十三卷、第二十四卷、第二十六卷、第三十六卷共六卷，又十八卷、二十五卷间有缺叶。这是现在留存下来最古的一部地理书。志载州郡、都城、山川、冢墓，皆有所本，无不根之说，也是研究唐代地理的重要著作。

研究唐代地理，除了上述诸书之外，还有《旧唐书·地理志》和《新唐书·地理志》，以及宋人乐史所著《太平寰宇记》。《新唐书·地理志》，对于折冲府，考稽得非常详细，对水利灌溉，也记述颇详。《太平寰宇记》虽是宋太宗太平兴国（公元九七六至九八三年）中修成，可是它所利用的材料，有很多是唐五代的，因此研究唐五代地理，也得参考它。

《两京新记》一卷，唐韦述撰。原本中土久佚，此从日本抄来，收入《佚存丛书》中。

《北户录》三卷，唐段公路撰。四库入地理类。书中载《鹅毛被》条：邕之南有酋豪，多用鹅毛为被，如稻畦纳之，其温软不下绵絮也。

《桂林风土记》一卷，唐莫休符撰。此书成于昭宗光化二年（公元八九九年），时休符以检校散骑常侍守融州（治融水，今广西融水县）刺史。四库入地理类。

《岭表录异》三卷，唐刘恂撰。书成于唐昭宗世。四库入地理类。书中载：

南道之酋豪，多选鹅之细毛，夹以布帛，絮而为被，复纵横衲之，其温不下于挟纩也。

广之属郡潮（治海阳，今广东潮安县）、循（治归善，今广东惠州市）多野象，牙小而红，最堪为笏。潮、循人或捕其象，争食其鼻，云肥脆，偏堪作羹……楚越之间，象皆青黑……予有亲旧，曾奉使云南，见彼中豪族，各家养象，若中华之畜牛马也。

这些地志记载，对了解两京和岭南风物人情，都是非常真切的。

唐三史注与《文选注》 汉司马迁撰成《史记》，成为一部千秋不朽的著作，南朝刘宋时人裴骃，注《史记》，撰成《史记集解》八十卷。唐贞观时，谏议大夫、崇贤馆学士刘伯庄撰《史记音义》二十卷。开元世，有润州司马河内郡人司马贞又“探求异闻，采摭典故，解其所未解，申其所未申者，释文演注，又重马《述赞》，凡三十卷，号曰《史记索隐》”（《史记索隐序》）。司马贞同时人右清道率府长史张守节，他潜心研究《史记》三十余年，“六籍九流，地里《苍》《雅》，锐心观采，……郡国城邑，委曲申明，古典幽微，窃探其美，索理允惬，次旧书之旨，兼音解注，引致旁通，凡成三十卷，名曰《史记正义》”。“开元二十四年（公元七三六年）八月，杀青斯竟”（《史记正义序》）。这三家注都是对《史记》带有总结性的注释，到了唐中叶，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班固《汉书》，汉魏两晋南北朝学人注之者也很多，唐贞观世，秘书少监颜师古注《汉书》一百二十卷，他在《汉书注·叙例》里说：“凡旧注是者，则无间然，具而存之，以示不隐。其有指趣略举，结约未伸，衍而通之，使皆备悉；至于诡文僻见，越理乱真，匡而矫之，以祛惑蔽。若泛说非当，芜辞竞逐，苟出异端，徒为烦冗，只秽篇籍，盖无取焉。旧所阙漏，未尝解说，普更详释，无不洽通。”《汉书》全部，“爰自陈、项，以迄哀、平，年载既多，综缉斯广，所以纪、传、表、志，时有不同，当由笔削未休，尚遗秕稗，亦为后人传授，先后错杂，随手率意，遂有乖张。今皆穷波讨源，构会甄释。”“近代注史，竟为该博，多引杂说，攻击本文，至有诋诃言辞，掎摭利病，显前修之纰僻，骋己识之优长。”颜师古继承了注不破经这一汉代学人的师法传统，坚持了“今之注解，翼赞旧书，一遵轨辙，闭绝歧路”。当时人称“颜秘书为班孟坚忠臣”。尽管颜师古这样说，但后代学人由于过分崇拜颜师古的缘故，有些根据他的说法，还是追改了《汉书》原文，如今本《东方朔传》“又有萩竹籍田”，萩原应作荻，由于如淳、颜师古都释作萩、楸，后人就以为萩字无讹，因此各本都作萩了。如果我们今天能用王充《论衡》所引《汉书》和《册府元龟》来校勘《汉书》，还可以校出《汉书》许多异文来。

范晔《后汉书》九十卷，唐高宗子章怀太子李贤注，当然章怀太子贤是挂名的，实际担任其事者，为张大安、刘讷言、革希玄、许叔牙、成玄一、史藏诸、周宝宁等人。前人对此书注之评价，认为“详观章怀之注范，不减于颜监（师古）之注班。惜非一手所成，不免有踳驳漏略之处”（王先谦《后

汉书集解》述略)。先是梁人刘昭注司马彪《续汉书》八志三十卷，宋真宗乾兴元年(公元一一二二年)，把章怀太子注的《后汉书》纪、传九十卷，和刘昭注的司马彪《续汉志》三十卷合刻在一起，就成为现在流行的《后汉书》本子。

梁武帝长子昭明太子萧统集文士选出一部《昭明太子文选》，到了唐代，成为辞章之学的标准读本，凡是应试诗赋的人，都得精读这部《文选》。唐高宗时人李善，历官太子右内率府录事参军，崇贤馆学士、秘书郎等职，他开始注《文选》，在唐高宗显庆三年(公元六五八年)完成进呈。这部《文选注》，后人给予它很高的评价。唐玄宗开元六年(公元七一八年)，又有衢州常山尉吕延济和处士张铣、吕向、李周翰、刘良等五人合注了《文选》进呈，世称之为《五臣注文选》，从此《文选》有两种注本流传。后人又把李善和五臣注合刻在一起，称之为《六臣注文选》。此后人们认为李善注《文选》，不仅徵引富博，保存了很多古籍的片断，而且在文字训诂和校勘上也用力至勤，不应和五臣注合刻在一起，因此，清嘉庆十四年(公元一八一九年)，胡克家又据宋淳熙本《文选》，采用李善单注，加以校刻上木，这就是今天流行的李善《文选》注本子。另外，商务印书馆在影印《四部丛刊》时，又影印了宋刊本的《六臣注文选》，《文选》有了这两种注本，用来进行研究，都是很理想的。

**隋唐五代杂史琐记书目介绍** 本节介绍的书目，以反映时代为先后，主要叙述的是隋唐五代人的作品，也附带一讲宋元和清代人述及隋唐五代时期典章制度以及人物的有关作品。

《建康实录》，唐许嵩撰。东吴、东晋、宋、齐、梁、陈所谓六朝，皆都建康(今南京市)，书中备记六朝事迹，故以为名。此书援引六朝古籍如裴子野《宋略》之类，今多不传，所以可贵。近年中华书局点校南朝宋、齐、梁、陈四史及《南史》时，曾据以作校，也颇有收获。

《通纪》，原本十卷，今存七卷，唐马总撰。书虽残缺，然遗文逸句，可校正《魏书》、《北齐书》、《周书》者不少。

《大业杂记》，唐杜宝撰，原为十卷，今已残缺，《指海》所辑，仅一卷而已。上起大业元年，下迄大业十二年，于隋炀帝修宫观，开运河，尚存大概。

《海山记》、《迷楼记》、《开河记》各一卷，并收入明吴琯《古今逸史》中，《四库全书总目》以为是宋人伪作，故入子部小说家类存目。

文中子王通著《中说》，前人以为是伪书。宋洪迈《容斋随笔》云：“王氏《中说》所载门人，多贞观时知名卿相，而无一人能振师之道者，故议者往往致疑。其最所称高第曰程、仇、董、薛，考其行事，程元、仇章、董常无所见，独薛收，唐史有列传，踪迹甚为明白。收以父道衡不得其死于隋，不肯仕，闻唐高祖兴，将应义举，郡通守尧君素觉之，不得去。及君素东连王世充，遂挺身归国，正在丁丑、戊寅(公元六一七至六一八年)岁中，丁丑为大业十三年，又为义宁元年，戊寅为武德元年，是年三月，炀帝遇害于江都，盖大业十四年也。”而杜淹所作《文中子世家》云：“十三年，江都难作，子有疾，召薛收谓曰：‘吾梦颜回，称孔子归休之命，乃寝疾而终。’殊与收事不合，岁年亦不同，是为大为可疑者也。”张溥在《云谷杂记》里解释当时可能有两个薛收，《文中子世家》中所说之薛收，可能另一薛收，而不是薛道衡之子薛收。张溥这个说法也不能使人心服。因为河东薛氏，是当

时大族，故薛道衡子薛收有可能受教于王通，两薛收的说法，就当时实际情况来看，是不存在的。又王应麟《困学纪闻》亦辨《唐会要》载武德元年五月，始改隋大兴殿为太极殿，而书中有隋文帝召见王通于太极殿事，皆证以史传，牴牾显然。然文中子实有其人，据杨炯《王勃集序》称勃“祖父通，隋秀才高第，蜀郡司户书佐、蜀王侍读，大业末，退让艺于龙门，其卒也，门人谥之曰文中子”。杨炯为王勃作序，记勃之祖事，必不向壁虚构。杜牧《樊川集》首有其甥裴延翰序，亦引文中子曰：“言文而不及理，王道何从而兴乎？”则文中子者实有其人。其人其书，在唐初并不著名，至韩愈尊儒辟佛，其书渐行于世，书中摹拟圣人之言，或后人有改篡也。

《贞观政要》十卷，唐天宝中史臣吴兢撰进。四库入杂史类。兢对贞观之政，辞多溢美。本书述太宗政治，多引此书。

《魏郑公谏录》五卷，唐高宗时，王方庆撰。方庆武则天时，官至宰相。魏郑公，即魏徵，他在唐太宗世，以能直言著称，唐太宗也能够接受直言。四库入传记类。

《隋唐嘉话》三卷，唐刘餗撰。书称玄宗为今上，盖开元间人。其书载：太宗病甚，出英公（徐勣）为夔州刺史。谓高宗曰：“李勣才智有余，屡更大任，恐其不厌伏于汝，故有此授。

今若即杀者，我死后可亲任之，如迟疑顾望，便当杀之。”勣奉诏不及家而行。

晋谢灵运须美，临刑，施为南海祇恒寺维摩诘须，寺人保惜，初不亏损。中宗朝，安乐公主五日门百草，欲广其物色，令驰驿取之，又恐为他人所得，因剪弃其余。遂绝。

《大唐新语》十三卷，元和中守江州浔阳县主簿刘肃撰。四库入小说类。书起武德之初，迄大历之末。书中载：

尹伊当为坊州司户，尚药局牒省索杜若，省符下坊州供送。伊判之曰：“坊州本无杜若，天下共知，省符忽有此科，应由谢勣眇诗误（谢眇《怀故人》诗；芳洲有杜若）。华省曹郎如此判，岂不畏二十八宿下向笑人。”由是知名，改补雍州司法。

〔御史大夫杨再思见张〕昌宗以貌美被宠，因谀之曰：“人言六郎似莲花，再思以为不然，只是莲花似六郎耳。”有识咸笑之。

元崇逵为果州司马，有一婢死，处分直典云：“逵家老婢死，驱使来久，为觅一棺木殓之。逵初到，家贫不能买得新者，但经一用者充事亦得。亦不须道逵买，直云君家自须。”直典出说之，一州以为口实。

其书多轶文旧事，如论宰相制度变革、宫人服装帷帽变革等，但由于谐谑一门，有上引诸条，所以四库列之于子部小说家。

《朝野僉载》六卷，唐张鷟撰。据莫休符《桂林风土记》：“张鷟字文成，深州陆泽（今河北深县）人。授襄乐尉，迁监察御史、司门员外〔郎〕。开元中，姚元崇为相，诬其奉使江南受遗……减死流岭南。数年，起为龚州（今广西桂平县东北）长史。卒年七十二。”书中载：

中宗令扬州造方丈镜，铸铜为桂树，金花银叶。帝每骑马自照，人马并在镜中。专知官高邮县令幼临也。

益州新昌县令夏侯彪之初下车，问里正曰：“鸡卵一钱几颗？”彪之乃遣取十千钱买三万颗，谓里正曰：“未须要，且寄母鸡抱之。”遂成三万头鸡，经数月长成，令县吏：“与我卖一鸡三十钱。”半年之间，成三十万。

又问：“竹笋一钱几茎？”曰：“五茎。”又取十千钱付之，买得五万茎，谓里正曰：“我未须要，笋又向林中养之。”至秋竹成，一茎十钱，成五十万。其贪鄙不道皆类此。

郑愔为吏部侍郎掌选，狼藉。引铨，有选人击百钱于靴带上，愔问其故，答曰：“当今之选，非钱不行。”愔默而不言。时崔湜亦为吏部侍郎，掌选，有铨引过分，疏云：“某能翘关负米。”湜曰：“君壮，何不兵部选。”答曰：“外边人皆云崔侍中下，有气力者即存。”

这两条材料，写出唐政府官吏的贪汗嘴脸，可谓详尽。

崇仁坊阿来婆弹琵琶卜，朱紫填门，浮休子张鹭曾往观之，见一将军，紫袍玉带甚伟，下一匹细绫，请一局卜。来婆鸣弦柱烧香，合眼而唱：“东告东方朔，西告西方朔，南告南方朔，北告北方朔，上告上方朔，下告下方朔。将军顶礼既，告请甚多，必望细看。以决疑惑。”遂即随意支配。

由于琐屑谐噱，四库列之于小说家类。

本书作者死于开元时期，而今本《朝野佥载》记载唐敬宗实历、唐宣宗大中时事，盖后人据《佥载补遗》补之，非张鹭原书如此。

《国史补》三卷，李肇撰。肇元和中为中书舍人，左迁将作少监。上卷中卷各一百三条，下卷一百二条，四库列于小说家类。记开元至长庆一百多年事。其书载：

德宗览李令（李晟）收城露布至：“臣已肃清宫禁，只谒寝园，钟簾不移，庙貌如故。”感涕失声，左右六军皆呜咽。露布，于公异之词也。议者以国朝捷书露布无如此者。公异后为陆贽所忌，诬以家行不至，赐《孝经》一卷，坎以终，朝野惜之。

马司徒（马燧）之子畅，以第中大杏馈窦文场（宦官），文场以进。德宗未尝见，颇怪之，令使就第封杏树，畅进进宅，废为奉诚园，屋木尽拆入内也。

唐衢，周郑客也。有文学，老而无成。唯善哭，每一发声，音调哀切，闻者泣下。尝游太原，遇享军，酒酣乃哭，满坐不乐，主人为之罢宴。

韩愈好奇，与客登华山绝峰，度不可返，乃作遗书，发狂痛哭，华阴令百计取之乃下。”

《次柳氏旧闻》一卷，唐李德裕撰，记玄宗遗事十七则。四库入小说家类。

《杨太真外传》二卷，宋乐史撰。其书载太真入宫事甚详。

开元二十二年十一月，归于寿邸（玄宗子瑁封寿王），二十八年十月，玄宗幸温泉宫，使高力士取杨氏女于寿邸为女道士，号太真，住内太真宫。天宝四载七月，册左卫中郎将韦昭训女配寿邸。是月，于凤凰园册太真宫女道士杨氏为贵妃，半后服用。

《高力士外传》，唐郭湜撰。书中载玄宗事。又云：

力士于园中见荠菜，土人不解吃，便赋诗曰：“两京秤斤买，五溪无人采。夷夏虽有殊，气味应不改。”使拾之为羹，甚美。

《明皇杂录》二卷，别录一卷，唐郑处晦撰。处晦在文宗太和八年（公元八三五年），以进士擢第，官至宣武节度使。是书成于太和九年，四库入小说家类。

《开元天宝遗事》四卷，五代王仁裕撰。仁裕五代后汉时官至翰林学士承旨、户部尚书，后周显德三年（公元九五六年）病卒。前人以为非王仁裕

原作，盖依托其名。洪迈《容斋随笔》“摘其中舛谬者四事，一为姚崇在武后时已为宰相，而云开元初作翰林学士；一为郭元振贬死后十年，张嘉贞乃为宰相，而云元振少时，宰相张嘉贞纳为婿；一为张九龄去位十年，杨国忠始得官，而云九龄不肯及其门；一为苏颋为宰相时，张九龄尚未达，而云九龄览其文卷，称为文阵雄师。”所驳诘皆为确当。其书载：

杨国忠权倾天下，四方之士，争诣其门。进士张彖者，陕州人也。力学有……志气……未尝低折于人，人有劝彖令脩谒国忠，可图显荣。彖曰：“尔辈以谓杨公之势，倚靠如太山，以吾所见，乃冰山也。或皎日大明之际，则此山当误人尔。”后果如其言。

《开天传信记》一卷，唐郑棨撰。棨昭宗时官至宰相，其书记开元天宝时事，凡三十二条。四库入之小说家类。

《安禄山事迹》三卷，唐姚汝能撰。汝能官华阴县尉，年代未详。是书上卷序禄山始生至玄宗宠遇，起长安三年尽天宝十二载事。中卷序天宝十三四载禄山起兵事。下卷序禄山起兵称帝并安庆绪、史思明、史朝义事，下尽宝应元年。《安禄山事迹》一书，对安史之乱的研究，有一定参考价值。但有些内容，诙谐可笑，如：

〔史〕思明本不识文字，忽然好吟诗，每就一章，必驿宣示，皆可绝倒。尝欲以樱桃赐其子朝义及周贽，以彩笺敕左右书之曰：“樱桃一笼子，半赤一半黄，一半与怀王（史朝义封怀王），一半与周贽。”小吏龙谭进曰：“请改为一半与周贽，一半与怀王，则声韵相叶。”思明曰：“韵是何物！岂可以我儿在周贽之下。”……郡国传写，置之邮亭。

《奉天录》四卷，唐赵元一撰。记唐德宗建中四年（公元七八三年）至兴元二年（公元七八五年）朱泚肇乱事。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多引用之，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李〔绛〕相国论事集》六卷，唐史官蒋偕编。凡收李绛为翰林学士时四十六事，为户部侍郎事四事，为宰相时十五事，共六十五条。书中载论朋党事甚激切。

元和七年（公元八一四年）春，延英〔殿〕对见，奏事了，上发言曰：“朕不知同年之称，便有情故，除授之际，遽有偏颇，何也？”对曰：“李吉甫、权德与并非科第；唯臣一人，是进士及第。有同年者，是四海之人，悉非亲族，亦有放出身然后始相识，谓同此出身，何得便有情故。每年明经进士及第一百余人，每年春同年吏部得官一千五百人，亦是同年，言事者知陛下不亲小事，敢以此罔上。”

上御延英殿与宰臣言：“向外人言朋党颇甚，如何？”武元衡、李吉甫未对，而李绛奏曰：“朋党之称为臣也。臣历观自古及今，帝王最恶者是朋党。奸臣能揣知上旨，非言朋党，不足以激怒主心。故小人谮毁贤良，必言朋党。寻之则无迹，言之则可疑，所以构陷之端，无不言朋党者。”朋党之说，兴自元和，迄大中未已，为祸之烈，盖五十年，在李绛延英论事中，就开始见其端倪了。

《封氏闻见记》十卷，唐封演撰。演德宗大历中曾为邢州刺史，贞元中为检校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四库入杂家类。书中载：

天宝中，御史大夫王鉞……宅内有自雨亭，从檐上飞流四注，当夏处之，凛若高秋。

高利自濠州改为楚州，时江淮米贵，职田每得粳米，直数千贯。准例替

人五月五日以前到者得职田，利欲以让前人，发濠州，所在故为淹泊，候过数日，然后到州，士子称焉。

萧诚自务礼翰，李邕自京别书，二人俱在南中，萧有所书，将谓称意，以呈邕，邕辄不许。萧……遂假作古帖数幅，朝夕把玩，令其故暗，见者皆以为数百年书也。萧诣邕云：“有右军真迹，宝之久矣，欲呈大匠。”李欣然愿见。萧故迟回旬日，未肯出也。后因论及，李固请见……萧于是令家童归……取……既至，李寻绎良久，不疑其诈，云：“是真物，平生未见。”在坐者咸以为然。数日，萧默候邕宾客云集，因谓李曰：“公常不许诚书，昨所呈数纸，幼时书，何故呼为真迹，鉴将何在？”邕愕然曰：“试更取之。”及见，略开视，置床上曰：“子细看之，亦未能好。”

《尚书故实》一卷，唐李绰撰。四库入杂家类。书中载：

元载破家，籍财货诸物，得胡椒九百石。

构圣善寺佛殿僧惠范，以罪没入其财，得一千三百万贯。

李抱真之镇潞州也（德宗建中初），军计匱阙，计无所为。有老僧大为郡人信服，抱真因诣之，谓曰：“假和尚之道以利军中，可乎？”僧曰：“无不可。”抱真温言请于鞠场焚，某当鑿一地道通连，候火作，即潜以相出。僧喜从之。遂陈状声言，抱真命于鞠场积薪储油，因为七日道场，昼夜香灯梵呗杂作……僧仍升座执炉、对众说法。

……士女骈填，拾财亿计。满七日，遂送柴积，灌油发焰，击钟念佛，抱真密已遣人填塞地道。俄顷之际，僧炭并灰。数日，籍所得货财，辇入车资库，别求所谓舍利者数十粒，造塔贮焉。

又说洛中顷年有僧得数粒所谓舍利者，贮于琉璃器中，昼夜香灯，檀施之利，日无虚焉。有士子迫于寒馁，因请僧愿得舍利，掌而观瞻，僧遂出瓶授与，遽即吞之，僧惶骇如狂，复虑闻之于外。士子曰：“与吾几钱，当服药出之。”僧闻喜，遂赠二百缗，仍取万病丸与吃，俄顷泄痢，以盆盎盛贮，濯而收之。

把僧侣的贪财的嘴脸，暴露无遗。

《刘宾客（刘禹锡）嘉话录》一卷，唐韦绚撰。韦绚，韦执谊子，历江陵少尹，咸通（公元八六 至八七三年）中，官至义武军节度使。书成于大中十年（公元八五六年），四库入小说家类。书中载：

杨国忠尝会诸亲，时知吏部铨事，且欲大噓。已设席，呼选人名，引入于中庭，不问资序，短小者道州参军（道州出侏儒），胡者湖州文学，帘中大笑。

刘仆射晏五鼓入朝，中路见卖蒸胡之处，势气腾辉，使人买之，以袍袖包裙帽底啗之。且谓同列曰：“美不可言，美不可言。”

大司徒杜公（佑）在维扬也，曾召宾幕闲语：“我致政之后，必买一小驷八九千者，饱食讫而跨之，著一粗布襦衫，入市看盘铃傀儡足矣。”

《因话录》六卷，唐赵璘撰。璘开成三年（公元八三八年），以进士擢第。大中七年（公元八五三年），为左补阙，后为衢州刺史。是书四库入小说家类。

《大唐传载》一卷，不著撰人名氏。记唐初至元和中杂事，四库入小说家类。

《教坊记》一卷，唐崔令钦撰。四库入小说家类。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日本求法僧圆仁撰。书中载唐王朝事，如：

〔太和九年十一月〕应宰相及王相公已上，计煞宰相及大宰都廿人，乱煞计万人以上。

开成五年二月廿二日，又闻开成天子今年正月三日崩。闻新天子（宣宗）上位，城中杀却四千余人，先帝（文宗）时承恩者也。

开成五年三月二日……牟平县至登州，傍北海行。比年虫灾，百姓饥穷，吃橡为饭。

三月廿五日，从登州文登县至此青州，三四年来，蝗虫灾起，吃却五谷，官私饥穷，登州界专吃橡子为饭。粮食难得，粟米一斗八十文，粳米一斗一百文，无粮可吃。

八月十日早发，西行三十里稷山县。黄（蝗）虫满路，及城内人家无地下脚。宿斋后，复西行六十五里，黄（蝗）虫满路，吃粟穀尽，百姓忧愁。

八月十六日，渡洛河。从洛河西，穀苗黄（蝗）虫吃尽，村乡百姓愁尽。

说明文宗开成末年，蝗虫为灾，百姓无食可吃。同时也提甘露事变，杀人上万，及文宗死，又杀四千余人，这些记载，都较正史为详。可见此书，史料价值较高。

《牛羊日历》一卷，唐刘轲撰。刘轲站在李德裕一派立场上，攻击牛僧孺、杨虞卿、杨汉公、李宗闵。牛僧孺有妾真珠，能歌善舞。白居易、刘禹锡诗中都曾道及。此书说真珠本是李愿之伎，牛僧孺的党羽，以计赚取，进献于牛。又如訾毁牛僧孺“作《周秦行纪》，呼德宗为沈婆儿，谓睿圣皇太后为沈婆，此乃无君甚矣。”刘轲公开利用著述来攻击其政敌，可谓用心极其险恶。

《西阳杂俎》二十卷，续集十卷，唐段成式撰。成式，宰相段文昌子，官至太常卿。梁元帝赋：“访西阳之逸典。”书盖取名于此。“其书多诡怪不经之谈，荒渺无稽之物，而遗文秘籍，亦往往错出其中”，故“自唐以来，推为小说家之翘楚，莫或废也”（《四库全书总目》）。书中载：

旧言月中有桂，有蟾蜍，故异书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树创随合。人姓吴名刚，西河人，学仙有过，谪令伐树。（《天咫》）

突厥事祆神，无祠庙，刻毡为形，盛于皮袋，行动之处，以脂酥涂之，或系之竿上，四时祀之。（《境异》）

上都街肆恶少，率髡而肤扎，备众物形状，恃诸军张拳强劫……今京兆薛公元赏上言白令里长潜部约三十余人悉杖煞尸于市……又高陵县捉得镂身者宋元素，刺七十一处，左臂曰：“昔日已前家未贫，苦将钱物结交亲。如今失路寻知己，行尽关山无一人。”（《黥》）

李夷简，元和末在蜀，蜀市人赵高好斗，常入狱，满背镂毗沙门天王，吏欲杖背，见之辄止，恃此转为坊市患害。左右言于李，李大怒，擒就厅前，索新造筋棒，头径三寸，叱杖子打天王尽则已，数三十余不绝。经旬日，袒衣而历门叫呼，乞修理功德钱。（《黥》）

大历已前，士大夫多妒悍者，婢妾小不如意，辄印面，故有月点、钱点。（《黥》）

宁王常猎于鄆县界，搜林，忽见草中一柜，扃锁甚固。王命发视之，乃一少女也。问其所自，女言“姓莫氏，父亦曾作仕，叔伯庄居，昨夜遇光火贼，贼中二人是僧，因劫某至此。”动婉含嚬，冶态横生，王惊悦之，乃载以后车，时……方获一熊，置柜中如旧锁之。时上方求绝色，王以莫氏衣冠子女，即日表上之，具其所由，上令充才人。

经三日，京兆奏：“鄠县食店有僧二人，以钱一万，独赁店一日一夜，言作法事。唯舁一柜入店中，夜久膈膊有声，店户人怪。日出不启门，撒户视之，有熊冲人走出，二僧已死，骸骨悉露。”上知之大笑，书报宁王云：“宁哥大能处置此僧也。”莫才人能为秦声，当时号莫才人焉。

《东观奏记》三卷，唐裴庭裕撰。龙纪（公元八八九年）大顺（公元八九至八九一年）景福（公元八九二至八九三年）之际，杜让能为宰相，监修国史，右补阙裴庭裕等专修宣宗实录，书未成，庭裕但采宣宗事，成《东观奏记》三卷，即此书。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多采其说，但亦不完全信它。“盖闻见所及，记近事者多确；恩怨未尽，记近事者亦多诬，自古而然，不但此书”（《四库全书·史部·杂史类·东观奏记》），书中载：

武宗朝，任宰相李德裕，德裕虽宰相子，文学过人。性孤峭，疾朋党如仇讎，挤牛僧孺、李宗闵、崔珣于岭南，杨嗣复……李公珣以会昌初册立事，亦七年岭外。上（宣宗）即位之后，岭表五相，同日迁北，以吏部尚书李珣为检校尚书右仆射，充淮南节度使。

宪宗皇帝晏驾之夕，上虽幼，颇记其事，追恨光陵（穆宗）商臣之酷，即位后，诛锄恶党，无漏网者。时郭太后（宪宗正配）无恙，以上英察孝果，且怀惭惧，时居兴庆宫，一日，与二侍儿同升勤政楼，倚衡而望，便欲殒于楼下，欲成上过，左右即持之，即闻于上，上大怒，其夕太后暴崩，上志也。

武宗好长生久视之术，于大明宫筑望仙台，势侵天汉。上（宣宗）始即位，斥道士赵归真杖杀之，罢望仙台。

裴稔为学士，一日加承旨。上幸翰林，稔寓直，便中请（当作中谢）。上曰：“加官之喜，不与妻子相面，得否？便放卿归。”稔蹈谢，却召，上以御盘果实赐之，稔即以衫袖张而跪受。上顾一宫嫔取项下小帛裹以赐稔。稔父度，元和中君臣鱼水之分，遂于稔恩礼亦异焉。

上延英听政，问宰臣白敏中曰：“宪宗迁座景陵，龙輶行次，忽值风雨，六宫百官尽避去，惟有一山陵使胡而长，攀灵驾不动，其人姓氏为谁，为我言之。”敏中奏：“景陵山陵使令狐楚。”上曰：“有儿否？”敏中奏：“长子绪，见任随州刺史。”上曰：“可任宰相否？”敏中曰：“绪小患风痹，不任大用。次子絢见任湖州刺史，有台辅之器。”上曰：“追来。”翌日，授考功郎中、知制诰，到阙，召充翰林学士，间岁，遂立为相。《幽间鼓吹》一卷，唐张固撰。载唐宪宗至宣宗遗事，四库入小说家类。书中载：

宣宗囑念万寿公主，盖武皇世有保护之功也。驸马郑尚书（颢）之弟凯，尝危疾，上使讯之。使回，上问：“公主视疾否？”曰：“无。”“何在？”曰：“在慈恩寺看戏场。”上大怒，且叹曰：“我怪士大夫不欲与我为亲，良有以也。”命召公主，公主走辇至，则立于阶下不视，久之……上责曰：“岂有小郎病，乃亲看他处乎？”立遣归宅。毕宣宗之世，妇礼以修饰。

裴公休在相位，一日奏对，宣宗曰：“今赐卿无畏，有何贮书，言之。”公尝蓄论储宫之意，至是乃顿首以谏，上曰：“若立储君，便是闲人。”公不敢尽言而退。

丞相牛公（僧孺）应举，知于顛相之奇俊也，特诣襄阳求知（于顛自贞元十四年任山南东道节度使，镇襄阳，至元和三年入为宰相），住数月，两见，以海客遇之。牛公怒而去，去后忽召客将问曰：“累日前有牛秀才，发未？”曰：“已去。”“何以赠之？”曰：“与之五百（文）。”“受之乎？”曰：“掷之于庭。”于公大恨，谓宾佐曰：“某盖事繁，有阙违者。”立命

小将赍绢五百，书一函追之，曰：“未出界即领来；如已出界，即送书信。”小将于界外追及，牛公不启封揖回。

《松窗杂录》一卷，唐李濬撰。四库入小说家类。书中载：

狄仁杰之为相也，有卢氏堂姨，居于午桥南别墅，姨止有一子，而未尝来都城亲戚家，梁公每遇伏腊晦朔，修礼甚谨。尝经甚雪，多休暇，因候卢姨安否。适见表弟挟弓矢携雉兔来归，膳味进于北堂，顾揖梁公，意甚轻简。公因启姨曰：“某今为相，表弟有何乐从，愿悉力以从其旨。”姨曰：“相自贵尔，有一子，不欲令其事女主。”公大惭而退。

太和开成中，有程修己者，以善画得进。……会春暮，内殿赏牡丹花。上颇好诗，因问修己曰：“今京邑传唱牡丹花诗，谁为首出？”修己对曰：“臣尝闻公卿间多吟赏中书舍人李正封诗曰：‘天香夜染衣，国色朝酣酒。’”上闻之，嗟赏移时。

《云溪友议》三卷，唐范摅撰。四库入小说家类。《新唐书·艺文志》《云溪友议》下注云：“咸通时，自称五云溪人。”

《杜阳杂编》三卷，唐苏鹞撰。鹞，武功人，光启（公元八八五至八八八年）中，以进士擢第。是编所记，上起代宗广德元年，下尽懿宗咸通十四年，凡十朝之事。四库入小说家类。书中载：

鱼朝恩专权使气，公卿不敢仰视。宰臣或决政事，不预谋者，则睚眦曰：“天下之事，岂不由我乎。”……朝恩幼子曰令徽，年十四五，始给事于内殿，上以朝恩故，遂特赐绿焉（唐制，六品七品以绿）。未浹旬月……朝恩……于上前奏曰：“臣幼男令徽，处众僚之下，愿陛下特赐金章以超其等。”上未及语，而朝恩已令所司捧紫衣（三品以上服紫）而至，令徽即谢于殿前，上虽知不可，强谓朝恩曰：“卿儿著章服，大宜称也。”

《苏氏演义》二卷，唐苏鹞撰。四库入杂家类。书中载：

陆法言著《切韵》，时俗不晓其韵之清浊，皆以法言为吴人而为吴韵也。此大误也，法言本代北人，世为部落大人，号步孤氏，后魏孝文帝改为陆氏。及迁都洛阳，乃下令曰：“从我入洛阳，皆以河南洛阳为望也。”（后魏征西将军东平王陆俟生骐驎，骐驎曾孙爽，爽子法言。）

《桂苑丛谈》一卷，不著撰人真名，题冯翊子撰。四库入小说家类。书中记南北朝事六条，唐代事十二条。中载：

进士……张祐，下第后多游江淮……岁余薄有资力。一夕，有非常人妆束甚武，腰剑手囊，囊中贮一物，流血殷于外，入门谓曰：“此非张侠士居也？”曰：“然。”揖客甚谨。既坐，客曰：“有一雠人之恨十年矣，今夜获之，喜不能已。”因指囊曰：“此其首也。”问张曰：“有酒店否？”命酒饮之。饮讫曰：“去此三千里，有一义士，予欲报之，若济此夕，则平生恩怨毕矣。闻公义气，能假予十万缗否？立欲酬之，是予愿毕，此后赴蹈汤火，誓无所惮。”

张深喜其说，且不吝嗇，即倾囊烛下筹其缗素，中品之物，量而与焉。客曰：“快哉！无所恨也。”遂留囊首而去，期以却回。既去，及期不至，五鼓绝声，杳无踪迹。又虑囊首彰露，以为己累，客且不来，计无所出，乃遣家人开囊视之，乃豕首也。由是豪侠之气顿衰矣。

《剧谈录》二卷，唐康骞撰。骞，池阳人。乾符四年（公元八七七年），以进士擢第，官崇文馆校书郎。书中载：

曲江池……开元中疏鉴，遂为胜境。其南有紫云楼、芙蓉苑，其西有杏

园、慈恩寺，花卉环周，烟水明媚，都人游赏，盛于中和上巳之节。彩幄翠幌，匝于堤岸，鲜车健马，比肩击毂。上巳即赐宴臣僚……百辟会于山亭，恩赐太常及教坊声乐，池中备绣舟数双，唯宰相三使北省官与翰士学士登焉……入夏则菰蒲葱翠，柳阴四合，碧波红蕖，湛然可爱。好事者赏芳辰，玩清景，联骑系觞，亶亶不绝。

含元殿，国初建造，凿龙首岗以为基趾。彤墀扣砌，高五十余尺。左右立栖凤翔鸾二岗，龙尾道出于阙前，

倚栏下瞰，前山如在诸掌。殿去五门二里，每元朔朝会，禁军与御仗宿于殿庭，金甲葆戈，杂以绮绣，罗列文武，纓珮序立，蕃夷酋长仰观玉座，若在霄汉，识者以为自姬汉之代迄于亡隋，未有如斯之盛。

大中年，韦 举进士，词学优赡，而贫窶滋甚。岁暮饥寒，无以自给。有韦光者，以宗党辍新居外舍馆之。放榜之夕。风雪凝互，报光成名者络绎而至， 略无登第之耗。光延之于庭际小阁，备设肴饌慰安之…… 夜分归于所止，拥炉而坐。愁欢无已。候光成名，将修贺礼。寝榻迫于坏牖，以横竹挂 蔽之……俄而禁鼓忽鸣，榜到， 已登第，光之服用车马，悉皆遗焉。

《平巢事迹考》一卷，宋人撰，不著名字。四库入杂史类存目。

《三水小牋》一卷，唐皇甫枚撰。枚懿宗咸通（公元八六 至八七四年），曾为汝州鲁山县令。唐末旅食汾晋，写成此书。书中载：

乾符丁酉岁（公元八七七年）秋七月，诏以左卫将军刘秉仁为江〔州〕刺〔史〕。刘公自京将一橐驼至郡，自风而逸于庐山下。南土无此畜，人睹而大惊，因聚徒击射至毙。乃列状于太守曰：“获庐水精。”刘公讶其事，既至，愀然曰：“此吾橐驼也。”乃命瘞于江壖。

《广陵妖乱志》一卷，唐郑延晦撰。记高骈败亡事。

《南楚新闻》，唐尉迟枢撰。所记唐末捉梢郭使君及看马李仆射，后世小说，多取之作为题材。

江陵有郭七郎者，其家资产甚殷，乃楚域富民之首。……乾符（公元八七四至八七九年）初年……是时唐季，朝政多邪，生乃输数百万于鬻爵者门，以白丁易得横州（治宁浦，今广西横县南）刺史。遂决还乡。时渚宫新罹……乱……生归旧居……方知弟妹遇兵乱已亡，独母与二三奴婢处于数间茅屋之下，囊橐荡空，旦夕以纫针为业。生之行李间有一二千缗，缘兹复得苏息。乃备舟与母赴秩（赴任）。过长沙，入湘江，次永州北，江南有佛寺名兜率，是夕宿于斯，结缆于大橹树下，夜半忽大风雨，波翻岸崩，树卧枕舟，舟不胜而沉，生与一梢公拽舟登岸，仅以独免，其余婢仅生计悉漂于怒浪。迟明投于僧室，母氏以惊得病，数日而殒。生章皇驰往零陵（今湖南零陵县）告州牧，州牧为之殡葬，且复赠遗之。既丁忧，遂寓居永郡（即永州，治零陵），孤且贫，又无亲识，日夕厄于冻馁。生少小素涉于江湖，颇熟风水间事，遂与往来舟船执梢以求衣食。永州市人呼为捉梢郭使君。自是状貌异昔，与篙工之党无异矣。

京华有李光者……以谄佞事田令孜，令孜嬖焉，为左军使，一旦奏授朔方节度使。敕下翼日无疾而死。光有子曰德权，年二十余，令孜遂署剧职。会僖皇幸蜀，乃从令孜扈驾，止成都……数年之间，聚贿千万，官至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右仆射。后〔陈〕敬暄败，〔德权〕为官所捕，乃脱身遁于复州（治沔阳，今湖北沔阳县西南），衣衫百结，丐食道涂。有李安者，常为复州后槽健儿……念其蓝缕，邀至私舍……未半载……安……死，德〔权〕

遂更名彦思，请继李安效力，盖慕彼衣食耳。寻获为牧守圉，人有识者，皆目之为看马李仆射。

《玉泉子》一卷，不著撰人名字。四库入小说家类。

《云仙散录》十卷，亦作《云仙杂记》，唐冯贽撰。前人以为伪书，虽所引书目，皆历代史志所未载，然谓之为伪书，则是厚诬古人。四库入小说家类。书中载：

裴令（度）临终，告门人曰：“吾死无所系，但午桥庄松雪岭未成，软碧池绣尾鱼未长，《汉书》未终篇，为可恨耳。”（引《晋公遗语》）

进士不第者，亲知供酒肉费，号买春钱。（引《承平旧纂》）

杜甫寓蜀，每蚕熟，即与儿躬行而乞，曰：“如或相悯，惠我一丝两丝。”（引《浣花旅地志》）

邳中老母村人织绫，必三交五结，号八梭绫，匹值米六筐。（引《摭拾精华》）

开成中，物价至微，村落买鱼肉者，俗人买，以胡绢半尺；士大夫买，以乐天诗一首兼之。（引《丰年编》）

石诩未娶，闻杜鹃唤归，叹曰：“此物催人使归，使我何所归耶。”（引《金台录》）

洛阳振德坊皆贫，例享糟糠之薄，贺知章目为糠市。（引《从容录》）

《金鑿密记》五卷，唐韩偓撰，见《新唐书·艺文志》。原书残缺，此经后人辑录，故四库未收。

《潇湘录》十卷，唐柳祥撰，见《新唐书·艺文志》。原书残缺，此经后人辑录。

《摭言》十五卷，五代王定保撰。四库入小说家类。此书述唐一代贡举之制特详，本书引用特多。

《中唐故事》二卷，南唐尉迟偓撰。四库入小说家类。南唐自以为承唐之后，故称长安为中朝。其书皆记唐宣、懿、昭、哀四朝旧闻。上卷多记君臣事迹、朝廷制度。下卷则杂录神异怪幻之事。

《金华子》二卷，南唐刘崇远撰。四库入小说家类。

《唐阙史》二卷，五代高彦休撰。四库入小说家类。

《甘泽谣》一卷，唐袁郊撰。四库入小说家类。

《资暇集》三卷，唐李匡乂撰。四库入小说家类。书中载：

押牙，武职令有押衙之目，衙宜作牙，此职名非押其衙府也。盖押牙旗者，又有押节者之类是也。案兵书云：“牙旗者将军之旌，故必竖牙旗于门，是以史传咸作牙门字”。

星货肆，有以筐，以笕，或倚、或垂鳞其物以鬻者曰星货铺，言其列货丛杂，如星之繁，今俗呼为星火铺是也。

《刊误》二卷，唐李涪撰。书中“祭节拜戟”条载：

上元元年（公元七六六年），宰相吕諲立戟，有司载戟及门，諲……乃更吉服，迎而拜之。颇为有识者所嗤。

《续博物志》十卷，宋李石撰。四库入小说家类。书中载：

黄公好谦，女有国色而谦其美，以为丑也，女至难嫁。有鰥夫冒娶之，乃国色。果信黄公之谦。

《北梦琐言》十卷，荆南孙光宪撰。四库入小说家类。书中载：

江陵在唐世号衣冠薮泽，人言琵琶多于饭甑，措大多于鲫鱼。

白太傅居易文章冠世，不躐大位。先是刘禹锡太和中为宾客，时李太尉德裕同分司东都。禹锡谒于德裕曰：“近曾得白居易文集否？”德裕曰：“累有相示，别令收贮，然未一披。今日为吾子览之。”及取看，盈其箱笥，没于尘盆。既启之而复卷之，谓禹锡曰：“吾于此人，不足久矣。其文章精绝，何必览焉。但恐回吾之心。”其见抑也如此。葆光子曰：李卫公之抑忌白少傅，举类而知也。初文宗命德裕，朝中朋党，首以杨虞卿、牛僧孺为言。杨、牛，即白公密友也。其不引翼，义在于斯。

唐相国李太尉德裕抑退浮薄，奖拔孤寒，于是朝贵朋党，掌武（指太尉李德裕）破之，由是结怨，而绝于附会，门无宾客。会昌三年，王相国起知举，先白掌武，乃曰：“某不荐人，然奉贺今年榜中得一状元也……”其年，卢肇为状元及第。

唐吴行鲁尚书，彭州人。少年事内官西门军容，小心畏慎，每夜温澣器以奉之，深得中尉之意……尔后假以军职，除彭州刺史，为卢耽相公西川行军司马，御蛮有功，历东西川山南三镇节旄。

宋统一宇内，宋太宗于太平兴国二年（公元九七七年）三月，下诏命李昉领衔撰集《太平广记》五百卷，目录十卷。太平兴国三年八月，书成表进。这一部书采摭宏富，引书凡三百四十四种，可谓宋以前笔记小说之渊薮。要研究唐人笔记小说，主要依靠这部《太平广记》。这里略举三事，一是讲琼山郡守拥有奴隶之众多，二是武昌官妓之能诗，三是前蜀时有女扮男妆之才女。

琼山（今广东琼山县南六十里）郡守韦公干者，贪而且酷，掠良家子为臧获，如驱犬豕。有女奴四百人，执业者太半，有织花缣文纱者，有伸角为器者，有镕锻金银者，有攻珍木为食具者，其家如市，日考月课，唯恐不程。（引《投荒杂录》）

韦蟾廉问鄂州，及罢任，宾僚盛陈祖席，蟾遂书《文选》句云：“悲莫悲兮生别离，登山临水送将归。”以笺毫授宾，请续其句。座中怅望，皆思不属。逡巡，女妓泫然起曰：“某不才，不敢染翰，欲口占两句。”韦……令随口写之，“武昌无限新栽柳，不见杨花扑面飞。”座客无不嘉欢。韦令唱作《杨柳枝词》，极欢而散。（引《抒情诗》）

王蜀（前蜀）有伪相周庠者……时临邛失火黄崇嘏才下狱，便贡诗一章曰：“偶离幽隐住临邛，行止艰贞比涧松。何事政清如水镜，绊他野鹤向深笼。”周览诗，遂召见，称乡贡进士，年三十许，只对详敏，即命释放。后数日，献歌，周极奇之，名于学院与诸生侄相伴。善棋琴，妙书画。翌日，荐摄府司户参军……胥吏畏伏，案牒丽明。周既重其英聪，又美其风采，在任将逾一载，遂欲以女妻之。崇嘏又袖封状谢，仍贡诗一篇曰：“一辞拾翠碧江涯，贫守蓬茅但赋诗。自服蓝衫居板掾，未抛鸾镜画蛾眉。立身卓尔青松操，挺志铿然白璧姿。幕府苦容为坦腹，速天速变为男儿。”周览诗惊骇不已，遂召见诘问，乃黄使君之女，幼失覆荫，唯与老妪同居，元未从人。周益仰贞洁，郡内咸皆叹异。旋乞罢归临邛之旧隐，竟莫知存亡焉。（引《玉溪编事》）

《唐语林》八卷，宋王谠撰。谠，宋徽、钦时人。是书收唐小说笔记五十家，仿《世说新语》分为五十二门，记唐代事。所引诸书五十种中，大概三十种具存，二十种已散失，可惜其书没有仿《太平广记》例，每条注出引书书名。书中载：

刘晏为诸道监铁转运使，时军旅未宁，西蕃入寇，国用空竭。始于扬州转运，船始以十双为一纲，载江南穀麦，自淮泗入汴，抵河阴，每船载一千石。扬州遣军将押至河阴之门，填阙一千石。转相授给，达太仓，十运无失，即授优劳官。汴水至黄河迅急，将吏典主，无不发白……晏初议造船，每一船用钱百万，……乃置十场于扬子院，专知官十人，竟自营办。

韩愈病将卒，召群僧曰：“吾不药，今将病死矣。汝详视吾手足支体，无诳人云韩愈癩死也。”

李相宗闵知贡举，门生多清雅俊茂，唐冲、薛庠、袁都，时谓之玉笋。

卢肇、黄颇同游李卫公门下，王起再知贡举，访二人之能。或曰：“卢有文学，黄能诗。”起遂以卢为状头，黄第三人。

李卫公以己非科第，常嫉进士。及为丞相，权要束手。王起知举，将入贡院，请德裕所欲。德裕曰：“安问所欲，借如卢肇、丁棱、姚颀，不可在击流内也。”起从之。或曰：“德裕初为某处从事时，同院有李评事者，进士也，与德裕官同。有举子投卷，误与德裕，举子即悟，复请之曰：‘文轴当与及第李评事，非公也。’由是德裕多排斥之。”

李卫公在珠崖郡，北亭谓之望阙亭，公每登临，未尝不北睇悲咽。题诗云：“独上江亭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碧山也恐人归去，百匝千遭绕郡城。”又郡有一古寺，公因步游之。至一老禅院，坐久，见其内壁挂十余葫芦，指曰：“中有药物乎？弟子颇足疲，愿得以救。”僧叹曰：“此非药也，皆人骼灰耳。此太尉当朝时，为私憾黜于此者，贫道悯之，因收其骸焚之，以贮其灰，俟其子孙来访耳。”公怅然如失，返步心痛，是夜卒。

李卫公（德裕）颇升寒素，旧府解有等第，卫公既贬，崔少保龜从在省，子殷梦为府解元。广文诸生为诗曰：“省司府局正绸缪，殷梦云知作解头。三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南望李崖州。”卢渥司徒以府元为第五人，自此废等第。

《钓矶立谈》一卷，南唐处士史虚白之子某撰。书前有《自序》云：“叟，山东一无闻人也。清泰（公元九三四至九三六年）年中，随先校书避地江表，始营钓矶于江渚。割江之后，先校书不禄，叟嗣守敝庐，不复以进取为念。王师吊伐，时移事往，将就芜没，随意所向，迹之于纸，得二百二十许条，题之曰《钓矶立谈》云云。”四库入载记类。书中载：

韩熙载上疏请诛斩〔陈觉、冯延鲁〕以谢国人。其略云：“擅兴者无罪，则疆场生事之臣，恬不知畏；丧师者获存，则行阵效死之士，何视而对。”元宗不能用其语。

其后闽土叛涣，竟成迁延之兵，湖湘既定而后变，地不加辟，财乏而不振。令耶律南入，中国大乱，边地连表请命，而南唐君臣束手无能延纳者。韩熙载上疏请乘衅北略，而兵力顿匱，茫洋不可为计。刮痍裹创，曾未得稍完，而周祖受命，世宗南征，全淮之地，再战而失。元宗始自叹恨，厌厌以至于弃代。《江南野史》十卷，宋龙衮撰。据郑樵《通志》，此书原本二十卷，已佚其半。四库入载记类。《江南别录》一卷，宋陈彭年撰。四库入载记类。《江表志》三卷，宋郑文宝撰。四库入载记类。《南唐近事》一卷，宋郑文宝撰。四库入小说家类。《南唐书》三十卷，宋马令撰。令，北宋末年人。四库入载记类。书中载：

保大四年二月，命建州制乳茶号京挺，腊茶之贡自此始，罢阳羨茶。

保大十有六年，升元初，括定民赋，每正苗一斛别输三斗于官廩，授盐

二斤，谓之盐米。至是淮甸盐场皆入于周，遂不支盐，而输米如初，以为定式。《南唐书》十八卷，宋陆游撰。四库入载记类。书中载：金陵数大水，秦淮溢，东关尤被害。彦能请筑堤为斗门，疏导之，水患稍息。（《刁彦能传》）《江南余载》二卷，失撰人名。四库入载记类。书中载：

钱氏科敛苛惨，民欠升斗，必至徒刑。汤悦、徐铉尝使焉，云夜半闻声若獐鹿啼叫。及晓问之，乃县司催科耳。其民多躲行，或以篾竹系腰。

徐知训在宣州，聚敛苛暴，百姓苦之。入觐侍宴，伶人戏作绿衣大面若鬼神者，傍一人问谁何？对曰：“我宣州土地神也。吾主入觐，和地皮掘来，故得至此。”

张崇帅庐州，人苦其不法，因其入觐，相谓曰：“渠伊必不复来矣。”崇闻之，计口征渠伊钱。明年又入觐，州人不敢交语，唯道路相目，捋须为庆而已。崇归，又征捋须钱。

《吴越备史》四卷，《补遗》一卷，旧本题宋武胜军节度掌书记范垞、巡官林禹撰。四库入载记类。书中载：

贞明五年（公元九一九年）夏四月，〔文穆〕王率水师大小战舰五百余艘……伐淮南……大战于狼山江。命进火油焚之。火油得之海南大食国，以铁筒发之，水沃，其焰弥甚。

忠献王即位，命境内给复一年……又命田园有隶道宫佛寺比入赋税者悉免。

《三楚新录》三卷，宋周羽翀撰。四库入载记类。按三楚，谓长沙马殷、武陵周行逢、江陵高季兴，皆据楚地称王，故论次其兴废本末，以一国为一卷。

《锦里耆旧传》四卷，宋句延庆撰。四库入载记类。述前蜀、后蜀事。

《蜀橹机》二卷，宋张唐英撰。四库入载记类。

《鉴诫录》十卷，蜀何光远撰。光远，后蜀孟昶广政初，官普州军事判官。四库入小说家类。《蜀鉴》十卷，宋郭允蹈撰。四库入纪事本末类。书中载：

〔前蜀亡〕得兵三十万，马九千五百匹，兵器七百万，粮二百五十三万石，钱一百九十三万缗，金银二十二万两，珠玉犀象二万，纹锦綾罗五十万匹。（郭崇韬率蜀中富民输犒赏钱五百万缗。昼夜督责，有自杀者。）

〔天成二年（公元九二七年）〕孟知祥置三场于汉州榷盐……岁得钱七万缗。

《五国故事》二卷，失撰人名。四库入载记类。五国指南唐李氏、前蜀王氏、后蜀孟氏、南汉刘氏、闽王氏。书中载：

蜀中每春三月为蚕市，至时货易毕集，闾闾填委，蜀人称其繁盛。

《五代史阙文》一卷，宋王禹偁撰。四库入杂史类。

《五代史补》五卷，宋陶岳撰。四库入杂史类。书中载：

太祖（朱温）之用兵也，法令严峻……然健儿且多窜匿，州郡疲于追捕，因下令文面。健儿文面，自此始也。

后唐明宗之在位也，一旦幸仓场观纳。时主者以车驾亲临，惧得其罪，较量甚轻。明宗因谓之曰：“……今轻量如此，其后销折，将何以偿之。”对曰：“竭尽家产，不足，则继之以身命。”明宗曰：“只闻百姓养一家，未闻一家养百姓。今后每石加二斗耗，以备鼠雀侵虫。”谓之鼠雀耗，仓粮起自此也。

《九国志》十二卷，宋路振撰。九国指吴杨氏、南唐李氏、吴越钱氏、前蜀王氏、后蜀孟氏、南汉刘氏、北汉刘氏、闽王氏、荆南高氏。

《十国春秋》一百十四卷，清吴仕臣撰。这是十国历史的总集，四库入载记类。

《南唐拾遗记》一卷，清毛先舒撰。四库入载记类存目。书中载：

韩熙载在南唐，多置女仆，客至杂坐，熙载语僧德明云：“吾为此行，正欲避国家入相之命。”僧问何故避之，曰：“中原常虎视于北，一旦真主出，江南弃甲不暇，吾不能为千古笑端。”

李煜既降宋，太祖因宴煜，顾近臣曰：“当不忝作一翰林学士。”

龙衮《江南别录》云：李国主小周后随后主归朝，封郑国夫人。例随命妇入宫，每一入辄数日，出必大泣，骂后主，后主多宛转避之。

李煜归宋後，郁郁不乐，见於词语。在赐第，七夕命故伎作乐，声闻于外，太宗怒。又传“小楼昨夜又东风”，并坐之，遂被祸。宋人笔记有很多涉及唐五代典章制度，如：《澠水燕谈录》十卷，宋王辟之撰。四库入小说家类。书中载：

唐以中官为枢密使，与中尉谓之内贵。梁为崇政院使，后唐旧有带相印者，分东西二院，晋废。

唐末始分度支、盐铁、户部专领财赋，唐明宗始号三司，总以一司。《春明退朝录》三卷，宋宋敏求撰。四库入杂家类。书中载：

唐大帝时，始有同中书门下三品，时中书令、侍中皆正三品，大历中并升为二品。晋天福五年，升中书门下平章事为正二品。

唐制，宰相四人，首相为太清宫使，次三相皆带馆职宏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集贤殿大学士，以此为次序。

《唐日历》贞观十年十月，始诏用黄麻纸写诏敕。又曰：上元三年闰三月，戊子敕：制敕施行，既为永式，比用白纸，多有虫蠹，自今已后，尚书省颁下诸司，及州下县，宜并用黄纸。《能改斋漫录》十八卷，宋吴曾撰。四库入杂家类。书中载：

唐宣宗时，中书门下奏：“若官度僧尼有阙，则择人补之，仍申祠部给牒。其欲远游寻师者，须有本所公验。”乃知本朝僧尼出游给公验，自唐已然矣。

《辩蜀论》：“自顷诸公议论，颇以蜀人为疑。”予後因读外史《檣机》，见五代时，后唐魏王伐蜀之后，朝廷颇疑蜀人，凡有势力资产之族，悉令遣入蜀。隐士张立为诗曰：“朝廷不用忧巴蜀，称霸何曾是蜀人。”

《容斋随笔》十六卷，《续笔》十六卷，《三笔》十六卷，《四笔》十六卷，《五笔》十卷，宋洪迈撰。四库入杂家类。书中载：

〔唐人避讳条〕唐人避家讳甚严……李贺应进士举忌之者斥其父名晋肃，以进与晋字同音，贺遂不敢试……裴德融讳皋，高锴礼部侍郎典贡举，德融入试。锴曰：“伊讳皋，向某下就试，与及第，困一生事。”……《语林》载崔殷梦知举，吏部尚书归仁晦托弟仁泽，殷梦唯唯而已。无何，仁晦复诣托之，至于三四。殷梦敛色端笏曰：“某见进表让此官矣。”仁晦始悟己姓，殷梦讳也。案《宰相世系表》，其父名龟从，此又与高相类。且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父名皋，主不得于主司姓高下登科；父名龟从，子不列姓归人于科籍，揆之礼律，果安在哉？后唐天成（公元九二六至九二九年）初，卢文纪为工部尚书，新除郎中于邺公参，文纪以父名嗣业，与同音，竟

不见。邺忧畏太过，一夕雉经于室。文纪坐谪石州司马。此又可怪也。

李卫公（德裕）在朱崖，表弟某侍郎遣人餉以衣物，公有书答谢之，曰：“天地穷人，物情所弃，虽有骨肉，亦无音书，平生旧知，无复吊问。阁老至仁念旧，再降专人，兼赐衣服器物茶叶至多，开缄发纸，涕咽难胜。大海之中，无人拯恤，资储荡尽，家事一空，百口嗷然，往往绝食，块独穷悴，终日苦饥，唯恨垂没之年，须作馁而之鬼。十月末，伏枕七旬，药物陈衰，委命信天，幸而自活。”书后云“闰十一月二十日，从表兄崖州司户参军同正李德裕状侍郎十九弟”。按德裕以大中十二年十月，自潮州司马贬崖州，所谓闰十一月，正在十三年，盖到崖才十余月耳，而穷困苟生已如是。《唐书》本传云：“贬之明年卒”，则是此书既发之后，旋踵下世也。

〔唐宰相不历守令条〕唐杨绾、崔祐甫、杜黄裳、李藩、裴垪皆称英宰，然考其履历，皆未尝为刺史守令……然则后之用人，必言践扬内外，谄熟民情，始堪大用，殆为隘矣。

偶阅大中祥符间太常博士许载著《吴唐拾遗录》，所载多诸书未有者。其劝农桑一篇正云：吴顺义（公元九二一至九二七年）年中，差官兴版簿，定租税。厥田上上者，每一顷税钱二贯一百文；中田一顷，税钱一贯八百；下田一顷，千五百，皆足陌见钱。如见钱不足，许依时价折以金钱。算计丁口课调，亦科钱。宋齐丘时为员外郎，上策乞虚抬时价，而折紬、绵、绢本色，曰：“江淮之地，唐季以来，战争之所。今兵革乍息，黎氓始安，而必率以见钱，折以金银，此非民耕凿可得也，无兴贩以求之，是为教民弃本逐末耳。”是时，绢每匹时价五百文，紬六百文，绵每两十五文，齐丘请绢每匹抬为一贯七百，紬为二贯四百，绵为四十文，皆足钱，丁口课调，亦请蠲除。朝议喧然沮之，谓亏损官钱，万数不少。齐丘致书于徐知诰曰：“明公总百官，理大国，督民见钱与金银，求国富庶，所谓拥彗救火，挠水求清，欲火灭水清可得乎？”知诰得书，曰：“此劝农上策也。”即行之。自是不十年间，野无间田，桑无隙地。自吴变唐，自唐归宋，民至于今受其赐……而《九国志》齐丘传中略不书，《资治通鉴》亦佚此事。

类书的编纂 一直到《隋志》，类书在书目子部里，还附在杂家，到了《旧唐书·经籍志》子部有类事部，《新唐书·艺文志》子部有类书部，开始独立出来著录类书。

魏文帝曹丕在黄初元年（公元二二二年），命缪袭、王象、刘邵、桓范、韦诞等，“集五经群书，以类相从”（《三国志·魏志·刘邵传》），书成，命曰《皇览》，全书八百余万字，百二十卷，这是中国第一部类书。梁武帝世，刘峻撰《类苑》一百二十卷。梁武帝为了要压倒它，命何思澄、顾协、刘杳、王子云、钟屿、徐僧权等，撰《华林遍略》六百二十卷，自天监十五年（公元五一六年）起，历八年乃成书。北齐后主武平三年（公元五七二年），祖珽、颜之推、韦道逊、萧放、萧恽等，撰《华林遍略》三百六十卷，分二百四十部以集之”（《玉海·艺文·承诏撰述篇》）。

虞世南在隋世为秘书郎，“抄经史百家之事以备，分八十部，八百一类”（《郡斋读书志》），合一百七十三卷，名曰《北堂书钞》。“北堂者，〔秘书〕省之后堂，世南抄书之所”。这部书异名很多，清初朱彝尊所藏，名《大唐类苑》，是钞本。钱曾所藏，名《古唐类苑》，亦是钞本，最为精致。这部书至今犹存。唐贞观十五年（公元六四一年），高士廉、房玄龄、魏徵、杨师道、岑文本、颜相时、朱子奢、刘伯庄、马嘉运、许敬宗、崔行

功、吕才、李淳风、褚遂良、姚思廉、司马宅相等又奉诏撰成《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目》十二卷。开元世，唐玄宗又命张说类集要事，以教诸王。说乃与徐坚、韦述、余钦、施敬本、张烜、李锐、孙季良等分撰《初学记》三十卷。开元十六年（公元七二八年）撰成进奏。宋敏求《春明退朝录》称：“唐明皇召集贤院学士徐坚等讨论故事，兼前世文辞，撰《初学记》。刘中山子仪（刘筠）爱其书，曰：‘非止初学，可为终身记。’”白居易尝撰《六帖》三十卷，后宋人孔传亦撰《续六帖》三十卷。在宋代已有人把两书合并，分析为一百卷。清末端方得宋本白氏《六帖》，已有影印本，最近将重印。

《牛羊日历》是李德裕一派攻击牛僧孺一派的书，书中称牛派中人“传业，乃白居易《六帖》，以为不语先生……三史六经，曾不一面”。可见在当时，举子已很重视这部《白帖》了。

宋初李昉受敕撰集《太平御览》一千卷，这部书是在北齐《修文殿御览》和唐《文思博要》两部大类书的基础上撰成的，收录隋唐五代故事典章很多，也是研究唐五代的必要参考书。《册府元龟》一千卷，宋王钦若、杨亿撰集。收有唐日历和实录。用他来校勘《旧唐书》、《旧五代史》，不但可以校出很多异文来，尤其外臣部所记录的，皆为《旧唐书》、《资治通鉴》所未曾载录，史料价值很高。

〔一〕偏记谓乐资《山阳公载记》、姚最《梁后略》之类，小录谓王粲《汉末英雄记》、戴逵《竹林七贤论》之类，逸事谓《汲冢纪年》、《西京杂记》之类，琐言谓裴启《语林》、刘义庆《世说新语》之类，郡书谓《陈留耆旧传》、《汝南先贤传》、《会稽典录》之类，别传谓刘向《列女传》、徐广《孝子传》之类，杂记谓干宝《搜神记》、刘敬叔《异苑》之类，地理书谓盛弘之《荆州记》、罗含《湘中山水记》之类，都邑簿谓《三辅黄图》、潘岳《关中记》之类。〔二〕海客乘槎事见《博物志》：“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此人乘槎而去，至一处，屋舍甚严，遥望宫中多织妇，见一丈夫牵牛渚次饮之。后至蜀问严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牵牛宿也。”

姮娥奔月事见《续汉书·天文志》注引张衡《灵宪》：“羿请无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之以奔月。将往，枚筮之于有黄。有黄占之，曰：‘吉！翩翩归妹，独将西行，逢天晦芒，毋惊毋恐，后且大昌。’姮娥遂托身于月，是为蟾蜍。”

王乔飞凫事见《后汉书·方术传》：“王乔……显宗世，为叶令。有神术，每月朔望，常自县诣台朝。帝怪其来数，而不见车骑，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临至，辄有双凫从东南飞来，于是候凫至，举罗张之，但得一双舄焉。乃诏尚方诊视，则四年中所赐尚书官属履也。”

左慈化羊事见《后汉书·方术传》：“左慈，字元放……少有神道……曹操……欲杀之……遂入走羊群，操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复相杀，本试君术耳。’忽有一老羝屈前两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许。’即竞往赴之，而群羊数百，皆变为羝……遂莫知所取焉。”

中州名汉指当时鲜卑贵族轻视汉人，骂汉人为“汉儿”、“一钱汉”等这一历史事实而说的。

关右称羌事见《北史·儒林·李业兴传》：“业兴……师事徐遵明（遵明，华阴人）于赵魏之间，时有渔阳鲜于灵馥……乃谓曰：‘李生久逐羌博士，何所得也？’”又见《北史·段韶传》：“宇文护……遣将尉迟迥等袭

洛阳……武成召韶……赴洛阳，但以突厥为虑。韶曰：‘北虏（突厥）侵边，事等疥癬，西羌（指北周）窥逼，是膏肓之疾’”。

易臣称奴事见《宋书·鲁爽传》：魏主“焘始南行，遣爽……向寿阳……仍至瓜步，始得与〔弟〕秀定归南之谋。焘还至湖陆，爽等请曰：‘奴与南有仇，每兵来，常虑祸及坟墓，乞共迎丧还葬国都。’虏群下于其主称奴，犹中国称臣也。”

呼母称姊事见《北齐书·文宣皇后传》，太原王高绍德呼母为姊姊。又《北齐书·琅邪王俨传》：“后主泣启太后曰：‘有缘更见家家，无缘永别。’”是亦称母为家家。《北史·南阳王绰传》：“绰兄弟皆呼父为兄兄，嫡母为家家，乳母为姊姊，妇（妻）为妹妹。”

## 第二节 隋唐五代的哲学思想与宗教神学

**佛教的继续发展** 从东汉以来，佛教传入中土，经历魏晋南北朝，居然在中国的土壤上生了根，并发展传播开来。由于佛教的传播，能够麻醉人民，缓和阶级矛盾，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巩固，因此发展得很快，在南北朝的后期，北齐大概拥有二千万人口（不包括部曲、客女），全国僧尼有二百万人；北周有一千万人口（不包括部曲、客女），全国僧尼有一百万人。北周武帝宇文邕在建德三年（公元五七四年），乃毁灭周境内佛法，建德六年（公元五七七年），灭北齐后，又毁灭齐境佛法，三百万僧侣，“皆复军民，还归编户”（《历代三宝记》）。两地四万寺宇，也“皆为俗宅”。隋文帝杨坚于北周宣帝大象二年（公元五八一年）夺到北周的政治权力，不久就下令恢复佛教。佛教的恢复，不但缓和了统治阶级内部僧俗之间的矛盾，同时也用来继续麻醉人民，巩固了封建统治政权，在改朝换代的紧张局面中，起了稳定作用。

隋文帝在恢复佛教的传播之后，还利用政权的力量，兴起寺宇，营立庄田，于开皇十三年（公元五九三年）下诏于诸州名山之下各置僧寺一所，并赐庄田。由于帝王的提倡，寺院经济很快发展起来，如京兆府大兴清禅寺，在隋代，“九级浮空，重廓远摄，堂殿院宇，众寺圆成，竹树森繁，园圃围绕，水陆庄田，仓廩碾磑，库藏盈满，京师殷有，无过此寺”（《续高僧传》）。就是这个清禅寺，据《续高僧传·习禅篇·京师清禅寺释昙崇传》称：“皇隋肇命，高祖唐公（李渊），割宅为寺，引众居之，敕赐额清禅。隋代晋王（隋炀帝未即位前，封晋王），钦敬定林，降威为寺檀越，前后送户七十有余，水磑及碾，上下六具，永充基业，传利于今。”可见佛教一恢复，就有达官贵人，割宅为寺，并送寺户并水碾及磑，永充基业，寺院经济的基础就非常稳固了。

唐初，寺院经济更在发展。今举嵩山少林寺为例，这所僧寺，在隋文帝“开皇中，有诏其柏谷屯地一百顷，宜赐少林寺”（唐崔灌《少林寺碑》）。隋末王世充时，寺“被废省，僧徒还俗，各从徭役”。后来因少林寺僧“翻城归国，有大殊动，据格合得良田一百顷”，即发还以前的一百顷田，但武德八年（公元六二五年），唐政府只交给“少林寺赐地肆拾顷，水碾磑一具”。少林寺的僧人“不伏减省，上表申诉”，以为“若论少林寺功动，与武牢不殊，武牢动赏，合地一百顷”，现在只给肆拾顷，“仍少六十顷”（《少林寺赐田敕》），请求补足。唐太宗贞观六年（公元六三二年）终于下敕改正，并补给赐田六十顷，满足百顷之数。可见仅仅一所少林寺，就拥有赐田百顷之数。

在唐代前期（公元八四五年），会昌五年灭佛之前，海内大的寺院，大都拥有广大庄田，如唐高宗赐长安西明寺，“田园百顷，净人百房，车五十辆，绢布二千匹”（苏颋《唐长安西明寺塔碑》）。这只是指赐田而论，百姓捐献寺院的土地，尚不计算在内。日本僧人圆仁来唐求法，他曾经过长山县（山东邹平县东）长白山醴泉寺，这座醴泉寺，就拥有“庄园十五所”，圆仁出醴泉寺门，向北行十五里，到醴泉寺庄断中（中午休息）（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可见醴泉寺庄十五所，遍布数十里外。又陇州（治汧源，今陕西陇县）大像寺，这座大像寺在唐武宗会昌元年（公元八四一年，

即灭佛前四年)重加整顿,全寺“管庄大小共七所,都管地总伍拾叁顷伍拾陆亩叁角,荒熟并柴浪等捌顷叁拾捌亩半,坡侧荒肆拾伍顷壹拾捌亩,熟瓦屋壹拾贰间,草舍贰拾间,果园一所,东市善和坊店舍共六间半并瓦,风伯庄荒熟共壹拾壹顷伍拾亩”(《金石萃编》卷一百十三《重修大像寺记》)。寺院拥有土地的数量之大,确是非常惊人的。诗僧“齐己,长沙人。长沙有大洩同庆寺,僧多而地广,佃户仅千余家,齐己则佃户胡氏之子也。七岁,与诸童子为寺司牧牛”(宋陶谷《五代史补》)。同庆寺属于禅宗,一个寺宇,下属佃户有千余家之多,它拥有的土地也可以类推而知。隋唐寺院的雄厚经济基础,使当时的佛教广泛传播,有了经济上的一定保证;同时,也使当时中土佛教宗派的确立和传述,获得充分的发展时机。

寺院的常住财产,名义上是全体僧侣所有,实际上是掌握在一个寺的三网手里。什么叫三网呢?《唐律·名例疏议》里说:“观(道士)有上座、观主、监斋,寺(僧)有上座、寺主、都维那,是为三网。其当观(道观)、寺(僧寺)部曲奴婢于三网有犯,与俗人期亲部曲同。依《斗讼律》,主殴杀部曲,合徒二年。……其奴婢、部曲殴三网者绞,置者徒二年。”“观寺部曲殴当观寺余道士、女冠、僧、尼等,各合徒一年。”“奴婢殴,又加一等,徒二年半。”僧寺的组织,有一部书叫《百丈清规》,所述较详。《唐律》里的上座,后来称为住持。其下有都监寺,这就是《唐律》里的寺主,他是大寺院的总务长,“早暮勤事香火,应接官员施主,会计簿书,出纳钱谷”,“差设庄库职务”,权力极大。监寺下有维那,“纲维众僧,曲尽调摄。堂僧挂搭,辨度牒真伪”,“戒腊(当和尚的年资)资次,床历图帐,凡僧事内外,无不掌之。”副监寺,也称库头或柜头,“掌常住金谷钱帛米麦出入,随时上历(账簿)收管支用”,他的下面又设有库子,由廉谨能书算的人来充任。有典座,“职掌大众斋粥”。有直岁,“职掌一切作务”,殿堂寮舍,遇有损漏,由他负责命人修葺,田园庄舍,碾磨碓坊,头匹舟车,都归他管理。另外还有寮元,“掌众寮之经文什物,茶汤柴炭,请给供需,洒扫浣濯,净发梳巾之类”。其下每寮设寮主、寮副(室长)各一人,十日一替。有延寿堂主,负责病僧医药饮食事项。有净头,负责打扫厕所。有园主,负责“栽种菜蔬,及时灌溉,供给堂厨,毋使缺乏”。有磨主,“兼主碓坊米面”。有水头,供汤水。有炭头,“预备柴炭以御寒事”。有庄主,“视田界至,修理庄舍,提督农务,抚安庄佃”。一个大丛林,基本上,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单位,除了布匹(尼寺布匹也能自足)、盐,一切都不需外求的。

### 隋唐寺院僧尼数字

从东汉到南北朝几百年间,由于佛教思想从五天竺的不断传入,不少高僧的西行求法取经,佛教经典的大量传入和翻译,中土佛教形成宗派的条件完全成熟了。要介绍隋唐的佛教,就得先叙述中土佛教宗派的形成和其主要内容。

佛教在五天竺是先有小乘,后有大乘,实际传入中土时,小乘教派中的俱舍、成实两论师的理论却是和大乘同时介绍过来的。

成实论师的主要经典是《成实论》,为中天竺小乘教派论师诃梨跋摩所著。诃梨跋摩生于公元三世纪初叶,出身于婆罗门种姓,尝居摩揭陀国首都巴连弗邑(今巴特那〔Patna〕)。他开始学于“说一切有部”(属上座部的

支派），后来又倾向大众部，著有《成实论》，是属于小乘空宗的论著。《成实论》明我法二空，极似大乘，但偏于顽空，对涅槃境界肯定不够，因此还未能跻于大乘学说之列。可是由于它分析名相，颇有条理，极便于初学，因此大乘教派中观宗诸论师也不废此论。后秦姚兴弘治十四年（公元四一二年），鸠摩罗什在长安译出《成实论》十六卷。鸠摩罗什死后，其弟子僧导、僧嵩把《成实论》介绍到江南，《成实论》开始在中土广泛传播开来，在南朝，这一教派的学说发展很快。

俱舍论师的主要经典是《俱舍论》，作者即瑜伽宗论师世亲。世亲起初是小乘教派的论师，研究“说一切有部”的学说，后来又嫌“说一切有部”的学说烦琐，反而喜欢起上座部另一支派“经量部”的学说起来。他于是改名换姓往“说一切有部”学派的中心北天竺迦湿弥罗国（今克什米尔）去留学。四年之后，学到了“说一切有部”的一套理论，又回至弗楼沙城，乃采用“经量部”的教义和自己的见解，来批判“说一切有部”的学说，著成《阿毗达磨俱舍论》，简称为《俱舍论》。后来世亲又放弃小乘，转向大乘，成为大乘教派中瑜伽宗的大师。但是瑜伽宗的特色，是拿小乘教义做基础，在它的上面建立起大乘学说来的，因此，要研究瑜伽宗的学说，也必须从研究小乘《俱舍论》入手。东晋孝武帝及安帝时（公元三七三——四一八年），罽宾（克什米尔）沙门僧伽提婆在中土译出《阿毗昙八犍度》二十卷，《阿毗昙心》十六卷，《鞞婆沙阿毗昙》十四卷，《阿毗昙心》四卷，江南一时传习毗昙称盛，时称为毗昙师。到了陈代，真谛在江南主讲《摄大乘论》时，又在陈天嘉五年（公元五六四年）译出《阿毗达磨俱舍释论》二十二卷，简称为《俱舍论》。这一译本的质量，超过以前的译本，因此毗昙论师后来也改称为俱舍论师了。到了唐玄奘从五天竺回来，为了更便利传播瑜伽宗的唯识哲学，又把《俱舍论》重新译了一遍，共分三十卷。玄奘的弟子神泰著《俱舍论疏》三十卷，普光著《俱舍论记》三十卷，又有法宝著《俱舍论疏》三十卷，这三部书成为研究《俱舍论》的最好注释。

中土的小乘教派论师和五天竺、中亚及中国西北部一带的小乘教派有着显著之不同，即五天竺等地区的小乘教派是和大乘教派对立的，而中土的小乘教派论师则和大乘教派的学说并不完全对立。如《成实论》是由大乘译师鸠摩罗什介绍过来的，他为了要介绍般若学说，才把《成实论》翻译过来。

《俱舍论》也是《摄论》大师真谛和唐代玄奘二人为了要介绍瑜伽宗学说，才把《俱舍论》重新翻译一道。即小乘教派的经典不是以独立的小乘教派学说被介绍进来，而是因为它的学说对大乘学说起着一种辅助作用，因此以大乘教派的附庸身份而被介绍到中土来的。所以大小乘教派的学说在中土不但不对立，不互相排斥，而且还起着互相扶持的作用。因为进入中土的小乘教派学说，只是成为大乘教派的附庸而被传播，那末自然不可能形成中土的小乘教派了。

大乘教派在中土流传的，到唐代一共有八宗〔一〕，列表如下：

八宗名称	异称	取义或依据经典	天竺渊源	中土开宗者
律宗	南山律宗	以《四分律》名宗。	优波离	唐道宣
三论宗		以《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名宗。	龙树提婆	隋吉藏
天台宗	法华宗	以《妙法莲华经》名宗。以智居天台，故名天台宗。	龙树	隋智顓
法相宗	唯识宗 慈恩宗	以明诸法之体相，名法相宗。以主张万法唯识，故称唯识宗。以玄奘、窥基居大慈恩寺，故亦称慈恩宗。	无著和世亲	唐玄奘窥基
密宗	真言宗	以修持秘密真言名宗。	龙树	唐善无畏 金刚智不空
净土宗		以往生净土名宗。		唐善导
华严宗	贤首宗	以《大方广佛华严经》名宗。因法藏字贤首，故亦称贤首宗。		隋法顺 唐法藏
禅宗	心宗 楞伽宗	以禅那故名禅宗。以心传心，故名心宗。以传《楞伽经》，故亦称楞伽宗。		唐慧能

这八宗中，尤以天台、法相、华严、禅宗四宗称为全盛。当时中土宗教史上称天台、法相、华严三宗为“教下三家”，而禅宗则被称为“教外别传”，成为唐前期最重要的教派。不过到了唐后期，“教下三家”也逐渐衰落了，只有禅宗的南宗一支特别兴盛，几乎形成了独霸佛教界的局面。

关于净土思想，在当时已很流行，这是不成问题的；但作为一个教派来说，包括其法统传授、寺院经济基础等等，可以不可说它已经形成为教派，尚需进一步加以研究。

**律宗在中土的形成** 律宗，这是五天竺所没有的一个教派，因为佛教既然成为宗教，必然有它的戒律规仪，这是宗教的必然产物，没有理由把它独立出来成为一个教派。可是在中国就不同，因为佛教教义传入中土以后，五天竺的许多风俗习惯和宗教仪式，是和中国迥然两样的，因此，中土的佛教徒不但要把五天竺佛教的清规戒律照抄了过来，而且还必须加以适当程度的中国化，使它尽量适应中国的社会习惯，这样，中土就有形成律宗这一教派之必要。当佛逝世时，佛的大弟子大迦叶在王舍城把佛的遗教第一次加以结集，首先结集毗尼（毗奈耶〔Vinaya〕）——“律”。以持律见称的优波离为上座，大迦叶就戒律的各条目质问优波离，优波离应问，一一作答，五百大众合诵应答的全部，并规定它是佛的遗教，这样，毗尼的结集就完成了。以后几次结集，也都讨论到律的问题。这种佛教的戒律规仪，在五天竺也随着教派的分裂而分为“萨婆多部”、“弥沙塞部”、“迦叶遗部”、“摩诃僧只部”、“昙无德部”等五部，它们以后的传承，还更为复杂。当佛教传入中土初期，自然不会先把律藏在经、论藏以前翻译过来，而佛教既然在中土以极迅速的速度在发展，它又如此迫切地需要戒律规仪来约制僧众，防止

腐化，以巩固佛教在群众间的欺骗作用，所以在五天竺戒律尚未传到中土以前，东晋时，释道安在襄阳（公元三六五至三七九年）曾草拟了清规戒律三条，以约制僧众，一时“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高僧传·义解篇·晋长安五级寺释道安传》）。后秦姚兴弘始六年（公元四一四年）起，鸠摩罗什在长安逍遥园先后请罽宾国僧人弗若多罗、西域僧人昙摩流支诵出萨婆多部的《十诵律》，由鸠摩罗什自己担任传译。弘治十二年（公元四一一年），又有罽宾国僧人佛陀耶舍在长安诵出昙无德部的《四分律》，由竺佛念笔受译出，于是律藏之书粗备。法显西行，其目的也是为了专求戒律，回国后，请佛驮跋陀罗同他合作，把他所取来的摩诃僧只部的《摩诃僧只律》（为大众部通用之戒律）译出。稍后，又由罽宾僧人佛驮什把法显从印度取来的弥沙塞部的《五分律》也翻译了出来。这样，小乘的戒律总算译出不少了，戒律愈多，抉择取舍，愈加困难，结合中土实际的要求，也愈加迫切，所以律宗就有在中土创建之必要。在这些传来的戒律中，开始是《十诵律》最为盛行，后来东魏、北齐的大僧统（大教长）慧光、法上师徒两人提倡《四分律》，《四分律》又压倒了《十诵律》。唐代初年，《四分律》有三大派，法励居相州，研究《成实论》，著《四分律疏》二十卷，称“相部律宗”。玄奘弟子怀素，研究《俱舍论》，著《四分律开宗记》二十卷，以其居西太原寺东塔，因称“东塔律宗”。隋代有智首，著《四分律疏》二十卷，他的门徒道宣，在唐武德九年（公元六二六年），著《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十二卷。《四分律》虽然是小乘教派的戒律，经过道宣的删繁补阙，把大乘方等经典上的内容充实进去，就使小乘戒律成了为大乘教派服务的东西。道宣在《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里还说：“原夫大小二乘，理无分隔，对机设药，除病为先。”“今方等学者，非于小乘；小乘学者，又非方等，故使大圣法典，二途兼亡。”他号召当时僧侣，不要因为“我是大乘，不关小教（小乘）”（《篇聚名报篇》），而不重视戒律。

道宣在这一部书里，无非是讲到僧侣如何礼佛，他们衣、食、住、行，都有严格规定，如何创立寺院戒坛，如何戒淫、盗、杀、妄，寺院不收逃亡奴婢出家，不收传染病人和颠狂病人出家，寺院不准蓄养猫狗等，不准杀老鼠，僧侣不准着丝绵，劝阻僧侣进行贸易，对偷盗寺院钱财或犯过的僧侣，主张“一月、两月苦使，（全体僧众）或不与语，不与共坐，或摈令出”。还采用地狱等说法，使他们惧怕。道宣还对当时“诸伽蓝，多畜妇人，或买卖奴婢者”的现象进行了批评。

中土僧侣的衣服——袈裟，完全模仿天竺的形制，但中土当时棉花的种植，尚不普遍，而蚕丝的养殖，又极其发达，因此在齐、梁时代，沈约就有这样的说法，“自涅槃东度，三肉罢缘，服膺至训，长蔬靡倦；而蚕衣缁服，曾不惟疑”。道宣非常反对僧侣著丝绢的衣服，他在《释门章服仪》里说：“肉食蚕衣，为方未异，害命天生，事均理一。暴茧烂蛾，非可忍之痛；悬庖登俎，成恶业之酷。渔人献鲟，桑妾登丝，假手之义不殊，分功之赏无别”，可是中土却是“断肉之制久行，禁丝之仪莫用”，因此他主张“两俱全断”。另外僧侣在条件困难的地方，非要著毛罽不可，以及疾病很厉害，非要服用乳、蜜不可，道宣认为这也勉强可以听许，“至如山寒贼夺，开服皮毛；疾急苦煎，听资乳蜜，非为通化，薄设权宜”。他还认为僧侣的衣服，“衣唯自缝”，而这时富有的僧侣，“自迷针缕，动必资人，但论刺作之织媚，不计价功之高下”。他也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批评。

僧侣的财产，如一个当家的僧侣大地主死后，哪些应该属于全寺所有？哪些应该属于个体僧侣所有？道宣在乾封二年（公元六六七年）所辑的《量处轻重仪》中，都作了详细的规定。他认为凡私有小寺、庄宅、店肆、仓库、水陆碾磑、自造大小诸房、生熟材木塼瓦、寺院内外园田、果菜、谷米、绫机、缣车、金银珠宝、窗帘帷帐、镏釜、家畜以及奴婢和奴婢的子息与资生工具，在所有主的僧侣死后，都应该改属于全寺所有，所谓“本主身死，折入常住”。即使是部曲客女，谓本是贱品，赐姓从良，而未离本主。本主身死，可入常住”。也是主张从个体僧侣的私属而转化成全寺僧侣的私属。只有衣服箱袱、书籍纸张，可以根据该僧平日的嘱咐，由个体僧侣去继承。这一部书，对研究僧侣的遗产继承法，是很重要的参考资料。

道宣还著有《教诫新学比丘行护律仪》一书。在这书里，道宣告诫小和尚应该怎样来伺候大和尚，小和尚又怎样来料理自己的衣食起居，甚至小和尚上厕所入浴等，一举一动，都有明确规定。它可以说是小和尚的生活行动守则。

道宣在僧侣的戒律方面，著作很多，因为他居于终南山，故称为“南山律宗”。这律宗三派中，由于南山律宗把小乘的《四分律》改造成为符合大乘教派需要的戒律，因此后来中土的大乘各教派都采用它的说法了。所以不久相部、东塔并衰，而南山律宗独盛。道宣除了提倡律学以外，还著有《续高僧传》、《广弘明集》、《大唐内典录》等书，这都是研究南北朝隋唐佛教史的重要资料。

三论宗吉藏的《二谛论》与天台宗智 的《止观论》 从鸠摩罗什译出龙树系中观宗的《中论》、《百论》、《十二门论》以后，他的门徒僧肇、道生、道融、僧睿等传播这派的般若学说，一时称盛。后来这一派的势力，在北方，由于姚秦灭亡，赫连勃勃攻破长安时，坑杀僧侣，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又废除佛教，受到一连串打击而衰落；在南方，开始也并不发展，到了南朝齐梁时代，僧朗居摄山（今江苏南京市东北之栖霞山），大弘三论，因以名家。僧朗传僧诠，僧诠传法朗（居兴皇寺），法朗传吉藏。吉藏，俗姓安，幼年出家，隋初居会稽嘉祥寺，所以他的门徒称他为嘉祥大师。开皇末年，隋炀帝为晋王，曾拉吉藏到长安讲经，唐武德初年，挑选十个僧侣来管理僧众，吉藏也列在十人之选。他长于佛经目录之学，曾讲三论一百多遍，《法华经》三十多遍，《大智度论》、《华严经》、《维摩诘经》等各数十遍。著有《三论玄义》一卷，《大乘玄论》五卷，《二谛义》三卷，《中观论疏》十卷，《十二门论疏》三卷，《百论疏》三卷，《涅槃经游意》一卷等数十部，由于他著述等身，俨然成为佛教界的一代宗师，三论宗到吉藏的手里，也可以说是正形成了。

吉藏要创建自己这一教派，必须追溯师承，并鼓吹“学问之道，要须依师承习”（《大乘玄论》卷三）。他在《百论疏》的序文中，称僧肇为“玄宗之始”。在《涅槃经游意》中，称自己这一教派，远“稟关、河（即鸠摩罗什、弟子僧肇等），传于摄岭（僧朗），摄岭得大乘之正意者”。把自己这一教派说成是中土大乘中观宗的正统嫡系。

三论宗的形成，是在唯心主义阵营内部和各个宗教神学的教派争执中成长起来的。所以吉藏在他的著作里特别强调三论的“破邪显正”。他在《三论玄义》中说：“论虽有三，义唯二辙，一曰显正，二曰破邪。破邪则下拯沉沦，显正则上弘大法，故振领提纲，理唯斯二也。”

三论宗所呵斥的对象，有四个神学流派，“一摧外道，二折毗昙（小乘），三排成实（小乘），四呵大执（大乘），因为外道不达二空，横存人、法；毗昙已得无我，而执法有性；跋摩（著《成实论》者）具辨（人、法）二空，而照犹未尽；大乘乃言究竟，但封执成迷。自浅至深，四宗阶级。”都是他排斥的对象。当然，吉藏是站在唯心主义宗教神学立场上，来反对他们的，而他对外道和小乘、大乘，又自然是分别对待的。所谓“一（外道）破不收；二（毗昙）收不破；三（成实师）亦破亦收；四（大乘某些教派）不破不收”。什么是破收的原则呢？他说：“言不会道，破而不收；说必契理，收而不破。学教起迷，亦破亦收，破其能迷之情，收其所惑之教。诸法实相，言忘虑绝，实无可破，亦无可收”。

因为外道是破而不收的，在吉藏的二谛论中，是被排斥而不齿的，因此先要提到它。吉藏在《三论玄义》里，把外道分为两类，一类是“天竺异执”，第二类是“震旦（指中土）众师”。震旦众师，有的指玄学家。从这里可以看到三论宗不仅呵责天竺的外道，也正式向中土玄学各派开火了。他引用了鸠摩罗什的说法，来攻击玄学家，他说：

罗什昔闻三玄与九部同极，伯阳（老子）与牟尼（佛）抗行，乃喟然叹曰：“《老》、《庄》入玄，故应易惑耳目，凡夫之旨，孟浪之言，言之似极，而未始诣也，推之似尽，而未谁至也。略陈六义，明其优劣：外（玄学）但辨乎一形；内（佛学）则朗鉴三世。外（玄学）未即万有而为太虚；内（佛学）说不坏假名而演实相。外（玄学）未能即无为而游万有；内（佛学）说不动真际建立诸法。外（玄学）存得失之门；内（佛学）冥二际于绝句之理。外（玄学）未境智两泯；内（佛学）则缘观俱寂。以此言之，短羽之于鹏翼，坎井（小水）之于天池，未足喻其悬（殊）矣。秦人（中土人士）疑其极，吾复何言哉！”

吉藏站在彻底的唯心主义立场上来攻击玄学各派别唯心主义的不彻底性，由此可见，过去佛教是以玄学的附庸姿态发展起来的，到了陈、隋之际，中土佛教酝酿成熟，玄学反降落到被他们所呵斥的地位了。

在佛教内部，各教派之间，一方面有斗争，一方面又必须彼此间取得一定的妥协，使不致因内部争吵而削弱到佛教的本身力量，因此在陈、隋之际，出现了所谓“判教”的这种方式。如三论宗根据天竺佛教，名小乘为“声闻藏”，大乘为“菩萨藏”。又说佛在世说法，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佛给已有深厚佛教基本知识的听众宣传教义，讲《华严经》等一乘的教法；由于一乘的教法，领悟困难，因此第二时期，佛又根据听众的程度深浅，分别讲《阿舍》、《般若》、《方等》等三乘的经法；第三时期，佛又在法华会上对佛教哲理最深的听众讲《法华经》。吉藏称佛的这种三次宣教为“三转法轮”，认为听众对佛教教义领会的程度不同，因此佛根据对象而所说的佛教教理内容也有所不同，后来佛教徒就根据佛不同时期对不同对象的说法，而形成自己的教派的。所以吉藏在首先肯定它们是佛教的前提之下，然后指出他们不足的地方，而加以分析和批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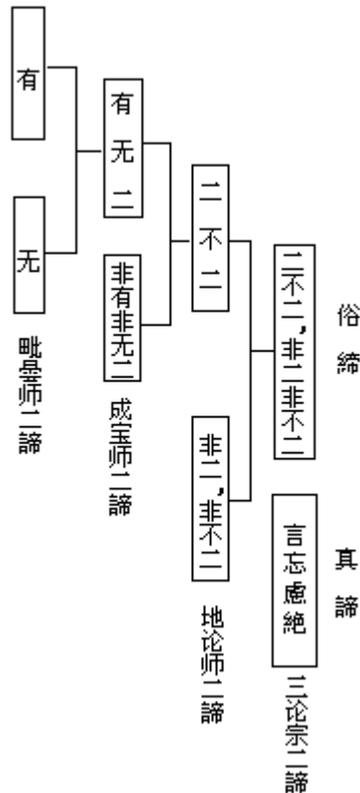
吉藏认为小乘毗昙师教义不足的地方，是这一派“但信人空，不信法空”（《三论玄义》）。这一教派“明诸法性有（承认客观世界的真实性），不知诸法性空（不了解客观世界的虚假性）。既不知性空，即不识诸法颠倒有。不知性空，不识第一义谛，不知颠倒有，即不识世谛也”（《二谛义》）。并说他们“虽知俗有，不悟真空。既惑真空，亦迷俗有，是则真、俗二（谛）”

俱并丧”（《三论玄义》）。这样，吉藏批判了这一教派承认客观世界真实存在的这一合理看法，相反采用了这一教派“人空”（即无我）的荒谬论点。吉藏引用了这一教派的二谛说来作为三论宗二谛论的四重结构的第一层结构。

吉藏认为小乘成实师教义不足的地方，是这一教派虽然说人法二空，实际它并没有真正懂得什么叫做空。它的空可以说“名为但空，谓但住于空”（《三论玄义》），结果把真如世界也否定掉了，也把它说做是空了。他举例说，这一派的僧侣听到佛教中有“毕竟空”的话，他们就必然会怀疑，“若都毕竟空，出何分别有罪福报应等？若有罪福，则不应空？推画空便起邪见也”（《二谛义》）。这样，无形之中便把佛性也掏空了，罪福报应也同时被否定了。三论宗批判说：“执於邪空（指顽空），不知假有，故失世谛；既失邪空，迷于正空（指佛性），亦失真矣”（《三论玄义》）。所以吉藏认为成实师的缺点，正在偏面强调了空，从而肯定真如世界不够。在三论宗看来，毗昙执有（承认客观世界是真实存在的），成实堕空（把真如世界也掏空了），两派虽然都有偏向，但从“空义浅深”来说，即从唯心主义的宗教神学思想来说，“则毗昙为小乘之劣，成实为小内（大乘学称接近大乘思想的小乘学为小内）之胜也”（《三论玄义》）。因此吉藏采用了这一教派的二谛说来作为三论宗二谛论的四重结构中的第二重结构。

吉藏认为有不少派的大乘师，他们也并不懂得二谛义。像有一派大乘师，他们“闻有住有，闻空住无”（《二谛义》），这叫做学二谛成“性二谛”。又如主张心无义的大乘师，他们认为“色不可空，但空於心”（《二谛义》），实际就是承认物质世界是真实存在的，这叫做学二谛成一有谛。还有一派大乘师，他们“闻空故空，闻有亦是空”（《二谛义》），这叫做学二谛成一空谛。总之，由於这些流派的大乘师“封执成迷”（《三论玄义》）的缘故，才会学二谛而得到这样的结果。在吉藏看来，上面这些流派的大乘师，名为大乘，实际是和小乘毗昙师、成实师思想很接近的流派，因此他们的二谛说还不够资格作为三论宗二谛论四重结构中的第三重结构。只有大乘瑜伽宗系统的中土地论师和摄论师，他们已经知道“法界体用，以中道为体，空有所用”了，不过他们还堕于“有所得”（《十二门论疏》）的境界，因此吉藏把地论师们的二谛说用来作为三论宗二谛论四重结构中的第三重结构。

吉藏认为无论毗昙师、成实师以及大乘地论师的论点，都还存在着缺点，只有他三论宗，“一切诸法言语断，无有自性如虚空”（《十二门论疏》），“言忘虑绝”，“无所依得”（《大乘玄论》），才是佛教的第一义谛。这四种二谛的结构层次如下图：



这样，吉藏虽然肯定了毗昙、成实、地论、摄论等师的二谛相对真理，但最后仍抬出三论宗的真谛“言忘虑绝”，认为这才是绝对的真理。吉藏的二谛论，除了耍弄一套极端烦琐的推理方法来欺骗人们以外，实际并没有什么奥妙的东西。因为他最终的目的只是想否定客观世界的存在，但他如果简单地把它否定，别人一看就看懂了，因此他必须采用四重二谛的形式表达出来，显得玄之又玄，叫人摸不清头脑，最后才搬出他的“言忘虑绝”，“无所依得”的最高真谛来。可以说，他只是耍弄一套极端烦琐的经院哲学来掩饰他空疏贫乏的内容而已。

吉藏用了很大力气来证明物质世界是虚幻的；但同时也使出他全身的力量来证明真如世界是存在的。因此，所谓“言忘虑绝”，“无所依得”，我们切不可把它当作顽空的状态来对待，实际这就是佛教徒所渲染的七宝庄严不可思议的真如世界。吉藏在《大乘玄论》卷四里说道：

真故无有，虽无而有，即是不动真际，而建立诸法；俗故无无，虽有而无，即是不坏假名，而说实相。以不坏假名而说实相，虽曰假名，宛然实相；不动真际，建立诸法，虽曰真际，宛然诸法。以真际宛然诸法，故不滞于无；诸法宛然实相，即不累于有。不累于有故不常，不滞于无故非断，即中道也。大意是说，一切存在的客观事物，都是虚假的幻像，要说它是“有”，它是不真实的东西；要说它是“无”，这些东西作为幻像来说，毕竟是存在的。实相，佛教教义中的无相之相，指的是万有的本体；真际，佛教教义中是和真如法性作同义语的，指的是精神的实体。不坏假名而说实相，就是说不放弃虚幻的假象，来说明本体；不动真际建立诸法，就是说不影响真空的本体，来建立虚假的诸法。说假的东西，不妨害真的；说真的东西，不撇开假的。作为宗教哲理的内容来讲，佛教是出世的哲学；作为宗教为世俗统治阶级服务的实质来讲，佛教又是入世的神学。因此，吉藏的三论宗和其它教派一样，在耍弄了一套“无所依得”、“言忘虑绝”的手法以后，还不得不说罪福报

应，是世谛，是假有，如果把它也说成空，便成邪见。又说：“无因果君臣父子忠孝之道，此人不识如来世谛，若不识世谛，……此人故失极大也。”（《二谛义》）从这里可以看出宗教神学在他们一套诡辩哲学的掩护之下，如何忠诚地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实质。

由于三论宗的烦琐学风，使这一教派无法广泛发展，入唐以后，它就日益衰微了。三论宗的思想，由于和天台宗比较接近，因此大部融入天台宗教义里去了。华严宗兴起，也吸取了三论宗的部分宗教神学思想。

天台宗的形成，和三论宗几乎同时。天台宗的主要依据经典《妙法莲华经》，因此这宗亦称法华宗。它固然以《妙法莲华经》为主要依据经典，但另外它还参酌了《大般涅槃经》、《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经》、《大智度论》的内容，构成它一宗的教义。北齐时，僧慧文依龙树《大智度论》和《中论》（《中论》本为《大智度论·中观品》），创一心三观之义。后来被追尊为天台宗的第二代祖师。慧文传南岳慧思（公元五一五至五七七年），慧思初居北方，后至江南。当时北方的佛教，注重禅定，而南方的佛教，偏重义理。所谓“自江东佛法，宏重义门（理论），至于禅法，盖蔑如也。而〔慧〕思慨斯南服，定（禅定）、慧（理解）双开。昼谈理义，夜便思择，故所发言，无非致远。便验因定发慧，此旨不虚。南北禅宗，不承绪”（《续高僧传》卷二十一）。可见慧思到了江南以后，也受到南方学风的影响，已经定、慧双修，因定发慧，融合佛教南北不同的学风，来形成自己一套的宗教神学思想了。

慧思传智（公元五三八至五九七年），智俗姓陈氏，颍川人，出身世族，父起祖，仕梁官至散骑常侍，益阳公。西魏破江陵，智锋镝生，投湘州果愿寺出家。后从慧思学一心三观之法，陈、隋之际，为佛教界著名领袖人物。隋炀帝为晋王，任扬州总管时，尊称之为智者禅师，意待甚厚。智于天台山创建寺院，即后之国清寺（智身后方才定名为国清寺），所以他所创建的教派，也称为天台宗。智著述甚多，有《妙法莲华经玄义》二十卷、《妙法莲华经文句》二十卷、《摩诃止观》二十卷，这三大部书以后成为天台宗的重要典籍。此外尚著有《修习止观坐禅法要》一卷、《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十二卷、《四教义》十二卷、《六妙法门》一卷、《四念处》四卷、《观心论》一卷、《法界次第初门》六卷，大都是他口述的讲义，由其门徒灌顶（世称章安大师）笔记下来加以整理而成的。天台宗在智时代，已经正式形成了。

天台宗的判教，分佛说法的时期，为五个阶段——“五时”，一，华严时，说《华严经》；二，鹿苑时，说四《阿含经》（小乘）；三，方等时，说《维摩经》等；四，般若时，说《般若经》等；五，法华、涅槃时，说《法华经》、《涅槃经》等。“佛年七十二岁，说《法华经》”（《妙法莲华经玄义》卷五上）。天台宗以《法华经》为佛最后的说法，认为这是最高经典，因此说《华严经》好像牛奶，四《阿含》好像奶酪，《方等经》好像生酥，《般若经》好像熟酥，《法华经》、《涅槃经》好像醍醐（似今之奶油），它包含佛教最高深的哲理。

天台宗还用“八教”来分别佛在五个不同的时期所讲的佛教宗教的哲学内容和不同的说教方式。八教可以分为“化法四教”和“化仪四教”。化法四教是指“藏教”、“通教”、“别教”、“圆教”。一，藏教，即小乘三藏教。二，通教，即佛说法时，利根（聪明）的人听了，就领会佛教较深的

哲理（意指大乘），钝根（不算聪明）的人听了，就留滞在小乘的阶段，可上可下，故名为通教。三，别教，是佛专对佛教哲理有深奥研究的人讲的，小乘教徒即使在座听了，也是“如聋如哑”（《四教义》），不易领会。四，圆教，是佛对佛教哲理领会最深的人讲的，因此内容最为圆妙。《妙法莲华经》既是属于这一类的经典，天台教也就当然属于圆教范围内的教派了。天台宗认为前三教都是三乘教，只有圆教，专说一乘之妙。

化仪四教，谓“顿”、“渐”、“秘密”、“不定”四种说教方法。皆指佛在世说法时，根据听讲的对象理解程度来决定他传教内容的说教方法。一，顿教，佛在华严时，对利根人讲说，他采用了使听众顿悟的讲法。二，渐教，佛在鹿苑时、方等时、般若时，对钝根人讲说大小乘，都采用了渐进的讲法。三，秘密教，佛在前四时中，运用他的“不思議力”，“或为此人说顿，或为彼人说渐，彼此互不相知，能令得益，故言秘密教”。四，不定教，“亦由前四味（即四时）中，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此则如来不思議力，能令众生於渐说中得顿益，於顿说中得渐益，如是得益不同，故言不定教”（谛观《天台四教仪》）。化仪四教可以说是天台宗自己穿凿附会搞出来的一套说教方法。最后，智 还认为佛说《妙法莲华经》时，是非顿、非渐、非秘密、非不定，采用了纯圆独妙的教法。总之，天台宗在各方面来抬高《妙法莲华经》在佛教经典中的地位，以提高天台宗在佛教诸教派中的地位。

天台宗主张定慧双修，所以这一宗很重视禅学。智 在《禅门口诀》中说到坐禅的方法：“行者常住闲静之处，结跏趺坐……平身正直……不倚不曲，解衣缓带，辄有不安，微动取便，要令调适也……小小开齿，微微启举舌，四五过长吐气，次渐平视，徐徐细闭目，勿令眼脸太急（放松肌肉）。”又云：“息（呼吸）有四种，应当拣择，一风，二气，三喘，四息。有声曰风，结滞曰气，出入不尽曰喘，不声不滞，出入俱尽曰息，绵绵若存。守喘则劳，守气则结。守风则散乱，守息则定。”他们还认为“息（呼吸）入出于脐”，他又说：“然后闭目合口开齿举舌向腭，令息调均（匀），一心谛观，若有外念，摄之令还。”“行者尔时一切勿著，但努力一心而已。”到了坐禅终了，“乃微动手脚，次动如按摩法，次开目，从细至麓，乃可起耳”。这种禅法，好像气功一样，把肌肉放松，使思维宁静下来，对治病来讲，有其合理可取之处的，但教徒却把它神秘化起来，作为成佛的手段，那就显得荒谬了。

天台宗就是上面所讲的那种禅法的基础上，提出他们的止观论来的。宋释元照在《修习止观坐禅法要》序中，说到“台教宗部虽繁，要归不出止观。舍止观不足以明天台道，不足以议天台教”。可见止观论是天台宗神学思想的核心。智 在其所著《修习止观坐禅法要》一书中说：“若夫泥洹之法，入乃多途，论其急要，不出止观二法。止乃伏结之初门；观是断惑之正要。止则爱养心识之善资，观则策发神解之妙术。止是禅定之胜因，观是智慧之由籍。若人成就定慧二法，斯乃自利利人，法皆具足……当知此之二法，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若偏修习，即堕邪倒。故经云：“若偏修禅定福德，不学智慧，名之曰愚；偏学智慧，不修禅定福德，名之曰狂。狂愚之过虽小，不同邪见，轮转盖无差别。”“止”与“观”是禅法中的两个过程。“息心静虑，名之为止”。又“凝心寂虑，心无波动（《法界次第初门》）”谓之“凝心止”。在这种坐禅的精神状态之下，然后再去用佛教教义观察宇宙本

体，得出对真实世界和常人相反看法的颠倒结论，这就名之为观。可以说，止观是通过禅法中内心观察，制止一切意识活动，而得出使自己的心（思维）与宇宙本体相冥合的一种宗教修证功夫。

智 在《法界次第初门》里，一开始就说：“今辨法界初门……但有名、色二法，当知名、色，即是一切世间、出世间法之根本，能生一切法，普摄一切法，即是一切法”。名就是心（当时以心为思维的器官），就是一切意识活动的总称，它“虽有能缘之用（主观的意识作用），而无质碍可寻”（没有物质实体），所以叫它做名。色是“有形质碍之法……既异于心意识法，故称为色也”。但色不仅包含从属于物质性的东西，同时也包括感觉经验（如眼入、耳入、鼻入、舌入、身入；色入、声入、香入、味入、触入）。如果不去管它概念上的混乱，大致可以说他把世界分成物质和精神的——客观和主观的两部分。

这两者之间，怎样联结起来呢？智 说：“根、尘相对，即有识生。识依根尘，即是能入，根尘即是所入。”（《法界次第初门》）根是感觉器官，尘是感觉对象。这是说由于感觉器官和感觉对象的接触，而产生了“识”。识虽是依于感觉器官和感觉对象而产生，但它是主动的（能入），而感觉器官和感觉对象则是被动的（所入）。上面所说的“识”，还是指前五识（眼耳鼻舌身），即感觉或知觉。智 认为第六“意识”，就是在前五识的基础上产生的，即人们的感觉器官与外界接触，就产生意识。意识产生之后，就反过来认识外间世界。从前五识到意识界的过程，即从感觉或知觉提高到思维的过程。

一直到这里为止，除了在某些地方混淆了物质性的东西和精神性的东西的界限以外，大体说来，还没有太违反普通常识。但智 却是想通过名、色的分辨，来证明客观世界都是虚幻的假象，他在《修习止观坐禅法要》中说：“反观所起之心（思维），过去已灭，现在不住，未来未至，三际穷之，了不可得。不可得法，则无有心，若无有心，则一切法皆空。”他用割断时间的方法来否定客观世界的真实性，而反过来论证“一切诸法，皆由心生”。这样他把客观世界最后归结为一个“空”，归结为虚幻的假象，那末前面所讲到的一套名色分辨，实际也不过是镜中像、水中月，如梦，如幻，如乾闥婆城（海市蜃楼），而毫无实在内容了。

智 认为多样性、复杂性的“三千世界”，不过是一心的产物，所以他说：“此三千，在一念心。若无心而已；介尔有心，即具三千。”（《摩诃止观》卷五上）他认为没有主观的思维，就没有客观的世界。这是一种十分露骨唯心主义观点。在智 的老师慧思的《大乘止观法门》里，慧思还讲到：“非但一念与三世等，亦可一念即是三世时劫，非但一尘共十方齐，亦可一尘即是十方世界。何以故？以一切法唯一心故。”他还举了一个极其荒谬可笑的例子：

佛法……是知一切法（事物）悉是心作……非谓心外有其实事……我今方便令汝得解，汝用我语不？外人曰：“善哉！受教。”沙门曰：“汝当闭目忆想，身上一小毛孔，即能见不？”外人忆想一小毛空已。报曰：“我已了了见也。”沙门曰：“汝当闭目忆想，作一大城，广数十里，即能见不？”外人想作城已，报曰：“我于心中了了见也。”沙门曰：“毛孔与城大小异不？”外人曰：“异。”沙门曰：“向者毛孔与大城，但是心作不？”外人曰：“是心作。”沙门曰：“汝心有大小邪？”外人曰：“心（思维）无形

相，焉可见有大小。”……沙门曰：“然则一心全体唯作一小毛孔，复全体能作一大城，心既是一无大小，故毛孔与城俱全用一心为体，当知毛孔与城，体融平等也”（《大乘止观法门》）。

空间的大小，在天台宗看来，没有客观的标准，完全是由主观意识想象得来的。他们认为一毛孔和一大城，在主观意识的领域里，完全没有区别，这是多么荒谬可笑违反常识的事情！

天台宗除了对物质存在形式的空间，作了如此荒谬可笑的说明以外，他们还物质存在形式的时间，也作了类似的比拟。他们说：

“我今又问汝，汝尝梦不？”外人曰：“我尝有梦。”沙门曰：“汝曾梦见经历十年、五岁时节以不？”外人曰：

“我实曾见历涉多年，或经旬月时节，亦有昼夜，与觉无异。”沙门曰：“汝若觉已，自知睡经几时？”外人曰：“我既觉已，借问他人，言我始经食顷。”沙门曰：“奇哉！于一食之顷，而见多年之时，以是义故，据觉论梦，梦里长时，便即不实；据梦论觉，觉时食顷，亦则为虚。若觉、梦据情论，即长短各论，各谓为实，一向不融；若觉、梦据理论，即长短相摄（长中包含短，短中包含长），长时是短（梦中之数年，只有醒时之俄顷），短时是长，而不妨长短相别。若以一心望彼，则长短俱无，平等一心也。正以心体平等，非长非短，故心性所起长短之相（意识中想象的时间长短的表象），即无长短之实（并没有实际上的时间长短），故得相摄（所以长达十年五岁，短到食顷，都可包含在一心之中）。若此长时自有长体，短时自有短体，非是一心起作者，即不得长短相摄。又虽同一心为体，若长时则全用一心而作，短时即减少许心作者，亦不得长短相摄。正以一心全体复作短时，全体复作长时，故得相摄也”（《大乘止观法门》）。

他完全否认了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实在性，他认为空间和时间是存在于意识之中，或倚赖于意识而存在的东西，是精神、意识的产物，这已经是极其可笑的了；如果再联系起佛教理论把物质世界从空间、时间中抽掉这一观点来看，那么空间和时间就老早已经成为唯心主义者头脑中空洞的观念，所谓空间、时间，不过是在耍弄词句而已，本来就已经没有内容可言的了。

智 论证物质世界是空的，虚假的；那末“一切诸法，皆由心生”，心究竟是否也是空呢？他通过四种心相的观察，来证明心也是空而不可得的。四种心相是：“一者未念，二者欲念，三者正念，四者念已。”（《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觉意三昧》），他采用龙树中观宗一贯所采用的诡辩手法，烦琐地论证这四种意识活动的过程，最后证明这四种状态，都是不实在的，那末心也就是空了。

心空，是说心不实在（虚相），不是说心不存在。相反，天台宗对修心这一门工夫还特别强调。慧思在《大乘止观法门》里，大谈其心性之学，他抽掉了人的阶级性，大谈人性。他认为人的心本来是清净的，但“体具染（肮脏的东西沾染它）、净（乾净的东西洗涤它）二性之用，故依染、净二种熏力，能生世间，出世间法也”。也就是说，心就着外界的熏染，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所以他又说：“心体若唯具染性者，不可得转凡成圣；既并具染、净二心，何为不得转凡成圣邪？”“一一众生，一一诸佛，心体本具（染净）二性，而无差别之相”。因此如用“净业熏，则成圣”，“染业息（繁息之息），故转凡”。“就性说，故染、净并具，依熏论，故凡圣不俱”。在这样一个理论基础上，天台宗特别强调止观以达到“净业熏净心”的预期

效果。

如果净业熏心以后，清净心就成为佛心。慧思在《大乘止观法门》里说：“此心即是自性清净心，又名真如，亦名佛性，复名法身，又称如来藏，亦号法界，复名法性，如是等名，无量无边。”智 也在《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觉意三昧》中说：“夫行人欲度生死大海，登涅槃彼岸者，必须了达妄惑之本，善知至道出要。妄惑之本，是即意之实际，至道出要，所谓反照心源。识之实际，即正因佛性，反照心源，即了因也。”所谓清净心、真如、佛性、法界、如来藏、实际、心源，都是指一个东西，即存在宗教神学唯心主义头脑中的一个常住不灭永恒不变的精神实体。

怎样来净业熏心呢？就得先从观心的修证过程着手，智 在《修习止观坐禅法要》里，把观心到达中道正观的过程，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止观的“止”方面来论证：

若行者如是修止观时，能了知一切诸法，皆由心生，因缘虚假不实，故空。以知空故，即不得一切诸法名字相，则体真止也。尔时上不见佛果可求，下不见众生可度，是名从假入空观，亦名二谛观。

第二个阶段是从止观的“观”方面来论证：

若菩萨为一切众生，成就一切佛法，不应取著无为，而自寂灭，尔时应修从空入假观。则当谛观心性虽空，缘对之时，亦能出生一切诸法，犹如幻化，虽无定实，亦有见闻觉知等相差别不同，行者如是观时，虽知一切诸法毕竟空寂，能于空中修种种行。如空中种树，亦能分别众生诸根，性欲无量故……是名方便随缘止，乃是从空入假观，亦名平等观。

第三个阶段是从止观的双照方面来论证：

因是二空观，得入中道第一义观，双照二谛，心心寂灭，自然流入萨婆若海（一切智海）……若体知心性，非真非假，息缘真假之心，名之为正谛观。心性非空非假，而不坏空假之法。若能如是照了，则于心性通达中道，圆照二谛。若能于自心见中道二谛，则见一切诸法中道二谛，亦不取中道二谛，以决定性不可得故，是名中道正观。

天台宗对世界万有的认识，就是采用这即空、即假、即中的空假中三谛观，作为它的认识论的。所谓一心三观，三谛圆融。三谛圆融之说是智 根据龙树《中论》：“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名为假名，亦名中道义”这一偈而衍化出来的。中观宗在中土的各流派既然采用真俗二谛来认识一切事物，实际就掉进中道观这一宗教神学的唯心主义泥坑里去了。比智 稍后的三论宗祖师吉藏在《三论玄义》中也说过：“即二谛是中道，既以二谛为宗，即以中道为宗。”可见真俗二谛就是中道，智 不过把这三者用空（即真谛）假（即俗谛或世谛）中的名称连（天台宗美之曰圆融）在一起而已，然后智 又故弄玄虚的把这观点渲染一番，戳穿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货色！中唐时，天台宗的继承者、智 的五世门徒湛然（公元七二至七八二年）著《始终心要》一书，书里说：“夫三谛者，天然之性德也。中谛者，统一切法；真谛者，泯一切法；俗谛者，立一切法，举一即三，非前后也。含生（人类）本具，非造作之所得也。”天台宗的外围信徒翰林学士梁肃在其《天台止观统例》一文中，也称：“夫三谛者，何也？一之谓也。空、假、中者，何也？一之目也。空、假者，相对之义；中道者，得一之名。……至一即三，至三即一，……非数义也，非强名也，自然之理也。……所谓空也者，通万法而为言者也；假也者，立万法而为言者也；中也者，妙万法而为言者也。

破一切惑，莫盛乎空；建一切法，莫盛乎假；究竟一切性莫大乎中。举中则无法非中；目假则无法非假；举空则无法非空。成之谓之三德，修之谓之三观。”湛然、梁肃两人把智 的一套唯心主义认识论捧得高之又高，解释得玄之又玄，因为捧得愈高，愈能迷惑一般人，讲得愈玄，才能使人听了骤然无从下手分析而受他们的欺骗。

尽管智 一讲止观，洋洋洒洒数百万言，一入禅那，说得个中三昧不可思议，但这样的高僧，他们不是生活在云端里的，他在世俗间，反动的政治立场非常坚定，佛教天台宗也和其它教派一样，为当时统治阶级服务的目的非常明确。智 在其代表性作品《妙法莲华经玄义》一书中说道：

若周、孔经籍，治法、礼法，兵法、医法，天文、地理，八卦、五行，世间坟典。孝以治家，忠以治国，各亲其亲，各子其子，敬上爱下，仁义揖让，安于百姓，霸立社稷。若失此法，强者陵弱，天下焦遑，民无聊生，鸟不暇栖，兽不暇伏。若依此法，天下太平，牛马内向。当知此法乃是爱国治民。而称为实。《金光明》云：“释提桓因种种胜论”，即其义也。盖十善意耳。修十善，上符天心，诸天欢喜，求天然报，此法为胜，故言胜论耳。

尽管他认为这些政治现实，在佛教看来，是“世界现见，何实可论”？但他还是以非常积极的态度来维护这种社会秩序的，甚至认为能够把封建秩序稳定下来，是上符天心，诸天也会欢喜的。因此天台宗的政治反动立场，也是极其露骨的，和其它教派比起来，并没有多大两样。

玄奘、义净的取经与传译 上面介绍了三论、天台宗思想以后，应该再来介绍法相宗的一套唯心主义思想。在讲法相宗思想以前，必须先介绍玄奘、义净西行取经和大量传译的事情。

在唐代前期，对西行取经和对佛经大量翻译贡献较大的，有玄奘和义净。

玄奘，俗姓陈，名 ，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县南）人，年十三，在洛阳出家为僧。隋末唐初（公元六一八年），避地长安，后住成都。武德五年（公元六二二年），唐王朝那时已统一了江南，玄奘乃自三峡下航荆州，后又北到相州，旋又还归长安。

玄奘研究《俱舍》、《摄大乘》论，感到论中有些问题，理解不能深透，屡向国内诸师问难质疑，但也不能满足，因此动了留学佛教发源地五天竺的念头。

贞观三年（公元六二九年），时玄奘年二十八岁，随饥民度陇，至河西走廊。时突厥强盛，因此越境之禁甚严。玄奘乃偷越玉门关，渡莫贺延碛，备极艰险，而至伊吾（今新疆哈密县）。这时高昌王正在伊吾，就把他接往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县）。由高昌王写了介绍信并派人护送他到西突厥可汗处。玄奘经阿耆尼（今新疆焉耆县）、屈支（今新疆库车县）、跋禄迦（今新疆阿克苏县），西北行三百余里，度石碛，至凌山木（苏尔岭），山行四百余里，至大清池（又名热海，今伊斯色克湖），沿大清池又进至西突厥可汗牙帐（碎叶城，今苏联吉尔吉斯共和国托克马克）。又由西突厥可汗派人护送，经药杀水（锡尔河）、乌浒水（阿姆河）流域的赭国（即石国，今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塔什干）、颯秣建国（即康国，今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撒马尔罕）、捕喝国（即安国，今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布哈拉）等诸国（昭武九姓），而至睹货罗国（即吐火罗，今阿富汗之巴尔克[Balkh]）。翻越大雪山（兴都库什山），经梵那衍国（今阿富汗之巴緬[Bamian]）、迦毕试国（今阿富汗之 Kifirstan）、滥波国（今阿富汗之喀布尔河上游）。由此前达健

驮罗国（今巴基斯坦之白沙瓦[Peshawar]），遍历了五天竺的十个国家或城市，巡礼佛迹，朝拜著名寺院。尝在迦湿罗国（今克什米尔）住了两年之久，学诸经论；并曾往今尼泊尔南境释迦的故居迦毗罗卫城等地巡礼，还到达今尼泊尔的首都加德满都。又在中天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羯若鞠多国家戒日王朝的首都曲女城（今印度巴特那[Patna]）之南王舍城的佛教最高学府那烂陀寺[Nalanda]停留了五年之久。这五年中，玄奘在那烂陀寺从瑜伽宗的戒贤论师受业，研究《瑜伽师地论》奥义；他又往杖林山从戒贤的高足胜军论师处受业二年，尽得胜军所擅长的《唯识决择论》胜义。他还钻研四吠陀和《奥义书》等天竺原始哲学著作，以穷本探源。由于他学习的努力，成绩卓越，因此在那烂陀寺的最后二年，还代戒贤为众僧开讲《摄大乘论》、《唯识决择论》，获得了一致的好评。他看到马鸣的《大乘起信论》，中土有传本，反而在天竺失传了，因此他又“译唐为梵，通布五天”（《续高僧传·译经篇·唐京师大慈恩寺玄奘传》）。他又用梵文写成《会宗论》来驳斥《瑜伽师地论》的论敌师子光。为了应付论敌的答难，他又写出《制恶见论》一千六百颂，书虽不传，但它的结论用因明（天竺逻辑）格式揭示于戒日王在曲女城为他举行的学术辩论大会上。这次大会，有五天竺十八个国王、大小乘僧侣三千余人、婆罗门和耆那教徒二千余人、那烂陀寺僧侣一千余人参加。学术辩论大会一共举行了十八天，没有一人对玄奘的论文结论提出非难，这也可见玄奘佛学造诣之深了。

贞观十七年（公元六四三年），玄奘离开羯若鞠多取道回国。出天竺，渡雪山，复经睹货罗（吐火罗，今阿富汗之巴尔克[Balkh]）等十余国，然后东行入波谜罗川（今帕米尔）；从波谜罗川东出五百余里至羯盘陀（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县），再经乌铎（今新疆英吉沙县）、佉沙（今新疆喀什市）、斫句迦（今新疆叶城县）、瞿萨旦那（今新疆和阗县）、纳缚波（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县），自塔里木盆南道返至敦煌。贞观十九年（公元六四五年），玄奘到达长安；前后出国十七年，留学五天竺者历十五年之久。出去时二十八岁，回来时已经四十四岁了。

玄奘学成回国，由于他在五天竺对于佛教研究方面获得了较高的荣誉，因此唐太宗把他接到洛阳去，并亲自延见。

玄奘从贞观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到达长安，中间去洛阳一次，到了三月初，就又回到长安，他先住弘福寺，后住大慈恩寺、玉华宫，从事翻译佛经工作，一直从事了十九年的翻译工作，到他临死（麟德元年，即公元六六四年二月五日）前的一个月才搁笔。在这十九年之中，“专务翻译，无弃寸阴，每日自立课程，若昼日有事不充，必兼夜以续之，过乙（乙夜）之后，方乃停笔。……三更暂眠，五更复起，读诵梵本，朱点次第，拟明旦所翻”（《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他一共译出了佛经七十四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平均每年译出七十卷，而实际到他最后快死的几年，平均每年乃至译出一百七十卷之多。

在玄奘以前，对佛经的翻译工作，已经有很高的要求了。如隋代释彦琮在其所著《辩正论》中曾提到译师应该具备的条件——八备。我们把它归纳起来，有下列几点：（一）译师首先要注意他本人人格上的修养，不要固执成见，不要追求哗众取宠；（二）对大小乘和经律论各方面都要精通；（三）不但对梵文要有深刻之研究，而且对本国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也要打好底子；（四）要多读经、子、史、集，来扩充自己的知识面和提高自己的

写作水平。彦琮在这里不仅谈到译例，同时还谈到译才、译德。但是尽管对译师的条件谈得这样详备，可是当时主译的译师，主要还是胡僧、梵客。如隋炀帝在西京、东都置翻译馆，唐高祖在长安大兴善寺设翻经院，仍然均以梵僧充任译主。到了玄奘返国，由他来充任译主，才完全改变梵僧充任译主的这种局面。

前代的译主，都由胡僧、梵客来充任，他们往往在到达中土以后始学汉语，因此在翻译工作进行方面，自然不免遇到捍格。而玄奘留学达十余年之久，他不但在梵文方面的修养，已经和天竺学者差不多；同时，他在佛学方面的研究，也造诣很深。由他来充任译主，自然较以前由胡僧、梵客来充任译主，更是理想得多了。“印印皆同，声声不别”（《宋高僧传》卷三），翻译工作上一些困难，基本上是克服了。何况玄奘对祖国文字也非常有修养，由他来宣译，“意思独断，出语成章，词人随写，即可披玩”（《续高僧传》卷五）。翻译出来的佛经，不仅在内容的正确程度上接近梵本；就是在文字上，也披玩可读了。

译场由政府来主持以后，译场的组织分工，也愈来愈细致。玄奘和以后义净所主持的译场，其组织大体如下：

- （一）译主 由汉地僧人担任，执本宣译。
- （二）笔受 由汉地僧人笔受为汉文，亦称“缀文”。
- （三）证梵本 由胡僧、梵客用梵本把译文对正一道。
- （四）证梵义 由胡僧、梵客把译出的汉文和梵文所载佛教教义对证是否密合。
- （五）证梵语梵文 用汉僧或梵僧对校译名是否妥切。
- （六）证义 由汉地僧人审查译出的“文字”、“内容”，是否妥切。
- （七）润色 由政府特派词学之臣，润色译文。
- （八）总勘 由汉僧在最后定稿时，校勘讎对译文一通，减少错失。
- （九）监护 在译场成立时，并由政府派大臣监护。译书的过程如此繁复，译场的分工如此细致，证文、考义，又至再至三，译出的佛经，当然能够保证一定的质量。而在这种译场中，一方面固然已经由汉僧担任译主，但在翻译工作各环节中，也并不排斥胡僧、梵客，如译场中，证梵本、证梵义、证梵语梵文这三项工作，还是尽量发挥胡僧、梵客的专长，而请他们担任。当然，主要的骨干工作，则是由汉地僧人自己担负起来了。

玄奘的翻译工作，不但丰富了中土佛教思想的内容，也为天竺佛教保存了很多珍贵的典籍。所慨叹的是玄奘所翻译过来的经论，全部都是属于唯心主义体系的东西，都是统治阶级利用它来毒害人民的宗教理论，他一生把宝贵的精力投掷到这种无益而有害的宗教神学事业上去，真是“有似黄金掷虚牝”（韩愈诗句）了。

玄奘除了翻译以外，还和他的弟子合作写了一部《大唐西域记》。这部书，详细地、生动地记载玄奘游历过的一百多个国家和传闻的二十个国家的情况，包括历史、地理、生产、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等。《大唐西域记》是一部研究公元七世纪前期五天竺以及中亚细亚等地区历史的重要著作。

玄奘在佛学上的辉煌成就，激荡起当时中土僧侣西行求法的念头，同时唐王朝的繁荣强盛，及它和中亚各国建立了友好的关系，中外间的交通亦有了空前的发展，也有助于僧侣西行求法的顺利进行。所以，继玄奘之后，僧侣西行取经之举，一时风起云涌，是佛教史上的盛事。

较玄奘稍后十多年去天竺的，有释玄照，他在贞观末（文成公主嫁吐蕃在贞观十五年公元六四一年），取道吐蕃，得文成公主的资助，前往天竺，留学闍烂陀国（即《大唐西域记》之闍烂达罗，今Galandhar）四载，学经、律，习梵文。后来又南至莫诃菩提寺（在中天竺摩揭陀国首都西南五、六里），留住四载。最后又在那烂陀院寺进修三年，就胜光法师学《中论》、《百论》；就宝师子受《瑜伽十七地》。在五天竺一共十一年。龙朔三年（公元六六三年）九月，唐朝诏书徵还，玄照从中天竺那烂陀寺（今印度巴特那[Patna]）出发，到了麟德元年（公元六六四年）的正月，就到达洛阳了。从中天竺到洛阳，全程不到半年，取道吐蕃，这是过去僧侣所没有走过的一条道路。玄照回来不久，唐高宗又派他再往五天竺，但到了中天竺，他就病死了。

玄奘以后，西行著名者，还有义净。

义净，俗姓张，字文明，范阳（今河北涿县）人。幼年出家为僧，年十五，便想往天竺取经。但到了三十七岁，才正式成行。唐高宗咸亨二年（公元六七一年）十一月，从广州出发，航行二十日到佛逝（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上之巨港[Palembang]），住了六个月；又进至末罗瑜国（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上之占碑[Jambi]），住了两个月，转往羯荼（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上之亚齐，现名哥打拉亚[Kata Raja]），又北行十余日至裸人国（今尼科巴群岛[Nicobar Is]），又西北行半月许，到达了东天竺的耽摩立底国（即法显《佛国记》里的多摩黎帝国，其地在距恒河口约六十里之Tamluk）。于是遍游五天竺，历三十余国。他住在那烂陀寺一地，即历十年之久。回国的時候，义净还是从耽摩立底搭船，到达佛逝后，又侨居该地有六年之久。到了武则天永昌元年（公元六八九年），一度回到广州，同年冬，再度泛海至佛逝搬运行存贮在那里的梵文经、律、论近四百部，合五十万颂。证圣元年（公元六九五五年）五月，才又回到洛阳。回国以后，即从事佛经翻译工作。他从公元七一年起到公元七一三年止，这十三年间，前后译出了佛经五十六部，二百三十卷。他还著有《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这两部书是研究公元七世纪佛教史以及中国和西域、南海的交通史方面的宝贵史料。

**法相宗的唯识思想** 天竺大乘瑜伽宗的宗教神学思想传来中土，当在南朝刘宋初年。宋文帝元嘉（公元四二四至四五三年）末，有中天竺僧人求那跋陀罗，在荆州辛寺译出《相续解脱地波罗蜜了义经》一卷，十八纸，这一部经就是从《解深密经》中把最后二品独立出来加以翻译的，而《解深密经》则为大乘瑜伽宗的主要依据经典。到了陈代天嘉四年（公元五六三年），西天竺僧人拘那罗陀（即真谛）在江南把《摄大乘论》和《解节经》（即《解深密经》初五品的略本）等一起翻译出来，瑜伽宗唯识思想在中土就传播开来了。真谛的门徒慧恺、法泰等又发扬这一派的学说，当时称之为摄论师。但是瑜伽宗的经典，一直到唐贞观初年，传来中土的还不齐备，玄奘的去天竺取经，主要就是去取和瑜伽宗有关的经论。

法相宗的主要经典有六部经和十一部论，在六部经中，以《解深密经》为最重要，在十一部论中，以《瑜伽师地论》为最重要。玄奘从天竺归来，把《解深密经》五卷，全部译出，同时又把《瑜伽师地论》也翻译了过来，又把天竺瑜伽宗护法 etc 十位论师解释世亲所著《唯识三十颂》的论文，也有系统地编译了过来，称为《成唯识论》十卷。这样，大乘瑜伽宗的经、论基本都翻译过来了，法相宗也开始有条件在中土形成了。玄奘的弟子窥基，著

《成唯识论述记》二十卷、《成唯识论掌中枢要》四卷、《唯识二十论述记》二卷、《瑜伽师地论略纂》十六卷、《大乘法苑义林章》七卷等，法相宗的神学理论更是充实了。因为这一派是穷究万法之性相（《大智度论》云：“性言其体，相言可识”，如火热是其性，烟是其相），所以称之为法相宗；因为它的教理是说明万法唯识的，因此又称之为唯识宗；玄奘和他的弟子窥基都住在大慈恩寺，因此又称为慈恩宗。

《成唯识论》虽然是玄奘编译的一部著作，但这本著作在编译的方式上和其他经论的翻译不一样，是“参糅”十家的论点，有所取舍的，所谓“陶甄诸义之差，有叶一师之制”（窥基《成唯识论述记》）。因此要探索玄奘等的唯识思想，亦以《成唯识论》为主要论据。

法相宗的判教，是完全以《解密深经》为依据的。它把佛的说教，分为三个时期，三个内容。这三个时期，所以有不同内容，这是由于听讲的对象不同，因此佛所说的教义也有深有浅，但都是佛说。第一时佛在鹿野苑所说为小乘有教，如四《阿含经》等。第二时佛在鹫岭所说为大乘空教，如《般若经》等。第三时佛所说的为大乘中道教，也就是瑜伽宗的教理，如《解深密经》、《华严经》等。它认为小乘有教和大乘空教（即中观宗）虽都是佛所说的教义，但都是佛为浅根人所说的“方便教”，都是不了义，只有瑜伽宗的教义，是真了义，是佛所说教理的精髓的学说。

法相宗认为小乘教某些教派，虽明人空，但未显法空，即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存在，没有加以否定；而另一些小乘教派如出于大众部的成实师，又过分强调了我法俱空，而又流于顽空。至如大乘中观宗，他们也是不但空外境，同时连涅槃精神境界也说成是虚幻的，这样，它固然堵塞了承认客观实体的一切道路，但同时把佛性、真如也说成空了，那就给宗教神学的理论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因此法相宗在讲空的基础上，即否认客观世界的真实存在的基础之上，并用全付力量来说明真如、佛性的实在性。

窥基在《成唯识论述记》中，解释唯识二字的意义时曾说：“唯谓简别，遮无外境，识谓能了，诠有内心。识体即唯持业释也。识性、识相，皆不离心，心所、心王，以识为主。归心泯相，总言唯识。唯遮境有，执有者丧其真；识简心空，滞空者乖其实。所以晦斯空有，长溺二边，悟彼有空，高履中道。”这是说，法相宗和大乘以及小乘某些教派一样，不承认物质世界的真实性，这是完全一样的，而法相宗它又把一切物质世界都归结为“识”的变现。它继承了大乘中观宗的“中道观”方法论，既批判了小乘某些教派以客观世界为实有的观点；又批判了大乘中观宗过分强调了心空的说法，而建立法相宗“识有非空，境无非有”（《成唯识论》卷一）的非空非有中道观。

法相宗认为一切精神方面的“心法”，一切自然现象方面的“色法”，都非实有，只是“识”的变现。所以它说“一切唯识”，“是故一切皆唯有识”，“实无外境，唯有内识”（《成唯识论》）。因此要研究法相宗的思想，只有从识变入手。

法相宗把人的精神现象，名之谓“心法”，分为八种，即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末那识、阿赖耶识。法相宗认为人的思维活动，就是由这八识组成的。它们是一个统一体，既是互相依存，又是存在着差别的。法相宗认为无论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都是由识所变现的。八个识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前六识是一类，其主要特点是起明了分别的作用，通过它可以区别色、声、香、味、触和思想想到的一切东西。这六识中，前五识和第

六识（意识）的功能又有区别。前五识相当于我们所谓的“感觉”，这五种识只能明了分别事物外部现象的个别方面，而不能明了分别外境的全部（如舌识只能辨别滋味，鼻识只能辨别气味等等），同时对事物的外部现象也只能发生直接的感觉，而不能够比量推知，所以由前五识得到的感觉是片面的、粗糙的、浮浅的。又因为前五识一定要与外境直接接触，才能生起作用，外境不显现时，作用就不起（如外境无色，即不起色觉；外境无声，即不起听觉等等），所以它们“起时少，不起时多”（《成唯识论》），因此它们的作用又是不连续的；有间断的。

第六意识虽与前五识都以外境为对象，但它能够了别外境的全部，因此它又获得“法识”这一名称。《成唯识论》里说：“色等五识，唯了识等，法识通能了一切法，或能了别法，独得法识名。”它对于外境的明了分别能力比前五识为深；它不仅能够明了分别现有的事物，还能比量推知，明了分别过去或未来的事物。但第六识也和前五识有相同的地方，即它亦以外境为对象的，因此它虽“断时少，现起时多”（《成唯识论》），但它在某种情况下（如在熟睡和闷绝状态中），也是有间断的。所以它的特点，《成唯识论述记》里说“第六深而不续”。

法相宗认为第六识在意识活动中，已经开始产生“我执”和“法执”，即把“虚幻”的自我与“不真实”的客观世界，当作“实我实法”。法相宗把这种“执”分为两类：一类称“俱生我执”和“俱生法执”；另一类称“分别我执”和“分别法执”。前者与生俱来，不待外缘，后者必待外缘而生起。俱生我执和俱生法执又有两种：一者常相续，二者有间断。在第六识中所形成者我法二执，就是有时有间断的，其常相续的一种要到第七识中才形成。至于分别我执和分别法执，则在第六识中都已形成了。所以可以这样说，在第六识中，已经初步形成一个自我中心了。可是这个自我，还是以外境为对象，所以它还具有间断性。

第七末那识，它和前六识不同，它不以外境为对象，而是以内在的第八阿赖耶识为它的“境”。它的特点是“恒审思量”（《成唯识论述记》），即永恒不断地思维着它。和第八识第六识都不同，第八识是“虽恒，非审思故”，第六识是“虽审思而非是恒，有间断故”（《成唯识论述记》）。前五识不审不恒，只有第七识具有“审”、“恒”的性质和功能。

第七识从无始以来就和第八识同时生起，它以第八识为“境”，而“起自心相”（《成唯识论》），执为实我实法。上面讲到第六识所形成的自我中心，是以外境为对象的，是具有间断性的；而第七识所形成的自我中心，则是以内在的阿赖耶为对象的，深藏的，无间断的。《成唯识论述记》里说它的特点是“第七深而不断”，就是说既连续，又深远。

第八阿赖耶识，它是八识中最根本的一种，也是七识所依止的中心，一切识都摄藏于第八识，由它生起，它有发号施令主持一切的作用，因此称它为“根本依”、“心”。它的特点是“第八不深不断”（《成唯识论述记》）。

第八识所以称为阿赖耶识，或译为藏识，因为它有三重涵义：第一是“能藏”，即能藏一切“种子”；第二是“所藏”，即一切种子的藏所；第三是“执藏”，即第七识（末那）执著此识以为自我。

什么叫做“种子”呢？在天竺瑜伽宗的创始人大概看到稻有稻种，粟有粟种，因此认为世界万有也应当有它的种子。但由于他们否认有物质性的世界，认为一切都是人的“识”产生的，因此认为这种子也离不开人的主观精

神，它不是物质性的，只能是精神性的。法相宗把这种精神性的种子，作为构成世界万有的原因。这“种子”就是潜藏在第八识中。当它的潜在状态直接显现时，便成为“现行”（显现行起）的诸识（前七识）。

法相宗对“种子”的来源，有三派说法：第一派认为“种子”是本来就有的，“现行”熏“种子”，只能增长其势力，而不能产生新种子；第二派认为“种子”是由“现行”熏习才产生的，所谓熏习，也是一种比喻的说法，譬如用香油来熏发“种子”，当“现行”诸识在生灭过程中，留有余势，投入第八识中，又形成新种子；到了玄奘时代，瑜伽宗又调和了以上两派的说法，认为“种子”有两类，一类是本有种子，一类是新熏种子，以上两类“种子”，合生“现行”。“种子”的显现，也不是杂乱的，若新熏的遇缘，便从新熏生，本有的遇缘，便从本有生。

“种子”是识的潜在状态，而“现行”的诸识乃是这种潜在的识的显现，因此它们的关系是“种子”生“现行”，即“种子”是因，“现行”是果。“现行”由“种子”生起，但又反过来熏习“种子”。原来的“种子”被熏之后，就成为新的“种子”，这就是“现行”生“种子”，“现行”是因，“种子”是果。这样，“种子”与“现行”，相互更生，互为因果，这种交错的因果连锁，因为“种子”和“现行”不同类，所以称之为“异类相生”。又因为它们互为因果，因果同时而具，所以又称之为“因果同时”。

法相宗分析“种子”与“现行”的关系，还不是到此为止，他们更进一步的认为“种子”生起“现行”，“现行”又熏成“种子”，就新种子和旧种子的因果关系而言，乃是旧种子生新种子，即旧种为因，新种为果。同样，“现行”熏“种子”，“种子”又生起“现行”，就旧的“现行”和新的“现行”的因果关系而言，乃是“现行”生“现行”，即旧的“现行”是因，新的“现行”是果。这种“种子”生“种子”，“现行”生“现行”的因果关系，法相宗称之为“自类相生”。在这一重因果关系中，因果不能同时而具，所以又称之为“因果异时”。

法相宗通过“种子”与“现行”之间的互为因果以及交互相错的关系，便描绘出一幅恒转如流的图景，既有刹那的前后生灭，又有永无穷尽的连续，既有“种子”与“现行”的意识流转，又有二者各自相对的独立发展。

法相宗的因果学说，是这一宗的全部教义的核心。尽管它的因果论，把因果的环链放在普遍的依存与流转的关系中来理解，表面上看来好像有其合理的因素。但因果不是抽象存在着的，它体现了物质运动的规律性，事物间的一种本质联系。而法相宗的因果观指的不是物质性的事物，不是客观的实在，而指的只是他们头脑中前一观念与后一观念的刹那生灭的因果关系，抽掉了物质基础，来谈因果关系，尽管他们说得天花乱坠，除了体现了他们一套极端烦琐的经院哲学思辨学风以外，其实都是一些呓语罢了。而且通常所理解的因果性，只是宇宙间客观实在联系的一个极小部分，只是物质发展这一链条上的一环。而法相宗却正相反，他们把它看作是宇宙间的唯一联系了，他们认为整个宇宙就是这样一个刹那生灭无边无限的因果之网，因果决定着一切，人无法逃出这一因果之网去。这种因果观，就成为“宿命论”的代名词，除了为宗教神学服务以外，和科学的因果观点是毫无相似之处的。

法相宗既然认为客观世界都是人们的内识所变的，这里就发生了困难的问题：（一）如果说这个世界是各人之识所变现的，那末每一个人的识形成一个客观世界，事相各不相同，就无法把客观世界统一起来；（二）如果说

这个世界就是我一个人的识所变现的话，事实上也有说不通的地方；（三）如果说所有人的识都是同一个识，因此显现的客观世界也是一样的，那未显现出来的世界，应该都是绝对相同的，但是事实上每个人的客观世界，都不可能绝对相同的。而且，如果说：“若唯一识，宁有十方凡圣尊卑因果等别？”（《成唯识论》）一切的差别都没有了，这也无法说得通。

为了摆脱这种矛盾的境地，他们又创造出的一套荒谬的说法来，认为阿赖耶识里藏有两种“种子”，一种叫“识种”，一种叫“业种”。在识种中，又可以分裂为两种“种子”，一种是“共相种子”，它是显现相似外境的种子，一种是“不共相种子”，它是显现差别外境的种子。但这两类种子，力量微弱，没有单独变现为诸识的能力，须要借助于“业种”的“共业”和“不共业”作为推动力量（增上缘），才能够显现为“现行”诸识。

法相宗又把“共相”和“不共相”分为四类：第一是“共中之共”，即“共相种子”所变，如大地山河等，这些都是各人的识变为各人的境界，又各自受用，而且由于各人的“共相种子”基本相似，“业力”又相似，因此显现出来的客观世界也基本相似，所谓“虽诸有情所变各别，而相相似，处所无异，如众灯明，各遍似一”（《成唯识论》）。第二是“共中不共”，也是由“共相种子”所变，但各人受用各人的，如田宅、房屋、衣服等。第三是“不共中共”，即“不共种子”所变，如感觉器官等，有时又共同受用。第四是“不共中不共”，亦“不共种子”所变，而又不共同受用的，如视神经（眼根）等，自识所变，仅能自己受用。他们就是靠这样荒谬绝伦的烦琐的名相分析，叫人坠入五里雾中，达到他们蒙骗世人的目的。

法相宗在讲述主观意识认识客观世界时，又提出了“见分”和“相分”这一对范畴来。“见分”是指主观认识能力，“相分”是指被认识的客观对象。前者亦称之为“分别”，后者亦称之为“所分别”（被分别）。分别与所分别，见分和相分，也就是主观与客观间的关系。但是由于法相宗认为客观世界，也是由人的内识变现出来的，是一种虚幻的假象，所以他们说：“彼所分别（被认识的客观世界），实我法性决定皆无”（《成唯识论》），因此又称之为“似外境”。由此可见，他们所谓主观客观的分别，实际是并不存在的，只是在故弄玄虚地耍弄名词而已。

法相宗既然认为一切“似外境”都是内识所变，而客观世界，实际是不真实地存在的，这样一种极端荒谬的说法，矛盾百出，是不容易被人们常识所接受的。为了弥补这方面的破绽，于是对这客观世界，表面上也作了某种程度的分析。他把客观的世界，分别为三类境界：第一种是“性境”，即客观的实境，在这境界里，“色是真色，心是真心”（《成唯识论掌中枢要》卷上末），有质有影，影如其质。第二是“独影之境”，这种境界，有影（影象）无质（物质实体），纯出主观，象龟毛兔角，空花石女等，即人们所谓的幻境。第三是“带质之境”，这是介于以上两者之间的一种境界，看到它的影象，好像有实在本质一样——“谓此影象有实本质”（《成唯识论掌中枢要》卷上末），如杯弓蛇影，即人们所谓的错觉。法相宗通过种种烦琐的分析，好像也区别出真实和虚幻的标准来，可是这一标准仍旧在“实无外境，唯有内识，似外境生”（《成唯识论》）的前提之下，因此，即使是所谓真实的“性境”，实际还是一种假象，“随妄情而设施”的一种海市蜃楼而已。

法相宗染上了当时天竺佛教大乘瑜伽学派那一套极端烦琐的思辨学风，把世界上各种现象分为“五位”、“百法”（均见玄奘所译《百法明门论》），

此外又有“三自性”、“三无性”、“四缘”、“十因”、“五果”以及佛性等学说，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法相宗作了这些不惮烦的名相分析，目的是想说明这个客观世界是不实在的，于是它站在宗教神学的反动立场上，诱骗人们放弃面对现实的阶级斗争，投向“纯净佛土”的涅槃境界去。它对这一“纯净佛土”渲染得有声有色，好像他真的看见过一样。说什么：“此佛身、土，俱非色摄，虽不可说形量大小，然随事相，其量无边，譬如虚空，遍一切处。”又说这一“纯净佛土，圆周无际，众宝庄严，自受用身，常依而住。如净土量，身量亦尔，诸根相好，一无无边”（《成唯识论》卷十），描绘出一幅粗俗的宗教神话的画面来。而人们怎样进入这一“纯净佛土”中去呢？法相宗认为最根本就是要斩断这一条“漂溺有情”的识变瀑流。怎样来斩断这一条识变瀑流呢？法相宗认为其关键就在于转识成智，就在于断二障（烦恼障、所知障），证二空（我法俱空）。

怎样转识成智呢？法相宗又抬出它的“种子”学说来，说第八识中所含藏的“种子”，又有两种：一种是“有漏种子”，它是使人类沉溺苦海的根本原因，因此又称它为“染种”，染是染污的意思；一种是“无漏种子”，它是通向纯净佛土的必要依据，因此又称它为“净种”。这两种“种子”是对立的，转识成智，就是通过修证功夫，把“有漏种子”熏成为“无漏种子”，一切烦恼永断，阿赖耶识这一名称也不复存在，而改称为“无垢识”了，“有漏种子”转化为“无漏种子”了。这个修行的人，据法相宗的说法，起码已经到达阿罗汉的地位了。法相宗就是用这一套骗人的说法来说教的。

表面上看来，法相宗的一套宗教神学理论，好像很是精致，但由于它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和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决定，使它无法自圆其说，使它不得不在百孔千疮的神学体系上，东打一个补丁，西打一个补丁。因此，尽管在玄奘时代，统治政权还想利用玄奘在佛教上的声望地位，支持这一教派，到了几传之后，这一教派就因为它极其烦琐的经院哲学不易于传播，而很快地衰落下去了。

华严宗法藏的《法界缘起论》华严宗的主要依据经典是《大方广佛华严经》，这是天竺佛教大乘瑜伽宗这一派系的重要经典之一。《华严经》原本相传有十万偈，南朝刘宋永初二年（公元四二一年），中天竺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南境）僧人佛驮跋陀罗在建康译出《华严经》五十卷，后传至北方，又改编为六十卷，世称为《六十华严》。武则天圣历二年（公元六九九年），于阗沙门实叉难陀又在洛阳重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八十卷，世称为《八十华严》。

唐德宗贞元十四年（公元七七九年），罽宾（克什米尔）沙门般若在长安又译出《大方广佛华严经》四十卷，世称为《四十华严》。此外在《六十华严》未译出前，东来的译师也曾在《华严》大本中，“抄略本部，支品流行”（《大唐内典录》卷九）。其中尤以《十地品》，异译的本子最多，这是由于当时佛教界研究《十地论》的人很多的缘故。

《十地论》是瑜伽宗创建人世亲依《华严·十地品》而作的论著，在北魏永平元年（公元五八八年），由中天竺僧人勒那摩提和另一北天竺僧人菩提流支译出。后来勒那摩提以《十地经论》授弟子慧光，菩提流支以《十地经论》授弟子道宠；因为慧光、道宠皆居相州邺城，一居邺城大道之南，一居邺城大道之北，故地论师分相州南北两派。北道一支在北齐时极有势力，

慧光的弟子法上，任北齐昭玄大统（佛教的大教长），当时关东寺宇四万所，僧尼二百万人，都归他管辖。由于地论师必须研究《华严经》，因此南北朝后期，研究《华严经》的僧侣就愈来愈多了。

隋唐之际，有终南山僧法顺（公元五五七至六四一年），俗姓杜氏，著有《华严五教止观》一卷、《华严法界观门》一卷。法顺弟子智俨（公元六二二至六六八年），亦专研《华严》，著有《大方广佛华严经搜玄分齐通智方轨》十卷（简称《华严经搜玄记》）、《华严一乘十玄门》一卷、《华严五十要问答》二卷、《华严经内章门等杂孔目章》四卷，以及《金刚般若经疏》等多部。华严宗在智俨手里已经初具规模了。智俨弟子法藏（公元六四三至七一二二年），俗姓康，字贤首。武则天时，曾参加《八十华严》的译筵，新译的《华严经》八十卷译出后，武则天又叫法藏在内殿讲说，一时成为出入宫禁的名僧，当时号之为“康藏国师”。法藏著述繁富，有《华严经探玄记》二十卷、《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四卷（又名《华严五教章》）、《华严经旨归》一卷、《华严策林》一卷、《华严经问答》二卷、《华严经义海百门》一卷、《修华严奥旨妄尽还源观》一卷、《华严游心法界记》一卷、《华严经金狮子章》一卷，以及《般若心经略疏》一卷等多种。华严宗在法藏时代，正式成立了。因为华严宗是在法藏手里才正式形成的，法藏字贤首，所以华严宗又名贤首宗。

华严宗的教判，为五教十宗，因为它分析得非常琐碎，所以这里只介绍它五教的说法。法藏在《华严游心法界记》里，把佛所说的教理，分为五个方面：“第一，法是我非门（法顺《华严五教止观》中作“法有无我门”）者，即愚法小乘……如四《阿含》等经及《毗昙》、《成实》、《俱舍》、《婆沙》等论明也。第二，缘生无性门（《五教止观》作“生即无生门”）者，即大乘初教……如诸部《波若》（即般若）等经及《中》、《百》等论明也。第三，事理混融门（《五教止观》作“事理圆融门”）者，即大乘终教，空有双陈，无障碍也。如《胜鬘》、《诸法无行》、《涅槃》、《密严》等经及《起信》、《法界无差别》等论明也。第四，言尽理显门（《五教止观》作“语观双绝门”）者，即大乘顿教，离相离性也。如《楞伽》、《维摩》、《思益》等经明也。第五，法界无碍门（《五教止观》作“华严三昧门”）者，即别教一乘，……如《华严经》明也。”华严宗为了要抬高自己教派在佛教中的地位，因此不惜贬低其余教派的地位，不但把小乘教派斥为“愚法”，甚至连中土大乘三论、法相诸流派，也说成是大乘中的三乘教，其学说不可和华严宗的一乘圆教攀比。什么是三乘、一乘呢？法藏在《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卷一里说过，三乘好像三辆车子，一乘是用牛拖的，那二乘却是用羊、鹿拖的。一乘教是一辆车子又是用一条大白牛拖的，因此一乘教在教义方面来讲，要比三乘教高出一头地。他还说，《法华经》（这是天台宗所依据的经典）虽然也属于一乘教，但它还有同于三乘的地方，终不及《华严经》直显一乘，而别于三乘。总之，法藏的意思，唯有《华严经》，最符合佛所传的深奥教义，因此也只有华严宗才算是佛教中的真正王麻子、张小泉，别宗比起他来，就大大不如了。

华严宗宗教神学的基石，是它的“法界缘起论”。所谓法界，相近于现在唯心主义哲学中的“存在”一词。它可以理解为物质的存在，也可以理解为精神的存在。而华严宗的法界，则是偏重于精神的存在。因为华严宗也和其它大乘教派一样，否认物质世界的真实存在。

佛教教义认为一切事物（包括物质的或精神的）都无有自性，随因缘而生起，所以缘起就是指一切事物的发生。法藏在《金狮子章》中，开宗明义就说：“缘起者，谓以金无自性，随工巧匠缘，遂有师子相起，起但是缘，故名缘起。”这是缘起的最简明的解释。法藏还在《华严经义海百门》中，对缘起作了如下的说明：

缘起者，如见尘时，此尘是自心现。由自心现，即与自心为缘，由缘现前，心法方起，故名尘为缘起法也。经云：“诸法从缘起，无缘即不起。”沈沦因缘，皆非外有，终无心外法，能与心为缘，纵分别于尘，亦非攀缘。然此一尘圆小之相，依法上起，假立似有，竟无实体，取不可得，舍不可得，以不可取舍，则知尘体空无所有。今悟缘非缘，起无不妙。但缘起体寂，起恒不起；达体随缘，不起恒起，如是见者，名实知见也。大意是说，如果见到客观世界（尘），这客观世界实际只是主观认识之中的显现，并不是独立于人意识之外而存在的东西。这客观世界（尘）在人的主观认识之中显现出来后，就成为人的认识作用的必要条件（缘），如果没有这条件（缘），一切认识作用（心法），是不会产生的。但是要知道心外无法，这种由自心显现的客观世界（尘），也只是“假立似有，竟无实体”的幻相，本身就是“空无所有”的。因此“心”“尘”的分别，实际是多余的。“悟缘非缘”，“起恒不起”，认识客观世界的前提——客观世界，佛教徒认为是不存在的，因此，他们尽管在大讲缘起，实际上只是主观意识的自我认识而已。

法藏在缘起的基础上，梦中说梦，就《华严经》中提到的三对范畴，大讲其“六相圆融”之说。他从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出发，想通过世界各种事物之间的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等关系，来证明“尘无自性”，即客观世界一切事物由于没有自己精神实体或本质属性的缘故，一切都自己作不了主，进而否定客观世界的真实存在。

六相：总相、别相，同相、异相，成相、坏相。这三对范畴，是华严宗最喜欢提到的。法藏曾在宫中为武则天讲新译《华严经》，讲到六相圆融，武则天茫然未解，法藏乃指镇殿金狮作譬喻，号《金狮子章》。他说：“狮子是总相，五根差别是别相。共从一缘起是同相，眼耳等不相滥是异相。诸根合会有狮子是成相，诸根各住自位是坏相”（《金狮子章》）。法藏认为客观事物，尽管非常复杂，但都跳不出这六相三对范畴之外，而且每一事物，都必然包含以上六相，而六相又互相包摄，层层无穷。

现在我们再介绍这总、别二相。法藏在《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中，是借用舍（房屋）和椽来说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的。

问：“何者是总相？”

答：“舍是。”

问：“此但椽等诸缘，何者是舍耶？”

答：“椽即是舍，何以故？为椽全独能作舍故。若离于椽，舍即不成；若得椽时，即得舍矣。”

问：“无一椽时，岂非舍邪？”

答：“但是破舍，无好舍也。故知好舍全属一椽。既属一椽，故知椽即是舍也。”

问：“舍既即是椽者，余板瓦等应即是椽邪？”

答：“总并是椽。何以故？去却椽即无舍故。所以然者？若无椽即舍坏，舍坏，故不名板瓦等，是故板瓦等即是椽也。若不即椽者，舍即不成，椽瓦

等并皆不成，今既并成，故知相即耳。一椽既尔，余椽例然。是故一切缘起法，不成则已，成则相即，熔融无碍，自然圆极。”

依照法藏的看法，认为离开一椽，就不能成好舍，所以舍即是椽，椽即是舍。同时去却一椽，舍即不成，舍既不成为舍，椽亦不成其为椽，板瓦等也不成其为板瓦；因板瓦等之所以成板瓦，依于舍之为舍，而舍之为舍，又依于一椽，因此板瓦等“总并是椽”。结论就成为舍即是椽，即是板瓦。也就是说，别相就是总相。

以上是从总相方面来看与别相的关系；下面是从别相方面来看与总相的关系。他在同一书中说：

别相者，椽等诸缘别于总故，若不别者，总义不成。由无别时即无总故。此义云何？本以别成总，由无别，故总不成也。是故总者，即以总成别也。

问：“若总即别者，应不成总邪？”

答：“由总即别故，是故得成总。如椽即是舍，故名总相；即是椽，故名别相。若不即舍，不是椽；若不即椽，不是舍。总、别相即，此可思之。”

问：“若相即者，云何说别？”

答：“只由相即，是故成别，若不相即者，总在别外，故非总也；别在总外，故非别也。思之可解。”

大意是说，椽之所以成为椽，因为它是构成舍宇的一部分，若不和舍宇结合在一起，就不能称做椽。别相之所以被称为别相，因为它是构成总相的一部分，如果不和总相结合在一起，也不成其为别相。于是他又说，如果没有别相，就不可能形成总相，好象没有椽，就不能形成舍宇一样。所以不能抛开别相来讲总相，正像不能抛开一椽来讲舍宇一样。最后他得出的荒谬结论是，总相就是别相。

总相和别相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全体和部分的关系问题，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共性和个性的关系问题。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系而存在，华严宗在这方面是有些看到的；但它夸大了这种联系，把这种联系绝对化起来，甚至不惜抹煞个别存在，这样就把个别说成是一般，一般也说成了就是个别，形而上学地把两者之间的关系完全搞得稀糟一团了。

法藏在讲到每一个别事物和现象与一般事物和现象之间的关系时，特别强调它们间的互相联系。他把每一个别事物和现象，称之为“本一”，把一般事物和现象，称之为“多一”。他说：“亦无不摄一之多，亦无不入多之一”，“无不容多一之本一，亦无不入本一之多一”。并说：“一中容彼多一”，“多一入本一中”，“是即由本一望多一，……能容能入，无有障碍；多一望本一，……能入能容，亦无障碍”（《华严经明法品内三宝章》卷下）。大意是说，一般事物和现象，不会有不包括个别事物和现象进去的道理的；个别的事物和现象也不会有不被包括进一般事物和现象里面去的道理的。他认为在事物和现象中，既不会有不被包括进一般事物和现象中去的个别事物和现象，也不会有不包括个别事物和现象的一般事物和现象。他特别强调了这种互相间包摄的关系，认为彼此包摄，能容能入，无有障碍。在华严宗的术语中，比喻这种相互的包摄关系，称之为“因陀罗网境界”。法顺在《华严五教止观》中，已经谈到因陀罗网了。他说：

境界者，即法。明多法互入，犹如帝网天珠，重重无尽之境界也……帝释天珠网者，即号因陀罗网也。然此帝网，皆以宝成。以宝明彻，递相影现，涉入重重，于一珠中，同时顿现，随一即尔，竟无去来也。今且向西南边取

一颗珠验之，即此一珠，能顿现一切珠影，此珠既尔，余一一亦然。既一一珠一时顿现，一切珠既尔，余一一亦然。如是重重，无有边际。即此重重有边际珠影，皆在一珠中炳然显现……若于一珠中坐时，即坐著十方重重一切珠也。何以故？一珠中有一切珠故，一切珠中有一珠时，亦即坐著一切珠也。……既于一珠中入一切珠，而竟不出此一珠，于一切珠中入一切珠，而竟不起此一珠（法藏《华严游心法界记》此句改作“而竟不离此重重一切珠也”，文意较完整）。

法藏为了形象地说明因陀罗网，又在寺院中“取鉴十面八方安排，上下各一，相去一丈余，面面相对，中安一佛像，然一炬以照之，互影交光，学者因晓刹海涉入无尽之义”（《宋高僧传·义解篇·周洛京佛授记寺法藏传》）。

华严宗从法顺到法藏，他们看到了一切事物现象之间存着互相渗透、互相联系的这种关系，这有可取的地方；但由于华严宗和其它佛教教派一样，是把客观世界当作不真实的幻相、假象来看待的，这样，尽管他们大讲其互相联系、互相包摄，而抽掉了物质性来侈谈普遍联系、互相包摄，除了概念上的游戏以外，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可言呢？因为因陀罗网的珠影，终究是虚幻的影子，它当然可以重重融摄，层层无穷，互相容入，互相影现的。抽去了物质而侈谈联系，除了把世界说成是没有物质性的一个无边无际的因陀罗网以外，还能说明一些什么呢？由是可见，华严宗的因陀罗网境界，是迷宫、幻境，是不真实的境界。

法藏在阐述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时，还提出了“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华严经一乘教义分齐章》卷四）这一命题来。法藏在《华严经义海百门》中，叙述一多之间的关系时，写道：“又一、多相由成立，如一全是多，方名为一；又多全是一，方名为多。多外无别一（有共性即无个性），明知是多中一；一外无别多（有个性即无共性），明知是一中多。”这就是用上面讲到过的总相、别相，总即是别，别即是总，椽即是舍，舍即是椽这一例子，套在一多的关系，从而得出“一即是多，多即是一”的结论来。又从这种诡辩逻辑，引申出“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这样荒谬的结论来。

“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这句话，此后便成为华严宗宗教神学思想的纲领，他们喜欢用这一公式来套在各种问题上，这样不但一般和个别的差别不存在了，甚至一切事物的差别性也都不存在了。如法藏经常说：“经云：‘以一佛土满十方，十方入一亦无余。’今卷则一切事于一尘中现；若舒则一尘遍一切处。”（《华严经义海百门》）又说：“小时正大，芥子纳于须弥（大山）；大时正小，海水纳于毛空。”（《华严策林》）空间广狭的差别性，在这里完全被认为没有意义的了。法藏又说：“或一念则无量劫；无量劫即一念。”（《华严经旨归》）“此一念之心现时，全是百千大劫……以百千大劫，由本一念。”（《华严经义海百门》）时间方面长短久暂的差别性，在这里也完全被抹煞了。他又说：“一切法即一法；一法即一切法。”（《华严经问答》）事物和现象的差别性，在这里也完全认为可以不存在了的。

法藏在他大量的著作中，大讲事相（即事物和现象）的差别性和依存性，他称之为“诸缘互异”或“诸缘各异”。但由于在华严宗看来，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虚假的幻相、假象，是不真实的东西，非物质性的东西；在否定物质存在这一前提之下，时间、空间（这是物质的存在形式）也自然地变成空洞的一个框子，毫无内容可言。这样，尽管华严宗大谈时间的长短、久暂，空间的广狭、大小，事物的差别、变化，实际都已丧失客观标准，只是

人们头脑中的一种概念游戏而已。把物质性从时间、空间中抽掉，那末华严宗要想衡量客观的一切标准，除了思维以外，还有什么是最可靠的工具呢？毋怪他们要说：“一切事法，皆由心现”（《华严经义海百门》）了。由于他们已经丧失客观标准，那末自然可以随心所欲地来胡诌了。所以他们说：“明一切法，皆唯心现，无别自体。是故大小随心回转，即入无碍。”（《华严经旨归》）又说：“通大小者，如尘圆相是小，须弥（大山）高广为大。然此尘与彼山，大小相容，随心回转，而不生灭。且如见高广之时，是自心现作大，非别有大；今尘圆小之时，亦是自心现小，非别有小……”（《十住品》）云：“金刚铁围（皆山名）数无量，悉能安置一毛端。”（《华严经义海百门》）又说：“摄九世以入刹那，舒一念而该（包括）永劫。”（《华严经探玄记》）所谓时间、空间以及事物现象的差别性，只是人们头脑中的变化而已。法藏用数十万言来说明事相的差别性，而实际却正是想运用佛教的一套诡辩逻辑，泯灭这种差别性，把这世界说做成混沌一团，最后达到他“缘起万差，说空一味”的目的。他说：“会万有以为一空，差即无差；观一空而成万有，无差即差。”（《华严经义海百门》）他实际是想抹煞世界上的一切差别，引导人们离开当前现实的斗争，投向天国。

在陈、隋之际的一些僧侣著作中，已经有谈到“理”、“性”这些词汇了。到了法藏的著作中，“理”这一名词，出现的次数更多。“理”是“事”相对立的一对范畴，理是事的根源，如果用华严宗“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这一公式套到“理”“事”这对范畴上的话，在华严宗看来，理只是“真理湛然”的一理，而事却是“万象纷然”（《华严经明法品内立三宝章》卷下）的万事。一般讲来，“事不异理”，“事随理而融通”的，但人们往往只看到“事”，而看不到“理”，因此很多情况是“事显而理隐”（《华严经义海百门》），所以对理的探讨，要使“理逐事彰”（《华严策林》），是比较复杂的一桩事情。

华严宗就理、事的关系，还提出一个命题来，即如果理是整体的、绝对的，而事是杂多的、差别的，那末理显现事时，是整体的显现呢，还是部分的显现呢？也就是说，理是可以分割的呢，还是不可以分割的呢？法藏的答案是认为在某种意义上，理是不可以分割的，因为理是普遍的存在；而在另一种意义上，理是不能分割的，因为每一事物都存在着完整的理。又认为在某种意义上，理可以说既可分割又不可分割的，因为理既是普遍的存在，同时又存在于各个事物中；而在另一种意义上，理也可以说既非可分割，亦非不可分割，因为理是“无在不在，而在此在彼无障碍”（《华严经明法品内立三宝章》），理是绝对的存在。这也就是说，理是一个整体，不同的各个事物所显现的理，其实就是这一个“理”。后来宋儒说“万理归于一理”（《二程语录》卷十一），“物物各有理，总而只是一理”（《朱子语类》卷十四），当然宋儒“理”的涵义，并不就是华严宗“理”这一涵义，但思维途径上，可以看出是受到华严宗的影响的。

华严宗的四祖澄观（公元七六 至八二 年）把华严宗的法界归结为四种法界：“一，事法界；二，理法界；三，理事无碍法界；四，事事无碍法界”（《华严法界玄镜》卷上）。华严宗的五祖宗密（公元七八 至八一四年）在《注华严法界观门》时，又把这四种法界统一在“一真法界”之下，但这个“一真法界”，虽然是“总该万有”，而实际只是一心所作，因此，华严宗的绝对本体，仍然是“即是一心”。

华严宗的正式形成时代比较三论、天台、法相三宗都要迟一些，因此它有条件可以吸取各家的长处，来充实自己这一教派的神学理论。它不仅吸取了大乘有宗系统如法相宗的许多论点；同时它在方法论上还吸取了大乘空宗系统如三论宗的诡辩手法；还有天台宗的许多理论，它在加以改造之后，用来充实自己的理论，因此华严宗是中土大乘教中的一个综合教派。

**密宗的传入及其教义** 密宗亦称真言宗，因为它专以修持秘密真言为主，故以名宗。真言，梵语为曼荼罗。这一宗以《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简称《大日经》）和《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大教王经》（简称《金刚顶经》）为重要依据的经典。这一教派的特色，是除了崇拜大日如来以外，还崇奉许多婆罗门教的神，尤其崇奉神的各种仪式。大概这一宗在天竺的兴起，是在佛教快要式微衰落的时候，佛教的一套唯心主义宗教哲学已经濒于破产了，不得不把许多神（包括婆罗门教所崇奉的神）抬出来为佛教撑腰，挽救它垂亡的命运。密宗的经典，在西晋时，已经有《大灌顶经》、《孔雀王经》译来中土，但大规模地传译这一宗经典，还是唐代开始的。

唐玄宗开元四年（公元七一六年），有中天竺僧人善无畏从陆道来到唐首都长安，他和一行合作译出《大日经》，可以说是中土正式传播真言宗的开始。到了开元七年（公元七一九年），又有南天竺僧人金刚智，由海道来到中国，在长安译出《金刚顶经》和《瑜只经》、《略出念诵经》，中土密宗经典稍称完备。金刚智的弟子不空，幼随金刚智来到中国，开元二十九年（公元七四一年）又从海道去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取经五百余部，天宝五载（公元七四六年），复从海道返归中国，他先后译出密宗经典一百多部。中土密宗到了不空时代，正式建立起来。后来密宗称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为“开元三大士”。善无畏的弟子一行，“博瞻天文，学通内外，唐、梵经史，无不洞明”（《两部大法相承师资付法记》卷下）。他除了帮助善无畏笔受《大日经》译成汉文以外，还撰著《大日经疏》二十卷、《大日经义释》十四卷，是密宗的重要著作。不空的弟子慧果，专弘密宗，其著名弟子，有义操及日本僧人空海等人。空海回国后，大弘此宗，世称“东密”。又此宗亦从天竺传入中国西部的西藏，世称“藏密”。

密宗的教判，很是简单，把法土法身佛的如来，称为“大日如来”，应土应身佛的如来称为“释迦如来”。释迦如来所说的大小乘教义，被称为“显教”。大日如来所讲的真言秘密教义，被称为“密教”。密宗并认为三论、法相、天台、华严诸宗的教法，都不及密宗那末神秘。

婆罗门教认为声音是一种神灵，极其重视。因此声音就和宗教发生密切的关系，如“阿母”表示湿婆神之音，“乌”表示毗修奴神之音等。密宗继承了婆罗门教这一传统，也认为声音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尤其崇拜“阿”字这一母音，认为它是众声之母，是一切字的种子，一切教法都从这“阿”字产生。由于对声音的崇拜，必然重视祈祷时的赞诵和咒语。又从诵咒中，认为其文句有不可思议的神秘力量，便称这种真言密咒为“陀罗尼”。

密宗重视祈祷时所作之种种手势——印契，称之为“身密”；重视咒语，称之为“语密”；强调一心观想如来的功力，称之为“意密”。他们强调身口意的一致，依靠这种帮助作用，就可以肉身成佛，称之为“三密瑜伽”。

由于密宗这一教派，完全依靠密咒真言来欺骗人民群众，哲理气息不浓厚，因此不为中土人士所乐意接受，故传播不广。又由于它不能起麻醉人民的广泛作用，因此统治阶级就也不积极扶植这一教派，所以这一教派在会昌

灭佛以后，就完全衰歇了。

净土学说的流行 净土教派的主要依据经典为《佛说无量寿经》、《佛说观无量寿经》、《佛说阿弥陀经》和《无量寿修多罗优婆提舍愿生偈》（略称《往生论》，世亲造），所谓三经一论。净土之说，本来在东晋南朝已很盛行；口宣佛号，中土各教派也本来就是成为一种仪式了。北魏末，有北天竺僧人菩提流支译出《往生论》，到了东魏时，其弟子昙鸾（公元四七六至五四二年）又著有《略论安众净土义》一卷、《往生论注》二卷，并撰《礼净土十二偈》，净土的学说，到此已有了发展。到了隋唐之际，有释道绰，著《净土论》二卷，专弘净土之说。他专劝人念阿弥陀佛，“用麻、豆等物而为数量，每一称（阿弥陀佛）名，便度一粒，如是率之”（《续高僧传·习禅篇·并州玄中寺释道绰传》）。“上精进者，用小豆为数，念弥陀佛，得八十石，或九十石；中精进者，念五十石；下精进者，念二十石”（迦才《净土论》）。道绰自己“声声相注”，“口诵佛号，日以七万（声）为限”（《续高僧传·习禅篇·并州玄中寺释道绰传》）。在他的倡导之下，念佛的风气，在道、俗间更是发展起来。贞观时，释善导受到道绰的影响，更把念佛的风习推广到首都长安来，他“每入佛室，胡跪念佛，非力竭不休，虽寒冰亦须流汗”（《乐邦文类》卷三）。当时受他影响而念佛的人，有“日课万声至十万声者”（《佛祖统纪》卷二十六）。由于这一教派的说法，极为平易，修行的对象，也无问道俗男女，因此人民群众很容易受它欺骗，而崇奉这种念佛的教法。当禅宗南宗思想在佛教界风靡一世的时候，只有净土学说，在社会上还保持它一定的潜势力，还能和禅宗相颉颃。

净土师的教判，也不是以三时、五时判教，而是以修行的难易来判教的。他们认为其它的教派，修证都须要经过一个艰巨的阶段，只有净土师认识到“一切万法，皆有自力、他力”。如果利用“他力”，即外部的力量，就容易达到成佛的目的。他们还举了一些例子来作比喻，如说：“譬如陆路步行则苦，故曰难行道；言易行道者，谓以信佛因缘愿生净土……佛愿力故，即便往生（净土）；……譬如水路乘船则乐，故名易行道也。”又举了一个例子说：“譬如瞿者，寄载他船，因风帆势，一日至于千里，岂可云瞿者云何一日至千里也？”（道绰《安乐集》卷上）可见这一部分僧侣是想走捷径取巧来成佛的。

道绰还说，修行只有“二种胜法”。“一谓圣道，二谓往生净土。其圣道一种，今时难证，一由去大圣（佛）遥远，二由理深辞微：……当今末法……唯有净土一门，可通入路”。接着他就廉价地兜售通向天国的门票说：“是故大经云：若有众生，纵令一生造恶，临命终时，十念相续，称我名字，若不生[净土]者，不取正觉。”又说：“纵使一形造恶，但能系念专精，常能念佛，一切诸障，自然消除，定得往生[净土]。”（道绰《安乐集》卷上）

佛教各教派把佛土分成三种等级：一曰法土，二曰报土，三曰应土或化土。其它教派认为净土往生的净土，是指化土而言的，而净土教派为了提高自己，说“极乐庄严国是报土”，并说“净土中成佛者，悉是报身；秽土中成佛者，悉是化身”（道绰《安乐集》）。这种无稽的论争，目的无非是想贬低别的教派并抬高净土教派的地位而已。

净土教派主张“念佛三昧”。所谓念佛者，不是简单的念阿弥陀佛（即无量寿佛）的名号，它亦包括“或念佛法身，或念佛神力，或念佛智慧，或念佛毫相，或念佛相好，或念佛本愿”，“念念相次，无余心相闻杂”。他

们有一专门术语，称之为“十念相续”。“十念相续”，意思就是“无他念相间杂”，从一念无间杂，到十念无间杂，千念、万念无间杂，都是形容其专一和持续不间断。当然他们更强调念佛名号，他们说：“诸佛如来有无量名号，若总若别，其有众生系心称念，莫不除障获益，皆生佛前，即是名号度众生。”他们认为人们“心如野马，识剧猿猴”，因此强调一心念佛，来减少杂念。并说：“若能常修念佛三昧，无问现在、过去、未来，一切诸障悉皆除也。”念佛久了，并能“延年益寿”。并说：“若一念阿弥陀佛，即能除却八十亿劫生死之罪。”（《安乐集》）十念相续的人死后并能往生安乐国——净土。净土宗成佛的方式比起通过定慧修行来要简便得多，受其欺骗的对象也自然更广泛得多了。

**禅宗的神学思想** 禅宗创始于北朝，正式形成于唐高宗、武则天之际，到了唐肃宗、唐代宗时，便成为中土佛教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教派了。“禅是天竺之语，具云禅那（Dhyana），中华谓之思维修，亦名静虑，皆定慧之通称也”（宗密《禅源诸诠集都序》）。因为这一宗的开山祖达磨重视禅法，曾面壁九年，故而称这一宗为禅宗。由于这一宗强调即心即佛，因此亦称“心宗”。又此宗初以《楞伽经》为传法的标记，所以又曾称之为“楞伽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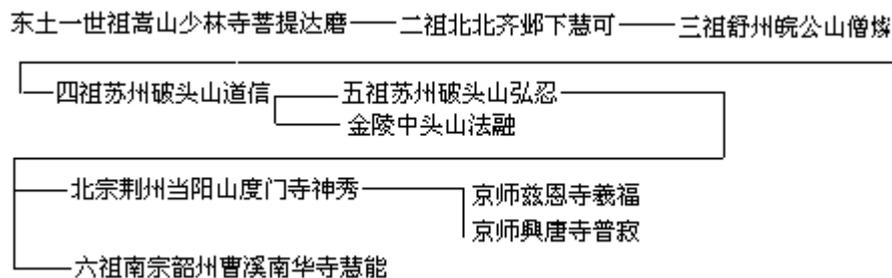
天竺的大小乘佛教，都重视禅定的宗教修养工夫，但在五天竺，并没有形成像禅宗那样的教派。中土的禅宗僧侣，为了说他们这一教派是佛教的最上乘，于是伪造出这样一个故事来：说佛快死去前，在涅槃会上，拈花示众，众皆默然，只有佛的大弟子摩诃迦叶破颜微笑，佛对摩诃迦叶说：“吾以清净法眼，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正法，传授于汝，汝当护持！……无令断绝。”（《景德传灯录》卷一）这就是契机，这就是禅宗以心传心的起源传说[二]。后来禅宗僧侣又伪造出在天竺从佛到菩提达磨的二十八祖的世系来。

菩提达磨，南天竺人，南天竺是大乘龙树中观宗的发祥地，因此达磨的教理，可能偏近于空宗。他从海道由南天竺来到中土，在南朝的首都建康见过梁武帝，梁武帝对他夸耀自己如何崇佛，并问他：“朕造寺度人，写经铸像，有何功德？”达磨答：“并无功德”，“此乃有为之善，非真功德。”（《历代法宝记》）梁武帝听了大不高与，达磨也认为机缘不契，就渡江去北魏了。关于达磨见梁武帝的事情，有人怀疑是禅宗伪造的，但在敦煌发现的古写本《六祖坛经》中，已经谈到，可见就是捏造也捏造得很早，不过后来如《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等书中，把这一事加以夸大渲染罢了。达磨到了北魏，住嵩山少林寺，终日面壁而坐，人谓之壁观婆罗门。所谓“壁观”，主要是“安心”。《续高僧传·习禅篇·齐邺下南天竺僧菩提达磨传》称：“如是安心，谓壁观也。”当时一般僧侣认为达磨的禅定，是旧禅法的异端，因此“多生讥谤”。时有僧人慧可，曾从达磨“从学六载”（《续高僧传·习禅篇·齐邺中释僧可传》）。《景德传灯录》曾记载他向达磨求法，他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磨说：“将心来，与汝安。”慧可说：“觅心了不可得。”达磨说：“我与汝安心竟。”这些话都是契机。达磨临死前，把他从天竺带来的金缕僧伽梨衣（袈裟）一领，交付给慧可，所谓“内传心印，以契证心；外付袈裟”（《景德传灯录》卷三），“以为法信”（《历代法宝记》）。另外，达磨还把从建康带来的《楞伽经》四卷（求那跋陀罗译本）授予慧可。后来禅宗尊奉达磨为中土禅宗的第一世祖。据传说，达磨也是被另一教派僧徒下毒毒死的。唐释道宣著《续高僧传》，有《齐邺下南

天竺僧菩提达磨传》，好像达磨是死在邺城的，但嵩山少林寺后来有达磨塔，那麽达磨是死在少林寺、葬在嵩山少室，并没有随东魏迁都去邺城。早期的禅宗，不是一个大教派，有些资料缺乏就无法考定了。

达磨的弟子慧可（二祖），在东魏北齐之际，居于北齐的首都邺城，唐释道宣《续高僧传》称之为《齐邺中释僧可》。他也被其它教派所排挤，称之为“魔语”。《景德传灯录》称他是在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公元五九三年），为管城县（今河南郑州市）县令翟仲侃所杀，时年一百零七岁。我认为慧可的年寿和死于开皇中，疑问也很多，像隋文帝统治年代，一个一百零七岁的禅僧，被县令处死，这是不可思议的事件。释道宣在《续高僧传》里不记载这件事，大概也认为这传说需要进一步证实。慧可传僧璨（三祖，死于隋大业二年，即公元六〇六年），僧璨住舒州（治怀宁，今安徽潜山县）皖公山（今潜山县西）。僧璨传道信（四祖，公元五八〇至六五一年），住蕲州黄梅县之破头山（亦称双峰）。道信传法融及弘忍。法融（公元五九四至六五七年）住建业牛头山（今江苏南京市南），称“牛头禅”。弘忍（五祖，公元六一一至六七四年）仍居蕲州破头山之东山寺，称“东山法门”。禅宗在法融、弘忍时期，广收门徒，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但真正发扬光大这一教派的，还是弘忍的弟子慧能（六祖）。

#### 慧能、神秀以前的禅宗统系



慧能（公元六三八——七一三年），俗姓卢，本籍范阳。父行瑫，《六祖大师法宝坛经》附录法海（慧能弟子）所著《六祖大师缘记外纪》中，称“行瑫唐武德三年九月，左官新州（治新兴，今广东新兴县）”。《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中称：“惠能严父，本贯范阳，左降流于岭南，作新州百姓。”按武德三年，唐的势力还没有到达岭南，这时岭南还是萧铣控制的地区，到唐武德四年，唐击败萧铣，才在岭南确立统治权。很可能慧能的父亲卢行瑫曾参加了萧铣的反隋活动，萧铣失败，所以卢行瑫也就被降为新州百姓了。慧能三岁丧父，随母由新州移居南海（今广东广州市），生活“艰辛贫乏”，既长，不识书字，“于市卖柴”。二十四岁那一年，到蕲州黄梅东山寺去见弘忍。弘忍问他：“汝何方人？欲求何物？”慧能答：“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远来礼师，惟求作佛，不求余物。”弘忍说：“汝是岭南人，又是猎奈，若为（如何的意思）堪作佛！”慧能答：“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猎奈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弘忍就叫慧能到槽厂去“破柴、踏碓”，人称为“卢行者”（带发修行而不是正式的和尚称行者）。

八个多月以后，有一天，弘忍的大弟子神秀，在走廊墙壁上写了一首偈，偈云：“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弘忍看了，认为唯心主义还不够彻底，说神秀“只到门外，未入门内”（《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过了两天，慧能也听到了神秀的偈语，说：“美则美矣！了则未了！”（《景德传灯录》卷三）这天晚上，慧能就请人替他在神秀偈旁，

也写了一偈，偈云：“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第二天弘忍看到了，大为欣赏。当时也不作声，用鞋把慧能的偈擦了，晚上叫慧能来到僧房，密授衣法，并恐怕其他门徒因妒嫉而杀害他，所以叫他即时回返岭南。弘忍自己把橹送他到九江驿，慧能请弘忍坐了，他来摇橹，弘忍说：“合是吾渡汝！”慧能答：“迷时师度，悟了自度，度名虽一，用处不同。慧能……今已得悟，只合自性自度。”（均见《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这些都是带有机锋性的语言。

慧能去岭南后，后称南宗。弘忍的大弟子神秀，在弘忍死后，居荆州江陵当阳山度门寺，称为北宗。在开始，禅宗仍以北宗为正统，这一宗在神秀时期，势力正是全盛。神秀，《宋高僧传·习禅篇·唐荆州当阳山度门寺神秀传》称他“少览经史，博综多闻”，是一个以“义学沙门”姿态出现的僧侣。又称“四海缁徒（指僧侣），向风而靡”，可见他声誉很高。武则天还召他到东都内道场讲经。当时“王公已下，京邑士庶，竞至礼谒，望尘拜伏，日有万计”。他死后，张说为他作《大通禅师碑》在碑文中，称他为“两京法主，三帝（则天、中宗、睿宗）国师”，所以当时他的门徒们尊他为禅宗的六祖。神秀的门徒普寂，以少林寺为北宗的根据地，也显赫一时。普寂在开元二十七年死后谥为大慧禅师，门徒尊之为七祖。神秀另一门徒义福，居长安慈恩寺，开元二十年死后，谥为大智禅师。一门三国师，禅宗北统在神秀、普寂时代，可以说已经非常兴盛了。但后来，南宗慧能系的势力，向北发展，取代了禅宗的正统地位，北宗就逐渐衰落下来了。

慧能回到岭南之后，有时住在渔村里，有时又参加猎人的队伍，这样过了十五六年之久。有一天，到广州法性寺听印宗法师讲《涅槃经》“寓止廓庑间，暮夜，风飏刹幡，闻二僧对论”（《景德传灯录》卷五），“一僧曰风动，一僧曰幡动，议论不已。慧能进曰：‘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寺主印宗听了他的一套主观唯心主义论点，大为心折，并知悉慧能是传授弘忍衣法的人，于是为慧能落发剃度。慧能后来居曹溪（今广东韶关市东南）之宝林寺，传布禅宗的顿悟学说，历三四十年之久。禅宗教派在他传布之下，发展得非常迅速。他有许多门徒，其中著名者有洛阳荷泽寺僧神会、衡岳般若寺僧怀让、吉州青原山静居寺僧行思等。其中神会对禅宗南统的发展，影响较大。

在神秀、慧能时期，禅门还以北宗为禅宗正统，到了神会居洛阳，南北二宗开始争夺禅宗的正统地位。开元二十二年（公元七三四年），神会在滑台大云寺开无遮大会时，正式宣称北宗“师承是傍，法门是渐”（宗密《禅门师资承袭图》），慧能亲受弘忍衣法，因此禅宗的正统应该是南宗。开始北宗的势力还强大，因此遭到他们的反击。到了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经济困难，出卖“度牒”，以供军用，这时神会年龄已经很高，就在洛阳帮政府推销度牒。《宋高僧传·习禅篇·唐洛京荷泽寺神会传》称：“所获财帛，顿支军费，代宗、郭子仪收复两京，会之济用，颇有力焉。”这样，唐政府就转而扶植南宗，此后南宗便成为禅宗的正统，慧能也就成为禅宗的“六祖”了。

禅宗从达磨以来，内传心印，外付法衣（金缕袈裟），祖师爷的心法是由一个僧侣指定另一个僧侣来继承的，这对教派的大发展是不利的。到了慧能时期，南宗在曹溪讲禅学，一时高材生辈出，其门徒著名者有四十三人之多。为了符合当时禅宗南宗的发展形势，就废止了传袈裟这个制度，因此南

宗就没有七祖，所谓“先祖人传一人，后代放任千灯千照”（宗密《禅源诸诠集都序》），确实也只有这样做，南宗发展的速度才更快。这件金缕袈裟的下落呢？唐肃宗在上元元年（公元七六一年）曾宣旨取进宫内道场去供养，后来又退还给曹溪寺，但它除了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以外，已经没有实际的以传法信内容了。

禅宗顿悟学说，当时风靡一时，这不能当作偶然的现象，是有其必然原因的。唐代武则天以后至唐玄宗以迄唐德宗时代，中国封建社会内部，有很大变化，即世族地主经济逐渐在衰落下来了，均田制已日趋崩溃了，庶族地主经济开始占统治地位，土地的买卖进一步合法化了，阶级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阶级矛盾更日益尖锐起来。在这样情况下，过去为世族地主服务的一套佛教神学，也必须相应地要有所改变，以适应庶族地主阶级统治的需要，禅宗正是这种应运而生的教派。在世族地主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在均田制度尚未崩溃的时候，中土的佛教，一方面有它的寺院的雄厚经济基础，一方面它又受着当时天竺佛教界那种极端烦琐的经院哲学的影响，无论那一种教派，都形成极端烦琐的学风。如天台宗的智顓，一解释“止观”两字，摇笔便是几十万言；三论宗的吉藏，也不甘落后，解释他的四重两谛，又是洋洋洒洒数十万言；法相宗的玄奘，去五天竺取经的时候，正是五天竺大乘瑜伽宗唯识哲学很抬头的时候，所以玄奘在翻译《瑜伽师地论》的时候，仅分析心法就分到六百六十法，玄奘自己在《成唯识论》中，还根据《百法明门论》，把宇宙万有，分之百法，约之为五位，这种烦琐的分析，分析得愈细腻，也就愈益支离破碎；后来华严宗出来，它综合中土大乘空、有二宗的说法，形成了自己的教派，在它的教义里，固然出现了一些新的东西，但由于它不能完全摆脱当时经院哲学那种烦琐学风的深刻影响，所以这一派的论师法藏，也是著作等身，并不输於上述几个教派的大师。宗教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器之一，如果要别人读了几十万言、几百万言，才明了他所要介绍的佛教教义，那末这一思想武器，就很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了。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庶族地主阶级本身利益来讲，就必须另扶植一种麻醉药性比较猛烈的佛教教派，来帮助他们巩固统治。禅宗的出现，正适应了封建社会内部新的统治阶级的需要。从禅宗的本身发展来讲，这一教派，虽然创始于北朝，它一开始，强调简单的禅法——壁观，看轻一切文字魔障，强调直指本心，使人们已经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但是在当时弥漫的烦琐学风侵袭之下，禅宗的内部也无例外，不能不受当时烦琐学风的影响，因此如北宗神秀，著《五方便论》，就反映了烦琐学风在禅宗内也在滋长起来这一倾向。南宗慧能师徒一出来，不但扫除了一切文字障和仪式障，甚至把禅定也一扫而空了，它用最简明的语言，教人顿悟，直指本心，见性成佛，这对当时佛教流于烦琐的学风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改革。这样富有猛烈麻醉性的一帖药剂，新的庶族地主阶级自然要当作宝贝来利用了。从此，禅宗的南宗奠定了在佛教界的有利地位，会昌灭佛之后，中土佛教的各种教派都衰微不振了，只有禅宗的势力席卷全国，成为五代宋元明时代中土佛教中最有势力的一个教派。

禅宗以南宗的思想最具有代表性，而南宗早期思想又以慧能和神会最具有代表性，所以下面介绍他们两人的思想。

南宗没有采用烦琐的教判形式，把佛的说教分为三时或五时，以分辨大小乘各派的教义深浅；但他们既然是一个宗教的教派，也必然要标榜自己这一教派，压抑别个教派。禅宗自己标榜是“南天竺一乘宗”又认为自己这一

教派，比其它任何大乘教派，都要高出一头，所以自己又称为“最上乘”。有一天，慧能的弟子智常问慧能，什么叫三乘？什么叫最上乘？慧能说：“法无四乘，人心自有等差，见闻转诵是小乘，悟法解义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万法尽通，万法俱备，一切不染，离诸法相，一无所得，名最上乘。”（《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神会也称“大乘”是“菩萨乘”，“最上乘”是“佛乘”，来标榜禅宗的教义是最深奥的佛教教理。

在禅宗内部，南北宗的判分，主要以顿、渐为区别。他们的论点是：“何以顿、渐，法即一种，见有迟、疾，见迟即渐，见疾即顿。法无渐、顿，人有利、钝，故名渐、顿。”“明即渐修，悟人顿修。”（敦煌写本《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神会也说：“发心有顿渐，迷悟有迟疾，迷即累劫，悟即须臾。……譬如一线之丝，其数无量，若合为绳，置于木上，利剑一斩，一时俱断，丝数虽多，不胜一剑。发菩提心人，亦复如是，若遇真正善知识以方便直示真如，用金刚慧断诸位地烦恼，豁然晓悟，自见法心本来空寂，惠利明了，通达无碍。证此之时，万缘俱绝，恒沙妄念，一时顿尽，无边功德，应时等备。”神会强调顿悟，不从渐修，他解释“渐”是由一阶梯一阶梯的升登九重之台；而“顿”却不必通过这样一些步骤。又说：“理发者向道疾；外修者向道迟。”并举世间的不可思议事和出世间的不可思议事来做比例，他说：“世间有不可思议，出世间亦有不可思议。世间不可思议者，若有布衣顿登九五，即是世间不可思议；出世间不可思议者，十信初发心，一念相应，便成正觉。于理相应，有何可怪？此明顿悟不可思议。”（《神会语录》）以前竺道生提倡顿悟之说，但还不排斥渐阶；到了禅宗慧能和神会，则已强调顿悟，有排斥渐阶的倾向了。本来顿悟也好，渐阶也好，其前提是成佛，而这一前提在现实世界中是绝不存在的。禅宗所以要提倡顿悟，这正符合地主阶级不劳而获的性格，因为在地主阶级看来，渐阶成佛，还要花费许多修证工夫，现在讲顿悟，不管自己生平做了多少剥削人民压榨人民的罪恶事，只要一旦觉悟，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这方法既简单、又方便，又何乐而不欢迎呢？同时对于麻醉人民来说，这种方便简单的成佛途径，也更具有欺骗性。所以顿悟学说一时风靡，是有它社会基础的。

禅宗本来是以禅定名宗的，这一教派的创始人达磨便以禅法名世，面壁九年，而此宗的四祖道信，《景德传灯录》称其“既嗣祖风，摄心无寐，胁不至席者，仅六十年。”他们的禅法固然和旧禅法有所不同，但重视坐禅这种修证功夫，却基本上态度是一致的。到了慧能和神会，索性反对这种坐禅了。他们“唯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有人问慧能：“京城禅德（禅僧）皆云：欲得会道，必须坐禅习定，若不因禅定而得解脱者，未之有也。未审师所说如何？”慧能回答他说：“道由心悟，岂在坐也。经云：若言如来若坐若卧，是行邪道，何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无生无灭，是如来清净禅。诸法空寂，是如来清净坐。”慧能还批评神秀这一系派所主张的“住心观静，长卧不动”的禅法，说这种禅法，“是病非禅”，“长坐拘身，于理何益！”（《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慧能的弟子神会也批判神秀的弟子普寂等所主张的“凝心入定，住心看净，起心外照，摄心内证”这一类禅法，说他们“鄞菩萨，未与菩提相应，何由可得解脱！”（《神会语录》）后来宗密曾批判有些禅僧，“远离喧闹，住闲静处，调身调息，跏趺宴默，舌拄上腭，心注一境”，认为这类禅法，并不是修佛的通路，而过去“净名已呵宴坐，荷泽

（神会）每斥凝心，曹溪（慧能）见人结跏，曾自将杖打起”（《禅法诸论集都序》），都是对的。唐玄宗开元（公元七一三至七四一年）中，南岳怀让禅师（慧能弟子）见马祖道一在禅坐，他问道一：“大德坐禅图什麼？”道一说：“图作佛。”怀让“乃取一砖在彼庵前石上磨，[道]一曰：‘师作什麼？’师曰：‘磨作镜。’[道]一曰：‘磨砖岂得成镜邪？’师曰：‘坐禅岂得作佛耶！’”（《景德传灯录》）。道一经这点悟，就被怀让收为门徒，禅法到了南宗的手里，确实已经赋予不同的内容了。

慧能在《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中解释坐禅时，说：“此门坐禅，元不著心，亦不著净，亦不是不动。若言著心，心元是妄，知心如幻，故无所著也。若言著净，人性本净，由妄念故，盖覆真如。但无妄想，性自清静。起心著净，却生净妄，妄无处所（妄本来不存在），著者是妄……若修不动者，但见一切人时，不见人之是非善恶过患，即是自性不动。”又说：“何名坐禅？”“外于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名为坐；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他又解释禅定的涵义：“何名禅定？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外若著相，内心即乱；外若离相，心即不乱。本性自净自定，只为见境思境即乱，若见诸境心不乱者，是真定也……外离相即禅，内不乱即定，外禅内定，是为禅定。”神会在他的《语录》里，也说：“但一切时中见无[念]者，不见身相，名为正定，不见心相，名为正慧。”又说：“念不起，空无所有，名正定。能见念不起，空无所有，名为正慧。”他批判有些教派的禅法，说“若有出定入定及一切境界者，非论善恶，皆不离妄心。”并说：“元是妄心修定，如何得定。”他并用煽动性的语言说，真正禅定的人，“决心证者，临三军际，白刃相向下，风刀解身，日（目）见无念，坚如金刚，毫微不动。纵见恒沙佛来，亦无一念喜心；纵见恒沙众生一时俱灭，亦不起一念悲心。此是大丈夫，得空平等心。”禅宗到了南宗，表面上好像抛弃了佛教修证方法的禅法，而实际他们这样做，正是把修证方法、认识论和宗教唯心主义的世界观进一步地统一起来，好为反动统治服务。

慧能、神会表面上好像是强调定、慧双修的，如慧能说：“我此法门，以定慧为本。大众！勿迷言定、慧别。定、慧一体不是二，定是慧体，慧是定用。即慧之时定在慧，即定之时慧在定。若识此义，即是定、慧等学。”（《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他并以灯和灯光来作比喻，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有灯则明，无灯则暗，灯和灯光两者都应重视，不宜有所轩轻。神会也批判了他同时的僧侣慧澄的“先修定，得定以后发慧”的主张，进一步强调了“定、慧等学。”并说：“即定之时即是慧，即慧之时即是定。”（《神会语录》）但他们实际上比较强调了慧，主张以慧识定，所谓：“今言定者，体不可得；今言慧者，能见不可得体，湛然常寂，有恒沙之用。”可见他们的修证方法和“因定发慧”的修证方法，区别确是很大的。

在佛性问题上，禅宗无论南北两宗，都主张人人皆有佛性，甚至认为“上至诸佛，下至蠢动含灵，皆有佛性”（《古尊宿语录》卷三《黄檗断际禅师宛陵录》）。禅宗并认为这个真如佛性，不是别的，就是各人自己的本心。弘忍在《最上乘论》里说：“此真心者，自然而有，不从外来。”在《六祖大师法宝坛经》里，记载着弘忍对慧能说的几句话，他说：“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若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心”和“性”的关系，在《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中也作了如下的说明：“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性去王无，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坏。”“性”既是

“心王”，也就是心的主宰。)所以后来慧能就要说：“一切般若智，皆从自性而生，不从外入。”又说：“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即是众生；自性觉，即是佛。”又说：“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故知万法尽在自心，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佛性。”又说：“世人性本清净，万法从自性生，思量一切恶事，即生恶行，思量一切善事，即生善行。如是诸法在自性中，如天常清，日月常明，为浮云盖覆，上明下暗；忽遇风吹云散，上下俱明，万象皆现。世人……智如日，慧如月，智慧常明，于外著境，被妄念浮云盖覆，自性不得明朗。若遇善知识，闻真正法，自除迷妄，内外明彻，于自性中，万法皆现，见性之人，亦复如是。”所以他又说：“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不修即凡，一念修行，自身等佛。……凡夫即佛；烦恼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前念著境，即烦恼；后念离境，即菩提。”“明与无明，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烦恼即是菩提，无二无别。”（《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神会和慧能一样，也认为“无明（烦恼之原）与佛性，俱是自然而生，无明依佛性，佛性依无明，两相依，有则一时有。觉了者即佛性，不觉了即无明。《涅槃经》云，如金之与矿，一时俱生，得遇金师，鑪冶烹鍊，金之与矿，当时各自。金即百鍊百精；矿若再鍊，变成灰土。金即喻于佛性，矿即喻于烦恼。烦恼与佛性，一时有。”他又说：“众生心是佛心，佛心是众生心。”认为只是觉了和不觉了的区别。如果觉了，“众生与佛元不别。”（《神会语录》）。慧能、神会这种强调心即是佛，心外更无别佛，真如佛性就在人的自性中，可以说它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

南宗认为觉了和不觉了，固然有时要“善知识”的指点；但主要依靠“自性自度”，这才算“真度”。慧能说：“经文分明言自归依佛，不言归依他佛，……三身佛在自性中，世人总有，为自身迷，不见内性，外觅三身如来。”他还举了一个例子，说：“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凡愚不了自性，不识身中净土，愿东愿西，悟人在处（到处）一般。”他明白地告诉人们，要求解脱，不能向外面去寻求解脱，只能在自己的内心去寻求解脱，如果自己的思想“通”了，接受佛教的教理，那末马上就得到解脱了。同时他还说：“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恶。但心清净，即是自性西方。”（《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即是说，只要接受佛教教理，思想上真的“通”了，在家在寺，其实一样。南宗的这种认为佛性就是自性，否定了心外有佛；认为净土即是净心，否定了西天更有极乐世界；认为在家可以修行，否定了只有僧侣才能成佛。这些论点，把佛教奥妙的教义说得比前更平易近人多了；但同时它的麻醉药毒性也更加猛烈了，因为这样说，那末人人有一颗心，就是说人人有成佛的机会；天堂就在净心之中，就是说它不是路途遥远不可到达的西天，而是只要有主观的宗教信仰，天堂就会出现在人的眼前；不必做和尚也可修行，就是说可以不必放弃世俗的生活，也可以成佛的。这样廉价地来抛售通往天国的门票，自然受到它愚弄的人数更是增加了，它的毒害作用也自然是更大了。

南宗既然认为心外无佛，佛性即是自性，那末怎样使这自性变成佛性呢？也就是说，怎样来树立自己坚定的主观信仰呢？他们认为必须通过顿悟的手段。怎样才算顿悟了呢？他们提出了“无念”、“无相”、“无住”三方面的标准，要求他们的信徒用来作为对待客观世界一切事物的态度。慧能在《六

祖大师法宝坛经》里说：“我此法门，从上以来，先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慧能在解释无念的涵义时说：“无念者，于念而无念。”又说：“于诸境上心不染，曰无念。于自念上常离诸境，不于境上生心。”“若见一切法（一切现象），心不染著，是为无念。用即遍一切处，亦不著一切处。但净本心，使六识出六门，于六尘中无染无杂，来去自由，通用无滞，即是般若三昧，自然解脱，名无念行。”神会也认为：“不作意即是无念。”“但无作意，心自无物，即无物心，自性空寂，空寂体上，自有本智，谓知以为照用。”（《神会语录》）慧能的所谓“无念”，神会的所谓“不作意”都是指着一种对事物不执著的精神绝对自由状态而言的。慧能又说：“若只百物不思，念尽除却，一念绝即死，别处受生，是为大错。”又说：“若百物不思，当令念绝，即是法缚，即名边见。”（《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神会也说：“若言作意，是有所得者即系缚，故何由可得解脱。声闻（小乘）修空住空被空缚，修定住定被定缚，修净住净被净缚，修寂住寂被寂缚……如此定者，并未是真解脱法。”（《神会语录》）。这是认为愈要有意识地去压制意识活动，这种压制的行为，反就成为自己的思想负担，反而受到这有意识活动的束缚了，因此只有“无念”，心无染着，来去自由，即进入精神的绝对自由状态，才算是真正的解脱。

无相，是“于相而离相”。慧能在《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中说：“成一切相，即心，离一切相，即佛。”意思是说，相由心生，客观世界只是人们头脑中的一种幻象之显现，只要不受这种幻象之迷惑，就是佛了。他又说：“外离一切相，名为无相。能离于相，即法体清净，此是以无相为体。”又说：“世人外迷著相，内迷著空，若能于相离相，于空离空，即是内外不迷。若悟此法，一念心开，是为开佛知见。”无相就是不著相，就是说不要为外界现象所吸引住、所拖拉住。神会也说：“一切众生，心本无相，所言相者，并是妄心。”又说：“‘明镜高台能照，万像悉现其中’，古德相传，共称为妙。今此门中未许此为妙。何以故？‘明镜能照万像，万像不见其中’，此将为妙。何以故？如来以无分别智，能分别一切；岂将有分别心，即分别一切。”（《神会语录》）意思是说，修行的人，心镜高悬，能够照烛一切事物和现象，但他却不执著地去分析辨别这些事物和现象，并绝不允许让这些事物和现象来占据自己的心境，这样，就是使自己的心境永远保持着像“万像不见其中”的明镜一样，这就叫做“无相”。

无住，就是说不要把自己的思维停留过去、现在、未来的某一个问题上，慧能说：“无住者……念念之中，不思前境。若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不断，名为系缚；于诸法上，念念不住，即无缚也。”他又说：“心不住法（法指一切事物和现象），道即通流；心若住法，名为自缚。”（《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有人问神会说：“若为修道得解脱？”神会答：“得无住心，即得解脱。……《金刚经》有文，……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但得无住心，即得解脱。”无住和无念一样，既要心如虚空，又要不著空见，这才算到家。

禅宗把佛性说成自性，实质上就是把佛性论变成为人性论，把修行变成为修心，实质上就是把宗教修证功夫变成为对待生活的态度。这种宗教的进一步世俗化，表面上看来，好像佛性的人性化，贬低了佛性的庄严性，修行就是修心，混淆了世间和出世间的界限，而实际上，宗教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目的性却更其明确了。佛教到了禅宗的南宗，不但不否定人间世的一切，而

且对人间世的一切，在不妨碍它宗教的基本教义的前提之下，反而完全把它肯定下来了。他们说：“自性变化甚多”，“一念思量名为变化，思量恶事，化为地狱；思量善事，化为天堂；毒害化为龙蛇；慈悲化为菩萨。”（《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无处不是地狱，无处不有天堂，对因果报应的宣传教育，实际更是在加强了。慧能在《无相颂》中，坦白地说：

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日用常行饶益，成道非由施钱。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听说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目前。（《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这一首颂中，除了持戒、修禅、西方、菩提等个别词汇带有佛教色彩以外，从它所反映的思想内容来讲，和儒家所提倡的伦理纲常，基本一致，并没有什么两样。这样的佛教派别，统治阶级为自己的利益来打算，自然非用大力来扶植它不可了，所以唐会昌灭佛不久，佛教重兴，可是佛教的许多教派，经过这次打击，都式微衰落了，独有禅宗的南统，一支独秀，明白了以上的道理，就也不会认为是偶然的了。

弘忍传付衣法给慧能的时候，曾给慧能传述菩提达磨的一首颂偈：“吾本来兹土，传法救迷情。一华开五叶，结果自然成”（《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后来禅宗南宗的僧侣就附会这个颂偈，认为弘忍预言禅宗要分成五宗。事实禅宗既分南北宗，南宗慧能后，又出现过荷泽宗；临济宗之后又支分出黄龙、杨歧两宗，结果因为把“一华开五叶”当作预言，荷泽宗神会一支，在唐武宗会昌灭佛之后，也一蹶不振了，黄龙、杨歧两宗也不敢尊称之为宗，而改称之为家，称之为五宗七家。黄龙、杨歧两家的形成在宋代，所以不在本书介绍范围之内，这里就只叙述到五宗为止。

这禅宗南宗的五支——五个宗，都是在会昌五年（公元八四五年）灭佛之后发展起来的，其它各教派受到灭佛的打击都衰落了，而禅宗的南宗却很快恢复和发展而形成五宗了。

一，沩仰宗，它的创建者为沩山（今湖南宁乡县西一百五十里之大沩山）灵祐（公元七七一至八五三年）和他的门徒仰山（今江西宜春县南八十里）慧寂（公元八七一至八八三年）。这一宗的宗教神学思想，基本上是继承六祖慧能的，只是在修证功夫方面，提出和过去不同的名词而已。它把主观思维称为“想生”，客观世界称为“相生”，不把思维停留在一点上，“心心无间断，流入于性海”（《景德传灯录》卷六），“真常流注”，“如镜长明”（《景德传灯录》卷十一），称为“流注生”。灵祐曾对慧寂说：“吾以镜智为宗，出三种生，所谓想生、相生、流注生。《楞严经》云：‘想相为尘，识情为垢，二俱远离，则俱法眼应时清明，云何不成无上正觉。’想生即能思之心杂乱，相生即所思之境历然，微细流注（用流注生来观察），俱为尘垢，若能净尽，方得自然”（《人天眼目》卷四）。他们不仅否定客观世界——山河大地之存在，同时也认为主观世界“能思之心杂乱在作祟”，应该“真常流注”，心心无间断，恒转如瀑流。用这种颠倒的世界观来观察事物，认识“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只有断绝“无明”，方成无上正觉。这些论点和其它教派并没有两样，本来不是什么新货色。至于沩仰宗的家风，也是主张“父慈子孝，上令下从，尔欲捧饭，我便与羹；尔欲渡江，

我便撑船。”对于伦常道德，封建秩序，还是和平共处的。

二，临济宗，它的创建者，是镇州（治真定，今河北正定县）城东南隅，临滹沱河侧的临济禅苑的义玄（生年不详，死于唐懿宗咸通八年，公元八六七七年）。临济宗义玄继承了禅宗“三界唯心”的看法，他说：“佛者，心清净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处处无碍净光是。三即一，皆是空名，而无实有。”又说：“心生，种种法（指客观世界）生；心灭，种种法灭。”“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所以梦幻空花，何劳把捉。”“尔一念心贪是欲界，尔一念心瞋是色界，尔一念心痴是无色界。是尔屋里家具子，三界不自道我是三界！”叫人要勘破对三界的看法。如果看不破，“尔若爱圣憎凡，生死海里浮沉！烦恼由心故有”，倘若能够“无心烦恼无拘，不劳分别取相，自然得道须臾。”别人问他，“何是佛、魔？”义玄说：“尔一念心疑处是魔，尔若达得万法无生，心如幻化，更无一尘一法，处处清净，是佛。”他也强调“即心即佛”，学道人“莫向外觅”。并说：“道流！是尔目前用底，与祖、佛不别，只么不信！向外求。向外求法，内亦不可得。”“古人云：向外作工夫，总是痴顽汉。”因为他们对一切粗细大小，不用物质来衡量，而用心来衡量，这样，就会得出“毛（汗毛）吞巨海芥纳须弥（大山）”违反常识的想法了。临济宗也是不强调坐禅的，义玄说：“山僧说：‘向外无法，学人不会，便即向里作解，即便倚壁坐，舌拄上腭，湛然不动，取此为是祖门佛法也，大错。’”在生活方面，他们是很随顺的，所谓“平常无事，屙屎送屎，著衣吃饭，困来即卧”（《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可是在教人顿悟方面，又有一套手法，什么四料拣、四照用之类，现在先介绍四料拣如下。义玄讲四料拣时，曾说：“有时夺人不夺境；有时夺境不夺人；有时人境俱夺；有时人境俱不夺。”什么叫夺人不夺境呢？义玄很形象地解释：“煦日发生铺地锦，婴孩垂发白如丝。”上句存境，下句夺人，婴孩才出生，不久便白发如丝，教人猛省，所以叫夺人。什么叫夺境不夺人呢？他形象地说：“王令已行天下遍，将军塞外绝烟尘。”上句夺境，下句存人。因为将军被围困在塞外，说明“王令已行天下遍”这个局面（境）实际并没有形成。什么叫人境俱夺呢？他说：“并（州治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汾（州治西河，今山西汾阳县）绝信，各处一方。”什么叫人境俱不夺呢？他形象地说：“王登宝殿，野老讴歌。”借世俗的内容，来作为四料拣的素材。四照用是指教人顿悟时采用的手法。“有时先照后用，有时先用后照，有时照用同时，有时照用不同时。”都得分别对待。什么是先照后用呢？因为这个棒喝的对象，法执严重，我执却不严重，所以首先得破他法执，否定客观世界的真实存在，用禅僧的诗句来形容，是“红旗耀日催征骑，骏马嘶风卷阵云”，实际是战卧沙场的一梦，现实世界中本不真实存在。什么是先用后照呢？这个棒喝对象，吾执严重，他不懂得主观世界的一切，如梦幻泡影，不是真实存在，用禅僧的诗句来形容，“斩得匈奴首，还归细柳营”，实际也是春梦一场，都是虚幻的。什么是照用同时呢？这个棒喝对象，吾执法执都很严重，对他们这些人进行指点，用禅僧的诗句来形容，“收下南岳岭头云，捉得太行山下贼”，不但破他的法执，也得破他的吾执，换句话说，“驱耕夫之牛，夺饥人之食，敲骨取髓，痛下针锥”，要对他们既证明客观世界是不真实存在的，也说明他的主观世界也是不真实的。什么是照用不同时呢？这个棒喝的对象，吾执、法执都不严重，那末对他们进行引接，就得“合水和泥，应机接物”，用禅僧的诗句“清凉（五台山）金色光先照，峨眉银界一时铺”

（《人天眼目》卷一），使他们研究宗教神学更加入迷。他们又引用了“午后打斋钟”的诗句，齐钟应该吃午饭前打的，午后打，就没有现实意义了，是多余的了。譬如已经觉悟的人，只要正面对他们进行教导好了。此外还有三玄、三要，基本上和四料拣、四照用差不多，我们就不一一介绍了。

在禅僧的问答中，对达磨祖师西来意的这个公案，因为难答覆，禅宗许多上座，都不愿正面作出回答，临济宗的义玄禅师却是作出了正面的回答的。别个僧侣问义玄“如何是西来意？”他在一处说：“若有意，自救不了。”在一处又说：“自达磨大师从西土来，只是觅个不受人惑底人”（《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义玄并没有像别个禅僧那样，顾而言他。临济一宗是禅宗南宗五支中势力较大的一支，它盛行在北方，在唯心主义传播教义方面，人才辈出，所谓“宗祖高明，子孙光大”（《人天眼目》卷一），在此后宋明佛教史中，是不能漠视的一支。

三，曹洞宗，这一宗的创建者，为洞山（今江西宜丰县东北五十里太平乡）良价（公元八七一至八六九年）和他的门徒曹山（今江西宜黄县北三十里）本寂（公元八四一至九一年）。应该称洞曹宗，由于在声韵学上，平声字应在上，仄声字应在下，才好称呼，因此称为曹洞宗。反映曹洞宗的世界观和认识论的是五位君臣论：“正位即属空界，本来无物；偏位即色界，有万形像；偏中正者，舍事入理；正中来者，背理就事；兼带者，冥应众缘，不随诸有，非染非净，非正非偏，故曰虚玄大道无著真宗”。“君为正位，臣为偏位，臣向君是偏中正，君视臣是正中偏，君臣道合，是兼带语。”谓之“正”，谓之“君”，实际就是他们的本体论；谓之臣，谓之偏，实际就是他们所讲的客观世界。因为禅宗和一切佛教教派一样，他们的颠倒世界观，把佛性真如认作本体，而把客观世界看作是佛性、真如的派生物。他们虚构了一个至高无上的精神实体，即“真如”、“佛性”作为宇宙万有的本体，说他是“君”，而把宇宙万物都说成是“臣”，反而成了精神的派生物，这是多么荒谬啊！

四，云门宗，这宗的创建者，为云门（今广东乳源县北云门山）文偃（公元八六四至九四九年），他死的时候，已经不是唐代而是在五代十国时期的南汉皇帝刘晟统位时期了。云门宗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三句话，第一句是“函盖乾坤”，意思是说，客观世界是由心（精神性）派生的，这个心，毛吞巨海，芥纳乾坤，可以包罗万象，函盖乾坤，它是宇宙万有的本体。第二句话是“截断众流”，意思是说，这个客观世界，如堆山积岳，排叠将来，只要认识他是乾闥婆城，海市蜃楼，并不真实存在，那末宇宙万有就也冰消瓦解，万机顿息了。他们以有若无，这是一种颠倒的认识论。第三句话是“随波逐浪”，意思是说，要应病给药，方法也应该灵活。这三句话，云门宗称之为云门剑，也称之为吹毛剑，以喻其教人顿悟，快利无比。禅宗语录里称云门宗的机锋，“孤危耸峻”，“直是剑锋有路，铁壁无门，打翻路布葛藤，剪却常情见解”（《人天眼目》卷二），是咄咄逼人的。可惜颠倒的世界观，使他们这套手法，不但没有起好作用，而且迷途走得更远而已。

五，法眼宗，这一宗的创建者，为金陵（今江苏南京市）清凉山报恩禅院的文益（公元八八五至九五八年），他死于五代十国的南唐中主李璟统治时期，南唐中主谥他为大法眼禅师，因此这一宗称为法眼宗。法眼宗袭用了华严宗六相的说法，来表达他们的世界观。这宗也强调了“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这宗解释“真如一心为总相，能摄世间出世间法故，约摄诸法得总

名。能生诸缘成别号（别相）；法法皆齐为同相；随相不等称异门（异相）；建立境界故称成（成相）；不动自位而为坏（坏相）。……此上六相义者，……观通世间一切法门，能入法界之宗，不堕断常之见。……所以位位即佛，阶墀宛然”（《人天眼目》卷四）。反映了禅宗发展到五代十国时期，有些著名禅僧已经禅教兼重，这个教外别传的禅宗，正在吸取别宗有营养的资料，来丰富自己的教义了。法眼宗教人顿悟的方法，也和云门宗相近，“对病施药，相身裁缝”。

禅宗南宗僧侣，都是不念经、不坐禅的，他们认为：“佛本是自心作，那得向文字中求”（《黄檗山断际禅师传心法要》）。有些禅僧，偶尔也翻阅佛经，旁人问他，他推托说这是用来遮眼的。临济义玄曾经对人说：这一堂僧，“经又不看，禅又不学”，“总教伊成佛作祖去”（《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他们甚至诋佛经为魔说，汾山灵祐和他的门徒仰山慧寂谈到佛理，灵祐问慧寂：“《涅槃经》四十卷，多少是佛说？多少是魔说？”慧寂答：“总是魔说”（《潭州汾山灵祐禅师语录》）。《涅槃经》是佛的遗教，尚且被禅宗诋呵为魔说，不用说其它经典了。临济义玄甚至诋呵“三乘十二分教，皆是拭不净故纸”；“你若求佛，即被佛魔摄；你若求祖（达磨），即被祖魔摄”（《古尊宿语录》卷四《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称佛经为魔说，称佛为佛魔，称祖为祖魔，可说是呵佛骂祖，已经很流行了。洪州新兴严阳尊者已诋佛为土块，“僧问：‘如何是佛’？师曰：‘土块’”（《景德传灯录》卷十一）。临济义玄至诋佛为乾屎橛（拭粪之橛）。有僧上堂说：“赤肉团上有一无位真人”（指佛），义玄说：“无位真人，是什么乾屎橛”（《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后来有人问云门文偃：“如何是释迦身？”文偃也答：“乾屎橛”（《云门匡真禅师广录》）。临济义玄又说：“坐断报化佛头，十地满心，犹如客作儿；等妙二觉，担枷锁汉；罗汉、辟支，犹如厕秽；菩提涅槃，如系驴橛”（《古尊宿语录》卷四）。德山宣鉴也说：“这里无祖无佛，达磨是老臊胡，释迦老子，是乾屎橛，文殊、普贤，是担屎汉，等觉妙觉，是破执凡夫，菩提、涅槃，是系驴橛，十二分教，是鬼神簿，拭疮疣纸，四果、三贤，初心、十地，是守古冢鬼，自救不了。”（《五灯会元》卷七）几乎把古佛今祖、佛遗教、佛道场都全盘否定了。有人问赵州从谿：“如何是佛”？师曰：“殿里底”。曰：“殿里者岂不是泥龕塑像！”师曰：“是”（《五灯会元》卷四赵州观音院从谿禅师）。南岳石头希迁收了一个徒弟天然，天然后居邓州（治穰，今河南邓县）丹霞山。他本来是个儒士，趁举赴考，想捞个官做。后来在旅途上碰到一位禅僧，这禅僧对他说：“选官何如选佛。”他大以为然，就出家当和尚了。在唐宪宗元和中（公元八六至八二二年），他寄居在慧林寺，“遇天大寒，师取木佛烧火向。院主诃曰：‘何得烧我木佛！’师以杖子拨灰，曰：‘吾烧取舍利。’曰：‘木佛何有舍利！’师曰：‘既无舍利，更取两尊烧’”（《五灯会元》）。他同时还说：“佛之一字，永不喜闻。”后来有人问洪州（治钟陵，今江西南昌市）清泉山的守清禅师：“丹霞烧木佛意，作么（怎麼）生？”守清答：“时寒烧火”（《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二）。在禅僧们看来，“金佛不度炉，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内里坐”（《古尊宿语录》卷十四），铜佛、木佛、泥塑佛，都是假相，即心即佛，真正的佛，在人心头。他们对佛、祖的传说，也是用怀疑态度的，他们说：“达磨西来，无风起浪；世尊拈花，一场败缺”（《黄檗断际禅师宛际录》）。认为释迦在灵山会上的拈花微笑，

达磨的附舶东来，都是多此一举。丹霞天然对人说：“禅可是尔解的物？岂有佛可成。……若识得释迦即老凡夫，……莫一盲引众盲，相将入火坑”（《禅宗正脉》卷五）。赵州从谏甚至不相信烧骨取舍利的事情，从谏“将谢世时，谓弟子曰：‘吾去世之后，焚烧了，不用净淘舍利。……且身是幻，舍利何生，斯不可也’”（《古尊宿语录》卷十三）。他们强调心即是佛，确实把僧侣骗人的东西揭穿了不少。有人问汝州西院汝明禅师：“如何是伽蓝（寺院）？”汝明答：“荆棘丛林。”又问：“如何是伽蓝中人？”汝明答：尽是些“獾儿貉子”（《景德传灯录》卷十一）。揭露寺院中的勾心斗角，把禅僧一群诋为獾儿貉子，也是非常形象的。临济义玄还对他的门徒说过：“道流！尔欲得如法见解，但莫受人惑，向里向外，逢着便杀。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逢父母杀父母，逢亲眷杀亲眷，始得解脱，不与物拘，透脱自然”（《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这喊杀之声，并不是真正要遇人即杀，而是所谓“学佛法底人，如斩钉截铁始得”（《景德传灯录》卷十七），要求在思想上和执着的東西包括佛魔、祖魔决裂。在禅僧们看来，只有思想上真正和执着的東西决裂了，才算“解脱”，才算“不与物拘，透脱自然”。禅宗僧侣们在思想上固然强调和世间决裂，但是他们在生活上，除了不敢结婚以外，其余一切却在进一步世俗化。他们“饥来吃饭，困来即眠”（《景德传灯录》卷六），“遇茶吃茶，遇饭吃饭”（《景德传灯录》卷十一），“齐前厨蒸南白饭，午后炉煎北苑茶”（《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二），生活是非常随和的。禅宗表面上使用一些激烈的词汇，蒙惑了一些资产阶级学者，这些学者甚至采用“革命”这一名词来形容他们的行径，其实这只是从形式上看问题，没有深入到事物的本质中去探讨。因为在思想战线上如果真正能够称为“革命”，那末就应该是以唯物主义观点来革唯心主义观点的命；而禅宗南宗，恰恰相反，从他们的世界观到认识论，连禅僧们自己也清楚，是“七颠八倒”（《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一）的，它只会更引导人们走向主观唯心主义的宗教神学，它只会更引导人们走向不可知论的泥坑，因此，实际说来，既无命可革，也无革可言。即使禅宗南宗在传播顿悟学说的手法上，采用一套单刀直入、青天霹雳的说教方法，有时甚至“栏腮一掌”，“劈肋三拳”（普秀《临济慧照玄公大宗师语录序》），或者“痛与乌藤三顿”（《人天眼目》卷二），柱杖二十，表面上看来，当头棒喝，好像很褊激，但由于它既不曾革掉唯心主义的命，相反，他们那一套手法，只是用来巩固禅宗南宗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的，也就一无可取了。

在禅宗宗教神学传播过程中，还值得介绍一下的，是发展了一种新文体，即语录的体制，它主要记载了禅僧们的言行。当他们载言的时候，是采用活的语言来加以记录的，因此，语录的有些部分，记载得形象生动，而且具有浓厚的口语化倾向，这些语录的不断出现，对此后语体文的发展，有着一定影响。语录的内容，除了记载宗教神学之外，还记载着口语化的警句，如上面曾提到过的，有人问泉州招提院禅僧道匡，“如何是佛法大意？”道匡曰：“七颠八倒”（《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一），用“七颠八倒”四个字来形容佛教的颠倒世界观，是最形象不过的了。仰山慧寂“问师弟香岩：‘近日见处如何？’[香]岩曰：‘某甲卒说不得。’乃有偈曰：‘去年贫，未是贫；今年贫，始是贫。去年无卓锥之地；今年锥也无’”（《景德传灯录》卷十一）；有一处又说：“上无片瓦，下无卓锥”，都是非常具有形象思维的语言，后来一直被大家沿用着。同卷还有一句警句，是“千年田，八百主”，

从这句话里反映了唐后期土地的转卖频仍，这些句子，在正史上我们是反而找不到的，使人读了，有一种清新的感觉。唐代是诗歌发达的时期，这一时期，涌现了许多著名的诗人；同样在禅僧行列中，也出现了不少诗僧，可惜他们的诗篇，不能全篇都保存下来，但在语录里，有时引用片章只句，作为机锋来处理，还是隽永可喜、耐人寻味的。如百丈怀海有七绝，“放出汾山水牯牛，无人坚执鼻绳头。绿杨芳草春风岸，高卧横眠得自由”。意境澹远，可称佳作。李翱赞维俨禅师的诗：“练就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景德传灯录》卷十四）。摘句中如雪峰义存有句：“雷罢不停声”，是哲理诗句中的上乘，灵云志勤把它改为“雷震不闻声”（《景德传灯录》卷十一），就违反常识，不成诗的意境了。汝州风穴延昭禅师在语录中引诗句较多，如“赴供凌晨入，开堂带雨归”；“三月懒游花下路，一家愁闭雨中门”；“常忆江南三月里，鹧鸪啼处野花香”（《景德传灯录》卷十三）。意境深远，和晚唐诗比肩而立，亦无逊色。禅宗语录不仅有助于我们对宗教神学的批判，同时在我们对唐代诗歌进行研究时，也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禅宗思想的广泛传播，和语录体制的出现，对此后宋元理学起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但由于不在本书叙述范围之内，所以我们就略而不论了。

唐王室的尊崇道教北周武帝灭佛，同时也灭道。隋文帝取得政权，恢复佛教，同时也恢复了道教。时有道士焦子顺牵强附会，“告隋文受命之符”（《唐会要》卷五）。隋文帝即皇帝位，尊焦子顺为天师，“常咨谋军国”，并为置五通观于宫侧，以便经常就近咨询。隋文帝并在京畿造道观三十六所，度道士二千人。开皇二十年（公元六〇一年），下诏：“有毁坏偷盗佛及天尊像、岳镇海渎神形者，以不道论”，“道士坏天尊者，以恶逆论”（《隋书·文帝纪》）。隋炀帝未即位时，曾邀请道士徐则、王远知等至其扬州镇所，“请求道法”（《册府元龟》卷八二二）。及即位后，又造观二十四所，度道士一千一百人。

李渊起兵晋阳，进军关中，有道士岐平定陈说符瑞，谓“陛下圣德感天，秦王谋无不胜，此乃上天所命，圣祖垂祐，何寇孽不可诛也”（《道藏》洞玄部·记传类《道教灵验记》）。武德三年（公元六二一年），有樵夫吉善行奏，说自己在浮山县（今山西浮山县南）东南羊角山，见到一位骑着白马穿着素衣的老人，说自己是当今皇帝的祖先太上老君，叫他告诉皇帝，今年可平王世充，从此长有天下。于是李渊授吉善行为朝散大夫，改浮山县为神山县，改羊角山为神角山，在山上兴修唐观，塑太上老君像，从此唐王室成为老子的后裔，称李聃作祖宗了。事实上，李聃是道家思想的奠基人，他和道教毫无关系。道教是从神仙巫术发展出来的，和老子思想毫不相关。

唐高祖李渊在武德八年（公元六二五年）国学释奠，还规定儒释道三教的先后，道为先，儒次之，佛在后，确定了唐王朝崇道的政策。唐太宗继承了这个传统，在贞观十一年（公元六三七年），下敕曰：“老子是朕祖宗名位称号，宜在佛先”（《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九）。又命列道士、女冠（女道士）于僧、尼之前。唐高宗乾封元年（公元六六六年），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道士、女冠改隶宗正寺。诸州置道观，上州三所，中州二所，下州一所，每观各度七人。到了武则天时代，推重佛教，天授二年（公元六九一年）下诏：“自今以后，释教宜在道法之上，缁流（僧尼）处黄冠（道士、女冠）之前”（《全唐文》卷九）。到了唐中宗变周为唐，道教的席次

又摆在佛教之前了。

唐玄宗尊崇玄元皇帝为“大圣祖”（《道藏》洞玄部·传记类《历代崇道记》）。开元二十九年（公元七四一年），又令全国各地建立玄元皇帝庙。天宝二年（公元七四三年），并令把长安的玄元皇帝庙改为太清宫，洛阳的玄元皇帝庙，改为太微宫，全国各地的玄元皇帝庙都改称紫极宫，从此道教寺宇又蒙上帝王“宫”“观”的名称。同时，也追尊庄子为南华真人，列子为冲虚真人，把《庄子》一书改称《南华真经》，《列子》一书改称为《冲虚真经》，事实证明，庄子和列子的思想和道教思想全无联系。

唐玄宗还在京师设立崇玄学，置博士、助教各一人，学生百人。后改崇文学为崇玄馆，改博士称学士，改助教称直学士。又置太清宫使一名，职位更为隆重，由首相兼任。每岁贡举，有道举，考试《道德经》、《南华真经》、《冲虚真经》和文子的《通元真经》等几部书，把它们列为经典著作（《老子》《庄子》收入《经典释文》），不入子书。唐玄宗还派遣使臣，往各州搜集道经，纂为《道藏》，共三千七百四十四卷，名为《三洞琼纲》。以后又命崇玄馆缮写，并令诸道采访使转写持诵，广为传播。

一般的道教寺宇，唐时称为“观”。开元时，“凡天下观，总一千六百八十七所。每观观主一人，上座一人，监斋一人，共纲纪众事。而道士修行有三号，其一曰法师，其二曰威仪师，其三曰律师，其德高思精，谓之炼师”（《唐六典》卷四《祠部郎中》）。由于唐王室崇事道教，因此有许多公主做女道士（时称女冠或女官）。武则天女太平公主曾出家为女道士，睿宗女金仙公主、玉真公主均曾为女道士，并为造金仙观、玉真观以居之。玄宗的杨贵妃，曾为女道士，玄宗女万安公主、新昌公主也均为女道士。朝臣中也有弃官入道的，如秘书监贺知章弃官为道士，舍会稽宅为千秋观。

唐王朝这样崇奉道教的原因，除了是想利用老子来增光王室门楣，加强皇帝的神圣意义之外，同时也是迷信方士烧炼丹药的一套方术。据说服了方士的丹药，上可以长生不老，下亦可以满足淫荡享乐的要求，因此统治阶级对于道教自然崇奉之不暇。中唐以后，有不少皇帝多为丹药所误，如唐宪宗信任方士柳泌，服其所合金丹。日加燥渴，躁怒过常，以致为宦官所弑杀，对外但云药发。唐宪宗的儿子唐穆宗也因妄服方士之药过多，因此病死。唐穆宗子唐武宗也是由于饵方士杜元阳的金丹，性加躁急，喜怒不常，武宗也觉得自己健康有问题，“而道士以为换骨”。终于金丹毒发而死，继承武宗之皇位的皇叔唐宣宗杖杀道士赵归真等数人，并流配罗浮山人轩辕集于岭南。可是宣宗在同年冬，亲受《三洞法籙》于衡山道士刘玄静，到了宣宗大中十一年（公元八五七年），即宣宗做了十一年皇帝以后，又把道士轩辕集从罗浮山接回长安，向他请教长生之术。这次轩辕集也学乖了，他对宣宗说：“王者屏欲而崇德，则自然受大遐福，何处更求长生”（《资治通鉴》），住长安数月，坚决请求还罗浮山去了。唐宣宗最后还是因为服了医官李玄伯、道士虞紫芝、山人王乐的丹药，疽发于背而死。“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道士以丹药骗人，皇帝以服丹药丧生。此外达官贵人为求长生不老，因此而服食金丹致死的，也不在少数。

唐五代道教徒的思想唐代的道教徒中，有些人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他们不仅和佛教思想有很接近的地方，有些还掺杂摩尼教的思想。

和佛教思想相接近的，为武则天时期的道教徒王玄览，他在其所著《玄珠录》（见《道藏·太玄部》）中说：“诸法无自性，随离合变，为相为性，

观性相中，无主无我，无受生死者。虽无主、我，而常为相、性。将金以作钏，将金以作钁；金无自性故。”这种世界万物没有自性的说法，就是佛教的理论。他又说：“法既妄，不言亦妄，此等既并是妄，何处是真？即妄等之法，并悉是真。”并说：“非有非无，非舍有无”，这种离二边的中道思想，又明显的是从佛教那里接受过来的。他认为要修道，“当灭知见，知见灭尽，乃得道矣。虽众生死灭后，知见自然灭”，但这只是一般的死灭，“若使身在未灭时，自由灭知见，当至身灭时，知见先已无，至已后生时，自然不受生。无生无知见，是故得解脱。”这和佛教涅槃永不受生的说法，又基本一致。因此可以说王玄览的思想，掺入了许多佛教思想的色彩。

掺杂有摩尼教思想色彩的，则为唐肃宗至唐代宗时期的道教徒李筌，他虽不是道士，而是唐王朝的官吏，官至仙州刺史、荆南节度副使，但是以道教徒著名的。当北朝后期，出现了一部伪书《阴符经》，托名黄帝所撰，大概是寇谦之系的道士们所伪撰。李筌得到这本书之后，为之作疏以传于世。

《阴符经》分上中下三卷，“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国安人之法，下有强兵战胜之数”（《阴符经疏序》）。李筌在《阴符经疏》中，介绍了他自己对构成万有本体的看法，他说：“天者，阴阳之总名也，阳之精气，轻清上浮为天；阴之精气，重浊下沉为地。相连而不相离。……故知天地则阴阳之二气，气中有子，名曰五行。五行者，天地阴阳之用也，万物从而生焉，万物则五行之子也”（《阴符经疏》上）。李筌认为万物的生成，和阴阳二气有关，由阴阳而生五行，由五行而生万物。但阴阳二气，并不是万有的本体，他又说：“阴阳生万物，人谓之神，不知有至道静默而不神，能生万物阴阳，为至神矣！”（《阴符经疏》中），又云：“不神者，何也？至道也。言至道虚静，寂而不神，此不神之中，能生日月阴阳三才，万物种种滋荣而获安畅，皆从至道虚静中来，此乃不神之中而有神矣，其理明矣。”由此可见，他还是以至道虚静的“无”认作是万有的本体的。在《阴符经》原文里，说道：“自然之道静，故天地万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阴阳胜，阴阳相推而变化顺矣。”这是说，物质虽有运动变化，但运动是相对的，静止是绝对的。李筌对物质运动的看法，在疏文中没有提出相反的意见，可见基本上和上述的观点是相一致的。李筌又认为“天生五行”，“更相制伏，递为生杀”，“五行相生而用之，则为道德，合于阳也；相克之道用之，则为贼害，合于阴也。”“故知善修道德者，道也，是阳之主也；阴恶贼害者，魔也，是阴之精。”人但能明此五行制伏之道，审阴阳兴废之源，就是见道，就是“吉无不利，与道同游”（《阴符经疏》上）。又说：“五贼者，五行之气也。……贼者害也，逆之不顺，则与人生害，故曰贼也。”五行相生则吉，相克则凶，本来是中国的原有说法，但李筌在讲到阴恶贼害的时候，特别联系到魔的一字，这和摩尼教说世界及每一个人的身体中，都具有五明力和五类魔和合而成的说法，极其接近。因此也可以猜测到在唐代中叶，道教的思想也掺杂有摩尼教的思想成份，这是应该加以注意的。

李筌以后，有施肩吾，也是道教的思想家。肩吾字希圣，宪宗、穆宗时期的人。《全唐文》卷七百三十九说施肩吾是元和十年（公元八一五年）进士。肩吾著《西山群仙会真记》一书，在书里放言性命之学，他说：“从道受生谓之性，自一禀形谓之命，所以任物谓之心，心有所忆谓之意，意有所思谓之志，事无不周谓之智，智周万物谓之虑。……气来入身谓之生，气去于形谓之死，所以通生谓之道。道者有而无形，无而有精。……道不可见，

因心以明之，心不可常，用道以守之”（《道藏》洞真部·方法类《西山群仙会真记》卷二第八）。从道受生谓之性，自一禀形谓之命，它以无形与有形来分别性命，开宋元道学言性命之学的先路。同时，气来入身谓之生，气去于形谓之死，这个道气的提法，也给后来道学家以深远的影响。他也谈到道器的问题，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上以下为基，道以器为用”，这种说法，在宋元道学家的语录中屡屡提到，可以说，道器体用的问题，施肩吾已经开始加以发挥了。

谭峭，字景升，父谭洙，国子司业。峭不乐仕进，著有《化书》。谭峭生活于晚唐五代之际。在宇宙观方面他不主张从无生有。他认为动静相磨，化生万物，他说：“动静相磨，所以化火也，燥湿相蒸，所以化水也。水火相勃，所以化云也，汤盎投井，所以化雪也，饮水雨日，所以化虹蜺也。小人由是知阴阳可以召，五行可以役，天地可以别构，日月可以我作”（《道藏》太玄部《化书》卷二）。他认为掌握住动静相磨的规律，阴阳可召，五行可役，天地可以别构，日月可以自作，他过分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力量，认为一个普通的人，只要掌握动静相磨的规律，就可以成为宇宙的主宰。但是谭峭的相化理论，有时又在循环不已的基础上运行着，在这种情况下，万物和人又处于被动的地位，他说：“夫万物非欲生，不得生；万物非欲死，不得死。达此理者，虚而乳之，神可以不化，形可以不生”（《道藏》太玄部《化书》卷一）。不化不生，永远处于死寂的环境中，又是一般道教徒的议论了。

杜光庭，字圣宾，唐僖宗时，随从入蜀，后来前蜀主王建赐光庭号广成先生。他给道和物定了一个定义，无形是道，有形是物。他说：“道本无形，莫之能名，无形之形，是谓真形，无象之象，是谓真象。先天地而不为长，后天地而不为老，无形而自彰，无象而自立，无为而自化，故曰大道”（《道藏》洞神部·玉诀类《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注》第二）。有时他又说道就是元气，“道本包于元气，元气分为二仪，二仪分为三才，三才分为五行，五行化为万物。”“故元气无形，不可名也。《经》云‘道隐无名。’”（《道藏》洞神部·玉诀类《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注》第二）元气虽然无形，但如果和阴阳结合起来，就称做阴气和阳气。他把气和道结合在一起，接近于无极而太极的理论。杜光庭在《中元众修金籙斋词》中又说到“至道希夷，真精玄寂，弘化于混元之末，凝光于太极之先”（《广成集》卷四）。太极而有先，可见太极还不是根本之所在；根本是至道，玄精，是否称做无极，尚不明确，但杜光庭的著作里，确已有无极这个字句了（见《广成集》卷十四）。杜光庭把有形的叫做物，他说：“五行造化谓之物，又云块然有凝谓之物，凡有形质者，俱谓之物也”（《道藏》太玄部《玄珠录》卷上）。当然，他解释《老子》“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的物是否有形时，他认为“道之妙用，非世之常物”，即这个物还是无形的。杜光庭认为人的贤愚，“得清明冲朗之气，为圣为贤，得浊滞烦昧之气，为愚为贱”（《道藏》洞神部·玉诀类《道德真经广圣义·不尚贤章》第二注）贤愚是得诸先天的，这是完全迎合封建统治者口味的说法。

后来给予道学家们影响最大的是陈搏。陈搏字图南，五代后唐明宗长兴（公元九三一至九三四年）间，举进士不第，服气辟谷为道士。周世宗（公元九五四至九五八年）授谏议大夫，固辞不就。北宋太宗太平兴国（公元九七六至九八三年）中，曾赐号希夷先生。他拟了一幅《太极图》，授予北宋

理学家周敦颐，周敦颐据之作《太极图说》，通过《太极图说》来研究宇宙生成、万物化生的道理。陈搏的著作，已经找不到了；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中说到：“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过去某些道士们理解宇宙的本质是静的，由静而动。《太极图说》却说“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认为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暂时的，这在思想上是一个很大的革新。可惜在“无极”的问题上，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存在”，或根本不是什么“存在”，他都没有详细讲到。只能靠后人去揣摩了。

#### [一]

道教是一种内容庞杂的宗教，它从东汉、三国以来，一直到唐末五代，不断吸取中土其它各种教派的论点，来充实自己。但它的能够传播，却不是具有这种长处，而是由于它能够满足统治阶级享乐腐化的愿望以外，还由於道教有一套荒诞无稽的骗人说法，如呼风唤雨、避祸消灾、起死回生、仙药治病等等，却正是受苦受难的人民平日生活之中所期望而得不到的东西，统治阶级就利用道教的这种说法，来麻醉当时人民，这就是使道教在人民群众中间有了许多信奉者。

祆教、景教、摩尼教的传播我国称祆教、景教、摩尼教为三夷教，现次第介绍如下。

祆教，是公元前六世纪，波斯人苏鲁阿士德（Zoroaster）因波斯拜火旧俗而创立的。他认为宇宙间有善恶两种力量在进行斗争，善神清净光明，恶神污浊黑暗，人们应该弃恶就善，弃黑暗而趋光明，以火代表光明，代表善神，而加以崇拜，故称拜火教。同时拜火以外，也拜日、月、星辰。中国人因为它拜天，所以称之为拜“胡天神”，并特为它制出“祆”的一个字来，作为胡天神的省文；以其拜火，有时又连称为“火祆”。波斯萨桑王朝兴（公元二二六年），定火祆为国教，由是中亚昭武九姓诸国和吾国西北部塔里木盆地南北道如疏勒（今新疆喀什市）、于阗（今和阗县）、焉耆（今焉耆县）等城邦，也多成为崇祀拜火教的地区了。

祆教最早传入中原地区，当在东晋十六国的石赵时期《晋书·石季龙载记》载：石虎死后，冉闵擅国政（公元三四九年），“龙骧（禁卫军）孙伏都、刘铄等，结羯士三千，伏於胡天，亦欲诛闵。”这个“胡天”，就是指祆祠而言的。这可说是祆教记载最早见於中国史上的一条材料。盖石氏系出中亚羯族，祆教也是他们本来崇奉的宗教，祆教在石赵时期传入中原地区，这是可以理解的。

北魏之季，灵太后登嵩高山，下令“废诸淫祀，而胡天神不在其列”（《魏书·皇后宣武灵皇后传》）；北齐后主高纬末年（公元五七六年），亦“躬自鼓舞，以事胡天”，北周诸帝“欲招来西域”，亦“有拜胡天制”（《隋书·礼仪志》）。可见北朝都是崇拜祆教的。唐代首都长安有祆祠四所，东都洛阳有祠祀二所，河西走廊如凉州、沙州（今甘肃敦煌县）等地，也有祆祠。

隋代有雍州萨保，流内视从七品，诸州胡二百户已上萨保，流内视正九品，见《隋书·百官志》。唐代有萨宝视流内正五品，萨宝府祆正，视流内从七品，有萨宝府祆祝，视流外勋品，萨宝率府，视流外四品，萨宝府史，视流外五品，见《通典·百官典·唐官品》。‘萨宝府官，主祀祆神’（宋敏求《长安志》卷十），皆以胡人充任。火祆既是胡人崇奉的宗教，因此唐

政府禁止内地百姓祈祭。“唐河南府（洛阳）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胡袄神庙”。“梁州有袄神庙”。“每岁商胡祈福，烹猪杀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在酬神之后，还请一位胡人充袄主，变出一套魔术来，如“取一横刀，利同霜雪，以刀刺腹，食顷，平复如故”（张鷟《朝野僉载》）的幻术之类。

会昌灭佛，袄教也在被废除之列。大中初年，佛教兴复，袄教同样准许在胡人之间崇祀。宋人张邦基著《墨庄漫录》，在其书卷四中提到东京开封府城有火袄祠，其庙祝姓史，白云“家世为祝累代矣，藏家世补受之牒凡三，有曰怀恩者，其牒唐咸通三年（公元八六二年）宣武节度使令狐[綯]给；有曰温者，周显德三年（公元九五六年）端明殿学士权知开封府王[朴]所给；有曰贵者，其牒亦周显德五年（公元九五八年）枢密使权知开封府王[朴]所给。自唐以来，袄神已祀於汴矣；而其祝乃能世继其职，踰二百年，斯亦异矣”。张邦基是北宋末、南宋初人，南宋以后，中土典籍，不载袄祠之名，袄教大概很衰落了[四]。

景教，是从希腊正教里面分裂出来的一个教派，创建者为叙利亚人聂思脱里（Nestorius）。聂思脱里於公元四二八年起，任君士坦丁堡大教长。他主张耶稣基督之神性与其人性非一体，谓耶稣之母玛利亚只产耶稣之体，不产耶稣之神，故不当称之为圣母，因此被斥为异端（此为公元四三一年事）；公元四三五年，并由罗马皇帝下令放逐聂思脱里於国外。聂思脱里一派虽不得志於东罗马，而以后在波斯等地却大大发展起来，中国的景教，就是从波斯传入的。

唐太宗贞观九年（公元六三五年），景教传教师阿罗本从波斯来到中国，唐太宗命他翻译景教的经典。贞观十二年（公元六三八年），下诏於西京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景教传教师）二十一人。唐高宗时，又下令於诸州置寺，并赐阿罗本以“镇国大法主”的称号。因为景教是从波斯传到中国的，所以中国人开始称它的寺院为波斯寺。到了唐玄宗天宝四载（公元七四五年），时波斯已灭，而景教本出自东罗马，唐人称东罗马为大秦，故又改称波斯寺曰大秦寺。德宗建中二年（公元七八一年），於大秦寺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石至今在西安市碑林保存，是研究中土流传景教的重要材料。此外，在敦煌石室中，也发现了有关景教的几种经典，中外学者也曾对它进行了研究[五]。

会昌灭佛，景教也受到冲击，此后就若存若亡了。

摩尼教，回鹘可汗碑称之为“明教”，其创建者为波斯人摩尼（Mani），亦译作末尼。摩尼生於公元二一六年（即汉献帝建安二十一年），从公元二四二年（魏齐王芳正始三年）起，开始创立新教。它的教义系改创火袄等教义而成。摩尼教倡二宗、三际之说。二宗，指光明与黑暗两种力量。摩尼教创世界的传说是：“此世界未立以前，净风、善母二光明使，入於暗坑无明境界……其五类魔黏五明身，如蝇著蜜，如鸟被羶，如鱼吞钩，以是义故，净风明使以五类魔及五明身二力和合，造成世界十天八地。如是世界，即是明身医疗药堂，亦是暗魔禁系牢狱。”（大正藏卷五十四《波斯教残经》）他认为世界是光明和黑暗两种力量和合而成的，因此这两种力量必然会发生斗争，这和袄教的善恶两种力量常在进行斗争之说，大致相同。三际，谓初际、中际、后际，它们代表过去、现在、未来明暗两种势力消长的三个阶段。“初际者，未有天地，但殊明暗，明性智慧，暗性愚痴，诸所动静，无不相

背”。这是一个明暗分明的时代。“中际者，暗既侵明，恣情驰逐，明来入暗，委质推移”。这是明暗两种势力斗争最激烈的时代。摩尼认为当时世界，正处於这样一个时代，他主张摩尼教徒应该“劳身救性”，助明胜暗，“即妄为真”。“后际者，教化事毕，真、妄归本，明既归於大明，暗亦归於积暗”（大正藏卷五十四《摩尼光佛教法仪略》）。这时明暗又各复本位，人人已处於“无上光明世界中”（大正藏卷五十四《摩尼教下部赞》）了。摩尼教认为人的肉身，就是一个小世界。当中际的时候，在这小世界中，光明的本性，“为魔囚缚，昼夜受苦”，只有用摩尼的五明力量，把光明的本性从怨憎、嗔恚、淫欲、忿怒、愚痴等五暗的魔道中挣脱出来，使人的心性也“像清净光明世界”（《波斯教残经》）一样。摩尼认为摩尼教徒应该帮助光明战胜黑暗。摩尼的学说当时受到火祆教徒的攻击，公元二七七年（晋武帝咸宁二年），摩尼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尸身并剥皮实草，揭示市门。

摩尼死，而摩尼之教传播极速，魏晋南北朝之际，中亚细亚诸地已有很多摩尼教徒。它的传入中国，约在武周时代，《佛祖统纪》卷三十九载武则天“延载元年（公元六九四年），波斯国人拂多诞（Jur-stadan）持二宗经伪教来朝”[六]，这是摩尼教入中国的最早记录。《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一引：“开元七年（公元七一九年），吐火罗国支汗那王帝矰上表献解天文人大慕闍。”其中的“慕闍”（Moga）也是摩尼教中法师之译名。摩尼教自延载元年传入中国，到了开元二十年（公元七三二年），前后不到四十年，一度曾遭禁断。《通典·职官典》称：“开元二十年七月敕：末摩尼法，本是邪见，妄称佛教，诳惑黎元，宜严加禁断；以其西胡等既是乡法，当身自行，不须科罪。”不过这道禁令，只是不准唐人信奉，至如中亚细亚人则不在限制之列。

天宝以前，传摩尼教至中国者，为波斯、吐火罗；至德以后，使摩尼教在中国广泛传播者则为回鹘。摩尼教的传入回鹘，当和传来唐地时间相去不远。当唐人谓摩尼为邪见，而加以禁断时，在回鹘，则君臣上下，一致尊奉，成为国教。安史之乱以后，回鹘於唐有功，故大历三年（公元七六八年）批准在长安为回鹘置摩尼寺，名之曰“大云光明寺”。到了大历六年（公元七七一年），又下敕在荆、扬、洪、越等州，各置大云光明寺一所。元和二年（公元八〇七年）又在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三所。可见摩尼教正在迅速传播。

唐武宗时，蒙古高原上的回鹘汗国败亡，唐政府乃在会昌三年（公元八四三年）下令没收摩尼寺全部财产，据《僧史略》载：“会昌三年，敕天下摩尼寺并废入官，京城女摩尼七十二人死。及此国（指唐朝）、回纥诸摩尼等，配流诸道，死者大半。”在日本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里，也记载：“会昌三年四月中旬，敕天下杀摩尼师，剃发令著袈裟，作沙门形而杀之。”摩尼教经此沉重打击，便转入地下了。

摩尼教虽遭政府严令禁断，但由於摩尼教徒平日生活朴素，不茹荤，不饮酒，死后裸葬等等，以及提倡同教人相亲相恤，互助互作，并主张在中际向黑暗作斗争，争取光明，因此这个教派有一定程度的战斗性格，容易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后梁贞明六年（公元九二二年），陈州末尼（摩尼之异译）党类，立母乙为天子，累讨未平，及贞明中，诛斩方尽”（《僧史略》）。后来民间称摩尼教为吃菜事魔，或称之为明教，宋代的方腊，据说就是吃菜事魔，元末的红巾大起义，也以明教为号召，都和摩尼教有密切的关系。

祆教、景教、摩尼教，所谓三夷教，摩尼教由於回鹘汗国败亡，在会昌三年（公元八四三年）最先下令废除；到了会昌五年（公元八四五年），祆教、景教也和佛教同时废除。在《旧唐书·武宗纪》毁佛寺制中称：“其大秦（景教）、穆护等祠，释教既已厘革，邪法不可独存”，“勒大秦、穆护、祆二千余人还俗”，“递归本贯充税户，如外国人，送还本处收管”。三夷教受此打击，除了摩尼教转入地下，和中土佛道诸教派融合，经过中国化过程，在人民群众间广泛深入传播以外，祆教还有活动，景教已经若存若亡了。

关于伊斯兰教，唐王朝虽和大食帝国有了频繁的接触，但是在唐代，没有传入伊斯兰教的明确记载。唐玄宗天宝中，怛逻斯一役，被大食生俘的杜环，曾到达苦法，回国后著《经行记》，称伊斯兰教为大食法，这是中土著述中谈述伊斯兰教的最早记载。

杜环在《经行记》里说：“其大食王（哈利发）号暮门，……有礼堂容数万人，每七日，王出礼拜，登高座，为众说法。曰：“人生甚难，天道不易，奸非劫窃，细行谩言，安己危人，欺贫虐贱，有一於此，罪莫大焉。凡有征战，为敌所戮，必得生天；杀其敌人，获福无量。”率土稟化，从之如流。法唯从宽，葬唯从俭”（《通典·边防典》大食国注）。“其大食法者，以弟子亲戚而作判典，纵有微过，不至相累。不食猪狗驴马等肉，不拜国王父母之尊，大信鬼神，祀天而已。其俗每七日一假，不买卖、不出纳”（《通典·边防典》大秦国注）。也可以说是介绍大食法的最早报导了。

**唐前期的反佛斗争** 佛教的传入中国，它的彻底宗教神学唯心主义和大力宣扬迷信的轮回教义，是麻醉群众的鸦片烟；它的宣传慈悲、忍辱、不抵抗，充满着缓和阶级矛盾的实质，企图解除人民在思想上对统治阶级的反抗。这样，就可以断定说，佛教的传播，对统治阶级巩固封建统治是极为有利的；而对于人民群众则是非常不利的。尽管佛教神学思想，五花八门，毒害中国很深，但是悠久的中国民族文化，对佛教仍具有一定的免疫力量。这种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曾和各式各样的宗教神学，包括佛教在内，进行过斗争。这一斗争的直接结果，揭露了佛教对人民的危害实质，使佛教的麻醉作用，受到限制。其间接结果，由於佛教不能完全统治世俗，像欧洲中世纪罗马教廷一样，不得不更靠拢统治政权，这样，宗教为了适应世俗的要求，不得不转向世俗化的一途。所以禅宗的南宗，尽管它口头上怎样偏激，而在实际行动中，却完全得和世俗生活一致起来的那种宗教教派了。

隋朝全盛时，有僧尼二十三万六千二百人。唐武德四年（公元六二一年），人口锐减，全国二百多万户，尚有僧尼二十万人。因此唐代初年，就有不少人主张废除佛教。

傅奕（公元五五五至六三九年），相州邺（今河南安阳市北）人。精於天文历数之学，唐初任为太史令。他在唐高祖武德七年（公元六二四年），上书请废除佛教。奏疏里说：佛教“以三涂、六道（轮回学说），吓愚欺庸，追既往之罪，窥将来之福。……且生死寿夭，本诸自然，刑德威福，系之人主。今其徒矫托，皆云由佛，攘天理，窃主权”（《新唐书·傅奕传》），因此主张禁绝。唐高祖也厌恶僧、道，“苟避徵徭，不守戒律”（《资治通鉴》唐武德九年），故在武德九年（公元六二六年）四月，下诏沙汰僧、尼、道士、女冠（女道士），京师只准保留寺院三所。可是还没有执行，玄武门事变发生，被迫退位，唐太宗因为自己新取得政权，力求把局面稳定下来，所以就把汰僧道的事搁置下来了。傅奕一生反佛，他还搜集魏晋以来反佛的

议论加以整理，辑成《高识篇》一书，公诸於世。使佛教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受到一定打击。

吕才（公元六六五年），博州清平（今山东高唐县西南）人。太宗、高宗世，历官太学博士、太常丞、太子司更大夫等职。吕才学问渊博，著述甚多，在历史著作方面，他著有《隋记》二十卷，在药物学方面，他曾参与《本草》的修订工作，在历算方面，他著有《刻漏经》一卷，在类书的编纂方面，他曾预修《文思博要》，在氏族志研究方面，他又参加《姓氏录》的编撰工作，此外他又精於乐律，可惜他的著作，没有全部流传下来。唐贞观十五年（公元六四一年），他受诏刊正《阴阳书》，合成百卷。这是一部御撰性质的著作，首先在有命运支配，有骨相可凭藉，有风水迷信可倚赖等等前提之下来加以整理的书籍。可是吕才替这部书写《叙宅经》、《叙禄命》、《叙葬书》三篇序文时，在序文中无情地驳斥了命相风水迷信之说，非常鲜明地显示出他那种唯物倾向的战斗性格来。当贞观十九年（公元六四五年），玄奘自五天竺取经归来，一时举国若狂，盲目地崇拜这位唯识哲学大师。当时玄奘宣译《因明论》以后，他的门徒神泰、靖迈、明觉三家还各记师说，写成《因明论义疏》。吕才非常冷静地研究了对方的一些论点，结果发现他们的一套学说并其方法论，完全是唯心主义和诡辩逻辑，同时神泰等三家的《义疏》，内容又互相抵牾，并不一致。於是吕才著《因明注解立破义图》，分上中下三卷，共四十余条，公开揭穿唯识哲学的一套诡辩说法。这一论战展开以后，玄奘躲在幕后，不敢出头露面，任他门徒去应战，最后他的门徒还是采用拖延、搪塞的手法，把一场争论以不了了之的方法拖过去了。可惜吕才的唯物主义思想倾向，没有详细地记述下来，我们无法充分加以介绍，但从吕才“以实际为大觉玄躯，无为是调御法体”这两句的意义来领会，我们认为吕才是主张客观世界是真实地存在着的，“无为”作为修养手段来处理，他认为是可以的，但不能用来说明客观世界的不真实性。由此可见，这一场论战，虽然是文献不足，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一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不同思想的论争。吕才在唐初，不失其为站在唯物主义反佛前哨的一位战士。

在武则天、唐中宗时期，佛教寺院数目有了增加，僧尼人数也日见增多。唐睿宗景云二年（公元七一一年），左拾遗辛替否上疏谏修立塔宇。他在谏疏中提到：“佛教东传”，“千帝百王，饰弥盛而国弥空，信弥重而祸愈大”。“何者？有道之长，无道之短，岂因其穷金玉，修塔庙，方见享祚乎？”“当今出财依势者，尽度为沙弥，避役奸讹者，尽度为沙弥，其所未度，唯贫人与善人耳”。“将何以租赋乎？将何以力役乎？臣以为出家者，舍尘俗，离朋党，无私爱。今殖货营生，仗亲树党，畜妻养子，是致人以毁道，非广道以求人。今天下佛寺，盖无其数，一寺堂殿，倍陛下一宫，壮丽甚矣，用度过矣。是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其七八，陛下何有之矣？百姓何食之矣？臣窃痛之”（《唐会要》卷四十八）。

唐玄宗开元二年（公元七一四年），当时的宰相姚崇也认为过去度僧度得太滥了，以致“富户强丁，皆经营避役，远近充满，损污精蓝”（《唐会要》卷四十七）。唐玄宗接受他的意见，命官吏对僧尼加以简择，一时伪滥还俗的僧尼，有三万余人之多。辛替否和姚崇的反佛，也都是站在统治阶级的利害立场上来进行的，但在当时佛教气氛那么浓郁笼罩着全国思想界的时候，只要能提出反佛的喊声，就应该加以肯定的了。中唐之后，反佛的任务，

还是非常迫切的，韩愈可算是当时反佛的主将，他提出了儒家道统这个新概念，来完成反佛这一历史任务。我们下面还要叙述到他，在这里就不详细地讲他了。

**会昌灭佛与佛教的重兴** 从唐统治政权的长远利益来讲，一方面想利用佛教起着麻醉人民，巩固统治的作用；一方面又怕佛教寺院经济的过度发展，分割了两税户口，剥夺了天下大半财富。为了防止私度僧尼，唐王室还规定剃度僧尼，得由祠部司出给度牒，有了度牒（僧尼证明书），才算正式僧尼。安禄山举兵后，唐宰相杨国忠“使御史崔众於河东纳钱度僧尼道士，旬日间出钱百万”（《旧唐书·食货志》）。从此政府公开出卖度牒，在唐代宗时期，禅宗慧能的弟子神会曾在洛阳出卖度牒，“所获财帛，顿支军费”（《宋高僧传·习禅篇·唐洛京荷泽寺神会传》），可见度牒的出卖，已成为唐政府的经费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了。但是尽管通过给与度牒的制度，始准出家，出家的僧尼人数，还是很可观。唐敬宗世（公元八二五至八二六年），徐州节度使王智兴“给言天子诞月，请筑坛度人以资福。”下诏报可。王智兴“即显募江淮间，民皆曹辈奔走，因牟擷其财（出卖度牒）以自入。”浙西（治润州，今江苏镇江市）观察使李德裕劾奏“智兴为坛泗州，募愿度者人输二千，则……普加髡落。自淮而西，户三丁男，必一男剔发，规影徭赋，所度无算。臣阅度江者日数百。……若不加禁遏，则前至诞月，江淮失丁男六十万，不为细变”（《新唐书·李德裕传》）。唐政府听取了李德裕的奏言，才下诏徐州禁止度僧。

唐武宗会昌三年（公元八四三年），泽潞节度使（亦称昭义节度使，治潞州，今山西长治市）刘从谏死，其弟子刘稹自称留后，求继位为节度使，朝廷不许，乃对泽潞用兵，当时唐王朝军费支绌，而关中、河东等地，又连年蝗虫为灾，这样，冲击佛教寺宇，没收僧尼财富，就成为当时可行的一途了。唐武宗本来就倾向道士，欢喜道士们为他炮制金丹，以求升仙。道士赵归真等也乘这个机会，攻击僧尼。会昌二年（公元八四二年）十月九日，敕下：“天下所有僧尼，解烧练咒术禁气，有军身上仗痕鸟文杂工功，曾犯刑养妻，不修戒行者，并勒还俗。若僧尼有钱物及谷斗田地庄园，收纳官。如惜钱财，情愿还俗者，亦任勒还俗，充入两税徭役。”“所畜奴婢，僧许留奴一人，尼许留婢二人，余各任本家收管。如无家者，官为货卖……余外资财，收贮待后敕处分。”会昌三年（公元八四三年）正月，长安“左街还俗僧尼共一千二百卅二人，右街还俗僧尼共二千二百五十九人。”“三月敕下云：代州五台山及泗州普光王寺，终南山五台、凤翔府法门寺……并不许置供及巡礼等。如有人送一钱者，脊杖二十；如有僧尼等在前件处受一钱者，脊杖二十；诸道州县应有送供人者，当处捉获，脊杖二十。因此四处灵境，绝人往来，无人送供。”“又敕下令毁拆天下山房、兰若、普通佛堂、义井村邑斋堂等，未满二百间不入寺额者，其僧尼等尽勒还俗，充入[两税]免役，具令分析闻奏。”又“敕令天下小寺，经、佛般入大寺，钟送道士观，其破拆寺僧尼粗行不依戒行者，不论老少，尽勒还俗，递入本贯，充入色役。”“会昌五年（公元八三五年），又敕下天下寺舍，不许置园庄。又令敕检天下寺舍，奴婢多少，兼钱物斛斗匹段，一一诣实具录令同奏。”“又敕令诸寺僧尼年四十已下，尽勒还俗，递归本贯。”“见说功德使条流僧尼还俗之事，商议次第，且令三十以下还讫，次令五十已下还俗，次令五十已上无祠部牒者还俗，第三番令祠部牒磨勘差殊者还俗，最后令祠部牒不差谬者尽令

还俗。”“又帖诸令，牒云，如有僧尼不伏还俗者，科违敕罪，当时决煞者”（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这一次灭佛的结果，据《资治通鉴》唐武宗会昌五年八月壬午载：“诏陈释教之弊，宣告中外。凡天下所毁寺四千六百余区，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五千人，大秦穆护袄僧二千余人，毁招提、兰若（官赐为寺，私造为招提兰若）四万余区。收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成绩是辉煌的。唐王朝就是在没收这许多财富中，消灭了企图割据泽潞的刘稹。

才灭佛不久，会昌六年（公元八四六年）的三月，武宗以服金丹过量，中毒而死，武宗叔父唐宣宗李忱即皇帝位。唐宣宗是崇信禅宗南宗宗教神学思想的佛教徒，为了缓和统治阶级内部僧俗之间的矛盾，又准许设置寺院，并允许有些大寺设置戒坛，剃度僧尼，不过“所度僧尼，仍令祠部给牒。”还是采用度牒的制度，控制全国僧尼人数的发展。

佛教史上有所谓“三武之厄”，是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佛和北周武帝宇文邕的灭佛以及唐武宗灭佛而言的。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灭佛，范围只局限在淮、汉以北，而唐武宗的灭佛，影响遍及江南、岭南。只有陇山以西，当时为吐蕃占领，因此如敦煌莫高窟等地区的寺院经济，就没有受到它的打击。另外，如河北三镇，当时对唐王朝保持一种半独立状态，成德节度（领恒、定、易、赵、深、冀等州，治恒州真定，今河北正定县）、魏博节度（领魏、博、贝、瀛、沧、相、洛、卫、澶等州，治魏州贵乡，今河北大名县东北）、幽州节度（领幽、蓟、平、檀、妫等州，治幽州蓟县，今北京城西南）。这所谓河北三镇，它不接受唐中央政府的意旨，不灭佛，“不拆舍，不条流僧尼。佛法之事，一切不动之”（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所以会昌灭佛，并没有波及到河北三镇。

会昌灭佛的时候，“五台山僧多亡奔幽州，[宰相]李德裕召[幽州]进奏官曰：‘汝趣白本使，五台僧为将必不如幽州将，为卒必不如幽州卒，何为虚取容纳之名，染於人口，独不见近日刘从谏招聚无算间人，竟有何益！’[幽州节度使]张仲武乃封二刀付居庸关曰：‘有游僧入境则斩之’”（《资治通鉴》唐会昌五年）。

会昌灭佛，时间虽是不到一年就让佛教恢复活动了，可是对佛教寺院经济，打击还是很严重的，佛教的经典，散失也是非常严重的，天台宗和华严宗的著作，损失了不少，有些中土已经失传，只能从新罗、日本去转抄过来；只有禅宗，它是不讲究译经和从事著述的，因此没有受到多大破坏，相反会昌灭佛以后，中土诸教派都受到这个打击而消沉下去了，独有禅宗反而因为迎合新兴庶族地主的要求，更加发展起来了。

**韩愈的排抑佛道与独尊儒术** 韩愈，另有介绍。韩愈在哲学史方面的地位，就是排抑佛、道，建立儒家的道统。

韩愈认为儒家中心思想，就是仁、义、道、德四个字。他在《原道》一文里说：“博爱之谓仁，仁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至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於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是儒家思想固有的内容），道与德为虚名”（三家都有道德，但三家表现的形式又各各不同）。儒家有儒家的道德标准，佛、道有佛、道的道德标准。“老子之所谓道德者，去仁与义言之也”，即佛、道的道德标准和儒家不同的地方，就是把仁、义的内容抽去罢了。韩愈说，儒家的经典著作，“其文《诗》、《书》、《易》、《春秋》”；儒家的统治手段，“其法礼、乐、刑、政”；儒家的职业分工，“其民士、农、工、

贾”；儒家的社会构成关系，“其法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儒家自有儒家的“道”，“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者所谓老与佛之道也”。这个道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况]与扬[雄]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韩把孟轲推到和孔子并列的地位，这是在韩愈以前所没有的。

唐初陆德明著《经典释文》，经典的次第是《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孝经》、《论语》、《老子》、《庄子》、《尔雅》。就是说在官学里，《孟子》和《荀子》、扬雄《法言》之类，是子类，而不列入经类，经过韩愈提倡，后来就把《孟子》也列入经类了。从此孔孟并称，这在经学史上是一个重大的改变。韩愈还在《读荀》篇里这样说：“始吾读孟轲书，然后知孔子之道尊，圣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为孔子之徒没，尊圣人者，孟子而已。……周之衰……六经与百家说错杂，然大儒犹在。火於秦，黄老於汉。其存而醇者，孟轲氏而止耳。……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新唐书·韩愈传》赞：“至贞元、元和间，愈遂以六经之文，为诸儒倡，障隄未流，……然愈之才……当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其道盖自比孟轲，以荀况、扬雄为未淳，宁不信然……昔孟轲拒杨、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佛道）乃去千余岁，拨衰反正，功与齐而力倍之，所以过况、雄为不少矣。自愈没，其言大行，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韩愈把孟轲提出来，直接继承孔子，他自己又继承了孟轲，构成了儒家的道统，以与佛、道争一日之长。儒家的势力，本来很雄厚，但是没有人站出来敢和佛、道明辨是非，韩愈把孟轲推出来，自己也挺身而出，建立了儒家的道统，这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个了不起的行动。

韩愈在《原道》里又说：“周道衰，孔子没，火於秦，黄老於汉，佛於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於老，则入於佛……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吾师亦尝云尔。”儒者在传统习惯势力的压力之下，也居然承认了佛道的说法，和他们和平共处，韩愈是大不谓然的，那么应该采用什么态度来对付佛道呢？韩愈主张：“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僧道返俗），火其书，庐其居”（把寺观改为民居）。

韩愈在对待个别僧侣问题上，也一些不让步，应该说的，他就直言不讳。他在《送浮屠文畅师序》里说，“浮屠师文畅好文章”，做了诗累百余篇，柳宗元替他作了序，可是柳宗元还是举浮屠之说来赠送他。韩愈认为“文畅，浮屠也。如欲闻浮屠之说，当自就其师而问之，何故谒吾徒而来请也”。如果向我们请益，我们应当“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不当又为浮屠之说而读告之也”。韩愈主张利用一切机会，对僧侣、道士介绍儒家学说，动员他们返俗，如果用浮屠之言、神仙之说来和他们相应酬，等於是向他们缴械投降。

韩愈在《送灵师》诗里说到：

佛法入中国，尔来六百年。齐民逃赋役，高士著幽禅。官吏不之制，纷纷听其然。耕桑日失隶，朝署时遣贤。（下略）在《送惠师》诗也说：

吾非西方教，怜子狂直醇。吾嫉惰游者，怜子愚且醇。去矣各异趣，何为浪沾巾。在《谢自然诗》里，他提到“果州南充县，寒女谢自然。童騃无

所识，但闻学神仙……一朝坐空室，云雾生其间……须臾自轻举，飘若空中烟。”韩愈根本不信这些，认为“人生有常理，男女各有伦。寒衣及饥食，在纺绩耕耘。下以保子孙，上以奉君亲。苟异於此道，皆为弃其身。”韩愈在《谁氏子》一诗里也说：

非痴非狂谁家子，去入王屋称道士。白头老母遮门啼，挽断衫袖留不止。翠眉新妇年二十；载送还家哭穿市。或云欲学吹凤笙，所慕灵妃媲萧史。又云时俗轻寻常，力行险怪取贵仕。神仙虽然有传说，知者尽知其妄矣。圣君贤相安可欺，乾死穷山竟何俟。呜乎予心诚岂弟，愿往教诲究终始。罚一劝百政之经，不从而诛未晚耳。谁其友亲能哀怜，写吾此诗持送似。无论对僧侣、道士，求法、学仙，韩愈对他们都是持反对态度的。

当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八一九年），从凤翔法门寺迎佛骨入禁中，韩愈上《论佛骨表》，加以规谏。

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汉明帝时，始有佛法……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今闻陛下下令群僧迎佛骨於凤翔，御楼以观，舁入大内……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岂宜令入宫禁……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表上，宪宗大怒，贬愈为潮州刺史。但是韩愈排抑僧道的态度，并没有因为遭到这次打击而有所改变。

韩愈的“性三品”说，这里也有一提之必要。韩愈在《原性》篇里说：“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荀况）之言性曰：‘人之性恶。’扬子（扬雄）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恶混。’”韩愈认为“上之性亲学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则孔子所谓‘不移’者也”。韩愈还是继承了儒家“上知与下愚不移”这说法，并没有在董仲舒性三品说方面更进一步。

韩愈在提出性三品之后，也提到“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惧，曰爱，曰恶，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动而处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无]亡与甚，直情而行者也”（《原性》）。就是说，情的具体内容是喜、怒、哀、惧、爱、恶、欲。和性三品相应，韩愈认为情也有三品。上品的情，是动而得中；中品的情，有过，有不及，力求动得其中；下品的情则是任情而行，任它泛滥而不加节制。韩愈把性三品和情三品配合起来，上品的性，则发为上品的情，下品的性，则发为下品的情。韩愈关于性、情互相联系的学说，有它的针对性的。佛教的理论，宣扬它灭情以见性的出世观点，教人逃避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认为这些关系，都是为情所累、影响见性成佛。韩愈则站在儒家的立场，认为恰恰相反，只有在君臣、父子、夫妇诸伦理关系中，才体现出平日的道德修养，才能使“情动而处其中”，因情以见性。这个理论，经后来宋儒的发挥，提出了气质之性，天理人欲之说，在它的理论基础上，更进展了一步。

李翱，字习之，陇西郡望。以进士擢第。元和初，为国子博士，史馆修撰。再迁朗州刺史，召为礼部郎中，又出为庐州刺史。入为谏议大夫、知制诰，改中书舍人。后历官桂管湖南观察使、山南东道节度使，病卒。翱始娶

韩愈从兄韩弇女为妻，又从韩愈学为文章，“辞致浑厚，见推当时。故有司亦谥曰文”（《新唐书·李翱传》）。

李翱响应韩愈，特别吹捧孟子，他说：“我友韩愈，非兹世之文，古之文也；非兹世之人，古之人也。其词与其意适，则孟轲既没亦不见有过於斯者”（《与陆惨书》）。韩愈、李翱共同注解《论语》，为《论语笔解》两卷，共同推崇孟轲，而且李翱又特别推崇《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到了宋明，儒家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尊为《四书》，实际是受着韩愈、李翱道统思想的影响。

李翱讲性、情之说，和韩愈也不完全一样，他不像韩愈那样强调性三品，他和孟轲主张性善学说有些相近。李翱在《复性书》里说：“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皆情之所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过也，七者循环而交来，故性不能充也。……情不作，性斯充矣。”李翱主张性善，这一点和佛教的“人人皆有佛性”，倒很相近。“性”本来是善的；干扰性的，是情。他又说：“百姓之性与圣人之性弗差也。”“桀纣之性，犹尧舜之心也。其（指桀纣）所以不睹其性，嗜欲好恶之昏也，非性之罪也。”曰：“为不善者非性邪？”曰：“非也。乃情所为也。情有善有不善，而性无不善焉。”“问曰：‘人之性犹圣人之性，嗜欲爱憎之心何因而生也？’曰：‘情者，妄也，邪也，邪与妄则无因矣。妄情灭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虚（上下四方），所以谓之能复其性也。’问曰：‘人之性本皆善，而邪情昏焉，敢问圣人之性将复为嗜欲所浑乎？’曰：‘不复浑矣……圣人既复其性矣，知情之为邪，邪既为明所觉矣，觉则无邪，邪无由生也？’”

李翱还举了几个例子，《易·系辞》曰：“颜氏之子（颜渊），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孟轲曰：“我四十不动心。”《大学》曰：“致知在格物。”《中庸》曰：“诚则明矣。”他认为这几句话是复性的最好内容，李翱的哲学思想，对后来宋代儒家理学思想的形成，也起了一定的影响。

唐懿宗咸通中（公元八六至八七三年），皮日休上书，其一“请以《孟子》为学科”，“请废《庄》、《列》之书，以《孟子》为主。”其二“请以韩愈配飨太学”（见《北梦言》，其详细内容见《皮子文藪》卷九《请孟子为学科书》及《请韩文公配飨太学书》两文，文长不录）。可见韩愈的推重孟轲，在士大夫间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毋怪到了北宋神宗之世，考试的科目，已经《论语》、《孟子》并列，孟子的书，已经从子部提升到经部的地位了。到元文宗时，且尊孟子为“亚圣”了。

柳宗元的《封建论》、《天说》与刘禹锡的《天论》 柳宗元，另有介绍。他的代表作为《封建论》、《天说》。现先讲《封建论》。

柳宗元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是有着客观必然趋势——“势”来支配的。柳宗元在《封建论》里说，人类最初生活在“草木榛榛，鹿豕狉狉”的环境里，“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气力比猛兽小，也斗不过猛兽。但是人能够合“群”，人能够创造出工具，终于人战胜了他们。群与群之间，引起纷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知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也就是国家的起源，是由於群与群之间互相争夺的结果。争夺的规模愈来愈大，“於是有诸侯之列”，“於是有方伯、连帅之类”，“而后有天子”，“然后天下会於一”。所以他最后归结，“封建，非圣人意也，

势也”。不是英雄创造时势，而是时势产生了英雄，他所提出重“势”的历史进化观点，还是有可以肯定的地方的。

柳宗元认为制度的变革，都取决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势。商伐桀，“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武王伐纣，“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因为商依靠三千诸侯的归附来代夏，周依靠八百诸侯的归附来代商，当然动摇诸侯们不得，所以说，“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春秋战国之后，“判为十二，合为七国”，最后秦统一了天下。

秦并天下，罢侯置守，但是“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秦之失，“失在於政，不在於制”。在秦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治，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难道政治酷暴到这种程度，而能不亡吗！汉“矫秦之枉”，“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最后酿成吴楚七国之变。然而当时“郡邑居半，时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到了中叶以后，藩镇跋扈，其“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只要解决藩镇拥兵的问题，危机是能解决的，“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柳宗元肯定了郡县制，认为郡县制的优点很多，郡县的长吏，由皇帝委派，“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解决当时的藩镇割据，应该解决方镇握兵的问题，不当动摇郡县制度。柳宗元主张顺应客观的形势，反对保守倒退，主张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从历史发展方向来看《封建论》，它具有积极的进步的倾向。

《天说》是柳宗元和韩愈讨论天有无意志的文章，韩愈认为“人之坏元气阴阳也亦滋甚：垦原田，伐山林，凿泉以井饮，窳墓以送死，而又穴为偃溲，筑为墙垣城郭台榭观游，疏为川渎沟洫陂池，燧木以燔，革金以熔，陶甄琢磨，恻然使天地万物不得其情，幸幸冲冲，攻残败挠而未尝息”。“吾意有能残斯人使日薄岁削，祸元气阴阳者滋少，是则有功於天地者也”。“今夫人举不能知天，故为是呼且怨也。吾意天闻其呼且怨，则有功者受赏必大矣，其祸焉者受罚亦大矣”。韩愈认为“天”是有意志的人格神，能够赏善罚恶。如果人类不侵害自然界，就是“有功於天地”，将会获得上天的赏赐；不利於天的，将受到上天的惩罚。人类处于困难的境遇，也不应向天呼号。

柳宗元批驳了韩愈的看法，指出“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这些自然现象，和果蔬、草木等自然物没有本质的区别。既然虫子吃蔬果，蔬果不会表示怨恨，人类猎取自然界的财富，自然界也不会惩罚人类，“其乌能赏功而罚祸乎？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谬矣”。驳斥了上天有意志和上天能赏善罚恶的论调。

柳宗元在《与刘禹锡天论书》中，指出了刘禹锡《天论》中某些弱点，认为蔬果所以成为蔬果，并不是为了给虫子吃；天的生殖万物，也不是为人类打算。天不仅生殖万物，也会使万物遭到灾荒；人类社会不仅出现法制，也出现了悖乱。“生殖与灾荒，皆天也；法制与悖乱，皆人也”。即认为自然界的现象和社会的治乱，都各有各的规律，不应该把他们混淆起来。

刘禹锡，另有介绍。他著《天论》三篇。在《天论》上篇中，他说道：“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于昭昭者，则曰：‘天与人实影响，祸必以罪降，福必以善徠，穷厄而呼必可闻，隐痛而祈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这是阴鹭之说。另外一种“泥于冥冥者，则曰：‘天与人实相异，霆震于畜、

木，未尝在罪；春滋乎堇、荼，未尝择善。跖、蹀焉而遂，孔、颜焉而厄，是茫乎无有宰者。’”这是自然之说。刘禹锡进而解释为什麼会产生这两种不同的看法呢？他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的说法，认为“天之道在生殖”，即自然界的职能在于生殖万物；“人之道在法制”，人类社会的职能在于讲是非法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各有自己所遵循的法则，不能互相干预。他还指出：“法大行，则是为公是，非为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赏，违善必罚。……故其人曰：‘天何预乃人事邪！……福兮可以善取，祸兮可以恶召，奚预乎天邪！’法小弛，则是非驳，赏不必尽善，罚不必尽恶。……故其人曰：‘彼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当然而固然，岂理邪？天也。福或可以诈取，而祸或可以苟免。’人道驳，故天命之说亦驳焉。法大弛，则是非易位，赏恒在佞，而罚恒在直，……人之能胜天之实尽丧矣。”他指出赏罚是非，是人类社会的问题，自然是不能干预的。他还指出“法大行”，是非公道，赏罚分明，人们不会追求天命。“法大弛”，是非混淆，赏罚不明，人们才祈求天命，徼幸赐福。刘禹锡企图从社会治乱的角度来说明天命迷信产生的认识根源。

在《天论》中篇中，刘禹锡又从人能否掌握自然规律和自己命运的角度，说明天命信仰产生的认识根源。他认为人如果明白了事物的理，就不会讲天命了；如果不明白事物的理，那末就没有不讲天命的。他举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在风平浪静的淮、淄、伊、洛小河里行舟，“疾徐存乎人，次舍存乎人”，行舟的规律，是人所能掌握的，因此，“舟中之人未尝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也”。但是如果在江、汉、淮、海大江大海中行舟，人就不能控制行舟的安全，这时，“舟中之人未尝有不言天者，何哉？理昧故也”。因此也就是说，在不认识事物的规律、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情况下，就会产生有神论，迷信天命。

刘禹锡还提出了天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论点。即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各有各各自的特殊规律，它们之间有着既是互相区别又互相作用的辩证关系。自然界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这种观点含有人定胜天的因素。

在《天论》下篇中，刘禹锡提出了带有唯物主义倾向的自然观。他认为“山川五行”是天地万物的根本，天地相互作用，产生了风雨、动植物以及人类等各种自然现象，而人是万物中最有智慧的，所以能与天交胜，能利用自然的资源，从事社会生活，所谓人，“倮虫之长，为智最大，能执人理，与天交胜，用天之利，立人之纪”。创造世界的是人，而决不是上帝。

柳宗元和刘禹锡的学说，对当时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的发展，有重大的贡献。但是他们两人对当时佛教迷信思想，却采取了容忍态度。在当时思想斗争的主要战线上主攻方向不明确，这就大大削弱了他们唯物主义思想和无神论思想的战斗性格。

[一]参考汤用彤氏《论中国佛教无十宗》一文，载《哲学研究》一九六二年第三期。

[二]《人天眼目》卷五：王荆公（王安石）问佛慧禅师云：“禅家所谓世尊拈花，出在何典？”泉云：“藏经亦不载。”荆公云：“予顷在翰苑，偶见《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三卷，因阅之，经文所载甚详。‘梵王至灵山，以金色波罗花献佛，舍身为床座，请佛为众生说法。世尊登座拈花示众，人天百万，悉皆罔措，独有金色头陀，破颜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分付摩诃大迦叶。’”“此经多谈帝王事佛请问，所以

秘藏，世无闻者。”

[三]参考杨向奎教授著《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上册。

[四]参考陈垣氏《火祆教入中国考》，载北京大学《国学季刊》，一九二三年第一卷第一号。

[五]参考张星烺氏《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

[六]按拂多诞，非人名，乃波斯语 Jur sfadan 即知教义者之译音。

又按大正藏卷五十四外教部《波斯教残经》，近人以为是景教经典，误。残经中多次提到“慕闍”和“拂多诞”等称呼，这是中土指摩尼教传教师的名称，残经中又有二宗的名词，由此可以断定是摩尼教的经典。

[七]参考陈垣氏《摩尼教入中国考》，载北京大学《国学季刊》，一九二三年第一卷第二号，以及法人沙畹著《摩尼教流行中国考》(冯承钧氏译)。

## 第十章 隋唐五代的文学艺术与科学技术

### 第一节 隋唐五代的诗歌与民间文学

隋代诗人 隋以前的诗坛，在江南影响较大的是徐陵，在关中影响较大的是庾信。尤其是自江南入北的庾信，他实际是融合南北文风的一个重要人物，下开隋唐诗坛的新风气，连唐代的李白、杜甫，都受到他深刻的影响。因为他的主要写作活动，都在梁、西魏、北周，我在拙著《魏晋南北朝史》里已经讲到，所以这里就不再多讲了。

隋炀帝也好，唐太宗也好，一个是失败的皇帝，一个是有成就的皇帝，但他们的诗格文风，却很相近，还是含有齐梁余韵，并不像曹操一样，开创新风格，成为建安文坛的主将。

在隋代，宰相杨素，他的五言乐府《出塞》诗，也和他的为人一样，有几分霸气。《出塞》诗云：

汉虏未和亲，忧国不忧身。握手河梁上，穷涯北海滨。据鞍独怀古，慷慨感良臣。历览多旧迹，风日惨愁人。荒塞空千里，孤城绝四邻。树寒偏易古，草衰恒不春。交河明月夜，阴山苦雾辰。雁飞南入汉，水流西咽秦。风霜久行役，河朔备艰辛。薄暮边声起，空飞胡骑尘。

诗的境界，比起齐梁诗体来，已经比较健康明朗，节奏也比前响亮多了。

薛道衡，也是隋代著名的诗人，他除了和杨素《出塞》诗以外，还有乐府《昔昔盐》，也是著名一时的诗篇。

垂柳覆金隄，靡芜叶复齐。水溢芙蓉沼，花飞桃李蹊。采桑秦氏女，织锦窦家妻。关山别荡子，风月守空闺。恒敛千金笑，长垂双玉啼。盘龙随镜隐，彩凤逐帷低。飞魂同夜鹊，倦寝忆晨鸡。暗牖悬珠网，空梁落燕泥。前年过代北，今岁往辽西。一去无消息，那能惜马蹄。

这首乐府诗，在齐梁体风格上发展了一步，境界比前有了扩大，情致也比较健康。其中“空梁落燕泥”之句，且传诵一时，据说隋炀帝后来杀害薛道衡，罪状是薛道衡上《文皇帝颂》（隋文帝颂），借古讽今；但还有附带一条罪状，是“还能作空梁落燕泥否？”《隋唐嘉话》还有一则故事，说到“薛道衡聘陈，为人曰诗云：‘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谁谓此虏（南朝呼北朝人为虏）解作诗。’及云：‘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无虚士。’”

唐代诗歌繁荣的原因 唐代诗歌，比之南北朝，又有了很大的发展。当清乾隆四十六年（公元一七八一年），在明人胡震亨的《唐音统签》和清人季振宜的《唐诗》基础上，编成《全唐诗》的时候，共收录唐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作者凡二千二百余人，总九百卷。可以说唐代是中国文学史上诗歌的黄金时代。

唐代诗歌繁荣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唐代的封建经济，有着高度的发展，经济基地也随着扩展，这就成为唐代诗歌繁荣的物质基础。

第二，阶级斗争贯串着整个唐王朝时期，尤其从武则天时代起，由于均田制已日趋崩溃，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唐开元天宝以后，这个矛盾一天比一天地在发展，这种斗争的现实内容，丰富并充实了唐代的文学内容。所以从武则天时代的陈子昂起，就有改革诗风使它具有社会现实内容的要求，到了

杜甫、白居易、王建、张籍等人的作品，都具有社会内容，便成为当时诗坛的主流了。

第三，统一强盛的唐王朝，版图辽阔，经济基地扩大，国内各族，国外各国，友好往来频繁，岭南、塞北，诗人的活动范围大大地扩大了，这样，也扩大了诗人的视野，丰富了诗人的创作生活。

第四，唐王朝设进士科，以诗赋取士，于是诗歌一门，便成为当时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必修科目。他们从幼年时代起，就精熟《文选》，在诗赋方面用功，作为他们此后爬上政治舞台的必需经过的阶梯。同时，这一科举取士制度，对打破魏晋以来门阀制度的九品中正旧传统，也起了一定作用。不但世家大族开始从事科举，在仕途上取得高位；就是一般的庶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也拚命在科举方面，获得发展机会。在文学创作方面，由于科举制的抬头，对魏晋以来的传统贵族文学文风学风多少起了一种改变的影响。

初唐诗人 初唐诗人如虞世南、褚亮等，他们的诗体，基本上沿袭齐梁余习，尚未达到庾信的境界，只有魏徵的代表作《出关》和王绩的《野望》，无论在形式上，内容上，已经开始挣脱齐梁余习，给人以一种清新的感觉。魏徵《出关》诗云：

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杖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请缨系南越，凭轼下东藩。郁纆陟高岫，出没望平原。古木鸣寒鸟，空山啼夜猿。既伤千里目，还惊九折魂。岂不惮艰险，深怀国士恩。季布无二诺，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气，功名复谁论。

魏徵诗的境界，确实要比南北朝开阔多了。

王绩，字无功，文中子王通之弟，著书东皋，自号东皋子。他的诗，格律完整，已经摆脱齐梁习气，具有唐代诗歌的新风格。他的代表作，如：

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野望》）

初唐诗人的代表人物，是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人。王勃是文中子王通的孙子，王绩的侄孙。勃早岁及第，为沛王（唐高宗子章怀太子李贤初封沛王）府修撰，时诸王好斗鸡，勃戏造《檄英王（唐中宗初封英王）鸡文》，唐高宗看到，认为王勃挑拨兄弟间关系，废斥不用。勃父福时亦因王勃故，左迁交趾令。王勃往交趾省父，坠海死，年二十八。杨炯，官盈川（今浙江衢县南）令。卢照邻，为新都（今四川新都县）县尉，后得麻风病，去官，自投颖水死，年四十。骆宾王，武则天时，为临海郡（治临海，今浙江临海县）丞。参加了徐敬业反武则天的起兵，兵败逃亡，不知所终。他们都是唐高宗、武则天时期的著名诗人，但都遭遇到悲惨的命运。

王、杨、卢、骆四家的次序排列，并不是说王勃的诗文最好，骆宾王的诗文最差，而是根据他们姓氏的声律来排定的。按照声律学说，平声字往往要安置在仄声字之前，如果两个字同是平声，又应该按照声韵的阴阳、洪细、轻浊来排定先后位置。例如刘项、苏李、卫霍、金张、许史、沈范、王谢、沈宋、元白、温李之类，大都先平后仄，以叶宫商。王杨卢骆的次序排列，也是如此。《新唐书·文苑传》：“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杨]炯闻之，谓人曰：‘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当时议者，亦以为然。”其后，张说曰：杨“炯既优于卢，亦不减王，‘耻居王后’，信然；‘愧在卢前’，谦也。”实际四杰的先后次序，受到声韵方面的限制，并不代表他们文学上造就高低的。杜甫对四杰很推重，他在《戏为六绝句》里曾说：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晒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王勃的代表作，有《滕王阁赋》和《诗》，文长不录。此外如：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杜少府之任蜀州》）

另外有一首五绝：

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山中》）短短二十字，已把秋天的景色和游子羁旅的心情，完全写出来了。

杨炯的代表作，如：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歌声。宁为百夫长，不作一书生。（《从军行》）

塞北涂辽远，城南战苦辛。幡旗如鸟翼，甲冑似鱼鳞。冻水寒伤马，悲风愁杀人。寸心明白日，千里暗黄尘。（《战城南》）

卢照邻的代表作，如：

虏骑三秋入，关云万里平。雪似胡沙暗，冰如汉月明。高阙银为阙，长城玉作城。节旄零落尽，天子不知名。（《雨雪曲》）

间拂檐尘看，鸣琴候月弹。桃源迷汉姓，松树有秦官。空谷归人少，青山背日寒。羨君栖隐处，遥望白云端。（《酬杨比部员外暮宿琴堂朝跻书阁率尔见赠之作》）

陇坂高无极，征人望故乡。关河别去水，沙塞断归肠。马系千年树，旌悬九月霜。从来共呜咽，皆是为勤王。（《陇头水》）

骆宾王的代表作，如：

忽上天山路，依然相物华。云疑上苑叶，雪似御沟花。行叹戎麾远，坐怜衣带赊。交河浮绝塞，弱水侵流沙。旅思徒漂梗，归期未及瓜。宁知心断绝，夜夜泣胡笳。（《晚度天山有怀京邑》）

二庭（北庭、安西）归望断，万里客心愁。山路犹南属，河源自北流。晚风连朔气，新月照边秋。灶火通军壁，烽烟上戍楼。龙庭但苦战，燕颌会封侯。莫作兰山下，空令汉国羞。（《夕次蒲类津》）

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于易水送人》）四杰的诗歌，不仅在形式声律上，非常完整；就是在内容上，也使人读了有清新的感觉。

与四杰同时，有上官仪，高宗时为宰相，后以事被杀。他的诗“绮错婉媚，人多效之，谓之上官体。”上官仪的代表作有：

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洲。鹤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入朝洛堤步月》）也是传诵人口的佳作。

武则天时代，有大将郭元振，玄宗世，官至宰相。他的《宝剑篇》，写出英雄怀才不遇的感慨，也很能感动人。

君不见昆吾铁冶飞炎烟，红光紫气俱赫然。良工锻炼经几年，铸得宝剑名龙泉。龙泉颜色如霜雪，良工咨嗟叹奇绝。琉璃玉匣吐莲花，错镂金环映明月。正逢天下无风尘，幸得周防君子身。精光黯黯青蛇色，文章片片

绿龜鳞。非直结交游侠子，亦曾亲近英雄人。何言中路遭弃捐，零落漂沦古狱边。虽复尘埋无所用，犹能夜夜气冲天。（《宝剑篇》）

龙泉就是龙渊，避李渊讳改。武则天读了这篇诗，大为欣赏，就开始重用他了。他另一首《塞上》诗，也形象地写出了他的马上生活来。

塞外虏尘飞，频年出武威。死生随玉剑，辛苦向金微（山名，即阿尔泰

山)。久戍人将老，长征马不肥。乃闻酒泉郡，已合数重围。

郭元振的绝句，也带有乐府吴歌西曲的余味，如：

江水春沉沉，上有双竹林。竹叶坏水色，郎亦坏人心。（《春江曲》）

陌头杨柳色，已被春风吹。妾心正断绝，君怀那得知（《子夜四时歌六首》之一《春歌》）

辟恶茱萸囊，延年菊花酒。与子结绸缪，丹心此何有。（《子夜四时歌六首》之四《秋歌》）

又如：

厌践冰霜域，嗟为边塞人。思从漠南猎，一见汉家尘。（《王昭君三首》之二）

秋风凛凛月依依，飞过高梧影里时。暗处若教同众类，世间争得有人知。（《萤》）

愁煞离家未达人，一声声到枕前闻。苦吟莫向朱门里，满耳笙歌不听君。（《蛩》）

聚散虚空去复还，野人闲处倚筇看。不知身是无根物，蔽月遮星作万端。（《云》）

纵无汲引味清澄，冷浸寒空月一轮。凿处若教当要路，为君常济往来人。（《野井》）

咏物诗托与幽长，而且显得诗人抱负之不凡。

四杰稍后，有沈佺期和宋之问。沈佺期，以进士擢第，武则天长安中（公元七一—七四年），累迁通事舍人，转考功郎、给事中。武则天被迫退位，沈佺期以张易之党，长流欢州（治九德，今越南兴元县蓝城附近）。唐中宗时，复召还为中书舍人；唐玄宗开元初年病死。宋之问，武则天长安末，为尚方监丞，亦以附张易之，左迁泷州（治泷水，今广东罗定县）参军。唐中宗复召为修文馆学士。唐睿宗时，长流钦州（治钦江，今广东钦县北），勒令自杀。自沈约、王融以来，诗律屡变，到了徐陵、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沈佺期、宋之问出，尤相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当时诗坛谓之沈宋体。

沈佺期的代表作，如：

闻道黄龙戍，频年不解兵。可怜闺里月，长在汉家营。少妇今春意，良人昨夜情。谁能将旗鼓，一为取龙城。（《杂诗三首》之三）

十年通大漠，万里出长平。寒日生戈剑，阴云拂旆旌。饥鸟啼旧垒，疲马恋空城。辛苦皋兰北，胡霜损汉兵。（《被试出塞》）

卢家少妇郁金香，海燕双栖玳瑁梁。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白狼河北音书断，丹凤城南秋夜长。谁谓含愁独不见，更教明月照流黄。（《独不见》）

不但属对精密，声调也铿锵可裂金石了。

宋之问的代表作，如：

日暮风亭上，悠悠旅思多。故乡临桂水，今夜渺星河。暗草霜华发，空亭雁影过。兴来谁与语，劳者自为歌。（《旅宿淮阳亭口号》）

去年上巳洛桥边，今年寒食庐山曲。遥怜巩树花应满，复见吴洲草新绿。吴洲春草兰杜芳，感物思归怀故乡。驿骑明朝发何处，猿声今夜断君肠。（《寒食江州满塘驿》）据说宋之问想做北门学士，做了一首《明河篇》以见意，篇末云：“明河可望不可亲，愿得乘槎一问津。更将织女支机石，还访成都”

卖卜人。”诗中表示了求作北门学士之心甚切。别人也在武则天面前替他讲了好话，武则天说：“非不知之问有奇才，但恨有口过（口臭）耳。”因为之问口臭的缘故，武则天还是不要他当北门学士的官。

沈、宋之外有崔、苏。崔融，武则天长安中，为凤阁舍人。武则天退位，崔融亦以附张易之贬官，后又召拜国子司业，卒官。崔融文章华丽，朝廷有大手笔（指诏令），多由他起草，文名甚著。他的代表作，如：

月生西海上，气逐边风壮。万里度关山，苍茫非一状。汉兵开郡国，胡马窥亭障。夜夜闻悲笳，征人起南望。（《关山月》）这首边塞诗，气势雄壮，也是佳作。

苏味道，武则天圣历（公元六九八至七〇一年）初，为宰相，后以附张易之贬官，病卒。他的代表作，如：

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骑皆秣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正月十五夜》）写元宵的繁华景象，读之使人神往。

陈子昂与张九龄 陈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射洪县）人。武则天时，为右拾遗，父在乡，为县令段简所陷害，子昂回乡处理其事，段简把子昂收系狱中，子昂忧愤而死。唐初文学承徐陵、庾信余风，骈俪秣缛，子昂主张改革，他和东方虬信中说：“文章道消，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徵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梧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他重视诗文的思想内容，反对六朝以来靡丽空虚的作品，提出了文学革新的主张。他的作品，数量虽不算多，但对此后李白、杜甫、韩愈、张籍、白居易、王建，影响都很大。

陈子昂的《感遇》诗，正是他文学理论的实践。当武则天统治时期，武周王朝和国内少数民族的关系比较紧张，陈子昂对边事是非常关心的，他在《感遇》诗中，涉及边事较多，同时也和他两度出塞亲身体会分不开的。《感遇》诗云：

苍苍丁零塞，今古缅荒途。亭堠何摧兀，暴骨无全躯。黄沙幕南起，白日隐西隅。汉甲三十万，曾以事匈奴。但见沙场死，谁怜塞下孤。

朝入云中郡，北望单于台。胡秦何密迩，沙朔气雄哉。藉藉天骄子，猖狂已复来。塞垣无名将，亭堠空崔嵬。咄嗟吾何叹，边人涂草莱。

李唐武周革代之际，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是非常惨烈的，在陈子昂《感遇》诗中，也作了如实的反映，如：

临岐泣世道，天命良悠悠。昔日殷王子，玉马遂朝周。宝鼎沦伊谷，瑶台成古丘。西山伤遗老，东陵有故侯。

武则天垂拱三年（公元六八七年），“发梁凤巴蛮[兵]，自雅州（今四川雅安）开道，出击生羌”。陈子昂上书谏止其事，以为“吐蕃爱蜀富饶，……徒以山川阻绝，障隘不通，势不能动。今国家乃乱边羌，开隘道，使其（指吐蕃）收奔亡之种，为乡导以攻边，是借寇兵为‘贼’除道，举全蜀以遗之也。”“且蜀人阨劣，不习兵战，山川阻旷，去中夏远，今无故生西羌、吐蕃之患，臣见其不及百年，蜀为戎矣。”“自古国家败亡，未尝不由黠兵，愿陛下熟计之。”武则天接受陈子昂的意见，兵不果兴，此事《资治通鉴》系在垂拱四年。在陈子昂《感遇》诗里，也提到了这件大事，诗云：

丁亥岁云暮，西山事甲兵。羸粮匝邛道，荷戈争羌城。严冬阴风动，穷岫油云生。昏噎无昼夜，羽檄复相惊。拳局竞万仞，崩危走九冥。籍籍峰壑里，哀哀冰雪行。圣人御宇宙，闻道泰阶平。肉食谋无失，藜藿纵横。

朔风吹汉树，萧条边上秋。亭上谁家子，哀哀明月楼。自言幽燕客，结发事远远。赤丸杀公吏，白刃报私仇。

避仇至海上，被役此边州。故乡三千里，辽水复悠悠。每徼胡兵入，常为汉国羞。何知七十战，白首未封侯。（《感遇》）

写边上壮士，白首未侯，也感慨很深。

陈子昂曾随武攸宜（武则天内侄）临边防御，他几次向武攸宜建议，但都没被采纳。后来武攸宜覆败，反而迁怒于陈子昂，把子昂降级叙用。陈子昂在《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诗中，借燕昭王礼贤筑黄金台以及乐毅君臣相契事，来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感。诗云：

南登碣石坂，遥望黄金台。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霸图怅已矣，驱马复归来。（《燕昭王》）

陈子昂的《感遇》诗还有如：

翡翠巢南海，雄雌珠树林。何知美人意，骄爱比黄金。杀身炎洲里，委羽玉堂阴。旖旎光首饰，葳蕤烂锦衾。岂不在遐远，虞罗忽见寻。多材信为累，叹息此珍禽。

搗来豪游子，势利祸之门。如何兰膏叹，感激自生冤。众趋明所避，时弃道犹存。云渊既已失，罗网与谁论。箕山有高节，湘水有清源。唯应白鸥鸟，可为洗心言。

兰以香销，膏以明煎，翡翠以羽毛丧身，陈子昂这两首诗的感慨是很深的。

微霜知岁晏，斧柯此青青。况乃金天夕，浩露沾群英。登山望宇宙，白日已西暝。云海方荡潏，孤鳞安得宁。

这首诗，陈子昂反映了个人和社会政治的关系，也是忧心悄悄，彷徨终夕。

王道已沦昧，战国竞贪兵。乐生何感激，仗义下齐城。雄图竟中天，遗叹寄阿衡。（《乐生》）

陈子昂还有《送著作佐郎崔融等从梁王（武三思）东征》诗云：

金天方肃杀，白露始专征。王师非乐战，之子慎佳兵。海气侵南部，边风扫北平。莫卖卢龙塞，归邀麟阁名。

陈子昂敢公然讲出“莫卖卢龙塞，归邀麟阁名”，可以说是非常大胆了，也见到他爱国如何之深了。

陈子昂的近体诗，也有他的独特风格，如：

遥遥去巫峡，望望下章台。巴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城分苍野外，树断白云隈。今日狂歌客，谁知入楚来。（《度荆门望楚》）

故乡杳无际，日暮且孤征。川原迷旧国，道路入边城。野戍荒烟断，深山古木平。如何此时恨，噉噉夜猿鸣。（《晚次乐乡县》）

边地无芳树，莺声忽听新。间关如有意，愁绝若怀人。明妃失汉宠，蔡女没胡尘。坐闻应落泪，况忆故园春。（《居延海树闻莺同作》）

禺山金碧路，此地饶英灵。送君一为别，凄断故乡情。片云生极浦，斜日隐离亭。坐看征骑没，惟见远山青。（《送殷大入蜀》）

美人挟赵瑟，微月在西轩。寂寞夜何久，殷勤玉指繁。清光委衾枕，遥

思属湘沅。空帘隔星汉，犹梦感精魂。（《月夜有怀》）

比陈之昂稍后，和陈子昂诗歌风格相似的有张九龄。张九龄，韶州曲江（今广东曲江县西）人。以进士擢第，累官至集贤院学士。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公元七三三年）至二十四年（公元七三六年）为宰相。后来受到李林甫的排挤，罢相出为荆州长史。玄宗一日欲废太子瑛及黜鄂王瑶、光王琚，九龄直言极谏，及九龄去而三王子终以废黜死。九龄又识安禄山不可任以重兵，玄宗不从其言，卒致安史之乱。开元二十八年（公元七四〇年），九龄病卒。九龄虽以直言忤旨，“然[玄宗]终爱重其人，每宰相荐士，辄问曰：‘风度得如九龄否？’”（《资治通鉴》开元二十八年）。到了安禄山起兵，玄宗逃往成都，怀念张九龄有先见之明，“遣中使至曲江祭之，厚恤其家”（《资治通鉴》至德二载）。以后正史上，也誉之为“贤相”。

张九龄的代表作，如：

巫山与天近，烟景长青荧。此中楚王梦，梦得神女灵。神女去已久，云雨空冥冥。唯有巴猿啸，哀音不可听。（《巫山高》）

庭树日衰飒，风霜未云已。驾言遣忧思，乘兴求相似。楚国兹故都，兰台有余址。传闻襄王世，仍立巫山祀。

方此全盛时，岂无婵娟子。色荒神女至，魂荡宫观启。蔓草今如积，朝云为谁起。（《登古阳云台》）当唐玄宗全盛之世，张九龄借楚襄王的荒淫来讽咏，可以说防患于未然，有先见之明了。

孤桐亦胡为，百尺傍无枝。疏阴不自覆，修榦欲何施。高冈地复迥，弱植风屡吹。凡鸟已相噪，凤凰安得知。（《杂诗》）

诗篇反映了张九龄已经感觉到李林甫等人的不可共事，正在排挤他了。

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谁知林栖者，闻风徒相悦。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感遇》）

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可以荐嘉客，奈何阻重深。运命唯所遇，循环不可寻。徒言树桃李，此木岂无阴。（《感遇》）

张九龄虽知有人在排挤他，使他的相业无法施展，但他也决不畏惧以至妥协，还是坚持己见，不屈不挠，这种高风亮节也是一般容身保位的宰相所不能企及的。

孤鸿海上来，池潢不敢顾。侧见双翠鸟，巢在三珠树。矫矫珍木巅，得无金丸惧。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恶。今我游冥冥，弋者何所慕。（《感遇》）

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暂来。岂知泥滓贱，只见玉堂开。绣户时双入，华轩日几回。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咏燕》）这些作品，也都是忧心悄悄，愠于群小，使人读了产生一种艺术感人的力量。

齐梁以后，宫体诗的一些脂粉气，到了陈子昂、张九龄，可以说洗刷殆尽，这对唐代诗坛的风气变革，起了很大作用。

盛唐诗人 唐代诗歌进入开元、天宝（公元七一三至七五五年）时期，即进入旧的文学史上所谓“盛唐”时期，诗歌的发展，经过长时期的准备和改革，更加成熟了。在这个社会动荡和不平凡的时期中，产生了不少的优秀诗人，他们都以成熟精练的写作技巧，丰富而不平凡的生活内容，饱经风霜的生活感情，倾吐出他们雄伟俊爽的歌声来。

这一时期著名的诗人，有王湾、李颀、王之涣、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李白、杜甫等诸大家。

王湾，洛阳人。登先天进士第。开元初，为荥阳主簿，后校书郎正院，

终洛阳尉。

王湾的代表作，如：

客路青山下，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次北固山下》）

王湾“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之句，为世传诵，宰相张说曾手题于政事堂，作为能诗楷式。

李颀，赵郡人，寓家颍阳。开元二十三年（公元七三五年），进士擢第。官新乡尉。他的七言古诗，气势磅礴，著名当时。

李颀的代表作，如：

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野云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古从军行》）

男儿事长征，少小幽燕客。赌胜马蹄下，由来轻七尺。杀人莫敢前，须如蝟毛磔。黄云陇底白雪飞，未得报恩不得归。辽东小妇年十五，惯弹琵琶解歌舞。今为羌笛出塞声，使我三军泪如雨。（《古意》）

黄云雁门郡，日暮风沙里。千骑黑貂裘，皆称羽林子。金笳吹朔雪，铁马嘶云水。帐下饮蒲萄，平生寸心是。（《塞下曲》）

八月寒苇花，秋江浪头白。北风吹五两，谁是浔阳客。鸬鹚山头微雨晴，扬州郭里暮潮生。行人夜宿金陵渚，试听沙边有雁声。（《送刘昱》）

远客坐长夜，雨声孤寺秋。请量东海水，看取浅深愁。（失题见《容斋随笔》卷四引）

最后一首洪迈谓“作客涉远，适当穷秋，暮投孤村古寺中，夜不能寐，起居凄恻，而闻檐外雨声，其为一时襟抱，不言可知。海水喻愁，非过语也。”（《容斋随笔》）

王昌龄，郡望太原，寓家京兆。开元十五年（公元七二七年），以进士擢第，初授校书郎，历江宁丞，后贬龙标（今湖南黔阳县）尉。安史乱起，昌龄奔江宁，为濠州刺史闾丘晓所杀。

王昌龄贬官龙标尉之后，曾写了一首《箜篌引》：

卢谿（在辰州龙标故地）郡南夜泊舟，夜闻两岸羌戎讴。其时月黑猿啾啾，微雨沾衣令人愁。有一迁客登高楼，不言不寐弹箜篌。弹到蓟门桑叶秋，风沙飒飒青冢头。将军铁骢汗血流，深入匈奴战未休。黄旗一点兵马收，乱杀胡人积如丘。疮病驱来配边州，仍披漠北羔羊裘。颜色饥枯掩面羞。眼眶泪滴深两眸。思还本乡食犂牛，欲语不得指咽喉。或有强壮能咿嗷，意被说他边将仇。五世属藩汉主留，碧毛毡帐河曲游。橐驼五万部落稠，敕赐飞凤金兜鍪。为君百战如过筹，静扫阴山无鸟投。家藏铁券特承优，黄金千斤不称求。九族分离作楚囚。深谿寂寞絃苦幽，草木悲感声飕飕。仆本东山为国忧，明光殿前论九畴。簏读兵书益冥搜，为君掌上施权谋。洞晓山川无与俦，紫宸诏发远怀柔。摇笔飞霜如夺钩，鬼神不得知其由。怜爱苍生比蚍蜉，朔河屯兵须渐抽。尽遣降来拜御沟，便令海内休戈矛。何用班超定远侯，史臣书之得已不。

唐王朝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唐初，有不少少数部族屯居塞上，为唐保护边疆，而边将邀功，却反诬蔑少数部族将领通敌背叛，从而把少数兄弟族充配到卢谿。王昌龄以正义的呼声，控诉唐王朝宠信边将迫害少数兄弟族

的罪行，这是一首具有深厚社会内容的优秀作品。

王昌龄的边塞诗，还有很多，也都是——时绝唱，如：

饮马渡秋水，水寒风似刀。平沙日未没，黯黯见临洮。昔日长城战，咸言意气高。黄尘足今古，白骨乱蓬蒿。（《塞下曲四首》之二）

边头何惨惨，已葬霍将军。部曲皆相吊，燕南代北闻。功勋多被黜，兵马亦寻分。更遣黄龙戍，唯当哭塞云。（《塞下曲四首》之四）

秋风夜渡河，吹却雁门桑。遥见胡地猎，鞞马宿严霜。五道分兵去，孤军百战场。功多翻下狱，士卒但心伤。（《塞上曲》）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出塞》）

骝马新跨白玉鞍，战罢沙场月色寒。城头铁鼓声犹振，匣里金刀血未乾。（《出塞》）

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上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从军行七首》之一）

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离别情。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从军行七首》之二）

关城榆叶早疏黄，日暮云沙古战场。表请回军掩尘骨，莫教兵士哭龙荒。（《从军行七首》之三）

边塞诗到了开元、天宝时代，一方面还是热情地歌颂了保卫边塞的士卒之英雄业绩，另外一方面，也在这些诗篇中，反映了当时人民反对统治集团进行扩张战争的意识。这是完全符合当时历史实际情况的。因为唐代初期的战争，是为了保卫祖国边疆和和平生活，所以歌颂这种保卫战争的边塞诗，基本上是可以肯定的。随着战争的长期进行和不断扩大，战争不完全是捍卫边疆而带着扩张的性质了。这种扩张战争的进行和结果，往往使唐王朝统治集团中一小撮上层分子得到了较多的利益，而绝大多数人，由于长期的兵役和巨额的军事费用负担，致使他们的生活更加困难起来了。有些边将，他们善于夤缘，导致了官爵显赫的地位；而低级将领，却苦战终身，白首未侯。诗人对于这种扩张战争，是不能漠然无动于衷的，必然在诗篇中咒诅它，这就赋予诗人的诗篇以更深厚的社会内容。

边防塞上留驻著几十万的作战将士，内地就一定出现不少思妇，因此闺怨诗也和边塞诗一样，开始流传开来，这是一个事情的两面。王昌龄除了写出很多气魄雄伟的边塞诗之外，还以细腻的笔触，写出了许多情词凄怨的闺怨诗，反映了穷兵黩武长期战争带来的离情别绪。如：

闺中少妇不曾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闺怨》）

王昌龄的宫词，也是一时绝唱。

昨夜风开露井桃，未央前殿月轮高。平阳歌舞新承宠，帘外春寒赐锦袍。（《春宫曲》）

西宫夜静百花香，欲卷珠帘春恨长。斜抱云和深见月，朦胧树色隐昭阳。（《西宫春怨》）

奉帚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共裴回。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长信秋词五首》之三）

王之涣，字季凌，郡望太原，寓家绛郡（今山西新绛县）。起家为冀州衡水县主簿，后官文安（今河北文安县）县尉。天宝元年（公元七四二年）

病卒，年五十五。

王之涣的作品大都散失了，今仅存诗六首。但他的边塞诗在他生前就已举世传诵了。近年发现他的《墓志铭》里说之涣“或歌《从军》，吟《出塞》，噉兮极关山明月之思，萧兮得易水寒风之声。传乎乐章，布在人口”（《唐故文安郡文安县尉太原王府君墓志铭并序》）。

王之涣旗亭赏酒的故事，脍炙人口。据《集异记》：“开元中，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齐名。时风尘未偶，而游处略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诗人共诣旗亭赏酒小饮。忽有梨园伶官十数人登楼会宴，三诗人因避席隈映（阴暗处），拥炉火以观焉。俄有妙妓四辈，寻续而至，奢华艳曳，都冶颇极。旋则奏乐，皆当时之名部也。昌龄等私相约曰：‘我辈各擅诗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观诸伶所讴，若诗入歌词之多者，则为优矣。’”俄而一伶官唱王昌龄诗，又一伶官唱高适诗，寻又一伶官再讴王昌龄诗，之涣“因指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诗，吾即终身不敢与子争衡矣。’”“因欢笑而俟之。须臾，次至双鬟发声，则曰：‘黄沙（《全唐诗》作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凉州词》）。’”……“因大谐笑。诸伶不喻其故，皆起诣曰：‘不知诸郎君何此饮噱？’因话其事。”伶官们听到是这三位诗人，请他们到筵席上一起饮酒。“三子从之，欢醉竟日。”

王之涣还有五绝：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登鹳雀楼》）也传诵一世，称为绝唱。

崔颢，汴州人。开元十一年（公元七二三年），以进士擢第。累官司勋员外郎。天宝十三年，病卒。

崔颢的代表作，如：

十五嫁王昌，盈盈入画堂。自矜年最少，复倚婿为郎。舞爱《前溪》绿，歌怜《子夜》长。闲来斗百草，度日不成妆。（《古意》）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黄鹤楼》）

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停舟暂借问，或恐是同乡。（《长干曲四首》之一）

家临九江水，来去九江侧。同是长干人，自小不相识。（《长干曲四首》之二）

下渚多风浪，莲舟渐觉稀。那能不相待，独自逆潮归。（《长干曲四首》之三）

三江潮水急，五湖风浪涌。由来花性轻，莫畏莲舟重。（《长干曲四首》之四）

用乐府格调来抒写，莲以谐怜，诗也自然流畅，情调比较健康。

王维，字摩诘，开元九年（公元七二一年），以进士擢第。工诗善画，历官右拾遗、监察御史。天宝末，为给事中。安禄山陷长安，王维不及逃出，拘于东都洛阳菩提寺，服药佯暗。安禄山在洛阳凝碧池大宴，盛奏众乐，玄宗以前所培养的梨园子弟，在奏乐时，往往歔歔泣下。王维没有参加宴会，但听到了这件事，便偷偷地作了一首诗：

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寮何日更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

（《菩提寺禁，裴迪来相看，说逆贼等凝碧池上作音乐，供奉人等举声便一时泪下，私成口号，诵示裴迪。》）唐王朝收复两京以后，出仕伪政府的官吏，或贬或杀，只有王维因为做了这首诗，还有他弟弟王缙的营救，仍授太子中允，后至尚书右丞。肃宗乾元二年（公元七五九年）病卒。

王维的作品，从内容、风格来讲，前期、后期是有着显明的区别的。前期的王维，对人生态度是较为积极的。如：

洛阳女儿对门居，才可容颜十五余。良人玉勒乘骢马，侍女金盘鲙鲤鱼。画阁朱楼尽相望，红桃绿柳垂檐向。罗帏送上七香车，宝扇迎归九华帐。狂夫富贵在新春，意气骄奢剧季伦（石崇字）。自怜碧玉亲教舞，不惜珊瑚持与人。春窗曙灭九微火，九微片片飞花琐。戏罢曾无理曲时，妆成只是薰香坐。城中相识尽繁华，日夜经过赵李家。谁怜越女颜如玉，贫贱江头自浣纱。（《洛阳女儿行》时年十八）

绝色天下重，西施宁久微。朝为越溪女，暮作吴宫妃。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邀人傅脂粉，不自著罗衣。君宠益骄态，君怜无是非。当时浣纱伴，莫得同车归。持谢邻家子，效颦安可希。（《西施咏》）

七国雌雄犹未分，攻城杀将何纷纷。秦兵益围邯郸急，魏王不救平原君。公子为嬴停驷马，执辔愈恭意愈下，亥为屠肆鼓刀人，嬴乃夷门抱关者。非但慷慨献良媒，意气兼将身命酬。向风刎颈送君子，七十老翁何所求。（《夷门歌》）

虽然是少作，感情健康，托意遥远。他这一时期的边塞诗，如：

长城少年游侠客，夜上戍楼看太白。陇头明月迥临关，陇上行人夜吹笛。关西老将不胜愁，驻马听之双泪流。身经大小百余战，麾下偏裨万户侯。苏武才为典属国，节旄空尽海西头。（《陇头吟》）

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山野火烧。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护羌校尉朝乘鄣，破虏将军夜渡辽。玉靶角弓珠勒马，汉家将赐霍嫖姚。（《出塞》）

十里一走马，五里一扬鞭。都护军书至，匈奴围酒泉。关山正飞雪，烽戍断无烟。（《陇西行》）

吹角动行人，喧喧行人起。笳悲马嘶断，争渡金河水。日暮沙漠陲，战声烟尘里。尽系名王颈，归来献天子。（《从军行》）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吏，都护在燕然。（《使至塞上》）

这些边塞诗，也是气势豪迈，具有盛唐气魄。此外如《观猎》诗：

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忽过新丰市，还归细柳营。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观猎》）

结句劲挺，有余意不尽之概，尤称绝唱。此外王维还运用了乐府民歌的形式，创造了优美的绝句，如：

莫以今时宠，难忘昔日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息夫人》）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鹿柴》）

清浅白石滩，绿浦向堪把。家住水西东，浣纱明月下。（《白石滩》）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绝无人，纷纷开且落。（《辛夷坞》）

日日采莲去，洲长多暮归。弄篙莫溅水，畏湿红莲衣。（《莲花坞》）

淼淼寒流广，苍苍秋雨晦。君问终南山，心知白云外。（《答裴迪辋口遇雨忆终南山之作》）

山中相送罢，日暮掩柴扉。春草年年绿，王孙归不归。（《送别》）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下，寒梅著花未？（《杂诗三首》之二）

红豆生南国，秋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相思》）  
萋萋春草秋绿，落落长松夏寒。牛羊自归村巷，童稚不识衣冠。（《田园乐七首》之四）

山下孤烟远村，天边独树高原。一瓢颜回陋巷，五柳先生对门。（《田园乐七首》之五）

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花落家童未扫，莺啼山客犹眠。（《田园乐七首》之六）

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少年行四首》之一）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渭城曲》）

这些绝句，在艺术造诣上，都有一定的感人力量。

开元二十四年（公元七三六年），张九龄罢相，王维是非常推重张九龄的，他有《献始兴公》诗，中云：“侧闻大君子，安问党与仇。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贱子跪自陈，可为帐下否？感激有公议，曲私非所求。”可说对张九龄的风节，是五体投地的。张九龄为荆州长史后，王维有《寄荆州张丞相》诗：“所思竟何在，怅望深荆门。举世无想识，终身思旧恩。方将与农圃，艺植老丘园。目断南飞雁，何由寄一言。”王维既是张九龄的拥护者，李林甫掌握大权以后，自然受到这一派的冷遇，他为了躲避现实政治斗争，就开始接受佛教思想，倾向佛教哲学了。因为他的思想上起了这样变化，因而他的作品内容和风格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王维过去诗篇中那种“叠海遥翻瀚海波，鸣笳乱动天山月”（《燕支行》），“瀚海经年别，交河出塞流”（《送平澹然判官》），“沙平连白雪，蓬卷入黄云”（《送张判官赴河西》）这一类劲挺雄拔的辞句，渐渐在他的诗篇里消失了，而代之以“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闻穷通理，渔歌入浦深”（《酬张少府》），颓废消沉的诗篇增多起来了。王维集中一切艺术力量，来表现自然村落中的宁静之美，田园诗的作品，开始增多如：

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渡头余落日，墟里生孤烟。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辋山闲居赠裴秀才迪》）

斜阳照村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雉雊麦苗秀，蚕眠桑叶稀。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渭川田家》）

贫居依谷口，乔木带荒村。石路枉回驾，山家谁候门。渔舟胶冻浦，猎火烧寒原。唯有白云外，疏钟闻夜猿。（《酬虞部苏员外过蓝田别业不见留之作》）

王维在描写自然村落景色之美的诗章里，警句是很多的。如“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送邢桂州》），“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汉江临泛》），“天寒远山净，日暮长河急”（《齐州送祖三》），“秋天万里净，日暮澄江空”（《送棋母秘书弃官还江东》），“荒城临古渡，落日满秋山”（《归嵩山作》），“鸡犬散墟落，桑榆荫远田”（《千塔主人》），

“落日鸟边下，秋原人外闲”（《登裴秀才迪小台》），“远树蔽行人，长天隐秋塞”（《别弟缙后登青龙寺望蓝田山》），“隔牖风惊竹，开门雪满山”（《冬晚对雪忆胡居士家》），“时倚檐边树，远看原上村”（《辋川闲居》），“绿竹含新粉，红莲落故衣”（《山居即事》），“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山居秋暝》）。“行到水尽处，坐看云起时”（《终南别业》），“树色分扬子，潮声满富春”（《送李判官赴江东》），“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送梓州李使君》），“鸟道一千里，猿声十二时”（《送杨长史归果州》），“落花寂寂啼山鸟，杨柳青青渡水人”（《寒食汜水上》），“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这些诗句，既描写了自然之美，诗中有画。有些又雍容华贵，带有盛唐气魄，在艺术上造就都很高。

安禄山乱后，王维虽然以凝碧池一诗免受处分，但他经历乱离的局面之后，一方面固然还担任了百事丛挫的尚书右丞，在精神方面，却更逃避现实了。在他的《叹白发》诗说到：“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大概他逃避现实，“欲知除老病，唯有学无生”（《秋夜独坐》），更专心去学佛了。

王维后期的不少作品，其基调大多是比较低沉的，可是偶然也有如：“酌酒与君君自宽，人情翻覆似波澜。白首相知犹按剑，朱门先达笑弹冠”（《酌酒与裴迪》前半首），还透露了一些不平之气。由于王维后期的作品基调低沉，而又具有一定的艺术性，因此往往容易感染读者，尤其容易被失意的人物所欣赏、陶醉。

孟浩然，襄阳人。开元末，张九龄罢相，出为荆州长史，浩然一度出任荆州从事。后遂隐居鹿门山（湖北襄樊市东南）。开元二十八年（公元七四年），病卒。

孟浩然的诗，比较具有生活气息，他的代表作，如：

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相望试登高，心飞逐鸟灭。愁因薄暮起，兴是清秋发。时见归村入，沙行渡头歇。天边树若荠，江畔舟如月。何当载酒来，共醉重阳节。（《秋登兰山寄张五》）

山光忽西落，池月浙东上。散发乘夕凉，开轩卧闲敞，荷花送香气，竹露滴清响。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感此怀古人，中宵劳梦想。（《夏日南亭怀辛大》）

秋空明月悬，光彩露沾湿。惊鹊栖未定，飞萤卷帘入。庭槐寒影疏，邻杵夜声急。佳期旷何许，望望空伫立。（《秋宵月下怀》）

采樵入深山，山深树重叠。桥崩卧槎拥，路险垂藤接。日落伴将稀，山风拂罗衣。长歌负轻策，平野望烟归。（《采樵作》）

妾有盘龙镜，清光常昼发。自从生尘埃，有若雾中月。愁来试取照，坐叹生白发。寄语边塞人，如何久离别。（《同张明府清镜叹》）

山寺钟鸣昼已昏，渔梁渡头争渡喧。人随沙岸向江村，予亦乘舟归鹿门。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岩扉松迳长寂寥，唯有幽人夜来去。（《夜归鹿门山歌》）

田家春事起，丁壮就东陂。殷殷雷声作，森森雨足垂。海虹晴始见，河柳润初移。予意在耕凿，因君问土宜。（《东陂遇雨率尔贻谢南池》）

木落雁南度，北风江上寒。我家襄水上，遥隔楚云端。乡泪客中尽，孤帆天际看。迷津欲有问，平海夕漫漫。（《早寒江上有怀》）

孟浩然的五律，如：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巾。（《与诸子登岷山》）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筵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过故人庄》）

孟浩然的绝句，如：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春晓》）

北固临京口，夷山近海滨。江风白浪起，愁煞渡头人。（《扬子津望京口》）

移舟泊烟树，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宿建德江》）

荆吴相接水为乡，君去春江正淼茫。日暮征帆何处泊，天涯一望断人肠。（《送杜十四之江南》）

这些诗篇，自有一种淳朴之气，自然之趣，含蓄隽永，具有它的独特风格。

孟浩然诗篇中，隽句很多，如“微云澹河汉，疏雨滴梧桐”（逸句），“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临洞庭》），“榜人投岸火，渔子宿潭烟”（《夜渡湘水》），“乱山残雪夜，孤烛异乡人”（《除夜》），都非常细致地描绘自然景色，在山水抒情诗方面艺术成就是较高的。杜甫诗：“复忆襄阳孟浩然，清诗句句尽堪传”（《解闷》），就是指孟浩然这方面的诗歌成就而言的。

高适，字达夫，勃海蓨（今河北景县）人。初任封丘尉，后为河西（镇姑臧，今甘肃武威县）节度使哥舒翰掌书记。安史乱后，历官剑南西川节度使，转刑部侍郎。唐代宗永泰元年（公元七六五年），病卒。

高适的边塞诗，不仅描写出艰苦的战争环境和雄奇瑰丽的塞上风光，同时还揭露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他的代表作，如：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校尉羽书飞翰海，单于猎火照狼山。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身当恩遇恒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泪）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边风飘飏那可度，绝域苍茫更何有。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相看白刃雪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燕歌行》）

君不见富家翁，旧时贫贱谁比数。一朝金多结豪贵，万事胜人健如虎。子孙成行满眼前，妻能管弦妾能舞。自矜一身忽如此，郤笑傍人独愁苦。东邻少年安所如，席门穷巷出无车。有才不肯学干谒，何用年年空读书。（《行路难二首》之二）

君不见芳树枝，春花落尽蜂不窥。君不见梁上泥，秋风始高燕不栖。荡子从君事征战，蛾眉婵娟守空闺。独宿自然堪下泪，况复时闻鸟夜啼。（《塞下曲》）

汉家能用武，开拓穷异域。戍卒厌糠核，降胡饱衣食。关亭试一望，吾欲泪沾臆。（《蓟门行五首》之二）

黯黯长城外，日没更烟尘。胡骑谁凭陵，汉兵不顾身。古树满空塞，黄云愁杀人。（《蓟门行五首》之五）

策马自沙漠，长驱登塞垣。边城何萧条，白日黄云昏。一到征战处，每愁胡虏翻。岂无安边书，诸将已承恩。惆怅孙吴事，归来独闭门。（《蓟中作》）

秋日登滑台，台高秋已暮。独行既未惬，怀土怅无趣。晋宋何萧条，羌胡散驰鹜。当年无战略，此地即边戍。兵革徒自勤，山河孰云固。乘间喜临眺，感物伤游寓。惆怅落日前，飘飏远帆处。北风吹万里，南雁不知数。归意方浩然，云沙更回互。（《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十三首》之六）

朝从北岸来，泊船河南浒。试共野人言，深觉农夫苦。去秋虽薄熟，今夏犹未雨。耕耘日勤劳，租税兼鸟鹵。园蔬空寥落，产业不足数。尚有献芹心，无因见明主。（《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十三首》之九）

濛濛洒平陆，淅淅至幽居。且喜润群物，焉能悲斗储。故交久不见，鸟雀投吾庐。（《苦雪四首》之三）

营州少年厌原野，狐裘蒙茸猎城下。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营州歌》）

高适在安史之乱未萌芽以前，就看到了唐王朝的危机，在上引一些作品里，揭露了唐玄宗的宠任蕃将，边地士卒生活日益困难，“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已经充分反映出来了。在《自淇涉黄河途中作》中，也流露出关心人民疾苦的心情来，这在安史之乱以前的诗人作品中，是不十分容易找到的。

岑参，南阳人，天宝三载（公元七四四年）以进士擢第。后来又在北庭和安西四镇节度使任幕僚，在近日吐鲁番唐墓的发掘中，曾出现了岑大夫（即岑参）的马料帐。可见岑参曾亲身到过安西、北庭一带。安史乱后，他官至嘉州刺史。因为他有丰富的边地生活，所以他的边塞诗写得非常真实。

岑参的代表作，如：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然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著。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黦淡万里凝。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天山有雪常不开，千峰万岭雪崔嵬。北风夜卷赤亭口，一夜天山雪更厚。能兼汉月照银山，复逐胡风过铁关。交河城边飞鸟绝，轮台路上马蹄滑。晦霭寒氛万里凝，阑干阴崖千丈冰。将军狐裘卧不暖，都护宝刀冻欲断。正是天山雪下时，送君走马归京师。雪中何以赠君别，惟有青青松树枝。（《天山雪歌送萧沼归京》）

火山突兀赤亭口，火山五月火云厚。火云满山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平明乍逐胡风断，薄暮浑随塞雨回。缭绕斜吞铁关树，氛氲半掩交河戍。迢迢征路火山东，山上孤云随马去。（《火山云歌送别》）

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

君不闻胡笳声最悲，紫髯绿眼胡人吹。吹之一曲犹未了，愁杀楼兰征戍儿。凉秋八月萧关道，北风吹断天山草。昆仑山南月欲斜，胡人向月吹胡笳。

胡笳怨兮将送君，秦山遥望陇山云。边城夜夜多愁梦，向月胡笳谁喜闻。（《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

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琵琶一曲肠堪断，风萧萧兮夜漫漫。河西幕中多故人，故人别来三五春。花门楼前见秋草，岂能贫贱相看老。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

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金叵罗。三更醉后军中寝，无奈秦山归梦何。（《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

岑参特别喜欢用七言古诗这种形式，来描写艰苦的战争环境和雄奇瑰丽的塞上风光，这是完全有充足理由的。因为边塞诗采用七言古诗形式表现出来，既有力量，又无拘束。岑参同时充分运用乐府民歌的风格和语言，推动了七言古诗这种形式更向高度发展。

岑参的边塞诗，在五律、七绝方面，也表现了他独特的豪迈劲挺风格，如：

一身从远使，万里向安西。汉月垂乡泪，胡沙损马蹄。寻河愁地尽，过碛觉天低。送子军中饮，家书醉里题。（《碛西头送李判官入京》）

黄沙碛里客行迷，四望云天直下低。为言地尽天还尽，行到安西更向西。（《过碛》）

黑姓蕃王貂狐裘，葡萄宫锦醉缠头。关西老将能苦战，七十行兵仍未休。（《胡歌》）

七月天山风似刀，城南猎马缩寒毛。将军纵博场场胜，赌得单于貂鼠袍。（《赵将军歌》）

岑参除了边塞诗之外，有些绝句，也清新可诵，如：

梁园日暮乱飞鸦，极目萧条三两家。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山房春事二首》之二）

洞房昨夜春风起，遥忆美人湘江水。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春梦》）

此外有些警句，如“万里乡为梦，三边月作愁”（《送人赴安西》），“黄沙西际海，白草北连天”（《过酒泉忆杜陵别业》），“孤城天北畔，绝域海西头”（《北庭作》），“半天城北雨，斜日霸西云”（《送王伯伦应制授正字归》），“远峰带雨色，落日摇川光”（《林卧》），“江村片雨外，野寺夕阳边”（《晚发五陵》）等句子，对于边塞的壮丽景色和川原自然变幻之美，描写得细致入微。

**李白与杜甫** 李白，自称是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县）郡望。当神龙（公元七五五至七五六年）初年，李白四、五岁的时候，随父流寓到剑南（今四川）居住，从此李白就把西蜀作为他的故乡了。李白早年家境较为富裕，他父亲可能是个富商。

李白少年时，读书击剑，才气横逸。二十多岁，出蜀历三峡而下，至荆州，泛舟洞庭，南穷苍梧，抵扬州。其后寄家安陆（今湖北安陆县），又北出太原，东游齐鲁，登泰山，南适会稽，入剡中，抵天台。李白过了这样十几年的漫游生活，接触到各种各样人物，偏览各地雄伟秀丽的自然景色，所以能够从这一时期开始写出他的优秀诗篇来。

当李白四十二岁的那一年（天宝元年——公元七四二年），唐玄宗听到他的诗名，从会稽把他招来，令其供奉翰林。据说天宝中，宫中特重木芍药，

得红、紫、浅红、通白四种，艺殖于兴庆池东沉香亭。会花开，玄宗乘“照夜白”（马名），太真妃辇从。玄宗曰：“赏名花，对妃子，不宜用旧乐章。”命乐工李龟年持金花笺宣赐李白，白承诏，立进《清平调》三章，诗云：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一枝秣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红妆。

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

梨园弟子抚丝竹，李龟年歌之。大概由于李白的诗人性格关系，宫廷生活不合他的胃口，所以他并不留恋这种生活。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说：“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李白对唐玄宗尚且表示这种傲岸不羁态度，对张垪（张说子，唐玄宗爱婿）、高力士（唐玄宗宠任的宦官）之流，当然更是不用说了。因此李白不久提出“还山”的要求，唐玄宗听信了左右对李白的谗言，以为李白“非廊庙器”（非做官的材料）而允许了他的请求。

李白离开长安后，寄家大梁（今河南开封市），足迹遍大河南北，后来又南下，留连于广陵（今江苏扬州市）、金陵（今南京市）一带，又漫游浙东。当安禄山起兵时，李白正住在宣城（今安徽宣城县）。两京失守，玄宗逃蜀，李白也东奔吴中，后来又辗转到庐山。唐玄宗怕朔方军抵不过安禄山，乃发表第十六子永王李璘为山南东道、岭南、黔中、江南西道四镇节度使，出镇江陵。永王想下取金陵，全有江东，以御禄山。永王率兵东下，经过浔阳（今江西九江市），听说李白在庐山，就把他请下来。永王是以抗安禄山为号召的，而李白本来就有政治抱负，平日以鲁仲连、谢安自居。他的诗如“安石在东山，无心济天下；一起振横流，功成复萧洒”（《赠常侍御》），他平日就有这种抱负，现在看到中原沸腾，九土横溃，“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经离乱后天恩流夜郎怀旧游书怀贻江夏韦太守良宰》），自然要“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誓欲斩长鲸，澄清洛阳水”（《赠张相镐》）了。他没有看出永王割据东南会给当时全局带来分裂的危害，他轻易地随永王向金陵进发，途中还做了《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如其中三首：

二帝（指玄宗入蜀，肃宗奔灵武）巡游俱未回，五陵松柏使人哀。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贤王远道来。

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

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

永王败死，参加这次事变的人，都作为“从逆”论，或死或贬，李白也被处分长流夜郎（今贵州遵义一带），这一年是乾元元年（公元七五八年），诗人已经五十八岁了。他第二年刚走到巫山的时候，全国大赦，他也在被赦之列，于是他又经江夏（今湖北武昌）回到浔阳。到了宝应元年（公元七六二年），他去当涂（今安徽当涂县），就在那里病死，年六十二。

李白的一生，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名扬宇宙而枯槁当年”（《为宋中丞自荐表》）。他早年家境富裕，在广陵散金三十余万。中年以后，离开长安，生活也渐渐紧缩起来。尽管诗人豪迈如昨，“主人何为言少钱，径取酤酒为君酌；五花马，黄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将进酒》）。可是实际上是“黄金逐手快意尽，昨日破产今朝贫”（《醉后赠从甥高镇》）了。“一朝去金马，飘落成飞蓬，宾交日疏散，玉樽亦已空”（《东武吟》），这就是李白“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园”（《书情赠蔡舍人雄》）时期的生活写照。此后他南游金陵，曾“于落星石上，以紫绮裘换酒为欢”

（《金陵江上遇蓬池隐者》诗题下自注），这事固然还见得他的豪兴如旧，但也可以看出他实际生活的如何窘迫来了。他自流放夜郎中途遇赦放归以后，生活更加困难起来，有时朋友偶然有一些馈赠，也如“斗水浇长鲸”（《献从叔当涂宰阳冰》），无济于事，终于贫病以死。身后很萧条，正如杜甫诗中所说的：“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梦李白》）。

李白的思想体系，他平日轻视儒生，他在诗里嘲鲁儒为“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他也“羞作济南生（伏生），九十诵古文”（《赠何七判官昌浩》）。他还有“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的说法。他在《来日大难》行里，说到在自己“乘龙上三天”之后，听到“下士大笑，如苍蝇声”，对礼法之士可以说极尽嘲谑之能事。这些思想情感和他的行迹，以及对唐宫廷的傲岸态度和安禄山起兵后的随永王东下，在在都可以说明他没有受到儒家传统思想的严格束缚。李白虽写了《西方净土变相赞》、《江夏送林公上人游衡山岳序》、《僧伽歌》这一类有关佛教方面的作品，他还自称“青莲居士”，而且说自己是“金粟如来是后身”（《答湖州叶司马问白是何人》），但这都不足以说明佛教思想对他发生过多少影响。老庄是以清静为本的，而李白汪洋纵恣，浮慕功名，和老庄宁静、一任自然的宗旨，又有根本抵触处；虽然李白的宇宙观和老庄有相近似的地方，

但这也还不足以说明李白的思想就受着老庄的深刻影响。唯其如此，李白对儒释老庄的教化感染都不深，因而李白在心灵上没有重压，反而能摆脱一切传统的束缚，睥睨一世。

李白和道教过从颇密，又喜欢神仙之说。他时时想逢到真人，“长跪问宝诀”（《古风》）；“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他时时在说“吾将营丹砂，永与世上别”（《古风》），“安得不死药，高飞向蓬瀛”（《游泰山》）。他在《古有所思行》中说：“我思仙人，乃在碧海之东隅。海寒多天风，白波连山倒蓬壶。长鲸喷涌不可涉，抚心茫茫泪如珠。西来青鸟东飞去，愿寄一书谢麻姑。”他又想“永随长风去，天外恣飘扬”（《古风》），“我欲蓬莱顶上行”（《怀仙歌》）。他听到贺知章说他是“谪仙人”，就非常高兴；他自己后来又说自己后来他在“天上白玉京，十二楼层城，仙人抚我顶，结发事长生”（《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由于“误逐世间乐”，而被谪下尘凡来。李白这种带有浪漫气息的想法，是不能单纯理解为他醉心于神仙之说的。正如我们要批判的李白那种及时行乐思想，如“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将进酒》），“三万六千日，夜夜当秉烛”（《古风》）；以及李白经常提到的“与尔共销万古愁”（《将进酒》），“举杯销愁愁更愁”（《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的那种苦恼情绪，也不能单纯把它看作是李白性格方面的忧郁、颓废或消沉悲观一样，因为李白的这种美丽的幻想和他这种忧郁或抵触情绪的形成，正说明了他对现实的不满，说明他在现实生活中碰了无数次的壁并碰得头破血流以后，才产生对现实的一种蔑视和否定。也唯有李白对当时现实采取了蔑视和否定，才决定他那种浪漫跌宕性格的形成，才能有力地写出他那种气魄雄伟、风格奔放的诗篇来。

李白对现实的不能谐合，同时还表现在他那种突出的任侠思想一方面。李白曾自称“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与韩荆州书》）。他经常剑不去身。他平生所景慕的人物，如张良、荆轲、高渐离，大都是《刺客列传》

上的人物。他自己在年轻时，曾手刃数人。他在诗里也说到“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赠从兄襄阳少府皓》）。他在《侠客行》里，也歌颂了“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的刺客行径。他在《结袜子》诗里，并写出“燕南壮士吴门豪，筑中置铅鱼藏刀，感君恩重许君命，泰山一掷轻鸿毛”的烈士气概。他在《经下邳圯桥怀张子房》一首诗里写张良和黄石公的事情时说：

子良未虎啸，破产不为家。沧海得壮士，椎秦博浪沙。报韩虽不成，天地皆振动。潜匿游下邳，岂曰非智勇。我来圯桥上，怀古钦英风。唯见碧水流，曾无黄石公。叹息此人去，萧条徐泗空。

从诗里可以见到李白对博浪沙一击，和对黄石公、张良这些人物，如何向往。同时，李白还以鲁仲连自比，如：

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生海底，一朝开光耀。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未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古风》）

李白对刺客、侠士，是那样的神往，认为“纵死白骨香，不惭世上英”（《侠客行》），而对贵为万乘之主的秦皇、汉武之流，却予以蔑视。如咏秦皇的三首：

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明断自天放，大略驾群才。收兵铸金人，函谷正东开。铭功会稽岭，骋望琅邪台。刑徒七十万，起土骊山隈。尚采不死药，茫然使心哀。连弩射海鱼，长鲸正崔嵬。额鼻象五岳，扬波喷云雷。髻鬣蔽青天，何由睹蓬莱。徐市载秦女，楼船几时回。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古风》）

秦王按宝剑，赫怒震威神。逐日巡海右，驱石驾沧津。徵卒空九宇，作桥伤万人。但求蓬莱药，岂思农 春。力尽功不贍，千载为悲辛。（《古风》）

郑客西入关，行行未能已。白马华山君，相逢平原里。璧遗镐池君，明年祖龙（指秦始皇）死。秦人相谓曰：“吾属可去矣。”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古风》）

“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但求蓬莱药，岂思农 春”，“璧遗镐池君，明年祖龙死”，这种不崇拜权威的思想，构成了李白积极浪漫主义精神的主导一方面，李白的作品所以能为后人所喜爱乐诵，是和以上这种任侠而不崇拜权威的思想分不开的。

李白生长在富强的唐王朝时代，他也和同时诗人一样，写出了许多反映时代面貌的边塞诗来，如：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戍客望边色，思归多苦颜。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关山月》）

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塞下曲六首》之一）

骏马似风飙，鸣鞭出渭桥。弯弓辞海月，插羽破天骄。阵解星芒尽，营空海雾消。功成画麟阁，独有霍嫖姚。（《塞下曲六首》之三）

紫骝行且嘶，双翻碧玉蹄。临流不肯渡，似惜锦障泥。白云关山远，黄云海戍迷。挥鞭万里去，安得念春闺。

（《紫骝马》）

大汉无中策，匈奴犯渭桥。五原秋草绿，胡马一何骄。命将征西极，横行阴山侧。燕支落汉家，妇女无颜色。转战渡黄河，休兵乐事多。萧条清万

里，瀚海寂无波。（《塞上曲》）

骝马新跨白玉鞍，战罢沙场月色寒。城头铁鼓声犹震，匣里金刀血未干。（《军行》）

百战沙场碎铁衣，城南已合数重围。突营射杀呼延将，独领残兵千骑归。（《从军行》）

唐王朝在开元、天宝时代所进行的战争，有些是有自卫性质，是可以肯定的。李白对这种战争，在他的边塞诗里，是加以歌颂的。但同时代所进行的有些战争，往往只是满足帝王开疆辟土的要求以及边将为了竞功邀赏而发动的侵略性质的战争，战争的结果也只有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就应该加以否定的了。李白在他作品里，一提及这类战争，非战思想就露骨地表现了出来。这种非战思想，完全是和当时人民爱好和平生活的要求、愿望相一致的，因此这些诗篇是具有深厚社会内容的作品，是应该予以肯定的。如：

去年战，桑乾源；今年战，葱河道。洗兵条支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万里长征战，三军尽衰老。匈奴以杀戮为耕作，古来唯见白骨黄沙田。秦家筑城备胡处，汉家还有烽火燃。烽火燃不息，征战无已时。野战格斗死，败马号鸣向天悲。鸟鸢啄人肠，衔飞上挂枯树枝。士卒涂草莽，将军空尔为。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战城南》）

胡关饶风沙，萧索竟终古。岁落秋草黄，登高望戎虏。荒城空大漠，边邑无遗堵。白骨横千军，嵯峨蔽榛莽。借问谁陵虐？天骄毒威武。赫怒我圣皇，劳师事鼙鼓。阳和变杀气，发卒骚中土。三十六万人，哀哀泪如雨。且悲就行役，安得营农圃。不见征戍儿，岂知关山苦。争锋徒死节，秉钺皆庸竖。战士涂草莱，将军获圭组。

李牧竟不在，边人饲豺虎。（《古风》）

上一首诗人反对穷兵黩武，下一首诗人还抨击了边将的轻启边衅，给各族人民带来了巨大灾害，这两篇诗章均有其现实的政治意义。

边庭多年少，内舍多寡妇，李白在闺怨诗的写作方面，也有很高成就。其代表作如：

黄云城边鸟欲栖，归飞哑哑枝上啼。机中织锦秦川女，碧纱如烟隔窗语。停梭怅然忆远人，独宿孤房泪如雨。（《鸟夜啼》）

白马谁家子，黄龙边塞儿。天山三丈雪，岂是远行时。春蕙忽秋草，莎鸡鸣西池。风摧寒梭响，月入霜闺悲。忆与君别年，种桃齐蛾眉。桃今百余尺，花落成枯枝。终然独不见，流泪空自知。（《独不见》）

白马黄金塞，云砂绕梦思。那堪愁苦节，远忆边城儿。萤飞秋窗满，月度霜闺迟。摧残梧桐叶，萧飒沙棠枝。无时独不见，流泪空自知。（《塞下曲六首》之四）

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当君怀归日，是妾独肠时。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春思》）

燕支黄叶落，妾望白登台。海上碧云断，单于秋色来。胡兵沙塞合，汉使玉关回。征客无归日，空悲蕙草摧。（《秋思》）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子夜吴歌·秋歌》）

明朝驿使发，一夜絮征袍。素手抽针冷，那堪把剪刀。裁缝寄远道，几日到临洮。（《子夜吴歌·冬歌》）

去年何时君别妾，南园绿草飞蝴蝶。今岁何时妾忆君，西山白雪暗晴云。

玉关去此三千里，欲寄音书那可闻。（《思边》）

日色已尽花含烟，月明欲素愁不眠。赵瑟初停凤凰柱，蜀琴欲奏鸳鸯弦。此曲有意无人传，愿随春风寄燕然。忆君迢迢隔青天。昔日横波目，今成流泪泉。不信妾肠断，归来看取明镜前。（《长相思》）这些闺怨诗，反映了唐王朝连年穷兵黩武，给人民制造了无限离恨别怨，也具有现实的社会内容。

李白的情诗，也是令人叫绝的，如：

美人在时花满堂，美人去后余空床。床中绣被卷不寝，至今三载闻余香。香亦竟不灭，人亦竟不来，相思黄叶落，白露点青苔。（《长相思》）这首情诗，感情真挚而不流于浮浅轻薄，意绪不免惆怅而不至于哀怨凄绝。如果感情不出以真挚，就会觉得轻薄了；如果感情太执着一些，就会觉得哀怨而不能自己了。写得这样，正恰到好处。

李白还有一首乐府体诗《长干行》，也是写爱情的，又别有一种情调：

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尝开。低头向暗壁，千唤不一回。十五始展眉，愿同尘与灰。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十六君远行，瞿塘滪滩堆。五月不可触，猿声天上哀。门前迟行迹，一一生绿苔。苔深不能扫，落叶秋风早。八月胡蝶黄，双飞西园草。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早晚下三巴，预将书报家。相迎不道远，直至长风沙。

长干里在今南京市南，长风沙在今安徽怀宁县东五十里（今名长枫夹）。这位《长干行》中的女主人，自幼和他夫婿一起长大，两小无猜。结婚后，夫婿溯江西上去巴蜀经商，女主人志节坚贞，感情真挚，攀望他早日归家。李白刺取了这一题材，作为歌行，不但故事动人，文字也接近口语，明白易懂，无怪前人选唐诗者，都曾采取这首诗。

李白描写酒家少女的诗，也值得介绍一下的，如：

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少年行》）银鞍白鼻騊，绿地障泥锦。细雨春风花落时，挥鞭直就胡姬饮。（《白鼻騊》）

李白还在乐府《丁督护歌》里，用哀切的声调写出江干撑夫的辛苦挽船形象来。

云阳（今江苏丹阳县）上征去，两岸饶商贾。吴牛喘月时，拖船一何苦。水浊不可饮，壶浆半成土。一唱《督护歌》，心摧泪如雨。万人系盘石，无由达江浒。君看石芒砀，掩泪悲千古。

我们可以从这首乐府诗里看出诗人对劳动者的深切感情来。李白另一首乐府《乌栖曲》：

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吴歌楚舞欢未毕，青山犹衔半边日。银箭金壶漏水多，起看秋月坠江波，东方渐高奈乐何！

也通过西施亡吴来作为借鉴，告诫人们纵乐不可过头，纵乐过头，是会招致国破家亡的。

李白作品的最大特色，就在于他不仅形成自己那种豪迈无前的独特风格，同时也表现在他写作艺术的多样化方面。不管哪一种体裁，不管哪一类题材，只要通过李白来抒写，就会达到很高的艺术成就。他能够写出气势雄伟的长篇，同时他也能写清新恬静的短诗。李白在他的代表作《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等作品里，表现了一种排山倒海，万马奔腾的气势，简直雄浑恣肆，不可放物。可是在另一类代表作如《远别离》、《长干行》等

作品里，又创造了凄怨婉约而又不失豪放的另一种新风格。

李白在作品中，喜欢用神话的色采，来丰富诗的画面。浪漫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在李白作品里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在《梦游天姥吟留别》这首诗里，尤显示出李白那种浪漫主义精神和丰富的想象力来。《梦游天姥吟留别》这个作品，李白对梦游仙境的描绘，读之令人魂悸魄动，目迷神摇。

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霓明灭或可睹。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谢公宿处今尚在，渌水荡漾清猿啼。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熊咆虎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列缺霹雳，丘峦崩摧。洞天石扇，訇然中开。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忽魂悸以魄动，恍惊起而长嗟。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别君去时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诗人在篇首夸耀了天姥峰的高耸横天以后，就展开了诗人的想像翅膀，飞渡吴越。诗人不仅从凌空倒景中欣赏了镜湖明月，也在天空中看到了壮丽的海上日出景色；不仅剡溪的猿鸣，传入诗人的耳际，就是天上仙家的鸡啼声，诗人也好像隐约地听到了。进入天台天姥峰周围以后，千岩万转，迷花倚石，深渊层巅，熊咆虎吟，景色之迷离，魂魄之惊栗，已引人入胜。忽然，霹雳一声，丘峦崩摧，一幅青冥浩荡、日月照耀的雄伟瑰丽的神仙世界画面，展示在诗人眼前。可惜这样一个仙境，诗人并没有呆多久，很快诗人就醒来了，回到现实世界来了。诗人对梦境的向往，更引起他对现实的不满，诗人不禁最后哼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诗句来。这又充分反映了诗人对现实的不谐合态度。

噫吁戏，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关名）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扞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巉岩不可攀。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瀑流争喧豗，砅崖转石万壑雷。其险也如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这首《蜀道难》，是李白另一代表作。“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是全篇诗章的宗旨，其基本内容是和张载《剑阁铭》：“穷地之险，极路之峻，世浊则逆，道清斯顺”的主旨，约略相似。不过李白少长西蜀，所以他采用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手法和丰富的想象力来加以渲染蜀道之难。首先诗人夸张地提到西蜀的悠久文化，经过蚕丛、鱼凫，经历了四万八千岁，才和秦合并。石牛粪金，五丁力穷，“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总算和“秦塞通人烟”了。但是从秦岭到西川，“上有六龙回日之高山，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不能飞渡，猿猱愁相攀援，岩峦高回，百

步九折，去天咫尺，扪参历井（参井皆星野名），巉岩畏途，飞湍瀑流，尤其是“子规啼夜月，愁空山”，“使人听此凋朱颜”。诗人最后还提到“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所以劝客游西川的人，“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诗人用万钧的笔力，来写蜀道之难，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天宝末，杨国忠自领剑南节度大使，以章仇兼琼为副使，代镇成都。安禄山起兵，国忠劝玄宗入蜀，李白以为西川不是割据的处所，故有此作。当国忠为乱兵所杀，玄宗入蜀避祸，诗人不再歌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而是写成《上皇西巡南京（指成都）歌》了。

谁道君王行路难，六龙西幸万人欢。地转锦江成渭水，天回玉垒作长安。水绿天青不起尘，风光和暖胜三秦。万国烟花随玉辇，西来添作锦江春。

《远别离》是李白的又一篇代表作。《山海经》的《中山经》洞庭之山条下说：“帝之二女（湘君、湘夫人）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出入必以飘风暴雨”。李白根据这个神话传说，写成诗篇。

远别离，古有[娥]皇[女]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潇湘之浦。海水直下万里深，谁人不言此离苦。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我纵言之将何补。皇穹窃恐不照予之忠诚，雷凭凭兮欲吼怒，尧舜当之亦禅禹。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或言尧幽囚，舜野死，九疑联绵皆相似，重瞳（舜目重瞳）孤坟竟何是。帝子（指娥皇、女英）泣兮绿云间，随风波兮去无还，恸哭兮远望，见苍梧之群山。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远离别》）

湘水日千里，九疑无数峰，这景色已够吸引人了，李白又加强了对潇湘苍梧的景色描写，他结合了自然景物，二妃泣血，湘竹染泪，九疑孤坟，飘风暴雨，使诗篇里展现出一幅“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的特定场面，加强了幽怨的气息，使《远离别》这个诗篇收到了预期的悲剧效果。

上面讲到李白的许多代表作，雄浑恣肆，不可放物；有些代表作又哀怨凄婉，形成另一种新风格。可是诗人的笔触有时又写出了接近王维、孟浩然的一派田园诗风格来，如：

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卻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相携及田家，童稚开荆扉。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欢言得所憩，美酒聊共挥。长歌吟松风，曲尽星河稀。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

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访戴天山道士不遇》）

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客心洗流水，余响入霜钟。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听蜀僧浚弹琴》）

笔调是变得那么朴素，意境是变得那么宁静。他的绝句，如：

渌水明秋月，南湖采白苹。荷花娇欲语，愁杀荡舟人。（《渌水曲》）

长干吴儿女，眉目艳新月。屐上足如霜，不著鸦头袜。（《越女词》）

耶溪采莲女，见客棹歌回。笑入荷花去，佯羞不出来。（《越女词》）

白玉谁家郎，回车渡天津。看花东陌上，惊动洛阳人。（《洛阳陌》）

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卻下水精帘，玲珑望秋月。（《玉阶怨》）

美人卷珠帘，深坐颦蛾眉。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怨情》）

峨眉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峨眉山月歌》)

早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早发白帝城》)

霜落荆门江树空，布帆无恙挂秋风。此行不为鲈鱼鲙，自爱名山入剡中。

(《秋下荆门》)

洞庭西望楚江分，水尽南天不见云。日落长沙秋色远，不知何处吊湘君。

(《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五首》之一)

帝子潇湘去不还，空余秋草洞庭间。淡扫明湖开玉镜，丹青画出是君山。

(《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五首》之五)

日照香炉(峰)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泉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水》)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越王勾践破吴归，义士还乡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唯有鹧鸪飞。

(《越中览古》)

风动荷花水殿香，姑苏台上宴吴王。西施醉舞娇无力，笑倚东窗白玉床。

(《口号吴王美人半醉》)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春夜洛城闻笛》)

镜湖流水漾清波，狂客归舟逸兴多。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送贺宾客归越》)

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

(《长门怨》)

人道横江好，侬道横江恶。一风三日吹倒山，白浪高于瓦官阁。(《横江词六首》之一)

海潮南去过浔阳，牛渚(牛渚矶，亦名采石，今安徽当涂县西北二十里)由来险马当(江西彭泽县西北四十里，山形似马横枕大江)。横江欲渡风波恶，一水牵愁万里长。(《横江词六首》之二)

横江西望阻西秦，汉水东连扬子津，白浪如山那可渡，狂风愁煞峭帆人。(《横江词六首》之三)

海神东过恶风回，浪打天门石壁开。浙江八月何如此，涛似连山喷雪来。(《横江词六首》之四)横江馆(安徽和县西南，对江南之采石)前津吏迎，向予东指海云生。郎今欲渡缘何事，如此风波不可行。(《横江词六首》之五)

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

在极少的语言里，表现了非常形象的事物，色彩鲜明，音律和谐，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成就。

李白足迹遍海内，他对祖国的山川景色和乡土风物，都发生热烈的感情；同时祖国雄伟壮美的山川景色，也深深地影响了他的诗歌风格。李白的诗里，提到峨眉山月，三峡猿声，蜀道的峻险，潇湘的奔流，庐山飞瀑，横江白浪，“江城五月落梅花”，“涛似连山喷雪来”。他以强烈的富有感染力的艺术力量，描绘和歌颂了这些雄伟壮美的山河景色，使人读到他的作品就萌发对祖国江山的热爱。

李白喜欢用大胆夸张的写法，如“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如“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秋浦歌》），如“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襄阳歌》），如“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远离别》），使形象更突出在读者面前，收到了更好的艺术效果。

李白的作品，音乐性极强，他的许多作品，无论长篇，无论短诗，音律的流动变化，都铿锵和谐，在一时诗人中，几无匹敌。

杜甫，字子美，郡望是京兆杜氏。西晋时，名将杜预，就是杜甫的祖先。东晋南渡，杜预曾孙杜逊南居襄阳，故称之为杜氏襄阳房。杜甫这一支，后又从襄阳移居河南巩县，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杜甫的父亲杜闲，官至奉天（今陕西乾县）令。杜甫在唐玄宗先天元年（公元七一二年），生于河南巩县。甫天宝初年曾漫游吴楚齐赵等地，他这时的诗歌修养，已经很突出了。代表作如：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

天宝（公元七四二至七五五年）中，杜甫在长安，历官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这时府兵制已经破坏，折冲府至无兵可交，十二卫的兵额也多缺额，从而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也变成了冷官，不为世所重视。杜甫在长安前后约有十三年的光景，生活是很凄清的，他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里说：“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这四句诗可以说是杜甫京华生活的写照。

杜甫虽是杜氏襄阳房，但郡望还是京兆杜氏。“城南韦杜，去天尺五”（《辛氏三秦记》），杜甫旅居长安之后，京兆杜氏聚居在京兆南杜陵南原，亦称少陵原，杜甫为了不忘本，也在杜陵南原置了一些薄产，并自称少陵叟或杜陵老。

自断此生休问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将移往南山边。短衣匹马随李广，看射猛虎终残年。（《曲江》）他当时很不得意，还打算在杜陵终老呢！

这一段时期，杜甫的代表作有《遣兴》三首和《前出塞》及《后出塞》。

下马古战场，四顾但茫然。风悲浮云去，黄叶坠我前。朽骨穴蝼蚁，又为蔓草缠。故老行叹息，今人尚开边。

汉虏互胜负，封疆不常全。安得廉颇将，三军同晏眠。（《遣兴三首》之一）

高秋登塞山，南望马邑州。降虏东击胡，壮健尽不留。穹庐莽牢落，上有行云愁。老弱哭道路，愿闻甲兵休。邺中何萧条，死人积如丘。诸将已茅土，载驱谁与谋。（《遣兴二首》之二）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亡命婴祸罗，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弃绝父母恩，吞声行负戈。（《前出塞九首》之一）

出门日已远，不受徒旅欺。骨肉恩岂断，男儿死无时。走马脱辔头，手中挑青丝。捷下万仞冈，俯身试拳旗。（《前出塞九首》之二）

磨刀鸣咽水，水赤刃伤手。欲轻肠断声，心绪乱已久。丈夫誓许国，愤惋复何有。功名图麒麟，战骨当速朽。（《前出塞九首》之三）

送徒既有长，远戍亦有身。生死向前去，不劳吏怒嗔。路逢相识人，附书与六亲。哀哉两决绝，不复同苦辛。（《前出塞九首》之四）

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前出塞九首》之六）

驱马天雨雪，军行入高山。逢危抱寒石，指落曾冰间。已去汉月远，何时筑城还。浮云暮南征，可望不可攀。（《前出塞九首》之七）

朝进东门营，暮上河阳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平沙列万幕，部伍各见招。中天悬明月，令严夜寂寥。悲笳数声动，壮士惨不骄。借问大将谁，恐是霍嫫媠。（《后出塞五首》之二）

献凯日继踵，两蕃（奚和契丹）静无虞。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越罗与楚练，照耀与台躯。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后出塞五首》之四）《前出塞》揭露唐玄宗的穷兵黩武，给国内人民带来了灾祸，内容已经比较深刻；《后出塞》更直接指出唐玄宗宠任安禄山，有人告安禄山反者，玄宗必缚送禄山，“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以致道路以目，无敢言者，危机更是四伏。

杜甫在天宝十载所作的《兵车行》里，对唐玄宗的穷兵黩武给人民带来无限灾祸，也致以抨击。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千云霄。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里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长者虽有问，役者敢伸恨。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战争给人民带来苦难。从张九龄罢相之后，李林甫、杨国忠相继擅权，唐玄宗也宠任他们，朝政更加混浊了。长安城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赴奉先咏怀》）。杨氏一门显赫，杜甫天宝十三载所作的《丽人行》，就是讽刺他们的。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头上何所有？翠微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袂稳称身。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犀筋厌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黄门飞鞚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箫管哀吟感鬼神，宾从杂还实要津。后来鞍马何逡巡，当轩下马立锦茵。杨花雪落覆白苹，青鸟飞去衔红巾。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前人评为“无一刺讥语，描摹处，语语刺讥；无一慨叹声，点逗处，声声慨叹”（浦起龙《读杜心解》）。这几句话，是非常确切的。

天宝末，关中水旱不时，长安米价高涨，杜甫置家奉先（今陕西蒲城县）。天宝十四载（公元七五五年）冬十一月，杜甫从长安至奉先探亲，想不到他的幼子已经病死了。“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吾宁舍一爱，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杜甫探亲以后，赶回长安，那时安禄山已在河北起兵，并向东都进军了。天宝十五载六月，潼关失守，玄宗逃蜀；七月，肃宗即位灵武，杜甫来不及逃出长安，就留在沦陷区里。在这一时期，他写了不少杰出的作品，如：

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忆昔霓旌下南苑，苑中万物生颜色。诏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箭正坠双飞翼。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人生有

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哀江头》）

杜甫在至德二载（公元七五七年），于长安城内路上，见到没有逃出长安的李唐王孙，又作了《哀王孙》。

长安城头头白乌，夜飞延秋门上呼。又向人家啄大屋，屋底达官走避胡。金鞭断折九马死，骨肉不得同驰驱。腰下宝玦金珊瑚，可怜王孙泣路隅。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已经百日窜荆棘，身上无有完肌肤。高帝子孙尽龙准，龙种自与常人殊。豺狼在邑龙在野，王孙善保千金躯。不敢长语临路衢，且为王孙立斯须。昨夜东风吹血腥，东来橐驼满旧都。朔方健儿好身手，昔何勇锐今何愚。窃闻天子已传位，圣德北服南单于。花门（指回纥）剺面请雪耻，慎勿出口他人狙。哀哉王孙慎勿疏，五陵佳气无时无。

至德元载（公元七五六年）的十月，唐肃宗用宰相房琯议，官军和安禄山的军队战于陈陶斜（咸阳县境内），房琯不识时务，采用春秋车战之法，以战车二千乘，马步夹在两边出击，安禄山的军队，都是渔阳精骑，顺风纵火鼓譟而进，杀得官军大败，官军伤折了四万余人之多。杜甫在沦陷区听到这件大事，作《悲陈陶》和《悲青坂》二诗：

孟冬十月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悲陈陶》）

我军青坂（在陈陶斜附近）在东门，天寒饮马太白窟。黄头奚儿日向西，数骑弯弓敢驰突。山雪河冰野萧瑟，青是烽烟白人骨。焉得附书与我军，忍待明年莫仓卒。（《悲青坂》）

杜甫在沦陷区里，还做了不少律诗，今录四首：

战哭多新鬼，愁吟独老翁。乱云低薄暮，急雪舞回风。瓢弃樽无缘，炉存火似红。数州消息断，愁坐正书空。（《对雪》）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乾。（《月夜》）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春望》）

无家对寒食，有泪如金波。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化离放红蕊，想像嚙青蛾。牛女漫愁思，秋期犹渡河。（《一百五日夜对月》）

到了至德二载的四月，杜甫逃出沦陷区，跑到肃宗驻军所在地凤翔（今陕西凤翔县），作了《喜达行在所》三首。其第二首云：

愁思胡笳夕，凄凉汉苑春。生还今日事，问道暂时人。司隶章初睹，南阳气已新。喜心翻倒极，呜咽泪沾巾。

第一首是提到喜达凤翔以后，“所亲惊老瘦，辛苦贼中来”。第三首起句是“死去凭谁报，归来始自怜”。第二首是喜极而悲，看到唐肃宗统治区的气象，坚信恢复有望。唐肃宗任杜甫为拾遗，并允许他返鄜州省家。诗人在《北征》诗中说：“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室。”“况我堕胡尘，及归尽华发。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见爷背面啼，垢腻脚不袜。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海图圻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凤，颠倒在短褐。”“那无囊中帛，救汝寒慄慄。粉黛亦解苞，衾裯稍罗列。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问事竞挽

须，谁能即嗔喝。翻思在贼愁，甘受杂乱聒。”把经过乱离之后，和家人重新团聚的一种悲喜交集情绪完全写出来了，写得既逼真，又动人。诗人的《羌村》三首，感情也非常真挚。

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歔。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

晚岁迫偷生，还家少欢趣。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忆昔好追凉，故绕池边树。萧萧北风劲，抚事煎百虑。赖知禾黍收，已觉糟床注。如今足斟酌，且用慰迟暮。

群鸡正乱叫，客至鸡门争。驱鸡上树木，始闻叩柴荆。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涕纵横。

第一首叙归客到家而喜，第二首叙到家后事，第三首叙述邻里之情，都非常真切动人。

杜甫到达凤翔以后，拜左拾遗。不久，唐军收复两京，杜甫以救房琯之故，由左拾遗出为华州司功参军。在这一段时间内，诗人写出了他杰出的代表作三吏、三别。

士卒何草草，筑城潼关道。大城铁不如，小城万丈余。借问潼关吏，修关还备胡。要我下马行，为我指山隅。连云列战格，飞鸟不能逾。胡来但自守，岂复忧西都。丈人视要处，窄狭容单车。艰难奋长戟，千古用一夫。

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潼关吏》）

暮投石壕村（陕州陕县石壕镇），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唯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石壕吏》）

兔丝附女萝，引蔓更不长。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傍。结发为君妻，席不暖君床。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君行虽不远，守边赴河阳。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父母养我时，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誓欲随君去，形势反苍黄。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自嗟贫家女，久致罗襦裳。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仰视百鸟飞，大小必双翔。人事多错迕，与君永相望。（《新婚别》）

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贱子因阵败，归来寻旧蹊。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四邻何所有，三老孤妻。宿鸟恋本枝，安辞且穷栖。方春独荷锄，日暮还灌畦。县吏知我至，召令习鼓鞞。虽从本州役，内顾无所携。近行止一身，远去终转迷。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永痛长病母，五年委沟溪。生我不得力，终身两酸嘶。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无家别》）

诗人控诉了战争对社会带来的残破景象，由於长期战乱，丁壮尽发，把才结婚不到一天的丈夫以及年老老妪，都被强徵入伍或拉去服役，真是惨极人寰，不忍卒读。有人赞誉杜甫的诗歌是诗史，正是指这些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而言的，这真正是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民主性精华。

肃宗乾元二年（公元七五九年）秋，关辅饥乱，杜甫全家生活困难，不

得不弃官携家至秦州（治上邽，今甘肃天水市），后住同谷（今甘肃成县）。他的《秦州杂诗》二十首，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迟回度陇怯，浩荡及关愁。水落鱼龙夜，山空鸟鼠秋。西征问烽火，心折此淹留。（《秦州杂诗二十首》之一）

鼓角缘边郡，川原欲夜时。秋听殷地发，风散入云悲。抱叶寒蝉静，归山独鸟迟。万方声一概，吾道欲何之！（《秦州杂诗二十首》之四）

云气接昆仑，涔涔塞雨繁。羌童看渭水，使客向河源。烟火军中幕，牛羊岭上村。所居秋草净，正闭小蓬门。（《秦州杂诗二十首》之十）

传道东柯谷，深藏数十家。对门藤盖瓦，映竹水穿沙。瘦地翻宜粟，阳坡可种瓜。船人近相报，但恐失桃花。（《秦州杂诗二十首》之十三）

地僻秋将尽，山高客未归。塞云多断续，边日少光辉。警急烽常报，传闻檄屡飞。西戎外甥国，何得迕天威。（《秦州杂诗二十首》之十八）

一县葡萄熟，秋山苜蓿多。关云常带雨，塞水不成河。羌女轻烽燧，胡儿制骆驼。自伤迟暮眼，丧乱饱经过。（《寓目》）

野寺残僧少，山园细路高。麝香眠石竹，鹦鹉啄金桃。乱石通人过，悬崖置屋牢。上方重阁晚，百里见秋豪。（《山寺》）

愁眼看霜露，寒城菊自花。天风随断柳，客泪堕清笳。水净楼影直，山昏塞日斜。夜来归鸟尽，啼杀后栖鸦。（《遣怀》）安史乱后，西陲边防空虚，吐蕃乘虚东窥，秦陇经常吃紧，杜甫亦不得不流寓入蜀了。

在秦州期间，杜甫写了一首《佳人》，大概根据当时实有其人来写的。

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白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关中昔丧败，兄弟遭杀戮。官高何足论，不得收骨肉。世情恶衰歇，万事随转烛。夫婿轻薄儿，新人美如玉。合婚尚知时，鸳鸯不独宿。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侍婢卖珠回，牵萝补茅屋。摘花不插鬓，采柏动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翠竹。

这位绝代佳人，尽管兄弟遭难，本人又为夫婿所遗弃，但洁身独居，杜甫笔下写出了个寂寞而又坚贞的女性形象。

在这个时期，有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李白染永王璘事，长流夜郎了。杜甫在天宝初年就和李白认识，李白要比杜甫年长十余岁，杜甫是非常尊敬李白的。他说：“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他赠李白诗说：“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赠李白》）。他称赞李白：“昔年有狂客（贺知章），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他怀念李白，诗云：“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春日忆李白》）。杜甫直觉是李白太天真，会挨人整，“不见李生久（原注：近无李白消息），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不见》）。“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指屈原）语，投诗赠汨罗”（《天末怀李白》）。不幸的消息果然传来了，李白长流夜郎，杜甫又做了《梦李白》二首，这两首诗，不是记梦，而可以当作李白的挽歌。

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恐非平生魂，路远不可测。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山黑。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

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告归常局促，苦道来不易。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杜甫对李白的真挚友情，在这二首诗里，充分作了说明。

杜甫于乾元二年（公元七五九年）的冬晚，全家到达成都，初寓浣花溪寺，后来就在浣花溪上，种树植竹，营立草堂，他有个王姓表弟，送他营置草堂的费用，杜甫到处向人觅桃、觅竹、觅松树子、觅桤木，在草堂四围栽植，杜甫就这样算在成都定居下来了。他这时的代表作有：

锦里烟尘外，江村八九家。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卜宅从兹老，为农去国赊。远惭勾漏令（葛洪），不得问丹砂。（《为农》）

风色萧萧暮，江头人不行。村春雨外急，邻火夜深明。胡羯何多难，樵渔寄此生。中原有兄弟，万里正含情。（《村夜》）

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风含翠筱娟娟静，雨裊红蕖冉冉香。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欲填沟壑唯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狂夫》）

时出碧鸡坊，西郊向草堂。市桥官柳细，江路野梅香。傍架齐书帙，看题减药囊，无人觉来往，疏懒意何长。（《西郊》）

锦里先生乌角巾，园收芋栗未全贫。惯看宾客儿童喜，得食阶除鸟雀驯。秋水才深四五尺，野航恰受两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门月色新。（《南邻》）

岁暮远为客，边隅还用兵。烟尘犯雪岭，鼓角动江城。天地日流血，朝廷谁请缨。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岁暮》）

檐影微微落，津流脉脉斜。野船明细火，宿雁聚寒沙。云掩初弦月，香传小树花。邻人有美酒，稚子夜能赊。（《遣意二首》之二）

三月桃花浪，江流复旧痕。朝来没沙尾，碧色动柴门。接缕垂芳饵，连筒灌小园。已添无数鸟，争浴故相喧。（《春水》）

坦腹江亭暖，长吟夜望时。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故林归未得，排闷强裁诗。（《江亭》）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春夜喜雨》）

去郭轩楹敞，无村眺望赊。澄江平少岸，幽树晚多花。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城中十万户，此地两三家。（《水槛遣心二首》之一）

手种桃李非无主，野老墙低还似花。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绝句漫兴九首》之二）

肠断春江欲尽头，杖藜徐步立芳洲。颠狂柳絮随风去，轻薄桃花逐水流。（《绝句漫兴九首》之五）

黄四娘家花满溪，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绝句漫兴九首》之八）

不是爱花即肯死，只恐花尽老相催。繁枝容易纷纷落，嫩叶商量细细开。（《绝句漫兴九首》之九）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绝句四首》之三）

杜甫的浣花草堂，是名符其实的草堂，堂顶是用茅草盖的，决不具有今天这样的规模。一到秋天风雨交集，茅盖的草堂，屋顶为风所疾卷，处处破

漏，杜甫非常感慨，曾作了一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以咏其事。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度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铁，骄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乾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通晓到达天明）。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诗人的流离颠沛生活，是很艰苦的了；但诗人还是关心民瘼，思想境界却是很高的。

宝应元年（公元七六二年）秋，杜甫曾离成都去梓州（今四川三台县），住了一年多。这一年多，也做了不少诗：

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卷帘残月影，高枕远江声。计拙无衣食，途穷仗友生。老妻书数纸，应悉未归情。（《客夜》）

秋窗犹曙色，落木更天风。日出寒山外，江流宿雾中。圣朝无弃物，老病已成翁。多少残生事，飘零似转篷。（《客亭》）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寺下春江深不流，山腰官阁回添愁。含风翠壁孤云细，背日丹枫万木稠。小院回廊春寂寂，浴凫飞鹭晚悠悠。诸天合在藤萝外，昏黑应须到上头。（《涪城县香积寺官阁》）

凉风动万里，群盗尚纵横。家远传书日，秋来为客情。愁窥高鸟过，老逐众人行。始欲投三峡，何由见两京。（《悲秋》）

十室几人在，千山空自多。路衢唯见哭，城市不闻歌。漂梗无安地，衔枚有荷戈。官军未通蜀，吾道竟如何。（《征夫》）

南国昼多雾，北风天正寒。路危行木杪，身远宿云端。山鬼吹灯灭，厨人语夜阑。鸡鸣问前馆，世乱敢求安。（《山馆》）

看花虽郭内，倚杖即溪边。山县早休市，江桥春聚船。狎鸥轻白浪，归雁喜青天。物色兼生意，凄凉忆去年。（《倚杖》盐亭县作）

广德二年（公元七六四年）冬，严武再任剑南东西川节度使，杜甫和严武是世交，武辟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杜甫又回到成都定居下来了。他这时的代表作有：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来天地，王垒浮云变古今。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父吟》。（《登楼》）

客里有所过，归来知路难。开门野鼠走，散帙壁鱼乾。洗杓开新酝，低头拭小盘。凭谁给曲蘖，细酌老江干。（《归来》）

秋风裊裊动高旌，玉帐分弓射虏营。已收滴博（的博岭在维州）云间戍，更夺蓬婆（大雪山一名蓬婆山）雪外城。（《奉和严大夫军城早秋》）

清秋幕府井梧寒，独宿江城蜡炬残，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风尘荏苒音书绝，关塞萧条行路难。已忍伶俜十年事，强移栖息一枝安。（《宿府》）

永泰元年（公元七六五年）夏，严武病卒，郭英乂代严武镇成都。同年，

崔宁杀郭英义，蜀中大乱。杜甫也离开成都东下了。他有诗：

迢递来三蜀，蹉跎有六年。客身逢故旧，发兴自林泉。过懒从衣结，频游任履穿。藩篱无限景，恣意向江天。（《春日江村五首》之二）

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万事已黄发，残生随白鸥。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去蜀》）杜甫虽然不得已离去成都，但他对浣花草堂还是留恋不舍的。

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层轩皆面水，老树饱经霜。雪岭界天白，锦城熏日黄。惜哉形胜地，回首一茫茫。

（《怀锦水居止二首》之次章）

杜甫经过渝州（今四川重庆市），到达云安（今四川云阳县北），沿路有诗：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旅夜书怀》）

禹庙（在忠县）空山里，秋风落日斜。荒庭垂橘柚，古屋画龙蛇。云气生虚壁，江声走白沙。早知乘四载，疏凿控三巴。（《禹庙》）

寒轻市上山烟碧，日满楼前江雾黄。负盐出井此溪女，打鼓发船何郡郎。新亭举目风景切，茂陵著书消渴长。春花不愁不烂熳，楚客唯听棹相将。（《十二月一日三首》之二）

峡里云安县，江楼翼瓦齐。两边山木合，终日子规啼。眇眇春风见，萧萧夜色凄。客愁那听此，故作傍人低。（《子规》）

杜甫在途中听到官军纪律败坏，又作了《三绝句》，控诉了他们的罪行。

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

二十一家同入蜀，唯残一人出骆谷（在陕西周至县）。自说二女啮臂时，回头却向秦云哭。

殿前兵马（时中官典禁军）虽骁雄，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

杜甫在大历元年（公元七六六年）季春，到达夔州（今四川奉节县）。夔州诗，是杜甫诗集中的精华部分。

中巴之东巴东山，江水开辟流其间。白帝高为三峡镇，瞿塘险过百牢关。（《夔州歌十绝句》之一）

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长年三老（梢工）长歌里，白昼摊钱高浪中。（《夔州歌十绝句》之七）

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尘匣元开镜，风帘自上钩。兔应疑鹤发，蟾亦恋貂裘。斟酌姮娥寡，天寒奈九秋。（《月》）

白帝城中云出门，白帝城下雨翻盆。高江急峡雷霆斗，古木苍藤日月昏。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妇诛求尽，恻哭秋原何处村。（《白帝》）

盗贼浮生困，诛求异俗贫。空村唯见鸟，落日不逢人。步壑风吹面，看松露滴身。远山回白首，战地有黄尘。（《东屯北崦》）

稻荻空云水，川平对石门。寒风疏草木，旭日散鸡豚。野哭初闻战，樵歌稍出村。无家问消息，作客信乾坤。（《刈稻了咏怀》）

壮志久零落，白首寄人间。天下兵常斗，江东客未还。穷猿号雨雪，老马怯关山。武德开元际，苍生岂重攀。（《有叹》）

岁暮阴阳催短景，天涯霜雪霁寒宵。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

野哭几家闻战伐，夷歌是处起渔樵。卧龙（诸葛亮）白马（公孙述）终黄土，人事音书漫寂寥。（《阁夜》）

卧病拥塞在峡中，潇湘洞庭虚映空。楚天不断四时雨，巫峡长吹万里风。沙上草阁柳新暗，城边野池莲欲红。暮春鸳鹭立洲渚，挟子翻飞还一丛。（《暮春》）

暮春三月巫峡长，晶晶行云浮日光。雷声忽送千峰雨，花气浑如百和香。黄莺过水翻回去，燕子衔泥湿不妨。飞阁卷帘图画里，虚无只少对潇湘。（《即事》）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又呈吴郎》）

楚王宫北正黄昏，白帝城西过雨痕。返照入江翻石壁，归云拥树失山村。衰年肺病唯高枕，绝塞愁时早闭门。不可久留豺虎乱，南方实有未招魂。（《返照》）

诗人一方面在过著非常艰苦的村居生活，一方面他却并没有忘记国家大事，对时政得失，念念未忘。现举《诸将》五首为例：

汉朝陵墓对南山，胡虏千秋尚入关。昨日玉鱼蒙葬地，早时金盃出人间（言关中皇陵被掘）。见愁汗马西戎（指吐蕃）逼，曾闪朱旗北斗殷。多少材官守泾渭，将军且莫破愁颜。（《诸将五首》之一）

韩公（张仁愿封韩国公）本意筑三城，拟绝天骄拔汉旌。岂谓尽烦回纥马，翻然远救朔方兵。胡来不觉潼关隘，龙起犹闻晋水清。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诸将五首》之二）

洛阳宫殿化为烽，休道秦关百二重。沧海未全归禹贡，蓟门何处尽尧封。朝廷衮职虽多预，天下军储不自供。

稍喜临边王相国（王缙），肯销金甲事春农。（《诸将五首》之三）

另外，杜甫还做了《秋兴》八首：

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丛菊两开（在夔州已两秋）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秋兴八首》之一）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听猿实下三声泪，奉使虚随八月槎。画省香炉违伏枕，山楼粉堞隐悲笳。请看石上藤萝月，已映州前芦荻花。（《秋兴八首》之二）

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直北关山金鼓震，征西车马羽车驰。

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秋兴八首》之四）

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三峡楼台淹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羯胡事主终无赖，词客哀时且未还。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咏怀古迹五首》之一）

夔州不是久居之所，大历三年（公元七六八年），杜甫终于离开夔州出峡了。杜甫以前有“即从巴峡穿巫峡，使下襄阳向洛阳”，但因政局变幻，因循未果。这次出峡，是否能从江陵直趋襄阳呢？还得看时局来决定。杜甫在出峡路上作了《咏怀古迹》五首。他在白帝城住了二年多，对这个白帝城的古迹，就做了二首。

蜀主窥吴幸三峡，崩年亦在永安宫。翠华想像空山里，玉殿虚无野寺中。

古庙杉松巢水鹤，岁时伏腊走村翁。武侯祠屋长邻近，一体君臣祭祀同。（《咏怀古迹五首》之四）

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咏怀古迹五首》之五）

秭归有王昭君旧居，巫山有楚襄王宫，江陵有宋玉旧居，杜甫经过此地，也做了两首诗：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昭君村在秭归）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咏怀古迹五首》之五）

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咏怀古迹五首》之二）

杜甫到达江陵之后，那时卫伯玉担任荆南节度使，他是军功出身的，并不知道杜甫是一代诗伯，杜甫很快就离开了江陵，一路上又作了不少诗。杜甫本想去淮南，不知什麼缘故，又折而至湖南。

商胡离别下扬州，忆上西陵故驿楼。为问淮南米贵贱，老父乘兴欲东游。（《解闷十二首》之二）

挂帆早发刘郎浦（在石首），疾风飒飒昏亭午。舟中无日不沙尘，岸上空村尽豺虎。十日北风风未回，客行岁晚晚相催。白头厌伴渔人宿，黄帽青鞋归去来。（《登刘郎浦》）

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片云天共黑，永夜月同孤。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江汉》）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登岳阳楼》）

百丈（纤舟之绳）牵江色，孤舟泛日斜。兴来犹杖履，目断更云沙。山鬼迷春竹，湘娥倚暮花。湖南清绝地，

万古一长嗟。（湘夫人《祠南夕望》）

欲雪违胡地，先花别楚云。郤过清渭影，高起洞庭群。塞北春阴暮，江南日色熏。伤弓流落羽，行断不堪闻。（《归雁二首》之二）

据《旧唐书》说，杜甫“泝沿湘流，游衡山。……尝游岳庙，为暴雨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阳令知之，自棹舟迎甫而还”。永泰二年（公元七六六年），甫病卒，年五十九。

李白和杜甫，各有所长。李白天才横逸，他的诗不是容易学到的。杜甫诗，功力深，宋人秦少游尝论：“杜子美之于诗，实积众流之长。”“昔苏武、李陵之诗，长于高妙；曹植、刘公干之诗，长于豪逸；陶潜、阮籍之诗，长于冲澹；谢灵运、鲍照之诗，长于峻洁；徐陵、庾信之诗，长于藻丽。于是子美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澹之趣，兼峻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及诸家之长，子美亦不能独至于此也。”“呜呼！子美亦集诗之大成欤？”杜牧《读杜诗》作：“杜诗韩笔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搔。天外凤凰谁得髓，无人解合续弦胶。”对杜甫的诗，韩愈的文，可谓推崇备至。韩愈在《调张籍》诗中有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后此之人，不是想抑杜扬李，便是想抑李扬杜，我看都是不必要的。诗人都有自己的诗歌风格，都各有专长。严羽说：“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

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太白《梦游天姥吟》、《远离别》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等篇，太白不能作。”李、杜诸公都创造了自己诗歌的独特风格，这也正反映了盛唐伟大时期诗人的各个不同风貌。

中唐诗人天宝以后，一直到唐文宗太和九年（公元八三五年），我把它称做中唐，甘露事变以后，我把它划入晚唐。肃宗、代宗、德宗三朝，是一个时期。宪宗元和，又是一个时期，韩愈、张籍、王建是其代表。穆宗长庆，白居易、元稹出，又是一个时期。

讲到大历、贞元，有人一定会想到大历十子，实际十子诗歌，托寄不深，因此就不一一介绍了。龚自珍诗：“天教伪体领风花，一代人材有岁差。我论文章恕中晚，略工感慨是名家”（《歌筵有乞书扇者》）。我对中晚唐诗人作品的选择标准，就是要求略工感慨。现在先从韦应物介绍起。

韦应物，京兆人。少以三卫事唐玄宗，他在《温泉行》里说到自己“出身天宝今年几，顽钝如槌命如纸。作官不了却来归，还是杜陵一男子。北风惨惨投温泉，忽忆先皇游幸年，身骑马引天仗，直入华清列御前。”（下略）在《宴李录事》诗题下说到：“与君十五事皇闱，拂晓炉烟上赤墀。花开汉苑经过处，雪下骊山沐浴时。”（下略）可见他早年是一个游侠年少，晚更折节读书，官至苏州刺史（约在德宗贞元四年至七年之间，从傅璇琮同志《唐代诗人丛考》说）。他的诗闲澹简远，人比之陶潜，并称陶韦。他的名句最为人所艳称的，如“兵卫森画戟，宴寝凝清香。海上风雨至，逍遥池阁凉”（《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集》）。以为雍容华贵，而又澹雅绝俗，一般不能兼具，韦应物却完全把两者融合起来了。

韦应物的代表作很多，尤其是五言古诗，如：

黄鸟何关关，幽兰亦靡靡。此时深闺妇，日照纱窗里。娟娟双青蛾，微微启玉齿。自惜桃李年，误身游侠子。

无事久离别，不知今生死。（《拟古诗十二首》之二）

嘉树蔼初绿，靡芜吐幽芳。君子不在赏，寄之云路长。路长信难越，惜此芳时歇。孤鸟去不还，缄情向天末。（《拟古诗十二首》之五）

月满秋夜长，惊鸟号北林。天河横未落，斗柄当西南。寒蛩悲洞房，好鸟无遗音。商飙一夕至，独宿怀重衾。

旧交日千里，隔我浮与沉。人生岂草木，寒暑移此心。（《拟古诗十二首》之六）

春至林木变，洞房夕含清。单居谁能裁，好鸟对我鸣。良人久燕赵，新爱移平生。别时双鸳鸯，留此千恨情。

碧草生旧迹，绿琴歇芳声。思将魂梦欢，反侧寐不成。揽衣迷所思，起望空前庭。孤影中自恻，不知双涕零。（《拟古诗十二首》之九）

有客天一方，寄我孤桐琴。迢迢万里隔，托此传幽音。冰霜中自结，龙凤相与吟。弦以明直道，漆以固交深。（《拟古诗十二首》之十一）

白日淇上灭，空闺生远愁。寸心不可限，淇水长悠悠。芳树自妍芳，春禽自相求。徘徊东西厢，孤妾谁与俦。年华逐丝泪，一落俱不收。（《拟古诗十二首》之十二）采用屈原《离骚》的手法，用美人香草以喻自己的坚贞不渝之操，文体雅洁，感情真挚婉委，在唐诗里，风格确是很高的。又如：

春罗双鸳鸯，出自寒夜女。心精烟雾色，指历千万绪。长安贵豪家，妖艳不可数。裁此百日功，唯将一朝舞。

舞罢复裁新，岂思劳者苦。（《杂体五首》之五）他同情劳动妇女，此诗托意深远，具有社会内容。

官府徵白丁，言采篮溪玉。绝岭夜无家，深榛雨中宿。独妇饷粮还，哀哀舍南哭。（《采玉行》）对从事采玉的丁壮和家属，都表示了深切的同情。

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田家几日闲，耕种从此始。丁壮俱在野，场圃亦就理。归来景常晏，饮犊西涧水。

饥敏不自苦，膏泽且为喜。仓廩无宿储，徭役犹未已。方惭不耕者，禄食出闾里。（《观田家》）韦应物在这首诗里，讲到了田家的“仓廩无宿储，徭役犹未已”，自惭高官，禄食出于闾里，确实已经看到问题的本质了。

韦应物的赠答诗，也有清新可诵的地方，如：

结茅临古渡，卧见长淮流。窗里人将老，门前树已秋。寒山独过雁，暮雨远来舟。日夕逢归客，那能忘旧游。（《淮上遇洛阳李主簿》）

楚江微雨里，建业暮钟时，漠漠帆来重，冥冥鸟去迟。海门深不见，浦树远含滋。相送情无限，沾巾比散丝（《赋得暮雨送李胄》）韦应物的短诗，也清新可喜，如：

怀君属秋夜，散步咏凉天。山空松子落，幽人应未眠。（《秋夜寄丘二十二员外》）

九日驱驰一日闲，寻君不遇又空还。怪道诗人清人骨，门对寒流雪满山。（《沐暇日访王侍御不遇》）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滁州西涧》）

怜君卧病思新橘，试摘犹酸亦未黄。书后欲题三百颗，洞庭须待满林霜。（《答郑骑曹青橘绝句》）

常建，开元十五年（公元七二七年），以进士及第。官盱眙县尉（今安徽盱眙县东北）尉卒。

常建的代表作，如：

翩翩云中使，来问太原卒。百战苦不归，刀头怨明月。塞云随阵落，寒日傍城灭。城下有孤妻，哀哀哭枯骨。（《塞上曲》）

嫖姚北伐时，深入几千里。战余落日黄，军败鼓声死。常闻汉飞将，可夺单于垒。今与山鬼邻，残兵哭辽水。（《吊王将军墓》）

铁马胡裘出汉营，分麾百道救龙城。左贤未遁旌竿折，过在将军不在兵。（《塞下》）

玉帛朝回望帝乡，乌孙归去不称王。天涯静处无消息，兵气消为日月光。（《塞下曲四首》之一）

北海阴风动地来，明君祠上望龙堆。髑髅皆是长城卒，日暮沙场飞作灰。（《塞下曲四首》之二）

龙斗雌雄势已分，山崩鬼哭恨将军。黄河直北千余里，冤气苍茫成黑云。（《塞下曲四首》之三）这几首边塞诗，都具有深厚的社会内容。

戎昱，荆南人，进士及第。卫伯玉镇荆南（公元七六三至七七六年），辟为从事。德宗世，历辰、虔二州刺史。

戎昱的代表作，如：上山望胡兵，胡马驰骤速。黄河冰已合，意又向南牧。嫖姚夜出军，霜雪割人肉。（《塞下曲》之二）

塞北无草木，乌鸢巢僵尸。泱泱沙漠空，终日胡风吹。战卒多苦辛，苦辛无四时。（《塞下曲》之三）

城上画角哀，即知兵心苦。试问左右人，无言泪如雨，何意休明时，终年事鼙鼓。（《塞下曲》之五）

北风凋白草，胡马日骎骎。夜后戍楼月，秋来边将心。铁衣霜雾重，战马岁年深。自有卢龙塞，烟尘飞至今。（《塞下曲》之六）

汉将归来虏塞空，旌旗初下玉关东。高蹄战马三千匹，落日平原秋草中。（《塞下曲》）

胡风略地烧连山，碎叶孤城未下关。山头烽子声声叫，知是将军夜猎还。（《塞上曲》）这些边塞诗的内容，都很清新。

安史之乱，唐王朝借回纥兵来和他作战，收复洛阳，回纥大肆劫掠，民人遭殃，在戎昱的诗歌里，也有所反映。

官军收洛阳，家住洛阳里。夫婿与兄弟，目前见伤死。吞声不许哭，还遣衣罗绮。上马随匈奴，数秋黄尘里。

生为名家女，死作塞垣鬼。乡国无还期，天津（桥名在洛阳）哭流水。（《苦战行五首》之二）

妾家清河边，七叶承貂蝉。身为最小女，偏得浑家怜。亲戚不相识，幽闺十五年。有时最远出，只到中门前。

前年狂胡来，惧死翻生全。今秋官军至，岂意遭戈鋌。匈奴为先锋，长鼻黄发拳。弯弓猎生人，百步牛羊膻。脱身落虎口，不及归黄泉。苦哉难重陈，暗哭苍苍天。（《苦战行五首》之四）

可汗奉亲诏，今日归燕山（燕然山）。忽如乱刀剑，揽妾心肠间。出户望北荒，迢迢玉门关。生人为死别，有去无时还。汉月割妾心，胡风凋妾颜。去去断绝魂，叫天天不闻。（《苦战行五首》之五）

戎昱的七绝杂诗，也清丽可喜。

好去春风湖上亭，柳条藤蔓系离情。黄莺久住浑相识，欲别频啼四五声。（《移家别湖上亭》）

刘长卿，字文房。唐德宗建中（公元七八 至七八四年）中，官至随州刺史。权德舆誉之为“五言长城”。

刘长卿的代表作，如：

逢君穆陵路，匹马向桑乾。楚国苍山古，幽州白日寒。城池百战后，耆旧几家残。处处蓬蒿遍，归人掩泪看。（《穆陵关北逢人归渔阳》）

草枯秋塞上，望见渔阳郭。胡马嘶一声，汉兵泪双落。谁为吮疮者，此事今人薄。（《从军六首》之六）

夜静掩寒城，清砧发何处。声声捣秋月，肠断卢龙戍。未得寄征人，愁霜复愁露。（《月夜听砧》）

十年多难与君同，几处移家逐转蓬。白首相逢征战地，青春已过乱离中。行人杳杳看西月，归马萧萧向北风。

汉水楚云千万里，天涯此别恨无穷。（《送李录事兄归襄邓》）

孤城上与白云齐，万古荒凉楚水西。官舍已空秋草绿，女墙犹在夜鸟啼。平江渺渺来人远，落日亭亭向客低。沙鸟不知陵谷变，朝飞暮去弋阳溪。（《登余干古县城》）

汀洲无浪复无烟，楚客相思益渺然。汉口夕阳斜渡鸟，洞庭秋水远连天。孤城背岭寒吹角，独戍临江夜泊船。贾谊上书忧汉室，长沙谪去古今怜。（《自夏口至鹦鹉洲夕望岳阳寄元中丞》）

刘长卿的五七言律诗，虽未必通首皆佳，然时时警句间发，至堪吟咏，

如“渡口月初上，邻家渔未归”（《余干旅舍》），“青松临古路，白日满寒山”（《宿北山禅寺兰若》），“远磬秋山里，清猿古水中”（《登思禅寺上方题修竹茂松》），“乱鸦投落日，疲马向空山”（《恩敕重推使牒追赴苏州次前溪馆作》），“离心秋草绿，挥手暮帆开”（《奉送裴员外赴上都》），“鸦归长郭暮，草映大堤春”（《过李将军南郑林园观妓》），“山含秋色近，鸟度夕阳迟”（《陪王明府泛舟》），“浅深看水石，来往逐云山”（《送张栩扶持之睦州》），“万里通秋雁，千峰共夕阳”（《移使鄂州次岷阳馆怀旧居》），“苍苍来暮雨，淼淼逐寒流”（《重阳日鄂城楼送屈突司直》），“寒潮落瓜步，秋色上芜城”（《更被奏留淮南送从弟罢使江东》），“湖山春草遍，云木夕阳微”（《送舍弟之鄱阳居》），“蓬蒿千里闭，村树几家全”（《送袁明府之任》），“向人寒烛尽，带雨夜钟沉”（《秋夜雨中诸公过灵光寺所居》），“明月天涯夜，青山江上秋”（《松江独宿》），“春随千里道，河带万家城”（《送史九赴任宁陵兼呈单父史八时监察五兄初入台》），“长江一帆远，落日五湖春”（《饯别王十一南游》），“寒光生极浦，暮雪映沧洲”（《重过宣峰寺山居寄灵一上人》），“岸明残雪在，潮满夕阳多”（《送韩司直》），“江城寒背日，湓水暮连天”（《送青苗郑判官归江西》），“晚景千峰乱，晴江一鸟迟”（《送荀八过山阴旧县兼寄剡中诸官》），“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别严士元》），“水近偏逢寒气早，山深常见日光迟”（《感怀》），“旧浦满来移渡口，垂杨深处有人家”（《上巳日越中与鲍侍郎泛舟耶溪》）。这些警句，都曾传诵人口。

刘长卿的五言绝句，也有非常好的，如：

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逢雪宿芙蓉山主人》）

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听弹琴》）

孤云将野鹤，岂向人间住。莫买沃洲山，时人已知处。（《送方外上人》）

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荷笠带斜阳，青山独归远。（《送灵澈上人》）

六言诗是比较难做的，刘长卿的六言诗，如：

危石才通鸟道，空山更有人家。桃源定在深处，涧水浮来落花。（《寻张逸人山居》）

对水看山别离，孤舟日暮行迟。江南江北春早，独向金陵去时。（《发越州赴润州使院留别鲍侍御》）

清川永路何极，落日孤舟解携。鸟向平芜远近，人随流水东西。白云千里万里，明月前溪后溪。惆怅长沙谪去，江潭芳草萋萋。（《苕溪酬梁耿别后见寄》）刘长卿的七绝，如：

秋江渺渺水空波，越客孤舟欲榜歌。手折衰杨悲老大，故人零落已无多。（《七里滩重送》）

萧条独向汝南行，客路多逢汉骑行。古木苍苍离乱后，几家同住一孤城。（《新息道中作》）山色湖光并在东，扁舟归去有樵风。莫道野人无外事，开田凿井白云中。（《东湖送朱逸人归》）

刘长卿诗歌的评价，在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里，只说到他“诗体虽不清奇，甚能链饰，大抵十首已上，语意稍同，于落句尤甚，思锐才窄也”。到了皇甫湜，对刘长卿诗歌的评价，已有提高，说“诗未有刘长卿一句，已呼阮籍为老兵矣”。清人卢文弨，对他评价更高，说“随州诗固不及浣花翁

（杜甫）之博大精深，然其含情悱恻，吐辞委婉，绪缠绵而不断，味涵咏而愈旨，子美之后，定当推为巨擘，众体皆工，不独五言为长城也”（《抱经堂文集》卷七）。称赞得可能有过头的地方，但刘长卿在中唐不失为一大家，这是可以肯定的。

钱起，吴兴人。天宝十载（公元七五一年），以进士擢第，终尚书考功郎中。大历十子之一。他应进士试，试题是“湘灵鼓瑟”，钱起应试诗结句是“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因此得名。

钱起的七绝，如：

故城门外春日斜，故城门里无人家。市朝欲认不知处，漠漠野田空草花。（《过故洛城》）写经安史乱后，洛阳残破之状，宛然在目。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苔。二十五弦弹夜月，不胜清怨却飞来。（《归雁》）也清新可喜。钱起的警句如“鸟道挂疏雨，人家残夕阳”（《太子李舍人城东别业与二三文友逃暑》），“竹怜新雨后，山爱夕阳时”（《谷口书斋寄杨补阙》），“虹翻湖上雨，鸟落瘴中天”（《送薛八谪居》），“牛羊上山小，烟火隔林疏”（《题玉山村叟屋壁》），“长乐钟声花下尽，龙池柳色雨中深”（《赠阙下裴舍人》），为世称美。

刘方平，河南人，隐居不仕，以病卒。

刘方平的代表作，如：

楚国巫山秀，清猿日夜啼。万重春树合，十二碧峰齐。峡出朝云下，江来暮雨西。阳台归路直，不畏向家迷。（《巫山高》）

神女藏难识，巫山秀莫群。今宵为大雨，昨日作孤云。散漫愁巴峡，徘徊恋楚君。先王为立庙，春树几氛氲。（《巫山神女》）

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地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纱窗日落渐黄昏，金屋无人见泪痕。

寂寞空庭春欲晚，梨花满地不开门。（《春怨》）柳中庸，河东人。萧颖士的女婿。官至洪州户曹。柳中庸的代表作，如：

玉树起凉烟，凝情一叶前。别离伤晓镜，摇落思秋弦。汉垒关山月，胡笳塞北天，不知肠断梦，空绕几山川。（《秋怨》）

春暮越江边，春阴寒食天。杏花香麦粥，柳絮伴秋千。酒是芳菲节，人当桃李年。不知何处恨，已解入箏弦。（《寒食喜赠》）

黄河流出有浮桥，晋国归人此路遥。若傍兰干千里望，北风驱马雨萧萧。（《河阳桥送别》）

岁岁金河复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征人怨》）

关山万里远征人，一望河山泪满巾。青海戍头空有月，黄沙碛里本无春。（《凉州词二首》之一）

高槛连天望武威，穷阴拂地戍金微。九城弦管声遥发，一夜关山雪满飞。（《凉州词二首》之二）

楚塞望苍然，寒林古戍边。秋风人渡水，落日雁飞天。（《扬子途中》）柳中庸留存的诗只有十三首，但大半思致清贍，音律铿锵，我们这里介绍的几首，可说都是他优秀的作品。

李嘉祐，赵州人。天宝七载（公元七四八年），以进士擢第。上元二年（公元七六一年），为台州刺史；后迁袁州刺史。诗辞婉丽，有齐梁风格。

李嘉祐的代表作，如：

江心澹澹芙蓉花，江口蛾眉独浣纱。可怜应是阳台女，对坐鸂鶒娇不语。掩面羞看北地人，回身忽作空山语。苍梧秋色不堪论，千载依依帝子魂。君看峰上斑斑竹，尽是湘妃泣泪痕。（《江上曲》）

莫向黔中路，令人到欲迷。水声巫峡里，山色夜郎西。树隔朝云合，猿窥晓月啼。南方饶翠羽，知尔饮清溪。（《送上官侍御赴黔中》）

闻说湘川路，年年苦雨多。猿啼巫峡雨，月照洞庭波。穷海人还去，孤城雁共过。青山不可极，来往自蹉跎。（《送友人入湘》）

处处征胡人渐稀，山村寥落暮烟微。门临莽苍经年闭，身逐嫖姚几日归。贫妻白发输残税，余寇黄河未解围。天子如今能用武，只应岁晚息兵机。（《题灵台县东山村主人》）

江皋尽日唯烟水，君向白田何处归。楚地蒹葭连海迥，隋朝杨柳映堤稀。津楼故市无行客，山馆荒城闭落晖。若问行人与征战，使君双泪定沾衣。（《送皇甫冉往安宜》）

移家避寇逐行舟，厌见南徐江水流。吴越征徭非旧日，秣陵凋弊不宜秋。千家闭户无砧杵，七夕何人望牵牛。只有同时骢马客，遍宜尺牍问新愁。（《早秋京口旅泊章侍御寄书相问因以赠之时七夕》）这些诗篇，多少反映了一些兵连祸结、民生憔悴的社会内容。他的警句如“野渡花争发，春塘水乱流”（《送王牧往吉州谒王使君叔》），“朝霞晴作雨，湿气晚生寒”（《仲夏江阴官舍寄裴明府》），也绮靡可诵。

顾况，苏州人。肃宗至德二载（公元七五七年），以进士擢第。镇海节度使韩滉（德宗建中二年至贞元二年，即公元七八一至七八六年），辟为判官。后人为著作佐郎。贞元五年（公元七八九年），贬饶州司户参军。后弃官隐居茅山，久之卒。

顾况的代表作，如：

板桥人渡泉声，茅檐日午鸡鸣。莫嗔焙茶烟暗，却喜晒谷天晴。（《过山农家》）

杜宇冤亡积有时，年年啼血动人悲。若教恨魄皆能化，何树何山著子规。（《子规》）

古庙枫林江水边，寒鸦接饭雁横天。大孤山远小孤出，月照洞庭归客船。（《小孤山》）

顾况的乐府和绝句，不但具有深厚社会内容，风格也很高。

张继，南阳人。天宝十二载（公元七五三年），以进士擢第。大历末，检校祠部员外郎，分掌财赋于洪州（今江西南昌市）。

张继的代表作，如：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枫桥夜泊》）

耕夫召募逐楼船，春草青青万顷田。试上吴门窥郡郭，清明几处有新烟。（《阆门即事》）

世称：“诗体清回，秀发当时。”

韩翃，南阳人。天宝十三载（公元七五四年），以进士擢第。大历十子之一。德宗建中初，召为驾部郎中、知制诰，终于中书舍人。

韩翃在代宗世，做了一首诗，后为德宗所激赏。诗云：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腊烛，青烟散入五侯家。（《寒食日即事》）

后汉封宦官五人为侯，故五侯系指宦官。诗意言宦官独承君王恩泽。韩翃的代表作还有：

骏马绣障泥，红尘扑四蹄。归时何太晚，日照杏园西。（《汉宫曲二首》之一）

鸳鸯赭白齿新齐，晚日花间放碧蹄。玉勒乍回初喷沫，金鞭欲下不成嘶。（《看调马》）

王孙别舍拥朱轮，不羨空名乐此身。门外碧潭春洗马，楼前红烛夜迎人。（《赠李翼》）

严维，字正文，越州山阴人。至德二载（公元七五七年），以进士擢第，擢辞藻宏丽科，调诸暨尉，辟河南幕府，终秘书省校书郎。

严维的代表作，如：

苏耽佐郡时，近出白云司。药补清羸疾，窗吟绝妙词。柳塘春水慢，花坞夕阳迟。欲识怀君意，明朝访楫师。（《酬刘员外见寄》）

故关衰草遍，离别正堪悲。路出寒云外，人归暮雪时。少孤为客早，多难识君迟。掩泣空相向，风尘何所期。（《送李端》）

丹阳郭里送行舟，一别心知两地秋。日晚江南望江北，寒鸦飞尽水悠悠。（《丹阳送韦参军》）

耿 ，河中人。宝应二年（公元七六三年），以进士擢第。官至左拾遗。大历十子之一。他的诗，不加琢削，而风格自胜。

耿 的代表作，如：

日暮黄云合，年深白骨稀。旧村乔木在，秋草远人归。废井莓苔厚，荒田路径微。唯余近山色，相对似依依。（《宋中》）

东皋占薄田，耕种过余年。护药栽山刺，浇蔬引竹泉。晚雷期稔岁，重雾报晴天。若问游人意，思齐沮溺贤。（《东郊别业》）

老人迎客处，篱落稻畦间。蚕室朝寒闭，田家昼雨闲。门间新薤草，樵采旧谿山。自问谁相及，邀予思往还。（《赠田家翁》）

老人独坐倚官树，欲语潸然泪便垂。陌上归心无产业，城边战骨有亲知。余生尚在艰难日，长路多逢轻薄儿。绿水青山虽似旧，如今贫后复何为。（《路傍老人》）

卢纶，河中蒲人。建中（公元七八 至七八三年）初，为昭应（今陕西临潼县）令。浑瑊镇河中，辟纶为元帅判官，检校户部郎中。贞元（公元七八五至八 四年）初，病卒。

卢纶的代表作，如：

好勇知名早，争雄上将间。战多春入塞，猎惯夜登山。阵合龙蛇动，军移草木闲。今来部曲尽，白首过萧关。（《送韩都护还边》）

衔杯吹急管，满眼起风砂。大漠山沉雪，长城草发花。策行须耻战，虜在莫言家。予亦祈动者，如何别左车（李左车，刘项时知兵者）。（《送刘判官赴丰州》）

老翁曾相识，相引出柴门。苦话别时事，因寻溪上村。数年何处客，近日几家存。冒雨看禾黍，逢人忆子孙。乱藤穿井口，流水到篱根。惆怅不堪住，空山月又昏。（《晚到盩厔老家》）

云开远见汉阳城，犹是孤帆一日程。估客昼眠知浪静，舟人夜语觉潮生。三湘愁鬓逢秋色，万里归心对月明。旧业已随征战尽，更堪江上鼓鼙声！（《晚次鄂州》）（原注：至德中作）

萤火扬莲丛，水凉多夜风。离人将落叶，俱在一船中。（《与畅当夜泛秋潭》）

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和张仆射塞下曲》之二）

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和张仆射塞下曲》之三）

出关愁暮一沾裳，满野蓬生古战场。孤村树色昏残雨，远寺钟声带夕阳。（《与从弟同下第后出关言别》）

行多无力住无粮，万里还乡未到乡。蓬鬓哀吟古城下，不堪秋气入金疮。（《逢病军人》）

双膝过颐顶在肩，四邻知姓不知年。卧驱鸟雀惜禾黍，犹恐诸孙无社钱。（《村南逢病叟》）

戴叔伦，润州金坛（今江苏金坛县）人。刘晏主盐铁，表叔伦主运荆南。嗣曹王皋领湖南、江西，表叔伦佐幕府。贞元元年（公元七八五年），试守抚州刺史；贞元四年（公元七八八年），迁容管经略使。《唐诗纪事》称叔伦“廨宇经山火，公田没海潮，亦指事造形之工者”。

戴叔伦的代表作，如：

乳燕入巢笋成竹，谁家二女种新谷。无人无牛不及犁，持刀斫地翻作泥。自言家贫母年老，长兄从军未娶妻。去年灾疫牛囤空，截绢买刀都市中。头巾掩面畏人识，以刀代牛谁与同。姊妹相携心正苦，不见路人唯见土。疏通畦陇防乱苗，整顿沟塍待时雨。日正南冈午饷归，可怜朝雉扰惊飞。东邻西舍花尽发，共惜余芳泪沾衣。（《女耕田行》）

春来耕田遍沙碛，老稚欣欣种禾麦。麦苗渐长天苦晴，土乾确确鋤不得。新禾未熟飞蝗至，青苗食尽余枯茎。捕蝗归来守空屋，囊无寸帛瓶无粟。十月移屯来向城，官教去伐南山木。驱牛驾车入山去，霜重草枯牛冻死。艰辛历尽谁得知，望断天南泪如雨。（《屯田词》）

这首《女耕田行》和《屯田词》，反映了战乱以来的生产破坏情形，具有充实的社会内容。

杜宇声声唤客愁，故园何处此登楼。落花飞絮成春梦，剩水残山异昔游。歌扇多情明月在，舞衣无绪彩云收。东皇去后韶华尽，老圃寒香别有秋。（《暮春感怀》）一雁过连营，繁霜覆古城。胡笳在何处，半夜起边声。（《关山月二首》之二）沅湘流不尽，屈宋怨何深。日暮秋烟起，萧萧枫树林。（《过三闾庙》）湘山千岭树，桂水九秋波。露重猿声绝，风清月色多。（《泊湖口》）看花无语泪如倾，多少春风别离情。不识玉门关外路，梦中昨夜到边城。（《闺怨》）闭门茅底偶为邻，北阮那怜南阮贫。却是梅花无世态，隔墙分送一枝春。（《旅次寄湖南张郎中》）四郭青山处处同，客怀无计答秋风。数处茅屋青溪上，千树蝉声落日中。（《题友人山居》）溪上谁家掩竹扉，鸟啼浑似惜春晖。日斜深巷无人迹，时见梨花片片飞。（《过柳溪道院》）苏溪亭上草漫漫，谁倚东风十二栏。燕子不归春事晚，一汀烟雨杏花寒。（《苏溪亭》）卢橘花开枫叶衰，出门何处望京师。沅湘日夜东流去，不为愁人住少时。（《湘南即事》）蕲水城西向北看，桃花落尽柳花残。朱旗半卷山川小，白马连嘶草树寒。（《蕲州行营作》）花雪随风不厌看，更多还肯失林峦。愁人正在书窗下，一片飞来一片寒。（《小雪》）李端，字正己，赵郡人。大历五年（公元七七 年），以进士擢第，为大历十子之一。初授校书

郎，后官杭州司马。李端的代表作，如：惆怅流水时，萧条背城路。离人出古亭，嘶马入寒树。江海正风波，相逢在何处。（《留别柳中庸》）凉州风月美，遥望居延路。泛泛下天云，青青缘塞树。燕山苏武上，海岛田横住。更是草生时，行人出门去。（《千里思》）

巫山十二峰，杂雨夜霏霏。湿马胡歌乱，经烽汉火微。丁零苏武别，疏勒范羌归。若看关头下，长榆叶定稀。（《雨雪曲》）

闻说湘水路，年年古木多。猿啼巫峡夜，月照洞庭波。穷海人还去，孤城雁与过。青山不同赏，来往自蹉跎。（《送友人》）

邠郊泉脉动，落日上城楼。羊马水草足，羌胡帐幕稠。射雕过海岸，传箭怯边州。何事归朝将，今年又拜侯。（《边头作》）

日惨长亭暮，天高大泽闲。风中闻草木，雪里见江山。马向塞云去，人随古道还。阮家今夜乐，应在竹林间。（《送张傲归觐叔父》）

京洛风尘后，村乡烟火稀。少年曾失所，衰暮欲何依。夜静临江哭，天寒踏雪归。时清应不见，言罢泪盈衣。（《代村中老人答》）

鸣箏金粟柱，素手玉房前。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听箏》）

山店门前一妇人，哀哀夜哭向秋云。自说夫因征战死，朝来逢著旧将军。（《宿石涧店闻妇人哭》）

于鹄，大历、贞元间诗人，隐居汉阳，尝为诸府从事。他的小诗绝句，清幽绝俗，感情细腻，代表作如：

偶向江边采白苹，还随女伴赛江神。众中不得分明语，暗掷金钱卜远人。（《江南曲》）

老大看花长不足，江边寻得数株红。日斜人散东风急，吹落谁家明月中。（《寓意》）

烟水初销见万家，东风吹柳万条斜。大堤欲上谁相伴，马踏春泥半是花。（《襄阳寒食》）

李涉，洛阳人。宪宗时，为太子通事舍人，寻谪为峡州司仓参军。文宗太和中，为太学博士，又以事流康州。

李涉的代表作，如：

无奈牧童何，放牛吃我竹。隔林呼不应，叫笑如生鹿。欲报田舍翁，更深不归屋。（《山中》）

朝牧牛，牧牛下江曲。夜牧牛，牧牛度村谷。荷蓑出林春雨细，芦管卧吹莎草绿。乱插蓬蒿箭满腰，不怕猛虎欺黄犊。（《牧童词》）

江城吹角水茫茫，曲引边声怨思长。惊起暮天沙上雁，海门斜去两三行。（《润州听暮角》）

唐太和中，涉“尝适九江，……至皖口之西，忽逢大风，鼓其征帆，数十人皆驰兵仗，而问是何人。从者曰：‘李博士船也。’其间豪首曰：‘若是李涉博士，吾辈不须剽他金帛。自闻诗名甚久，但希一篇，金帛非贵也。’李乃赠一绝句”（《云溪友议》）。诗云：

春（《唐才子传》作暮）雨萧萧江上村，绿林豪客夜知闻。他时不用来回避（《唐才子传》作“藏名姓”），世上如今半是君。（《井栏砂宿遇夜客》）

这首绝句，歌咏的是绿林豪客，讽刺的却是贪官污吏。

韩愈提倡的古文运动及其在诗歌方面的改革 韩愈，字退之，邓州南阳人，郡望是昌黎韩氏。唐德宗贞元八年（公元七九二年），进士擢第。累

官至监察御史。贞元十九年（公元八三三年），以极论宫市之害，贬官阳山（今广东阳山县）令。元和中，再为国子博士，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转考功郎中、知制诰，进中书舍人。裴度讨淮西，请为行军司马，以功迁刑部侍郎。宪宗遣使者往凤翔迎佛骨，韩愈上表极谏，贬潮州刺史，迁袁州刺史。穆宗即位，召拜国子祭酒、兵部侍郎，转吏部，又罢为兵部，转吏部侍郎，长庆四年（公元八二四年）卒官，赠礼部尚书，谥曰文。

韩愈提倡道统和辟佛，这是中国思想史上重大事件，我们在思想史一节里已经提及，这里只讲他所提倡的古文运动和诗歌方面的改革。

在东汉和三国以前，本无文、笔的分别，到了南北朝，又有文笔之分，初以有韵为文，无韵为笔。后来不仅仅以有韵、无韵来分，只要讲究骈俪、排偶、辞藻、音律、典故，都得谓之文，而散行单句，都得谓之笔。这样就不用文笔这名称来分别，而采用骈文、散文这名称来区别了。隋人李谔他就反对当时的华丽文风，认为“体尚轻薄”，“流宕忘反”。尤其诗歌方面。自“魏之三祖（曹操、曹丕、曹睿）”，“好雕虫之小艺”，“驰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唯务吟咏”，“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指儒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隋书·李谔传》）。武则天世，陈子昂提倡建安风骨，是指充实诗歌的社会内容而言的，并没有提到古文运动。韩愈出，主张提倡散文，反对骈文，散文大都是向《左传》、《史记》、《庄子》、《孟子》等书学习的，托古改制，名义上是向周秦两汉学习，实际是一种文体的革新运动，故称之为古文运动。

韩愈的古文运动，是有它社会经济基础的，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封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为世家大族服务的骈俪文，已经不完全适合社会的需求了；为寒门素族地主阶级所服务的散文，更适应社会的需要了。韩愈的文体改革，正是顺应了这一变革趋势，他“惟陈言之务去”（《答李翱书》），力求追求一种散行单句、自由流畅的文学语言，从此骈文日渐衰落，散文逐渐兴起，这都是韩愈提倡古文运动以后巨大的影响及其结果。当然，一个古文运动不是孤家寡人所能提倡起来的，与韩愈同时提倡写散文的，还有韩愈的友人柳宗元和韩愈的后辈李翱、皇甫湜、孙樵等人，彼此协作，大力鼓吹，使古文运动得到了顺利的实现。李翱在《韩吏部行状》里说：“自贞元末以至于兹（指长庆末），后进之士，其有志于古文者，莫不视公（指韩愈）以为法。”可见古文运动已经在知识份子层里广泛传播了。

还有两点应该需要交代的，韩愈提倡古文运动，并不等于说骈文就此销声匿迹，不时行了，当时的官文书如诰令诏敕，基本是采骈俪文体的，这种风气，一直到五代两宋犹然。韩愈自己也担任过知制诰、中书舍人等官职，遇到他起草制诏，也不得不采用骈俪文体。不过后人编他的全集时，没有收诏令入集罢了。还有一点，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这个八代是指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八代而言的，不是指后汉、魏、晋、宋、齐、梁、陈、隋的八代。韩愈的门人李汉作《昌黎先生集序》，固然推崇韩愈，以为“秦汉已前，其气浑然；迨乎司马迁、[司马]相如、董生、杨雄、刘向之徒，尤所谓杰然者也。至后汉、曹魏，气象萎尔；司马氏已来，规范荡悉”，把后汉也否定了，韩愈自己“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答李翱》），自己并没有否定后汉，实际魏晋也是不能轻易否定的。章太炎先生认为“文起八代之衰”的八代，是指宋、齐、梁、陈、魏、

齐、周、隋而言的，我基本遵循了章先生这个说法，认为这说法是对的。

韩愈的记叙文，写人、记事、状物，形象鲜明、结构完整，今举《张中丞传后叙》南霁云借兵一事为例：

南霁云之乞救于贺兰[进明]也，贺兰嫉[张]巡[许]远之声威功绩出己上，不肯出师救。爱霁云之勇且壮，不听其语，强留之。具食与乐，延霁云坐。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云泣下。云知贺兰终无为云出师意，即驰去。将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图，矢著其上砖半箭，曰：“吾归破贼，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

写南霁云的忠贞坚强形象，是极为成功的。

韩愈在诗歌方面的改革，也值得一提的。盛唐时期，涌现了不少诗人，其中最高成就者，自以李白、杜甫为代表。至德以后，进入中唐，诗人辈出，但是他们的成就，比之李杜，反有逊色。僧皎然在《诗式》中说：

大历中，词人多在江外，皇甫冉、严维、张继素、刘长卿、李嘉祐、朱放，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以为己有，吾知诗道初衰，正在于此，何得推过齐梁作者。

所谓诗道初衰，实际是指吟诵自然景物，对民间疾苦，却噤若寒蝉，对现实社会反映得太少了。皎然“诗道初衰”之语，不是无缘无故说的。韩愈用古文笔法来作诗，这是改革的一种尝试，元稹、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又是改革的另一种尝试。韩愈诗歌的内容，和盛唐变化不是太大，但是长诗七古采用古文笔法来遣辞造词，对宋代诗歌的影响很大，后来欧阳修、苏轼等的七言古诗，几乎都是宗法韩愈的。

我们在这里特别介绍韩愈的代表作七言古诗：

利剑光耿耿，佩之使我无邪心。故人念我寡徒侣，持用赠我比知音。我心如冰剑如雪，不能刺谗夫，使我心腐剑锋折。决云中断开青天，噫！剑与我俱变化归黄泉。（《利剑》）

写出获得利剑以后，想用来刺击谗夫的心情，心事如画。

原头火烧静兀兀，野雉畏鹰出复没。将军欲以巧伏人，盘马弯弓惜不发。地形渐窄观者多，雉惊弓满劲箭加。冲人决起百余尺，红翎白镞相倾斜。将军仰笑军吏贺，五色离披马前堕。（《雉带箭》）

写将军盘马弯弓，仰射飞雉的一种英雄气概，也读之使人神往。

神仙有无何渺茫，桃源之说诚荒唐。流水盘回山百转，生绡数幅垂中堂。武陵太守好事者，题诗远寄南宫下，南宫先生忻得之，波涛入笔驱文辞。文工画妙各臻极，异境恍惚移于斯。架岩凿谷开宫室，接屋连墙千万日，羸颠刘蹶了不闻，地坼天分非所恤，种桃处处惟开花，川原近远蒸红霞。初来犹自念乡邑，岁久此地还成家。渔舟之子来何所，物色相猜更问语。大蛇中断丧前王，群马南渡开新主。听终辞绝共凄然，自说经今六百年。当时万事皆眼见，不知几许犹流传。争持酒食来相馈，礼数不同樽俎异。月明伴宿玉堂空，骨冷魂清无梦寐。夜半金鸡啁晰鸣，火轮飞出客心惊。人间有累不可住，依然离别难为情。船开棹进一回顾，万里苍苍烟水暮。世俗宁知伪与真，至今传者武陵人。（《桃源图》）

和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及王维《桃花源诗》来并读，韩诗又别具一种风格。

妮妮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浮云柳絮无根蒂，

天地阔远随飞扬。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皇。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嗟予有两耳，未省听丝簧。自闻颖师弹，起坐在一旁。推手遽止之，湿衣泪滂滂。颖乎尔诚能，无以冰炭置我肠。（《听颖师弹琴》）

写颖师弹琴，从“妮妮儿女语”到一变为“勇士赴敌场”，人的感情也随着他的琴声跌宕起伏。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周纲陵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佩鸣相磨。搜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从臣才艺咸第一，拣选撰刻留山阿。雨淋日炙野火燎，鬼物守护烦搗呵。公从何处得纸本，毫发尽备无差讹，辞严义密读难晓，字体不类隶与科。年深岂免有缺画，快剑斫断生蛟鬣。鸾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金绳铁索锁纽壮，古鼎跃水龙腾梭。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褊迫无委蛇。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嗟予好古生苦晚，对此涕泪双滂沱。忆昔初蒙博士徵，其年始改称元和。故人从军在右辅，为我度量掘臼科。濯冠沐浴告祭酒，如此至宝存岂多。毡包席裹可立致，十鼓只载数骆驼。荐诸太庙比鸛鼎，光价岂止百倍过。圣恩若许留太学，诸生讲解得切磋。观经鸿都尚嗔咽，坐见举国来奔波。剜苔剔藓露节角，安置妥帖平不颇。大厦深檐与盖覆，经历久远期无他。中朝大官老于事，讷肯感激徒媵媵。牧童敲火牛砺角，谁复着手为摩挲。日销月铄就埋没，六年西顾空吟哦。羲之俗书趁姿媚，数纸尚可博白鹅。继周八代争战罢，无人收拾理则那。方今太平日无事，柄任儒术崇丘轲。安能以此上论列，愿借辩口如悬河，石鼓之歌止于此，呜呼吾意其蹉跎。（《石鼓歌》）

经过韩愈的提倡，从此石鼓文就被学术界重视起来。

韩愈用写散文的笔法来写七言古诗，诗格豪放倔强，别具一种风格，他尤喜欢押险韵，不避粗险执拗，这种诗的变格，影响宋元明清的诗歌风格，非常之大。

**柳宗元与刘禹锡** 柳宗元，字子厚，河东人。贞元九年（公元七九三年），以进士擢第。历官校书郎、蓝田尉、监察御史里行。顺宗即位，为王伾、王叔文所引，擢礼部员外郎。二王失败，宗元亦累贬为永州（治零陵，今湖南零陵县）司马。元和十年（公元八一五年），迁柳州刺史，元和十四年卒官。年四十七。

柳宗元也是提倡古文运动的，他善于记叙山川，在传记文学方面，也有很高成就，在寓言讽刺文方面，往往以几百字的短篇，写出了深远的社会现实内容。柳宗元在诗歌方面的成就，也是很高的。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飏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

零落残红倍黯然，双垂别泪越江边。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桂岭瘴来云似墨，洞庭春尽水如天。欲知此后相思梦，长在荆门郢树烟。（《别舍弟宗一》）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渔翁》）

篱落隔烟火，农谈四邻夕。庭际秋虫鸣，疏麻方寂历。蚕丝尽输税，机杼空倚壁。里胥夜经过，鸡黍事筵席。各言官长峻，文字多督责。东乡后租

期，车毂陷泥泽。公门少推恕，鞭朴恣狼籍。努力慎经营，肌肤真可惜。迎新在此岁，唯恐踵前迹。（《田家三首》之二）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江雪》）

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苹花不自由。（《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

宦情羁思两凄凄，春半如秋意转迷。山城过雨百花尽，榕叶满庭莺乱啼。（《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题》）

刘禹锡，字梦得，彭城人。贞元九年，以进士擢第。累官至监察御史。顺宗即位，王伾、王叔文用事，引为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二王失败，刘禹锡贬朗州（治武陵，今湖南常德市）司马。居十年，改连州（治桂阳，今广东连县）刺史，徙夔、和二州刺史，入为主客郎中，改礼部郎中，集贤院学士。出为苏州刺史，徙汝、和二州刺史，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检校礼部尚书。会昌二年（公元八四二年）病卒，年七十一岁。

孟棻《本事诗》载：刘禹锡“自屯田员外左迁朗州司马，凡十年始徵还，方春作《赠看花诸君子》诗曰：‘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其诗一出，传于都下，有素嫉其名者，白于执政，又诬其有怨愤。他日，见时宰（宰相），与坐，慰问甚厚。既辞，即曰：‘近者新诗，未免为累，奈何！’不数日，出为连州刺史。其自叙云：‘贞元二十一年春，予为屯田员外，时此观未有花。是岁，出牧连州，至荆南，又贬朗州司马。居十年，诏至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盛如红霞，遂有前篇，以记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于今十四年，始为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荡然无复一树，唯免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再游，时太和二年三月也。’诗曰：‘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刘禹锡也是提倡古文运动的，他的诗文，早岁与柳宗元齐名，宗元早死，刘禹锡寓居洛阳，又和白居易齐名。

刘禹锡的代表作，如：

莫徭自生长，名字无符籍。市易杂鲛人，婚姻通木客。星居占泉眼，火种开山脊。夜渡千仞溪，含沙不能射。（《莫徭歌》）

冈头花草齐，燕子东西飞。田塍望如线，白水光参差。农妇白紵裙，农父绿蓑衣。齐唱郢中歌，嚶嚶如竹枝。但闻怨响音，不辨俚语词。时时一大笑，此必相嘲嗤。水平苗漠漠，烟火生墟落。黄犬往复还，赤鸡鸣且啄。路傍谁家郎，乌帽衫袖长。自言上计吏，年幼离帝乡。田夫语计吏，君家侬定谿。一来长安道，眼大不相参。计吏笑致辞，长安真大处，省门高轲峨，侬入无度数。昨来补卫士，唯用筒竹布。君看二三年，我作官人去。（《插田歌》并《序》：“连州城下，俯接村墟，偶登城楼，适有所感，遂书其事为俚歌，以俟采诗者。”）

边马萧萧鸣，边风满碛生。暗添弓箭力，斗上鼓鼙声。袭月寒晕起，吹云阴阵成。将军占气候，出号夜翻营。（《边风行》）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还有刘禹锡的《竹枝词》虽然是三峡俚歌，却含思宛转，别具风格。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竹枝词二首》之一)

日出三竿春雾清，江头蜀客驻兰桡。凭寄狂夫书一纸，家住成都万里桥。

(《竹枝词九首》之四)

巫峡苍苍烟雨时，清猿啼在最高枝。箇里愁人肠自断，由来不是此声悲。

(《竹枝词九首》之八)

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

(《竹枝词九首》之九)

刘禹锡的《杨柳枝词》、《浪淘沙》，也和《竹枝词》一样，为时传诵。

炀帝行宫汴水滨，数枝杨柳不胜春。晚来风起花如雪，飞入宫墙不见人。

(《杨柳枝词九首》之六)

春江一曲柳千条，二十年前旧板桥。曾与美人桥上别，恨无消息到今朝。

(《杨柳枝》)

洛水桥边春日斜，碧流清浅见琼砂。无端陌上狂风急，惊起鸳鸯出浪花。

(《浪淘沙九首》之三)

日照澄洲江雾开，淘金女伴满江隈。美人首饰侯王印，尽是沙中浪底来。

(《浪淘沙九首》之六)

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浪淘沙九首》之八)刘禹锡还有许多绝句，皆传诵一时。

今日好南风，商旅相催发。沙头檣竿上，始见春江阔。(《荆州歌二首》之一)

何物令侬羨，羨郎船尾燕。衔泥趁檣竿，宿食长相见。(《淮阴行五首》之四)。

曾随织女渡天河，记得云间第一歌。休唱贞元供奉曲，当时朝士已无多。

(《听旧宫中乐人穆氏唱歌》)

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翠水，白银盘里一青螺。

(《望洞庭》)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

(《金陵五题》之一《石头城》)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金陵五题》之二《乌衣巷》)

台城六代尽繁华，结绮临春事最奢。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

(《金陵五题》之三《台城》)

前者匆匆袂被行，十年憔悴到京城。南京旧吏来相问，何处淹留白发生。

(《徵还京师见旧番官冯叔达》)

秦国功成思税驾(李斯)，晋臣名遂叹危机(诸葛长民)。无因上察牵黄犬，愿作丹徒一布衣。(《题欹器图》)

平章宅里一栏花，临到开时不在家。莫道两京非远别，春明门外即天涯。

(《和令狐相公(楚)别牡丹》)

柳宗元的古体诗优于近体诗，刘禹锡的近体诗优于古体诗。刘禹锡的诗歌，格调悲凉，雄浑老苍，尤其是《竹枝词》，他汲取了民歌的优美长处，创造了新的风格。

张籍与王建 张籍，字文昌，和州(治历阳，今安徽和县)人，郡望是吴郡张氏。贞元十五年(公元七九九年)，以进士擢第。历官秘书郎、国子博士、水部员外郎、主客郎中、国子司业。贾岛是韩愈的后辈，张籍、孟郊

却和韩愈是同辈。籍工乐府，白居易《籍诗集》云：“张公何为者，业文三十春。尤攻乐府词，举代少其人。”姚合也非常推重他，有诗云：“妙绝江南曲，凄凉怨女诗。古风无敌手，新语是人知。”

张籍的代表作，如：

九月匈奴杀边将，汉军全没辽水上。万里无人收白骨，家家城下招魂葬。妇人依倚子与夫，同居贫贱心亦舒。夫死战场子在腹，妾身虽存如昼烛。（《征妇怨》）

老农家贫在山住，耕种山田三四亩。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岁暮锄犁傍空室，呼儿登山收橡实。西江贾客珠百斛，船中养犬长食肉。（《野老歌》）

织素缝衣独苦辛，远因回使寄征人。官家亦自寄衣去，贵从妾手著君身。高堂姑老无侍子，不得自到边城里。殷勤为看初著时，征夫身上宜不宜。（《寄衣曲》）

筑城处，千人万人齐把杵。重重土筑试行锥，军吏执鞭催作迟。来时一年深碛里，尽著短衣渴无水。力尽不得抛杵声，杵声未定人皆死。家家养男当门户，今日作君城下土。（《筑城词》）

黄头鲜卑入洛阳，胡儿执戟升明堂。晋家天子作降虏，公卿奔走如牛羊。紫陌旌幡暗相触，家家鸡犬惊上屋。妇人出门随乱兵，夫死眼前不敢哭。九州诸侯自顾土，无人领兵来护主。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永嘉行》）

陇头路断人不行，胡骑夜入凉州城。汉兵处处格斗死，一朝尽没陇西址。驱我边人胡中去，散放牛羊食禾黍。去年中国养子孙，今著毡裘学胡语。谁能更使李轻军，收取凉州入汉家。（《陇头行》）

边州八月修城堡，候骑先烧碛中草。胡风吹沙度陇飞，陇头林木无北枝。将军阅兵青塞下，鸣鼓逢逢促猎围。天寒山路石断裂，白日不销帐上雪。乌孙国乱多降胡，诏使名王持汉节。年年征战不得间，边人杀尽唯空山。（《塞下曲》）

促促复促促，家贫夫妇欢不足。今年为人送租船，去年捕鱼在江边。家中姑老子复小，自执吴绡输税钱。家家桑麻满地黑，念君一身空努力。愿教牛蹄团团羊角直，君身常在应不得。（《促促词》）

山头鹿，角芟芟，尾促促。贫儿多租输不足，夫死未葬儿在狱。早日熬熬野冈，禾黍不收无狱粮。县家

唯忧少军食，谁能令尔无死伤。（《山头鹿》）这些乐府诗，都具有深厚的社会现实内容，在唐代诗人作品中，是不多见到的。

张籍还有《昆仑儿》一首：

昆仑家住海中洲，蛮客将来汉地游。言语解教秦吉了，波涛初过郁林州。金环欲落曾穿儿，螺髻长卷不裹头。自爱肌肤黑如漆，行时半脱木棉裘。此外如：

去去远迁客，瘴中衰病身。看山无限路，白首不归人。海国战骑象，蛮州市用银。一家分几处，谁见日南春。（《送南迁客》）

渔家在江口，潮水入柴扉。行客欲投宿，主人犹未归。竹深村路远，月出钓船稀。遥见寻沙岸，春风动草衣。（《夜到渔家》）

野店临西浦，门前有橘花。停灯待贾客，卖酒与渔家。夜静江水白，路回山月斜。闲倚泊船处，潮落见平沙。（《宿江店》）

高秋原上寺，下马一登临。渭水西来直，秦山南向深。旧宫人不住，荒碣路难寻。日暮凉风起，萧条多远心。（《登咸阳北寺楼》）

杨柳阊门路，悠悠水岸斜。乘舟向山寺，着屐到渔家。夜月红柑树，秋风白藕花。江天诗兴好，回日莫令赊。（《送从弟戴玄往苏州》）

东南归路远，几日到乡中。有寺山皆遍，无家水不通。湖声莲叶雨，野气稻花风。州县知名久，争邀与客同。（《送朱庆余及第归越》）

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归书意万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秋思》）

凤林关里水东流，白草黄榆六十秋。边将皆承主恩泽，无人解道取凉州。（《凉州词三首》之三）

蜀客南行祭碧鸡，木棉花发锦江西。山桥日晚行人少，时见猩猩树上啼。（《逢蜀客》）

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是人间贵，一曲菱歌敌万金。（《酬朱余庆》）

据《容斋三笔》载：“张籍在他镇幕府，郢帅李师古又以书币聘之。籍却而不纳，而作《节妇吟》一章寄之”。曰：

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还君明珠双泪垂，何不相逢未嫁时。可见张籍之为入，对于自己的出处不是很随和的。

张籍的宫词，也写出了宫闱生活富贵气象。

新鹰初放兔犹肥，白日君王在内稀。薄暮千门临欲锁，红妆飞骑向前归。（《宫词》）

黄金杆拨紫檀槽，弦索初张调更高。尽理昨来新上曲，内官帘外送樱桃。（《宫词》）

温泉流入汉离宫，宫树行行浴殿空。武帝（唐人称玄宗为武帝）时人今欲尽，青山空闭御墙中。（《华清宫》）

王建，字仲初，颍川（郡治长社，今河南许昌市）人。大历十年（公元七七五年），进士擢第。历官渭南尉、秘书丞、侍御史。太和（公元八二七至八三五年）中，出为陕州司马。建工乐府，与张籍齐名。宫词百首，尤传诵人口。

王建的乐府著名者，如：

凉州四边沙皓皓，汉家无人开旧道。边头州县尽胡兵，将军别筑防秋城。万里人家皆已没，年年旌节发西京。多来中国收妇女，一半生男为汉语。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从今种禾黍。驱羊亦著锦为衣，为惜毡裘防斗时。养蚕缲茧成匹帛，那堪绕帐作旌旗。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凉州行》）

辽东万里辽水曲，古戍无城复无屋。黄云盖地雪作山，不惜黄金买衣服。战回各自收弓箭，正西回面家乡远。年年郡县送征人，将与辽东作丘坂。宁为草木乡中生，有身不向辽东行。（《辽东行》）

去秋送衣渡黄河，今秋送衣上陇坂。妇人不知道径处，但问新移军近远。半年著道经雨湿，开笼见风衣领急。旧来十月初点衣，与郎著向营中集。絮时厚厚绵纂纂，贵欲征人身上暖。愿身莫著裹尸归，愿妾不死长送衣。（《送衣曲》）

写出安史之乱以后，陇坂以西，陷于吐蕃，辽水以东时受两蕃、新罗侵

扰，国家疆土日促，战争频仍，人民和平生活受到严重威胁。

蚕欲老，箔头作茧丝皓皓。场宽地高风日多，不向中庭燃蒿草。神蚕急作莫悠扬，年来为尔祭神桑。但得青天不下雨，上无苍蝇下无鼠。新妇拜簇愿茧稠，女洒桃浆男打鼓。三日开箔雪团团，先将新茧送县官，已闻乡里催织作，去与谁人身上著。（《簇蚕辞》）

西江运船立红帜，万棹千帆绕江水。去年六月无稻苗，已说水乡人饿死。县官部船日算程，暴风恶雨亦不停。在生有乐当有苦，三年作官一年行。坏舟畏鼠复畏漏，恐向太仓折升。辛勤耕种非毒药，看着不入农夫口。用尽百金不为贵，但得一金即为利。远徼海稻供边食，岂如多种边头地。（《水运行》）

叹息复叹息，园中有枣行人食。贫家女为富家织，翁母隔墙不得力。水寒手涩丝脆断，续来续去心肠烂。草虫促促机下啼，两日催成一匹半。输官上头有零落，姑未得衣身不著。当窗却羨青楼倡，十指不动衣盈箱。（《当窗织》）

男声欣欣女颜悦，人家不怨言语别。五月虽热麦风清，檐头索索缲车鸣，野蚕作茧人不取，叶间扑扑秋蛾生。麦收上场绢在轴，的知输得官家足。不望入口复上身，且免向城卖黄犍。田家衣食无厚薄，不见县门身即乐。（《田家行》）

大女身为织锦妇，名在县家供进簿。长头起样呈作官，闻道官家中苦难。回花侧叶与人别，唯恐秋天丝线乾。红缕葳蕤紫茸软，蝶飞参差花宛转。一梭声尽重一梭，玉腕不停罗袖卷。窗中夜久睡髻偏，横钗欲堕垂着肩。合衣卧时参没后，停灯起在鸡鸣前。一匹千金亦不卖，限日未成官里怪。锦江水涸贡转多，宫中尽著单丝罗。莫言山积无尽日，百尺高楼一曲歌。（《织锦曲》）

海神无家海里住，采珠役象为岁赋。恶波横天山寨路，未央宫中常满库。（《海人谣》）

写出唐中叶以后，人民受尽剥削，男耕女织，尽为统治阶级席卷以去，民生憔悴，生活维艰。

除了乐府以外，王建的近体诗，也描绘细腻，如：

瘴云梅雨不成泥，十里津楼压大堤。蜀女下沙迎水客，巴童傍驿卖山鸡。寺多红药烧人眼，地足青苔染马蹄。夜半独眠愁在远，北看归路隔蛮溪。（《江陵即事》）

千里河烟直，青槐夹岸长。天涯同此路，人语各殊方。草市迎江货，津桥税海商。回看故宫柳，憔悴不成行。（《汴路即事》）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故行宫》）

最后一首，或以为元稹作，语少意足，有无穷之味。王建的宫词，也富贵雍容，写出帝王宫闱气派。如：青山直绕凤城头，澹水斜分入御沟。新教内人唯射鸭，长随天子苑东游。（《御猎》）

自直梨园得出稀，更番上曲不教归。一时跪拜霓裳彻，立地阶前赐紫衣。（《霓裳词十首》之三）

传呼法部按霓裳，新得承恩别作行。应是贵妃楼上看，内人舁下彩罗箱。（《霓裳词十首》之八）

知向华清秋月满，山头山底种长生。去时留下霓裳曲，半是离宫别馆声。（《霓裳词十首》之十）

蓬莱正殿压金 阙，红日初生碧海涛。闲著五门遥北望，赭黄新帕御床高。  
(《宫词百首》之一)

新调白马拍鞭声，供奉骑来绕殿行。为报诸王侵早入，隔门催进打球名。  
(《宫词百首》之十四)

鱼藻宫中锁翠娥，先皇行处不曾过。如今池底休铺锦，菱角鸡头积渐多。  
(《宫词百首》之十八)

春池日暖少风波，花里牵船水上歌。遥索剑南新样锦，东宫先钓得鱼多。  
(《宫词百首》之三十)

每夜停灯熨御衣，银熏笼底火霏霏。遥听帐里君王觉，上直钟声始得归。  
(《宫词百首》之三十六)

合暗报来门锁了，夜深应别唤笙歌。房房下著珠帘睡，月过金阶白露多。  
(《宫词百首》之四十三)

丛丛洗手绕金盆，旋拭红巾入殿门。众里遥抛新橘子，在前收得便承恩。  
(《宫词百首》之四十五)

家常爱著旧衣裳，空插红梳不作妆。忽地下阶裙带解，非时应得见君王。  
(《宫词百首》之五十一)

窗窗户户院相当，总有珠帘玳瑁床。虽道君王不来宿，帐中长是炷牙香。  
(《宫词百首》之八十七)

雨入珠帘满殿凉，避风新出玉盆汤。内人恐要秋衣著，不住熏笼换好香。  
(《宫词百首》之八十八)

树头树底觅残红，一片西飞一片东。自是桃花贪结子，错教人恨五更风。  
(《宫词百首》之九十)

宫词不仅反映了宫廷内的生活，也把幽闭在深宫中的少女内心的寂寞和苦痛的情绪反映了出来。

**王涯与令狐楚** 王涯，太原人。贞元中，进士擢第。元和中，官至宰相。后出为剑南东川节度使，文宗时，再入为宰相。甘露事变，王涯和他的一家都为宦官所杀。王涯文有雅思，元和中，以兵部员外郎、知制诰，再为翰林学士，所起草的制诰，文辞温丽。现在传世的《元和姓纂》，实际是王涯领衔修纂的，因他被杀，遂改用协修者林宝的名义。

王涯的边塞诗，也清新可咏。如：

塞虏常为敌，边风已报秋。平生多意气，箭底觅封侯。(《塞上曲二首》之二)

负羽到边州，鸣笳度陇头。云黄知塞近，草白见边秋。(《陇上行》)

辛勤几出黄花戍，迢递初随御柳营。寒晚每愁残月苦，边愁更逐断蓬惊。

(《塞下曲二首》之一)

年少辞家从冠军，金妆宝剑去邀勋。不知马骨伤寒水，唯见龙城起暮云。

(《塞下曲二首》之二)

他的《秋夜曲》也有较新的意境。

桂魄(月)初生秋露微，轻露已薄未更衣。银筝夜久殷勤弄，心怯空房不忍归。

王涯也写了不少宫词，内容丰富，刻划细腻，由于他再任宰相，接近宫闱，所以王涯在宫词写作方面的造就，不在王建之下。如：

五更初起觉风寒，香炷烧来夜已残，欲卷珠帘惊雪满，自将红烛上楼看。

夜久盘中蜡滴稀，金刀翦起尽霏霏。传声总是君王唤，红烛台前著舞衣。

永巷重门渐半开，宫官著锁隔门回。谁知曾笑他人处，今日将身自入来。  
春风帘里旧青蛾，无奈新人夺宠何。寒食禁花开满树，玉堂终日闭时多。  
白雪猧儿拂地行，惯眼红毯不曾惊。深宫更有何人到，只晓金阶吠晚萤。  
春风摆荡禁花枝，寒食秋千满地时。又落深宫石渠里，尽随流水入龙池。  
禁门烟起紫沉沉，楼阁当中复道深。长入暮天凝不散，掖庭宫里动秋砧。  
迥出芙蓉阁上头，九天县处正当秋。年年七夕晴光里，宫女穿针尽上楼。  
银瓶泻水欲朝妆，烛焰红高粉壁光。共怪满衣珠翠冷，黄花瓦上有新霜。

令狐楚，宜州华原人。贞元七年（公元七九一年），进士擢第。元和末，官至宰相。他的近体诗，也清新可诵。

令狐楚的代表作如：

君行登陇上，妾梦在闺中。玉箸千行落，银床一半空。（《长相思二首》之一）

绮席春眠觉，纱窗晓望迷。朦胧残梦里，犹自在辽西。（《长相思二首》之二）

却望冰河阔，前登雪岭高。征人几多在，又拟战临洮。（《从军词五首》之三）

胡风千里惊，汉月五更明。纵有还家梦，犹闻出塞声。（《从军词五首》之四）

暮雪连青海，阴霞覆白山。可怜班定远，生入玉门关。（《从军行五首》之五）

少小边州惯放狂，骍骑蕃马射黄羊。如今年老无筋力，犹倚营门数雁行。（《年少行四首》之一）

家本清河住五城，须凭弓箭得功名。等闲飞鞚秋原上，独向寒云试射声。（《年少行四首》之二）

弓背霞明剑照霜，秋风走马向咸阳。未收天子河湟地，不拟回头望故乡。（《年少行四首》之三）

雪满衣裳冰满须，晓随飞将伐单于。平生意气今何在，把得家书泪如珠。（《塞下曲二首》之一）

边草萧条塞雁飞，征人南望泪沾衣。黄尘满面长须战，白发生头未得归。（《塞下曲二首》之二）

云霞五采浮天阙，梅柳千般夹御沟。不上乐游原上望，岂知春色满神州。（《汉苑行》）

令狐楚的骈文，固然对李商隐影响很深，就是近体诗，也一样对李商隐影响很深。

元和时期的诗人，著名者还有刘言史、鲍溶、殷尧藩、施肩吾、姚合、章孝标等。

刘言史，邯郸人，歌诗美丽恢瞻。初客镇冀，王武俊奏为枣强令。后客汉南，李夷简署为司空掾，病卒。

刘言史的代表作，如：

杜陵村人不田穡，入谷经溪复缘壁。每至南山草木春，即向侯家取金碧。  
幽艳凝华春景曙，林夫移得将何处。蝶惜芳丛送下山，寻断孤香始回去。  
豪少居连鹄鹳东，千金使买一株红。院多花少栽未得，零落绿娥纵指中。  
咸阳亲戚长安里，无限将金买花子。浇红湿绿千万家，青丝玉轳声哑哑。（《买花谣》）

独坐炉边结夜愁，暂时思去亦难留。手持金箸垂红泪，乱拨寒灰不举头。  
(《长门怨》)

秋江欲起白头波，贾客瞻风无渡河。千船火绝寒宵半，独听钟声觉寺多。  
(《夜泊润州江口》)

柔枝湿艳亚朱栏，暂作庭芳便欲残。深藏数片将归去，红缕金针绣取看。  
(《看山木瓜花二首》之二)

旧业丛台废苑东，几年为梗复为蓬。杜鹃啼断回家梦，半在邯郸驿树中。  
(《泊花石浦》)

远火荧荧聚寒鬼(指磷火)，绿燄欲销还复起。夜深风雪古城空，行客衣襟汗如水。(《夜入简子古城》)

鲍溶，字德源。元和间，以进士擢第，与韩愈友善。

鲍溶的代表作，如：

蒙恬虏生人，北筑秦氏冤。祸兴萧墙内，万里防祸根。城成六国亡，宫阙启千门。生人半为土，何用空中原。奈何家天下，骨肉尚无恩。投沙拥海水，安得久不翻。乘高惨人魂，寒日易黄昏。枯骨贯朽铁，砂中如有言。万古骊山下，徒悲野火燔。(《长城》)

西方太白高，壮士羞病死。心知报恩处，对酒歌易水。沙鸿号天末，横剑别妻子。苏武执节归。班超束书起。山河不足重，重在遇知己。(《壮士行》)

竹间深路马惊嘶，独入蓬门半似迷。劳问圃人终岁事，桔槔声里雨春畦。  
(《答客》)

柳塘烟起日西斜，竹浦风回雁弄沙。炀帝春游古城在，坏宫芳草满人家。  
(《隋宫》)

施肩吾，字希圣，洪州人。元和十年(公元八一五年)，以进士擢第。为诗奇丽。

施肩吾的代表作，如：

古人谩歌西飞燕，十年不见狂夫面。三更风作切梦刀，万转愁成系肠线。所嗟不及牛女星，一年一度得相见。(《古离别二首》之一)

老母别爱子，少妻送征郎。血流既四面，乃一断二肠。不愁寒无衣，不怕饥无粮。惟恐征战不还乡，母化为鬼妻为孀。(《古离别二首》之一)

落尽万株红，无人解系风。今朝芳径里，惆怅锦机空。(《惜花》)

可怜江北女，惯唱江南曲。摇荡木兰舟，双皂不成浴。(《杂古词五首》之一)

红颜感暮花，白日同流水。思君如孤灯，一夜一心死。(《杂古词五首》之五)

湘川终日流，湘妃昔时哭。美色已成尘，泪痕犹在竹。(《湘川怀古》)

秦世老翁归汉世，还同白鹤返辽城。纵令记得山川路，莫问当时州县名。  
(《桃源洞二首》之二)

羊马群中觅人道，雁门关外绝人家。昔时闻有云中郡，今日无云空见沙。  
(《云中道上作》)

姚合，陕州硤石(今河南陕县东南七十里)人。元和十一年(公元八一六年)，以进士擢第。历杭州刺史、陕虢观察使。开成(公元八三六至八四年)末，终秘书监。

姚合的代表作，如：

酬恩不顾名，走马觉身轻。迢递河边路，苍茫塞上尘。沙寒无宿雁，虏近少闲兵。饮罢挥鞭去，傍人意气生。（《送李侍御过夏州》）

相思春树绿，千里亦依依。鄂杜月频满，潇湘人不归。桂花风畔落，烟草蝶双飞。一别无消息，水南车迹稀。（《友人南游不回因寄》）

先忆花时节，家山及早归。爱诗看古药，忆酒典春衣。睡少身还健，愁多食不肥。自怜依赖性，无事出门稀。（《秋日闲居二首》之二）

秋来梨果熟，行哭小儿饥。邻富鸡长往，庄贫客渐稀。借牛耕地晚，卖树纳钱迟。墙下当官道，依前夹竹篱。（《原上新居》）

叶叶如眉翠色浓，黄莺偏恋语从容。桥边陌上无人识，雨湿烟和思万重。（《杨柳枝词五首》之一）

二月杨花触处飞，悠悠漠漠自东西。谢家咏雪徒相比，吹落庭前便作泥。（《杨柳枝词五首》之四）

章孝标，桐庐人。元和十四年（公元八一九年），以进士擢第。除秘书省正字。太和中，试大理评事。

章孝标的代表作，如：

边酒画角怨金徽，半夜对吹惊贼围。塞雁绕空秋不下，胡云著草冻还飞。关头老马嘶新月，碛里疲兵泪湿衣。余韵袅空何处尽，戍天寥落晓星稀。（《闻角》）

旧垒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归。连云大厦无栖处，更傍谁家门户飞。（《归燕词辞工部侍郎》）

章孝标的儿子章碣，唐僖宗乾符中，以进士登第。

他的代表作，如：

流落常嗟胜会稀，故人相遇菊花时。凤笙龙笛数巡酒，红树碧山无限诗。尘土十分归举子，乾坤大半属偷儿。

《长杨》《羽猎》须留本，开济重为阙下期。（《登卯岁毗陵登高高会中贻同志》）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元来不读书。（《焚书坑》）

**李贺与李益** 李贺，字长吉，唐远房宗室。七岁能辞赋，为韩愈、皇甫湜所器重。以父名晋肃，避父讳，不肯应进士举，卒年二十七。李商隐作《李贺小传》云：“长吉细瘦，通眉，长指爪，能苦吟疾书。最先为昌黎韩愈所知。……每旦日出与诸公游，未尝得题，然后为诗。……常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镜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太夫人使婢探囊出之，见所书多，辄曰：‘是儿要当呕出心始已耳。’上灯与食，长吉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过亦不复省。”据说李贺以诗卷谒韩愈，韩愈时为国子博士，终朝接客很疲倦，已送客解带，值李贺求见，门人呈贺行卷，愈旋解带旋读之。行卷的首篇为《雁门太守行》，诗云：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月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声寒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韩愈读未终卷，赶忙束带派人把他请进来。这首歌行的好处，是在五十六字的诗篇里，强调了战斗的紧张气氛，“黑云压城城欲摧”，“霜重鼓声寒不起”，战争的压力压迫得读者透不过气来，最后描绘雁门太守只好慷慨就义，“提携玉龙为君死”，洒血沙场了。

李贺的代表作，如：

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画栏桂树悬秋香，三十六宫土花碧。魏官牵车指千里，东关酸风射眸子。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携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金铜仙人辞汉歌》）

汉武帝铸造了捧露盘的铜人，魏明帝青龙元年（公元二三三年），把铜人从关中运往洛阳，据说拆盘临载的时候，捧露盘的铜人潸然泪下，这本来是一件荒诞无稽的神话故事，李贺采用这个情节，做了这首歌行，“东关酸风射眸子”，“忆君清泪如铅水”，把无情的铜人写成了有情的活人，在诗人丰富奇诞的想像中，给铜人注入了生命和感情，再用“天若有情天亦老”的句子来衬托，毋怪使人读了为之骨骇神惊，赞叹不已。

李贺是没有经过边塞生活的，但是他的边塞诗，却形成另一种独特风格，如：

卷发胡儿眼睛绿，高楼夜静吹横竹。一声似向天上来，月下美人望乡哭。直排七点星藏指，暗合清风调宫徵。蜀道秋深云满林，湘江半夜龙惊起。玉堂美人边塞情，碧窗皓月愁中听，寒砧能捣百尺练，粉泪凝珠滴红线。胡儿莫作陇头吟，隔窗暗结愁人心。（《龙夜吟》）

饥寒平城下，夜夜守明月。别剑无玉花，海风断鬓发。塞长连白空，遥见汉旗红。青帐吹短笛，烟雾湿昼龙。日晚在城上，依稀望城下。风吹枯蓬起，城中嘶瘦马。借问筑城吏，去关几千里。惟愁裹尸归，不惜倒戈死。（《平城下》）

胡角引北风，蓟门白于水，天含青海道，城头月千里。（《塞下曲》三首之一）

露下旗蒙蒙，寒金鸣夜刻。蕃甲锁蛇鳞，马嘶青冢白。（《塞下曲》三首之二）

秋静见旄头，沙远席羈愁。帐北天应尽，河声出塞流。（《塞下曲》三首之三）

李贺的《老去采玉歌》亦脍炙人口：

采玉采玉须水碧，琢作步摇徒好色。老夫饥寒龙为愁，蓝溪水气无清白。夜雨冈头食蓊子，杜鹃口血老夫泪。蓝溪之水厌生人，身死千年恨溪水。斜山柏风雨如啸，泉脚挂绳青袅袅。村寒白屋念娇婴，古台石磴悬肠草。（《老夫采玉歌》）

全诗描绘采玉工匠的悲惨生活，刻划入微。《感愤》五首之一：

合浦无明珠，龙州无木奴。足知造化力，不给使君须。越妇未织作，吴蚕始蠕蠕。县官骑马来，狞色虬紫须。怀中一方板，板上数行书。不因使君怒，焉得诣尔庐。越妇拜县官，桑牙今尚小。会待春日晏，丝车方掷掉。越妇通言语，小姑具黄粱。县官踏餐去，簿吏复登堂。

和他平日的诗歌风格，又有很大变化，但对官吏的剥削人民，尽情揭露。当然这种具深厚社会内容的作品，在李贺歌诗编中数量是不算多的。李贺的情诗、如：

妾家住横塘，红纱满桂香。青云教绾头上髻，明月与作耳边璫。莲风起，江畔春，大堤上，留北人。郎食鲤鱼尾，妾食猩猩唇。莫指襄阳道，绿浦归帆少。今日菖蒲花，明朝枫树老。（《大堤曲》）

意境优美，确是最好的情诗。此外如《梦天》、《昆仑使者》诸诗，也

都迷离恍惚，意境神奇，别具一种风格。

老兔寒蟾泣天色，云楼半开壁斜白。玉轮轧露湿团光，鸾珮相逢桂香陌。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梦天》）

昆仑使者无消息，茂陵烟树生愁色。金盘玉露自淋漓。元气茫茫收不得。麒麟背上石文裂，虬龙鳞下红枝折。何处偏伤万国心，中天夜久高明月。（《昆仑使者》）

李贺的绝句，又别具一种风格，如：

斫取青光写楚辞，腻香春粉更离离。无情有恨何人见，露压烟啼千万枝（《昌谷北园新笋四首》之二）

鬣叔去匆匆，如今不豢龙。夜来霜压栈，酸骨折西风（《马诗二十三首》之九）

武帝爱神仙，烧金得紫烟。厩中皆肉马，不解上青天。（《马诗二十三首》之二十三）也是音节悲凉，托意深远。

李贺也有不少诗篇，辞意晦涩，不容易领会了解，同时他二十七岁就死了，究竟生活圈子狭窄，视界不宽，缺少社会实践，徒以辞藻典故取胜，不免有形式主义的倾向。

李益，姑臧（今甘肃武威）人。大历四年（公元七六九年），以进士擢第。授郑县尉。北游河朔，幽州节度使刘济辟为从事。宪宗元和中，召为秘书少监，集贤殿学士，自负才望，多所凌忽，谏官举其与幽州镇将刘济诗句：“草绿古燕州，莺声引独游。雁归天北畔，春尽海西头。向日花偏落，驰年水自流。感恩知有地，不上望京楼。”又云：“惆怅秦城送独归，蓟门云树远依依。秋来莫射南飞燕，从遣乘春更北飞。”认为对刘济有感恩语，降居散秩，不久又用为秘书监，迁太子宾客、集贤学士、判院事。转右散骑常侍。太和（公元八二七至八三五年）初，以礼部尚书致任，卒。益长于诗歌，与宗人李贺齐名，每作一篇，教坊乐人取为供奉歌辞。

李益的代表作，如《长干行》[一]：

忆妾深闺里，烟尘不曾识。嫁与长干人，沙头候风色。五月南风兴，思君下巴陵。八月西风起，思君发扬子。去来悲如何，见少离别多。湘潭几日到，妾梦越风波。昨夜狂风度，吹折江头树。渺渺暗无边，行人在何处。好乘浮云骢，佳期兰渚东。鸳鸯绿浦上，翡翠锦屏中。自怜十五余，颜色桃花红。那作商人妇，愁水复愁风。

百马饮一泉，一马争上游。一马喷成泥，百马饮浊流。上有沧浪客，对之空叹息。自顾纓上尘，裴回终日夕。为问泉上翁，何时见沙石。（《饮马歌》）

前一首《长干行》，可与李白的《长干行》相匹敌；后一首《饮马歌》讲到害群之马，“一马喷成泥，百马饮浊流”，重视了集体的利益。内容都比较深刻。

李益也有不少边塞诗，当时乐府传唱，如：

眼见风来沙旋移，经年不见草生时。莫言塞上无春到，纵有春来何处知。（《度破讷沙二首》之一）

破讷沙头雁正飞，鹞鹞泉上战初归。平明日出东南地，满碛寒光生铁衣。（《度破讷沙二首》之二）

蕃州部落能结束，朝暮驰猎黄河曲。燕歌未断塞鸿飞，牧马群嘶边草绿。

(《塞下曲》)

黄河东流流九折，沙场埋恨何时绝。蔡琰没去造胡笳，苏武归来持汉节。

(《塞下曲》)

行人夜上西城宿，听唱梁州双管逐。此时秋月满关山，何处关山无此曲。

(《夜上西城听梁州曲二首》之一)

胡风冻合鹍鹄泉，牧马千群逐暖川。塞外征行无尽日，年年移帐雪中天。

(《暖川》)

天山雪后北风寒，横笛偏吹《行路难》，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从君北征》)

关城榆叶早疏黄，日暮沙云古战场。表请回军掩尘骨，莫教士卒哭龙荒。

(《回军行》)

回乐烽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夜上受降城闻笛》)其他几首绝句，也清新可喜。如：

边头射雕将，走马出中军。遥见平原上，翻身向暮云。(《江南词》)

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观骑射》)

烟草连天枫树齐，岳阳归路子规啼。春江万里巴陵戍，落日看沉碧水西。

(《送人归岳阳》)

汴水东流无限春，隋家宫阙已成尘。行人莫上长堤望，风起杨花愁杀人。

(《汴河曲》)

寒山吹笛唤春归。迁客相看泪满衣。洞庭一夜无穷雁，不待天明尽北飞。

(《春夜闻笛》)

**元稹与白居易** 元稹，字微之，郡望河南，寓家河内(今河南沁阳县)人。年十五，以明经擢第，补校书郎。元和元年(公元八 六年)，举制科，对策第一，拜右拾遗，迁监察御史。以得罪宦官，贬江陵士曹参军，久乃徙通州(治通川，今四川达县)司马，改虢州(治弘农，今河南灵宝县)长史。元和末，召拜膳部员外郎。穆宗即位，擢祠部郎中、知制诰，俄迁中书舍人，为翰林学士承旨，出为工部侍郎，未几，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三月罢。出为同州刺史，徙浙东观察使。太和三年，召为尚书左丞。俄拜武昌节度使，病卒，年五十三。元稹和白居易诗名相埒，时称元白。

元稹的代表作，如：

连昌宫中满宫竹，岁久无人森似束。又有墙头千叶桃，风动落花红蔌蔌。宫边老翁为予泣，少年进食曾因入。上皇正在望仙楼，太真同凭阑干立。楼上楼前尽珠翠，炫转荧煌照天地。归来如梦复如痴，何暇备言宫里事。初过寒食一百六，店舍无烟宫树绿。夜半月高弦索鸣，贺老琵琶定场屋。力士传呼觅念奴，念奴潜伴诸郎宿。须臾觅得又连催，特敕街中许然烛。春娇满眼睡红绡，掠削云鬟旋装束。飞上九天歌一声，二十五郎吹管逐。逡巡大偏凉州彻，色色龟兹轰录续。李暮压笛傍宫墙，偷得新翻数般曲。平明大驾发行宫，万人歌舞涂路中。百官队仗避岐薛，杨氏诸姨车斗风。明年十月东都破，御路犹存禄山过。驱令供顿不敢藏，万姓无声泪潜堕。两京定后六七年，却寻家舍行宫前。庄园烧尽有枯井，行宫门闭树宛然。尔后相传天皇帝，不到离宫门久闭，往来年少说长安，玄武楼成花萼废。去年敕使因斫竹，偶值门开暂相逐。荆榛栉比塞池塘，狐兔骄痴缘树木。舞榭敲倾基尚在，文窗窈窕纱犹绿。尘埋粉壁旧花钿，鸟啄风筝碎珠玉。上皇偏爱临砌花，依然御榻临阶斜。蛇出燕巢盘斗拱，菌生香案正当衙。寝殿相连端正楼，太真梳洗楼上

头。晨光未出帘影黑，至今反挂珊瑚钩。指似傍人因恸哭，却出宫门泪相续。自从此后还闭门，夜夜狐狸上门屋，我闻此语心骨悲，太平谁致乱者谁。翁言野父何分别，耳闻眼见为君说。姚崇宋璟作相公，劝谏上皇言语切。变理阴阳禾黍丰，调和中外无兵戎。长官清平太守好，拣选皆言由相公，开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渐渐由妃子。禄山宫里养作儿，虢国门前闹如市。弄权宰相不记名，依稀忆得杨与李。庙谖颠倒四海摇，五十年来作疮痍。今皇神圣丞相明，诏书才下吴蜀平。官军又取淮西贼，此贼亦除天下宁。年年耕种宫前道，今年不遣子孙耕。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庙谖休用兵。（《连昌宫词》）

织夫何太忙，蚕经三卧行欲老。蚕神女圣早成丝，今年丝税抽徵早。早徵非是官人恶，去岁官家事戎索。征人战苦束刀疮，主将动高换罗幕。缫丝织帛犹努力，变 撩机苦难织。东家头白双女儿，为解挑纹嫁不得（予掾荆时，目击贡绫户有终老不嫁之女）。檐前袅袅游丝上，上有蜘蛛巧来往。羨他虫豸解缘天，能向虚空织罗网。（《织妇词》）

牛吒吒，田确确，旱块敲牛蹄趵趵，种得官仓珠颗谷。六十年来兵簇簇，日月食粮车辘辘。一日官军收海服，驱牛驾车食牛肉。归来收得牛两角，重铸锄犁作斤斲。姑舂妇担去输官，输官不足归卖屋。愿官早胜讎早复。农死有儿牛有犊，不遣官军粮不足。（《田家词》）元稹的绝句，也清新可诵，如：

秋丛绕舍似陶家，遍绕篱边日渐谢。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无花。（《菊花》）白居易，字乐天，其先太原人，后徙家下邦（今陕西渭南县东北）。贞元十六年（公元八 年），以进士擢第，补校书郎。元和元年（公元八 六年），以制举对策列乙等，调整屋尉，为集贤校理。寻召为翰林学士，迁左拾遗，转左赞善大夫。居易数言事，有谏风，宰相嫌其出位，不悦，言官言居易母墮井死，而居易赋《新井篇》，元和十年（公元八一五年），黜为江州司马。元和十三年（公元八一八年），徙忠州（治临江，今四川忠县）刺史。元和十五年（公元八二 年），入为司门员外郎。长庆元年（公元八二四年），以主客郎中、知制诰，俄迁中书舍人。长庆二年（公元八二五年），复出为杭州刺史。长庆四年（公元八二四年），以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宝历元年（公元八二五年），复拜苏州刺史，病免。文宗太和元年（公元八二七年），召为秘书监，迁刑部侍郎。时牛李党争开始，居易复求分司东都。太和三年（公元八二九年）（夏，除太子宾客，分司。太和五年（公元八三一年），拜河南尹。太和七年（公元八三三年），复以太子宾客分司。开成元年（公元八三六年），起为同州刺史，不拜。改太子少傅。会昌元年（公元八四一年），以刑部尚书致仕，时年七十。会昌六年（公元八四六年），病卒，年七十五。

白居易有一封信给元稹，提倡讽谕诗，他认为讽谕诗“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洎周衰秦兴，采诗官废，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导人情，乃至於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於时六义始義矣。国风变为骚辞，五言始於苏李。苏李骚人，皆不遇者，各系其志，发而为文。故河梁之句，止於伤别；泽畔之吟，归於怨思；彷徨抑郁，不暇及他耳。……晋宋以还，得者盖寡。以康乐（谢灵运）之奥博，多溺于山水；以渊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园。江（文通）鲍（照）之流，又狭于此。如梁鸿《五噫》之例者，百无一二焉。……至於梁陈间，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余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离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之什，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故仆所谓嘲风雪、

弄花草而已……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所可举者，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篇，至於贯穿今古，翻续格律，尽工尽善，又过於李。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杜尚如此，况不逮杜哉乎。仆尝痛诗道崩坏，忽忽发愤，或食辍哺、夜辍寝，不量材少，欲扶起之”（《与元九书》）。白居易的讽谕诗，一、主张要有政治社会内容，二、主张文字力求避免深奥，又不流于庸俗。当然要达到这两点，是非常困难的。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有“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张祜讥之为《目连变文》，白居易也只好接受这个批评。可见既要老妪咸解，又不流于庸俗，真是谈何容易。

白居易的讽谕诗，“意激而言质”，具有深厚的政治内容。如：

晨游紫阁峰，暮宿山下村。村老见予喜，为予开一尊。举杯未及饮，暴卒来入门。紫衣挟刀斧，草草十余人。夺我席上酒，掣我盘中食。主人退后立，敛手反如宾。中庭有奇树，种来三十春。主人惜不得，持斧断其根。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宿紫阁山北村》）

由于宪宗是由宦官拥立的，因此元和初年宦官权势很大。神策军归宦官指挥，当然可以胡作非为，谁人也不敢奈何他们。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妇姑荷箠食，童稚 壶浆。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傍。右手秉遗穗，左臂悬敝筐。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观刈麦》）

这首诗是白居易为盩厔尉时所作。诗的内容，具有现实社会内容。最后白居易的内心自疚，更加强了社会分配不平均的气氛，使这首诗收到了更好的效果。

骅骝失其主，羸饿无人牧。向风嘶一声，苍苍黄河曲。蹋冰水畔立，卧雪冢间宿。岁暮田野空，寒草不满腹。岂无市骏者，尽是凡人目。相马失于瘦，遂遗千里足。村中何扰扰，有吏徵刍粟。输彼军厩中，化作驽骀肉。（《羸骏》）

骏马没有碰到王良、伯乐，使人视为凡马，最后作为驽骀肉来处理，也是感慨很深的。

麦死春不雨，禾损秋早霜。岁晏无口食，田中采地黄。采之将何用，持以易糒粮。凌晨荷锄去，薄暮不 筐。 来朱门家，卖与白面郎。与君啖肥马，可使照地光。愿易马残粟，救此苦饥肠。（《采地黄者》）

白居易通过采地黄一事，来控诉人民生活的艰巨，和富贵之家以残粟易地黄以饲马这一事实，作了鲜明的对比。《秦中吟》一组诗，是白居易反映贞元、元和之际闻见之事的作品。

厚地植桑麻，所要济生民。生民理布帛，所求活一身。身外充征赋，上以奉君亲。国家定两税，本意在爱人。厥初防其淫，明敕内外臣。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浚戎以求宠，敛索无冬春。织绢未成匹，缣丝未盈斤。里胥迫我纳，不许暂逡巡。岁暮天地闭，阴风生破村。夜深烟火尽，霰雪白纷纷。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悲喘与寒气，并入鼻中辛。昨日输残税，因窥官库门。缿帛积如山，丝絮如云屯。号为羨余

物，随月献至尊。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秦中吟》之二《重赋》）

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贵贱无常价，酬直看花数。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素。上张幄幕庇，旁织巴篱护。水洒复泥封，移来色如故。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有一田舍翁，偶来买花处，低头独长叹，此叹无人喻。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秦中吟》之十《买花》）

白居易对《秦中吟》这组诗，自己也很为满意的。他有诗云：

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中）吟》近正声。忽被老元（元稹）偷格律，苦教短李（李绅）伏歌行。世间富贵应无分，身后文章合有名。莫怪气粗言语大，新排十五卷诗成。（《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赠元九李十二》）

《新乐府》一组，是白居易在元和四年（公元八九年）的作品。《新乐府》自序曰：“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於意，不系于文……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诚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丰老翁八十八，头鬓眉须皆似雪。玄孙扶向店前行，左臂凭肩右臂折。问翁臂折来几年，兼问致折何因缘。翁云贯属新丰县，生逢圣代无征战。惯听梨园歌管声，不识旗枪与弓箭。无何天宝大徵兵，户有三丁点一丁。点得驱将何处去，五月万里云南行。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是时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将大石捶折臂。张弓簸旗俱不堪，从兹始免征云南。骨碎筋伤非不苦，且图拣退归乡土。此臂折来六十年，一肢虽废一身全。至今风雨阴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终不悔，且喜老身今独在。不然当时泸水头，身死魂孤骨不收。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冢上哭啾啾。老人言，君听取，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不赏边功防黠武。又不闻天宝宰相杨国忠，欲求恩幸立边功。边功未立生人怨，请问新丰折臂翁。（《新乐府》之九《新丰折臂翁》）

白居易的《江南遇天宝乐叟》，大概是元和十年（公元八一五年），至江州以后所作。

白头病叟泣且言，禄山未乱入梨园，能弹琵琶和法曲，多在华清随至尊。是时天下太平久。年年十月坐朝元。千官起居环佩合，万国会同车马奔。金钿照耀石瓮寺，兰麝熏煎温汤源。贵妃宛转侍君侧，体弱不胜翠珠繁。冬雪飘锦锦袍暖，春风荡漾霓裳翻。欢娱未足燕寇至，弓劲马肥胡语喧，鬻土人迁避夷狄，鼎湖龙去哭轩辕。从此漂沦落南土，万人死尽一身存。秋风江上浪无限，暮雨舟中酒一尊。涸鱼久失风波势，枯草曾沾雨露恩。我自秦来君莫问，骊山渭水如荒村。新丰树老笼明月，长生殿暗锁春云。红叶纷纷盖绮瓦，绿苔重重封坏垣。唯有中官作宫使，每年寒食一开门。（《江南遇天宝乐叟》）

在中唐诗中，白居易的讽喻诗，反映了社会的黑暗面，其现实主义精神，是无出其右的。

白居易有几篇杰作，如：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

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赋得古原草送别》）

短短四十字，把春草的倔强生命力，完全刻划了出来。据《幽闲鼓吹》称：白居易“应举至京，以诗谒顾著作〔况〕，顾睹姓名，熟视白公曰：‘兼价方贵，居亦弗易。’乃披〔行〕卷，首篇曰：‘咸阳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即嗟赏曰：‘道得个语，居即易矣。’因为之延誉，声名大振。”可见这是他的代表作，列於行卷之首的。

桂布白似雪，吴绵软於云。布厚绵且重，为裘有余温。朝拥坐至暮，夜覆眠达晨。谁知严冬月，支体暖如春。中夕忽有念，抚裘起逡巡。丈夫贵兼济，岂独在一身。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新制布衣》）

从自己布厚绵且软的布裘，想到“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推己及人，这种高尚品德，是很可嘉尚的。

丘墟郭门外，寒食谁家哭。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累累春草绿。棠梨花映白杨树，尽是死生离别处。冥冥重泉哭不闻，萧萧暮雨人归去。（《寒食衣望吟》）

寒食清明是吾国悼念逝者的扫墓节日，白居易在这首诗中集中了人们哀悼的情绪，在短短五十二个字中把它表达了出来，这也是非常成功的。

白居易的代表作，还有如：

二月村园暖，桑间戴胜飞。农夫春旧谷，蚕妾捣新衣。牛马因风远，鸡豚过社稀。黄昏林下路，鼓笛赛神归。（《春村》）

采石江边李白坟，绕田无限草连云。可怜荒垆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但是诗人多薄命，就中沦落不过君。（《李白墓》）

南窗背灯坐，风霰暗纷纷。寂寞深村夜，残雁雪中闻。（《村雪夜坐》）

村南无限桃花发，唯我多情独自来。日暮风吹红满地，无人解惜为花开。（《下邳庄南桃花》）

慈恩春色今朝尽，尽日徘徊倚寺门。惆怅春归留不得，紫藤花下渐黄昏。（《三月三十日题慈恩寺》）

江柳影寒新雨地，塞鸿声急欲霜天。愁君独向沙头宿，水绕芦花月满船。（《赠江客》）

瞿唐峡口水烟低，白帝城头月向西。唱到竹枝声咽处，寒猿暗鸟一时啼。（《竹枝词四首》之一）

巴东船舫上巴西，波面风生雨脚齐。水蓼冷花红簇簇，江篱湿叶碧凄凄。（《竹枝词四首》之三）

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如真珠月似弓。（《暮江吟》）

菱叶萦波荷飏风，荷花深处小船通。逢郎欲语低头笑，碧玉搔头落水中。（《采莲曲》）对甘露事变，白居易是完全站在唐文宗一边的。有诗为证：

秦磨利刀斩李斯，齐烧沸鼎烹郈其。可怜黄绮入商洛，闲卧白云歌紫芝。彼为菹醢机上尽，此为鸾皇天外飞。去者逍遥来者死，乃知祸福非天为。（《咏史》九年十一月作）

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顾索素琴应不暇，忆牵黄犬定难追。

麒麟作脯龙为醢，何似泥中曳尾龟。（《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牛李党争中，白居易的亲友大都是牛党，而且都是实权派，但白居易没肯卷

进党争漩涡里去，很早就请分司东都，做一个闲官，抽身政局之外，“完节自高”（《新唐书·白居易传》）。他有诗云：

向夕褰帘卧枕琴，微凉入户起开襟。偶因明月清风夜，忽想迁臣逐客心。何处投荒初恐惧，谁人绕泽正悲吟。始知洛下分司坐，一日安闲直万金。

权门要路是身灾，散地闲居少祸胎。今日怜君岭南去，当时笑我洛中来。虫全性命缘无毒，木尽天年为不才。

大抵吉凶多自致，李斯一去二疏回。（《闲卧有所思二首》）

在大中元年（公元八四七年），还有一个小故事。《云溪友议》云：“居易有妓樊素，善歌；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年既高迈，而小蛮方丰艳，（因作《别柳枝》词云：“两枝杨柳小楼中，袅袅多年伴醉翁。明日放归归去后，世间应不要春风。”刘禹锡见其诗，继和云：‘春尽絮飞留不得，随风好去落谁家。’）[居易又]因《杨柳词》以托意云：‘一树春风千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永丰（居易所居洛阳坊名）西角荒园里，尽日无人属阿谁。’宣宗朝，国乐唱[乐天]前词，上问‘谁作？永丰在何处？’左右具以对，遂因东使，命取永丰柳两枝，植于禁中。居易感上知其名，且好尚风雅，又为诗一章云：‘一树衰残委泥土，双枝荣耀植天庭。定知玄象今春后，柳宿光中添两星。’”

白居易的两首著名代表作《长恨歌》和《琵琶行》，因文长不录。和元稹、白居易齐名的还有李绅。

李绅，字公垂，润州无锡人，为人短小精悍，时称短李。元和初，以进士擢第，累迁右拾遗、翰林学士、户部侍郎。武宗即位，李德裕引之，遂为宰相，后出为检校淮南节度使，病卒。他的诗：

春种一粒粟，秋成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古风二首》之一）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古风二首》之二）李绅这两首诗，虽每首只二十字，但具有深厚的社会内容。

江横渡阔烟波晚，潮过金陵落叶秋。嘹唳寒鸿经楚泽，浅深红树见扬州。夜桥灯火连星汉，水郭危樯近斗牛。今日市朝风俗变，不须开口问迷楼。（《宿扬州》）李绅这首七律诗，写广陵风物，也比较细致。

窦巩，字友封，元和中，以进士擢第。历官刑部郎中。元稹观察浙东，奏为副使。又从镇武昌。白居易编《元白往还集》，收巩诗入集内。

窦巩的代表作。如：

烽烟犹未尽，年鬓暗相催。轻敌心犹在，弯弓手不开。马依秋草病，柳傍故营摧。唯有酬恩客，时听说剑来。（《老将行》）

校猎燕山经几春，雕弓白羽不离身。年来马上浑无力，望见飞鸿指似人。（《赠阿史那都尉》）

春迟不省似今年，二月无花雪满天。村店闭门无处宿，夜深遥唤渡江船。（《早春送宇文十归吴》）

烟水初销见万家，东风吹柳万条斜。大堤欲上谁相伴，马踏春泥半是花。（《襄阳寒食寄宇文籍》）

书未报来几时远，知在三湘五岭间。独立衡门秋水阔，寒鸦飞去日衔山。（《寄南游兄弟》）

年来七十罢耕桑，就暖支羸强下床。满眼儿孙身外事，闲梳白发对斜阳。（《代邻叟》）

伤心欲问前朝事，唯见江流去不回。日暮东风春草绿，鹧鸪飞上越王台。  
(《南游感兴》) 这些七言绝句，也富于情致。

**张祜、徐凝兴朱庆馀** 张祜，字承吉，清河人。长庆(公元八二一至八二四年)中，令狐楚表荐于朝，不见用，后客淮南(扬州)、爱丹阳曲阿(今江苏丹阳县)地，筑室卜隐。祜与徐凝齐名，白居易右凝而抑祜，杜牧右祜而抑凝，我也认为张祜的才情在徐凝之上。张祜以宫词得名，张祜的代表作，如：

日下西塞山，南来洞庭客。晴空一鸟渡，万里秋江碧。惆怅异乡人，偶言空脉脉。(《西江行》)

晓出郡城东，分围浅草中。红旗开向日，白马骤迎风。背手抽金簇，翻身控角弓。万人齐指处，一雁落寒空。(《观徐州李司空猎》)

残猎渭城东，萧萧西北风。雪花鹰背上，冰片马蹄中。臂挂捎荆兔，腰悬落箭鸿。归来逞馀勇，儿子乱弯弓。(《猎》)

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宫词二首》之一)

金陵津渡小山楼，一宿行人自可愁。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洲。(《题金陵渡》)

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纵游淮南》) 徐凝，睦州(治建德，今浙江建德县)人。徐凝的代表作，如：

寒空五老雪，斜月九江云。钟声知何处，苍苍树里闻。(《庐山独夜》)

水色帘前流玉霜，赵家飞燕侍昭阳。掌中舞罢箫声绝，三十六宫秋夜长(《汉宫曲》)

远客远游新过岭，每逢芳树问芳名。长林遍是相思树，争遣愁人独自行。(《相思林》)

一树梨花春向暮，雪枝残处怨风来。明朝渐校无多去，看到黄昏不欲回。(《玩花五首》之一)

萧娘脸下难胜泪，桃叶眉头易得愁。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忆扬州》)

玳瑁床头刺战袍，碧纱窗外叶骚骚。若为教作辽西梦，月冷如丁风似刀。(《莫愁曲》) 朱庆馀，名可久，以字行，越州人。宝历(公元八二五至八一六年)中，进士擢第。朱庆馀的代表作，如：

寂寂花时闭院门，美人相并立琼轩。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宫词》)

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近试上张籍水部》) 用新婚夫妇的画眉深浅，来比喻张籍对朱庆馀作品鉴定的是否首肯，非常巧妙，诗也清婉可诵。

**晚唐诗人** 我们把文宗太和九年(公元八三五年)甘露事变以后，在诗坛上活动的诗人，列为晚唐诗人。又把晚唐分为两个阶段，从太和九年到懿宗咸通十四年(公元八七三年)，为第一个阶段，从僖宗乾符元年(公元八七四年)到唐亡(公元九〇六年)，为第二个阶段。

赵嘏，字承祜，山阳人。会昌二年(公元八四二年)，以进士擢第。大中间，仕至渭南尉，病卒。

赵嘏的代表作，如：

晚树疏蝉起别愁，远人回首忆沧洲。江连故国无穷恨，日带残云一片秋。久客转谙时态薄，多情只共酒淹留。到头生长烟霞者，须向烟霞老始休。（《忆沧洲》）

云物凄凉拂曙流，汉家宫阙动高秋。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紫艳半开篱菊静，红衣落尽渚莲愁。鲈鱼正美不归去，空戴南冠学楚囚。（《长安晚秋》）赵嘏“长笛一声人倚楼”诗句，当时传诵人口，人称之为“赵倚楼”。他还有钱塘诗，“一千里色中秋月，十万军声夜半潮”，把中秋节前后的钱塘江潮，也非常形象地写了出来。

马戴，字虞臣。会昌四年（公元八四四年），以进士擢第。懿宗咸通末年，终太学博士。

马戴的代表作，如：

领得卖珠钱，还归铜柱边。看儿调小象，打鼓放新船。醉后眠神树，耕时语瘴烟。又逢衰蹇老，相问莫知年。（《蛮家》）

河梁送别者，行哭半非亲。此地足征战，胡天多杀人。金罍照离席，宝瑟凝新春。早晚期相见，垂杨凋复新。（《河梁别》）

露气寒光集，微阳下楚丘。猿啼洞庭树，人在木兰舟。广泽生明月，苍山夹乱流。云中君不见，竟夕自悲秋。（《楚江怀古》）

帝乡归未得，辛苦事羁游。别馆一尊酒，客程千里秋。霜风红叶寺，夜雨白苹洲。长恐此时泪，不禁和恨流。（《将别寄友人》）

崔櫓，大中时，以进士擢第，仕至棣州（治厌次，今山东惠民县东南）司马。

崔櫓的代表作，如：

含情含怨一枝枝，斜压渔家短短篱。惹袖尚馀香半日，向人如诉雨多时。初开偏称雕梁画，未落先愁玉笛吹。行客见来无去意，解帆烟浦为题诗。（《岸梅》）

烟花零落过清明，异国光阴老客情。云梦夕阳愁里色，洞庭春浪坐来声。天边一与旧山别，江上几看芳草生。独凭树杆意难写，暮笳鸣轧调孤城。（《春晚岳阳城言怀》）

草遮回磴绝鸣鉴，云树深深碧殿寒。明月自来还自去，更无人倚玉栏干。（《华清宫》之一）

门横金锁悄无人，落日秋声渭水滨。红叶下山寒寂寂，湿云如梦雨如尘。（《华清宫》之三）李群玉，澧州（治澧阳，今湖南澧县）人。官弘文馆校书郎。李群玉的代表作，如：

昔窃不死药，奔空有嫦娥。盈盈天上艳，孤洁栖金波。织女了无语，长宵隔银河。轧轧挥素手，几时停玉梭。（《感兴四首》之二）

洞房三五夕，金釭凝焰灭。美人抱云和，斜倚纱窗月。沉吟想幽梦，闺思深不说。弦冷玉指寒，含颦待明发。（《感兴四首》之三）

八月白露浓，芙蓉抱香死。红枯金粉堕，寥落寒塘水。西风团叶下，叠藪参差起。不见棹歌人，空垂绿房子。（《伤思》）

西南一片黑，俄起北风颠。浪泼巴陵树，雷烧鹿角田。鱼龙方簸荡，云雨正喧阗。想赭君山日，秦皇怒赫然。（《洞庭风雨二首》之一）

巨浸吞湘澧，西风忽怒号。水将天共黑，云与浪俱高。羽化思乘鲤，山漂欲扑鳌。阳乌犹曝翅，真空湿蟠桃。（《洞庭风雨二首》之二）李群玉的五言，托意幽远，别具一种风格。李群玉的七律如：

落照苍茫秋草明，鹧鸪啼处远人行。正穿诘曲崎岖路，更听钩辀格磔声。曾泊桂江深岸雨，亦於梅岭阻归程。此时为尔肠千断，乞放今宵白发生。（《九子坡闻鹧鸪》）

小姑洲北浦云边，二女容华自俨然。野庙向江春寂寂，古碑无字草芊芊。风回日暮吹芳芷，月落山深哭杜鹃。犹似含颿望巡狩，九疑愁断隔湘川。（《黄陵庙》）也都对仗工整，风格清丽，堪称佳作。

许浑，字用晦，丹阳人。太和六年（公元八三二年），以进士擢第。官历睦（治建德，今浙江建德县）、郢（治长寿，今湖北钟祥县）二州刺史，著有《丁卯集》。

许浑的代表作有：

南楼春一望，云水共昏昏。野店归山路，危桥带郭村。晴烟和草色，夜雨长溪痕。下岸谁家住，残阳半掩门。（《南楼春望》）

绿树荫青苔，柴门临水开。簟凉初熟麦，枕腻乍经梅。鱼跃海风起，鼉鸣江海来。佳人竟何处，日夕上楼台。（《闲居孟夏即事》）

金风荡天地，关西群木凋。早霜难喔喔，残月马萧萧。紫陌秦山近，青枫楚树遥。还同长卿志，题字满河桥。（《秋日行次关西》）

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鸟下绿芜秦苑夕，蝉鸣黄叶汉宫秋。行人莫问当年事，故国东来渭水流。（《咸阳城东楼》）

桂州南去与谁同，处处山连水自通。两岸晓霞千里草，半帆斜日一江风。瘴雨欲来枫树黑，火云初起荔枝红。愁君路远销年月，莫滞三湘五岭中。（《送杜秀才归桂林》）

新秋弦管清，时时遏云声。曲尽不知处，月高风满城。（《闻歌》）

劳歌一曲解行舟，红叶青山水急流。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谢亭送别》）许浑的诗歌风格，上接中唐，下启晚唐，属对清丽，辞情婉转，可谓晚唐之秀。

刘沧，字蕴灵，鲁人。大中八年（公元八五四年），以进士擢第，官龙门（今山西河津县）令。

刘沧的代表作，如：

此地曾经翠辇过，浮云流水竟如何。香消南国美人尽，怨入东风芳草多。残柳宫前空露叶，夕阳川上浩烟波。行人遥起广陵思，古渡月明闻棹歌。（《经炀帝行宫》）

森森古木列岩隈，回压寒原霁色开。云雨只从山上起，风雷多从庙中来。三江入海声长在，双鹤啼天影未回。花落空庭春昼晚，石床松殿满青苔。（《题敬亭山庙》）

十二岚峰挂夕晖，庙门深闭雾烟微。天高木落楚人思，山迥月残神女归。触石晴云凝翠鬋，度江寒雨湿罗衣。婵娟似恨襄王梦，猿叫断岩秋藓稀。（《题巫山庙》）

白浪连空极渺漫，孤舟此夜泊中滩。岳阳秋霁寺钟远，渡口月明渔火残。绿绮（琴）韵高湘女怨，青葙色映水禽寒。乡遥楚国生归思，欲曙山光上木兰（舟）。（《江行夜泊》）

南浦蒹葭疏雨后，寂寥横笛怨江楼。思飘明月浪花白，声入碧云枫叶秋。河汉夜阑孤雁度，潇湘水阔二妃愁。发寒衣湿曲初罢，露色河光生钓舟。（《江楼月夜闻笛》）

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废兴。渭水故都秦二世，咸阳秋草汉谿陵。天空绝塞闻边雁，叶尽孤村见夜灯。风景苍苍多少恨，寒山半出白云层。（《咸阳怀古》）

李频，字德新，睦州寿昌（今浙江建德县西南）人。大中八年（公元八五四年），以进士擢第。累迁都官员外郎，终于建州（治建安，今福建建瓯县）刺史。李频的代表作，如：

归家来几夜，倏忽觉秋残。月满方塘白，风依老树寒。戏鱼重跃定，惊鸟却栖难。为有门前路，吾生不得安。（《山中夜坐》）

秦楼吟苦夜，南望只悲君。一宦终遐徼，千山隔旅坟。恨声流蜀魄，冤气入湘云。无限风骚句，时来日夜闻。（《哭贾岛》）

五陵佳气晚氛氲，霸业雄图势自分，秦地山河连楚塞，汉家宫殿入青云。未央树色春中见，长乐钟声月下闻。无那杨花起愁思，满天飘落雪纷纷。（《乐游原春望》）

李郢，字楚望，长安人。大中十年（公元八五六年），以进士擢第。官至侍御史。

李郢有《茶山贡焙歌》，这茶山，是指阳羨（今江苏宜兴县）的茶园。歌云：

使君爱客情无已，客在金台价无比。春风三月贡茶时，尽逐红旗到山里。焙中清晓朱门开，筐箱渐见新芽来。陵烟触露不停探，官家赤印连帖催，朝饥暮匍谁兴哀。喧阅竞纳不盈掬，一时一饷还成堆。蒸之馥之香胜梅，研膏架动轰如雷。茶成拜表贡天子，万人争啖春山摧。驿骑鞭声聒流电，半夜驱夫谁复见。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前。吾君可谓纳谏君，谏官不谏何由闻。九重城里虽玉食，天涯吏役长纷纷。使君忧民惨容色，就焙尝茶坐诸客。几回到口重咨嗟，嫩绿鲜芳出何力。山中有酒亦有歌，乐营房户皆仙家。仙家十队酒百斛，金丝宴饌随经过。使君是日忧思多，客亦无言徵绮罗。殷勤绕焙复长欢，官府例成期如何。吴民吴民莫憔悴，使君作相期苏尔。诗人通过贡茶这件事，反映了茶农沉重的封建负担，具有深厚的社会现实内容，在晚唐诗里是不可多得的一首好诗。

曹邺，字邺之，桂州（治始安，今广西桂林市）人。大中中，以进士擢第，官至洋州（治兴道，今陕西洋县）刺史。

曹邺的代表作较多，并富有社会内容。如：

江边野花不须采，梁头野燕不用亲。西施本是越溪女，承恩不荐越溪人。（《徒相逢》）

天子好征战，百姓不种桑。天子好年少，无人荐冯唐。天子好美女，夫妇不成双。（《捕渔谣》）

手推呕哑车，朝朝暮暮耕。未曾分得谷，空得老农名。（《四怨诗》之四）

东西是长江，南北是官道。牛羊不恋山，只恋山中草。（《五情诗》之一）

野雀空城饥，交交复飞飞。勿怪官仓粟，官仓无空时。（《五情诗》之五）

千金画阵图，自为弓箭苦。杀尽田野人，将军犹爱武。性命换他恩，功成谁作主。凤皇楼上人，夜夜长歌舞。（《战城南》）

官仓老鼠大如斗，见人开仓亦不走。健儿无粮百姓饥，谁遣朝朝入君口。

(《官仓粟》)

寒女不自知，嫁为公子妻。亲情未识面，明日便东西。但得上马了，一去头不回。双轮如鸟飞，影尽东南街。九重十二门，一门四扇开。君从此路去，妾向此路啼。但得见君面，不辞插荆钗。(《去不返》)

入门又到门，到门戟相对。玉箫声尚远，疑似人不在。公子厌花繁，买药栽庭内。望远不上楼，窗中见天外。此地日烹羊，无异我食菜。自是愁人眼，见之若奢泰。(《贵宅》)

心如山上虎，身若仓中鼠。惆怅倚市门，无人与之语。夜宴李将军，欲望心相许。何曾听我言，贪谗邯郸女。独上黄金台，凄凉泪如雨。(《东武吟》)

一车至三毂，本图行地速。不知驾驭难，举足成颠覆。欺暗尚不然，欺明当自戮。难将一人手，掩得天下目。不见三尺坟，云阳草空绿。(《读李斯传》)曹邺的诗歌特色，不是讽刺统治阶级好像太仓的老鼠，偷食太仓之粟；便是替被遗弃的妇女唱出呐喊的呼声。文体朴素，形象鲜明，具有独特风格。

司马扎，大中时诗人。他的代表作，也具有深厚社会内容。如：

有田不得种，身卧辽阳城。梦中稻花香，觉后战血腥。汉武在深殿，唯思廓寰瀛。中原半烽火，比屋皆点行。边土无膏腴，闲地何必争。徒令执耒者，刀下死纵横。(《古边卒思归》)

养蚕先养桑，蚕老人亦衰。苟无园中叶，安得机上丝。妾家非豪门，官赋日相追。鸣梭夜达晓，犹恐不及时。但爱蚕与桑，敢问结发期。东邻女新嫁，照镜弄蛾眉。(《蚕女》)

种田望雨多，雨多长蓬蒿。亦念官赋急，宁知荷锄劳。亭午霁日明，邻翁醉陶陶。乡吏不到门，禾黍苗自高。独有辛苦者，屡为州县徭。罢锄田又废，恋乡不忍逃。出门吏相促，邻家满仓谷。邻翁不可告，尽日向田哭。(《锄草怨》)或代戍卒咒诅战争，或替蚕女控诉婚姻失期，或为农民怨诉锄田之勤苦和官赋之沉重，皆具有社会内容。

于濆，字子漪。咸通中，以进士擢第，终于泗州(治临淮，今江苏泗洪县东南)判官。

于濆的代表作，如：

手植千树桑，文杏作中梁。频年徭役重，尽属富家郎。富家田业广，用此买金章。昨日门前过，轩车满垂杨。归来说向家，儿孙竞咨嗟。不见千树桑，一浦芙蓉花。(《田翁欢》)

古凿岩居人，一称有产。虽沾中覆形，不及贵门犬。驱牛耕白石，课女经黄茧。岁暮霜霰浓，画楼人饱暖。(《山村叟》)

贫女苦筋力，缲丝夜夜织。万梭为一素，世重韩娥色。五侯初买笑，建章方落籍。一曲古凉州，六亲长血食。欢尔画长眉，学歌饱亲戚。(《织素谣》)

二十属卢龙，三十防沙漠。平生爱功业，不灑从军恶。今来客鬓改，知学弯弓错。赤肉痛金疮，他人成卫霍。目断望君门，君门苦寥廓。(《边游录戍卒言》)于濆在以上诗篇创作中，同情田翁山叟、织女戍卒，都具有深厚社会内容。

邵谒，韶州翁源县(今广东翁源县东北)人。咸通中诗人。

邵谒的代表作，如：

皇天降丰年，本忧贫士食。贫士无良畴，安能得稼穡。工佣输富家，日落长叹息。为供豪者粮，役尽匹夫力。天地莫施恩，施恩强者得。（《岁丰》）

寒女命自薄，生来多贱微。家贫人不聘，一身无所归。养蚕多苦心，茧熟他人丝。织素徒苦力，素成他人衣。青楼富家女，才生便有主。终日著罗绮，何曾识机杼。清夜闻歌声，听之泪如雨。他人如何欢，我意又何苦。

所以问皇天，皇天竟何语！（《贫女行》）

聂夷中，字坦之，河东人。咸通十三年（公元八七一年），以进士擢第。官华阴尉。

聂夷中的代表作，如：

种花满西园，花发青楼道。花下一禾生，去之为恶草。（《公子行》）

二月卖新丝，五月糞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咏田家》）

父耕原上田，子劬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仓。（《田家二首》之一）这些诗传诵人口，反映农民艰苦生活，语重心长。

杜牧 杜牧、字牧之，京兆万年人，元和中宰相杜佑的孙子。太和二年（公元八二八年），以进士擢第。沈传师表为江西团练使巡官，又为牛僧孺淮南节度使掌书记。擢监察御史，移疾分司东都。以弟 病弃官，复为宣州团练使判官，拜殿中侍御史内供奉。累迁左补阙、史馆修撰，改膳部员外郎，历黄（治南安，今湖北黄冈县）、池（治秋浦，今安徽贵池县）、睦（治建德，今浙江建德县）三州刺史，入为司动员外郎，改吏部，复出为湖州刺史。逾年，拜考功郎中、知制诰，迁中书舍人，病卒。

杜牧著《罪言》，主张对藩镇用兵。他的诗歌，情致豪迈，时称小杜，以别于杜甫，著有《樊川集》。

杜牧的代表作，如：

元载相公曾借箸，宪宗皇帝亦留神。旋见衣冠就东市，忽遗弓剑不西巡。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河湟》）他念念不忘河湟的不守，到了宣宗大中初年，河湟收复，他也有诗：

捷书皆应睿谋期，十万曾无一镞遗。汉武惭夸朔方地，周宣休道太原师。威加塞外寒来早，恩入河源冻合迟。

听取满城歌舞曲，凉州声韵远参差（《今皇帝陛下一诏徵兵不日功集河湟诸郡次第归降臣获睹圣功辄献歌咏》）

句吴亭东千里秋，放歌曾作昔年游。青苔寺里无马迹，绿水桥边多酒楼。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月明更想桓伊在，一笛闻吹出塞愁。（《润州二首》之一）

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澹云间今古同。鸟来鸟去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惆怅无因见范蠡，参差烟树五陵东。（《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阁下宛溪夹溪居人》）

百感中来不自自由，角声孤起夕阳楼，碧山终日思无尽，芳草何年恨始休。睫在眼前长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祜》）

七子论诗谁似公，曹刘须在指挥中。荐衡昔日知文举（令狐相公曾表荐处士），乞火何人作蒯通。北极楼台长挂梦，西江波浪远吞空。可怜故国三千里，虚唱歌词满六宫。（《酬张祜处士见寄长句四韵》）

日落水流西复东，春光不尽柳何穷。巫娥庙里低含雨，宋玉宅前斜带风。

不嫌榆荚共争翠，深与桃花相映红。灞上汉南千万树，几人游宦别离中。（《柳长句》）

炀帝雷塘上，迷藏有旧楼。谁家唱水调，明月下扬州。骏马宜闲出，千金好旧游。喧阗醉年少，半脱紫茸裘。（《扬州三首》之一）杜牧的绝句，也脍炙人口，如：

杜诗韩集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抓。天外凤皇谁得髓，无人解合续弦胶。（《读韩杜集》）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赤壁》）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过华清宫绝句三首》之一）

新丰绿树起黄埃，数骑渔阳探使回。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过华清宫绝句三首》之二）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山行》）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泊秦淮》）

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木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寄扬州韩绰判官》）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江南春绝句》）

十载飘然绳检外，樽前自献自为酬。秋山春雨间吟处，倚偏江南寺寺楼。（《念昔游三首》之一）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秋夕》）

有那麽多的绝句清新可诵，杜牧真不愧是晚唐的大诗人了。

**李商隐与温庭筠** 李商隐，字义山，自号玉溪生，怀州河内（河南沁阳县）人。李商隐大约生于唐宪宗元和八年（公元八一三年），卒于唐宣宗大中十二年（公元八五八年），活了四十六岁（据冯浩说）。

宰相令狐楚为河阳节度使，奇商隐之才，后徙天平（镇郓州，今山东东平县须城镇）、宣武（镇汴州，今河南开封市）节度使，皆表为巡官，亲自教李商隐怎样写骈体文。李商隐的古文，也写得很出色；李商隐的诗在晚唐诗人中具有独特风格；李商隐的骈体文，经令狐楚指点，也很有成就。他的诗集中有一首诗：

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携笔砚侍龙韬。自从半夜传衣钵，不羨王祥得宝刀。（《谢书》）就是感激令狐楚对他的精心指导而写的。令狐楚于开成元年（公元八三六年）在梁州山南西道节度使任上病卒，当其疾甚时，自为遗奏，未成，召商隐足成之。遗奏的主要内容，以甘露事变诛杀太多，株连太广，请朝廷对被害而无辜的人加以昭雪，不使有冤，辞致曲尽，是一篇震动当时的文章。李商隐挽令狐楚诗：

延陵留表墓，岷首送沉碑。敢伐不加点，犹当无愧辞。百身终莫报，九死谅难追。待得生金后，川原亦几移。（《撰彭阳公志文毕有感》）可见李商隐和令狐楚的关系，不仅仅是府主和幕僚的关系，而是亲密的师生关系。

开成二年（公元八三七年），李商隐以进士擢第。唐代的风俗，很看重

科第，武臣动贵尤其喜欢在新及第进士中选择女婿。泾源节度使（镇泾州，今甘肃泾川县）王茂元很看重李商隐的文才，把女儿嫁给李商隐。

开成四年（公元八三九年），李商隐以“试判”及格，授秘书省校书郎（正九品上）。不久，又外调为弘农（今河南灵宝县）尉（从九品上）。尉得管理犯人，李商隐对这个工作很泄气，陕虢观察使孙简对他也不够重视，他准备弃官返京，还愤愤地做了一首诗：

黄昏对印点刑徒，愧负荆山入座隅。却羨卞和双刖足，一生无复没阶趋。（《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刚好孙简调职，姚合继任，姚合也是一个著名诗人，他看重李商隐文才，使人示意，才把他挽留了下来。不久，李商隐还是内调了，重任秘书省校书郎。稍后，李商隐又因母丧守制，一度返居永乐（今山西永济县东南一百二十里永乐镇），但大部分时间居家在长安，过了“十年京师穷且饿”（《樊南甲集序》）的小京官生活。

这十年中，唐武宗的统治，从会昌元年到会昌六年（公元八四一至八四六年），一共占了六年，这是李德裕当国的时期，但是正九品小京官的李商隐和当朝一品的李德裕并无来往瓜葛。李德裕失败，再贬崖州司户参军，李商隐有《李卫公》诗：

绉纱弟子音尘绝，鸾镜佳人旧会稀。今日致身歌舞地，木棉花暖鹧鸪飞。从这首诗里，反映了李商隐对李德裕并不怎么样抱有同情态度。李商隐集子里收有一篇《太尉卫公会昌一品集序》，那是替给事中郑亚代笔的稿子，后来郑亚改写，也没有全用李商隐的稿子。而且《一品集序》由郑亚具名，牵累不到李商隐的头上来。

唐武宗会昌三年（公元八四三年），李商隐的妻父河阳节度使王茂元卒于镇，不久，大概在宣宗大中初年吧，李商隐的妻子也在京病故，这使李商隐的生活大大紧缩起来，不得不想出路，谋做外官了。

宣宗大中元年（公元八四七年），李商隐去桂林任桂管观察使郑亚的从事——掌书记。带的京衔是检校水部员外郎（从六品上）。郑亚以李德裕党贬官，李商隐还长安。大中三年（公元八四九年），吏部选李商隐为盩厔（今陕西周至县）尉（正九品下），迁京兆府法曹参军（正七品下）。卢弘止出为徐州武宁军节度使，奏署李商隐为判官，掌典章奏，带的京衔是侍御史（从六品下）。大中六年（公元八五二年），卢弘止病死，李商隐返回长安，以选为太学博士（正六品上）。太学博士是冷官，太穷了。“归来寂寞灵台下，著破蓝衫出无马。天官补吏府中趋，玉骨瘦来无一把”（《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不久他又弃官去梓州（治郪，今四川三台县）任东川节度使柳仲郢的掌书记，带的京衔是检校工部郎中（从五品上）。一直到大中十一年（公元八五七年）柳仲郢内调，李商隐也返回长安。从公元八四七至八五七年这十年（除了任太学博士外），李商隐大致过的是“客涂飘瞥，使府沉沦”（冯浩《玉溪生年谱》）寄人篱下的幕僚生活。

柳仲郢内调为兵部侍郎，充盐铁转运使，李商隐也受委充任盐铁推官。不久，李商隐去荥阳，在荥阳病死。陆龟蒙说：“玉溪官不挂朝籍而死。”当时的制度，五品以上的官吏，都由朝廷制授，皆有籍，称为“具员”，这就是朝籍。[二]“官不挂朝籍而死”，就是说李商隐没有做到五品以上官便死去，意味着诗人的一生，位卑年促。

李商隐的代表作很多，我们先介绍他有关政治方面的诗篇。如：

玉帐牙旗得上游，安危须共主君忧。窦融表已来关右，陶侃军宜次石头。

岂有蛟龙愁失水，更无鹰隼与高秋。昼号夜哭兼幽显，早晚星关雪涕收。（《重有感》）这是李商隐在“甘露事变”后，看到文宗形同幽囚，不能接对朝士，宰相阖家受屠戮，李商隐的诗意，希望藩镇能从外面给宦官集团施加压力，改变中央这种不正常的局面。

文宗开成元年，李商隐从汉中回到长安，在路上写了《行次西郊作一百韵》的五言长诗，中有云：“蛇年建丑月，我自梁还秦。南下大散岭，北济渭之滨。草木半舒坼，不类冰雪晨。又若夏苦热，焦卷无芳津。高田长檟枿，下田长荆榛。农具弃道傍，饥牛死空墩。依依过村落，十室无一存。……右辅田畴薄，斯民常苦贫。……国蹙赋更重，人稀役弥繁。……尔来又三岁，甘泽不及春。盗贼亭午起，问谁多穷民。”诗中反映了当时长安以西由于连年乾旱，村落荒芜，白日发生劫掠，黄昏之后，更是寸步难行。李商隐认为应该责任宰相，进行政治改革，把动摇的局面稳定下来。

刘蕡是攻击宦官擅权非常激烈的一个进士，结果反被宦官贬斥，黜为柳州司户参军，李商隐赠刘蕡诗云：

江风扬浪动云根，重碇危樯白日昏。已断燕鸿初起势，更惊骚客后归魂。汉廷急诏谁先入，楚路高歌自欲翻。万里相逢欢复泣，凤巢西隔九重门。（《赠刘司户蕡》）后来刘蕡病死，李商隐挽他作诗：

上帝深宫闭九阍，巫咸不下问衔冤。黄陵（庙）别后春涛隔，湓浦（九江）书来秋雨翻。只有安仁能作诔，何曾宋玉解招魂。平生风义兼师友，不敢同君哭寝门。（《哭刘蕡》）

离居星岁易，失望死生分。酒瓮凝馀桂，书签凝旧芸。江风吹雁急，山木带蝉曛。一叫千回首，天高不为闻。

有美扶皇运，无谁荐直言。已为秦逐客，复作楚冤魂。湓浦应分派，荆江有会源。并将添恨泪，一洒问乾坤。（《哭刘司户二首》）

路有论冤谪，言皆在中兴。空闻迁贾谊，不待相孙宏。江阔唯回首，天高但抚膺。去年相送地，春雪满黄陵。（《哭刘司户蕡》）把刘蕡的形象写得很大，对刘蕡的死在感情上也表现出非常真挚和悲切。

李商隐的咏史诗，也往往出人意表，清新可诵，如：

咸阳宫阙郁嵯峨，六国楼台艳绮罗。自是当时天帝醉，不关秦地有山河。（《咸阳》）以言六国为秦所灭，不关秦得河山百二，自是天帝偶醉，不省之耳。对暴秦可说攻击得很厉害了。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贾生》）此言汉文访贾生于宣室，虽夜半前席，而道及鬼神，不问如何存安苍生，此可憾耳。

汉家天马出蒲梢，苜蓿榴花遍近郊。内苑只知含凤觜，属车无复插鸡翘。玉桃偷得怜方朔，金屋修成贮阿娇。谁料汉卿老归国，茂陵松柏雨萧萧。（《茂陵》）茂陵，汉武帝陵名。此言汉武雄武，然而方朔终去，阿娇憔悴，及乎苏武杖汉节归来，而茂陵松柏萧萧，虚有求仙之说矣。

世上苍龙种，人间武帝孙。小来唯射猎，兴罢得乾坤。渭水天开苑，咸阳地献原。英灵殊未已，丁傅渐华轩。（《鄂杜马上念汉书》）歌咏的汉宣帝，实际是指唐宣宗而言的。“兴罢得乾坤”，极言得政权之不易。“丁傅渐华轩”，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新势力已接头。

猿鸟犹疑畏简书（公文），风云常为护储胥（篱墙）。徒令上将挥神笔，终见降王（指蜀后主）走传车。管（仲）乐（毅）真不忝，关张无命欲

何如。他年锦里经祠庙，梁父吟成恨有余。（《筹笔驿》）此借筹笔驿嗟叹诸葛亮之忠荃，而亮死之后，蜀终以亡，所以说“梁父吟成恨有余”。

永寿兵来夜不扃，金莲无复印中庭。梁台歌管三更罢，犹自风摇九子铃。（《齐宫词》）此言齐梁更替事。

任昉当年有美名，可怜才调最纵横。梁台初建应惆怅，不得萧公作骑兵。（《读任彦升碑》）此亦言齐梁时事，言萧衍称帝，任昉不得使萧衍作骑兵参军，昔日喜言，竟成虚说。

玄武湖中玉漏催，鸡鸣埭口绣纛回。谁言琼树朝朝见，不及金莲步步来。敌国军营漂木柁，前朝神庙锁烟煤。满宫学士皆颜色，江令当年只费才。（《南朝》）此指陈后主亡国事。

一笑相倾国便亡，何劳荆棘始堪伤。小怜（冯淑妃）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

巧笑知堪敌万机，倾城最在著戎衣。晋阳已陷休回顾，更请君王猎一围。（《北齐二首》）此言北齐后主猎天池失晋阳事。

紫泉宫殿锁烟霞，欲取芜城（广陵城）作帝家。玉玺不缘归日角（唐太宗龙颜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隋宫》）

乘兴南游不戒严，九重谁省谏书函。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隋宫》）此皆言隋炀帝游广陵事。

唐人喜欢言唐玄宗事，李商隐也一样。有关唐玄宗的诗：

骊岫飞泉泛暖香，九龙呵护玉莲房。平明每幸长生殿，不从金舆惟寿王。（《骊山有感》）

龙池赐酒敞云屏，羯鼓声高众乐停。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龙池》）都是通过杨太真本来是寿王李瑁妃这一事实，来对唐玄宗进行讽刺的。

冀马燕犀动地来，自埋红粉自成灰。君王若道能倾国，玉辇何由过马嵬。

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闻虎旅传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如何四纪为天子（十二年为一纪），不及卢家有莫愁。（《马嵬二首》）对唐玄宗的安史之乱，也是假诗意以讽谕其事的。

李商隐有大量无题诗（包括以诗开头二个字为题），辞意婉约，题旨隐晦，猜测的人又莫衷一是。由于篇幅限制，我们在这里只能举数首为例：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锦瑟》）《史记·封禅书》有这样一段话：“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因此瑟实际是二十五弦而不是五十弦，锦瑟年华也是指二十五岁左右的人，而不是指五十岁的人。在李商隐《樊南集》里，《锦瑟》诗置在第一篇，这是由于李商隐在其送人的行卷里，《锦瑟》篇本来是行卷的首篇，后来编集的人仍其旧贯，仍以此篇置首。行卷是在进士擢第前投赠而用的，擢第以后就不必用行卷了。因此这首《锦瑟》诗肯定是李商隐二十六岁及第前的作品。锦瑟年华当然是指二十五岁而言的。

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蜡照半笼金翡翠，麝熏微度绣芙蓉。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无题四首》之一）这首诗是远别梦家，醒来作书之作。

帐卧新春白袷衣，白门寥落意多违。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远路应悲春晼晚，残宵犹得梦依稀。玉璫缄札何由达，万里云罗一雁飞。（《春雨》）这首诗也是春雨思家之作。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无题》）这也是别后怀人之作。无题诗就只介绍这几首了。

李商隐的代表作还有如：

八岁偷照镜，长眉已能画。十岁去踏青，芙蓉作裙钗。十二学弹筝，银甲不曾卸。十四藏六亲，悬知犹未嫁。十五泣春风，背面秋千下。（《无题二首》之一）

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常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常娥》）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夜雨寄北》）

想像咸池日欲光，五更钟后更回肠。三年苦雾巴江水，不为离人照屋梁。（《初起》）

山上离宫宫上楼，楼前宫畔暮江流。楚天长短黄昏雨，宋玉无愁亦有愁。（《楚吟》）

竹坞无尘水槛清，相思迢递隔重城。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

沟水分流西复东，九秋霜月五更风。离鸾别凤今何在，十二玉楼空更空。（《代应二首》之一）

洞庭波冷晓侵云，日日微帆送远人。几度木兰舟上望，不知元是此花身。（《木兰花》[三]）

昔岁陪游旧迹多，风光今日雨蹉跎。不因醉本兰亭在，兼忘当年旧永和。（《寄在朝郑曹独孤李四同年》）

非关宋玉有微辞，却是襄王梦觉迟。一自高唐赋成后，楚天云雨尽堪疑。（《有感》）

本是丁香树，春条结始生。玉作弹棋局，中心亦不平。（《柳枝五首》之二）

向晚意不适，驱车上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乐游原》）  
这些作品，在《樊南集》里，都是杰出的诗篇。

李商隐在文体方面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不仅善写骈体文，同时也能写出精湛的散文；他不仅善于写五言诗和五律、七律、五绝、七绝，同时也能模仿韩愈，用古文笔法来写七言古诗，《韩碑》就是最好的见证。最后，我们谈谈他和令狐綯的关系。令狐綯要比李商隐大十多岁，由于令狐綯是李商隐的知赏者令狐楚的儿子，所以李商隐也很尊敬他。在文宗开成五年（公元八四四年），令狐綯守制服满，复官左补阙，李商隐赠他诗时说：

惜别夏仍半，回途秋已期。那修直谏草，更赋赠行诗。锦段知无报，青萍更见疑。人生有通塞，公等系安危。警露鹤辞侣，吸风蝉抱枝。弹冠如不闻，又到扫门时。（《酬别令狐补阙》）到了会昌四年（公元八四四年），令狐綯为右司郎中，李商隐赠诗：

嵩秦树久离居，双鲤迢迢一纸书。休问梁园旧宾客，茂陵秋雨病相如。（《寄令狐郎中》）感情是融洽的。到了会昌五年（公元八四五年）至大中

元年（公元八四七年），令狐綯出为湖州刺史，令狐綯还有诗赠李商隐，李商隐也有和他的诗，诗中告诉他“补羸贪紫桂，负气托青萍”，负气是感于意气的意思，并告诉他因生活上有困难，想前往桂府，充任幕职。大中二年（公元八四八年），令狐綯由湖州召回，为考功郎中，知制诰，累迁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承旨，到了大中四年（公元八五一年），正式任为宰相，一直到大中十三年（公元八五九年），他才罢相，充任宰相前后达十年之久。

李商隐在令狐綯从湖州调回中央以后，赠诗如：

昨夜玉轮明，传闻近太清。凉波冲碧瓦，晓晕落金茎。露索秦宫井，风弦汉殿筝。几时《绵竹颂》，拟荐《子虚》名。（《令狐舍人说昨夜西掖玩月因戏赠》）扬雄作《绵竹颂》，司马相如作《子虚赋》，李商隐这首诗里，确实有请令狐綯推荐给唐宣宗的意思。另外还有一首《寄令狐学士》诗，末两句云：“钧天虽许人间听，阊阖门多梦自迷。”表示愿意一窥阊阖，这和他的《钧天》诗的内容基本是一致的。《钧天》诗云：

上帝钧天会众灵，昔人因梦到青冥。伶伦吹裂孤生竹，却为知音不得听。意思是上帝在会集众灵，奏钧天广乐，已经有人在梦中参加而听到了，伶伦是著名的乐师，却被排摈在外，而不能听到。

李商隐的文采，尤其在骈体文方面的成就，如果推荐他担任知制诰、中书舍人、翰林学士这类官职，是能够胜任的，但令狐綯始终没有加以推荐，毋怪李商隐在《九日》诗里要说：“郎君官贵施行马，东阁无因得再窥”了。但这首《九日》诗疑点也很多，全诗云：

曾共山翁（山简）把酒时，霜天白菊绕阶墀。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不学汉臣栽苜蓿，空教楚客咏江蓠。郎君官贵施行马，东阁无因再得窥。令狐楚卒于唐文宗开成元年（公元八三六年），令狐綯的拜相在大中四年（公元八五一年），前后距离十四年，“十年泉下无消息”这句诗，就对不起来。另外，令狐楚是令狐綯的父亲，唐人避家讳是很严格的，而李商隐诗却说“空教楚客咏江蓠”，这是习俗所不能允许的。因此这首诗的疑点是很多的。但是这首诗尽管存在着不少疑点，而令狐綯的不肯援引李商隐却是事实。

那末李商隐是否是牛李党争中李党的一方呢？答：不是的。李商隐和李德裕并无来往，上面已经谈到过了。是不是李商隐的岳父王茂元是李德裕之党而李商隐受牵连被指为李党呢？也不是的。李商隐和王茂元女儿结婚，是在开成二年，此后李商隐还经常和令狐綯赠诗往返，并没有和令狐綯疏远的痕迹；况且王茂元也算不上是李党。那末是不是李商隐在大中初年仕李党骨干郑亚桂管观察使从事而为令狐綯所恶呢？也不像。因为此时李德裕已贬崖州司户，郑亚也将随着贬为循州刺史，李商隐只是烧冷灶，并不是在李党得势的时候做郑亚的幕僚，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我认为令狐綯是牛党中的大派阀，他那时要把牛党中的骨干推荐到政府要害部门，如知制诰、中书舍人、翰林学士这类位置上去。李商隐固然不是李党，但也不是牛党，就只好靠边站，无法去占据要路津了。从大派阀令狐綯的角度来看，把李商隐安插在政府要害部分，对牛党决不会有好处的。所以李商隐只好名不挂朝籍而死了。

温庭筠，本名岐，字飞卿，原籍太原，寓居江东。屡举进士，不及第，后官随县（今湖北随县）尉，卒。庭筠才思艳丽，韵格清拔，工为词章小赋，与李商隐齐名，时称温李。温庭筠的代表作，如：

南朝天子射雉时，银河耿耿星参差。铜壶漏断梦初觉，宝马尘高人未知。

鱼跃莲东荡宫沼，蒙蒙御柳悬栖鸟。红妆万户镜中春，碧树一声天下晓。盘踞势穷三百年，朱方杀气成愁烟。彗星拂地浪连海，战鼓渡江尘涨天。绣龙画雉填宫井，野火风驱烧九鼎。殿巢江燕砌生蒿，十二金人霜炯炯。芊绵平绿台城基，暖色春容荒古陂。宁知玉树后庭曲，留待野棠如雪枝。（《鸡鸣埭曲》）

丁东细漏侵琼瑟，影转高梧月初出。簇簌金梭万缕红，鸳鸯艳锦初成疋。锦中百结皆同心，蕊乱云盘相间深。此意欲传传不得，玫瑰作柱朱弦琴。为君裁破合欢被，星斗迢迢共千里。象齿熏炉未觉秋，碧池中有新莲子。（《织锦词》）

天兵九月渡遐水，马踏沙鸣惊雁起。杀气空高万里情，塞寒如箭伤眸子。狼烟堡上霜漫漫，枯叶号风天地干。犀带鼠裘无暖色，清光炯冷黄金鞍。虏尘如雾昏亭障，陇首年年汉飞将。麟阁无名期未归，楼中思妇徒相望。（《遐水谣》）

捣麝成尘香不灭，拗莲作寸丝难绝。红泪文姬洛水春，白头苏武天山雪。君不见无愁高纬花漫漫，漳浦宴余清露寒。一旦臣僚共囚虏，欲吹羌管先决澜。旧臣头鬓霜华早，可惜雄心醉中老。万古春归梦不归，邺城风雨连天草。（《达摩支曲》）

朔管迎秋动，雕阴雁来早。上郡隐黄云，天山吹白草。嘶马悲寒磧，朝阳照霜堡。江南戍客心，门外芙蓉老。（《边笳曲》）

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槲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因思杜陵梦，凫雁满回塘。（《商山早行》）

澹然空水对斜晖，曲岛苍茫接翠微。波上马嘶看棹去，柳边人歇待船归。数丛沙草群鸥散，万顷江田一鹭飞。谁解乘舟寻范蠡，五湖烟水独忘机。（《利州南渡》）

湖上微风入槛凉，翻翻菱荇满回塘。野船著岸偎春草，水鸟带波飞夕阳。芦叶有声疑雾雨，浪花无际似潇湘。飘然篷艇东归客，尽日相看忆楚乡。（《南湖》）

曾于青史见遗文，今日飘蓬过古坟。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始怜君。石麟埋没藏春草，铜雀荒凉对暮云。莫怪临风倍惆怅，欲将书剑学从军。（《过陈琳墓》）

铁马云骝久绝尘，柳阴高压汉营春。天清杀气屯关右，夜半妖星照渭滨。下国卧龙空误主，中原逐鹿不由人。象床锦帐无言语，从此谯周是老臣。（《过五丈原》）

苏武魂销汉使前，古祠高树两茫然。云边雁断胡天月，陇上羊归塞草烟。回目楼台非甲帐，去时冠剑是丁年。茂陵不见封侯印，空向秋波哭逝川。（《苏武庙》）

江海相逢客恨多，秋风叶下洞庭波。酒酣夜别淮阴市，月照高楼一曲歌。（《赠少年》）

古坟零落野花春，闻说中郎有后身。今日爱才非昔日，莫抛心力作词人。（《蔡中郎坟》）

咸阳桥上雨如悬，万点空濛隔钓船。还似洞庭春水色，晚云将入岳阳天。（《咸阳值雨》）

冰簟银床梦不成，碧天如水夜云轻。雁声远过潇湘去，十二楼中月自明。（《瑶瑟怨》）温庭筠“才思艳丽，工于小赋，每入试，押官韵作赋，凡八

义乎而八韵成，多为邻铺（试场内邻室）假手，号曰救数人也。”“沈询侍郎知举，别施铺席授庭筠，不与诸公邻比。翌日，帘前谓庭筠曰：‘向来策名者，皆是文赋托于学士，某今岁场中并无假托，学士勉。’因遣之。”“宣宗爱唱《菩萨蛮》词，令狐相国（綯）假其新撰密进之，戒令勿泄，而遽言于人，由是疏之。”又令狐綯“曾以故事访于温岐（庭筠），对以其事出《南华》（《庄子》），且曰：‘非僻书也。或冀相公燮理之暇，时宜览古。’綯益怒之，乃奏岐有才无行，不宜与第。”“乃授（随州）方城县尉，所以岐诗云：“因知此恨人多积，悔读《南华》第二篇。””（《北梦琐言》）庭筠之出为随州随县尉，时中书舍人裴坦当制，敕文云：“敕：乡贡进士温庭筠，早随计吏，夙著雄名，徒负不羁之才，罕有适时之用。放骚人于湘浦，移贾谊于长沙，尚有前席之期，未爽抽毫之思。可随州随县尉。”庭筠“词赋诗篇，冠绝一时”。而“连举进士，竟不中第，至是谪为九品吏”（《东观奏记》）。庭筠将之任，文士争作诗送之，唯纪唐夫得其尤。诗云：“何事明时泣玉频，长安不见杏园春。凤凰诏下虽沾命，《鹦鹉》才高却累身。且饮醪 消积恨，莫辞黄绶拂行尘。方城若比长沙远，游隔千山与万津”（《摭言》），人多讽诵，表示对诗人的同情。

**皮日休、陆龟蒙与杜荀鹤** 皮日休，字袭美，襄阳人。咸通八年（公元八六七年），以进士擢第。累官太常博士。黄巢攻下长安，署为翰林学士，后又为巢所杀。皮日休的代表作，如：

秋深橡子熟，散落榛芜岗。伛偻黄发媪，拾之践晨霜。移时始盈掬，尽日方满筐。几曝复几蒸，用作三冬粮。山前有熟稻，紫穗袭人香。细获又精舂，粒粒如玉璫。持之纳于官，私室无仓箱。如何一石余，只作五斗量。狡吏不畏刑，贪官不避脏。农时作私债，农毕归官仓。自冬及于春，橡实诳饥肠。吾闻田成子，诈仁犹自王。吁嗟逢橡媪，不觉泪沾裳。（《橡媪叹》）

陇山千万仞，鹦鹉巢其巅。穷危又极险，其山犹不全。蚩蚩陇之民，悬度如登天。空中觇其巢，堕者争纷然。百禽不得一，十人九死焉。陇川有戍卒，戍卒亦不闲。将命提雕笼，直到金台前。彼毛不自珍，彼舌不自言。胡为轻人命，奉此玩好端。吾闻古圣王，珍禽皆舍。今此陇民属，每岁啼涟涟。（《哀陇民》）

隐隐聚若雷，絪肤不知足。皇天苦不平，微物教食肉。贫士无絳纱，忍苦卧茅屋。何事觅膏腴，腹无太仓粟。（《蚊子》）

女媧掉绳索，絪泥成下人。至今顽愚者，生如土偶身。云物养吾道，天爵高我贫。大笑猗氏辈，为富皆不仁。（《偶书》）

亭午头未冠，端坐独愁予。贫家烟爨稀，灶底阴虫语。门小愧车马，廩空惭雀鼠。尽室未寒衣，机声羨邻女。（《贫居秋日》）陆龟蒙，字鲁望，苏州人。举进士不第，辟苏州湖州二州从事，退隐松江甫里。唐昭宗光化（公元八九八至九一年）中，赠右补阙。陆龟蒙的代表作，如：

将军被蛟函，只畏金石镞。岂知谗箭利，一中成赤旆。古来信簧舌，巧韵凄锵曲。君闻悦耳音，终日听不足。初因起毫发，渐可离骨肉。所以贤达心，求人须任目。（《感事》）

芙蓉匣中镜，欲照心还懒。本是细腰人，别来罗带缓。从君出门后，不奏云和管。妾思冷如簧，时时望君暖。心期梦中见，路永魂梦断。怨坐泣西风，秋窗月华满。（《赠远》）

屋小茅干雨声大，自疑身著蓑衣卧。兼似孤舟小泊时，风吹折苇来相佐。

我有愁襟无可那，才成好梦刚惊破。背壁残灯不及萤，重挑却向灯前坐。（《雨夜》）

捣成霜粒细鳞鳞，知作愁吟喜见分。向日乍惊新茧色，临风时辨白萍文。好将花下承金粉，堪送天边咏碧云。见倚小窗亲鬓染，尽图春色寄夫君。（《裘美以鱼笺见寄因谢成篇》）

城上一培土，手中千万杵。筑城畏不坚，坚城在何处。（《筑城词二首》之一）

莫叹筑城劳，将军要却敌。城高功亦高，尔命何劳惜。（《筑城词二首》之二）

南北路何长，中间万弋张。不知烟雾里，几只到衡阳。（《雁》）

《天问》复《招魂》，无因彻帝阍。岂知千丽句，不敌一谗言。（《离骚》）杜荀鹤，字彦之，池州（治秋浦，今安徽贵池县）人。大顺二年（公元八九一年），以进士擢第。官至主客员外郎、知制诰、翰林学士。天祐（公元九四四至九四七年）初卒。杜荀鹤的代表作，如：

早被婵娟误，欲妆临镜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为容。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年年越溪女，相忆采芙蓉。（《春宫怨》）

去越从吴过，吴疆与越连。有园多种橘，无水不生莲。夜市桥边火，春风寺外船。此中偏重客，君去必经年。（《送友游吴越》）

握手相看谁敢言，军家刀剑在腰边。遍搜宝货无藏处，乱杀平人不怕天。古寺拆为修寨木，荒坟开作甃城砖。郡侯逐出浑闲事，正是銮舆幸蜀年。（《旅泊遇郡中叛乱示同志》）

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苧衣衫鬢发焦。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后尚徵苗。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山中寡妇》）

经乱衰翁居破村，村中何事不伤魂。因供寨木无桑柘，为点乡兵绝子孙。还似平宁徵赋税，未尝州县略安存。至今鸡犬皆星散，日落前山独倚门。（《乱后逢村叟》）

家随兵尽屋空存，税额宁容减一分。衣食旋营犹可过，赋输长急不堪闻。蚕无夏织桑充寨，田废春耕犊劳军。如此数州谁会得，杀民将尽更邀动。（《题所居村舍》）

去岁曾经此县城，县民无口不冤声。今来县宰加朱绂，便是生灵血染成。（《再经胡城县》）

粉色全无饥色加，岂知人世有荣华。年年道我蚕辛苦，底事浑身著苧麻。（《蚕妇》）

无子无孙一病翁，将何筋力事耕农。官家不管蓬蒿地，须索王租出此中。（《伤硤西县病叟》）

白发星星筋力衰，种田犹自伴孙儿。官苗若不平平纳，任是丰年也受饥。（《田翁》）

楚天空阔月沉轮，蜀魄声声似告人。啼得血流无用处，不如缄口过残春。（《闻子规》）

雨匀紫菊丛丛色，风弄红蕉叶叶声。北畔是山南是海，只堪图画不堪行。（《闽中》）杜荀鹤有些诗篇，虽基调略嫌低沉，但不少作品还是富有社会内容，反映了唐末离乱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

唐末还有不少诗人，写出了不少动人的诗篇。

高骈，历官安南都护，唐僖宗时，迁剑南西川节度使，封燕国公。又徙荆南节度使，加诸道行营都统，又徙为淮南节度，进检校太尉，封渤海郡王。骈早年英俊有为，折节为文学。晚节意志衰落，好神仙，刑政不修，信任金人吕用之，接受襄王李煜伪署，及煜为帝不成失败，骈在广陵亦为其部将毕师铎所杀。高骈的代表作，如：

帝舜南巡去不还，二妃幽怨水云间。当时珠泪垂多少，直到如今竹尚斑。  
(《湘妃庙》)

六出花飘入户时，坐看修竹变琼枝。逡巡好上高楼望，盖尽人间恶路歧。  
(《对雪》)

曾驱万马上天山，风去云回顷刻间。今日海门南面事，莫教还似凤林关。  
(《赴安南却寄台司》)

关山万里恨难销，铁马金鞭出塞遥。为问昔时青海畔，几人归到凤林桥。  
(《寓怀》)

公子邀欢月满楼，双成揭调唱伊州。便从席上风沙起，直到阳关水尽头。  
(《赠歌者二首》之二)

二年边戍绝烟尘，一曲河湾万恨新。从此凤林关外事，不知谁是苦心人。  
(《塞上曲二首》之一)

陇上征夫陇下魂，死生同恨汉将军。不知万里沙场苦，空举平安火入云。  
(《塞上曲二首》之二)

蜀江波影碧悠悠，四望烟花匝郡楼。不会人家多少锦，春来尽挂树梢头。  
(《锦城写望》)

花满西园月满池，笙歌摇曳画船移。如今暗与心相约，不动征旗动酒旗。  
(《写怀二首》之二)高骈在西川节度使任上，筑成都城，备御吐蕃和南诏，朝廷却怀疑他要割据一方，徙镇荆南(镇江陵)，他作了《风筝》一诗以见意(见《容斋随笔》)。诗云：

夜静弦声响碧空，宫商信任往来风。依稀似曲才堪听，又被移将别调中。  
(《风筝》)后来王铎作了诸道都统，他又作诗见意：

炼汞烧铅四十年，至今犹在药炉前。不知子晋缘何事，只学吹箫便得仙。  
(《闻河中王铎加都统》)以为自己百战之功，不见重用，四十年老将，反受王铎节制，故作此诗，表示他的牢骚。张乔，池州(治秋浦，今安徽贵池县)人。咸通中，以进士擢第。张乔的代表作，如：

贫游无定踪，乡信转难逢。寒渚暮烟阔，去帆归思重。潮平低戍火，木落远山钟。况是渔家宿，疏篱响夜舂。(《江村》)

少年随将讨河湟，头白时清返故乡。十万汉军零落尽，独吹边曲向残阳。  
(《河湟旧卒》)

离别河边绾柳条，千山万水玉人遥。月明记得相寻处。城锁东风十五桥。  
(《寄维扬故人》)曹唐，字尧宾，桂州人。初为道士，后返儒服，累为使府从事。曹唐的代表作，是《小游仙》诗九十八首。今录数首如下：

骑龙重过玉溪头，红叶还春碧水流。省得壶中见天地，壶中天地不曾秋。  
焚香独自上天坛，桂树风吹玉简寒。长怕嵇康乏仙骨，与将仙籍再寻看。  
天上邀来不肯来，人间双鹤又空回。秦皇汉武死何处，海畔红桑花自开。  
叔卿(《神仙传》有卫叔卿)遍觅九天春，不见人间故旧人。怪得蓬莱山下水，半成沙土半成尘。

海上桃花千树开，麻姑一去不知来。辽东老鹤应慵惰，教探桑田便不回。

方士飞轩驻碧霞，酒寒风冷月初斜。不知谁唱归春曲，落尽溪头白玉花。借神仙境界来叙述人间的离恨别怨和曲折感情，情致委婉动人。罗邺，余杭人，累举进士不第，光化（公元八九八至九一年）中，追赐进士及第，赠官补阙。罗邺的代表作，如：

自说归山人事賒，素琴丹灶是生涯。床头残药鼠偷尽，溪上破门风摆斜。石井晴无青葛叶，竹篱荒映白茅花。遥知此去应稀出，独卧晴窗梦晓霞。（《送张逸人》）

愁坐兰闺日过迟，卷帘巢燕羨双飞。管弦楼上春应在，杨柳桥边人未归。玉笛岂能留舞态，金河犹自浣戎衣。梨花满园东风急，惆怅无言倚锦机。（《春闺》）

暮天新雁起汀洲，红蓼花开水国愁。想得故园今夜月，几人相忆在江楼。（《雁二首》之一）

蜀魄千年尚怨谁，声声啼血向花枝。满山明月春风夜，正是愁人不寐时。（《闻子规》）

望断长川一叶舟，可堪归路更沿流。重来别处无人见，芳草斜阳满渡头。（《春江恨别》）高蟾，河朔人。干符三年（公元八七六年），以进士擢第，乾宁（公元八九四至八九八年）中，为御史中丞。高蟾的代表作，如：

明月断魂清霭霭，平芜归思绿迢迢。人生莫遣头如雪，纵得春风亦不消。（《春》）

曾伴浮云悲晚翠，犹陪落日泛秋声。世间无限丹青手，一片伤心画不成。（《金陵晚望》）

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东风怨未开。（《下第后上永崇高侍郎》）唐彦谦，字茂业，并州人。咸通（公元八六至八七四年）中，举进士十余年不第，后历官阆（州治阆中，今四川阆中县东二十里）、壁（州治诺水，今四川通江县）、绛（州治正平，今山西新绛县）三州刺史。唐彦谦的代表作，如：

落日下遥峰，荒村倦行旅。停车息茅店，安寝正鼾睡。忽闻扣门急，云是下乡隶。公文捧花柙，鹰隼驾声势。良民惧官府，听之肝胆碎。阿母出搪塞，老脚走颠蹶。小心事款延，余粮复匱。东邻借种鸡，西舍觅芳醕。再饭不厌饱，一饮直呼醉。明朝怯见官，苦苦灯前跪。使我不成眠，为渠滴清泪。民膏日已瘠，民力日愈弊。空怀伊尹心，何补尧舜治。（《宿田家》）

春风吹蚕细如蚁，桑芽才努青鸦嘴。侵晨探采谁家女，手挽长条泪如雨。去岁初眠当此时，今岁春寒叶放迟。愁听门外催里胥，官家二月收新丝。（《采桑女》）

天北天南绕路边，托根无处不延绵。萋萋总是无情物，吹绿东风又一年。（《春草》）

昭烈（刘备）遗黎死尚羞，挥刀砍石恨谯周。如何千戴留遗庙，血食巴山伴武侯。（《邓艾庙》）

纷纷从此见花残，转觉长绳系日难。楼上有愁春不浅，小桃风雪凭栏干。（《春早落英》）周朴，字太朴，吴兴人。避地福州，寄食乌石山僧寺。黄巢入闽，朴为巢所杀。周朴的代表作，如：

荒郊一望欲消魂，泾水萦纡旁远村。牛马放多春草尽，原田耕破古碑存。云和积雪苍山晚，烟伴残阳绿树昏。数里黄沙行客路，不堪回首思秦原。（《春日秦国怀古》）

一阵风来一阵砂，有人行处没人家。黄河九曲冰先合，紫塞三春不见花。  
(《塞上曲》)

石国胡儿向碛东，爱吹横笛引秋风。夜来云雨皆飞尽，月照平沙万里空。  
(《塞下曲》) 郑谷，字守愚，袁州(治宜春，今江西宜春县)人。光启三年(公元八八七年)，以进士擢第。历官右拾遗、都官郎中。郑谷的代表作，如：

乡人来话乱离情，泪滴残阳问楚荆。白社已应无故老，清江依旧绕空城。  
高歌军旅齐山树，昔日渔家尽野营。牢落故居灰烬后，黄花紫蔓上墙生。(《渚宫后乱作》)

暖戏烟芜锦翼齐，品流应得近山鸡。雨昏青草湖边过，花落黄陵庙里啼。  
游子乍闻征袖湿，佳人才唱翠眉低。相呼相唤湘江阔，苦竹丛深春日西。(《鹧鸪》)  
郑谷这首《鹧鸪》诗写成后，传诵一时，时称之为郑鹧鸪。崔涂，字礼山，江南人。光启四年(公元八八八年)，以进士擢第。崔涂的代表作，如：

年年南涧滨，力竭志犹存。雨雪朝耕苦，桑麻岁计贫。战添丁壮役，老忆太平春。  
见说经荒后，田园半属人。(《南涧耕叟》)

风紧日凄凄，乡心向此迷。水分平楚阔，山接故关低。客路缘烽火，人家厌鼓鼙。  
那堪独驰马，江树穆陵西。(《申州道中》)

迢递三巴路，羸危万里身。乱山残雪夜，孤烛异乡春。渐与骨肉远，转于僮仆亲。  
那堪正飘泊，明日岁华新。(《巴山道中除夜书怀》)

风飘碧瓦雨催垣，却有邻人与锁门。几树好花闲白昼，满庭芳草自黄昏。  
放鱼池涸花争闹，栖燕巢空雀自喧。不独凄凉眼前事，咸阳一火便成原。(《废宅》)

举国繁华委逝川，羽毛飘荡一年年。他山叫处花成血，旧苑春来草似烟。  
雨暗不离浓绿树，月斜长吊月明天。湘江日暮声凄切，愁杀行人归去船。(《子规》)

水流花谢两无情，送尽东风过楚城。蝴蝶梦中家万里，子规枝上月三更。  
故园书动经年绝，华发春唯满镜生。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争。(《春夕》)

衡门一别梦难稀，人欲归时不得归。长忆去年寒食夜，杏花零落雨霏霏。  
(《忆街西所居》)

洛阳寒食苦多风，扫荡春华一半空。莫道芳蹊尽成实，野花犹有未开丛。  
(《涂中阻风》)

染不成干画未销，霏霏拂拂又迢迢。曾从建业城边路，蔓草寒烟锁六朝。  
(《秋色》)

五千里外三年客，十二峰前一望秋。无限别魂招不得，夕阳西下水东流。  
(《巫山旅别》)

四朝十帝尽风流，建业长安两醉游。唯有一篇杨柳曲，江南江北为君愁。  
(《读庾信集》) 吴融，字子华，越州山阴人。龙纪(公元八八九年)初，以进士擢第。昭宗召拜中书舍人，迁翰林学士承旨。

吴融的代表作，如：

一棹归何处，苍茫落照昏。无人应失路，有树始知春。湖岸春耕废，江城战鼓喧。  
儒冠解相误，学剑尽乘轩。(《途中》)

始怜春草细霏霏，不觉秋来绿渐稀。惆怅撷芳人散尽，满园烟雾蝶高飞。

(《秋园》)

春红始谢又秋红，息国亡来入楚宫。应是蜀冤啼不尽，更凭颜色诉西风。  
(《送杜鹃花》) 钱珣，字瑞文，吏部尚书钱徽子。善文辞，为宰相王搏所荐，官知制诰、中书舍人。及王搏得罪死(事在唐昭宗光化三年，即公元九年)、珣亦贬为抚州(治临川，今江西抚州市)司马。钱珣的代表作，如：

洒洒滩声晚霁时，客亭风袖半披垂。野云行止谁相待，明月襟怀只自知。无伴偶吟溪上路，有花偷笑腊前枝。牵情景物潜惆怅，忽似伤春远别离。(《客舍寓怀》)

负罪将军在北朝，秦淮芳草绿迢迢。高台爱妾魂销尽，始得丘迟为一招。久戍临洮报未归，篋香销尽别时衣。身轻愿比兰阶叶，万里还寻塞草飞。永巷频闻小苑游，旧恩如泪亦难收。君前愿报新颜色，团扇须防白露秋。

(《春恨三首》)

冷烛无烟绿蜡干，芳心犹卷怯春寒。一缄书札藏何事，会被东风暗折看。

(《未展芭蕉》)

钱珣尚有《江行无题一百首》，都是五言绝句，其中有不少佳作，如：  
佳节虽逢菊，浮生正似萍。故山何处望，荒岸小长亭。  
兵火有余烬，贫村才数家。无人争晓渡，残月下寒沙。  
岸绿野烟送，江红斜照微。撑开小渔艇，应到月明归。  
咫尺愁风雨，匡庐不可登。只疑云雾窟，犹有六朝僧。  
千顷水纹细，一拳岚影孤。君山寒树绿，曾过洞庭湖。卢汝弼，以进士擢第。以祠部员外郎、知制诰，从昭宗迁洛。后依李克用，克用表为节度副使。

卢汝弼的代表作，如：

春风昨夜到榆关，故国烟花想已残。少妇不知归不得，朝朝应上望夫山。  
卢龙塞外草初肥，雁乳平芜晓不飞。乡国近来音信断，至今犹自著寒衣。  
八月霜飞柳半黄，蓬根吹断雁南翔。陇头流水关山月，泣上龙堆望故乡。  
朔风吹雪透刀瘢，饮马长城窟更寒。半夜火来知有敌，一时齐保贺兰山。

(《和李秀才边庭四时怨》)

黄巢的诗 农民起义军领袖黄巢，尝举进士不第，他也能诗。据《贵耳集》说：“巢五岁时，侍其翁(祖父)、父为菊花联句，翁思索未至，巢信口应曰：‘堪与百花为总首，自然天赐赭黄衣。’”“乃翁曰：孙能诗，但未知轻重，可令再赋一篇。”巢应之曰：

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移共桃花一处开(《题菊花》)。据宋与时《宾退录》引陶谷《五代乱离纪》云：黄巢并没有死于狼虎谷，“遁免后祝发为浮屠，依张全义于洛阳，曾绘像题诗。”诗云：

三十年前草上飞，铁衣著尽著僧衣。天津桥上无人识，独倚危栏看落晖。这首诗实际是假的，元稹有《智度师》二首：

四十年前马上飞，功名藏尽拥禅衣。石榴园下擒生处，独自闲行独自归。

三陷思明三突围，铁衣抛尽衲禅衣。天津桥上无人识，闲凭栏干望落晖。所谓黄巢的诗实际是从元稹《智度师》二首窜易磔裂，合二为一的。黄巢的诗既是假的，黄巢的遁免为僧之说，当然也绝不可信了。

司空图与韩偓 司空图，字表圣，河中虞乡(今山西虞乡县)人。咸通

末，以进士擢第。历官礼部员外郎、礼部郎中。僖宗在凤翔，召拜知制诰、中书舍人。后退居中条山王官谷（今曰横岭，在虞乡县东南十里）。朱温召为礼部尚书，不赴，病卒。司空图的代表作，如：

旅寓虽难定，乘闲是胜游。碧云萧寺霁，红树谢村秋。戍鼓和潮暗，船灯照岛幽。诗家多滞此，风景似相留。（《寄永嘉崔道融》）

身病时亦危，逢秋多恸哭。风波一摇荡，天地几翻覆。孤萤出荒地，落叶穿破屋。势利长草草，何人访幽独。（《秋思》）

宦游萧索为无能，移住中条最上层。得剑乍如添健仆，亡书久似失良朋。燕昭不是空怜马，支遁何妨亦爱鹰。自此致身绳检外，肯教世路日兢兢。（《退栖》）

形胜今虽在，荒凉恨不穷。虎狼秦国破，狐兔汉陵空。（《秦关》）

丧乱家难保，艰虞病难医。空将忧国泪，犹拟洒丹墀。（《乱后三首》之一）

独步荒郊暮，沉思远墅幽。平生多少事，弹指一时休。（《偶书五首》之四）

离乱身偶在，窜迹任浮沉。虎暴荒居迥，营孤黑夜深。（《避乱》）

故国春归未有涯，小栏高槛别人家。五更惆怅回孤枕，犹自残灯照落花。（《华上二首》之一）

天风斡海怒长鲸，永固（苻坚）南来百万兵。若向沧洲犹笑傲（指谢安），江山虚有石头城。（《南北史感遇十首》之四）

乱后人间尽不平，秦川花木最伤情。无穷红艳红尘里，骤马分香散入营。（《南北史感遇十首》之十）

小池随事有风荷，烧酎倾壶一曲歌。欲待秋塘擎露看，自怜生意已无多。（《偶题三首》之一）韩偓，字致尧，小字冬郎，京兆万年人。偓父瞻，与李商隐同年及第，又同为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女婿。偓十岁就能写诗，李商隐有赠冬郎诗：

十岁裁诗走马成，冷灰残烛动离情。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可见韩偓在幼年时代，就是天资聪颖，成诗敏捷。偓龙纪元年（公元八八九年），以进士擢第。初佐河中幕府，后拜左拾遗，历左谏议大夫、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兵部侍郎、翰林学士承旨。唐昭宗想命韩偓任宰相者数四，偓皆推让不肯做。后来韩偓推荐他的座主御史大夫赵崇和兵部侍郎王赞，唐昭宗答应了。宰相崔胤恶崇、赞等分己权，使朱温入朝争之。温见昭宗，曰：“赵崇轻薄之魁，王赞无才用，韩偓何得妄荐为相！”（《资治通鉴》唐昭宗天复三年）昭宗在朱温的压力下，乃贬偓为濮州（治鄆城，今山东鄆城县旧城）司马。因为濮州是朱温的统治地区，韩偓惧为朱温所害，故不敢赴官，乃南游寄寓湖湘，时天复三年（公元九〇三年）也。天祐三年（公元九〇六年），偓又经江西入福建，依王审知，后病死於福建。

韩偓在翰林时，写了不少诗，反映了他在翰林学士任上的生活和政治活动情况。

银台直北金銮外，暑雨初晴皓月中。唯对松篁听刻漏，更无尘上翳虚空。绿香熨齿冰盘果，清冷侵肌水殿风。夜久忽闻铃索动（禁署严密，非本院人，虽有公事，不敢遽入。至於内夫人宣事，亦先引铃。每有公事，即内臣立於门外，铃声动，本院小判官出受，受讫，授院使，院使授学士）。玉堂西畔响丁东。（《雨后月中玉堂闲坐》）

清暑帘开散异香，恩深咫尺对龙章。花应洞里寻常发，日向壶中特地长。坐久勿疑槎犯斗，归来兼恐海生桑。

如今冷笑东方朔，唯用诙谐侍汉皇。（《六月十七日召对自辰及申方归本院》）

星斗疏明禁漏残，紫泥封后独凭栏。露和玉屑金盘冷，月射珠光贝阙寒。天衬楼台笼苑外，风吹歌管下云端。长卿只为《长门赋》，未识君臣际会难。（《中秋禁直》）

蜂黄蝶粉两依依，狎宴临春日正迟。密旨不教江令（江总）醉，丽华微笑认皇慈。（《侍宴》）

上苑离宫处处迷，相风高与露盘齐。金阶铸出狻猊立，玉树雕成翡翠啼。外使调鹰初得按（五方外按使，以鹰隼初调习，始能擒获，谓之“得按”），中官过马不教嘶（上每乘马，必阉官驭以进，谓之“过马”。既乘之，而后蹀躞嘶鸣）。笙歌锦绣云霄里，独许词臣醉似泥。（《苑中》）宦官逼迫唐昭宗去凤翔，韩偓随侍昭宗左右，这是唐王朝政局最动荡时期。韩偓诗中反映其事。

中宵忽见动葭灰，料得南枝有早梅。四野便应枯草绿，九重先觉冻云开。阴冰莫向河源塞，阳气今从地底回。不道惨舒无定分，却忧蚊响又成雷。（《冬至夜作》天复二年壬戌，随驾在凤翔府）到了天复三年（公元九三年）二月十一日，偓贬濮州司马，同月二十二日有诗：

谪官过东畿，所抵州名濮。故里欲清明，临风堪恸哭。溪长柳似帷，山暖花如醜。逆旅讶簪裾（南路以久无儒服经过，皆相聚悲喜），野老悲陵谷。暝鸟影连翩，惊狐尾蠢簌。尚得佐方州，信是皇恩沐。（《出官经硖石县》）

硖石县在今河南硖县东南七十里硖石镇，韩偓赴濮州，应从潼关东过洛阳，他却从硖石东南直趋湖南了。

韩偓在湖南的作品有：

梅花不肯傍春光，自向深冬著艳阳。龙笛远吹胡地月，燕钗初试汉宫妆。风虽强暴反添思，雪欲侵袭更助香。应笑暂时桃李树，盗和天气作年芳。（《梅花》）

古木侵天日已沉，露华凉冷润衣襟。江城曛黑人行绝，唯有啼乌伴夜斟。（《曛黑》）

万里晴江万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烟。渔翁醉著无人唤，过午醒来雪满船。（《醉著》）

一笼金线拂弯桥，几被儿童损细腰。无奈灵和标格在，春来依旧裹长条。（《柳》）

万古离怀憎物色，几生愁绪溺风光。废城沃土肥春草，野渡空船荡夕阳。倚道向人多脉脉，为情因酒易恹恹。

宦途弃掷须甘分，回避红尘是所长。（《即目二首》之一）

一园红艳醉陂陀，自蒂连梢簇茜罗。蜀魄未归长滴血，只应偏滴此丛多。（《净兴寺杜鹃一枝繁艳无比》）

西山爽气生襟袖，南浦离愁入梦魂。人泊孤舟青草岸，鸟鸣高树夕阳村。偷生亦似符天意，未死深疑负国恩。白面儿郎犹巧宦，不知谁与正乾坤。（《避地》）

天长水阔网罗稀，保得重重翠碧衣。挟弹小儿多害物，劝君莫近市朝飞。（《翠碧鸟》）以上并在醴陵作）

韩偓在天祐二年（公元九〇五年），进入江西，听到唐王朝任命他重为兵部侍郎兼翰林学士承旨，他没有北上，却做了一首诗：

旅寓在江郊，秋风正寂寥。紫泥虚宠奖，白发已渔樵。事往凄凉在，时危志气销。若为（如何之意）将朽质，

犹拟杖於朝。（《乙丑岁（天祐二年）九月在萧滩镇驻泊两月忽得杨迢员外书贺予复除戎曹（兵部）依旧承旨（翰林学士承旨）还城后因书四十字》）

天祐三年（公元九〇六年）秋，他进入福建。此后的诗如：

此心兼笑野云忙，甘得贫闲味甚长。病起乍尝新橘柚，秋深初换旧衣裳。晴来喜鹊无穷语，雨后寒花特地香。把钓覆棋兼举白，不离名教可颠狂。（《秋深间兴》）

故都（指长安）遥想草萋萋，上帝深疑亦自迷。寒雁已侵池御宿，宫鸦犹恋女墙啼。天涯烈士空垂涕，地下强魂必噬脐。掩鼻计成终不觉，冯欢无路斃鸣鸡。（《故都》）

水自潺湲日自斜，尽无鸡犬有鸣鸦。千村万落如寒食，不见人烟空见花。（《自沙县抵龙溪县值泉州军过后村落皆空因有一绝》）（庚午年——后梁开平四年，即公元九〇一年）

鹅儿唼藕黄茸，凤子轻盈腻粉腰，深院下帘人昼寝，红蔷薇架碧芭蕉。（《深院》）

簪裾皆是汉公卿，尽作锋镝剑血醒。显负旧恩归乱主，难教新国用轻刑。穴中狡兔终须尽，井上婴儿岂自宁。底事亦疑惩未了，更应书罪在泉扃。（《八月六日作四首》之三）

坐看包藏负国恩，无才不得预经纶。袁安坠睫寻忧汉，贾谊濡毫但《过秦》。威风鬼应遮矢射，灵犀天兴隔埃尘。堤防瓜李能终始，免愧於心负此身。（《八月六日作四首》之四）

壬申年，唐已亡了六年了，韩偓追想天祐元年（公元九〇四年），昭宗被杀；天祐二年，朱温杀朝士於白马驿，投尸黄河；同年，杀昭宗后何氏；天祐四年，朱温自立为梁帝，明年（梁开平二年，公元九〇八年），又鸩杀唐幼主。韩偓在这四首诗里，对唐梁的改朝换代，帝后被杀，表示其悲愤之情，对误国媚梁的公卿如柳璨辈，更痛加斥责。

**唐王朝末日的挽歌——韦庄诗篇** 韦庄，字端己，京兆杜陵（今陕西长安市东南）人，玄宗时宰相韦见素之后。庄“曾祖少微，宣宗中书舍人”（《唐诗纪事》）。庄唐昭宗乾宁元年（公元八九四年），以进士擢第，授校书郎，转右补阙。乾宁四年（公元八九七年），唐以左谏议大夫李洵为两川宣论使，出使西蜀，洵奏庄为判官。时王建据蜀，为西川节度使，庄见中原已乱，唐室将亡，潜欲留蜀，受王建辟为掌书记。唐昭宗召建为起居舍人，王建表留庄。唐亡，王建建前蜀，庄仕前蜀至宰相。卒於前蜀主王建之武成三年（公元九〇一年）。

韦庄的卒年，正确可考，但韦庄的生年，不能严格确定。唐懿宗咸通（公元八六〇至八七四年）年代，韦庄是经历着的，庄有《咸通》诗：

咸通时代物情奢，欢杀金张许史家。破产竞留天上乐，铸钱争买洞中花。诸郎宴罢银灯合，仙子游回璧月斜。

人意似知今日事，急催弦管送年华。短短一首七律，写出了承平之世，唐统治阶级在富裕生活中腐化了，醉生梦死，不知大乱已经迫在眉睫。还有《贵公子》诗，也是描写承平之世的公子王孙的。诗云：

大道青楼御苑东，玉栏仙杏压枝红。金铃犬吠梧桐院，朱鬣马嘶杨柳风。流水带花穿巷陌，夕阳和树入帘栊。

瑶池宴罢归来醉，笑说君王在月宫。

唐末农民大起义爆发了，以黄巢为首的农民军冲破了层层封锁线，曾南下达广州。不久，又从广州回师，沿湘江而北，进逼江陵。众号五十万。韦庄有诗纪其事：

几时闻唱凯旋歌，处处屯兵未倒戈。天子只凭红旆壮，将军空恃紫髯多。尸填汉水连荆阜，血染湘云接楚波。莫问流离南越事，战馀空有旧山河。（《又闻湖南荆渚相次陷没》）

唐僖宗广明元年（公元八八一年）黄巢攻下东都洛阳，进破潼关，占领了西京长安，僖宗仓皇逃奔成都。当时韦庄正在长安，陷身重围中，作诗云：

九衢标杵已成川，塞上黄云战马闲。但有羸兵填渭水，更无奇士出商山。田园已没红尘里，弟妹相逢白刃间。西望翠华殊未返，泪痕空湿剑文斑。（《辛丑年》）

中和三年（公元八八三年）四月，黄巢自长安撤军，由蓝田东走。韦庄也在此时东奔洛阳。在这一程途中，他写成了《秦妇吟》。这首长诗，传诵一时，因此当时称韦庄为“秦妇吟秀才”。这一首《秦妇吟》长歌，久已散佚，近百年在敦煌石室发现，《秦妇吟》唐钞本得复见于世，王国维先生、陈寅恪先生皆有考证，诗太长，不全录。

《秦妇吟》中提到长安经过农民军扫荡以后：

……长安寂寂今何有，废市荒街麦苗秀。采樵斫尽杏园花，修寨诛残御沟柳。华轩绣毂皆销散，甲第朱门无一半。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楼前荆棘满。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内库烧成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来时晓出城东陌，城外风烟如塞色。路傍时见游奕军，陂下寂无迎送客。灞陵东望人烟绝，树锁骊山金翠灭。大道俱成棘子林，行人夜宿长安月。……韦庄在《秦妇吟》中叙述秦妇经过新安以东：

……明朝又过新安东，路上乞浆逢一翁。苍苍面带苔藓色，隐隐身藏蓬荻中。问翁本是何乡曲，底事寒天霜露宿。老翁暂起欲陈词，却坐支颐仰天哭。乡园本贯东畿县，岁岁耕桑临近甸。岁种良田二百里，年输户税三十万。小姑娘织褐袍，中妇能炊红黍饭。千间仓兮万斯箱，黄巢过后犹残半。自从洛下屯师旅，日夜巡兵入村坞。匣中秋水拔青蛇，旗上高风吹白虎。入门下马若旋风，倾室倾囊如卷土。家财既尽骨肉离，今日残年一身苦。一身苦兮何足嗟，山中更有千万家。朝饥山草寻蓬子，夜宿霜中卧荻花。……《秦妇吟》对官军镇压农民战争之际，尽情劫掠民间，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灾祸，作了有力的控诉。

官军纪律的败坏，不仅在《秦妇吟》里提到，还在韦庄其它诗篇里，也充分作了反映。

关中群盗已心离，关外犹闻羽檄飞。御苑绿莎嘶战马，禁城寒月捣征衣。漫教韩信兵涂地，不及刘琨啸解围。昨日屯军还夜遁，满车载得洛神归。（《睹军回戈》）藩镇军队在“勤王”的名义掩护下，抢掠得民家妇女无数，毋怪诗人要喊出“满车载得洛神归”了。

韦庄在离开东都之前，写了不少伤时怀事之作。如：

春城回首树重重，立马平原夕照中。五凤（楼）灰残金翠灭，六龙（天子六马驾车）游去市朝空。千年王气浮清洛，万古坤灵镇碧嵩。欲问向来陵

谷事，野桃无语泪花红。（《北原闲眺》）

华轩不见马萧萧，廷尉门人久寂寥。朱槛翠楼为卜肆，玉兰仙杏作春樵。阶前雨落鸳鸯瓦，竹里苔封一桥。莫问此中销歇事，娟娟红泪滴芭蕉。（《过旧宅》）

满庭松桂雨馀天，宋玉秋声韵蜀弦。乌兔（日中有乌，月中有兔）不知多事世，星辰长似太平年。谁家一笛吹残暑，何处双砧捣暮烟。欲把伤心问明月，素娥无语泪娟娟。（《夜景》）

魏王堤（在洛阳）畔草如烟，有客伤时独扣舷。妖气欲昏唐社稷，夕阳空照汉山川。千重碧树笼春苑，万缕红霞衬碧天。家寄杜陵归不得，一回回首一潸然。（《中途晚眺》）韦庄追忆承平之世，燕歌莺舞，不胜慨然。

忆昔曾向五陵游，《子夜》歌清月满楼。银烛树前长似画，露桃花里不胜秋。西园公子名无忌，南国佳人号莫愁。今日乱离俱是梦，夕阳唯见水东流。（《忆昔》）唐僖宗於广明元年（公元八八一年）逃蜀，至中和三年（公元八八三年），尚音息杳然。韦庄有诗云：

四年龙驭守峨嵋，铁马西来步步迟。五运未教移汉鼎，六韬何必待秦师。几时鸾凤归丹阙，到处乌鸢从白旗。独把一樽和泪酒，隔云遥奠武侯祠。（《喻东军》）又有《闻官军继至未睹凯旋》诗：

嫖姚何日破重围，秋草深来战马肥。已有孔明传将略，更闻王导得神机。阵前鼙鼓晴应响，城上乌鸢饱不飞。何事小臣偏注目，帝乡遥羨白云归。最后，唐统治阶级借沙陀兵力收复长安，韦庄也避地前往江南了。韦庄有《古离别》，诉说马头指向江南。

晴烟漠漠柳鬢鬢，不那离情酒半酣。更把玉鞭云外指，断肠春色在江南。韦庄在《秦妇吟》里，已经透露了要往镇海（治曲阿，今江苏镇江市）节度使周宝那儿去：

……适闻有客江南至，见说江南风景异。自从大寇犯中原，戎马不曾生四鄙。诛锄窃盗若神功，惠爱生灵

如赤子。城壕固护教金汤，赋税如云送军垒。奈何四海尽滔滔，湛然一镜平如砥。避难徒为阙下人，怀安却羨

江南鬼。愿君举棹东复东，咏此长歌献相公。……

韦庄到了浙西之后，成为周宝的座上客，那时浙西尚全盛。庄有诗云：

十里旌旗十万兵，等闲游猎出军城。紫袍日照金鹅斗，红旆风吹画虎狞。带箭彩禽云外落，避雕寒兔月中惊。归来一路笙歌满，更有仙娥载酒迎。（《观浙西府相畋游》）

满耳笙歌满眼花，满楼朱翠胜吴娃。因知海上神仙窟，只似人间富贵家。绣户夜攒红烛市，舞衣晴曳碧天霞。却愁宴罢青蛾散，扬子江头月半斜。（《陪金陵府相中堂夜宴》）韦庄对金陵做了三首诗：

南朝三十六英雄，角逐兴亡尽此中。有国有家皆是梦，为龙为虎亦成空。残花旧宅悲江令，落日青山吊谢公。止竟霸图何物在，石麟无主卧秋风。（《上元县》浙西作）

谁谓伤心画不成，画人心逐世人情。君看六幅南朝事，老木寒云满故城。（《金陵图》）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台城》）唐僖宗於光启元年（公元八八五年），才从成都重返长安。不久，宦官田令孜和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因争夺河东盐池的利益，发生冲突，王

重荣联合了河东节度使李克用进兵攻逼长安。这年的冬天，田令孜劫迁唐僖宗往宝鸡，光启二年三月，唐僖宗又被田令孜劫迁至兴元（今陕西汉中市）。四月，长安文武拥立李唐远房宗室唐肃宗之玄孙襄王李煜监军国事，同年十月，又推李煜为帝，关中大乱。庄有《闻再幸梁洋》（指兴元）诗：

才喜中原息鼓鼙，又闻天子幸巴西。延烧魏阙非关燕，大狩陈仓不为鸡。兴庆玉龙寒自跃，昭陵石马夜空嘶。遥思万里行宫梦，太白山前月欲低。

可知韦庄北上“西赴行朝”之前，已经知道唐僖宗已经逃亡梁洋了。周宝在浙西，曾任命其女婿杨茂实为苏州刺史，田令孜以唐中央名义，另任命赵载为苏州刺史代茂实，周宝不令赵载至任，把他留在润州。后来唐中央又派右散骑常侍沈诰至江南，诰“负田令孜势，震暴州县”。长安文武立李煜后，煜“下令搜令孜党，宝收诰及赵载杀之”（《新唐书·周宝传》）。可见周宝和田令孜矛盾很大，他是倾向拥立李煜的。韦庄北上，不会是“西赴行朝”，“至陈仓迎驾”，实际是以周宝幕僚身份至长安向李煜劝进的。“至陈仓迎驾”之说，在李煜失败后，为了掩饰而追改的。

光启二年，韦庄北上，韦庄这次北上，是走汴宋路由汴堤入河的。他有“夏初，与侯补阙江南有约同泛淮汴，西赴行朝。庄自九驿路先至甬桥（今安徽宿县）。补阙由淮楚续至泗上，寝病旬日，遽闻捐馆。回首悲恸，因成长句四韵吊之”诗题，题下尚有小注：“已后自浙西游汴宋路，至陈仓迎驾，却过昭义相州路，归金陵作。”实际韦庄不可能“至陈仓迎驾”，因为唐僖宗已去梁洋了。甬桥即今安徽宿县汴水上，《旧唐书·文宗纪》：“太和七年（公元八三三年）三月，复於甬桥置宿州，割徐州符离、泗州虹县隶之。”这个甬桥，是江淮粮运的重要转运点。韦庄还写有《汴堤行》欲上隋堤举步迟，隔云烽燧叫非时，才闻破虏将休马，又道征辽再出师。朝见西来为过客，暮看东去作浮

尸。绿杨千里无飞鸟，日落空投旧店基。庄又有《自孟津西上雨中作》：秋烟漠漠雨濛濛，不卷征帆任晚风。百口寄安沧海上，一身逃难绿林中。来时楚岸杨花白，去日隋堤蓼穗

红。却到故园翻似客，归心迢递秣陵东。从孟津西上，究竟到那里去呢？去长安呢？还是间关去陈仓呢？都没有下文。

散骑萧萧下太行，远从吴会去陈仓。斜风细雨江亭上，尽日凭栏忆楚乡。（《题貂黄岭官军》）这时唐僖宗早已迁驻梁洋，就是去陈仓，也只是扑个空而已。诗人的归途，没有沿汴河走，原因是淮南、镇海两镇皆已大乱，沿运河走不安全，所以韦庄不得不兜个大圈子。庄《壶关道中作》诗云：

处处兵戈路不通，却从山北去江东。黄昏欲到壶关寨，匹马寒嘶野草中。

韦庄又从壶关，经相州的内黄（今河南内黄县西），有诗云：

相州吹角欲斜阳，匹马摇鞭宿内黄。僻县不容投刺客，野陂时遇射雕郎。云中粉堞新城垒，店后荒郊旧战场。犹指去程千万里，秣陵烟树在何乡。（《过内黄县》）这时江淮大乱，淮南节度使高骈被杀，史称：“先是扬州富庶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二，及经秦[彦]、毕[师铎]、孙[儒]、杨[行密]兵火之余，江淮之间，东西千里，扫地尽矣”（《资治通鉴》唐昭宗景福元年）。浙西也是大乱，周宝被逐，依钱鏐而卒，或说为鏐所杀。韦庄只能暂时寄家婺州了。庄有《过扬州》诗云：

当年人未识干戈，处处青楼夜夜歌。花发洞中春日永，月明衣上好风多。淮王去后无鸡犬，炀帝归来葬绮罗。二十四桥空寂寂，绿杨摧折旧官河。

莫悲建业荆榛满，昔日繁华是帝京。莫爱广陵台榭好，也曾芜没作荒城。鱼龙爵马皆如梦，风月烟花岂有情。行客不劳频怅望，古来朝市欢衰荣。（《杂感》）韦庄寄家婺州后，好像没有什麼政治活动，和钱鏐也无瓜葛往来。这时期的作品如：

故人相别尽朝天，苦竹江头独闭关。落日乱蝉萧帝寺，碧云归鸟谢家山。青州从事（酒）来偏熟，泉布先生（钱）老渐铿。不是对花长酩酊，永嘉时代不如闲。（《江上题所居》）

兰芷江头寄断蓬，移家空载一帆风。伯伦嗜酒还因乱，平子归田不为穷。避世飘零人境外，结茅依约画屏中。从今隐去应难觅，深入芦花作钓翁。（《将卜兰芷村居留别郡中在任》）

年年春日异乡悲，杜曲黄莺可得知。更被夕阳江岸上，断肠烟柳一丝丝。（《江外思乡》）

梦中乘传过关亭，南望莲花簇簇青。马上正吟归去好，觉来江月满前庭。（《梦入关》）

送君江上日西斜，泣向江边满树花。若见青云旧相识，为言流落在天涯。（《送人归上国》）

云晴春鸟满江村，还似长安旧日闻。红杏花前应笑我，我今憔悴亦羞君。（《闻春鸟》）

夕阳滩上立徘徊，红蓼花前雪翅间。应为不知栖宿处，几回飞去又飞来。（《独鹤》）

杖策无言独倚关，如痴如醉又如闲。孤吟尽日何人会，依约前山似故山。（《倚柴关》）

庭前芳草绿於袍，堂上诗人欲二毛。多病不禁秋寂寞，雨松风竹莫骚骚。（《语松竹》）诗中时时流露天涯沦落之感，基调是很低沉的。不久，韦庄在《和郑拾遗秋日感事一百韵》诗内，就提到“负笈将辞越，扬帆欲泛湘”，准备作江湘之行了。

韦庄在江湘之行中，有代表性的作品，今择二首：

杜陵归客正裴回，玉笛谁家叫落梅。之子棹从天外去，故人书自日边来。杨花慢惹霏霏雨，竹叶闲倾满满杯。欲问维扬旧风月，一江红树乱猿哀。（《章江作》）

千重烟树万重波，因便何妨吊汨罗。楚地不知秦地乱，南人空怪北人多。臣心未肯教迁鼎，天道还应欲止戈。否去泰来终可待，夜寒休唱《饭牛歌》。（《湘中作》）

唐昭宗景福二年（公元八九三年），韦庄才从江南回到关中。

却将憔悴入都门，自喜青霄足故人。万里有家留百越，十年无路到三秦。摧残不是当时貌，流落空馀旧日贫。多谢青云好知己，莫教归去重沾巾。（《投寄旧知》）

却到山阳事事非，谷云溪鸟尚相依。阮咸贫去田园尽，向秀归来父老稀。秋雨几家红稻熟，野塘何处锦鳞肥。年年为献东堂策，长是芦花别钓矶。（《鄂杜旧居二首》之一）乾宁元年（公元八九四年），韦庄以进士擢第，授校书郎，迁右补阙。乾宁四年（公元八九七年），随李洵使蜀，从华州起程，经过故都长安，不免凭吊一番。

满目墙垣春草生，伤时伤事更伤心。车轮马迹今何在，十二玉楼何处寻。（《长安旧里》）他还到了樊川、泮陂等旧游之地，看了一下：

却到樊川访旧游，夕阳衰草杜陵秋。应刘去后苔生阁，嵇阮归来雪满头。能说乱离唯有燕，解偷闲暇不如鸥。千桑万海无人见，横笛一声空泪流。（《过樊川旧居》）辛勤曾寄玉峰前，一别云溪二十年。三径荒凉迷竹树，四邻凋谢变桑田。溇陂可是当时事，紫阁空馀旧日烟。多少乱离无处问，夕阳吟罢涕潸然。（《过溇陂怀旧》）当韦庄使蜀之际，唐昭宗依韩建于华州，朝廷危亡，朝不保夕。庄入蜀至汉州（今四川广汉县）有诗云：

北依初到汉州城，郭邑楼台触目惊。松桂影中旌旆色，芰荷风里管弦声。人心不似经离乱，时运还应却太平。

十日醉眠金雁驿，临歧无限眼波横。（《汉州》）到了成都，则显出承平气象。

才喜新春已暮春，夕阳吟杀倚楼人。锦江风散霏霏雨，花市香飘漠漠尘。今日尚追巫峡梦，少年应遇洛川神。有时自患多情病，莫是生前宋玉身。（《奉和左司郎中春物暗度感而成章》）

天畔峨眉簇簇青，楚云何处隔重扃。落花带雪埋芳草，春雨和风湿画屏。对酒莫辞冲暮角，望乡谁解倚高亭。

惟君信我多惆怅，只愿陶陶不愿醒。（《奉和观察郎中春暮忆花言怀见寄四韵之什》）韦庄从此留仕前蜀，再不北返了。

诗僧贯休在成都，和韦庄常有往还，在贯休《酬韦相公见寄》之作中，有“一丈临山且奈何”之句，句下自注云：“日到天心，乃相公之日；老僧日去山乃一丈耳。”这时韦庄的年龄，才五十开外，六十不满，故曰“日到天心”；而贯休卒于前蜀永平二年（公元九一二年），比韦庄迟死二年，年已八十一，贯休作诗时，年龄七十多，故曰：“日去山乃一丈”，可见，韦庄的年龄要比贯休小得多，近人作韦庄年谱，说韦庄死时年已七十五岁，比贯休只少四岁，恐怕把韦庄的年龄说得偏高一些了。

五代十国诗人 五代十国时期，诗人词客，大半集聚在南唐、吴越、荆（江陵）、蜀各地，今以时代先后来介绍。

罗隐，字昭谏，余杭人。仕於吴越钱氏，历官钱塘令、镇海军节度使掌书记、节度判官、监铁发运副使、著作佐郎，奏授司动郎，病卒。

罗隐的代表作，如：

似共东风别有因，绛罗高卷不胜春。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也动人。芍药与君为近侍，芙蓉何处避芳尘。可怜韩令功成后，辜负穠华过此身。（《牡丹花》）

树远连天水接空，几年行乐旧隋宫。花开花谢还如此，人去人来自不同。鸾凤调高何处酒，吴牛蹄健满车风。思量只合腾腾醉，煮海平陈尽梦中。（《春日独游禅智寺》）

寒城猎猎戍旗风，独倚危楼怅望中。万里山川唐土地，千年魂魄晋英雄。离心不忍听边马，往事应须问塞鸿。好脱儒冠从校尉，一枝长戟六钧弓。（《登夏州城楼》）

抛掷南阳为主忧，北讨东征尽良筹。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唯馀严下多情水，犹解年年停驿流。（《筹笔驿》）

一年两度锦江游，前值东风后值秋。芳草有情皆碍马，好云无处不遮楼。山将别恨和心断，水带离声入梦流。今日因君试回首，澹烟乔木隔绵州。（《绵谷回寄蔡氏昆仲》）

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西施》）罗隐有些作品，意志颓丧，目光短浅，如“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愁多恨亦悠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自遣》）。“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蜂》）。虽为时传诵，而境界不高，不能算作他的好作品。

张蠙，字象文，清河人。乾宁二年（公元八九五年），以进士擢第。后入蜀，仕前蜀王氏，终金堂（今四川金堂县）令。

张蠙的代表作，如：

边兵春尽回，独上单于台。白日地中出，黄河天外来。沙翻痕似浪，风急响疑雷。欲向阴关度，阴关冷不开。（《登单于台》）

嘉陵路恶不和泥，行到长亭日已西。独倚阑干正惆怅，海棠花里鹧鸪啼。（《题嘉陵驿》）

蒋贻恭，后蜀时人，后蜀主孟昶搜访遗材，贻恭亦被收录（见何光远《鉴诫录》）。

蒋贻恭的代表作，如：

辛勤得茧不盈筐，灯下缫丝怨恨长。著处不知来处苦，但贪衣上绣鸳鸯。（《咏蚕》）

扬眉斗目恶精神，捏合将来恰似真。刚被时流借拳势，不知身自是泥人。（《咏金刚》）

黄滔，字文江，莆田（今福建莆田县东南）人。昭宗乾宁二年（公元八九五年），以进士擢第。后返闽仕於王审知。

黄滔的代表作，如：

望岁心空切，耕夫尽把弓。千家数人在，一税十年空。没阵风沙黑，烧城水陆红。飞章奏西蜀，明诏与殊功。（《书事》）

匹马萧萧去不前，平芜千里见穷边。关山色死秋深日，鼓角声沉霜重天。荒骨或衔残铁露，惊风时掠暮沙旋。陇头冤气无归处，化作阴云飞杳然。（《塞下》）

颜仁郁，字文杰，泉州人。仕王审知为归德场长。

颜仁郁的代表作，如：

夜半呼儿趁晓耕，羸牛无力渐艰行。时人不识农家苦，将谓田中谷自生。（《农家》）

张泌，字子登，淮南人。初官句容尉，南唐后主徵为监察御史，历考功员外郎，迁中书舍人，改内史舍人。随李煜降宋，仍入史馆，迁郎中，病卒。

张泌的代表作，如：

戍楼吹角起征鸿，猎猎寒旌背晚风。千里暮烟愁不尽，一川秋草恨无穷。山河惨澹关城闭，人物萧条市井空。只此旅魂招未得，更堪回首夕阳中。（《边上》）

空江浩荡景萧然，尽日菰蒲泊钓船。青草浪高三月渡，绿杨花扑一溪烟。情多莫举伤春目，愁绝兼无买酒钱。犹有渔人数家住，不成村落夕阳边。（《洞庭阻风》）

烟郭遥闻向晚鸡，水平舟静浪声齐。高林带雨杨梅熟，曲岸笼云谢豹啼。二女庙荒汀树老，九疑山碧楚天低。湘南自古多离怨，莫动哀吟易惨凄。（《晚泊湘源县》）

秋风丹叶动荒城，惨澹云遮日半明。昼梦却因惆怅得，晚愁多为别离生。

江淹彩笔空留恨，庄叟玄谈未及情。千古怨魂销不得，一江寒浪若为平。（《惆怅吟》）

见说还南去，迢迢有侣无。时危须早转，亲老莫他图。小店蛇羹黑，空山象粪枯。三间遗庙在，为我一鸣呼。（《送友人之岭外》）

清世诗声出，谁人得似君。命通须有日，天未丧斯文。楚木寒连寺，修江碧入云。相思喜相见，庭叶正纷纷。（《海边见罗邺》）

寺阁间纵望，不觉到斜晖。故国在何处，多年未得归。寒江平楚外，细雨一鸿飞。终效于陵子，吴山有绿薇。（《登鄱阳寺阁》）

蓟门寒到骨，战碛雁相悲。古屋不胜雪，严风欲断髭。清吟得冷句，远念失佳期。寂寞谁相问，迢迢天一涯。（《蓟北寒月作》）

魄慑魂飞骨亦销，此魂此魄亦难招。黄金白玉家家尽，绣闼雕甍处处烧。惊动乾坤常黯惨，深藏山岳亦倾摇。恭闻国有英雄将，拟把何心答圣朝。（《东阳罹乱后怀王慥使君五首》之四）

六街晴色动秋光，雨霁凭高只易伤。一曲晚烟浮渭水，半桥斜日照咸阳。休将世路悲尘事，莫指云山认故乡。回首汉宫楼阁暮，数声钟鼓自微茫。（《题华严寺木塔》）诗意清婉，属对精丽，其七律在五代诗人，堪称上乘。

五代时有两个诗僧，我们也应把他们的作品介绍一下。僧贯休，俗姓姜氏，兰溪（今浙江兰溪县）人。七岁出家，诗格奇险。时钱鏐王吴越，贯休投之以诗：

贵逼身来不自由，几年勤苦蹈林丘。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莱子衣裳宫锦窄，谢公篇咏绮霞羞。他年名上凌烟阁，岂羨当时万户侯。莱子衣裳，是说钱鏐娱亲；谢公诗篇，是说钱鏐能诗，这首诗可说吹捧钱鏐到家了。可是钱鏐对“一剑霜寒十四州”这句诗尚嫌不满，遣人向贯休示意，要求把十四州改为四十州，才许接见。贯休说：“州亦难添，诗亦难改，然闲云野鹤，何天而不可飞”（《唐纪记事》），就此去江陵了。江陵节帅对待他也很优待，馆之於龙兴寺。贯休在江陵作《酷吏词》以讽刺江陵政治的腐败，诗云：

霰雨灏灏，风吼如鬪。有叟有叟，暮投我宿，吁欢自语，云太苛酷。如何如何？掠脂斡肉。吴姬唱一曲，等闲破红束。韩娥唱一曲，锦段鲜照屋。宁知一曲两曲歌，曾使千人万人哭。不唯哭，亦白其头饥其族。所以祥风不来，和风不复。蝗兮蟹兮，东西南北。江陵节帅自然不愿意听到这种诗，贯休也只能离荆入蜀了。王建对他很礼待，署号禅月大师。贯休投王建诗云：

河北河南处处灾，惟闻全蜀少尘埃。一瓶一钵垂垂老，万水千山得得来。秦苑幽栖多胜景，巴慙陈贡愧非才。

自惭林藪龙钟者，亦得亲登郭隗台。贯休遂终於蜀，年八十一。

贯休的代表作，如：

地角天涯外，人号鬼哭边。大河流败卒，寒日下苍烟。杀气诸蕃动，军书一箭传。将军莫惆怅，高处是燕然。（《古塞下曲七首》之六）这两首七律虽是贯休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诋毁农民起义，但也指出了致乱之由，由於酷吏的剝削生灵。

僧齐己，俗姓胡氏，潭州益阳（今湖南益阳县）人。出家於大沩山同庆寺为僧。後至江陵，高从晦留为僧正。

齐己的代表作，如：

春风吹蓑衣，暮雨滴箬笠。夫妇耕共劳，儿孙饥对泣。田园高且瘦，赋

税重复急。官仓鼠雀群，共待新租入。（《耕叟》）

夜钓洞庭月，朝醉巴陵市。却归君山下，渔龙窟边睡。生涯在何处，白浪千万里。曾笑楚臣迷，苍黄汨罗水。（《渔父》）

汉地从休马，胡家自牧羊。都来销帝道，浑不用兵防。草上孤城白，沙翻大漠黄。秋风起边雁，一一向潇湘。（《边上》）

垂白堪思大乱前，薄游曾驻洞庭边。寻僧古寺沿沙岸，倚杖残阳落水天。兰蕊蔫菸骚客庙，烟波晴阔钓师船。

此时欲买君山住，懒就商人乞个钱。（《怀巴陵》）

荆门归路指湖南，千里风帆兴可谙。好听鹧鸪啼两处，木兰舟晚泊春潭。（《送人往长沙》）

齐己著《风雅旨格》，述诗警句云：“山寺钟楼月，江城鼓角风”，“风过花争出，云空月半生”，“苦雨秋涛涨，狂风野烧翻”，“亡国空流水，孤桐掩落花”，“日落无行客，天寒有去鸿”，“白鬓无心镊，青山得意多”。《全唐诗》同时著录齐己名句，《桂林诗评》有“一片月生海，几家人上楼”。《东皋杂录》有“楝花开后风光好，梅子黄时雨意浓”，都堪称佳句。

唐五代的讽喻诗 隋及唐初，有王梵志，以佛教思想为基础，作通俗诗，甚为时俗所喜诵。

据《太平广记》卷八十二引《史遗》云：“王梵志，卫州黎阳人也。黎阳城东十五里有王德祖，当隋文帝时，家有林擒（南方称花红，北方称沙果，似苹果而小）树”。一天，王德祖发现一个私生婴儿安置在树上，“德祖收养之”，因名曰王梵志。长大后，“梵志作诗示人，甚有义旨”。

《云溪友议》载梵志诗云：

多置庄田广修宅，四邻买尽犹嫌窄。雕墙峻宇无歇时，几日能为宅中客。

造作庄田犹未已，堂上哭声身已死。哭人尽是分钱人，口哭元来心里喜。

对富人兼并穷人土地，揭露得较为彻底。《敦煌掇瑣》中收有王梵志诗九十二首，其中如[1]。

耶娘绝年迈，不得离旁边。晓夜专看待，仍须省睡眠。

兄弟相怜爱，同生莫异居。为人欲得别，此则是兵奴。

停客勿叱狗，对客莫频眉。供给千馀日，临时请不饥。

贷人五米，送还一硕粟。算时应有馀，剩者充白直。

无亲莫充保，无事莫作媒。虽失乡人意，终身无祸害。

尊人同席饮，不问莫多言。纵有文章好，留将馀处宣。

诗的内容，无非是教人要对父母孝顺，兄弟和睦，对待客人要尊敬，借了债要倍利偿还，莫管闲事，不做保，不做媒，在长辈面前，不要炫耀自己才能，还有劝人信佛行善等等，根据它的教旨，无非是用来巩固封建社会的秩序的一套格言。

在《敦煌掇瑣》中还有一组诗歌，经近代学人考订，也是王梵志的诗。

你道生胜死，我道死胜生。生即苦战死，死即无人征。十六（中男）作夫役，二十充府兵。碛里向前走，衣钾（甲）困须擎。白日趁食地，每也（夜）悉知更。铁钵淹甘（乾）饭，同火共分争（纷争）。长头饥欲死，肚似欲穷坑。遗儿我受苦，慈母不须生。相将归去来，问否浮（弗）可停

天下恶官职，不过是府兵。四面有贼劫，当日即须行。有缘重相见，业薄即隔生。逢贼被打煞，五品无人争（争）。

妇人因（困）重役，男儿重征行。带刀拟开煞，逢阵即相刑。将军马上

死，兵灭地君（敌军）营。血流遍荒野，白骨在边庭。去马游残迹，空流（留）纸上名。关山千万里，影绝故乡城。生受刀光苦，意里极皇皇。以上三首诗，是说府兵痛苦的。

贫穷田舍汉，菴子（真）孤凄。两共前生种，今世作夫妻。妇即客春捣，夫即客扶犁。黄昏到家里，无米复无柴。男女空饿肚，状似一食斋。里正追庸调，村头共相催。袱头巾子露，衫 肚皮开。体上无裨袴，足下复无鞋。丑妇来恶骂，啾唧 头灰，里正被脚蹴，村头被拳搓。驱将见朋友，打脊趁回来。租调无处出，还须里正倍（赔）。门前见债主，入户见贫妻。舍漏儿啼哭，重重逢苦灾。如此更穷汉，村村一两（枚）。

男女有亦好，无时亦最精。儿在愁他役，又恐点着征。一则无租调，二则绝兵名。闭门无呼唤，耳里捏星星。

生时同毡被，死则嫌尸妨。臭秽不中停，火急须埋葬。早死无差科，不愁怕里长。行行展脚卧，永绝呼征防。生促死路长，久住何益当。贫苦农民在租庸调的剥削下，饥饿困苦，生既不可，死又不得，在诗篇里充分反映了出来。

工匠莫学巧，巧即他人使。身是自来奴，妻亦官人婢。夫婿暂时无，曳将仍被耻。未作道与钱，作了擘眼你。

工匠巧儿的生活，也没有保障，给人作工，作了却不给钱。女工还要受人糟蹋凌辱。

富饶田舍儿，论请实好事。度种如（屯）田，宅舍青烟起。糟上饲肥马，仍更买奴婢。牛羊共成群（群），满圈养生（豚）子。窖内多埋谷，寻常愿米贵。里正追役来，坐着南厅里。广设好饮食，多酒劝遣醉。追车即与车，须马即与使。须钱即与钱，和市亦不避。索面驴驮送，续後更有雉。官人应须物，当家皆具备。县官与恩泽，曹司一家事，纵有重差科，有钱不怕你。在这种不平等的阶级社会里，只有富裕的地主能够应付过来，“寻常愿米贵”，他们还囤积居奇，以攫取更多的财富。

佐史非台补，任官州县上。未是好出身，丁儿避征防。不虑弃家门，狗偷且就养。每日求行案，寻常恐进杖。食即众厨餐，童儿更护当。事事遣案追，出帖付里正。火急促将来，险语唯须胱（谎）。前人心里怯，乾唤愧曹长。纸笔见续到，仍送一缣想（饷）。钱多早发遣，物少被颡颡。解须除却名，楷赤（开释）将头（他）放。诗篇中写佐史的生活和贪污情形，也比较形象。

兴生市郭儿，从头市内坐。例（利）有百余千，火下三五个。行行皆有铺，铺里有杂货。山彰（障）买物来，巧语能相和。眼勾稳物着，不肯遣放过。意尽端坐取，得利遇（过）一倍。 ，分毫擘眼睁（争）。他买抑遣贱，自买（卖）即高擎。心里无平等，尺寸不分明。名沾是百姓，不肯远征行，不是人强了，良由孔方兄。诗篇中写出商贾分毫必争，精打细算的形象。一切向着钱看。

世间慵懒人，五分向有二。例着一草衫，两膊成山字。出语嘴头高，诈作达官子。草舍元无休，无毡复无被。他家人定卧，日西展脚睡。诸人五更走，日高尚未起。菜粥吃一 ，街头阔立地。逢人若共语，荒（谎）说天下事：“朝庭数千人，平章共博戏。”（此两句原在日高未起下，今移此）唤女作家生，将儿作奴使。妻即赤体行，寻常饥欲死。诗篇中很形象地描述出一个不事生产，专事吹牛说谎的家伙。

世间乱浩浩，贼多好人少。逢着光火贼，大堡抄少（小）堡。从这寥寥四句中，说明了即在唐王朝前期，光火大盗，已经‘大堡打小堡’，阶级斗争已经非常尖锐了。

王梵志的诗歌，虽然有一部分反映了唐初的阶级矛盾和社会问题，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宣扬佛教的。王梵志教导人们说：“虚沾一百年，八十最是老。长命得八十，不解学修道。悠悠度好日，无心念三宝。报（抱）拳入地狱，天堂无人到。折破五戒身，却入三恶道。一入恒沙劫，不须自懊恼。”劝人归依佛教，因此这些诗篇的基调，还是非常低沉的。[四]

在《太平广记》卷二百五十七引《卢氏杂说》里，提到“唐卢氏子，不中第，徒步及都城门东。其日风寒甚，且投逆旅。俄有一人续至附火。良久，忽吟诗曰：‘学织缭绫功未多，乱投机杼乱抛梭。莫教宫锦行家见，把此文章笑杀他。’又云‘如今不重文章事，莫把文章夸向人。’卢愕然，忆是白居易诗（莫把文章夸向人两句系白居易诗）。因问姓名，曰：“姓李，世织绫锦，离乱前，属东都官锦坊宫锦巧儿，以薄艺投本行，皆云如今花样与前不同……且东归去。”

上面所引宫锦巧儿的诗，反映了绫锦技巧，不断在改进，有些宫锦巧儿只懂得老花样，而这些老花样，实际都已过时了，式样不时髦了，因此宫锦巧儿就被淘汰下来了。这首诗充分反映了新花样的时行，老花样的被淘汰。

唐代的民谣，也有很多包含着新鲜的内容。

唐高宗永淳元年（公元六八二年）秋七月，东都大雨，人多殍殍，童谣曰：

新禾不入箱，新麦不入场。迨及八九月，狗吠空垣墙。《朝野僉载》云：“唐王熊为泽州都督，昏愤糊涂，前人尹正义为都督，公平。”百姓为之歌曰：

前得尹佛子，後得王癡獡。判事驴咬瓜，唤人牛嚼沫。见钱满面喜，无襁（钱贯绳）从头喝。尝逢饿夜叉，百姓不可活。百姓用辛辣的语言，来揭露贪官污吏的丑恶形象。

唐德宗贞元二十年（公元八 四年），关辅饥旱，京兆尹李实方务聚斂以结於上，仍峻责租调，民穷无告，至撤屋瓦木，卖鬻麦苗，以供赋斂。优人成辅端作诗替百姓诉苦，诗云：

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贱田园。一顷麦苗硕伍米，三间堂屋二千钱。李实诉之於德宗，德宗以为成辅端诽谤国政，下令把他打杀。

又唐德宗时，战争连年，百姓夫妇离散。有葛鸦儿作诗云：

蓬鬓荆钗世所稀，布裙犹是嫁时衣。胡麻好种无人种，正是归时底不归。胡麻食之宜子，葛鸦儿借诗意以诉人民夫妇离别之苦。

南唐世有李询赋《赠织锦》诗云：

札札机声晓复晡，眼穿力尽意何如。美人一曲成千赐，心里犹嫌花样疏。

李家明，庐州（今合肥市）西昌人。南唐中主时，为乐部头。滑稽善讽谏。随中主出游，见牛晚卧树阴，中主曰：“牛且热矣。”家明曰：“臣不调，敢上绝句”。曰：

曾遇宁戚鞭敲角，又被田单火燎身。闲背斜阳嚼枯草，近来问喘定何人。汉宰相邴吉问牛喘，而南唐时宰相不关心民瘼，不问牛喘，所以李家明赋了这首诗来刺讥宰相，“时左右宰相皆惭，免冠谢罪”（龙袞《江南野史》）。

南唐中主既失淮南广大地区，金陵也受到后周军队的威胁，于是迁都南

昌，而令太子李煜（即后主）留守金陵。中主迁都时，“时既划江，舟楫多从南岸”。中主“北望皖公山（今安徽潜山县西），谓家明曰：‘好青峭数峰，不知何名耶？’家明应声对曰：‘龙舟轻颭锦帆风，正值宸游望远空。回首皖公上色翠，影斜不到寿杯中。’嗣主（中主）因惭，俯首而过。”（《江南野史》）

南唐危亡未露之前，有隐士史虚白作诗云：“风雨揭却屋，浑家（此指全家，非指老妻）醉不知。”讽论南唐君臣上下，纸醉金迷，亡国就在眼前。南唐主读后，为之变色。

李后主“作红罗亭子，四面栽红梅花，作艳曲歌之，韩熙载和之云：‘不须夸烂熳，已输了春风一半。’时已割淮南与周矣”（《十国春秋》）。

马令《南唐书》载：沈彬再过金陵诗云：

玉树歌终王气收，雁行高送石城秋。江山不管兴亡事，一任斜阳伴客愁。和许洞的诗，其基调是一致的。

唐五代词 诗和音乐的距离愈来愈远，到后来不能歌唱了，和音乐配搭密切的词，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了。词的音节和长短句方面形成固定的格律，作者只要倚声填词，填成，就可配合音乐，加以歌唱了。

敦煌石室发现的《云谣集》[五]和其他一些杂曲子词，其中不少是反映封建社会内妇女在爱情上的各种痛苦的。

狂夫数载，萍寄他乡。去便无消息，累换星霜。月夜愁听砧杵，拟塞雁行。孤眠鸾帐里，枉劳魂梦，夜夜飞扬。想君薄行，更不思量。谁为传书与，表妾衷肠。倚牖无言垂血泪，暗祝三光。万般无那处，一炉香尽，又更添香。（《云谣集·凤归云·闺怨》）

绿窗独坐，修得君书。征衣裁缝了，远寄边隅。想得为君贪苦战，不惮崎岖。终朝沙碛里，已凭三尺，勇战奸愚。岂知红脸，泪滴如珠。枉把金钗卜，卦卦皆虚。魂梦天涯无暂歇，枕上长嘘。待公卿回，故日容颜憔悴，彼此何如。（《云谣集·凤归云·闺怨》）

珠泪纷纷湿绮罗，少年公子负恩多。当初姊妹分明道，莫把真心过与他。子细思量著，淡薄知闻解好麽。（《云谣集·抛球乐》）

宝髻钗横坠鬓斜，殊容绝胜上阳家。蛾眉不扫天生绿，蝉脸能匀似早霞。无端略入後园看，羞杀庭中数树花。（《云谣集·抛球乐》）《云谣集》以外，敦煌发现的曲子词中，如：

天上月，遥望一团银。夜久更阑风渐紧。为奴吹散月边云，照见负心人。（《望江南》）

悔嫁风流婿，风流无准凭。攀花折柳得人憎。夜夜归来沉醉，千声唤不应。回觑帘前月，鸳鸯帐里灯，分明照见负心人。问道些须心事，摇头道不曾。（《南歌子》）这是封建社会内妇女对负心男子汉的控诉。

莫攀我，攀我太心偏。我是曲江临池柳，者人（这人）折去那人攀，恩爱一时间。（《望江南》）反映了妓女的生活，更是悲惨。文人填词，是从李白开始的。李白有两首词，是令人叫绝的：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霸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忆秦娥》）

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菩萨蛮》）声律铿锵，可裂金石，《唐宋诸贤绝妙词选》誉二词为百代词曲之祖，我看一些也不过

誉。韦应物的词，也别具风格：

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调笑令》）戴叔伦的词：

边草，边草，边草尽来兵老。山南山北雪晴，千里万里月明。明月，明月，胡茄一声愁绝。（《调笑令》）王建的词：

扬州桥边少妇，长干市里商人。三年不得消息，各自拜鬼求神。（《三台》）

团扇，团扇，美人频来遮面。玉颜憔悴三年，谁复商量管弦。弦管，弦管，春草昭阳路断。（《调笑令》）张志和，婺州金华人。肃宗时，待诏翰林。后不复仕进，居江湖间，自称烟波钓叟。张志和的词：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渔父》）白居易的词：

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花非花》）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忆江南》）

前度小花静院，不比寻常时见。见了又还休，愁却等闲分散。肠断，肠断，记取钗横鬓乱。（《如梦令》）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长相思》）

中晚唐文坛上有两种变化和倾向，一种倾向如韩愈，开始试以古文笔法，写作五七言古诗，下开宋人苏轼等诗人以古文笔法作五七言古诗之先河，这样，音律的约束，更其松懈了，并且从辞藻的修饰中解放出来，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另一种倾向如温庭筠，开始以艳丽的文体来写长短句的词，抒情诗向词的方向发展，也给后人开辟了独特的蹊径，这样，词和音律的结合，更其紧密了。这两者在向两极发展，而且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温庭筠的词：

似带如丝柳，团酥握雪花，帘卷玉钩斜。九衢尘欲暮，逐香车。（《南歌子》）

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苹洲。（《梦江南》）

凭绣槛，解罗帏。未得君书，断肠潇湘春雁飞。不知征马几时归。海棠花谢也，雨靡靡。（《遐方怨》）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菩萨蛮》）

柳丝长，春雨细，花下漏声迢递。惊塞雁，起城乌，画屏金鹧鸪。香雾薄，透帘幕，惆怅谢家池阁。红烛背，绣帘垂，梦长君不知。（《更漏子》）

玉垆香，红蜡泪，偏照画堂秋思。眉翠薄，鬓云残，夜长衾枕寒。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更漏子》）皇甫松的词：

菡萏香连十顷陂，小姑贪戏采莲迟。晚来弄水船头湿，更脱红裙裹鸭儿。（《采莲子》）

船动湖光滟滟秋，贪看少年信船流。无端隔水抛莲子，遥被人知半日羞。（《采莲子》）唐昭宗於乾宁三年（公元八九六年），避兵华州，曾做了两首《菩萨蛮》词，其第一首：

登楼遥望秦宫殿，茫茫只见双飞燕。渭水一条流，千山与万丘。远烟笼碧树，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归大内中。司空图的词：

买得杏花，十载归来方始拆。假山西畔药阑东，满枝红。旋开旋落旋成空。白发多情人更惜，黄昏把酒祝东风，且从容。（《酒泉子》）韩偓的词：侍女动妆奁，故故惊人睡。那知本未眠，背面偷垂泪。懒卸凤凰钗，羞入鸳鸯被。时复见残灯，和烟坠金穗。（《生查子》）

秋雨五更头，桐竹鸣骚屑。却似残春间，断送花时节。空楼雁一声，远屏灯半灭。绣被拥娇寒，眉山正愁绝。（《生查子》）风光旖旎，辞藻艳丽，具有韩偓的诗词特色。张曙的词：

枕障熏炉隔绣帏，二年终日苦相思，杏花明月始应知，天上人间何处去，旧欢新梦觉来时，黄昏微雨画帘垂。（《浣溪沙》）

韦庄的词，是与温庭筠齐名的，世称温韦。韦庄的词，清艳绝伦，初日芙蓉，春月杨柳，使人想见风度。王国维誉之为“骨秀”。

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思帝乡》）

红楼别夜堪惆怅，香灯半卷流苏帐。残月出门时，美人和泪辞。琵琶金翠羽，弦上黄莺语。劝我早归家，绿窗人似花。（《菩萨蛮》）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於天，画船听雨眠。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菩萨蛮》）

如今却忆江南乐，当时年少春衫薄。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翠屏金屈曲，醉入花丛宿。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菩萨蛮》）

洛阳城里春光好，洛阳才子他乡老。柳暗魏王堤，此时心转迷。桃花春水绿，水上鸳鸯浴。凝恨对残晖，忆君君不知。（《菩萨蛮》）

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别君时，忍泪佯低面，含羞半敛眉。不知魂已断，空有梦相随。除却天边月，没人知。（《女冠子》）

春欲暮，满地落花红带雨。惆怅玉笼鹦鹉，单栖无伴侣。南望去程何许，问花花不语。早晚得同归去，恨无双翠羽。（《归国遥》）

金翡翠，为我南飞传我意。罨画桥边春水，几年花下醉。别后只知相愧，泪珠难远寄。罗幕绣帏鸳被，旧欢如梦里。（《归国遥》）

绿槐阴里黄莺语，深院无人春昼午。画帘垂，金凤舞，寂寞绣屏香一炷。碧天云，无定处，空有梦魂来去。夜夜绿窗风雨，断肠君信否。（《应天长》）

《菩萨蛮》四首，大概都是流寓江南之作，此时韦庄尚想终老江南。後面几首，写别情离恨，如怨如诉。时中原板荡，关洛扰攘，住既不能，终走西蜀，而惓惓故国之思，语淡而悲，不堪卒读。

五代十国时期，词的发展和造诣，又远远超越过唐代，但就内容来讲，诗和词还是有所分工的。当时的诗人词客，喜欢采用诗的形式来叙写政治社会各种现象，而词的形式，只是用来抒写离情别绪，恨绿愁红的。就是说，词的内容，还比较狭窄。

和凝，字成绩，郢州须昌（今山东东平县西北）人。以进士擢第。後唐明宗天成（公元九二六至九三年）中，历翰林学士。後晋天福五年（公元九四四年），为宰相，卒于后周。和凝的词：

写得鱼笺无限，其如花锁春晖。目断巫山云雨，空教残梦依依。却爱熏香小鸭，羨他长在屏帏。（《河满子》）

越梅半拆轻寒里，冰清澹薄笼蓝水。暖觉杏梢红，游丝狂惹风。闲阶莎

径碧，远梦犹堪惜。离恨又迎春，相思难重陈。（《菩萨蛮》）牛希济，陇西人。前蜀王衍时，累官翰林学士、御史中丞。降於後唐，为雍州节度副使。牛希济的词：

春山烟欲收，天澹星稀小。残月脸边明，别泪临清晓。语已多，情未了。回首犹重道。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生查子》）

毛文锡，字平圭，南阳人。以进士擢第。仕前蜀为翰林学士，迁内枢密使，进文思殿大学士，拜司贬茂州司马，随王衍降唐。

毛文锡的词：

休相问，怕相问，相问还添恨。春水满塘生，鸂鶒还相趁。昨夜雨霏霏，临明寒一阵。偏忆戍楼人，久绝边庭信。（《醉花间》）

春夜阑，春恨切，花外子规啼月。人不见，梦难凭，红纱一点灯。偏怨别，是芳节，庭下丁香千结。宵雾散，晓霞晖，梁间双燕飞。（《更漏子》）

暮蝉声尽落斜阳，银蟾影挂潇湘。黄陵庙侧水茫茫。楚山红树，烟雨隔高唐。岸泊渔灯风刮碎，白苹远散浓香。灵娥鼓瑟韵清商。朱弦凄切，云散碧天长。（《临江仙》）魏承班，父弘夫，为前蜀主王建养子，赐姓名王宗弼，封齐王。承班为驸马都尉，官至太尉。

魏承班的词：

烟雨晚晴天，零落花无语。难话此时心，梁燕双来去。琴韵对熏风，有恨和情抚。肠断断弦频，泪滴黄金缕。（《生查子》）

李珣，字德润，梓州人。仕唐至谏议大夫。唐昭宗乾宁四年（公元八九七年）为两川宣论和协使。遂仕前蜀。

李珣的词：

回塘风起波纹细，刺桐花里门斜闭。残日照平芜，双双飞鹧鸪。征帆何处客，相见还相隔。不语欲魂消，望中烟水遥。（《菩萨蛮》）

隔帘微雨双飞燕，砌花零落红深浅。捻得宝箏调，心随征棹遥。楚天云外路，动便经年去。香断画屏深，旧欢何处寻。（《菩萨蛮》）

顾夔，前蜀王建时给事内廷，迁茂州刺史。後事後蜀孟知祥，官至太尉。

顾夔的词：

永夜香闺思寂寥，漏迢迢。鸳帏罗幌麝烟消，烛光摇。正忆玉郎游荡处，无寻处。更闻帘外雨潇潇，滴芭蕉。（《杨柳枝》）

永夜抛人何处去，绝来音。香阁掩，眉敛，月将沉。争忍不相寻，怨孤衾。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诉衷情》）

欧阳炯，益州华阳人。少事前蜀後主王衍，为中书舍人。後事後蜀主孟知祥及孟昶，累官翰林学士，进侍郎，门下同平章事。後蜀亡归宋，授左散骑常侍。

欧阳炯的词：

春去秋来也，愁心似醉醺。去时邀约早回轮，及去又何曾。歌扇花光蹴，衣珠泪滴新。恨身翻不作车尘，万里得随君。（《巫山一段云》）

三十六宫秋夜永，露华点滴高梧。丁丁玉漏咽铜壶，明月上金铺。红线毯，博山炉，香风暗触流苏。羊车一去长青燕，镜尘鸾影孤。（《更漏子》）

翠眉双脸新妆薄，幽闺斜卷青罗幕。寒食百花时，红繁香满枝。双双梁燕语，蝶舞相随去。肠断正思君，闲眠冷绣茵。（《菩萨蛮》）

毛熙震，仕后蜀孟氏，至秘书监。

毛熙震的词：

春光欲暮，寂寞闲庭户。粉蝶双双穿槛舞，帘卷晚天疎雨。含愁独倚闺帏，玉炉烟断香微。正是销魂时节，东风满树花飞。（《清平乐》）

梨花满院飘香雪，高楼夜静风筝咽。斜月照帘帷，忆君和梦稀。小窗灯影背，燕语惊愁态。屏掩断香飞，行云山外归。（《菩萨蛮》）

张泌的诗，已见，他的词：

钿毂香车过柳堤，桦烟分处马频嘶，为他沉醉不成泥。花满驿亭香露细，杜鹃声断玉蟾低，含情无语倚楼西。（《浣溪沙》）

柳色遮楼暗，桐花落砌香。画堂开处远风凉，高卷水精帘额衬斜阳。（《南歌子》）

岸柳拖烟绿，庭花照日红。数声蜀魄入帘栊，惊断碧窗残梦画屏空。（《南歌子》）

古树噪寒鸦，满庭枫叶芦花。画灯当午隔轻纱，画阁珠帘影斜，门外往来祈赛客，翩翩帆落天涯。回首隔江烟火，渡头三两人家。（《河渚神》）

渺莽云水，惆怅暮帆，去程迢递。夕阳芳草，千里万里，雁声无限起。梦魂悄断烟波里，心如醉，相见何处是。锦屏香冷无睡，被头多少泪。（《河传》）

孙光宪，字孟文，陵州（今四川仁寿县）人。为荆南高从晦掌书记，历检校秘书，兼御史大夫。

孙光宪的词：

小庭花落无人扫，疏香满地东风老。春晚信沉沉，天涯何处寻。晓堂屏六扇，眉共湘山远。争奈别离心，近来尤不禁。（《菩萨蛮》）

木棉花映丛祠小，越禽声里春光晓。铜鼓与蛮歌，南人祈赛多。客帆风正急，茜袖偎檣立。极浦几回头，烟波无限愁。（《菩萨蛮》）

寂寞掩朱门，正是天将暮。暗澹小庭中，滴滴梧桐雨。绣工夫，牵心绪，配尽鸳鸯缕。待得没人时，偎倚论私语。（《生查子》）

愁肠欲断，正是青春半。连理分枝鸾失伴，又是一场离散。掩镜无语眉低，思随芳草凄凄。凭仗东风吹梦，与郎终日东西。（《清平乐》）

等闲无语，春恨如何去。终是疏狂留不住，花暗柳浓何处。尽日目断魂飞，晚窗斜界残晖。长恨朱门薄暮，绣鞍驴马空归。（《清平乐》）

留不得，留得也应无益。白紵春衫如雪色，扬州初去日。轻别离，甘抛掷，江上满帆风疾。却羡彩鸳三十六，孤鸾还一双。（《谒金门》）

渚莲枯，宫树老，长洲废苑萧条。想像玉人空处所，月明独上溪桥。经春初败秋风起，红兰绿蕙愁死。一片风流伤心地，魂销目断西子。（《思越人》）孙光宪借长短句来抒写情怀，有时又借女子口吻，来抒写离情别怨，都是比较成功的。

徐昌图，莆田人，初仕闽，入宋为国子博士，累迁至殿中丞。

徐昌图的词：

饮散离亭西去，浮生常恨飘蓬。回头烟柳渐重重，淡云孤烟远，寒日暮天红。今夜画船何处，潮平淮月朦胧。酒醒人静奈愁浓。残灯孤枕梦，轻浪五更风。（《临江仙》）

许岷，不知何许人，他的词载入《尊前集》。

江南日暖芭蕉展，美人折得亲裁剪。书成小简寄情人，临行更把轻轻捻。其中捻破相思字，却恐郎疑踪不似。若还猜妾倩人书，误了平生多少事。（《木兰花》）

冯延巳在词方面的造诣 五代十国词人中，有三大家，即前蜀之韦庄、南唐之冯延巳、南唐後主李煜。韦庄作品已见，这里介绍冯延巳。

冯延巳，字正中，广陵人。仕南唐，中主李璟时，位至宰相。

冯延巳的词：

谁道闲情抛掷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日日花前常病酒，敢辞镜里朱颜瘦。河畔青芜堤上柳，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独立小楼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後。（《鹊踏枝》）

萧索清秋珠泪坠，枕簟微凉，展转浑无寐。残酒欲醒中夜起，月明如练天如水。阶下寒声啼络纬，庭树金风，悄悄重门闭。可惜旧欢携手地，思量一夕成憔悴。（《鹊踏枝》）

几日行云何处去，忘却归来，不道春将暮。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泪眼倚楼频独语，双燕归来，陌上相逢否？撩乱春愁如柳絮，悠悠梦里无寻处。（《鹊踏枝》）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入秋千去。（《鹊踏枝》）

六曲阑干偎碧树，杨柳风轻，展尽黄金缕。谁把钿筝移玉柱，穿帘海燕惊飞去。满眼游丝兼落絮，红杏开时，一霎清明雨。浓睡觉来慵不语，惊残好梦无寻处。（《鹊踏枝》）

小堂深静无人到，满院春风，惆怅墙东，一树樱桃带雨红。愁心似醉兼如病，欲语还慵，日暮疏钟，双燕归栖画阁中。（《采桑子》）

洞房深夜笙歌散，帘幕重重，斜月朦胧，雨过残花落地红。昔年无限伤心事，依旧东风，独倚梧桐，闲想闲思到晓钟。（《采桑子》）

冷红飘起桃花片，青春意绪阑珊。画楼帘幕卷轻寒。酒余人散后，独自凭阑干。夕阳千里连芳草，风光愁杀王孙。徘徊飞尽碧天云。凤城何处，明月照黄昏。（《临江仙》）

雨晴烟晚，绿水新池满。双燕飞来垂柳院，小阁画帘高卷。黄昏独倚朱栏，西南新月眉弯。砌下落花风起，罗衣特地春寒。（《清平乐》）

风乍起，吹绉一池春水。闲引鸳鸯香径里，手授红杏蕊。斗鸭阑干独倚，碧玉搔头斜坠。终日望君君不至，举头闻鹊喜。（《谒金门》）

江水碧，江上何人吹玉笛，扁舟远送潇湘客。芦花千里霜月白。伤行色，来朝便是关山隔。（《归国谣》）

宿莺啼，乡梦断，春树晓朦胧。残灯吹烬闭朱栊，人语隔屏风。香已寒，灯已绝，忽忆去年离别。石城花雨倚江楼，波上木兰舟。（《喜迁莺》）

玉炉烟，红烛泪，偏对画堂秋思。眉翠薄，鬓云残，夜长衾枕寒。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更漏子》）

霜积秋山万树红，倚帘楼上挂朱栊。白云天远重重恨，黄叶烟深淅淅风。仿佛梁州曲，吹在谁家玉笛中。（《抛球乐》）

南浦，南浦，翠鬟离人何处。当时携手高楼，依旧楼前水流。流水，流水，中有伤心双泪。（《三台令》）词到了冯延巳，不但辞采清丽，情致婉约，而且在形象思维方面，也具有较高造诣。他对于词境界的探索和扩展，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南唐後主李煜 南唐中主李璟留传下来的词只有四首，其中二首：

手卷真珠（帘）上玉钩，依旧春恨锁重楼。风里落花谁是主，思悠悠。

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回首绿波三楚暮，接天流。（《摊破浣溪沙》）

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无限恨，倚阑干。（《摊破浣溪沙》）

后主李煜，国亡前留下来的作品不多，如：

花明月暗笼轻雾，今宵好向郎边去。划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好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菩萨蛮》）

红日已高三丈透，金炉次第添香兽，红锦地衣随步绉。佳人舞点金钗溜，酒恶时拈花蕊嗅，别殿遥闻箫鼓奏。（《浣溪沙》）

樱桃落尽春归去，蝶翻金粉双飞。子规啼月小楼西，曲栏金箔，惆怅卷金泥。门巷寂寥人去後，望残烟草低迷。炉烟闲袅凤凰儿，空持罗带，回首恨依依。（《临江仙》）苏辙题跋其后云：“凄凉怨慕，真亡国之音也。”

後主入宋以后，羈居别宅，写出亡国之痛，内容更为凄切深刻，如：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销磨。最是仓黄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破阵子》）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

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望江南》）

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清平乐》）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乌夜啼》）

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秋风庭院藓侵阶。一任珠帘闲不卷，终日谁来。金锁已沉埋，壮气蒿莱。晚凉天净月华开。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浪淘沙》）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令》）

真是亡国之音哀以思，词情凄怨，如其身世。

**唐代传奇小说** 唐初，尚沿习六朝志怪的馀习，无论人物塑造、情节描写，都比较粗糙，不够细腻。而且由於南北朝以来，随着佛教迷信的广泛传播，因果报应之说流毒无穷，志怪小说也随着佛教哲学的发展而专以讲因果报应为其主要内容。

隋唐间人唐临著《冥报记》，顾名思义，它是一部传播宗教迷信的故事小说。但作者为了要取信於人，也不得不采取一些社会生活中实际的例子，作为故事的素材。由於这一缘故，从这些故事的侧面也反映出封建社会内残酷和黑暗。举一则故事为例：

北齐时，有仕人姓梁，甚豪富，将死，谓其妻子曰：“吾平生所爱奴及马，皆使用日久，称人意，吾死，以为殉；不然，无所乘也。”及死，家人以囊盛土压奴杀之。（下略）这一则故事的下半段，大都是宣传佛法无边的宗教迷信的。但上面所叙述的一些内容，有助於我们对当时黑暗社会的了解，

有时这类宝贵材料在正史里是找不到的。

唐高宗时，释道世撰集《法苑珠林》，把佛教因果报应的故事，收集在一起。这种以佛教思想为基础的小说故事，由於迷信成份十分浓厚，因此毒害人民也十分严重。但其中有些作品，在僧侣宣讲时，为了要取信於人，於是把故事情节尽量写得逼真，这样就能收到传播佛教的预期效果。既然要把情节编造得比较真实，使人听了相信若有其人，若有其事，那麽在这些构造故事素材的折光中，就也不可能不透露出一些社会现实的黑暗面来。如《法苑珠林》卷三十七引释道宣《续高僧传》（《华严经传记》中也载着这则故事），叙述隋文帝代周，重兴佛法，一时佛教气氛弥漫全国。在这种宗教迷信气氛笼罩之下，僧侣们为了要重新建立寺院的雄厚经济基础，便由僧徒们到各处去化缘，“兴建福会”，欺骗人民，搜括财富。於是就编出了下面一则故事：

大万村中有田遗生者，家途壁立，而有四女；妻著弊布，至膝而已，四女赤露，迥无条线。大女名华严，年已二十，惟有粗布二尺，拟充布施。[普]安引村众次至其门，愍斯贫苦，遂度不入。大女思念，“由我贫煎，不及福会。今又不修，当来（将来）何救？”周编求物，阗无一物，仰面悲号，遂见屋藿一把乱糜，用塞明空。挽取抖藪，拟用随喜。身既无衣，待至夜暗，匍匐而行，趣斋供所。以前施物，遥掷众中；十馀粒米，别奉炊饭。因发愿曰：“女人穷困，由昔种慳业，今得穷报，困苦如是。今竭贫行施，用希来报。”作此愿已，以此十粒黄米，投饭甑中。“必若至诚，贫业尽者，当愿所炊之饭，变成黄色。如无所感色，命也奈何！”作此誓已，掩泪而返。於是甑中五石米饭，并成黄色。大众惊叹，未知所以，周寻缘构，乃云田遗生女之愿力也。斋会齐率，获粟十斛，寻济之女。安办法衣，仍度华严，送入京寺。

这一则故事，有很多迷信毒素和违反事实的地方，应该批判。如普安经过华严家的门口而不入，说是“愍斯贫苦”，实际是无利可图，才不进去。如代华严的口，说“昔种慳业，今得穷报”，“今竭贫行施，用希来报”。这完全想通过华严的话，来宣传因果报应，散播佛教毒素。如说一锅子饭，都变成黄色，除非是饭烧焦了，或者募化来的陈年粮食，蒸郁变色了，否则完全违反科学逻辑，不足一驳。最後叙述安办法衣，募华严出家於寺，充当尼姑，这更是僧尼的一种毒辣手段和卑鄙的宣传方法，实际把年方二十的华严送进活地狱去。这些都应该加以分析批判。除此之外，也暴露了封建历史工作者所艳称的隋文帝开皇时代，这是一个国力和社会经济富强的时期，可是在首都大兴城附近的终南山区大万村，农民的生活却如何地困难，贫苦农民的女儿，虽长到二十岁，尚且有赤露无衣的，饭吃不上更不用说了。这些事实，在正史里有时是看不到的，可是却能从这些宗教迷信故事的侧面，把它真实地反映了出来。因此尽管宣扬宗教迷信的书，也有它一定的史料价值和具体社会内容。当然，其全书主要是宣传宗教迷信，是为宗教服务的东西，决不可以全部加以肯定。

唐代的传奇，就是在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不同的，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内容，基本上含有许多迷信和不科学的成份。而唐代传奇，虽然也有迷信和不科学的成份，但开始从描写神怪故事转而描写社会生活，题材较前有了扩大，写作艺术较前有了提高。

隋唐间人王度，据说是文中子王通的弟弟，著《古镜记》（见《太平广

记》卷二百三十引《异闻集》)。故事是这样的：“隋汾阴侯生，奇士也。”临死，赠王度一面古镜。“镜横径八寸，鼻作麒麟蹲伏之像；绕鼻列四方龟龙凤虎，依方陈布四方；外又设八卦，卦外置十二辰位而具畜焉。辰畜之外，又置二十四字，周绕轮廓。”王度获得这面古镜后，大业七年（公元六二一年）“六月，度归长安，至长乐坡，宿于主人程雄家，雄新受寄一婢，颇甚端丽，名曰鸚鵡。”王度偶然引镜照见鸚鵡，鸚鵡自说是精魅狐狸所变，经古镜一照，不能活了，果然“化为老狸而死。”大业六年，王度弟王绩将“游嵩山少室，降石梁，坐石坛。属日暮，过一嵌岩，有一石堂，可容三五人，[王]绩栖息止焉。月夜二更后，有两人，一貌胡，须眉皓而瘦，称山公。一面阔，白须眉长，黑而矮，称毛生。”“绩疑其精怪，引手潜后开匣取镜，镜光出而二人失声俯伏，矮者化为龟，胡者化为猿。悬镜至晓，二身俱殒，龟身带绿毛，猿身带白毛。”其他灵验很多，大都荒诞不经。后来王绩又把古镜还给王度，到了大业十三年（公元六二七年），镜在“匣中悲鸣”，“开匣视之，即失镜矣。”故事就以这样而结束。

唐初又有《补江总白猿传》，撰人不著名氏。是对唐初书法家欧阳询开玩笑的一篇小说。因为欧阳询的样子活像猕猴，所以作者虚构这则故事，说欧阳询的母亲在岭南曾被白猿精摄去，怀孕了欧阳询。后来欧阳询的父亲欧阳颀冒险寻妻，杀死白猿，夺回爱妻，所以欧阳询生出来很像猕猴。欧阳询少时，父欧阳颀被杀，颀素与江总善，询为江总抚养长大。这则虚构的《白猿传》故事，便被说成是从江总口里传述出来的。故事情节还明显地受到佛教文学的深刻影响。（原文收在《太平广记》卷四百十四里）

《游仙窟》，张文成撰，张鷟，字文成，调露（公元六七九至六八一年）初，以进士擢第。开元初，官终司门员外郎。他还著有《朝野僉载》、《龙筋凤髓判》。《游仙窟》，中土久佚，日本有全文保存下来。叙述张文成出使河源，道中夜投大宅，逢二女曰十娘、曰五嫂，宴饮欢笑，以诗相调，止宿而去。文近骈俪而时杂鄙语，今略录其升堂燕饮时情状于下：

十娘唤香儿为少府设乐，金石并奏，箫管间响，苏合调琵琶，绿竹吹笙，仙人鼓瑟，玉女吹笛，……清音咿啾，片时则梁上尘飞，雅韵铿锵，卒尔则天边雪落。一时忘味，孔丘留滞不虚，三日绕梁，韩娥余音是实。……两人俱起舞，共劝下官。……遂舞著词曰：“从来巡绕四边，忽逢两个神仙。眉上冬天出柳，颊中旱地生莲。千看千处妩媚，万看万种妍。今宵若其不得，刺命过与黄泉。”又一时大笑。舞毕……十娘咏曰：“得意似鸳鸯，情乖若胡越。不向君边尽，更知何处歇。”十娘曰：“儿等并无可收采，少府公云冬天出柳，旱地生莲，总是相弄也。”

作品的思想，只是描写了偶然的风流艳遇，其中还夹杂着一些色情描绘，但比之《古镜记》、《白猿传》，已经除去怪诞的色彩。在写作技巧上，还有一个特色，即散文和骈文的互用。

沈既济，苏州吴人，以杨炎荐，召拜左拾遗，史馆修撰。炎得罪，既济亦贬为处州司户参军。后卒于礼部员外郎。他著小说《枕中记》（载《太平广记》卷八十二引《异闻集》，题曰《吕翁》）：

开元十九年，道者吕翁经邯郸道上，邸舍中设榻施席，担囊而坐，俄有邑中少年卢生，……亦止邸中……久之，卢生……乃叹曰：“大丈夫生世不谐，而困如是乎……当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言讫，目昏思寐。是时主人蒸黄粱为饌，翁乃采囊中枕以授之，曰：“子枕此，

当令子荣适如志”……生俯首就之，寐中……娶清河崔氏女，女容甚丽，而产甚殷……明年，举进士，登甲科。解褐，授校书郎，应制举，授渭南尉，迁监察御史、起居舍人，为知制诰。三年即真，出典同州，寻转陕州……迁汴州，岭南道采访使，入京为京兆尹，……除御史中丞、河西陇右节度使……转御史大夫、礼部侍郎。……为当时宰相所忌，以飞语中之，贬端州刺史。三年，徵还，除户部尚书。未几，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嘉谋密命，一日三接，献替启沃，号为贤相。同列者害之，遂诬与边将交结，所图不轨，下狱。府吏引徒至其门，追之甚急，生惶骇不测，泣其妻子曰：“吾家本山东，良田数顷，足以御寒馁，何苦求禄，而今及此。思复衣短裘，乘青驹，行邯郸道中，不可得也”。引刀欲自裁，其妻救之得免。共罪者皆死，生独有中人保护，得减死论。出授驩牧，数岁，帝知其冤，复起为中书令，封赵国公，恩旨殊涯，备极一时。生有五子，……其姻媾皆天下族望。有孙十余人……后年渐老，屡乞骸骨，不许。及病……卒。卢生欠伸而寤，见其身方偃[蹇]于邸中，顾吕翁在傍，主人蒸黄粱尚未熟。

唐代士人，多歆慕功名，《枕中记》虽诡幻动人，但亦有所本。干宝焦湖庙祝以玉枕使杨林入梦，可能就是《枕中记》的蓝本。明人汤显祖的《邯郸记》，又是据此文而改写的。

《任氏传》，是沈既济的另一篇传奇名著（载《太平广记》卷四百五十二），文长不录。

沈亚之，字下贤，吴兴人。元和十年（公元八一五年），以进士擢第。太和（公元八二七至八三五年）初，为德州行营柏耆判官。柏耆败，亚之亦谪南康尉，终于郢州掾。

沈亚之的传奇文三篇，其一《秦梦记》，载《太平广记》卷二百八十二引《异闻集》。自述道出长安城，客橐泉邸舍。梦至秦，时秦穆公幼女弄玉婿萧史先死，公因命尚公主，题其门曰翠微宫，穆公遇亚之亦甚厚。一日，公主忽无疾卒，公追伤不已，命亚之作挽歌，曰：

泣葬一枝红，生同死不同。金钿坠芳草，香绣满春风。旧日闻箫处，高楼当月中。梨花寒食夜，深闭紫微宫。

穆公又使亚之作墓志铭，其铭曰：

白杨风哭兮，石鬣髻莎。杂英满地兮，春色烟和。珠愁粉瘦兮，不生绮罗。深深埋玉兮，其恨如何！居月余，穆公见亚之曰：“寡人每见子，即不能不悲悼。大夫盍适大国乎！”亚之将去，“公复命至翠微宫与公主侍人别。重入殿内，时见珠翠遗碎青阶下，窗纱檀点依然。宫人泣对亚之，亚之感咽良久，因题宫门诗曰：

君王多感放东归，从此秦宫不复期。春景自伤秦丧主，落花如雨泪胭脂。竟别去。”忽惊觉，身仍卧邸舍。《秦梦记》文辞婉约，情致骀荡。

在《太平广记》卷二百九十八引《异闻集》《太学郑生》条，沈亚之述郑生偶遇孤女，相依数年。一旦别去，白云：“我湖中鲛室之妹也，谪而从君，今岁满，无以久留君所。”乃与生诀。后十余年，生登岳阳楼，“有画舫浮漾而来”，“中一人起舞，含嚬怨慕”，即女也。而“风涛崩怒，遂不知所在。”以华丽之笔，叙恍惚之情，极窈窕之思。

元和十年（公元八一五年），沈亚之为泾源节度使李汇掌书记，有一天，听李汇说邢凤，帅家子，寓居长安平康里南，……买故豪洞门曲房之第，……梦一美人自西楹来”，歌《春阳曲》，其词曰：“长安少女踏春阳，何处春

阳不断肠。舞袖弓弯浑忘却，罗帷空度九秋霜。”过了不少天，诗人姚合又对沈亚之讲了一则故事。故事说，“吾友王生者，元和初夕，梦游吴，侍吴王，久之，闻宫中出犏吹箫击鼓，言葬西施。王悲悼不止，立诏门客作挽歌词，生应教为词曰：

西望吴王阙，云书凤字牌。连江起珠帐，择士葬金钗。满地红心草，三层碧玉阶。春风无处所，凄恨不胜怀。

词进，王甚佳之。及寤，能记其事”（《太平广记》卷二百八十二引《异闻录》）。沈亚之好述梦，尤好言仙鬼复死，然后记其悼思之情。不仅散文写得很好，诗亦情致缠绵。

陈鸿，贞元中，为主客郎中，与白居易友善，鸿著《长恨歌传》，居易著《长恨歌》。传云：

天宝末，兄国忠盗丞相位，愚弄国柄。及安禄山引兵向阙，以讨杨氏为辞。潼关不守，翠华南幸，出咸阳，道次马嵬，六军徘徊，持戟不进。从官郎吏伏上马前，请诛[晁]错以谢天下，国忠奉 纓盘水，死于道周。左右之意未决，上问之，当时敢言者请以贵妃塞天下之怒。上知不免，而不忍见其死，反袂掩面，使牵而去之，仓黄展转，竟就死于尺组之下。（《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六引）“杨贵妃故事，唐人本所乐道，然鲜有条贯如[《长恨》]传者，又得白居易作歌，故特为世间所知。清洪升撰《长生殿传奇》，即本此《传》及《歌》意也。”（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陈鸿又著有《东城老父传》：

老父姓贾，名昌……玄宗在藩邸时，乐民间清明节斗鸡戏。及即位，泊鸡坊于两宫间，索长安雄鸡，金毫铁距，高冠昂尾千数，养于鸡坊，选六军小儿五百人，使驯扰教饲……昌……召入为鸡坊小儿，衣食右龙武军……中谒者王承恩言于玄宗，召试殿庭，皆中玄宗意，即日为五百小儿长……天子甚爱幸之。金帛之赐，日至其家。开元十三年，笼鸡三百，从封东岳……十四年三月，衣斗鸡服，会玄宗于温泉，当时天下号为神鸡童。时人为之语曰：“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能令金距期胜负，白罗绣衫随软举。父死长安千里外，差夫持道挽丧车”……八月五日……千秋节……玄宗率皆在骊山，每至是日，万乐具举，六宫毕从。昌冠雕翠金华冠，锦袖绣襦袴，执铎拂道，群鸡叙立于广场，顾眄如神，指挥风生，树毛振翼，砺吻磨距，抑怒待胜，进退有期，随鞭指低昂，不失昌度。胜负既决，强者前，弱者后，随昌雁行，归于鸡坊。角觝、万夫、跳剑、寻橦、蹴球、踏绳，舞于竿巅者，索气沮色……天宝……十四载，胡羯陷洛，潼关不守，……昌变名姓，依于佛舍……旧里居室，为兵掠，家无遗物，布衣憔悴，不复得入禁门矣。（《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五）记贾昌于兵燹之后，追忆太平盛事，荣华零落，其语亦悲。

白行简，白居易之弟，贞元末，以进士擢第。官至主客郎中。宝历二年（公元八二六年），病卒。

白行简著《李娃传》（《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四），为世所传。故事的内容，有荥阳郑氏子，迷恋长安倡女李娃，“狎戏游宴，囊中尽空。乃鬻骏乘，及其家童，资财仆马荡然。”李娃的养母把他赶逐出来，最后流落在街头，被雇用于丧肆，为挽郎。“每歌《薤露》之章，举声清越，响振林木，曲度未终，闻者歔歔掩泣。”后来被他父亲知道，认为“志行若此，污辱吾门”，把他痛打到昏晕过去，认为已死，弃之而去。从此沦为乞丐。

一旦大雪，生为冻馁所驱，冒雪而出，乞食之声甚苦，闻见者莫不凄恻。时雪方甚，人家外户多不发，至安邑[里]东门，循里垣北转第七、八，有一门，独启左扉，即娃之第也。生不知之，遂连声疾呼，饥冻之甚，音响凄切，所不忍听。娃自阁中闻之，谓侍儿曰：“此必生也，我辨其音矣。”连步而出，见生枯瘠疥疠，殆非人状。……娃前抱其颈，以绣襦拥而归于西厢，失声长恸曰：“令子一朝及此，我之罪也。”李娃用尽一切力量，使郑生恢复健康，并鼓励他应举擢第。荣阳郑生既贵达，李娃认为自己出身倡家，郑氏是海内望族，“当结媛鼎族，……中外婚媾，无自黜也。”反映了唐代门阀制度之森严可怕。《李娃传》对于后来的小说，也影响很大。如元人著《曲江池》，明人薛近兗著《秀襦记》，都是以《李娃传》为蓝本的。

白行简又著《三梦记》（见《说郛》卷四），其第一梦云：

天后时，刘幽求为朝邑丞，尝奉使夜归，未及家十馀里，适有佛寺，路出其侧。闻寺中歌笑欢洽，寺垣短缺……刘俯身窥之，见十数人儿女杂坐，罗列盘馔，环绕之而共食。见其妻在坐中语笑，刘初愕然，不测其故……且思其不当至此……又熟视容止言笑无异。将就察之，寺门闭不得入，刘掷瓦击之，中其壘洗，破进散走，因忽不见。刘逾垣直入，与从者同视殿庑，皆无人，寺扃如故。刘讶益甚，遂驰归。比至其家，妻方寝，闻刘至，乃叙寒暄讫，妻笑曰：“向梦中与数十人同游一寺，皆不相识，会食于殿庭，有人自外以瓦砾投之，杯盘狼藉，因而遂觉。”刘亦具陈所见，盖所谓彼梦有所往而此遇之也。

元稹，元和、长庆间的名诗人，已有介绍。他著有《莺莺传》，亦称《会真记》。故事的经过是：“唐贞元中，有张生者，性温茂，美风容，……年二十三，未尝近女色。……无几何（没多少时），张生游于蒲，蒲之东十余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张生寓焉。适有崔氏孀妇将归长安，路出于蒲，亦止兹寺。崔氏妇，郑女也，张出于郑，绪其亲，乃异派之从母。是岁，浑瑊薨于蒲，……军人因丧而扰，大掠蒲人，崔氏……旅寓，惶骇不知所托。先是张与蒲将之党有善，请吏护之，遂不及于难。……郑厚张之德甚，因饰馔以命张。“见其女莺莺，生惑之，托崔之婢红娘，缀《春词》二首以通意。“是夕，红娘复至，持彩笺以授张，曰：‘崔所命也’，题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词曰：‘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张喜且骇，已而崔至，则端服严容，责其非礼，言毕，翻然而逝。

数夕，张生临轩独寝……则红娘敛衾敛枕而至，抚张曰：“至矣！至矣！”……俄而红娘捧崔氏而至，则娇羞融冶，力不能运支体，曩时端庄，不复同矣。是夕，旬有八日（十八日）也。斜月晶莹，幽晖半床……有顷，寺钟鸣，天将晓，红娘促去，崔氏娇啼宛转，红娘又捧之而去，终夕无一言。张生辨色而兴，自疑曰：“岂其梦邪！”及明，睹妆在臂，香在衣，泪光荧荧然，犹莹于茵席而已。是后复十余日，杳不复知……是时复容之，朝隐而出，暮隐而入，同安于曩所谓西厢者几一月矣……无何，张生将至长安，先以情论之，崔氏宛无难词，然而愁怨之容动人矣。将行之夕，不可复见，而张生遂西下。数月，复游于蒲，会于崔氏者又累月……张生俄以文调及期，又当西去……崔已阴知……徐谓张曰：“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乱之，君终之，君之惠也，则殁身之誓，其有终矣，又何必深感于此行。”……明旦而张行，明年，文战不胜，张遂止于京……后岁余，崔已委身于人，张亦有所娶，适经所居……求以外兄见，夫语之而崔终不

出……崔潜赋一章词曰：“自从消瘦减容光，万转千回懒下床。不为旁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竟不之见，后数日……又赋一章以谢绝云：“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

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自是绝不复知矣。元稹有重名，所以《会真记》为世所重。后人继作，宋赵德麟取其故事作《商调蝶恋花》，金则有董解元《弦索西厢》，元则有王实甫《西厢记》，关汉卿有《续西厢记》，明则有李日华《南西厢记》，陆采《南西厢记》等。

李公佐，陇西郡望，会昌（公元八四一至八四六年）中，为淮南节度使幕僚。著《南柯太守传》（见《太平广记》卷四百七十五《淳于棼》）：

东平淳于棼，吴楚游侠之士……落魄纵诞，饮酒为事。家住广陵郡东十里，所居宅南有大古槐一株，枝干修密，清阴数亩。棼于生日与群豪大饮其下。唐贞元七年（公元七九一年）九月，因沉醉致疾，时二友人于坐扶生归家，卧于堂东庑之下，二友谓生曰：“子其寢矣，予将秣马濯足，俟子小愈而去。”

淳于棼解巾就枕，昏然梦至槐安国，令尚公主，拜驸马都尉，出为南柯太守，在郡二十载，风化广被。生五男二女。后有檀萝国来侵南柯郡，生抵御败绩，未几，公主又薨，王命送生归家。既醒。

见家之僮仆，拥彗于庭，二客濯足于榻，叙日未隐于西垣，馀樽尚湛于东牖，梦中倏忽，若度一世矣。生感念嗟叹，遂呼二客……与生出外寻槐下穴……有大穴，根洞然明朗，可容一榻，上有积土壤以为城郭台殿之状，有蚁数斛，隐聚其中。中有小台，其色若丹，二大蚁处之，素翼朱首，长可三寸，左右大蚁数十辅之，诸蚁不敢近，此其王矣。即槐安国都也。又穷一穴，直上南枝，可四丈，宛转方中，亦有土城小楼，群蚁亦处其中，即生所领南柯郡也……追想前事，感叹于怀……不欲二客坏之，遽令掩塞如旧……复念檀萝征伐之事，又请二客访迹于外。宅东一里有古涸涧，侧有大檀树一株，藤萝拥织，上不见日，旁有小穴，隐聚其间，檀萝之国，岂非此耶？明汤显祖本之作《南柯记》。

公佐还著《谢小娥传》（《太平广记》卷四百九十一），小娥嫁历阳段居贞，夫妇与父皆习贾，往来江湖间。后段之弟兄、谢之僮仆数十人，并在江中为盗所杀。小娥亦投水伤胸折足，为他船拯起，至上元县，依妙果寺尼以居。后小娥变服男子服，为佣保於江湖间，遇贼于浔阳，知杀父者申兰，杀夫者申春也。小娥手斩申兰，擒申春鸣于官，其余党数十，亦悉就擒获。李复言演其文入《玄怪录》，明人则本其事作平话（见《拍案惊奇》十九）。

陇西李朝威著《柳毅传》（载《太平广记》卷四百十九），记“柳毅应举下第，将还湘滨，念乡人有客涇阳者，遂往告别”。至涇阳，“见有妇人牧羊于道畔”，曰：“妾洞庭龙君小女也。父母配嫁涇川[君]次子，而夫婿逸乐，为婢仆所惑，日以厌薄……又得罪舅姑，舅姑毁黜以至此。闻君将还吴，密通洞庭，或以尺书寄托侍者，未卜将以为可乎？”毅曰：“洞庭，深水也。吾行尘间，宁可致意邪！唯恐道途显晦，不相通达。”女曰：“洞庭之阴，有大橘树焉，乡人谓之杜橘。君……叩树三发，当有应者。”柳毅既致书于洞庭君，洞庭君弟钱塘君刚暴，杀婿取女归。洞庭君欲以女配毅，因毅严拒而止。后毅再丧妻，居家金陵，娶范阳卢氏，即龙女也。当觐洞庭，复徙居南海，且四十年，又归洞庭。开元末，毅表弟薛嘏谪官东南，当过洞庭，遇毅乘彩舟来，赠嘏仙药五十丸，一丸可增一岁。“自是已后，遂绝影

响”。金人取其事为杂剧，元尚仲贤据之作《柳毅传书》，翻案又为《张生煮海》，清李渔又折衷之而成《蜃中楼》。

蒋防著《霍小玉传》（《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七）。李益，年二十，以进士擢第。寓居长安，识名妓霍小玉，同居二年。后生授郑县主簿，与小玉坚约婚姻而别。及生覲母东都，始知已订婚中表卢氏，母素严，生不敢违，遂与小玉绝。小玉久不得生音问，竟卧病，踪迹招益，益亦不敢往。一日，益与同辈五六人诣崇敬寺玩牡丹花，步于西廊，递吟诗句。忽有黄衫豪士强邀之至霍氏家。一家惊喜，声闻于外。

玉沉绵日久，转侧须人，忽闻生来，忽然自起，更衣而出，恍若有神。遂与生相见，含怒凝视，不复有言。羸质娇姿，如不胜致。时复掩袂返顾李生，感物伤人，坐皆欷歔……因遂陈设，相就而坐。玉乃侧身转面，斜视生良久，遂举杯酒酌地曰：“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此。韶颜稚齿，饮恨而终，慈母在堂，不能供养，绮罗弦管，从此永休，徵痛黄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当永诀。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

乃引左手握生臂，掷杯於地，长恸号哭数声而绝。

最后，作品以浪漫主义的手法，说李益终娶卢氏，然为怨鬼所祟，竟以猜忌出其妻，至于三娶，莫不如是。由于这篇传奇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有一定成就，毋怪明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要说：“唐人小说纪闺阁事，绰有情致。此篇尤为唐人最精彩动人之传奇，故传诵弗衰”了。

许尧佐《柳氏传》，记韩翃娶柳氏为妾，天宝末，安禄山起兵，柳氏剪发毁形，寄迹法灵寺，韩翃后走山东，为淄青节度使侯希逸掌书记。翃尝寄柳氏诗曰：

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也应攀折他人手。

柳氏答：

杨柳枝，芳菲节，所恨年年赠离别。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没有多少时，有蕃将沙吒利，立军功，知柳氏名，劫之归。及韩翃随侯希逸自淄青入朝，知已失柳氏，欢想而已。一日偶于龙首冈辋冈中见柳氏。会淄青诸将合乐酒楼，使人请翃，翃强应之，然意色皆丧，音韵凄咽。有虞候许俊者知其事，谓翃曰：“请足下数字，当立致之。”乃直趋沙吒利第，曰：“将军中恶，使召夫人。”遂升堂出翃札示柳氏，挟之归。柳氏与翃执手涕泣。是时沙吒利恩宠殊等，懼等惧祸，乃诣李希逸告其事，希逸为闻之於朝，有诏柳氏宜还韩翃，沙吒利赐钱二百万。柳氏遂与韩翃偕老。其事又见于孟棻《本事诗》，可能是实录，故事不完全出于虚构。

《周秦行纪》一卷，托名牛僧孺撰，实际是李德裕门下士欲中伤牛僧孺所写（收入《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九）。用牛僧孺的第一人称：“予贞元中举进士落第，归宛叶间，至伊阙南道鸣皋山下”。因暮失道，夜宿汉薄太后庙中，因与神遇，与汉唐妃嫔宴饮，中有戚夫人、王昭君、潘淑妃、杨贵妃以及石家绿珠。宴饮甚欢，“太后问予：‘今天子为谁？’予对曰：‘今皇帝，先帝长子。’太真笑曰：‘沈婆儿作天子也，大奇！’”复赋诗，终以昭君侍寝，至明而行。“衣上香经十馀日不歇”。李德裕之党为了打击牛僧孺，利用伪造的《周秦行纪》来横加诬蔑，并谓牛僧孺在《周秦行纪》中至“戏[唐]德宗为沈婆儿”，又说“令人骨战，可谓无礼于其君甚矣”。毋怪鲁迅先生要说自来假小说以陷人，此为最怪了。[六]

《玄怪录》四卷，唐牛僧孺撰，《续玄怪录》四卷，唐李复言撰。这两部书，都经近人程毅中君校勘，有中华书局排印本。这两部志怪小说，在当时都是以行卷的形式把它写成并流通的。行卷不仅收录本人诗歌作为主要内容，有时也采用志怪、传奇作为内容，流利的散文，恢奇的故事，投献当世达官贵人，以邀其青睐，取得他们的激扬或推荐。宋赵彦卫《云麓漫钞》云：“唐之举人，先籍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行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

《玄怪录》和《续玄怪录》中许多篇文，大都被收在《太平广记》一书之中，现在就不一一介绍了。只有《续玄怪录》中一篇《辛公平上仙》条，《太平广记》之所不收，陈寅恪氏认为这篇志怪之篇，史料价值甚高。他说：“唐宪宗为内官所弑，阉人更隐讳其事，遂令一朝国史，于此大变，若有若无。”“故凡记载之涉及者，务思芟易改易，绝其迹象。”李复言《续玄怪录·辛公平上仙》条，“乃关于事变幸存之史料，岂得以其为小说家言，而忽视之耶？”（《金明馆丛稿》二编《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

《续玄怪录》卷一《辛公平上仙》条云：

洪州高要县尉辛公平、吉州卢陵县尉成士廉，同居泗州下邳县，于元和未偕赴调集，入洛西榆林店。掌店人甚贫，待宾之具，莫不尘秽，独一床似洁，而有一步客先憩于上矣。主人率皆重车马而轻徒步，辛、成之来也，乃逐步客他床。客倦起于床而回顾，公平谓主人曰：“客之贤不肖，不在车徒，安知步客非长者，以吾有一仆一马烦动乎！”因谓步客曰：“请公不起，仆就此憩矣。”客……遂复就寝。深夜，二人饮酒食肉……公平高声[谓步客]曰：“有少酒肉，能相从否？”一召而来，乃绿衣吏也。问其姓名，曰：“王臻。”言辞亮达，辞不可及。二人益狎之……行次闾乡，臻曰：“二君固明智之者，识臻何为者？……乃阴吏之迎驾者。”曰：“天子上仙，可单使迎乎？”曰：“是何言欤？甲马五百，将军一人，臻乃军之籍吏耳。”……过……华阴……宿灊上，臻曰：“此行乃人世不测者也，辛君能一观。”成公曰：“何独弃我？”曰：“……君命稍薄，故不可耳……入城当舍于开化坊西门北壁上第二板门王家，可直造焉。辛君初五更立灊西古槐下。”

及期，辛步往灊西……转盼间，一旗甲马立于其前，王臻者乘且牵，呼辛速登。既乘，观马前后，戈甲塞路。臻引辛谒大将军。将军者，丈余，貌甚伟……遂同行入通化门及诸街铺，各有吏士迎拜。次天门街……于是分兵五处，独将军与亲卫馆于颜鲁公庙……臻与公平止西廊幕次……居数日……得报曰：“已敕备夜宴。”于是部管兵马，戌时齐进，入光范[门]及诸门，门吏皆立拜宣政殿下，马兵三百，余人步，将军金甲仗钺来，立于所宴殿下，五十人从卒环殿露兵，若备非常者。

殿上歌舞方欢，俳优赞咏，灯烛荧煌，丝竹并作。俄而三更四点，有一人多髯而长……其状可畏，忽不知其所从来，执金匕首长尺许，拱于将军之前，延声曰：“时到矣。”将军频眉揖之，唯而走，自西厢历阶而上，当御座后，跪以献上。既而左右纷纭，上头眩，音乐骤散，扶入西阁，久之未出。将军曰：“升云之期，难违顷刻。上既命驾，何不遂行！”对曰：“上澡身否？”曰：“然，可即路。”遽闻具浴之声。

三[五]更，上御碧玉舆……肩舆下殿……将军……逐步从：……而出。自内阁及诸门吏，莫不呜咽群辞，或收血捧舆，不忍去者。过宣政殿，二百骑引，三百骑从，如风如雷，飒然东去，出望仙门。

将军乃敕臻送公平，遂勒马离队，不觉足已到一板门前，臻曰：“此开化[坊]王家宅，成君所止也。”……公平叩门一声，有人应者，果成君也。秘不敢泄。更数（月）[日]，方有攀髯之泣。鬼神当然是没有的，在当时，李复言不得不通过志怪托之鬼神记载了唐宪宗被弑的经过。这桩弥天大事，是由宦官一手包办的，可是李复言不敢有一个字提到内官，可见梁守谦、陈弘志辈当时恶势力可以遮天。裴廷裕《东观奏记》云：“宣宗追恨光陵（穆宗）商臣之酷，郭太后亦以此暴崩。”可见郭贵妃（即后来的郭太后）和太子（穆宗），是预闻这个密谋的，从八二一年穆宗即位，穆宗卒，子敬宗、文宗、武宗相继嗣位，到八四七年，宪宗第十三子宣宗即位，经过二十七年长长的时间，皇位才由穆宗诸子手里转移到宪宗幼子宣宗手里，这件弑帝大案才翻过来。李复言《续幽怪录·辛公平上仙》条，在二十七年之间，起过一定作用。

唐宪宗暴死于大明宫中和殿，棺敛却在太极殿，《续玄怪录》中正记载了由东内迁徙到西内的经过。由于唐宪宗是被匕首刺死的，一定血污狼籍，所以在移尸之前，必须澡身具浴，更换御衣，包扎创口，以蒙蔽众臣之耳目。“三更”一定是“五更”之讹，因为上面已经提到三更四点了，不可能又时光倒流，又回到三更来。“数月”一定是“数日”之讹，这样的大事，隐瞒几天才发布消息，是完全可以的，不可能隐瞒到数月之久。

《本事诗》一卷，唐孟棨撰。棨，唐僖宗末犹在世。书中载陈乐昌公主事：

陈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后主叔宝之妹，封乐昌公主，才色冠绝。时陈政方乱，德言知不相保，谓其妻曰：“以君之才容，国亡必入才豪之家，斯永绝矣。倘情缘未断，犹冀相见，宜有以信之。”乃破一镜，人执其半。约曰：“他日必以正月望日卖于都市，我当在，必以是日访之。”及陈亡，其妻果入越公杨素之家，宠嬖殊厚。德言流离辛苦，仅能至京。遂以正月望日，访于都市。有苍头卖半镜者，大高其价，人皆笑之，德言直引至其居，具言其故，出半镜以合之，仍题诗曰：“镜与人俱去，镜归人不归。无复嫦娥影，空留明月辉。”陈氏（乐昌公主）得诗，涕泣不食，素知之，怆然改容。即召德言还其妻……令陈氏为诗，曰：“今日何迁次，新官对旧官。笑啼俱不敢，方验作人难。”遂与德言归江南，竟以终老。破镜重圆，遂成为人间佳话。

杜光庭《虬髯客传》（《太平广记》卷一百九十三），光庭另有介绍。小说的最大缺点，充满天命论思想，认为李唐王朝的建立，是天命早已安排好了的，不是人力所能改变得了的。但这篇小说在人物的描写上却虎虎有生气，性格显明，极为成功。故事的经过，说唐太宗大将李靖未达时，去见隋司空杨素，“素亦踞见之”。靖前揖曰：“天下方乱，英雄竞起，公为帝室重臣，须以收罗豪杰为心，不宜踞见宾客。”说明李靖虽是布衣，已是气概非凡。当李靖和杨素谈论的时候，有一妓有殊色，执红拂立于前，时目靖。靖既归旅舍，其夜，红拂妓紫衣戴帽奔之，“脱去衣帽，乃十八、九佳丽人也”。李靖怕杨素追究其事，红拂女曰：“彼尸居馀气，不足畏也。诸妓知其无成，去者众矣，彼亦不甚逐也。计之详矣，幸无疑焉。”她又说：“妾侍杨司空，久阅天下之人多矣，未有如公者，丝萝非独生，愿托乔木，故来奔耳。”乃为夫妇，同往太原。

行次灵石旅舍，既设床，炉中烹肉且熟。张氏（即红拂女）以发长委地，

立梳床前，靖方刷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而虬，乘蹇驴而来……取枕欹卧，看张氏梳头。靖怒甚，未决，犹刷马。张氏熟视其面，一手握发，一手映身摇示令勿起。急急梳头毕，敛袂前问其姓，曰：“姓张。”对曰：“妾亦姓张，合是妹。”遽拜之，问：“第几？”曰：“第三。”……张氏遥呼曰：“李郎且来拜三兄。”靖骤拜，遂环坐曰：“煮者何肉？”曰：“羊肉，计已熟矣。”客曰：“饥甚。”靖出市买胡饼，客抽匕首切肉共食。

中间插叙虬髯客通过李靖，刘文静两次会见李世民的经过。最后天命论起了作用，认为“太原李氏，真英主也”。“此世界非（虬髯）公世界也”。决定退出，另找出路。并约李靖夫妇去长安找他们。

靖……到京，与张氏同往，乃一小板门，叩之，有声者拜曰：“三郎令候一娘子、李郎久矣。”延入重门，门益壮丽……引靖入东厅……传云：“三郎来。”乃虬髯者，纱帽褐裘，有龙虎之姿。相见欢然。催其妻出拜，盖天人也。遂延中堂，陈设盘筵之盛，虽王公家不侔也。……家人自西堂舁出二十床，各以锦绣帕覆之，既呈，尽去其帕，乃文簿钥匙耳。虬髯谓曰：“尽是珍宝货泉之数，吾之所有，悉以充赠……三五年内，即当太平。李郎以英特之才，辅清平之主，竭心尽善，必极人臣……非一妹不能识李郎，非李郎不能遇一妹，……虎啸风生，龙腾云萃，固当然也……此后十余年，东南数千里外有异事，是吾得志之秋也。”……靖据其宅，遂为豪家……贞观中，靖位至仆射，东南蛮奏曰：“有海贼以千艘积甲十万人，入扶余国，杀其主自立，国内已定。”靖知虬髯成功也，归告张氏，具礼相贺。

后人乐道道这则故事，至绘成图画，称为“风尘三侠”。明凌初成作《虬髯翁》，张凤翼、张太和皆著有《红拂记》。

当然，小说只能是小说，没法看做历史。杨素卒于大业二年（公元六六年）之七月，李渊到大业十三年（公元六一七年），才任为太原留守，距杨素之死已十一年。大业二年，李世民才九岁，既尚非州将之子，也非年已二十。所谓“不衫不履，褐裘而来”，都是子虚乌有之事。所以洪迈《容斋随笔》谓“此一传，大抵皆妄”，大概可作定论。

敦煌石室发现的唐代变文 变是指经变而言的。讲变文之前，先得讲变相。“相”即今“像”字。现存敦煌石窟寺壁画中，往往有根据佛本生故事画成一组壁画，也就是画成一组故事由发生、发展以至到结局的壁画。这类壁画，今日得称之为连环壁画，当时习称之为经变相。因为画面是随着故事的内容改变而变化着，变相之名，也由此而来。唐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中著录南北朝的经变相有“（宋）袁倩《维摩诘变相图》（一卷），张墨《维摩诘变相图》一卷，（梁）张儒童《宝积变相图》一卷，（隋）董伯仁《弥勒变相图》一卷，杨契丹《杂物变相》二卷，展子虔《法华变相》一卷。”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著录：“荐福寺西廊菩提院，吴（道子）画《维摩诘本行变》。慈恩寺塔之东南中门外偏，张孝师画《地狱变》。宝刹寺佛殿西廊，陈静眼画《地狱变》。兴唐寺塔院南廊，吴（道子）画《金刚经变》。菩提寺佛殿东壁，董诩画《本行经变》。永泰寺东精舍，郑法士画《灭度变相》。福先寺三阶院，吴（道子）画《地狱变》。”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寺塔记》著录：常乐坊赵景公寺南中三门里东壁上，吴道玄（即吴道子）画《地狱变》，笔力劲怒，变状阴怪，睹之不觉毛戴。三阶院西廊下，范长寿画《西方变》。平康坊菩萨寺食堂东壁上，吴道玄画《智度论色偈变》。变相即变化的画像，不称一幅，而称一卷或二卷，可证明它是连环图画，是由多幅画

面构成的，这大概不会错。

有人说：变相这一形式，是由印度随佛教传播而传入的。这句话，既对，也不对。在神庙的壁上，绘画着连环图画，这在中国老早就有了。《楚辞·天问》：

惟浇在户，何求於嫂？何少康逐犬，而颠陨厥首。女歧缝裳，而馆同爰止。何颠易厥首，而亲以逢殆。这里就构成四幅画面，第一幅画了寒浞的儿子在户边和他嫂子谈情，第二幅画了少康训练了猎犬去暗杀寒浞。第三幅画了浇和其嫂女歧同居的画面，第四幅画了猎狗没有杀掉寒浞，却把女歧的头咬断带回来了。我们读到《天问》的文辞，就可以了解楚国神庙壁上所绘图像的故事内容。解说神庙图像内容，《楚辞·天问》是一种形式，唐代变文又是一种形式。它们中间，有一定的继承关系。

在唐五代，佛教寺院里的僧侣为了传播教义，於是采用变文形式，同时利用壁画或佛教的故事内容用来讲唱一番，达到僧侣们传播宗教的目的。讲唱佛教故事的变文，如《佛本生故事变文》、《维摩诘变文》、《破魔变文》、《降魔变文》、《地狱变文》、《目连变文》等等以外，也采录民间流传下来人们日常所喜闻乐道的故事内容，既绘於寺院之壁上或画为手卷，又编为变文，如《舜子至孝变文》、《孟姜女变文》、《伍子胥变文》、《季布骂阵变文》、《汉将王陵变文》、《李陵变文》、《王昭君变文》、《张义潮变文》等等，通过俗讲的形式，加以宣讲。

僧侣演唱之际，每到一个段落，就特别举出图画为例，就是说连环图又得换一个画面了。今举《王昭君变文》为例：

- (一) 昭军(君)荣拜号作胭脂贵氏(妃)处
- (二) 昭军(君)既登高岭，愁思便生，遂指天汉帝乡而曰处
- (三) 明妃遂作遗言，略叙平生，留将死处
- (四) 单于恻悲切调，乃哭明妃处
- (五) 单于亲降，部落皆来，倾国威仪，乃葬昭军(君)处
- (六) 单于受汉使吊，宣哀，帝闻，遂出祭词(祀)处

《王昭君变文》，前半段已残缺，后半段尚完整，这一组连环画，还可以指出故事内容尚被保留下来的六个画面。

变文的文辞，不可能达到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那样高的水平，大概是一般知识份子所执笔的。今乃举《王昭君变文》为例，散文如：

妾闻居塞北者，不知江海有万斛之船；居江南之人，不知塞北有千日之雪。此及苦复重苦，怨复重怨。行经数月，途程向尽……即至牙帐，更无城郭，空有山川。地僻多风，黄羊野马，日见千群万群，                    ，时逢十队五队。似(以)语(契)丹为东界，吐蕃作西邻，北倚穷荒，南临大汉，当心而坐，其富如云。毡裘之帐，每日调弓；孤格之军，终朝错箭。将门战为业，以猎射为能，不蚕而衣，不田而食，既无谷麦，啖肉充粮：少有丝麻，织毛为衣。夫突厥法，贵壮贱老，憎女忧(爱)男……冬天逐暖，即向山南，夏月寻源，便居山北……若道一时一晌(晌)，犹可安排，岁久月深，如何可度。把王昭君嫁给匈奴单于，当作嫁给突厥可汗，把唐代的契丹、吐蕃，作为匈奴的邻居，历史知识之浅陋，是经不起推敲的。其韵文如：

乍到未闲胡地法，初来且着汉家衣。冬天野马从他瘦，夏月犛牛任意肥。边云忽然闻此曲，令妾愁肠每意(忆)归。蒲桃未必蒙春酒，毡帐如何及彩帟。莫怪适下频下泪，都为残云度岭西。韵文是用来唱的。在韵文和散文之

间，还加上一段插白，解说经变，再和壁画和画卷配合起来，以期收到预期的效果。

唐穆宗长庆（公元八二一至八二四年）中，有俗讲僧文淑，善于讲唱变文，“其声宛畅，感动里人”（《乐府杂录》）。唐敬宗宝历二年（公元八二六年）六月己卯，曾亲“幸兴福寺观沙门俗讲”（《资治通鉴》）。俗讲甚至吸引皇帝也去听讲，可见卖座之盛了。胡三省《通鉴注》：“释氏讲说，类谈空有，而俗讲者又不能演空有之义，徒以悦俗邀布施而已。”从这条注文看，俗讲的内容，基本上传会世俗所好，并不完全会附合佛经宗旨的。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提到唐武宗会昌元年（公元八四一年），“敕于左右街七寺开俗讲，左街四处”，“右街三处”。左街有海岸、体虚、齐高等，右街有文淑等，“而称文淑，城中俗讲，此法师为第一。”文淑在文宗时曾因罪流放，至武宗时，盖又归长安也。据赵璘《因话录》里说：“有文淑僧者，公为聚众谈说，假托经论，所言无非淫秽鄙褻之事。不逞之徒，转相鼓扇扶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奉，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近日庸僧以名系功德使，不惧台省府县，以士流好窥其所为，视衣冠过于仇雠，而淑僧最甚，前后杖背，流在边地数矣。”

佛教寺院有俗讲僧，道观也模仿寺院进行俗讲，道士俗讲内容，没有吸引听众力量，甚至利用信奉道教的女道士（时称女冠）来主讲。韩愈有《华山女》诗云：

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庭。广张罪福资诱胁，听众狎恰排浮萍。黄衣道士亦讲说，座下寥落如明星。华山女儿家奉道，欲驱异教归仙灵。洗妆拭面著冠帔，白咽红颊长眉青。遂来升座演真诀，观门不许人开扃。不知谁人暗相报，訇然振动如雷霆。扫除众寺入迹绝，骈骊塞路连辘轳。观中人满坐观外，后至无地无由听。抽钗脱钿解环佩，堆青叠玉光青荧。天门贵人传诏召，六宫愿识师颜形。玉皇领首许归去，乘龙驾鹤来青

冥。豪家少年岂知道，来绕百币脚不停。云窗雾阁事恍惚，重重翠幔深金屏。仙梯难攀俗缘重，浪凭青鸟通丁宁。可见当时的俗讲，很能吸引人。俗讲的内容，中间往往杂以黄色淫秽故事，道观甚至利用华山女冠的色相来传播教义，但今天敦煌石窟所发现的变文，却没有把这类内容保存下来，因此我们就无法得知其详了。

近人把敦煌石窟所发现的变文，编成《敦煌变文集》，这对于研究唐五代变文的发生、发展帮助很大。

变文中说话部份对后来白话小说的影响很大，宋代说话人分小说、说经及说参请、讲史书、合生商谜四科。其中说经及说参请的内容，就是宣讲佛经故事的，如《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后来又发展为《西游记》等等。宋代所用的话本，现在还残存的有《五代史平话》、《京本通俗小说》、《大宋宣和遗事》等等，后来的长篇章回小说如《水浒传》等，大体上也是从这些话本发展而来的。

此外如宋明的宝卷，开宣之初引“经云”一段，每一段落结束宣赞佛号，全文也以一段韵文、一段散文组成；明代盛行于南方的弹词，用三七句法组成，用韵文歌咏，散文叙述，可以说都是受到唐代变文形式的影响。

[一]此诗亦收入李白集中，黄庭坚以为“此篇乃李益所作”，明胡震亨从黄说。

[二]《资治通鉴》唐宣宗大中二年：上欲知百官名数，令狐綯曰：“六

品已下，官卑数多。皆吏部注拟。五品以上，则政府制授，各有籍，命曰具员。”上命宰相作《具员御览》五卷上之，常置于案上。

[三]《古今诗话》：义山游长安，宿旅店，客赋木兰花诗，众皆夸示，义山后成，客尽惊，问之始知是义山。

[四]敦煌民歌部份原件多错别字，参考杨公骥教授所著《唐代民歌考释及变文考论》一书中改错，用括弧注明，加以改正。

[五]本节所引《云谣集》，据潘重规教授《敦煌云谣集》定本。

[六]本节参考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 第二节 绘画、雕塑、书法与音乐、舞蹈

隋唐五代的绘画艺术 先讲人物画，次讲花鸟画，次讲画马牛，最后讲山水画。

人物画 隋代的人物画家，有展子虔、郑法士、董伯仁、杨契丹。展子虔除了善画“台阁人马”，也善画山水画，因此，我们准备在讲山水画时讲到他。郑法士，善画人物，“丽组长纓，得威仪之樽节；柔姿绰态，尽幽闲之雅容”。他画有《游春图》，画已失传，原本据说气氛非常浓郁，当时誉为佳作。董伯仁，也善画人物，在他所画的《畋游图》里，“欣戚笑言，皆穷生动之意，驰骋田猎，各有奔飞之状”（《历代名画记》），一时称为绝手。又有杨契丹，亦善丹青。据传说，杨契丹和田僧亮、郑法士三人一起在大兴光明寺画壁画，郑法士画东壁和北壁，田僧亮画西壁和南壁，杨契丹画外边四壁，当时称为“三绝”。这三人的壁画，推杨契丹为首。郑法士要求看杨契丹的画稿，杨契丹“引郑至朝堂，指宫阙、衣冠、人马、车乘，曰：‘此是吾之画本也’”（《太平广记》卷二百一十一引《历代名画记》），郑法士听了非常佩服。

唐太宗时，阎立德、阎立本兄弟，并以善画人物著名。阎氏从西魏、北周以来，一直是贵族，立德仕唐至工部尚书，立本至中书令。立本的画名，尤在立德之上，唐太宗时代，著名的《秦府十八学士图》、《凌烟阁功臣图》，唐高宗时代，著名的《昭陵列像图》、《永徽朝臣图》、《外国图》、《西域图》等，都是立本的笔迹。阎立本画的《列代帝王像》，现收藏在美国波斯顿博物馆。阎立本的这一幅《历代帝王像》，现在还留下十三个帝王像：汉昭帝、汉光武帝、魏文帝、蜀先主、吴大帝、晋武帝、陈文帝、陈废帝、陈宣帝、陈后主、北周武帝、隋文帝、隋炀帝。阎立本根据每个帝王的所处时代、所居地区、不同的年龄和经历，以及他们在历史上的不同政治作为，通过不同的面部特征、坐立姿态、服饰，恰如其分地把每个帝王（包括成功的和失败的）的性格和特点，描绘出来，达到较高的艺术水平。阎立本还画有唐太宗《步辇图》，他的临摹本，到现在还很好地保存着。汤厚在《古今画鉴》里介绍《步辇图》真迹时道：“《步辇图》画太宗坐步辇上，宫人十余舆辇，皆曲眉丰颊，神采如生。一朱衣髯官，执笏引班，后有赞普使者，服小团花衣，及一从者。赞皇李卫公[德裕]小篆题其上，唐人八分，书赞普辞婚事，宋高宗题印，定真，奇物也。”在这幅《步辇图》里，阎立本把唐太宗那种帝王气派和吐蕃使节那种诚恳朴质的性格，都描绘出来了。这是一幅艺术水平较高的作品。

唐太宗时代，于阗（今新疆和田县）人尉迟跋质那，人称为大尉迟，他的儿子尉迟乙僧，人称为小尉迟，他们从于阗来到长安，并以善画驰名中原。大尉迟的画风，“洒落而有气概”，小尉迟“用笔紧劲如屈铁盘丝”（《历代名画记》）。他们父子俩都善画佛像和西域的风俗人物画。他们的画面上有阴影的晕染，所谓凹凸花，也就是元汤厚《古今画鉴》中称之为“用色沉着，堆起绢素而不隐指”，是一种带有西域倾向的画法。段成式在《酉阳杂俎·寺塔记》里称长安宣阳坊奉慈寺普贤堂中有尉迟乙僧之画，其“变形三魔女，身若出壁”，“又左右梵僧及诸蕃，往奇，然不及西壁，西壁逼之擦擦然”。所谓“身若出壁”，“逼之擦擦然”，都是形容它的立体感。

吴道子，又名道玄，唐玄宗时人。他的成就，尤高出于当时其他诸人，所以后来画师推尊他为“祖师”。《唐画断》称他“年未弱冠，穷丹青之妙”（《太平广记》卷二百十二引）。人物、台阁、鸟兽、草木、山水，他无所不能。他的人物画，“落笔雄劲，而傅彩简淡”（《图画见闻志》），“其傅彩，于焦墨痕中，略施微染，自然超出缣素”（汤厚《古今画鉴》），“点不加墨，口浅深晕成，故最如活”（米芾《画史》），所以已后“画家有轻拂丹青者，谓之吴装”（《图画见闻志》）。从这些评论中，可以想到，吴道子汲取了晕染法的优点，把它融化进传统的画法之中，这对当时的绘画发展，有重要贡献。

吴道子前后画寺院墙壁三百余间，人相、鬼状，无一相同。有些壁画，由他一人画成；有些壁画，由他起了样，令其弟子着色完成。他在长安常乐坊赵景公寺壁上，画“执炉天女，窃眸欲语”，可见他的技艺之高超。他除了发展晕染法以外，对传统的线条画法，也有很大的发展。如他在长安平康坊菩萨寺食堂前画了一个“礼佛仙人，天衣飞扬，满壁风动”。《酉阳杂俎》中又说到他在这一寺的壁上画佛教故事，“笔迹遒劲，如磔鬼神毛发”。在赵景公寺壁上“画龙及刷天王须，笔迹如铁”（《酉阳杂俎·寺塔记》）。《历代名画记》中也称道他画的人物，“虬须云鬓，数尺飞动，毛根出肉，力健有余”。可见屈铁盘丝的线条画法，在他的熟练技法运用下，达到了很高的成就。

吴道子喜欢饮酒，“每欲挥毫，必须酣饮”（《历代名画记》）。还有一则脍炙人口的故事，足以见到他的画风。据说唐玄宗“开元中……时将军裴居母丧，诣道子，请于东都天宫寺画神鬼数壁，以资冥助。道子答曰：‘废画已久，若将军有意，为吾缠结舞剑一曲，庶因猛厉，获通幽冥。’于是脱去縗服，若常时装饰，走马如飞，左旋右抽，掷剑入云，高数千丈，若电光下射，引手执鞘承之，透室而入，观者数千百人，无不惊栗。道子于是援毫图壁，飒然风起，为天下之壮观。道子平生所画，得意无出于此”（《太平广记》卷二百十二引《独异志》）。观裴舞剑，以助挥毫，奋笔俄顷，便成巨画，足见道子画风的跌宕豪放。

吴道子的宗教画，主要是为宗教迷信服务的。据当时人说，吴道子在长安赵景公寺画成“地狱变”以后，“都人咸观，皆惧罪修善。两市（东市和西市）屠沽，鱼肉不售”（《太平广记》卷二百二十二引《唐画断》）。说明这种宗教画，对当时传播宗教教义，影响极大。

从魏晋到唐初，在绘画史上的唯一特点，是宗教画特别发达，因之中亚和五天竺的绘画技法，也随着佛教而介绍到中国来，这对中国的画风，起一定影响。当时，中国的许多画家，也很注意学习外来的绘画技法。如南朝的名画师张僧繇，北朝的名画师曹仲达，他们都虚心地汲取外来的有益东西，来提高自己的绘画技法，而且都得到了显著的成就。到了唐开元、天宝之际，吴道子出，他是集南北绘画大成的一个画家。在这时，不但南北两地的画风，已经融合成为一家，而且外来的绘画技法与中国画风也已融为一体。这个时候形成的画风，完全是具有中国气派和民族风格的。这对以后绘画方面的发展，影响极大。此后张萱、周昉在吴道子的写实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和发展，但他们已经跳出了宗教画的圈子，而去致力于风俗画方面的发展了。当然，张萱、周昉的历史局限和阶级局限还是很大的，即他们还是偏重图写贵族生活，而没有把平民的生活反映到绘画里来，所谓“全法衣冠，不近间

里”（《历代名画记》）。但就是这样，比起纯粹的宗教画——“地狱变”之类，总算已经跨出了一大步了。

张萱，京兆人，善画人物。“尝画贵公子鞍马屏帷宫苑子女等，名冠于时。善起草点簇位置亭台竹树花鸟仆使，皆极其态。画《长门怨》，约词摭思，曲尽其旨，即金井梧桐秋叶黄也”。其流传“粉本，画《贵公子夜游图》、《宫中七夕乞巧图》、《望月图》，皆绢上，幽闲多思，意逾于象”（《太平广记》卷二百十三引《唐画断》）。张萱“又能写婴儿，此尤为难。盖婴儿形貌态度，自是一家，要于大小岁数间，定其面目髻稚。世之画者，不失之于身小而貌壮，则失之于似妇人。又贵贱气调与骨法，尤须各别”（《宣和画谱》）。张萱的代表作，有《明皇纳凉图》、《整妆图》、《乳母抱婴儿图》、《捣练图》、《执炬宫骑图》、《挟弹宫骑图》、《按羯鼓图》、《按乐士女图》、《号国夫人游春图》等，惜真迹大半散失，现在流传下来的，只有宋人临摹的《捣练图》和《号国夫人游春图》等了。

周昉，字景玄，长安人，家世贵仕，昉以贵公子游卿相间，“画穷丹青之妙”。昉兄周皓，曾随哥舒翰收石堡城，以战功官至十二卫将军。唐德宗为太后修章敬寺，想请周昉为章敬寺画壁，“召皓谓曰：‘卿弟昉善画，欲请画章敬寺神，卿可特言之。’经数月，帝又谕之，方就画……初昉落墨时，彻去幄帘，使往来纵观之，又寺接国门，贤愚毕至，或言妙处，或指搨未至，众目助其得失，昉随所闻改定。月余，是非语绝，遂下笔成之……当时推为第一”（《宣和画谱》）。可见周昉不但画艺超绝，而且能够虚心听取别人意见，不断提高改进，使他的艺术作品，达到更高水平。元人汤厚在《古今画鉴》中谓：“周昉善画贵游人物，作仕女多浓丽丰肥，有富贵气。”《宣和画谱》亦云：“世谓昉画妇女，多为丰厚态度者……此无他，昉贵游子弟，多见贵而美者，故以丰厚为体。而又关中妇人，纤弱者为少，至其意态浓远，宜览者得之也。此与韩干不画瘦马同意。”他们能从仕女的富裕生活来解释唐人所画妇女，多浓丽丰肥，是比较客观的。米芾在《画史》里称昉画“秀润匀细”。郭子仪的女婿赵纵请韩干替自己画了一张像，后来又请周昉也画了一张像，郭子仪“尝列二画於座，未能定其优劣，因赵夫人（子仪女，赵纵妻）归省，令公（郭子仪）问云：‘此何人？’对曰：‘赵郎。’‘何者最似？’云：‘两画总似，后画者佳。’又问：‘何以言之？’‘前画空得赵郎貌，后画兼移其神思情性笑言之姿。’令公问‘后画者何人？’乃云周昉，是日定二画之优劣”（《太平广记》卷二百十三引《唐画断》）。《画断》称周昉画仕女，“为古今之冠”。他的画，国际闻名。贞元（公元七八五至八四年）末，新罗国使臣在扬州等地，高价收买昉画，带回到新罗去。他的代表作，有《明皇骑从图》、《三杨图》、《织锦回文图》、《五陵游侠图》、《宫骑图》、《游春士女图》、《凭栏士女图》等等，近年辽宁博物馆收藏了一幅《簪花仕女图》，据专家的考证，就是周昉的作品。

韩滉，唐德宗时宰相，善画人物，尤工牛马。他的传世作品，系经过宋徽宗题识的《文苑图》。画卷上只有五个人，一个人抚孤松而立，两个人在共展卷子，一个人握笔托腮凝思，一个人大概是仆使，在低头磨墨。人物体态庄严，栩栩如生。

吴侏，不知何许人，善画，“作泉石平远，溪友钓徒，皆有幽致”（《宣和画谱》）。他画了一幅《萧翼赚兰亭图》，画辨才书呆子气可掬，画萧翼故作寒峻相，也曲尽其态。“人品流辈，各有风仪，披图便能想见一时行记，

历历在目”。这幅画，我们今天还保存着，真是人间瑰宝。

顾闳中，江南人，五代南唐时为南唐画院待诏。他善画人物。南唐主屡欲相韩熙载，而韩熙载“好声伎，专为夜饮”，“宾客揉杂，欢呼狂逸，不复拘制”。南唐主闻熙载“荒纵，然欲见樽俎灯烛间觥筹交错之态度不可得，乃命闳中夜至其第窃窥之，目识心记，图绘以上之（《宣和画谱》）。这就是流传于世的《韩熙载夜宴图》。图卷现藏故宫博物院，据专家考证，已不是顾氏原本，而是北宋人的临摹本。画绢共分五个场面，韩熙载的像，也连续出现了五次，画面上还出现了太常博士陈致雍、紫微朱铣、状元郎粲、门生舒雅、教坊副使李家明，以及歌伎、舞女、和尚等人，人物形象生动，描染细腻精工，即使是宋人临摹本，也是高水平的。

花鸟画到了唐、五代，也有巨大的发展。

唐僧彦悰在《后画录》里，说尉迟乙僧“攻改四时花木”。可见尉迟乙僧不但在人物画方面有较高的成就，就是在花鸟画方面，也是高水平的。彦悰又提到康萨陀也以花鸟画著名中土，“初花晚叶，变态多端；异兽奇禽，千形万品”。乙僧是于阗人而萨陀是西域人，说明中国花鸟画的兴起也受到西域艺术的影响。

唐德宗时，花鸟画有边鸾最为知名。边鸾，京兆长安人，少“攻丹青，最长于花鸟，折枝之妙，古未之有”（《太平广记》卷二百十三引《唐画断》）。鸾“精于设色，无斧凿痕”（《宣和画谱》）。他的花鸟画，以细劲的钩勒法作轮廓，而填以绚丽的颜色，“下笔轻利，用色鲜明”（《唐朝名画录》）。“贞元中（公元七八五至八四年），新罗国献孔雀解舞者，德宗诏[鸾]于玄武殿写貌，一正一背，翠羽生动，金羽辉灼”（《唐朝名画录》）。边鸾不仅“善画花鸟，精妙之极，至于山花园蔬，无不遍写”（《历代名画记》），都达到很高水平。

刁光胤，长安人，唐昭宗天复（公元九一至九三年）末，避乱入蜀，居成都，为西蜀绘画名家。他以“善画湖石、花竹、猫兔、鸟雀之类”（《宣和画谱》）著名。刁光胤“尝于大慈寺承天院内窗边小壁四堵上画四时花鸟，体制精绝”（《图画见闻志》）。他有两个弟子，一个是孔嵩，一个即黄筌，时称孔已“升堂”，黄称“入室”。

和刁光胤同时，蜀中的花鸟画名家尚有滕昌祐。滕昌祐，本吴人，他由长安随唐僖宗入蜀。他的花鸟画，得力于写生。他入蜀之后，“尝于所居树竹、石、杞、菊，种名花异草木以资其画”（《益州名画记》）。他画的“折枝花，下笔轻利，用色鲜妍”。据说他“初攻画，无师，惟写生物，以似为工而已”。据《宣和画谱》称黄筌“花竹师滕昌祐，鸟雀师刁光胤”，可见黄筌受滕昌祐、刁光胤的影响很深。

黄筌，字要叔，成都人，以花鸟画知名五代，“刁处士（光胤）入蜀，授之竹石、花雀；又学孙位画龙水、松石、墨竹；教李升画山水、竹树，曲尽其妙”（《益州名画录》）。他又擅长人物，据《太平广记》卷二百十四引《野人闲话》载：“昔吴道子所画一钟馗，衣蓝衫，鞞一足，眇一目，腰一笏，巾裹而蓬发垂鬓，左手捉一鬼，以右手第二指挽鬼眼睛，笔迹遒劲，实有唐之神妙。”这幅名画被人收得，以献后蜀主孟昶，孟昶“甚爱重之，常悬于内寝。一日，召黄筌令看之，筌一见，称其绝妙。……昶谓曰：‘此钟馗若拇指掐鬼眼睛，则更校有力，试为我改之。’筌请归私第，数日，看之不足，别緝绢素，画一钟馗，以母指掐鬼眼睛，并吴[道子]本一时进纳。”

昶问曰：‘比令卿改之，何为别画？’筌曰：‘吴道子所画钟馗，一身之力，气色眼貌，俱在第二指，不在拇指，所以不敢辄改。筌今所画，虽不及古人，一身之力，意思并在拇指。’昶甚悦，赏筌之能，遂以彩段银器，旌其别识。”可见黄筌在人物画上鉴别之精。他的花鸟画，不仅“兼有众体之妙”，而且“笔意豪赡，脱去格律”，他又善于写生，据说广政癸丑岁（公元九五三年），他在后蜀八卦殿壁上画了一只野雉，适“有五坊使呈鹰于陛殿之下”，这只鹰误认壁上所画野雉是真的，“掣臂者数四，蜀主孟昶嗟异之”，可见黄筌写生之真妙。筌画“山花野草，幽禽异兽，溪岸江岛，钓艇古槎，莫不精绝”（《宣和画谱》）。李廌在《画品》里评黄筌的《寒龟晒背图》说：“笔墨老硬，无少柔媚；监（黄筌仕后蜀为少府监）平时所作……亦皆淡色鲜华，以示其巧，此独为水墨。”笔墨老硬，淡色鲜华，可说是黄筌的画格。汤厚在《古今画鉴》里也说：“黄筌画枯木，信笔涂抹，画竹如斩钉截铁”，足见他笔法的劲利了。据姚际恒所著《好古堂家藏书画记》说：“黄筌《金盆浴鸽图》大幅著色牡丹下，金盆群鸽相浴，有浴者，有不浴者，有将浴者，有浴罢者，有自上飞下者。其十一鸽，各各生动，极体物之妙，真神品也。”可见黄筌的花鸟画，确有很高的成就。

徐熙，金陵人，世为江南显族。他所画“草木虫鱼，妙夺造化，非世之画工形容所能及也。尝徜徉游于园圃间，每遇景辄留，故能传写物态，蔚有生意。至于芽者、甲者、华者、实者，与乎濠梁唼喙之态，连昌森束之状”，无不曲尽其状。当时画花卉，“往往以色晕淡而成，独熙落墨以写其枝叶蕊萼，然后传色，故骨气风神，为古今之绝笔”（《宣和画谱》）。当时画坛上对徐熙、黄筌两家的风格，有“黄家富贵，徐熙野逸”（《图画见闻志》）的评语，由于两人处境的不同，因此画格也显著有所不同，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黄筌在前蜀任画院待诏，在后蜀仕至少府监，供奉禁中，所以他所画的，多是“禁籞所有珍禽、瑞鸟，奇花、怪石；今传世桃花、鹰鹞、纯白雉兔、金盆鹑鸽、孔雀、龟鹤之类是也。又翎毛骨气尚丰满，而天、水分色”。徐熙是江南处士，高尚不仕，他“放达不羁，多状江湖所有，汀花、野竹、水鸟、渊鱼，今传世凫雁、鹭鸶、蒲藻、虾鱼、丛艳、折枝、园蔬、药苗之类是也。又翎毛形骨轻秀，而天、水通色”（《图画见闻志》）。这些分析，反映了黄筌给事画院，多状禁中奇物，画里也保持了一种富贵气派。徐熙江南处士，有江湖偃仰之姿，自然会出现一种野逸之气。徐熙死於南唐灭亡之前，他的遗作都由南唐国主收入禁中，南唐亡，徐熙的作品，又尽为宋军捆载运往开封。后来宋“太宗因阅图书，见熙画安石榴树一本，带百余实，嗟异久之，曰：‘花果之妙，吾独知有熙矣，其余不足观也’”（《圣朝名画评》）。米芾也说到“徐熙《风牡丹图》，叶几千余片，花只三朵，一在正面，一在右，一在众枝乱叶之背”（《画史》）。这种画格完全是写意，和黄筌的写真，用意不同。黄筌的一派，注重设色，所以他的作品，浓艳如生；而徐熙的一派，注重写意，重在墨笔勾勒，然后以青绿略加点拂，“落笔之际，未尝以传色晕淡细碎为功”（《图画见闻志》），神态自然，奇趣横生，他的气韵，自然超轶黄筌而上了。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对徐黄二家曾有这样的分析：“诸黄（黄筌及其子居宝、居采，弟维亮）画花妙在傅色，用笔极新细，殆不见墨迹，但以轻色染成，谓之写生。徐熙以墨笔画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已，神气迥出，别有生动之意。”这几句话，把两家的不同面目，已说得很清楚了。

在画牛马方面，唐玄宗时人有曹霸，工鞍马。曹霸的学生陈闳、韩干亦以画马著名。韩干，长安附近蓝田人。出身贫穷，少时常为赏酒家送酒，经常到王维家里去取赏酒钱，见王维画画，他也画地为人马。王维发现他有绘画天才，就培养他学绘画。十余年后，便成为出色的画家。他也工人物画，尝在长安道政坊宝应寺壁画佛教画，在画释梵天女时，把王缙（王维弟，封齐公）的女妓小小等作为写真模型，维妙维肖。他和陈闳，都是曹霸的弟子，但曹霸、陈闳恪守传统画法，画马着重筋骨，画出来都是瘦马，所谓“尚翘举之姿，乏安徐之体”，马的毛色也只有騮（浅黄色）骠（赤马赤尾）骝（苍白杂色）驳（赤马白斑），“无他奇异”（《历代名画记》）。韩干开始不守旧法，以御真马为写真对象。《唐画断》载：“天宝中，召入供奉，上令师陈闳画马，怪其不同，诏因诘之。奏曰：‘臣自有师，陛下内马，皆臣之师也。’”可见他画马着重写实主义精神，因此成就很高。当时全国牧有马四十万匹，御骏白玉花骢、照夜白等，皆“筋骨既健，蹄甲皆厚”（《太平广记》）卷二百十二引《唐画断》），“骨力追风，毛彩照地”（《历代名画记》），骑在这种大马背上，“舒身安神，如据床榻”。韩干就以素描这种大马为写实对象，画出来后，使人看了，感到具有盛唐的气派和风格。

韩滉，他除了人物画以外，“牛马尤工。昔人以谓牛马目前近习，状最难以，滉落笔绝人”（《宣和画谱》）。他画的《五牛图》，今传于世，确是艺术作品中瑰宝。

戴嵩，是韩滉的弟子，“世之所传画牛者，嵩为独步”。“至于田家川原，皆臻其妙”（《宣和画谱》）。戴嵩弟戴峰，亦以画牛而名高一时。他画牛，“喜作奔逸之状”。

山水画在隋以前，中国的山水画还处于萌芽状态时期。画山水，“群峰之势，若钿饰犀栉，或人不容泛，或人大于山”。画树石，“列植之状，则若伸臂布指”。就是到了唐初，也是“状石则务于雕透，如冰渐斧刃；绘树则刷脉镂叶，多栖梧苑柳，功倍愈拙，不胜其色”。隋代有展子虔，他不仅善画“台阁人马”，就是他的山水画，也是“咫尺千里”（《历代名画记》），称为名手。他画的《游春图》，现在还被保存着，对此后吴道子、李思训的山水画，都有巨大影响。

吴道子，不但善画人物，山水画方面，也造诣很深。唐玄宗想看嘉陵江山水，派吴道子到四川去就地写生，他回来以后，告诉唐玄宗说：“臣无粉本，并记在心。”唐玄宗就命他在大同殿壁画嘉陵山水，吴道子画“嘉陵江三百里山水，一日而毕”（《太平广记》卷二百十二引《唐画断》），“怪石、崩滩，若可扞酌”。“由是山水之变，始于吴，成于二李（思训、昭道）”（《历代名画记》）。山水画到吴道子、李思训时代才正式形成。

李思训、李昭道父子，不仅人物画方面，造就很大，同时他们还工于山水画。李思训的画，品格高奇，用笔劲挺而细密，“其画山水树石，笔格遒劲”（《历代名画记》）。“尤工山石林泉，笔格遒劲，得湍濑潺湲、烟霞缥缈难写之状”（《宣和画谱》）。李思训的山水画，除了“笔格遒劲”这一特色之外，还“采用金碧辉映，为一家法，后人所画著色山往往多宗之”（《图绘宝鉴》）。所谓“金碧山水”的画法，据饶自然《绘宗十二忌》所载：“设色金碧，各有重轻。轻者，山用螺青，树石用合绿染，为物不用粉衬。重者，山用石青绿，并缀树石，为物用粉衬。金碧则下笔之时，其石便带皴法，当留白面，却以螺青合绿染之，后再加以石青绿，逐摺染之。”

间有用石绿皴者，树叶多夹笔，则以合绿染，再以石青绿缀。金泥则当于石脚、沙嘴、霞彩用之。此一家只宜朝暮及晴景，乃照耀陆离而明艳也。人物楼阁，虽用粉衬，亦须轻淡，除红叶外，不可妄用朱金丹青之属，方是家数”（《画史会要》）。明汪珂玉也说：“李将军（思训）、赵千里先勾勒成山，却以大青绿着色，方用螺苦绿碎皴染，兼泥金石脚。”李思训的金碧山水，是重色一派，这种画法，好处在骨力劲健，色彩鲜明。他的着重点是“攒点作皴，首重尾轻”的斧劈皴和“随类赋采”、色彩鲜明两项。吴道子和李思训两家是代表唐代山水画的写意和工致两大派别。继吴道子和李思训而起的，有王维和张藻。

王维，不仅是山水抒情诗的大家，同时又是山水画的名手。王维有诗句云：“当代谬词客，前身应画师。不能舍余习，偶被时人知。”（《偶然作》）可见在绘画方面，王维也是很自负的。王维的诗，如“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过香积寺》），“天寒远山静，日暮长河急”（《齐州送祖三》），“远树蔽行人，长天隐秋塞”（《别弟缙后登缙云寺望蓝田山》），“落花寂寂啼山鸟，杨柳青青渡水人”（《寒食汜上作》），已经充满了诗情画意。他的山水画，张彦远称之为“重深”。说他尤善“破墨山水，笔迹劲爽”（《历代名画记》）。《唐画断》里也称他“画山水松石，踪似吴生（道子），而风标特出”（《太平广记》卷二百一十一引）。《旧唐书·文苑传》谓其“山水平远，云峰石色，绝踪天机，非绘者之所及”。他尝于清源寺画《辋川图》，“山谷郁盘，云水飞动，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太平广记》二百一十一引《唐画断》）。由于王维把诗情画意两者结合起来，对此后文人画的发展，发生较大影响。因此，尽管王维的画，在唐代，地位并不高于吴道子、李思训，但随着封建经济、封建文化的发展，文人画更适合地主阶级中知识分子的口胃，因而王维在画史上的地位愈抬愈高，影响也愈大。但也由于文人画的特别发展，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绘画史上写实主义精神的发展，关于这问题，因不在本章讨论范围之内，我们就不去详细叙述它了。

张藻，吴郡人，出身士族，“衣冠文学，时之名流”。他画“松石山水，擅当代名”（《太平广记》卷二百十二引《唐画断》）。他和王维是同时人，年辈又略后于维。他“工树石山水”，画时“唯用秃笔，或以手摸绢”（《历代名画记》）。他的画风，豪放诡奇，大概和吴道子很相近。《唐画断》称他画“松树特出古今，能用笔，常以手握双管，亦一时齐下，一为生枝，一为枯枝，气傲烟雾，势逾风雨，其槎枿鳞皴之质，随意纵横，生枝则润合春泽，枯枝则乾裂秋风”。他加强了墨法的作用，“不贵五采”（荆浩《笔法记》），而着重墨法。他的山水画，“其山水之状，则高低秀绝，咫尺深重，石突欲落，泉喷如吼。其近也，逼人而寒，其远也，极天之净”（《太平广记》卷二百十二引《唐画断》）。张藻山水画的技法，又在前人的画法基础上，推进了一步。

荆浩，五代时河内沁水人，隐居太行山洪谷，自号为洪谷子。他善画山水树石，尤重笔、墨。在他所著《山水诀》里讲到：“画者约入艰难，必要先知体用之理，方有规矩。具体者，乃描写形势骨格之法也，运于胸次，意在笔先，远则取其势，近则取其质。……在乎落笔之际，务要不失形势，方可进阶，此画体之要也。其用者，乃明笔墨虚皴之法，笔使巧拙，墨用轻重，使笔不可反为笔使，用墨不可反为墨用。凡描枝柯苇草，楼阁舟车，运笔使

巧；山石坡崖，苍林远树，运笔宜拙。虽巧不离乎形；固拙亦存乎质。远则宜轻：近则宜重。浓墨不可复用，淡墨必教重提。”《山水诀》的体，便是画面的形势，用便是笔墨之法。笔墨得力，则形势自成。体用互为表里，而尤注重于笔墨。米芾《画史》说：“荆浩善为云中山顶，四面峻厚。”四面峻厚的画法，必须笔墨来支持，笔以见峻，墨以见厚，这就代表了荆浩山水画的风格。荆浩有《答大愚僧乞画》诗云：“姿意纵横扫，峰峦次第成。笔尖寒树瘦，墨淡野云轻。”（《五代名画补遗》）从诗句中，也可见出他画风的一斑。

关仝，长安人，“工画山水，从荆浩学，有出蓝之美，驰名当代”（《图画见闻志》）。关仝“尤喜作秋山寒林与村居野渡，幽人逸士，渔市山驿，使其见者悠然如在灞桥风雪中、三峡闻猿时，不复有朝市抗尘走俗之状。盖仝之所画，其脱落毫褚，笔愈简而气愈壮，景愈少而意愈长也”（《宣和画谱》）。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里，讲及关仝的画格时，说道：“石体坚凝，杂木丰茂，台阁古雅，人物幽闲者，关氏之气也。”“关画木叶，间用墨搨，时出枯梢，笔纵劲利，学者难到。”米芾在《画史》里也说到关仝画“麓山”，气势雄伟，“工关河之势，峰峦少秀气”，可以说是山水画北方一派的代表。关仝虽精于树石，而于人物非工，于山间作人物，多请胡翼替他补足，这和前代的画家，工于人物而不精树石，正是相反，可见山水画到了五代时，人物已渐变为点缀品，已无足轻重了。

董源，江南钟陵（今江西进贤县西北）人，仕南唐，为北苑（即后苑）副使，因此后世称之为董北苑。源善画，多作山石。源“所画山水，下笔雄伟，有崭绝峥嵘之势，重峦绝壁，使人观而壮之”。当时画坛多“以著色山水誉之，谓景物富丽，宛然有李思训风格。今考源所画信然，盖当时著色山水未多，能仿思训者亦少也”（《宣和画谱》）。就是说，在五代，董源是以著色山水闻名于世的。元汤厚《古今画鉴》中 also 说：“董源山水有二种，……一样，著色，皴文甚少，用色浓古，人物多用青红衣，[人面]亦用粉素者……皆佳作也。”大概董源的著色山水，都是江南风景，设色艳丽，接近李思训金碧山水一派。董源除了著色山水以外，据《宣和画谱》说，他更能“出自胸臆，写山水、江湖、风雨、溪谷，峰峦晦明，林霏烟云，与夫千岩万壑，重汀绝岸，使览者得之，真若寓目于其处也，而足以助骚客词人之吟思，则有不可形容者”。这类“出自胸臆”的画格，是指董源著色山水以外的作品。沈括在《梦溪笔谈》中也谈到：“江南中主时，有北苑使董源善画，尤工秋岚远景，多写江南真山，不为奇峭之笔。”董源这方面的作品，“皆宜远观，其用笔甚草草，近视之几不类物象，远观则景物粲然，幽情远思，如睹异境。如源画《落照图》，近视无功，远观村落杳然深远，悉是晚景；远峰之顶，悉有反照之色，此妙处也。”董源这一画格，和北方荆浩、关仝一派用笔严整象物刻画的画风，可见是有明显区别的。米芾在《画史》里也谈到董源在著色山水以外的成就，说“董源天真平淡多……近世神品，格高无与比也。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岚色郁苍，枝干劲挺，咸有生意；溪桥渔浦，洲渚掩映，一片江南也”。元汤厚在《古今画鉴》里也说董源的《夏山图》：“天真烂漫，拍塞满纸，不为虚歇烘锁之意，而幽深古润，使人神情爽朗。”又说：“董源山水有二种，一样，水墨矾头，远林疏树，平远幽深，山石作麻皮皴。”这些可以说是董源水墨山水画的特色。董源的画山手法，最著名的是披麻皴，是一种细长圆润的石纹画法，形如麻线下披，

因以为名。据黄公望说：“坡脚先向笔画边（即勾勒边）皴起，然后用淡墨破其深凹处。”另外董源作树，曲处甚简，多作劲挺之状，也和北宋初年画家李成一派的画法千屈万屈，明显的不相同。董其昌在《画眼》里说：董源“画小树，不先作树枝及根，但以笔点成形，画山即用画树之皴”。又说：董源“画杂树，只露根，而以点叶高下肥瘦，取其成形。……最为高雅，不在斤斤细巧”。又说：董源“画树，都有不作小树者，如《秋山行旅》是也。又有作小树，只远望之以树，其实凭点缀以成形者……盖小树最要淋漓约略，简于枝柯，而繁于形影”。可见董源的技法，确在前人的成就基础上，又向前跨进了一大步。董源的代表作，有《秋山晚霭图》。元人柯九思跋这幅图说：董源“善山水，树石幽润，峰峦清深，得山之神气，天真烂漫，意趣高古”。又云：“此卷景趣奇辟，如入武夷曲，如行山阴道，令观者流连不忍释手。”元明之际的张羽题跋：“右董北苑《秋山晚霭图》，位置高深，笔墨简劲，超轶尘俗……洵绝作也。”又说：“此卷境界稍寥落耳，氤氲出没，不减山阴道上，岩谷秋初，赏心眩目矣。”清人孔尚任在《享金簿》里说到：“董源《秋山晚霭图》小卷，纸墨古澹，画意简妙，树身石块，多不细皴，而峰峦烟云变灭之状，皆非近手所及。”明人董其昌在《画眼》里也说：董源画“烟云变灭，草木郁葱，真骇心动目之观。”可见他们对董源的作品，都给予很高的评价。

巨然，南唐时僧人，亦江宁（南京市）人。巨然亦善山水画，“笔墨秀润，善为烟岚气象，山川高旷之景”。“画山水皆有远思”。“但林木非其所长”（《图画见闻志》）。米芾在《画史》里也说：“巨然师董源，今世多有本，岚气清润，布景得天真多。巨然少年时多作矾头，老年平淡趣高。”又说：“巨然明润郁葱，最有爽气，矾头太多。”所谓矾头，大概是山顶上的小方石，形如石矾，因以为名，画之以增雄峻之气的。《圣朝名画评》说到巨然所画的山水轴，“古峰峭拔，宛立风骨。又于林麓间多为卵石，加松柏草竹，交相掩映，旁分小径，远至幽壑，于野逸之景甚备”。《宣和画谱》里也说：巨然“所作雨脚，如有爽气袭人”之感。大概董源既能画著色山水，又能画岚色郁苍的江南水乡风景，巨然在著色山水方面，并没有继承董源的画格，而在水墨矾头，山石作麻皮皴方面，继承了董源这个传统，因此得与董源齐名，世称董巨。董巨的画名，开始在北方画家荆浩、关仝之下，后来由于米芾、黄公望、董其昌的吹捧，就远远超过荆浩、关仝而上了。汤厚在《古今画鉴》里说：“唐画山水，至宋始备，如[董]源又在诸公之上。”“得[董]源之正传者，巨然为最也。”黄公望说：“作山水者，必以[董]源为师法，如吟诗之学杜也。”可见在文人山水画中，董、巨地位之高。[1]

**塑造艺术** 由于人物画的进步，塑造艺术亦随着有所提高。在佛教画方面，有曹（北齐曹仲达）吴（唐吴道子）二体。曹衣服紧窄，吴衣服飘举，时称“曹衣出水，吴带当风”。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说，“雕塑铸像，亦本曹吴”。说明雕塑方面，也采用了绘画方面的新成就。吴道子本人不搞塑造艺术，但他在绘画方面的新成就，却被应用到雕塑方面来了。

杨惠之，是吴道子的同学，开始和吴道子一起学画，知道自己的绘画艺术赶不上吴道子，于是放弃绘画，专门从事塑像工作。当时吴道子画，杨惠之塑，并称绝艺。据说：杨惠之尝于京兆府塑名演员留杯亭像，“像成之日，惠之并手装染之。遂于市会中面墙而置之，京兆人视其背，皆曰：‘此留杯亭也。’”（《五代名画补遗》）只要从背影看去，便可以呼出他的名字来，

可见杨惠之塑造艺术的高超程度，无怪后人要称杨惠之为塑造圣手了。

**隋唐五代的石窟艺术** 唐代的石窟寺，著名者有洛阳龙门石窟和敦煌千佛洞等。

龙门石窟在今河南洛阳市南二十五里的伊水两岸。西崖叫龙门山，东崖叫香山。龙门山的石窟，最早开凿于北魏宣武帝元恪的景明元年（公元五年）；香山都是唐代的石窟，因为武则天佞佛，她在位时期，又大部份时间居住在洛阳，因此开凿的石窟，也以武周时为最多。龙门山和香山两崖，排列着石窟和壁龛，有几千个之多，尤其龙门山，石窟群长约二里，远看简直像蜂巢一样。西崖龙门有主要石窟二十八处；东崖香山有主要石窟七处。所有石窟石龛中，北朝的作品占百分之三十，唐代的作品占百分之六十，其他各时代的作品占百分之十。

在龙门唐窟中，以奉先寺最具有代表性。此窟开凿于唐高宗咸亨二年（公元六七二年），卒工于上元二年（公元六七五年）。奉先寺一共有九尊大佛，据《河洛上都龙门之阳大卢舍那像龛记》称正中间的卢舍那“佛身通光、座，高八十五尺；二菩萨，七十尺；迦叶、阿难、金刚、神王，各高五十尺”。奉先寺的大佛，规模弘伟，具有盛唐气派。

龙门石窟，经会昌灭佛和后代的连年兵燹，破坏得很严重，如古阳洞是龙门石窟中最早开凿的一个石窟，主佛像首却被道士用泥涂上，改塑为太上老君，已经看不到原来雕像面目，所以当地人都改称他为老君洞了。尤其可恨的是外国帝国主义分子勾结奸商，收买龙门的佛像头部，因此较精美、较轻便的佛像，几乎十分之九，都已丧失头颅。更使人愤恨的，原来有一块非常精美的《帝后礼佛图》，外国帝国主义分子串通我国奸商，把它一块一块地凿了下来，运往国外。

西崖极南一洞的洞口，有两尊唐代的金刚力士像，是龙门石窟中非常优秀的作品。两力士作对称而立的姿态，可惜两像头部及一臂，已在会昌灭佛之际，遭到严重破坏。两力士腰下穿着裙裤，上身裸露，他们那裸露的部分，肌肉突出，真实感很强。对于紧张和松弛的肌肉关系方面，也处理得很适当，耸起的三角筋和僧帽筋，显得非常坚硬，而弯下的腹外斜筋，却显出松动。他那抬起的臂膀和绷得紧紧的胸部，没有像别处的天王力士那样露出青筋来，然而却给人以一种血液在奔流、肌肉在膨胀的感觉。在这里，通过金刚力士的形象，仿佛见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健壮体魄，同时也体会到他们那种勇敢、勤劳和坚毅的性格，说明了金刚力士的形象，还是艺术家们从生活中体会得来的。

敦煌千佛洞，在河西走廊西端，敦煌县城东南四十里的鸣沙山侧，古称莫高窟。千佛洞最早开凿于前秦苻坚的建元二年（公元三六六年），以后每朝不断增加，其中有壁画和塑像的洞窟，共四百七十六窟，其中苻秦至北周二十三窟，隋九十五窟，唐二百十三窟，五代五十三窟共占有四百七十六窟中的三百八十四窟。

鸣沙山的石质比较松脆，不宜于雕刻，因此，千佛洞的主要艺术创作是壁画和泥塑。如果把敦煌千佛洞的壁画全部衔接起来，可长达二十五里左右，真不愧为佛教艺术宝库。

壁佛的内容，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时代，以说法图和佛本生故事为主要内容。说法图布局比较简单，一般都是佛在中间，两菩萨胁侍左右，有时也点缀几位散花奏乐的飞天在空中翱翔。所谓佛本生故事，就是《佛本

生经》上的故事，如摩诃萨埵投崖以身喂饿虎的故事，称为《摩诃萨埵本生》；如尸毗王为了要营救饥鹰爪下的鸽子而把自己身上的肉割下来喂鹰的故事，称为《尸毗王本生》。

隋唐时期起，单调的说法图，在各个洞窟中，因已到达饱和状态，大概没有增加必要了；而佛本生故事这一类宗教故事内容，对当时人民进行欺骗和麻醉，其所收到的效果也没有达到预期那样大，因此又增加了经变，并成为壁画的主要内容。经变就是把经文的故事，用图像表达出来。有净土变、维摩诘变、法华经变等。经变画的内容，和佛本生故事一样，都是宣传宗教迷信毒素的。在每一套经变画中，其中最主要的一轴，也是最大场面的一幅，往往是描绘佛所宣传的西方极乐世界庄严万千彩色缤纷的景象的。这一巨大画面，构图布局非常复杂，到了唐盛时的作品，一幅这样的画面，环绕在佛左右前后的可以达到千百人之多，香花缤纷，音乐齐备。统治阶级所以这样不惜工本的大规模的来描绘这种巨大场面的经变，其目的无非想麻醉人民，把西方极乐世界渲染得愈出色，人民向往往生天国的愈多，统治阶级利用宗教麻痹人民斗争意志的预期效果也收获愈大，所以经变便代替了佛本生故事，而构成为壁画的主要内容。从内容方面来讲，用这些巨大场面来描绘西方极乐世界，宣传宗教迷信，应该批判；从技法方面来讲，当时画师在处理复杂画面上，表现了一定的技能和魄力。

这种经变画，画人大都采用连环图画的形式，选择经文故事中带有关键性和典型的场面，把它的内容系统地表达出来。当时被寺院所雇用的画师们，尽管接受了绘制宗教画这一任务，但有时他们并不甘心于宗教题材的束缚，往往运用他们的智慧，很巧妙地把富有社会现实生活的内容在作品中表现出来，如耕作、收获、伐木、射猎、饲养，挤奶、拉纤、屠沽等画幅，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的辛勤劳苦生活；它如舟车、行旅、游乐、宴餐、战争等画幅，也从各个角度反映了当时各阶层的生活；还有西域的人像和供养人像，也如实地画出了当时各族、各阶级、各阶层的衣着、面貌来。这些画，不仅艺术价值较高，就是史料价值也很高。

除了壁画以外，敦煌千佛洞还保存了一千三百多尊塑像，其中完整保持原型的，约有七百多尊，残缺者六十多尊，经清代修理失去原来面目者，五百九十多尊。

#### 千佛洞现存魏隋唐塑像统计

时代	塑像总数	其中残缺者	其中经清代修理者	其中完整保持原型者
魏	二六八尊	三一尊	一尊	二三六
尊隋	四四四尊	五尊	一九七尊	二四二尊
唐	六六一尊	三三尊	三九三尊	二三五尊
总计	一三七三尊	六九尊	五九一尊	七一三尊

从这些塑像群中，可以看出北朝和隋唐两个阶段的艺术水平的发展。

北朝的塑像，无论佛、菩萨，面相都比较清癯，鼻梁都比较高，嘴角虽是带着微笑，但使人看了发生一种森严而不可接近的感觉；与此相适应，衣着的襞褶也是紧贴躯体，所谓“曹衣出水”，好像刚从水里出来一样，衣褶线条，使人看了感到劲健有余，柔和不足。总之一句话，这种佛、菩萨的形

象，还带着浓厚的西域五天竺情味，这种情味，对佛教的广泛传播来说，是起着一种阻滞作用的，因此，作为宗教服务的寺院塑匠们，就有继续改进的必要。隋唐以来，经过塑匠们的不断改进，佛、菩萨的面相转成丰满，鼻梁降低，耳垂加大，手足肢体也益形丰腴，使人看了有一种慈祥庄严的感觉；同时在襞褶线纹方面，裙袖飘动流畅，所谓“吴带当风”，也予人以柔和之感。佛、菩萨、金刚、梵天王之类，在现实世界中是并不存在的，但艺术家在创造他们的形象时，却不得不参考现实世界中各种人物的形象和性格来捏塑，如塑匠们参考女伎的形象来捏塑女菩萨，参考劳动人民的发达肌肉来捏塑金刚力士，这样，可以说在捏塑创作中，人物的性格能表现得愈显明，捏塑的艺术水平也愈高。

敦煌千佛洞石窟中所发现的古代文物，极大部分被帝国主义文化特务劫掠出国了，只留下一小部分，现在还保存在国内。关于敦煌的壁画和塑像部分，在解放前，帝国主义文化特务也想勾结官僚和民族败类，盗运出国，由于当地人民的力量，才阻止了他们的继续破坏。解放后，党和政府一方面充实和扩大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组织，使这一世界艺术宝库，能持久保护下去；另一方面，又把敦煌壁画和塑像拍摄临摹下来，印成书籍图片，大量地在国内外发行，作为艺术工作者的借鉴。

与佛教艺术有关的，我国至今还保存了不少隋唐五代时期的宝塔。塔本为瘞佛骨之所，梵语叫“窣堵波”，亦译作“浮图”。译为“方坟”或“圆冢”。在五天竺，大都为半圆球形象，其上立刹。山东济南朗公谷神通寺单层石塔，俗称为“四门塔”。塔平面正方形，四面辟门，中立方墩，墩四面各坐一像，塔身单层，平素无饰。上部叠溢出檐，上砌方锥形顶，顶上立刹，塔形制与云冈浮雕所见单层塔极相似，其刹也与云冈浮雕塔刹完全相同，可见“四门塔”是代表早期佛塔的形式。四门塔造像有东魏武定二年（公元五四四年）题记，四门塔的建筑年代，当在同时。佛教在中国发展，佛塔也相应发展，于是宝塔就有十五层、十三层、十一层、九层、八层、七层、六层、五层、四层、三层、二层、一层的区别。

唐代的寺塔，有西安兴教寺玄奘塔，在西安城南五十里，唐总章二年（公元六六九年）建。塔五层，平面方形，国内塔之砌作木构形者，当以此为最古。

香积寺塔，在西安城西南五十里。塔建于唐永隆二年（公元六八一年），与玄奘塔同一类型，平面正方，高十三层，今仅存十一层半。

慈恩寺大雁塔，在西安城南八里，唐之长安城中进昌坊。武则天长安（公元七一一至七二四年）中重建。塔七层，平面正方形。此塔与玄奘塔、香积寺塔，为同一类型，都是模仿木结构形状而造成。各层以木构成楼板，升降亦用木扶梯，可以作为隋唐时代塔内结构的代表作。

荐福寺小雁塔，在西安城南三里。唐中宗景龙（公元七二七至七三九年）中建。塔十五层，平面正方形。各层塔身，高广均递减，愈上愈促，塔全部轮廓呈现秀丽畅快之形制。今顶上二级已塌毁，只剩下十三级了。

嵩山法王寺砖塔，十五层，平面正方形，无建造年代，从它的形制来讲，当与西安小雁塔同一时期。

崇圣寺三塔，在云南大理点苍山腰。唐末南诏国主嵯巅所建，塔十五层。“三浮图玉柱标空，金顶耀日，寰中之塔，无与比肩”（李元略《崇圣寺略记》）。

我国塔的建筑形式和风格，固然受到五天竺建筑的深刻影响，但中国优秀的建筑师们却也尽量运用中国建筑结构上的优良传统技术，很快使它变成为自己民族形式的东西，来装点我们伟大祖国的美丽河山。〔二〕

隋唐的房屋，由于多是木构造的，因此能保存到今天非常困难。山西五台山南台之外，有佛光寺大殿，殿建于唐宣宗大中十一年（公元八五七年），此为我国现存最古之木构造物。殿平面广七间，深四间。除殿本身为唐代之木结构建筑物外，殿内尚存唐塑佛菩萨像数十尊，梁下有唐代题名墨迹，拱眼壁有唐代壁画，可为我国古代建筑之瑰宝。由于佛光寺位置于南台之外，后世朝山者人迹罕至，香火冷落，寺极贫寒，因而一千余年来，得幸免重建之厄。

唐太宗昭陵，在陕西醴泉县西北五十里，因九嵕山为陵。据《长安图志》，昭陵周垣两重，前建献殿，陪葬诸王公主嫔妃功臣一百余人，刻蕃酋十四人像，并所乘六骏之形。今六骏尚存，四骏在西安陕西省立博物馆，两骏已盗往国外，现存美国。

唐高宗乾陵，在陕西乾县北五里，因梁山为陵。亦周垣两重，山垣四面辟门，四隅为角楼。陵前双阙，石师石马，蕃酋六十四人像。今石人石兽尚存，为唐代雕刻精品。

隋唐五代的书法 陈代吴兴有永欣寺僧智永，是大书法家王羲之的裔孙，藏有很多二王真迹，他本人也真草并工。和智永同时稍后有智果，亦居永欣寺，行草入能品，甚为隋炀帝所重。据《书断》说：智果“工书铭石，甚为瘦健，造次难类”。他曾对智永说：“和尚得右军肉，智果得骨。”当时人对智果书法的评价，只认为“此公稍乏清幽，伤于浅露”（《太平广记》卷二百七引《书断》）。当然，智果在书法方面，还是得到右军的嫡传的。

唐初的书法，一宗二王。唐太宗好二王，即位后，“大购图书，宝于内库。钟繇、张芝、芝弟昶、王羲之父子书四百卷，及汉、魏、晋、宋、齐、梁杂迹三百卷”（《法书要录》引徐浩《古迹记》）。由于唐太宗的提倡，一时二王的书法，举世风靡。

唐太宗时代，书法方面最脍炙人口的事件，是差遣萧翼赚取《兰亭序》的故事。《法书要录》里说：

王羲之《兰亭序》，僧智永弟子辨才尝于寝房伏梁上，凿为暗槛，以贮《兰亭》，保惜贵重，甚于师在日。贞观中，太宗以听政之暇，锐志玩书，临羲之真草书帖，购募备尽，唯未得《兰亭》，寻讨此书，知在辨才之所。……上谓侍臣曰：“右军之书，朕所偏宝，就中逸少之迹，莫如《兰亭》，求见此书，梦于寤寐。此僧耆年，又无所用，若得一智略之士，设谋计，取之必获。”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曰：“臣闻监察御史萧翼者，梁元帝之曾孙，今贯魏州莘县，负才艺，多权谋，可充此使，必当见获。”太宗遂召见，翼奏曰：“若作公使，义无得理，臣请私行诣彼。须得二王杂帖三数通。”太宗依给。翼遂改冠，微服至洛潭，随商人船，下至越州（时辨才住会稽嘉祥寺）。又衣黄衫极宽长，潦倒得山东书生之体。日暮入寺，巡廊以观壁画，过辨才院，止于门前。辨才遥见翼，乃问曰：“何处檀越？”翼就前礼拜云：“弟子是北人，将少许蚕种来卖，历寺纵观，幸遇禅师。”寒温既毕，语议便合，因延入房内，即共围棋抚琴，投壶握槊，谈说文史，意甚相得。乃曰：“白头如新，倾盖如旧，今后无形迹也。”便留夜宿，设缸面药酒果等。江东云缸面，犹河北称瓮头，谓初熟酒也。酣乐之后，请宾赋诗……彼此讽咏，恨相

知之晚。通宵尽欢，明日乃去。辨才云：“檀越闲即更来。”翼乃载酒赴之，与后作诗，如此者数四，诗酒为务，……经旬朔。翼示师梁元帝自书《职贡图》，师嗟赏不已，因谈论翰墨。翼曰：“弟子先传二王楷书法，弟子自幼来耽玩，今亦数帖自随。”辨才欣然曰：“明日来，可把此看。”翼依期而往，出其书以示辨才，辨才熟详之曰：“是即是矣，然未佳善也。贫道有一真迹，颇是殊常。”翼曰：“何帖？”才曰：“《兰亭》。”翼曰：“数经乱离，真迹岂在，必是向榻伪作耳。”辨才曰：“禅师（智永）在日保惜，临亡之时，亲付于吾，付受有绪，那得参差，可明日来看。”及翼到，师自于屋梁上槛内出之，翼见讫，故驳瑕指显，曰：“果是向榻书也。”纷竞不定。自示翼之后，更不复安于伏梁上，并萧翼二王诸帖，并借留，置于几案之间。辨才时年八十余，每日于窗下临学数遍，其老而笃好也如此。自是翼往还既数，童弟等无复猜疑。后辨才出赴邑汜桥南严迁家斋，翼遂私来房前，谓童子曰：“翼遗却帛子在床上。”童子即为开门，翼遂于案上取得《兰亭》及御府二王书帖，便赴永安驿，告驿长陵诉曰：“我是御史，奉敕来此，今有墨敕，可报汝都督知。”都督齐善行闻之，驰来拜谒，萧翼因宣示敕旨，具告所由。善行走使人召辨才，辨才仍在严迁家，未还寺，遽见追赴，不知所以，又遣云：“侍御须见。”及师来见，乃是房中萧生也。萧翼报云：“奉敕遣来取《兰亭》，《兰亭》今已得矣，故唤师来别。”辨才闻语，身便绝倒，良久始苏。翼便驰驿南发，至都奏御。太宗大悦……拜翼为员外郎，加入五品，赐银瓶一，金缕瓶一，马瑙碗一，并实以珠，内廐良马两匹，兼宝装鞍辔，宅庄各一区。太宗初怒老僧之秘吝，俄以其年耄……数月后，仍赐物三千段、穀三千石，便敕越州支給。辨才不敢将入己用，乃造三层宝塔，塔甚精丽……老僧因警悸患重，不能强饭，唯歠粥，岁余乃卒。帝命供御拓书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真等四人各拓数本，以赐皇太子诸王近臣。贞观二十三年，圣躬不豫，幸玉华宫含风殿，临崩谓高宗曰：“吾欲从汝求一物，汝诚孝也，岂能违吾心耶？汝意何如？”高宗哽咽流涕，引耳而听制命，太宗曰：“吾所欲得《兰亭》，可与将去。”后随仙驾入玄宫矣。今赵模等所拓在者，一本尚直钱数万也”（《法书要录》卷三引何延之《兰亭纪》，文繁，此转引自《太平广记》卷二八，文有删略）。据《新五代史·温韬传》：“温韬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也。”“事李茂贞，为华原镇将”。“茂贞以华原县为耀州，以韬为刺史”。“茂贞又以美原县（今陕西耀县东北）为鼎州，建义胜军，以韬为节度使。”“韬在镇七年，唐诸陵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而昭陵最固，韬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笔迹，纸墨如新，韬悉取之，遂传人间，惟乾陵风雨不可发。”阙名著《江南余载》亦称：“进士舒雅尝从郑元素学，元素为雅言：‘温韬乱时，元素随之，多发关中陵墓。尝入昭陵，见太宗散发，以玉架卫之。两厢皆置石榻，有金匣五，藏钟、王墨迹《兰亭》亦在其中。嗣是散落人间，不知归于何所。’”

又据宋人周密《志雅堂杂钞》载：唐亡，昭陵发掘，《兰亭》又流落人间。后来又被人作为殉葬品，《兰亭》再度进入墓圻。南宋景定（公元一二六至一二六四年）中，有人在盗冢中，又发现所盗者之棺上，有木替，所贮皆法书，其中杂有《兰亭》真迹。“其精神透出纸外，与寻常绝殊”。但是第二次重见天日的《兰亭》真本，“为尸气所侵，其臭不可近，虽用沉脑

熏焙数十次，亦不尽去”。通过《兰亭》的赚取，和唐太宗的用来殉葬，可见唐人对二王真迹的重视和向往。

唐初的大书法家，首推虞世南（公元五五八至六三八年）。世南，会稽余姚人，少长江南。唐贞观初，官至秘书监，封永兴县公。贞观十二年卒，年八十一岁。他在陈代，曾学书于智永禅师，因此可以说是二王的嫡传。张怀瓘在《书断》里说他的字，“得大令（王献之）之宏规，含五方之正色”。“秀岭危峰，处处间起，行草之间，尤所偏工。及其暮齿（老年），加以遒逸”。李嗣真在《书品》里说：“虞世南萧散洒落，真、草唯命，如绮罗娇春，鸕鸿戏沼，故当[萧]子云之上。”（《法书要录》引（窦泉在《述书赋》里也说：“永兴（称世南）超出，下笔如神，不落疏慢，无惭世珍”（《法书要录》引）。当时人对唐初两大书法家欧、虞作比较，认为“欧之与虞，可谓智均力敌”。“欧若猛将深入，时或不利；虞若行人（外交家）妙选，罕有失辞。虞则内含刚柔，欧则外露筋骨，君子藏器（含蓄），以虞为优”（《法书要录》引张怀瓘《书断》）。可见对虞世南的评价，要比对欧阳询的评价为高。虞世南所写的《孔子庙堂碑》，后世公认为虞书妙品。碑书于贞观初年，虞世南七十多岁时所作，但书法还是遒逸有神，一些也看不出暮年的颓唐气息来，据说碑刻成之后，“车马填集碑下，毡拓无虚日”，可见虞世南书名之盛。后人评虞世南书法，“气秀色润，意和笔调，外柔内刚，修媚自喜”（莫廷韩评书），一直备受推崇。

虞世南的外甥陆柬之，吴郡人，少学书于虞世南，虽“工于效仿，劣于独断”，但也有较高成就。“晚习二王，尤尚其古，殊矜质朴，耻夫绮丽”（《书断》）。因他书法风格较高，当时书法界对他的书法有“乔松倚壁，野鹤盘松”（《宣和书谱》）的评语。

欧阳询（公元五五七至六四一年），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市）人。少长江南，后仕隋为太常博士，入唐历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封渤海县男。贞观十五年卒，年八十五岁。他开始也从学习二王入手，但他和虞世南各有不同。虞世南一生谨守二王尺度，不敢失坠，只是在二王的书法基址上，力求上进。欧阳询则不然，他早年虽也宗法二王，但入北以后，看到的东西更多，如“询尝行，见索靖所书碑，初唾之而去，后复来观，乃悟其妙，于是卧于其下者三日”（《宣和书谱》）。这一例子，就说明他开始受到北方书法风格的影响，所以更从笔力刚劲瘦硬这方面去用功夫，开始在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了。所以张怀瓘说他“真行之书，虽于大令（王献之），亦别成一体”（《书断》），就是从这方面说的。

欧阳询“八体尽能”，“篆书尤精”（《书断》），更善于书写碑志。他的楷书碑志，以《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邕禅师碑》为代表，“笔力劲险”（《书断》），气韵生动，达到较高艺术水平。他在草书的造诣上，也很高。李嗣真在《书品》里说他的草书“如旱蛟得水，馋兔走穴”（《法书要录》引）。张怀瓘说他的草书，“迭荡流通，视之二王可为动色。然惊奇跳骏，不避危险，伤于清雅之致”。大概欧阳询的书法成就虽高，但在二王的嫡系看来，还嫌不纯，有掺入北方风格的地方，因此对他尚有微词。但也由于欧阳询和褚遂良的书法，以后直接影响颜真卿和柳公权，对宋代的书法发展，影响也较大，因此对他的书法，愈到后来评价愈高。唐韦续《九品书》：“欧阳询书，若草里蛇惊，云间电发，若金刚之瞋目，力士之挥拳。”《宣和书谱》称欧阳询“晚年笔力并刚劲……或比之草里蛇惊，云间电发。

至其笔画工巧，意态精密，俊逸处，而人复比之孤峰崛起，四面削成，论者皆非虚语也”。苏轼也说：“欧阳率更书，研紧拔群，尤工于小楷。……今观其小楷，劲险刻厉”（《东坡题跋》）。莫廷韩评书称：“欧之正书，浓纤得度，刚劲不挠，点划工妙，意态稍密，杰出当时。”欧阳询的书名，远播邻国，高丽尝遣使求之。唐太宗笑着对人说：“彼观其书，固谓形貌魁梧耶！”（《新唐书·儒学欧阳询传》）因为欧阳询的身材是很矮小的，可是他的字体，却含有雄劲的气魄。

欧阳询的儿子欧阳通，武则天时为宰相，后为酷吏所杀。他自幼便刻意临摹他父亲的书法，因以能书名，世称大、小欧阳。近年出土的唐碑中，有《泉男生碑》，就是署名欧阳通所书。他的字没有他父亲那么丰腴，所谓“瘦怯于父”（《书断》），但结体雅正，出笔劲挺，艺术上的造诣也很高。

在虞世南未死之前（贞观十二年前），唐太宗所收藏的二王真迹，大都是由虞世南鉴定的。虞世南死后，唐太宗很伤心地说：“虞世南死后，无人可与论书！”魏徵就把褚遂良推荐给唐太宗，说：“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之体”（《法书要录》引《唐朝叙书录》）。自此，对二王真迹的鉴定，都由褚遂良来负责了。

褚遂良（公元五九六至六五九年），贞观末，为中书令，高宗永徽初，为尚书右仆射，封河南郡公。后以谏立武后，再贬爱州刺史，卒，年六十四。褚遂良也是以学二王擅名，李嗣真在《书品》中说他“临写右军，亦为高足，丰艳雕刻，……功勤精悉”（《法书要录》引）。张怀瓘在《书断》中称褚遂良“少则服膺虞监（世南），长则祖述右军。真书甚得其媚趣，若瑶台青琐，窅映青林，美人婵娟，不任罗绮，增华绰约，虞、欧谢之”。唐韦续《九品书》云：“褚遂良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苏轼也说：褚遂良“清远萧放，微杂隶体”（《东坡题跋》）。莫廷韩评书：“褚法出入钟王，古雅绝俗，……风流绰约，欧、虞谢之。”他们对褚遂良的书法评价都很高。褚遂良的代表作有《伊阙佛龕碑》、《孟法师碑》、《圣教序》等，都达到艺术水平的高度。

褚遂良既以书法著名，曾问虞世南曰：“‘某书何如永师？’曰：‘吾闻彼一字直五万，官何得若此？’曰：‘何如欧阳询？’虞曰：‘闻询不择纸笔，皆能如志，官岂得若此？’褚曰：‘既然，某何更留意于此。’虞曰：‘若使手和笔调，遇合作者，亦深可贵尚。’褚喜而退。”（《太平广记》卷二百八引《国史异纂》）可见褚遂良自持也是很高的。

褚遂良和欧阳询一样，虽然也是宗法二王的，但都受到北方风格的影响，已经融合南北的风格而进一步发展了。尤其褚遂良的书法，可以说是融合南北风格较成功的一个书家。

薛稷（公元六四五至七一三年），河东汾阴人，是隋代著名诗人薛道衡的曾孙。唐睿宗时，稷以黄门侍郎，参知机务，后历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开元元年，以党太平公主，为唐玄宗所杀，年六十五。薛稷是魏徵的外孙，魏徵家里藏有虞世南、褚遂良等许多真迹，薛稷自少锐精临仿，遂以书名天下。他的书法，结体遒丽，张怀瓘在《书断》中称他：“书学褚公，尤尚绮丽媚好，肤肉得师之半。”韦续《续书品》称薛稷书如“风惊苑花，雪惹山柏”。董道《广川书跋》说：“薛稷于书，得欧、虞、褚、陆遗墨至备，故于法可据。然其师承血脉，则于褚为近。至于用笔纤瘦，结字疏通，又自别为一家。”对薛稷的书法成就，评价都很高。所以后人列欧、虞、褚、薛为

初唐书法的四大家。

在初唐，二王之体，既风靡一时，因此集王的风气，也非常盛行。唐高宗咸亨三年（公元六七二年），释怀仁到各处模拓王羲之真迹，勒成《圣教序》全文，世称王《圣教》，以别于褚遂良所书的褚《圣教》。这一块碑，对当时和后来二王书法的发展，影响都很大。

唐前期，崇尚二王之体，除个别碑志还参酌隶体以外，一般都是真书上石的。碑志往往结体端正，书法妍雅，深可宝贵。唐志的另一特点，即不少碑志，署有书写人姓名爵里，而且有些碑志是由著名书家执笔的。如盛唐时，书家李邕，他一人一生前后就写了八百多通墓志。李邕，扬州江都人，父李善以《文选》注著名。李邕长于碑志文，当时人士不仅请他做碑志，同时因他善书法，也请他写碑志，“当时奉金帛而求邕书，前后所受钜寓余，自古未有如是之盛者也。”李邕官北海太守，世称之为李北海。因为李邕是学二王的，所以他还以二王书法来写碑志，他所写的《云麾将军碑》，到今天还是学书者的楷模。李邕从二王入手，后又略“变右军行法，顿挫起伏，即得其妙，乃摆脱旧习，笔力一新，李阳冰谓之书中仙手”。“议者以为骨气洞达，奕奕如有神力”（《宣和书谱》）。李邕的书法，愈到后来，推重愈高。唐韦续《续书品》称李邕书如“华岳三峰，黄河一曲”，气势非常雄壮。苏轼的书法实际是学徐浩入手的，后来苏轼在文学方面的成就，远远超过徐浩，因此人家把苏轼的书法比似徐浩，苏轼就不愿意；比他似李邕，他就很高兴。苏轼自评字云：“昨日见欧阳叔弼，云‘子书大似李北海，予亦自觉其如此，世或以为似徐[浩]者，非也’”（《东坡题跋》）。解缙《续书评》称李邕书法，如“楼台映日，花木逢春”。赵孟俯已经很推崇李北海了，董其昌推崇更甚，他说：“王右军如龙，李北海如象”（冯班《钝吟书要》），把李邕和王羲之并列起来了。

李唐碑志，明清出土的已很多，近代出土的更多，将近四五千件，考查唐代的书法衍变，研究唐代历史资料时，这是一座宝库。我呼吁国家文物局、出版局组织力量，仿赵万里同志《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体例，把唐五代墓志拓本全部搜集起来，加以影印出版。

在草书方面，唐高宗、武则天时人孙过庭，字虔礼，陈留人。书学二王，“工于用笔，隽拔刚断”（《书断》），如“丹崖绝壑，笔势坚劲”（唐韦续《续书品》），书名著于一时。他写的草书《书谱》，至今流传，作为草书学习的楷模。长沙释怀素，也以草书著名，李白在《草书歌行》中也说：“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对他非常推重。韦续《续书品》称：释怀素书“援毫掣电，随手万变”。《宣和书谱》说怀素的草书，似“惊蛇走虺，骤雨狂风”，可说字字飞动。米芾也说“怀素书字法清远”（《宝章待访录》），对他推重很高。怀素每天练书，日久“弃笔推积，埋于山下，号曰笔冢”（《太平广记》卷二百八引《国史补》）。怀素的代表作是《自叙》帖，在艺术上有较高成就。开元时，吴人张旭，以草书名家。据说：他见“公主与担夫争路，而得笔法之意。后见公孙氏舞剑器而得其神”（《太平广记》卷二百八引《国史补》）。“旭尤善狂草，性嗜酒，每酒酣兴起，落笔挥洒，醒后自视，以为神异，不可复得”，当时呼之为张颠。他的草书，“虽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无一点画不该规矩者”。苏轼也称赞张旭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所以世称神品。张旭的真书，如代表作《郎官石柱记》。苏轼说：“作字简远，如晋宋间人”（《东

坡题跋》)。古人赞为“进退履绳，旋曲中规”（《广川书跋》），备尽楷法。由于张旭在楷书方面功力很深，因此，草书方面的成就，也容易突出。关于张旭的书法，还有一则小故事，很吸引人。张旭为“苏州常熟尉，上后（到差后）旬日，有老父过状（递上呈文），判去，不数日复至，乃怒而责曰：‘敢以闲事，屡扰公门。’老父曰：‘某实非论事，但睹少公（尊称县尉曰少公）笔迹奇妙，贵为篋笥之珍耳’”（《太平广记》卷二百八引《幽间鼓吹》）。这个老父的先人也是工书的，所以老父本人才爱张旭书法到这种程度。会稽贺知章，官至秘书监，好酒，自号“四明狂客”。知章善草书，“纵笔如飞，酌而不竭”（唐韦续《续书品》）。史亦称知章“善草隶，好事者具笔研从之，意有所惬，不复拒，然纸才十数字，世传以为宝”（《新唐书·隐逸·贺知章传》）。知章每酒酣命书，“忽有好处，与造化相争，非人功所到也”（《法书要录》引《述书赋》）。他手写的《孝经》真迹，唐代流入日本，至今宝存，影印流传，笔力清劲，结体隽拔，真是天壤间之瑰宝！

李阳冰，原籍赵郡，寄寓云阳（今江苏丹阳县）。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七五九年）至上元二年（公元七六一年），为缙云令。代宗宝应元年（公元七六二年），为当涂令。李白那年死在当涂，他还做了一篇李白《草堂集序》。后来官至国子监丞、集贤院学士，见欧阳修《六一题跋》。他工于书法，尤精小篆，初师李斯《峯山碑》。他的篆书，“劲利豪爽，风行雨集。识者谓之苍颉后身”（《法书要录》引《述书赋》注）。阳冰曾自言“斯翁之后，直至小生，曹喜、蔡邕不足言”。“绛州有篆字，与古不同，颇为怪异，李阳冰见之，寝卧其下，数日不能去。验其书是唐初，不载书者名姓，碑有碧落二字，时人谓之《碧落碑》”（《太平广记》卷二百八引《国史补》）。

《宣和书谱》云：“方时颜真卿以书名，真卿书碑，必得阳冰题其额，欲以擅连璧之美。盖其篆法妙天下如此，议者……论有唐三百年以篆称者，惟阳冰独步。舒元舆作《玉筋篆志》，亦曰：‘阳冰之书，其格峻，其力猛，其功备，光大于秦斯备矣。’”韦续《续书品》称：“李阳冰若古钗倚物，力有万夫，李斯后一人而已。”

徐浩，字季海，越州人。父峤之，广平太守。浩，代宗时，官岭南节度使，改吏部侍郎，后责授明州别驾，改彭王传，卒。“峤之善书，以法授浩，益工。当书四十二幅屏，八体皆备，草隶尤工，世状其法曰‘怒猊抉石，渴骥奔泉’云”（《新唐书·徐浩传》）。徐浩是张九龄的外甥，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赠张九龄司徒诰》，据说就是徐浩所书写，“用一尺绢书，多渴笔，有锋芒”（米芾《书史》）。黄庭坚说：“季海长处正是用笔劲正而心圆。”又云：“如季海笔少令韵胜，则与[庾]稚恭并驱争先可也。”又说：“季海暮年，乃更摆落王氏规摹，自成一家”（《山谷题跋》）。米芾说：“《评书帖》，徐浩书，收转处，屈强拗折，故昔人有抉石奔泉之目”（《宝章待访录》）。都很推重徐浩。米芾又说：“开元以来，缘明皇字体肥俗，始有徐浩，以合时君所好，经生（钞写手）字亦自此肥，开元已前古气无复有矣。还说：“唐人以徐浩比[王]僧虔，甚失当。浩大小一伦，犹吏楷也”（《海岳名言》）。可见米芾推重徐浩以外，有时也对他有贬辞的。大概徐浩以前，学二王，字体瘦硬，徐浩以后，学二王，字体渐趋肥腴，渐渐和晋法距离远起来了。苏轼是从徐浩入手的，可是他晚年很不愿让人说他是学徐浩的。黄庭坚曾“跋东坡《水陆赞》云：东坡此书圆劲成就，所谓‘怒猊抉

石，渴骥奔泉’，恐不在徐会稽（徐浩）之笔，而在东坡之手矣”（《山谷题跋》），这几句话中，透露出苏轼早年书法受徐浩影响的内幕来，但是黄庭坚是不愿和苏轼当面谈及的。

二王的书法，似回风流雪，主要是“风骨”和“娟媚”四个字。唐初学二王著名的如虞世南、褚遂良，也都获得“风骨”和“娟媚”四个字。所以有人说，褚遂良的书法，如“美女婵娟，不任罗绮”。如果单是有“娟媚”，而没有“风骨”的话，那是不足称道的。徐浩迎合时君所好，字体稍稍肥腴起来。肥腴起来之后，容易流于肥俗，颜真卿出，搀杂以篆籀气，一矫当时肥俗之病。颜真卿（公元七九至七八四年）在安禄山起兵，河北尽陷时，独以平原太守为唐守御。唐玄宗始闻禄山起兵，叹曰：“河北二十四郡，无一忠臣邪？”后来听说颜真卿为唐抗御禄山，谓左右曰：“朕不识真卿何如人，所为乃若此！”（《新唐书·颜真卿传》）。到了唐德宗时代，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举兵反抗朝廷，唐又命颜真卿宣慰希烈，真卿庭詈希烈，卒为希烈所害。由于颜真卿的气节，“忠贯白日，识高天下，故精神见于翰墨之表者，特立而兼括”（《宣和书谱》）。宋欧阳修跋其断碑云：“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端严庄重，使人畏而爱之。虽其残阙，不忍弃也”（《六一题跋》）。董其昌说：“颜清臣（真卿之字）忠义大节，唐代冠冕，世人以其书传”（《戏鸿堂帖》）。可见他的人品，更提高了他书法方面的成就，因此特别为人们所宝贵。颜真卿封鲁郡公，天下皆称之曰颜鲁公。颜真卿并“善正、草书，笔力遒婉，世宝传之”（《新唐书·颜真卿传》）。唐韦续《续书品》称：“颜真卿书，锋绝剑摧，惊飞逸势。”给予很高评价。苏轼说：“颜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后之作者，殆难措手”（《东坡题跋》）。黄庭坚说：“观鲁公此帖，奇伟秀拔，奄有魏、晋、隋、唐以来风流气骨，回观欧、虞、褚、薛、徐、沈（传师）辈，皆为法度所窘，岂如鲁公肃然一出于绳墨之外，而卒与之合哉！盖自二王后，能臻书法之极者，惟张长史与鲁公二人”（《山谷题跋》）。米芾说，颜真卿的草书，“自张颠（张旭）血脉来”。米芾又说：颜真卿“《与郭知运争坐位帖》，有篆籀气，颜杰思也”（《海岳名言》）。又说：“颜鲁公《与郭定襄争坐位第一帖》，起草秃笔，字字意相连属飞动，诡形异状，得于意外也。世之颜行，第一书也。”他的真书，“《疏拙帖》，古麻纸书，真字，清劲秀发”（《宝章待访录》）。宋代的书家，见到他的真迹，都予以很高的评价。颜真卿的书法，“点如坠石，划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弩”（《宣和书谱》），字体奇古遒逸，庄重闳伟，具有自己的独特风格。颜真卿的代表作有《中兴颂》、《颜氏家庙碑》、《麻姑仙坛记》、《觉仙坛记》、《争坐位帖》、《告身》等等。

柳公权，京兆华原人，以进士擢第，累官翰林侍书学士、中书舍人、翰林书诏学士、谏议大夫、知制诰、学士承旨、集贤学士、判院事、金紫光禄大夫，封河东郡公，历工部尚书，太子少师，赠太子太师，卒年八十八。“公权初学王书，体势劲媚，自成一家”。初为穆宗侍书学士，“穆宗政僻，尝问公权：‘笔何尽善？’对曰：‘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上（穆宗）改容，知其笔谏也。”唐文宗“夏日与学士联句，帝曰：‘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公权续曰：‘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时丁、袁五学士皆属继，帝独讽公权两句，曰：‘辞清意足，不可多得。’乃令公权题于殿壁，字方圆五寸，帝视之叹曰：‘钟、王复生，无以加焉。’”大中初，柳公权“御前书三纸……一纸真书十字，曰‘卫夫人传笔法于王右军。’”一纸行

书十一字，曰‘永禅师真草千字文得家法。’一纸草书八字，曰‘谓语助者焉哉乎也’……仍令自书谢状，勿拘真、行，帝尤奇惜之”。‘当时公卿大臣家碑版，不得公权手笔者，人以为不孝。外夷入贡，皆别署货贝，曰：‘此购柳书。’上都西明寺《金刚经碑》，备有钟、王、欧、虞、褚、陆之体，尤为得意”（《旧唐书·柳公绰传弟公权附传》）。黄庭坚说：“柳公权《谢紫丝鞞鞋帖》，笔势往来，如用铁丝纠缠，诚得古人用笔意”（《山谷题跋》）。《宣和书谱》云：“公权之学，出于颜真卿，加以盘结遒劲，为时所重。议者以谓如‘惊鸿避弋，饥鹰下鞞’，盖以言其风骨峻极。”柳公权之兄柳公绰，官至河东节度使、兵部尚书，也工书法，他所书的《武侯庙碑》，后人誉之为唐碑中之有晋法者。

沈传师，苏州吴人。贞元（公元七八五至八五年）末，举进士，历江西观察使转宣歙观察使，卒于吏部侍郎。传师‘工书，有楷法’（《新唐书·沈既济传子传师附传》）。宋朱长文《墨池编》称：“传师正、行书，皆至妙品。”《广川书跋》谓传师所书“黄陵庙碑，世以其书为重，近人以完本售至数，谓传师此书，特谨重有法。”

杜牧，他不仅是杰出的诗人，“情致豪迈，人称小杜”。他也工书法，所“作行、草，气格雄健”（《宣和书谱》）。董其昌《容台集》称：杜牧“书张好好诗，深得六朝人风韵。予见颜、柳以后，若温飞卿与牧之，亦名家也。”杜牧所手写的《张好好诗》真迹，仍然保存到今天，现藏故宫博物院，有影印本行世。杜牧做过沈传师的幕僚，可能他的书法授受，和沈传师有渊源。

杨凝式，字景度，华阴人。父涉，唐末宰相。凝式历仕五代，后周时，官至尚书左仆射、太子太保。显德元年（公元九五四年）卒，年八十二，赠太子太傅。“凝式虽仕历五代，以心疾（精神病）闲居，故时人目为‘风子’。其笔迹遒放，宗师欧阳询与颜真卿，而加以纵逸。既久居洛，多邀游佛道祠，遇山水胜概，辄留连赏咏。有垣墙圭缺处，顾视引笔，且吟且书，若与神会，率宝护之。……其所题后，或真或草，或不可原诘。而论者谓其书自颜中书（真卿）后，一人而已”。“洛阳诸佛宫，书迹既多”。“士大夫家，亦有爱其书帖者，皆藏去，以为清玩”（宋张世南《游宦纪闻》）。《宣和书谱》亦云：凝式工于书法，“尤工颠草。居洛下十年，凡琳宫佛祠，墙壁间题记殆遍。然挥洒之际，纵放不羁。……欧阳修尝跋其字，以谓‘自唐亡……及我宋兴……盖百有五十余年。五代之际，有一杨凝式，……为一时之绝。’”苏轼云：“唐末丧乱，人物凋零”，“独杨凝式笔迹雄杰，有二王、颜、柳之余，此真为书之豪杰，不为时势所汨没者”（《论唐宋书家》）。黄庭坚云：“予曩时至洛师，遍观僧壁间杨少师书，无一字不造微入妙……见杨少师书，然后知徐（浩）、沈（传师）有尘埃气”（《山谷题跋》）。凝式“笔迹遒放，宗师欧阳询与颜真卿，而加以纵逸”（《旧五代史考异》）。因为杨凝式的行、草，都很接近颜真卿，所以世以颜杨并称。黄庭坚说：“盖自二王后，能臻书法之极者，惟张长史（张旭）与鲁公二人。其后杨少师颇得仿佛，但少规矩，复不善楷书，然亦自冠绝天下矣。”又说：“予尝谓二王以来，书艺超轶绝尘，惟颜鲁公、杨少师。”（《山谷题跋》）。《宣和书谱》也说：杨“凝式笔迹，独为雄强，与颜真卿行书相上下，自是当时翰墨中豪杰。”又说：“杨凝式之书，在季世翰墨中，如景星凤凰之杰出”（《宣和书谱》豆卢革条）。米芾、黄庭坚均认为王安石的书法，受杨凝式的影响，

米芾说：“杨凝式书，天真烂漫，纵逸类颜鲁公《争坐帖》”，“王安石尝学之，人不知也”（《书史》）。黄庭坚也说：“王荆公（王安石）书字得古人法，出于杨虚白（杨凝式）。”庭坚又认为苏轼的书法，也受杨凝式的影响，“比来苏子瞻（苏轼字子瞻）近颜、杨气骨”（《山谷题跋》）。陶谷《清异录》载：“少师杨凝式书画独步一时，求字者纸轴堆叠若垣壁，少师见则浩欢曰：‘无奈许多债主，真尺二冤家也。’”可见杨凝式书法独步当世，向他求书者之多。

唐代印刷术还没有普遍行用，一般书籍，都是由钞写手——“经生”又称“写生”（见北京图书馆敦煌文书羽字第四号写经纸背）来抄写。“唐书法，至经生，自成一律，其间固有超绝者”（《宣和书谱》杨庭条）。他们书“累数千字，终始一律，不失信次，便于疾读，但恨拘窘法度，无飘然自得之态，然其一波三折笔之势，亦自不苟”。他们中高手所作小楷，下笔有力，一点画不妄作，然修整自持，正类经生之品格高者”（《宣和书谱》释昙林条）。唐文宗太和（公元八二七至八三四年）中人吴彩鸾，钟陵（今江苏南京市）人，嫁为文士文萧客为妻，她工于书法，能抄写书籍。萧客“拙于为生，彩鸾为小楷书《唐韵》一部，市五千文为糊口”。吴彩鸾一生，写了近百部王仁煦《切韵》，字迹端正娟秀，为世传宝。“由是《唐韵》，世多得之。《唐韵》字画虽小，而宽绰有余”（《宣和书谱》）。今王仁煦《切韵》，故宫博物院藏有真迹，且已影印行世，据说就是吴彩鸾所写的。为了抬高吴彩鸾写本的价格，于是狡狴文士又造出吴彩鸾是天仙下凡，她能用一天时间写《唐韵》一部。世上决没有神仙，更不可能一天写出几万字的一部《唐韵》来，这类不真实的传说，应该予以排除。又有詹鸾，也以书写《唐韵》出卖为生。他“书《唐韵》，极有功”，他所“作楷字，小者至蝇头许，位置宽绰”。因此吴彩鸾和詹鸾所书的《唐韵》，皆著名于世。至使他们的“断纸余墨，人传宝之”（《宣和书谱》）。

在半个世纪之前，敦煌千佛洞发现了藏经卷的石窟。在这个秘密石窟中，有三万多件卷子，皆是手抄的，上起前赵麟嘉五年（公元三二一年），下至北宋初年。这三万多件卷子，几乎全是经生手抄的，唐代的抄写卷子，又几占三分之二以上。这些唐代经卷，虽和两晋南北朝一样，都是经生手抄，但比之前代，书法的水平，又大大发展了一步，它同时还明显地可以看出欧、虞、褚、薛、颜、柳等书法大家对经生书法的影响。这些经生终日低着头替寺院施主抄经，他们的生活非常困难，就只是依靠抄写的一些收入来养家活命。有时寺院和施主还故意拖欠抄写费用，这更加重了他们生活上的困难程度。有一个经卷的末尾，有这样两首诗：

写书今日了，因何不送钱？谁家无赖汉，回面不相看。

今日书他知，他来定是嗔。我今归舍去，将作是何人。从这两首诗可见经生的生活困难程度。由于我本人对敦煌唐卷真迹阅览不多，它的艺术价值就无法具体一一介绍了。在敦煌石窟中，还发现了三个唐代拓本，一是唐太宗的《温泉铭》，二是欧阳询的《化度寺碑》，三是柳公权所书《金刚经》，从这三件唐代的拓本，还可以鉴赏唐代传拓的技法和水平。

**音乐与舞蹈** 隋文帝统一南北，带来了南北两方音乐的大融合。从西晋的灭亡，匈奴、羯、氐、羌、鲜卑、丁零各族迭主中原，随着漠北、西域的音乐大量输入黄河流域，黄河流域在音乐方面最占主导势力的，不是过去“华夏正声”，而是“西凉乐”和“龟兹乐”了。东晋在江南的建国，使

南方的声歌，如吴歌、西曲中的《子夜》、《前溪》、《乌夜啼》、《石城乐》、《莫愁乐》、《襄阳乐》之类，也带着浓厚的地方色彩，被保存了下来。这样，当时的音乐界正如祖孝孙所说的出现了“陈、梁旧乐，杂用吴、楚之音；周、齐旧乐，多涉胡戎之伎”（《旧唐书·音乐志》）的现象。

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五八九年），灭陈，初定令，置七部乐，一曰《国伎》（即《西凉乐》），二曰《清商伎》（即盛行於南朝的《清商乐》），三曰《高丽伎》（包括《百济乐》在内），四曰《天竺伎》（包括《扶南乐》在内），五曰《安国伎》，六曰《龟兹伎》，七曰《文康伎》。[一]七部乐中“又杂有疏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倭国等伎”（《隋书·音乐志》）。到了隋炀帝大业中，又改定为九部乐，这九部乐是《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到了隋亡唐兴，又造《燕乐》，并加上《高昌乐》而去《礼毕》，[四]合为十部乐。《高昌乐》，舞者二人，乐器有答腊鼓、腰鼓、鸡娄鼓、羯鼓、箫、横笛、箏、琵琶、五弦、铜角、箜篌等十一种，后来箜篌也不用了。

《燕乐》的乐器有玉磬、大方响、搯箏、卧箜篌、小箜篌、大琵琶、大五弦、小五弦、大笙、小笙、大箏、小箏、大箫、小箫、正铜拔、和铜拔、长笛、短笛、羯鼓、连鼓、鞞鼓、桴鼓等二十二种，另外还有工歌二人。

唐十部乐，即《燕乐》、《清商乐》、《西凉乐》、《高丽乐》、《天竺乐》、《高昌乐》、《龟兹乐》、《疏勒乐》、《康国乐》、《安国乐》。此外，尚有南北朝时期传入的《百济乐》，唐中宗时代，工伎死散，音伎多阙，乐器也只残存了箏、笛、桃皮箏、箜篌等四种了。隋代传来的《扶南乐》，又因为它和《天竺乐》是一个音乐体系的，所以只“以《天竺乐》转写其声，而不齿乐部”（《隋书·音乐志》）。在唐代，《扶南乐》的乐器，也只残存羯鼓、都昙鼓、毛员鼓、箫、笛、箏、铜拔、贝等八种了。唐德宗贞元十六年（公元八二六年），南诏异牟寻进《奉圣乐舞》，时谓之《南诏乐》，德宗亲御麟德殿观赏了《南诏乐》。德宗贞元十八年（公元八二八年），骠国（今缅甸）国王也遣使来献《骠国乐》，“凡有十二曲，以乐工三十五人来朝，乐曲皆演释氏《经》《论》之词。骠国在云南西，与天竺国相近，故乐多演释氏之词。每为曲皆齐声唱，各以两手十指，齐开齐敛，为赴节之状。一低一昂，未尝不相对，有类中国《柘枝舞》”（《唐会要》卷三十三）。以上讲到的《百济乐》、《扶南乐》、《南诏乐》、《骠国乐》四种，皆不列入十部乐之内。

《北狄乐》，是指鲜卑、吐谷浑、步落稽（即稽胡）三个部族的音乐而言的。“皆马上之声，自汉后以为鼓吹，亦军中乐，马上奏之，故隶鼓吹署。后魏乐府初有《北歌》，亦曰《真人歌》，都代时，命宫人朝夕歌之。周、隋始与《西凉乐》杂奏。至唐存者五十三章，而名可解者六章而已。一曰《慕容可汗》，二曰《吐谷浑》，三曰《部落稽》，四曰《钜鹿公主》，五曰《白净王》，六曰《太子企喻》也。其余辞多可汗之称，盖燕、魏之际鲜卑歌也。隋鼓吹有其曲而不同。贞观中，将军侯贵昌，并州人，世传《北歌》”（《新唐书·礼乐志》）。开元初，有“歌工长孙元忠，云自高祖以来，代传其业。元忠之祖，受业于侯将军，名贵昌。”“元忠之家世相传如此，虽译者亦不能通知其辞，盖年岁久远，失其辞矣”（《旧唐书·音乐志》）。随着鲜卑、吐谷浑、步落稽语言的衰亡，《北歌》也必然趋于衰亡。

讲了唐十部乐之后，在没有介绍《燕乐》之前，先得介绍一下龟兹人苏只婆的七调。

北周武帝天和三年（公元五六八年）娶突厥阿史那皇后，在阿史那后的陪嫁的乐工中，有龟兹人苏只婆，善于音律，尤善胡琵琶。“听其所奏，一均（即韵字）之中，间有七声。因而问之，答云：‘父在西域，称为知音。代相传习，调有七种。’以其七调，勘校七声，冥若合符。”

一曰“娑陁力”，华言平声，即宫声也。

二曰“鸡识”，华言长声，即商声也。

三曰“沙识”，华言质直声，即角声也。

四曰“沙侯加滥”，华言应声，即变徵声也。

五曰“沙腊”，华言应和声，即徵声也。

六曰“般赡”，华言五声，即羽声也。

七曰“俟利”，华言斛牛声，即变宫声也。

以上七调叶今西乐音符，列表于下：

郑译向苏只婆学习弹弄胡琵琶，开始领会了七声的区别。七调之外，又有五旦（即五韵），把七调、五韵合成十二律。律有七韵，音立一调，故成七调十二律，孳乳为八十四调，“旋转相交，尽相和合”（《隋书·音乐志》）。这对我国音乐方面的发展，影响很大。

在此以前的音乐，《雅乐》则以宫声为调首，《清商曲》则以商声为调首，宫商以外，一般不为调首。自从苏只婆把龟兹乐调传至中原地区以后，这种传统习惯就被打破了，七声都可以成调首了，这在中国音乐史上来说，不能不说是个很大的发展。[五]

《燕乐》，正确地说来，是中原化后的《龟兹乐》。由于唐十部乐中，以《燕乐》居首，所以不得不与《龟兹乐》分部。龟兹乐是前秦苻坚命吕光到龟兹时传其乐声的，可是中原地区传习之盛，却是从北魏后期开始。《通典·乐典》称：“自宣武（元恪）已后，始爱胡声，泊于迁都，屈茨（龟兹）琵琶、五弦、箜篌、胡、胡鼓、铜钹、打沙罗，胡舞，铿锵镗镗，洪心骇耳，抚箏新靡绝丽，歌音全似吟哭，听之者无不凄怆。”到了北齐后期，《龟兹乐》更是盛行，有曹婆罗，在魏世以弹龟兹琵琶著名当世，子曹僧奴，僧奴子曹妙达，北齐后主高纬时，“以能弹胡琵琶，甚被宠遇，俱开府封王”，此外如“何朱弱、史丑多之徒十余人，咸以能舞工歌，及善音乐者，亦至仪同开府”。后主还使幸臣韩凤于梨阳（河南浚县东北）临河筑城戍，曰：“急时且守此作龟兹国子”（《北史·恩幸传》）。到了隋代，《龟兹乐》更盛行于民间，“新声奇变，朝改暮易”。隋炀帝并自“制艳篇”，“令乐正白明达（龟兹人）造新声，创《万岁乐》……《门百草》、《泛龙舟》……等曲，掩抑摧藏，哀音断绝”（《隋书·音乐志》）。唐太宗“贞观末，[疏勒人]裴神符者，妙解琵琶，作《胜蛮奴》、《火凤》、《倾杯乐》三曲，声度清美，太宗深爱之”（《唐会要》卷三十三）。唐高宗“晓音律，闻风叶鸟声，皆蹈以应节。尝晨坐闻莺声，命乐工白明达写之为《春莺啭》”（《乐府诗集》卷八十引《教坊记》）。以上一些例子，都说明了隋唐时期，《龟兹乐》真是风靡一世。

唐代的十部乐，又分为坐立两部，坐部在堂上坐奏，立部在堂下立奏。对坐部乐工的音乐修养，要求较高。元稹《立部伎》诗注称当时太常选坐部伎无性识者，退入立部伎，绝无性识者，始退入《雅乐》部，可见西域音乐

的地位，远要比所谓华夏正声的雅乐地位高。

立部伎有《安乐》、《太平乐》、《破阵乐》、《庆善乐》、《大定乐》、《上元乐》、《圣寿乐》、《光圣乐》凡八部。

《安乐》，即北周的《城舞》，“行列方正，象城郭”。“舞者八十人，刻木为面，狗喙兽耳，以金饰之，垂线为发，画狻皮帽”（《旧唐书·音乐志》）。这些装饰，再配合《龟兹乐》，可以说充满了鲜卑的情调。

《太平乐》，“亦谓之《五方师子舞》。师子鸞兽，出于西南夷、天竺、师子（斯里兰卡）等国。缀毛为之，人居其中，像其俯仰驯狎之容。二人持绳秉拂，为习弄之状。五师子各立其方色，百四十人歌《太平乐》，舞以足，持绳者服饰作昆仑象”（《新唐书·音乐志》）。

《破阵乐》，太宗所造。“太宗为秦王之时，征伐四方，人间歌谣《秦王破阵乐》之曲。及即位，使吕才协音律，李百药、虞世南、褚亮、魏徵等制歌辞。百二十人披甲持戟，甲以银饰之。发扬蹈厉，声韵慷慨，享宴奏之”。又云：“太宗制《破阵舞图》，左圆右方，先偏后伍，鱼丽鹅贯，箕张翼舒，交错屈伸，首尾回互，以象战阵之形。”“凡为三变，每变为四阵，有来往疾徐击刺之象，以应歌节”（《旧唐书·音乐志》）。后更名为《七德之舞》。

《庆善乐》，太宗所造。太宗生于武功之庆善宫，既即帝位，宴于宫中，“赋诗，被以管弦。舞者六十四人”，“舞蹈安徐，以象文德洽而天下安乐也”（《旧唐书·音乐志》）。后更名为《九功之舞》。唐以《破阵乐》为武舞，《庆善乐》为文舞。《破阵乐》亦称《神功破阵乐》，《庆善乐》亦称《功成庆善乐》。

《大定乐》，“出自《破阵乐》。舞者百四十人，被五采文甲，持槊”（《旧唐书·音乐志》）。

《上元乐》，“高宗所造。舞者百八十人，画云衣，备五色，以象元气，故曰上元”（《旧唐书·音乐志》）。

《圣寿乐》，“高宗武后所造也。舞者百四十人，金铜冠，五色画衣，舞之行列必成字，十六变而毕。有‘圣超千古，道康百王，皇帝万年，宝祚弥昌’字”（《旧唐书·音乐志》）。《乐府杂录》：“字舞者，以舞人亚身於地布成字也。”《教坊记》：“《圣寿乐》舞，衣襟皆各绣一大窠，皆随其衣本色。制纯纁衫，下才及带，若短汗衫者以笼之，所以藏绣窠也。舞人初出，乐次皆是纁衣舞。至第二叠，相聚场中，即于众中，从领上抽去笼衫，各纳怀中。观者忽见众女咸文绣炳焕，莫不惊异。”

《光圣乐》，“玄宗所造也。舞者八十人，鸟冠，五采画衣”（《旧唐书·音乐志》）。

“自《破阵舞》以下，皆雷大鼓，杂以龟兹之乐，声振百里，动荡山谷。《大定乐》加金钲。惟《庆善舞》虽独用《西凉乐》，最为闲雅”（《旧唐书·音乐志》）。

《安乐》等八舞，声乐皆立奏之，乐府谓之立部伎，其余总谓之坐部伎”（《旧唐书·音乐志》）。

“坐部伎有《燕乐》、《长寿乐》、《天授乐》、《鸟歌万寿乐》、《龙池乐》、《破阵乐》，凡六部”（《旧唐书·音乐志》）。

《燕乐》，贞观时，张文收所造。舞者二十人，分为四部。《景云乐》，舞者八人。小《庆善乐》，舞者四人；小《破阵乐》，舞者四人；《承天乐》，舞者四人。后来小《庆善乐》、小《破阵乐》、《承天乐》三种都不奏了，

只有《景云乐》还流传下来。

坐部伎还有《长寿乐》，武则天长寿（公元六九二至六九四年）中所造。“舞十有二人，画衣冠”（《旧唐书·音乐志》）。

《天授乐》，武则天天授（公元六九〇至六九一年）中所造，“舞四人，画衣五采，凤冠”（《旧唐书·音乐志》）。

《鸟歌万岁乐》，武则天所造。时宫中养鸟能人言，常呼万岁，故为乐以象之。舞三人。

《龙池乐》，玄宗所造。玄宗未即位前，居隆庆坊，有池，弥漫数里，即位后，作《龙池乐》，“舞十有二人，人冠饰以芙蓉”（《旧唐书·音乐志》）。

《破阵乐》玄宗所造。“生于立部伎《破阵乐》。舞四人，金甲胄”（《旧唐书·音乐志》）。立部伎有《破阵乐》，舞者一百二十人。坐部伎《燕乐》有小《破阵乐》，舞者四人。此又有《破阵乐》，舞者也是四人。自《长寿乐》已下，皆奏《龟兹乐》，唯《龙池》备用雅乐，而无钟磬。

隋文帝平陈，把南朝的音乐，总谓之《清商乐》，亦谓之《清乐》，并置清商署以保存这一部音乐。武则天时候，《清乐》犹存六十三曲，到了唐末，其辞能保留下来的只有三十二首了，尚有七首，已有声无辞了。三十二曲中有《白雪》周曲也。《公莫舞》，晋宋谓之《巾舞》。《巴渝舞》，汉高祖自蜀汉伐楚，以版楯蛮为前锋，其人勇而好斗，又好歌舞，使乐工象其击刺之形，号曰《巴渝舞》。《昭君》汉元帝时远适匈奴单于，汉人怜其远嫁，为作此歌。晋石崇姬人绿珠善舞，崇以此曲教之，而自制新歌曰：“我本汉家子，将适单于庭。昔为匣中玉，今为粪土英。”《凤将雏》，汉世旧曲。《明之君》，本汉世《鞞舞曲》，梁武帝改制其辞。《铎舞》，亦汉曲。

《白鸠》，吴朝旧曲。《白紵》，沈约云：“紵本吴地所出，疑是吴舞也。”梁武帝又令沈约改制《四时白紵》。《子夜》，晋曲也。晋有女子名子夜造此曲，声过哀苦。《前溪》，晋沈充所制。《阿子》及《欢闻》，晋穆帝时民间所唱。《团扇》，晋世民歌。《懊侬》，晋隆安（公元三九七至四〇一年）中民谣。《长史变》，晋末司徒左长史王廞临败所制。《督护》，晋宋间曲。今歌是宋孝武帝所制，云：“督护上征去，侬亦恶闻许。愿作石尤风，四面断行旅。”《读曲》，宋人为彭城王刘义康所制。《乌夜啼》，宋临川王刘义庆所作。唐世所传歌辞，云：“歌舞诸少年，娉婷无种迹。菖蒲花可怜，闻名不相识。”已非义庆本辞。《石城》，宋臧质所作。石城在竟陵，臧质尝为竟城郡守，於城上眺瞩，见群少年歌谣通畅，因作此曲，歌云：“生长石城下，开门对城楼。城中美年少，出入见依投。”《莫愁乐》，出於《石城乐》。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谣，歌云：“莫愁在何处，莫愁石城西。艇子打两桨，催送莫愁来。”《襄阳乐》，宋随王刘诞所作。其歌曰：“朝发襄阳来，暮至大堤宿。大堤诸女儿，花艳惊郎目。”《栖乌夜飞》，宋沈攸之所作。《估客乐》，南齐武帝萧赜所作。歌曰：“昔经樊邓役，阻潮梅根渚。感忆追往事，意满情不叙。”释宝月善音律，武帝使宝月奏之，敕歌者常重为感忆之声。《杨伴儿》，齐时歌谣。歌云：“暂出白门前，杨柳可常乌。欢作沉水香，侬作博山炉。”《骁壶》，疑是投壶之乐。《常林欢》，疑是宋、梁间曲。荆州有长林县，常长声相近，盖乐人误谓“长”为“常”。

《三洲》，商人歌也。商人数行巴陵三江之间，因作此歌。《采桑》，由《三洲曲》孳乳而生。《春江花月夜》、《玉树后庭花》、《堂堂》，并陈后主

共朝臣狎客及宫中女学士相和所作，又命太乐令何胥采其尤艳丽者以为乐曲。《泛龙舟》，隋炀帝江都宫所作。自武则天长安（公元七 一至七 四年）以后，吴歌西曲，“工伎转缺，能合於管弦者，唯《明君》、《杨伴》、《骝壶》、《春歌》、《秋歌》、《白雪》、《堂堂》、《春江花月》等八曲”（《旧唐书·音乐志》）而已。

吴歌西曲，是地区性的音乐，传入中原，总属清商署以后，不但乐章日渐残缺，就是和吴、楚的音调也距离转远。当时刘昉（刘知几子）认为“宜取吴人使之传习，开元中，有歌手李郎子。李郎子北人，声调已失，云学于李才生。才生，江都人也，自郎子亡后，《清乐》之歌阙焉”（《通典·乐典》）。说明唐玄宗开元时，江南传入北方的《清商乐》就已日益散失，幸亏宋人郭茂倩在撰集《乐府诗集》时，把不少吴歌西曲的歌辞保存了下来。它不但保存了东晋南朝的吴歌西曲歌辞，同时也把唐代《清商乐》歌辞保存了不少，这对我们研究《清商乐》是帮助很大的。

音乐和舞蹈有着必然的联系。唐段安节《乐府杂录》称：“舞者，乐之容也，有大垂手、小垂手，或像惊鸿，或如飞燕。娉娉，舞态也。蔓延，舞缀也。”唐代分《健舞》、《软舞》、《字舞》、《花舞》、《马舞》。《字舞》已见上《圣寿乐》，《马舞》别见散乐下。《花舞》据《乐府杂录》谓舞者“著绿衣，偃身合成花字也。”这下面主要介绍《健舞》和《软舞》两种。《健舞》曲有《稜大》、《阿连》、《柘枝》、《剑器》、《胡旋》、《胡腾》；《软舞》曲有《凉州》、《绿腰》、《苏合香》、《屈柘》、《团圆旋》、《甘州》等”（《乐府杂录》。崔令钦《教坊记》则称：“《阿辽》、《柘枝》、《黄麈》、《拂菻》、《大渭州》、《达摩支》之属，谓之《健舞》”；“《垂手罗》、《回波乐》、《兰陵王》、《春莺啭》、《半社渠》、《借席》、《乌夜啼》之属，谓之《软舞》”。《健舞》中的《柘枝》，出自石国。《乐府诗集》卷五十六引《乐苑》云：“羽调有《柘枝曲》，商调有《屈柘枝》。此舞因曲为名。用二女童，鲜衣帽，帽施金铃，抃转有声。其来也，於二莲花中藏，花坼而后见。对舞中雅妙者也。”白居易《柘枝伎》诗云：

平铺一合锦筵开，连击三声画鼓催。红蜡烛移桃叶起，紫罗衫动柘枝来。带垂钿胯花腰重，帽转金铃雪面回。看即曲终留不住，云飘雨送向阳台。又《柘枝词》：“绣帽珠稠缀，香衫袖窄裁。”刘禹锡《和乐天柘枝》诗：“鼓催残拍腰身软，汗透罗衣雨点花。”张祜《金吾李将军柘枝》诗：

足叠蛮鼉引柘枝，卷檐虚帽带交垂。紫罗衫宛蹲身处，红锦靴柔踏节时。微动翠蛾抛旧态，慢遮檀口唱新词。客看舞罢轻云起，却赴襄王梦里期。又《周员外出双舞柘枝伎》诗：

画鼓拖环锦臂攘，小娥双换舞衣裳。金丝蹙雾红衫薄，银蔓垂花紫带长。鸾影乍回头对举，凤声初歇翅齐张。一时折腕招残拍，斜敛轻身拜玉郎。又《池州周员外出柘枝》诗：

红筵高设画堂开，小妓妆成为舞催。珠帽著听歌遍匝，锦靴行踏鼓声来。纤纤玉笋罗衫撮，戢戢金星钿带回。长恐周瑜一私顾，不教闲客望瑶台。张祜还有一首《赠柘枝》诗，提到“帽侧蹙腰铃数转，亚身招拍腕频斜。”又《赠杭州柘枝》诗：“傍收拍拍金铃摆，脚踏声声锦靴催。”把以上一些资料 and 诗句归纳起来看，中原的柘枝舞或单人舞或双人舞，舞妓穿着五色罗衫，窄袖，锦靴，腰系银色带，头冠绣花卷檐虚帽，帽上别施金铃，回旋转侧之

际，铃声锵锵，和乐声鼓声相合。舞至曲终，“急破催摇曳，罗衫半脱肩”（薛能《柘枝词》），舞态是非常媚人的。

《剑器舞》，也属健舞之一。曲有《西河剑器》及《剑器子》。舞伎，武装，独舞，持双剑（白居易《立部伎》：“立部伎，舞双剑，跳七丸，袅巨索，掉长竿。”舞双剑即指剑器子也）。剑身飘垂彩帛，舞姿浏漓顿挫，妍妙异常。惜《剑器舞》的舞态及所执是否双剑，尚待考古发现来证实。由于杜甫有《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因此《剑器舞》更为世所注意。杜甫诗序中说到“昔者吴人张旭善草书书帖，数尝于邺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豪荡感激，即公孙可知矣”。又《太平御览》卷五七四引《乐府杂录》谓：“开元中，有公孙大娘善舞剑器，僧怀素见之，草书盖（益字之讹）长[进]，盖准其顿挫之势也。”杜甫说是草圣张旭，段安节说是草圣怀素，不知道究竟是哪一位？

《胡旋舞》，也属健舞之一。出自康国。唐玄宗开元、天宝之际，西域康、米、史、俱密诸城邦屡献胡旋女子《胡旋舞》之在中土盛行，当在此时。白居易《新乐府》有《胡旋女》：

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歌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飘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

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元稹《胡旋女》云：

……胡旋之义世莫知，胡旋之容我能传。蓬断霜根羊角疾，竿戴朱盘火轮炫。骊珠进珥逐飞星，虹晕轻巾掣流电。潜鲸暗笪波海，回风乱舞当空霰。万过其谁辨终始，四座安能分背面。……两诗皆极赞《胡旋舞》旋转之疾，“左旋右转不知疲”，“四座安能分背面”，可谓形容旋转到淋漓尽致了。据《乐府杂录》又云：“有《骨鹿舞》、《胡旋舞》，俱於一小圆球子上舞，纵横腾踏，两足终不离於球子上，其妙如此。”《新唐书·礼乐志》亦称：“《胡旋舞》，舞者立球上，旋转如风。”《封演闻见记》谓：“今乐人又有踢球之戏，彩画木球，高一二尺，妓女登榻，球转而行，萦回去来，无不如意。”这恐怕是散乐杂伎，而不是《胡旋舞》，就是站立在小圆球子上旋转而舞的所谓《胡旋舞》，恐怕也是《胡旋舞》的新花样，而不是正统的《胡旋舞》。

《胡腾舞》，亦属健舞之一。刘言史《王中丞（王武俊）宅夜观舞胡腾》诗：

石国胡儿人少见，蹲舞樽前急如鸟。织成蕃帽虚顶尖，细氎胡衫双袖小。手中抛下蒲桃盏，西顾忽思乡路远。跳身转毂宝带鸣，弄脚缤纷锦靴软。四座无言皆瞪目，横笛琵琶遍头促。乱腾新球雪朱毛，傍拂轻花下红烛。酒阑舞罢丝管绝，木槿花西见残月。李端《胡腾》诗：

胡腾身是凉州儿，肌肤如玉鼻如锥。桐布轻衫前后卷，葡萄长带一边垂，帐前跪作本音语，拾襟搅袖为君舞。安西旧牧收泪看，洛下词人抄曲与。扬眉动目踏花毡，红汗交流珠帽偏。醉却东倾又西倒，双靴柔弱满灯前。环行急蹴皆应节，反手叉腰如却月。丝桐忽奏一曲终，呜呜画角城头发。胡腾儿，胡腾儿，故乡路断知不知。从刘、李两诗来看，《胡腾舞》舞者多属男性，与《柘枝舞》、《胡旋舞》舞者多属女性，这是最明显的不同。舞《胡腾》者大都着窄袖胡衫，衣袖甚长，舞衣前后上卷，葡萄长带、一边下垂，以便舞时飘扬生姿。因衣袖窄长，故舞时须“拾襟搅袖”，以助回旋。头戴卷檐虚帽，帽上缀以珠玉，以便舞时闪烁生光。

《春莺啭》，属《软舞》曲之一。高宗时，龟兹乐工白明达写成《春莺啭》。张祜《春莺啭》诗：

兴庆池南柳未开，太真先把一枝梅。内人已唱《春莺啭》，花下傞傞软舞来。据《太平御览》卷五七四：“开成（公元八三六至八四一年）末，有乐人崇胡子，能《软舞》，其腰支不异女郎也”（佚引书名）。可见《软舞》的舞人必须腰支柔软，能作弓弯状，和《胡旋舞》的旋转疾速，又异其趣。

“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坐部伎子弟三百教於梨园，声有误者，帝必觉而正之，号皇帝梨园弟子。宫女数百，亦为梨园弟子，居宜春北院。梨园法部，更置小部音声三十余人”（《新唐书·礼乐志》）。《乐府诗集》注引《乐苑》：“《霓裳羽衣曲》，开元中，西凉府节度杨敬述进。”“白居易曰：‘《霓裳》法曲也。其曲十二遍，起于开元，盛于天宝。’凡曲将终，声拍皆促，唯《霓裳》之末，长引一声。”《开天传信录》称：玄宗“夜梦游月宫，诸仙娱……以上清之乐，流亮清越……曲名《紫云回》。”《新唐书·礼乐志》称：天宝末，玄宗在骊山，“杨贵妃生日，命小部张乐长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会南方进荔枝，因名曰《荔枝香》”。《乐府杂录》称：及玄宗自蜀“回至骆谷，闻雨淋銮铃，因令张野狐撰为曲”，名《雨霖铃》。张祜有诗云：

雨霖铃夜却归秦，犹是张徽（即张野狐）一曲新。长说上皇和泪教，月明南内更无人。

民间流传的乐曲，武则天时，“有士人陷冤狱，籍没其家，其妻配入掖庭，本初善吹笙簧，乃撰《离别难》曲，以寄哀情。始名《大郎神》，盖取良人行第也，既畏人知，遂三易其名，亦名《悲切子》，终号《怨回鹘》”（《乐府杂录》）。“康老子者，本长安富家子，酷好声乐，落魄不事生计，常与国乐游处，一旦家产荡尽。因诣西廊，遇一老姬，持旧锦褥袋鬻，乃以半千获之。寻有波斯见，大惊，谓康曰：‘何处得此至宝，此是冰蚕丝所织，若暑月陈于座，可致一室清凉，即酬价千万。康得之，还与国乐追欢，不经年复尽，寻卒。后乐人嗟惜之，遂制此《康老子》曲，亦名《得至宝》”（《乐府杂录》）。当然冰蚕丝能致一室清凉，酬价千万之语，是不经之谈；但《康老子》之曲，却是乐人喜唱的名曲，也是事实。张祜诗有“春风一曲《杜韦娘》”，《杜韦娘》大概也是曲名而不是指人名。《杜韦娘》这个曲，也是当时人们所爱唱的歌曲。《何满子》，曲名。白居易《听歌六绝句》之六《何满子》诗云：

世传满子是人名，临就刑时曲始成。一曲四词歌八叠，从头便是断肠声。原注云：“开元中，沧州有歌者何满子，临刑，进此曲以赎死，上竟不免。”可是元稹在《何满子歌》中却说：“何满能歌能宛转，天宝年中世称罕。婴刑系在圜圜间，水调哀音歌愤懣。梨园弟子奏玄宗，一唱承恩羈网缓。便将何满为曲名，御谱亲题乐府纂。……”元白平生交友至笃，独记此事，白谓满子竟不免死，元谓恩赦不死，不知以何为是。薛逢《何满子》词云：

系马宫槐老，持杯店菊黄。故交今不见，流恨满川光。白居易所谓“一曲四词”，盖指此而言。八叠者，疑有和声，今已无法考知了。

关于曲名，我们不能一一介绍，只就几个著名的有代表性讲讲吧了。

唐代涌现了许多音乐家。唐代以歌唱著名者，玄宗时有韦青，官至金吾将军。青“本是士人，尝有诗‘三代主纶诰，一身能唱歌。’”他不但能唱歌，而且能够发现歌才，加以培养。有张红红，“本与其父歌于衢路丐食，

过将军韦青所居，青于街牖中闻其歌声喉音寥亮，仍有美色，即纳为姬，其父舍于后户优给之，乃自传其艺，颖悟绝伦。尝有乐工自撰一曲，即古曲《长命西河女》也，加减其节奏，颇有新声，未进闻，先印可于青。青潜令红红于屏风后听之。红红乃以小豆数合，记其节拍。乐工歌罢，青因入问红红‘如何？’云：‘已得矣。’青出给云：‘某有女弟子，久曾歌此，非新曲也。’即令隔屏风歌之，一声不失，乐工大惊异，遂请相见，叹伏不已。再云：‘此曲先有一声不稳，今已正矣。’寻达上（指代宗）听，翌日，召入宜春院，宠泽隆异，宫中号记曲娘子。……一日，内史奏韦青卒，上告红红，红红乃于上前呜咽，奏云：‘妾本风尘丐者，一旦老父死有所归，致身入内，皆自韦青，妾不忍忘其恩。’乃一恸而绝”（《乐府杂录》）。

唐玄宗时，女子歌唱家最著名者，曰永新。永新并不是她的真名。她姓许，名和子，本吉州永新县（今江西永新县）乐家女也。开元末，选入宫，即以永新名之，籍于宜春院。“既美且慧，善歌，能变新声。韩娥、李延年歿后千余载，旷无其人，至永新始继其能。遇高秋朗月，台殿清虚，喉啭一声，响传九陌”。“一日，赐大酺于勤政楼，观者数千，万众喧哗聚语，莫得闻鱼龙百戏之音……高力士奏请命永新出楼歌一曲，必可止喧。上从之。永新乃撩鬓举袂，直奏曼声，至是，广场寂寂，若无一人，喜者闻之气勇，愁者闻之肠绝”。及安史之乱，“永新为一士人所得，韦青避地广陵（今江苏扬州市），因月夜凭阑干小河之上，忽闻舟中奏水调者，曰：‘此永新歌也。’乃登舟与永新对泣久之。”后士人病卒，永新“与其母之京师，竟歿于风尘。及卒，谓其母曰：‘阿母！钱树子倒矣！’”（《乐府杂录》）在封建社会内，这样一个杰出的歌唱家，下落却如此悲惨！

据《明皇杂录》：“开元中，乐工李龟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学盛名。彭年善舞，鹤年、龟年能歌，制《渭州曲》，特承顾遇。”杜甫在大历五年（公元七七七年），于江湘遇李龟年，有诗云：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江南逢李龟年》）

德宗贞元（公元七三五至八四年）中，有著名歌唱家田顺郎，刘禹锡《有歌童田顺郎》诗云：

天上能歌御史娘，花前月底奉君王。九重深处无人见，分付新声与顺郎。宪宗元和（公元八六至八二二年）、穆宗长庆（公元八二一至八二四年）以来，著名的歌唱家有米嘉荣、何戡，刘禹锡有《与歌者米嘉荣》诗云：

唱得凉州意外声，旧人唯数米嘉荣。近来时世轻前辈，好染髭须事后生。（此据本集。《太平广记》卷二

四引《卢氏杂说》作“三朝供奉米嘉荣，能变新声作旧声。于今后辈轻前辈，好染髭须事后生。”）又《与歌者何戡》诗云：

二十余年别帝京，重闻天乐不胜情。旧人唯有何戡在，更与殷勤唱渭城。武宗时，有著名歌唱家南不嫌，《云溪友议》载：“李尚书讷（宣宗大中六年至九年任浙东观察使）夜登越城楼，闻歌曰：‘雁门山上雁初飞’，其声激切。召至，曰：‘去籍之伎盛小丛也。’曰：‘汝歌何善乎？’曰：‘小丛是梨园供奉南不嫌女甥也，所唱之音，乃不嫌之授也。’”南不嫌的女甥歌唱水平尚且如此高，南不嫌本人的歌唱水平之高，更是可想而知了。据《国史补》称，唐代还有一个著名歌唱家李袞，他虽生长在江南，可是他的“善歌”，却“名动京师。崔昭入朝，密载而至（京师）。乃邀宾客请第一部乐

及京邑之名倡以为盛会，昭言：‘有表弟，请登末座。’令袞弊衣而出，满座嗤笑之。少顷命酒，昭曰：‘请表弟歌。’座中又笑。及喉啜一声，乐人皆大惊曰：‘是李八郎也。’罗拜之。”还有善于唱哀乐的李可及，据《唐会要》卷三十四称：“咸通（公元八六 至八七四年）中，伶官李可及善音律，尤能转喉为新声，音辞曲折，听者忘倦，京师屠沽少年效之，谓之拍弹。时同昌公主（懿宗爱女）除丧，懿宗与郭淑妃悼念不已。可及为《叹百年》舞曲，舞人皆盛饰珠翠，仍画鱼龙地衣以列之，曲终乐阕，珠翠覆地，词语凄恻，闻者流涕。又尝於安国寺作《菩萨蛮》舞，上益怜之。可及常为子娶妇，帝赐酒二银樽，启之，乃金翠也。”

笛，开元中，有李谟独步于当时。玄宗“尝于上阳宫夜后按新翻一曲，属明夕正月十五日，潜游灯下，忽闻酒楼上有笛奏前夕新曲，大骇之。明日，密遣捕捉笛者，自云：‘其夕窃于天津桥玩月，闻宫中度曲，遂于桥柱上插谱记之，臣即长安少年善笛者李谟也。’明皇异而遣之”（《连昌宫词》注）。元稹《连昌宫词》：“李谟摩笛傍宫墙，偷得新翻数般由。”即咏此事。玄宗“遇高秋朗月，台殿清虚”，令永新歌新声，“独召李谟吹笛逐其歌曲，曲终管裂”（《乐府杂录》）。其妙如此。安史之乱，李谟避地江南，有时月夜泛江，兴起吹笛，寥亮逸发。曾秋夜，吹笛于瓜洲，舟楫甚隘，群动皆息。及数奏，微风飒然立至。有顷，舟人贾客皆有怨叹悲泣之声”（《国史补》）。李谟有外孙许云封，也以善吹名家。“贞元初，韦应物自兰台郎出为和州牧……轻舟东下，夜泊灵壁驿（今安徽宿县西北）。时云天初秋，灏露凝冷……忽闻云封笛声，嗟叹久之。韦公洞晓音律，谓其笛声酷似天宝中梨园法曲李谟所吹者，遂召云封问之，乃是李谟外孙也”（《太平广记》卷二 四《甘泽谣》）。唐文宗时，有教坊副史云朝霞，“善吹笛，新声变律，深惬上旨”（《唐六典》卷三十四），官至润州司马。

琵琶，“开元中，有贺怀智，其乐器，以石为槽，鸚鸡筋作弦，用铁拨弹之”（《乐府杂录》）。元稹《连昌宫词》：“夜半月高弦索鸣，贺老琵琶定场屋。”贞元中，琵琶著名者有康昆仑。时值关中大旱，长安两市祈雨，兼斗声乐。“街东有康昆仑琵琶最上，必谓街西无以敌也。遂请昆仑登彩楼，弹一曲新翻羽调《录要》（即《绿腰》亦名《六么》）。其街西亦建一楼，及昆仑度曲，西市楼上出一女郎，抱乐器，先云我亦弹是曲，兼移在枫香调中。及下拨声如雷，其妙入神。昆仑惊骇，乃拜请为师。女郎遂更衣出见，乃……庄严寺僧善本，姓段也”（《乐府杂录》）。后康昆仑拜段为师，尽段之妙。“元和中，有王芬、曹保之子善才、其孙曹纲，皆精此艺。次有裴兴奴，与纲同时。纲善运拨，若风雨然，不事捏弦。兴奴则善于拢捻，指拨稍软。时人谓纲有右手，兴奴有左手”（《乐府杂录》据《古今图书集成乐律典》卷一一四引《琵琶录》校勘）。中国古代乐器琴，已无传人，它的地位，全给琵琶夺走了。于頔令客弹琴，于頔嫂知琴，“听于帘次，叹曰：‘三分之中，一分箏声，二分琵琶声，无本色韵’”（《国史补》）。

羯鼓，“以戎羯之鼓，故曰羯鼓”。“龟兹部、高昌部、疏勒部、天竺部皆用之”。“磔如漆桶，山桑木为之，下有小牙床承之。击用两杖，其声焦杀鸣烈，尤宜促曲急破战杖连碎之声。又宜高楼晚景，明月清风，破空透远，特异众乐。”唐玄宗最喜羯鼓、玉笛，常云：“八音之领袖，诸乐不可为比。尝遇二月初……宿雨初晴，景色明丽，小殿内庭，柳杏将吐”，帝“临轩纵击一曲，曲名《春光好》……及顾柳杏，皆已发拆”。“又制《秋风高》，

每至秋空迴彻，纤翳不起，即奏之，必远风徐来，庭叶随下”。宁王（玄宗兄）子汝南王璡也善羯鼓，玄宗尝“自摘槿花一朵，置于[璡]帽上”，羯鼓已，“花不坠落”。开元中，宰相宋璟，亦善羯鼓。代宗时，西川节度使杜鸿渐罢镇出蜀，至嘉陵江，“颇有山水景致，其夜月夜又佳”，鸿渐乃取羯鼓击之，“酣奏数曲，四山猿鸟皆惊，飞鸣嗷嗷”（《乐府杂录》）。

唐代的声乐和器乐，就介绍到这里为止。

五代十国时，前后蜀、吴越、南唐，音乐、舞蹈都比较发达。前蜀后主王衍尝游青城山，“衍自作《甘州》曲”，“上下山谷，衍常自歌，而使宫人皆和之”（《五代史·前蜀世家》）。后蜀主孟昶时，有花蕊夫人费氏能诗，通音律，其所著《宫词》百首，皆付乐府朝夕歌唱。及后蜀亡，花蕊夫人诗云：

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吴越王钱鏐妃“每岁归临安，王以书遗妃云：‘陌上开花，可缓缓归矣。’吴人用其语为歌[《缓缓归》]，含思宛然，听之凄然”（《委巷丛谈》）。钱鏐受王封后，归至临安，延故老，大陈乡饮，鏐自唱《还乡歌》以娱宾，“父老虽闻歌进酒，都不之晓”，因为歌辞太文雅了，钱鏐也觉得“欢意不甚浹洽，再酌酒，高揭吴喉，唱山歌以见意。词曰：

你辈见侬底欢喜，别是一般滋味子，长在我侬心子里。（据《湘山野录》）歌阙，合声赓赞，叫笑振席，欢感闾里”。可见山歌之感动人心。南唐后主大周后，通书史，善歌舞，“尝雪夜酣燕，举杯请后主起舞，后主曰：‘汝能创为新声则可矣。’后即命笺缀谱，喉无滞音，笔无滞思，俄顷谱成，所谓《邀醉舞破》也。又有《恨来迟破》，亦后所制”（《南唐书》）。“薛九，江南富家子，得侍宫中，善歌《嵇康》。《嵇康》，江南曲名也……建业破，零落于江北。予遇于洛阳福善坊赵春舍，饮酣，于是歌《嵇康》，其词即[南唐]后主所制焉。尝感激，坐人皆泣。春举酒请舞，谢曰：‘老矣！腰腕衰硬，无复旧态。’乃强起小舞，终曲而罢”（《侍儿小名录》）。国亡之后，伎工流落，身世也是很可怜的。

散乐百戏 杂伎，唐代称为“散乐”，总名“百戏”。

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六〇六年），突厥可汗染干来东都洛阳访问，隋炀帝为了表示国家全盛，“总追四方散乐，大集东都。初于芳华苑积翠池侧，帝帷宫女观之。有舍利（兽名）先来，戏于场内，须臾，跳跃，激水满衢，鼉鼉龟鳖，水人鱼龙，偏覆于地。又有大鲸鱼，喷雾翳日。倏忽化成黄龙，长七八丈，耸踊而出，名曰《黄龙变》”（《隋书·音乐志》）。这个传统杂伎节目，沈约《宋书·乐志》里也详细介绍了。隋世“又以绳系两柱，相去十丈，遣二倡女，对舞绳上，相逢切肩而过，歌舞不辍”（《隋书·音乐志》）。这个传统杂伎，南朝称之为《高絙》，唐代称之为《戏绳》。《封氏闻见记》卷六：“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公元七三六年）八月五日，御楼设绳妓。妓者先引长绳两端属地，埋鹿卢以系之。鹿卢内数丈立柱，以起绳之直如弦。然后妓女自绳端蹑而上，往来倏忽之间，望之若仙。有中路相遇，侧身而过者；有著履而行，从容俯仰者；或以画竿接脰，高五六尺；或蹋肩蹈顶，至三四重；既而翻身掷倒至绳，还往曾无蹉跌，皆应严鼓之节，真奇观也。”安史乱后，“伶伦分散，外方始有此妓，军州宴会，时或有之”。刘言史有《观绳伎》诗，注云：“潞府李相公席上作。”诗云：

秦陵遗乐何最珍，彩绳冉冉天仙人。广场寒食风日好，百夫伐鼓锦臂新。

银画青绡抹云发，高处绮罗香更切。重肩接立三四层，著屐背行仍应节。两边丸剑渐相迎，侧身交步何轻盈。闪然欲落却收得，万人肉上寒毛生。危机险势无不有。倒挂矸腰学杨柳。下来二芙蓉姿，粉薄钿稀态转奇。坐中还有沾巾者，曾见先皇初教时。戏绳本来是杂伎的传统剧种，不过戏者“以画竿接脰，高六尺”，用这种高跷踏在绳上行走，是非常不容易的了。至于“重肩接立三四层”，“踏肩蹈顶，至三四重”，难度之大，更为不容易。

还有踏弓弦绳技，更是险极。唐苏鹞《杜阳杂编》云：“升降日（生日），大张音乐，集天下百戏于殿前。时有妓女石火胡，本幽州人也，挈养女五人，才八九岁，于百尺竿上张弓弦五条，令五女各居一条之上，衣五色衣，执戟持戈，舞《破阵乐》曲，俯仰来去，赴节如飞。是时观者目眩心怯，火胡立于小重朱画床子上，令诸女迭踏以至半空，手中皆执五彩小帜，床子大者才一尺余。俄而手足齐举，为之踏浑脱，歌呼抑扬，落履平地。上赐物甚厚。文宗即位，恶其太险伤神，遂不复作。”连封建帝王也感到“太险伤神”，可见其惊险程度，非同一般绳技。

南朝有《夏育扛鼎》，隋炀帝大业二年招待突厥可汗时，曾表演这个传统剧种。这个剧目是“取车轮、石臼、大瓮器等，各于掌上而跳弄之”（《隋书·音乐志》）。到了唐代尚称之为《戏车轮》。汉世有《撞木伎》，梁称《猕猴幢伎》，唐称《缘干》，又称《猕猴缘竿》。缘幢在隋代，水平已经很高，能够“并二人戴竿，其上有舞，忽然腾透而换易之”。开元初，张楚金有《透幢童儿赋》，“透幢”就是“忽然腾透而换易之”，可见这个传统杂伎剧种，到唐代还在继续发展。《教坊记·序》称唐玄宗“在藩邸，有《散乐》一部”。及即帝位，“常于九曲阁太常乐，卿姜晦……狎乐以进。凡戏，辄分两朋，以判优劣，则人心竞勇，谓之‘热戏’。于是诏宁王主藩邸之乐以敌之。一伎戴百尺幢，鼓舞而进，太常所戴，即百余尺。”比藩邸之幢要高过一半，快速的程度，也“疾仍兼倍。太常群乐鼓噪，自负其胜”。玄宗不悦，命内养（宦者）五六十人，各执一物，皆铁马鞭、骨槌之属也，潜匿袖中，杂于[太常]声[伎]儿后立，复候鼓噪，当乱捶之。晦……及左右……于是夺气褫魄。而[太常]戴竿者方振摇其竿，南北不已。上顾谓内人者曰：‘其竿即自当折。’斯须，中断，上抚掌大笑，内伎咸称庆，于是罢遣”。从这一则事例中，可见缘幢伎分朋争胜，竞争得还相当激烈。张祜《热戏乐》诗云：

热戏争心剧火烧，铜锤暗热不相饶。上皇失喜宁王笑，百尺幢竿过动摇。据《教坊记》载，玄宗在东都，“于天津桥南，设帐殿，酺三日。教坊一小儿，筋斗绝伦，乃衣以缯彩，梳洗，杂于内伎中。少顷，缘长竿上，倒立，寻复去手。久之，垂手抱竿翻身而下。乐人等皆舍所执，宛转于地，大呼万岁，百官拜庆。中使宣旨云：‘此伎尤难，近方教成。’欲以矜异，其实乃小儿也”。张祜《大酺乐》二首之一云：

车驾东来值太平，大酺三日洛阳城。小儿一伎竿头绝，天下传呼万岁声。唐玄宗在西京，“御勤政楼，大张声乐，罗列百伎。时教坊有王大娘，善戴百尺竿，竿上施木山，状瀛洲、方丈，仍令小儿持绛节出入其间而舞不缀”（《明皇杂录》）。刘晏有《咏王大娘戴竿》诗云：

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谁为绮罗翻有力，犹自嫌轻更著人。姚汝能《安禄山事迹》称：玄宗世，“有乐人戴竿索者……皆非人间之伎，转相教习，或一人肩荷首戴二十四人，戴竿长百余尺；至于竿杪人，腾掷如

猿猴飞鸟之势，竟为奇绝。累日不憚，观者流汗目眩”。由此可见，唐代开元、天宝时期培养出来的缘橦伎，水平之高。

《朝野僉载》称：

幽州人刘交戴长竿高七十尺，自擎上下。有女十二，甚端正，于竿上置定，跨盘独立，见者不忍，女无惧色。后竟为扑杀。可见很危险，常常会发生事故。

唐中叶以缘橦伎著名者，尚有赵解愁。张祜《千秋乐》诗云：

八月平时花萼楼，万方同乐是千秋。倾城入看长竿出，一伎初成赵解愁。

《缘橦伎》不仅是宫禁里喜欢的传统杂伎剧种，也是人民群众所喜欢的剧种。王建有《寻橦歌》云：

人间百戏皆可学，寻橦不比诸余乐。重梳短髻下金钿，红帽青巾各一边。身轻足捷胜男子，绕竿四面争先缘。习多倚附欹竿滑，上下踟蹰皆著袜。翻身垂颈欲落地，却住把腰初似歇。大竿百夫擎不起，褭褭半在青云里。纤腰女儿不动容，戴行直舞一曲终。回头但觉人眼见，矜难恐畏天无风。险中更险何曾失，山鼠悬头猿挂膝。小垂一手当舞盘，斜惨双蛾看落日。斯须改变曲解新，贵欲欢他平地人。散时满面生颜色。行步依前无气力。顾况的《险竿歌》云：

宛陵女儿攀飞手，长竿横空上下走。已能轻险若平地，岂肯身为一家妇……翻身挂影恣腾蹋，反缩头髻盘旋风。盘旋风，撒飞鸟，惊猿远，树枝褭。头上打鼓不闻时，手蹉脚踏蜘蛛丝。勿雷掣断流星尾，矐睒划破蚩尤旗。……和缘橦相近的是《掷倒伎》，唐时称为“筋斗”，今天通称“翻跟斗”。开元、天宝之际，筋斗著名者有裴承恩。此外传统杂伎节目有《舞盘伎》、《长躡伎》、《跳剑伎》、《吞剑伎》、《弄椀珠伎》、《丹珠伎》，唐代还继续保存下来。

在唐睿宗时，天竺国“婆罗门献乐，舞人倒行，而以足舞于鋗（快利）刀锋，倒植于地，低目就刃，以历脸中，又植于背下，吹笙篥者立其腹上，终曲而亦无伤”（《旧唐书·音乐志》）。这也是一种运气工，一般不能到达这样高水平的。《透飞梯》，前代谓之《透三峡伎》，也是高空杂伎节目，没有熟练的伎能也无法表演。

唐代尚有歌舞戏，有《大面》、《拨头》、《踏摇娘》、《窟子》四种。《大面》亦称《代面》，“出于北齐。北齐兰陵王长恭，才武而面美，常著假面以对敌。尝击周师金墉城下，勇冠三军，齐人壮之，为此舞以效其指麾击刺之容，谓之《兰陵王入阵曲》”（《旧唐书·音乐志》）。“戏者[著面具]，衣紫、腰金、执鞭也”（《乐府杂录》）。

《拨头》出西域，胡人为猛兽（虎）所噬，其子求兽（虎）杀之”（《旧唐书·音乐志》）。此“人上山寻其父尸，山有八折，故曲八叠，戏者被发素衣，面作啼，盖遭丧之象也”（《乐府杂录》）。《踏摇娘》，亦称《苏郎中》，生于隋末，隋代河内苏郎中[六]，“丑貌而好酒”。“醉归必殴其妻，妻美色，善自歌，乃歌为怨苦之词。河朔演其曲而被之管弦，因写其妻之容。妻悲诉，每摇其身，故号《踏摇娘》云”（《通典·乐典·散乐》）。唐教坊“苏五妻张四娘，善歌舞，能弄《踏摇娘》”（《教坊记》）。

“（《窟子》亦云《魁子》，作偶人以戏。善歌舞，本丧家乐也，汉末始用之于嘉会。北齐后主高纬尤所好。高丽之国亦有之”（《通典·乐典·散乐》）。这个传统剧目，今天尚很流行。表面好像两个人扭住不放，

互相揪打，打得很认真。最后揭起傀儡，站立起来，实际只是一个人，原来是背上背了两个傀儡。

俳优，有《弄参军》。后赵石勒时，有参军周延，初为馆陶令，以贪脏“官绢数百匹，下狱，以八议宥之。后每大会，使俳优著介帻黄绢单衣。优问：‘汝为何官，在我辈中？’曰：‘我本为馆陶令。’抖擻单衣曰：‘政坐取是，故入汝辈中。’以为笑”（《太平御览》卷五六九引《赵书》）[七]。开元中，黄幡绰、张野狐善于演《弄参军》，入神入妙。后又有李仙鹤，亦善此戏，玄宗特授仙鹤韶州同正参军，使食其禄。武宗时，有曹叔度、刘泉水，懿宗以后，有范传康、上官唐卿、吕敬迁，都是《弄参军》的著名演员。

《弄假妇人》，亦俳优剧，故事内容今已无法考知。宣宗时，有孙乾、刘璃珩，懿宗以后，有郭外春、孙有熊、刘真，善于饰演这类角色。

《弄婆罗门》，亦俳优剧。宣宗时，有康迺、李百魁、石宝山，善于演饰这门角色。

在杂伎中，还应提到狮子舞，《太平乐》有五方狮子舞，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另外军州宴会，也喜欢这个传统剧种。白居易《新乐府》的《西凉伎》云：

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狮子。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帖齿。奋迅毛衣摆双耳，如从流沙来万里。紫髯深目两胡儿，鼓舞跳梁前致辞。应似凉州未陷日，安西都护进来时。……在较小规模的宴会上，舞狮子舞，用《西凉乐》配奏，还是很能吸引人的。

《散乐》中，规模最大的，要算《马舞》了。《明皇杂录》载：“明皇在位，尝令教舞马四百匹，分为左右部，目为某家宠、某家娇，时塞外亦以善马来贡者，上俾之教习，无不曲尽其妙。因命衣以文绣，绀以金铃，饰其鬣间，杂以珠玉。其曲谓之《倾杯乐》者数十曲，奋首鼓尾，纵横应节。又施三层板床，乘马而上，抃转如飞。或命壮士举一榻，马舞于榻上，乐工数十人，立于左右前后，皆衣以淡黄衫、文玉带，必求少年而姿貌美秀者，每千秋节（八月五日），常命舞于勤政楼下。其后明皇既幸蜀，舞马亦散在人间，禄山尝睹其舞而心爱之，自是因以数十匹置于范阳，其后转为田承嗣所得，而承嗣不知，杂于战马，置之外栈。忽一日，军中大享士，乐作，马舞不能自止，廐养辈谓其为妖，拥彗以击之，马谓其舞不中节，抑扬顿挫，尚存故态。吏遂以为怪，白承嗣，承嗣命箠之甚酷，马舞益整，而鞭挞愈加，终毙于枥下。其人亦有知其舞马者，惧田暴逆，而终不敢言。”张说有《舞马千秋万岁乐府词》：

圣皇至德与天齐，天马来仪自海西。腕足徐行拜两膝，繁骄不进踏千蹄。

鬣奋鬣时蹲踏，鼓怒骧身忽上跻。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掉尾醉如泥。马舞之外，还有大象、犀牛，也能拜舞。《明皇杂录》：五坊使“又引大象、犀牛，或拜或舞，动中音律。”

关于斗鸡之戏，已见《东城老父传》，这里就不再讲了。

打波罗球之戏，分步打和马球两种。球的大小，和今高尔夫球差不多，击球的杖，有步杖，有马杖，步杖较短，马杖较长。新旧《唐书》志里，没有谈到打球之式，《宋史·礼志》讲得太繁琐，现举《金史·礼志》八以略见打球之梗概。《金史·礼志》：以重五（端午）行拜天之礼于鞠场。“已而击球，各乘所常习马，持鞠杖，杖长数尺，其端如偃月。分其众为两队，共争击一球。先于球场南立双桓（立木为表曰桓），置板，下开一孔为门，

而加网为囊。能夺得鞠（球）击入网囊者为胜。或曰两端对立二门，互相排击，各以出门为胜。球状小如拳，以轻韧木枵（空窍曰枵）其中而朱之，皆所以习跷捷也”。唐代的马球，大概和这相近。球场必须砥平，所以唐中宗时，“驸马武崇训、杨慎交洒油以筑球场”（《资治通鉴》唐中宗景龙二年）。景龙（公元七〇七至七一〇年）中，玄宗时为临淄郡王，和吐蕃赞普派来的使臣打马球，玄宗“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打了一个胜仗。玄宗即位后，时常御楼看打马球，“能者左萦右拂，盘旋宛转，殊可观”（《封氏闻见记》）。唐宣宗也是打马球的能手，《唐语林》云：“宣宗弧矢击鞠，皆尽其妙。所御马，衔勒之外，不加雕饰，而马尤矫捷。每持鞠杖，乘势奔跃，运鞠于空中，连击至数百而马驰不止，迅若流电。二军（左右神策军）老手咸服其能。”据《唐摭言》载：僖宗乾符四年（公元八七七年），新进士及第，“为月灯阁打球之会”，可是球场为两军打球军将占了，是年及第进士“刘覃谓同年曰：‘仆能为群公小挫彼骄，必令解去，如何？’状元已下应声请之。覃因跨马执杖，跃而揖之曰：‘新进士刘覃拟陪奉，可乎？’诸辈皆喜。覃驰骤击拂，风驱电驰，彼皆眙。俄策得球子，向空磔之莫知所在。数辈惭沮，俯而去。时阁下数千人，因之大呼笑，久而方止”。咸通十三年（公元八七二年）三月，也有打球之会。可见新进士发榜后在月灯阁集会打球，由来已久，可见唐代不仅帝王贵戚，两军健儿喜欢此戏，就是文人学士，也能一献身手。王建《宫词》：

对御难争第一筹，殿前不打背身球。内人唱好龟兹急，天子鞘回过玉楼。可见陪皇帝打球，就先得让皇帝赢第一筹，这也是巴结皇帝的手法。花蕊夫人《宫词》：

自教宫娥学打球，玉鞍初跨柳腰柔。上棚知是官家认，偏偏长赢第一筹。可见后蜀孟氏也有马球之戏，而且是宫人骑马打球。

步打，也是用月牙鞠杖击球的，不过步打的杖较短于马球的杖而已。唐僖宗“好蹴球斗鸭为乐，自以能于步打，谓俳优石野猪曰：‘朕若步打进士，当得状元。’”宫女打球，也多步打。王建《宫词》云：

殿前铺设两边楼，寒食宫人步打球。一半走来争跪拜，上棚先谢得头筹。据《太平广记》卷二八九《北梦琐言》：“唐军容使田令孜（宦官）擅权，有回天之力。尝致书于许昌，为其兄陈敬瑄求兵马使职，节将崔侍中安潜拒而不与。迨后崔公移镇西川，陈敬瑄与杨师立、牛勣、罗元果以打球争三川，敬瑄获头筹，制授西蜀节度，以代崔公，中外惊骇。”把西川节度使当作赌注来争夺，唐王朝不久也崩溃灭亡了。

蹴鞠，亦称蹋鞠，近于今天的踢足球。《史记·苏秦列传》云：“临菑……民无不……六博蹋鞠者。”大概战国时此戏已很普遍。《西京杂记》称汉高帝父太上皇好“斗鸡蹴鞠”。《汉书·东方朔传》称董偃“贵宠天下，郡国蹴鞠剑客辐凑”。《汉书·霍去病传》：“穿域蹋鞠。”穿域就是辟球场，蹋鞠就是踢球。《风俗通》：“丸毛谓之鞠。”郭璞《三苍解诂》：“鞠，毛丸可蹋戏。”《汉书·艺文志》兵家有“蹴鞠二十五篇”，师古曰：“鞠以韦为之，实以物，蹴蹋之以为戏也。”宋程大昌《演繁露》：“扬子（扬雄）曰：‘捩革为鞠，亦各有法。’革，皮也。捩革为鞠，即后世皮球之斜作片瓣而缝合之，故唐人借皮为喻，而为诗以诮皮日休曰：‘六片尖皮砌作球，火中燂了水中揉。一包闲气如长在，惹踢招拳猝未休。’其谓‘砌皮’、‘皮气’，即今之气球也矣。古今物制，固多不同……师古曰：‘鞠，以皮

为之，实之以毛，蹋蹙而戏也。’今世皮球中不置毛，而皆砌合皮革，待其缝砌已周，则遂吹气满之，气既充满，鞠遂圆实，所谓‘火中燂了水中揉’者，欲其皮宽而能受气也。详此意制，当是古时实之以毛，后加巧而实之以气也。”宋江少虞《皇朝事实类苑》亦云：“蹴鞠以皮为之，中实以物……今所作牛毬胞，纳气而张之，亦谓之球焉。”唐韦庄《丙辰年鄜州遇寒食城外醉吟五首》之五云：“雨丝柳烟欲清明，金屋人间暖凤笙。永日迢迢无一事，隔街闻筑气球声。”筑，一本作蹴。就嘲皮日休和韦庄鄜州寒食诗来看，可见在唐代，球已经不实之以毛，而纳之以气了。唐代军中健儿，喜蹴鞠这一运动，来锻炼身体，这里就不多讲了。

拔河，古用篾缆，唐代改用“大麻絙，长四五十丈，两头分系小索数百条挂于前，分二朋，两相齐挽。当大絙之中，立大旗为界，震鼓叫噪，使相牵引，以却者为胜，就者为输，名曰拔河。中宗时，曾以清明日御梨园球场，命侍臣为拔河之戏。时宰相二驸马为东朋，三宰相五将军为西朋……西朋竟输。仆射韦巨源、少师唐休璟年老，随絙而踣，久不能兴，上大笑，左右扶起。玄宗数御楼设此戏，挽者千余人，喧呼动地，蕃客士庶观者，莫不震惊”（《封氏闻见记》）。

泼胡乞寒之戏，此戏出自康国。《旧唐书·康国传》：“至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相泼，盛为戏乐。”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四十：“苏莫遮，西戎胡语也，正云飒摩遮。此戏出自龟兹国，至今犹有此曲……或作兽面，或像鬼神，假作种种面具形状。或以泥水沾洒行人，或持羸索搭钩捉人为戏。每年七月初公行此戏，七日乃停。土俗相传云常以此法攘厌驱趁罗刹恶鬼食啖人民之灾也。”《康国传》说十一月中举行，《一切经音义》说七月初举行，证之中土记载，大概以十一月十二月间举行为是。《周书·宣帝纪》，大象二年（公元五八一年）十二月，“又纵胡人为乞寒，用水浇沃为戏乐”。可以说这是中原有乞寒之戏的最早记录。《旧唐书·张说传》：“自则天末年季冬为泼寒胡戏，中宗尝御楼以观之。”《旧唐书·中宗纪》：“神龙元年（公元七〇五年）十一月己丑，御洛城南门楼观泼寒胡戏。”“景龙三年（公元七〇九年）十二月乙酉，令诸司长官向醴泉坊看泼胡王乞寒戏。”由于这两次举行泼胡乞寒之戏，因而引起朝臣的反对。“神龙二年（公元七〇六年）三月，并州清源县吕元泰上书谏止泼寒胡戏曰：“比见都邑城市，相率为浑脱，骏马胡马，名为苏莫遮。旗鼓相当，军陈之势也。腾逐喧噪，战争之象也。锦绣夸竞，害女工也。徵敛贫弱，伤政体也。胡服相效，非雅乐也。浑脱为号，非美名也。臣谨案《洪范》曰：“谋时寒若。”君能谋时，则燠寒顺之，何必裸露形体，浇灌衢路，鼓舞跳跃，而索寒也？”玄宗先天二年（公元七一三年）十月，张说亦上疏谏止其事，谓“乞寒泼胡，未闻典故，裸体跳足，盛德何观，挥水投泥，失容斯甚”（《唐会要》卷三十四）。玄宗初政，开元元年（公元七一三年）十二月，曾下敕禁断。张说有《苏摩遮》诗五首，今录四首于下：摩遮本出海西胡，琉璃宝服紫髯胡。闻道皇恩遍宇宙，来将歌舞助欢娱。（《亿岁乐》）绣装帕额宝花冠，夷歌骑舞借人看。自能激水成阴气，不虑今年寒不寒。（《亿岁乐》）腊月凝阴积帝台，豪歌急鼓送寒来。油囊取得天河水，将添上寿万年杯。（《亿岁乐》）寒气宜人最可怜，故将寒水散庭前。唯愿圣君无限寿，长取新年续旧年。（《亿岁乐》）日本有《苏莫者》曲，为涉盘调中曲，盖《苏莫者》、《苏摩遮》、《飒摩遮》，皆《苏莫遮》音译之异。《苏莫遮》为曲调之名，《浑脱》为

舞名。日本《苏莫者》曲舞虽失传，但尚留图可按。舞者戴帽，著假面具，身披蓑笠。作此戏时，舞者唱《苏莫遮》曲步行，胡服骑骏马者持盛水油囊交相泼洒，舞者踏歌应节，并作闪避之状。[八]

隋唐五代，音乐舞蹈，散乐百戏，又在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基址上有了新的的发展。它也和唐代的文学诗歌一样，表现了各族文化艺术大融合局面出现之后的非常繁荣现象。在中原地区，原来一套华夏的雅乐虽然衰落下去了，但隋的统一南北，却使江南的清商乐舞以及吴歌西曲流传到北地来。白居易、刘禹锡等诗人，还继续把《竹枝词》即带有南方民歌格调的有益营养成份加以提倡，丰富了我国文学艺术的形式和内容。同时，在北方，由于《西凉乐》、《龟兹乐》、《疏勒乐》、《南诏乐》等的大量传入，以及龟兹乐系统的苏祇婆琵琶七调的广泛被采用于教坊乐府，不但西域、漠北的健康文风影响了文学艺术的风格，同时也逐渐形成了具有我国自己民族风格和健康雄伟气魄的作品。这一时期文学艺术的发展不仅对我国此后文学艺术音乐舞蹈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对我们许多友好邻邦也起过很好的影响。

[一]参考《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艺术典》。

[二]参考梁思成氏主编《中国建筑史》（高等学校交流讲义）。

[三]参考张秀民氏《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

[四]《隋书·礼乐志》：“礼毕者，出自晋太尉庾亮家。亮卒，其伎追思亮，因假为其面。执翳以舞，像其容，取其谥以号之，谓之为《文康乐》。每奏九部乐终则陈之，故以礼毕为名。其行曲有《单交路》，舞曲有《散花》。乐器有笛、笙、箫、篪、铃槃、鞞、腰鼓等七种，三悬为一部。工二十二人。

岑仲勉先生认为《文康乐》出自西域，与庾亮无关。李白乐府《上云乐》，本注“老胡文康辞。”梁周舍本辞亦称：“西域老胡，厥名文康。”故岑氏疑为胡乐也。

[五]关于龟兹七调、五旦对中原地区音乐的影响一事，曾参考日本林谦三氏所著《隋唐燕乐调研究》和向达教授《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中《龟兹苏只婆琵琶七调考原》和《论唐代佛曲》。

[六]《踏摇娘》，《通典·乐典》、《旧唐书·音乐志》谓生于隋末，《乐府杂录》谓出于后周。按北周宇文氏行周礼六官，无郎中之官，作隋末是。

[七]《弄参军》，《乐府杂录》俳优条谓故事发生在东汉和帝时，查参军事之名，三国时始有，疑故事发生在后赵时为长。故今从王观堂先生之说也。

[八]关于《胡旋》、《胡腾》、《柘枝》、马球、泼胡乞寒诸条，参考向达教授《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 第三节 雕板的发明与纸墨笔砚制造的改进

**雕板印刷术的发明** 在欧洲，使用拉丁字母，因此他们认为必需发展到活字版的应用，才算是印刷术的发明；在中国则不然，由于中国是不使用字母而使用单字的，因此只要有雕板的发明，就是印刷术的发明了。

秦汉的印玺，汉魏的三体石经，南北朝的碑志石刻，如果对它们进行模拓的话，实际就是印本了，所不同于后来木板的，印玺石刻模拓出来，大都是阴文，而后来的雕板则是阳文。唐韦应物《石鼓歌》：“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埽白黑分。”韩愈《石鼓歌》：“公从何处得纸本，毫发尽备无差讹。”可见石拓在唐代已很流行。韦应物诗中还说：“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罟李斯迹。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此殊悬隔。”那末可见李斯刻石的拓本，在韦应物之前很早，甚至可以说在汉魏有纸以后，就已经有拓片并流传很广了。这种石拓本，尽管是阴文，但不能不说它是雕板印刷术的滥觞。

关于雕板的首先使用，前人曾说是在隋开皇十三年（公元五九四年）。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云：载阅陆子渊（名深）《河汾燕闲录》云：“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板。此印书之始。”据斯说，则印书实自隋朝始，又在柳玼先，不特先冯道、毋昭裔也。……余意隋世所雕，特浮屠经像，盖六朝崇奉释教致然，未及概雕他籍也。唐至中叶以后，始渐以其法雕刻诸书，至五代而行，至宋而盛，于今而极矣。但陆深《河汾燕闲录》“悉令雕板”四字原作“悉令雕撰”。陆深所引材料，见于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原文亦作“废像遗经，悉令雕撰”。像，是塑像，经，是佛典，意思是把被破坏的佛像，重加雕塑，已残缺的佛经，重加修撰。因此说隋代已开始有雕板印刷的说法，是靠不住的。

也有人引明邵经邦（公元一四九一——一五六五年）的《弘简录》卷四十六云：（唐）太宗后长孙氏……崩年三十六。上为之恸。及宫司上其所撰《女则》十篇……帝览而嘉欢。以后此书足垂后代，令梓行之。认为可以证明雕板印刷在这时已开始使用。我们认为现存有关唐代文献，如《旧唐书》《新唐书》《通鉴》《唐会要》《册府元龟》等书籍，都没有提到把《女则》梓行的事情，而且“令梓行之”的文气，也不像唐人的语气，《弘简录》虽然是一部好书，可是这一条不知引自何书，恐怕也靠不住。

倒是《云仙杂记》，虽是一部宋人冒名唐人所作的伪书，但它引用了《僧园逸录》所说：

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众，每岁五驮无余。这说法倒是可靠成份的，因为从玄奘贞观十九年（公元六四五年）回国，到麟德元年（公元六六四年）病死，这二十年间，佛教在玄奘的影响下，颇有发展，大量的佛像，用雕板来印刷，也比较合算，并容易普及，这个时候的生产水平，也可以适应这样要求，因此张秀民同志认为这是雕板印刷之始，我个人是同意他的说法的。而且雕板印刷发展的过程，从开始由雕板图像才演进而为雕板文字，也符合事物发

雕板印刷既然使用于佛像，当然必然会应用于文字。唐中叶以后，长庆四年（公元八二五年），元稹为白居易作《白氏长庆集序》云：《白氏长庆集》者，太原人白居易之所作……而乐天《秦中吟》、《贺雨》、《讽谕》等篇，时人罕能知者。然而

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

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自注：杨、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余杂诗，卖于市肆之中也）又《册府元龟》卷一百六十载：（太和）九年（公元八三五年）十二月丁丑，东川节度使冯宿奏：“准敕，禁断印历日板。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日历既于市，每岁天文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故命禁之。唐范摅《云溪友议》云：

纥干尚书众苦求龙虎之丹十五余稔，及镇江右（众为江南西道观察使，在大中元年至三年——即公元八四七年至八四九年），乃大延方术之士，乃作《刘宏传》，雕印数千本，以寄中朝及四海精心烧炼之者。日本来唐学问僧宗睿于唐懿宗咸通六年（公元八六五年）归国时，曾携回大量佛经和杂书，其中有“西川印子《唐韵》一部五卷，同印子《玉篇》一部三十卷”（《新书写请来法门等目录》），所谓印子，就是指雕板印刷印成的书本而言的。

由于元白诗歌，家家传诵，历书又是农业社会的不可缺少之物；《唐韵》、《玉篇》这类字书，一般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又需求迫切，因此雕板印刷才先从这些方面开始应用，这也是完全符合当时客观要求的。至于纥干众迷信神仙烧炼之术，欲为之鼓吹，故雕印《刘宏传》数千本，以分赠同好，既然需要数千本之多，自然抄写不上算，而刻之黎枣了。总之在唐中叶以后，印刷术已经大大有发展而应用于各方面了。

在敦煌石室曾发现有咸通九年（公元八六八年）王玠为二亲造的《金般若波罗蜜经》一卷，用七张纸黏成一卷，全长十六尺，高一尺，首尾完整无缺。卷首还有释迦牟尼在给孤独园，坐莲花座上，对长老须菩提说法的扉画，妙相庄严，刻镂精美。全卷字体也端正秀挺，是很成熟的一部作品，可见雕板印刷事业在此以前一定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发展，才会到达这样精致水平的。可惜这现存的第一部印本书，已经被斯坦因拿走，不在国内了。

另外有唐僖宗乾符四年（公元八七七年）和中和二年（公元八八二年）两种历书，这两种历书也是在敦煌石室发现的，也都被斯坦因将往伦敦。中和二年历书还印有“剑南四川成都府樊赏家历”字样，说明这也是民间出版的私历。其字体的秀挺，风格的古朴，也反映了当时雕板印刷的很高水平。

唐柳玭《柳氏家训》序说：“中和三年（公元八八三年）癸卯夏，奎舆在蜀之三年也（唐僖宗逃蜀）。予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域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浸染不可尽晓。”由此可见，在唐代末年，成都书铺已经有不少刻本书在出售了。到了五代，后唐长兴三年（公元九三二年），宰相冯道等奏请由国子监校正九经，刻板印卖。据《五代会要》云：

后唐长兴三年二月，中书门下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抄写注出，子细看读，然后雇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秩刻印板，广颁天下。”……其年四月……委国子监于诸色选人中，召能书人端楷写出，旋付匠人雕刻，每日五纸。

汉乾祐元年（公元九四八年）闰五月，国子监奏：“见在雕印板九经内，有《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四经，未有印本，今欲集学官校勘四经文字镂板。”从之。

周广顺三年（公元九五三年）六月，尚书兼判国子监事田敏进印板九经书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各二部，一百三十册。

显德二年（公元九五五年）二月，中书门下奏：“国子监祭酒尹拙状称：准敕校勘《经典释文》三十卷，雕造印版，欲请兵部尚书张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敕：其《经典释文》，已经本监官员校勘外，宜差张昭、田敏详校。这部巨大的九经雕板工程，经过二十二年的长期进行，终于雕刻完成，在全国发行了。与此同时，后蜀宰相母昭裔在成都也奏请后蜀后主孟昶镂板刻印九经。母昭裔同时还出私财，“令门人句中正、孙逢吉等书《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刻板印之”（《十国春秋》）。这些书的木板，蜀亡后，母昭裔的儿子母守素把它运到北方，广为刷印，“诸书遂大彰于世”。可见，雕板事业到了五代十国，有了巨大的发展。这给此后宋代印刷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和活字板的出现，打下了雄厚的基础。

雕板印刷的发明，对于当时文化传播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在文化发展史上的巨大贡献。中国印刷术发明以后，很快传播到亚洲的友好邻邦去，以后并对欧洲的印刷事业的发展，也起了深刻的影响。可以说，中国印刷术的发展，推动了整个世界学术文化的前进，因此其意义是极其重大而深远的。

**纸墨笔砚的制造与改进** 木板印刷术的发展，促使纸张具有更广泛的用途；而书法、绘画艺术的发展，要求造纸技术在质的方面更有所提高。唐五代的造纸技术，是在魏晋南北朝的基础上，大大前进了一步的。

《唐六典》卷二十《古藏署令》：“益府（成都府）之大小黄白麻纸，杭（州治钱塘，今浙江杭州市）、婺（州治金华，今浙江金华市）、衢（州治信安，今浙江衢县）、越（州治会稽，今浙江绍兴县）等州之上细黄白状纸，均州（治武当，今湖北均县）之大模纸，宣（治宣城，今安徽宣城县）、衢等州之案纸、次纸，蒲州（治河东，今山西永济县西蒲州镇）之百日油细薄白纸。”这都是作为贡品来收藏的。

《国史补》所载唐代著名产纸地：“纸则有越之剡藤、苔笺，蜀之麻面、屑末、滑石、金花、长麻、鱼子、十色笺，扬（治江都，今江苏扬州市）之六合笺，韶（州治曲江，今广东韶关市西北）之竹笺，蒲之白薄、重抄，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之滑薄，又宋（州治宋城，今河南商丘市南）毫（治谯县，今安徽亳县）间有织成界道绢素，谓之乌丝栏、朱丝栏，又有茧纸。”亦都驰名全国。

现在再分别介绍。

益州的麻纸（以破布作纸浆制成的），质量尤好。唐皇帝制书除拜宰相用黄麻纸，故称拜相为宣麻。制诏由学士草制，不自中书出，则用白麻纸。当时婺州出产的藤纸，每年以六千张作为贡品。皇帝的敕旨、敕牒，都用黄藤纸缮写；道观荐告词文，则用青藤纸，以朱笔缮写，称之为“青词”，见于《翰林志》。

益州的麻纸大量运到长安供朝廷各部门使用，《新唐书·艺文志》称：“玄宗创集贤书院，学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月给蜀郡麻纸五千番。”当时皇家图书馆的“四库之书，两京（长安及洛阳）各二本，共二万五千九百六十一卷，皆以益州麻纸写”（《唐六典》卷九）。在东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杂说篇》里，曾说过用黄蘗来染纸，可使蠹虫不生，谓之“染潢”。到了唐朝，纸制成，也经过染潢这一手续，近年敦煌发现的唐人写经，有的往往经过染潢然后书写的。

在东晋南北朝，剡溪（今浙江嵊县一带）的藤纸，是驰名全国的。到了

唐代，剡溪的藤纸，原料渐渐有枯竭的趋势了。舒元舆《悲剡藤文》中说到：“剡溪上绵四五百里，多古藤，……溪中多纸工，万斧斩伐无时，攀剥皮肤，以给其业。”“异日过数十百郡，洎东洛（洛阳）、西雍（长安），历见书文者，多以剡纸相夸。”可见在国内市场上，剡溪的藤纸，仍有着很高的声誉。

越中（今浙东）和闽广，还以嫩竹造纸，称为竹纸。所谓“越中竹纸”（元鲜于枢《笺纸谱》），“闽人以嫩竹”（《本草纲目》引宋苏易简《纸谱》），唐人李肇还提到“韶之竹笺”（《国史补》）。

“江南楮皮纸”（宋陈旒《负暄野录》），“楚人以楮为纸”（《本草纲目》引宋苏易简《纸谱》）。

“又有茧纸”（《国史补》），所谓“吴人以茧”（《本草纲目》引宋苏易简《纸谱》）。

在沿海一带，也以海苔制纸。隋诗人薛道衡已有《咏苔纸》诗，可见用苔来制纸，当在隋代中叶。李肇在《国史补》中也提到越之“苔笺”。“海人以苔”（《本草纲目》引宋苏易简《纸谱》），当是就地取材。宋陈旒《负暄野录》称：“苔纸以水苔为之，名侧理纸。”

“临川（江西抚州市）之滑薄”（《国史补》），可能接近于后代的连史纸。九江（今江西九江市）出云蓝纸，宋许《彦周诗话》云：“段成式与温庭筠云蓝纸诗序曰：‘予在九江，出意造云蓝纸，辄分送五十番。’”《国史补》又提到“扬之六合笺”，所谓“临川之滑薄”、“九江云蓝纸”和扬州之六合笺，都不知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

“罗州（治廉江，今广东廉江县北）多栈香树，身如柜柳，皮堪捣纸，土人号为香皮纸”（唐段公路《北户录》）。“唐人诗中多用蛮笺字。南番中出香皮纸，色白，纹如鱼子”（《负暄野录》）。可见香皮纸是岭南的特产，驰誉全国。四川的蛮笺，就是模仿香皮纸而得名的。

在唐代，西川地区是造纸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它几乎可和江南的造纸技术媲美。蜀中造纸的材料，据苏易简《纸谱》云：“蜀人以麻。”《新唐书·艺文志》称：“玄宗创集贤书院，学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月给蜀郡麻纸五千番。”麻纸外，《负暄野录》又称：“蜀中藤纸。”蜀纸之最著名的为薛涛笺。薛涛是唐宪宗、唐穆宗时期的蜀中营妓，能诗，喜造纸。费著《蜀笺谱》云：“薛涛以浣花潭水造纸，故佳。其[锦]江旁，凿臼为碓，上下相接，凡造纸之物，必杵之使烂，涤之使洁，然後随其广狭长短之制以造。研则为布纹，为绫绮，为人物花木，为虫鸟，为鼎彝，虽多变，亦因时之宜。”“薛涛所制笺，特深红一色尔。……盖以胭脂染色，最为靡丽。”唐代诗人看到深红色的薛涛笺，就得咏诗来赞美它。《太平寰宇记》云：“薛涛十色笺，短而狭，才容八行。”那麽，薛涛笺不仅只是红色，还具有多种颜色。

蜀“纸以人得名者，有谢公”。谢公不知指谢姓何人，谢公“创笺样以便书尺，俗因以为名”（费著《蜀笺谱》）。谢公所创制的十色笺，据《成都古今记》载蜀笺，“其目曰深红，曰粉红，曰杏红，曰明黄，曰深青，曰浅青，曰深绿，曰浅绿，曰铜绿，曰浅云，凡十样。又有松花纸、金沙纸、流沙纸、彩霞纸、金粉纸、龙凤纸、桃花、冷金之目。”费著《蜀笺谱》还提到蜀中“笺纸有玉版，有贡馀，有轻屑，有表光。玉版、贡馀，杂以旧布破履乱麻为之，惟轻屑、表光，非乱麻不用。”十色笺制裁较少，有似岭南的香皮纸，因此也蒙上“蛮笺”这一称号。唐诗人韩浦《寄弟》诗：“十样

蛮笺出益州，寄来新自浣花头。”可见蜀十样笺也得称蛮笺。《国史补》里讲到蜀纸，也有“蜀之麻面、屑末、滑石、金花、长麻、鱼子、十色笺”等名目，可以证实《成都古今记》中所载的蜀笺，颜色在唐人著述里都早已提到了。蜀笺中，鱼子笺算是最精致的一种，颜色光洁，纸面上还隐约带着霜粒的鳞鳞花纹，故晚唐诗人陆龟蒙鱼笺诗有：“捣成霜粒细鳞鳞，知作愁吟喜见分。向日乍惊新茧色，临风时辨白萍文。好将花下承金粉，堪送天边咏碧云。见倚小窗亲襞染，尽图春色寄夫君”（《袭美以鱼笺见寄因谢成篇》）。

五代十国世，吴越有蠲纸，南唐有澄心堂纸。

宋程棨《三柳轩杂识》云：“温州作蠲纸，洁白坚滑，大略类高丽纸，东南出纸处最多，此当为第一焉。由拳皆出其下。”“吴越钱氏时，供此纸者，蠲其赋役，故号蠲云。”由拳的产纸，是由麻来制造的，疑蠲纸也是属于麻纸的一类。

澄心堂纸，据《珍珠船》称，南唐“李後主，留意笔札，所用澄心堂纸、李廷珪墨、凤尾砚，三者为天下冠”。李後主所造澄心堂纸，甚为贵重，宋初纸犹有存者。《负暄野录》称：“南唐以徽纸作澄心堂纸得名。”米芾在《书史》中批驳了以徽纸（徽州即今安徽歙县）为澄心堂纸的说法，以为澄心堂纸是池纸（池州治秋浦，今安徽贵池县）。他说：“纸多有益於书，由拳麻纸硬坚损书，第一池纸。匀礮之易软少毛，澄心其制也。今人以歙为澄心，可笑。古澄心以水洗浸一日，明日铺於桌上，乾，浆礮已去，纸复元性，乃今池纸也。特捣得细无筋耳。古澄心有一品簿者，最宜背书。台藤（今浙江天台一带的藤纸）背书，滑无毛，天下第一，馀莫及。”绘画写字，都推澄心堂纸，元鲜于枢《笺纸谱》亦云：“南唐澄心堂纸，细薄光润，为一时之甲。”《後山丛谈》：“澄心堂，南唐烈祖节度金陵之宴居也。世以为元宗书殿，误矣。赵内翰彦若有澄心堂书目三千馀卷，有建业文房之印。”宋董道《广川书跋》：“江左书两等纸，用澄心堂所作，谷皮细钞，其上本入中隐堂，备亲览者，为御府书。其下入文馆，以广图籍。书有楷法，而字颇校讎，今散落人间，往往收藏为佳玩，与供进者绝异。”澄心堂纸是南唐李氏由御府监造的精致纸张，它在五代和北宋享有很高的声誉。从《广州书跋》中“谷皮细钞”一词来看，大概澄心堂纸是用谷皮来制成的，它细薄光润，载誉古今。

据《负暄野录》称：“若蜀笺、吴笺，皆染捣而成，蜀笺重厚，不佳，今吴笺为胜。”澄心堂纸是不染色者，细薄光润，适宜书画，此纸出，自当独步一世。

唐代北方“有桑皮纸”（《负暄野录》）。唐萧诚（玄宗时人）“善造斑石文纸，用西山野麻及虢州土谷，五色光滑”（《法书要录》）。“蒲[州]之白薄重抄”（《国史补》），亦名重北方。

除了造纸以外，“又宋（州治宋城，今河南商丘县南）、亳（治谯县，今安徽亳县）间，有织成界道绢素，谓之乌丝栏”（《国史补》），也是书家所喜用的。

**墨** 没有纸以前，就有墨了，竹简和绢素，都可以用墨来书写的。汉代用终南山之松来造墨，扶风渝麋县（今陕西沔阳县东）的墨，是非常驰名的。蔡质《汉官仪》：“尚书令仆丞郎，月赐渝麋大墨一枚，小墨一枚。”曹植诗：“墨出青松烟，笔出狡兔翰。”可见用的是松烟。晋卫夫人（王羲之的老师）《笔阵图》说：“墨取庐山松烟。”到了唐代，河北易州（治今河北

易县)和河东路州(治上党,今山西长治县)的松烟,尤见名贵。《通典·食货典》,易州上谷郡,年贡墨二百挺;潞州上党郡,年贡墨三挺。大概都是松烟。到了五代的时候,南唐改用黄山松、黟山松、罗山松来制墨,用的基本上也是松烟。而松烟的缺点是色彩暗淡,无光泽,尽管重用胶漆,还是挽救不了这个缺点。到了唐代,“长安分石炭,上党结松心”(李峤诗),松烟之外,也采用油烟,尤其喜欢用桐油的煤烟来制墨,墨成,光泽逾於松烟。在《云仙杂记》里引《成老伯墨经》说:“墨纹如履皮,磨之有油晕者,一两可染三万笔。”又云:“墨染纸三年,字不昏暗者为上。”字不昏暗,用桐油烟煤逾於松烟煤。北宋“熙、丰(宋神宗熙宁元年至元丰八年,即公元一六九至一八五年)间,张遇供御墨用油烟入脑麝”(《辍耕录》),才正式发展以油烟来制墨。

制墨,和胶是首要的事情,如果“有上等煤,而胶不如,墨亦不佳;如得胶法,虽次煤,能成善墨。”“凡胶,鹿胶为上”。鹿胶,“一名白胶,一名黄明胶。墨法所称黄明胶,正谓鹿胶”。“凡煤一斤,古法用胶一斤,今(北宋时)用胶水一斤,水居十二两,胶居四两”。“胶多利久,胶少利新”。除了和胶以外,还掺漆入鹿胶中,“若以漆和之,生漆三钱,熟漆二钱,取清汁投胶中,打之匀,和之如法”(晁以道《墨经》)。

胶和煤烟,都有臭气必须掺入香料。韦仲将《墨方》:“合墨法,以真珠一两、麝香半两,皆捣细後,都合下铁臼中捣三万杵,杵多愈善。”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用柗木、鸡白、真珠、麝香四物掺入。唐君德用醋石榴皮、犀角屑、胆矾三物掺入。又一法,用柗木皮、皂角、胆矾、马鞭草四物掺入。南唐李廷珪用藤黄、犀角、真珠、巴豆等十二物掺入。真珠粉掺进入墨,使墨磨成之後,闪闪发光;麝香除臭气,发香气,所以古人用来和墨。

汉代渝麋墨称枚,魏晋时以丸形,所以称墨丸。後来有螺子墨,大概也有丸形的。黄山谷言李廷珪能削坠谷中,经月不坏。唐末易州又墨工奚勳、奚鼎兄弟,以制墨著名。奚勳子奚起、奚超傳父制法。五代初,北方战乱,奚超一房,自易州南渡江南,定居歙州(今安徽歙县),南唐主赐姓李氏。奚超子李廷珪(一作李廷邽)、李廷宽、李承晏皆以制墨擅名江南。《十国春秋》云:“李廷珪居歙,其地多美松。时江南又有朱君德、柴询、柴成务、李文远、张遇、陈贇,著名当时。其制有剑脊、圆饼、拙墨、进贡墨、供堂墨,其面多作蛟龙,其幕有宣府字,或著姓氏,或别州府,然傳者绝少。”“黄山谷於几间取小锦囊,有墨半丸,以示卖墨者潘,隔囊手之,即置几上曰:‘天下之宝也。’出之乃廷珪墨。”但李廷珪父子尚用松烟,到了北宋,始改用桐油烟煤来制墨。一直到今天,徽墨尚享有盛名。

黑墨以外,《云仙杂记》引《大唐龙随记》云:“楚王灵夔使人造红白二墨为戏,及书写衣服,黑衣用白书,白衣用红书,自成一家。”可说是五色墨的滥觞。

笔在用纸以前,古人已经用笔来写在简素上了。最近考古发现,几次出有古笔,形制古拙,笔管较今笔为长。《庄子》:“画者吮笔和墨。”《博物志》:“蒙恬造笔。”马缟《中华古今注》云:“蒙恬始作秦笔耳,以柘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毛为被。所谓苍毫,非谓兔毫,竹管笔也。”人间传说:“张芝、钟繇用鼠须笔,笔锋劲强有锋芒”(王羲之《笔经》),可是王羲之却不信此说。《法书要录》谓王羲之“写《兰亭序》以鼠须笔”。王羲之既不信张芝、钟繇用鼠须笔,自己也不见得会用鼠须笔,所以用鼠须笔

之说，恐是後世传闻之误，未必真有其事。卫夫人《笔阵图》讲到制笔时，“要取崇山绝仞中兔毛，八九月收之，其笔头长一寸，管长五寸，锋齐腰强者”（《法书要录》引）。王羲之《笔经》也说：“诸郡兔毫，惟赵国毫中用。赵国平原广泽，无杂草木，唯有细草，是以兔肥，毫长而锐。”“时人咸言兔毫无优劣，管手有巧拙。”《新唐书·艺文志》：“玄宗创集贤书院，学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岁给河间（郡治乐城，今河北献县东南）、景城（郡治清池，今河北沧县东南）、清河（郡治清河，今河北清河县）、博平（郡治聊城，今山东聊城市）四郡兔千五百皮为笔材。”可见笔材基本上都是采用兔毫制成的。白居易的新乐府《紫毫笔》：“紫毫笔，尖如锥兮利如刀。江南石上有老兔，吃竹饮泉生紫毫。宣城之人采为笔，千万毛中拣一毫。毫虽轻，功甚重，管勒工名充岁贡。”段公路《北户录》中也称：“宣城岁贡……紫毫三两”以作笔。这个紫毫笔，也是以兔毫充笔材。据《云仙杂记》说：“白乐天作《紫毫笔》诗云：‘宣城石上有老兔，食竹饮泉生紫毫。’予守宣（州治宣城，今安徽宣城县）时，问笔工：‘毫用何处兔？’答云：‘陈、毫、宿数州客所贩；宣自有兔毫，不堪用。’盖兔居原田，则毫全，以出入无伤也。宣兔居山，出入为荆棘树石所伤，毫例倒秃。”可见宣州兔毫笔，并不是用宣州土产的兔毛，而用的是陈、毫、宿等州兔毛，不过由於宣州笔工技术过关，选择精良，从而宣笔和宣纸、徽墨一样，在国内获得很高的声誉。

宣城制笔的笔工，在唐、五代，以诸葛氏最为著名。据宋叶梦得《避暑录》称：“笔出於宣州自唐，惟诸葛一姓，世传其业。”据说南唐时，宜春王李从谦，“喜书札，学习二王楷法，用宣城诸葛笔，一枝酬以十金，劲妙甲当时”（陶谷《清异录》），当时一枝普通的笔，只值三个制钱，而诸葛氏之笔，一枝酬以十金，可以称为高级毛笔了。

笔管以竹最为适宜，《朝野僉载》称：“欧阳通以象牙犀角为笔管。”《新唐书·欧阳询传》亦称：欧阳通“书亚於父，晚自矜重，以狸毛为笔，覆以兔毫，管皆象、犀，非是未尝书。实际笔管应取轻便，不必一定要取金银牙犀来装饰，王羲之《笔经》云：“昔人或以琉璃、象牙为笔管，丽饰则有之，然笔须轻便，重则踈矣。”

东晋时，王隐作《笔铭》：“岂其作笔，必兔之毫；调和难脱，亦有鹿毛。”在王隐之前，秦蒙恬曾以鹿毫为笔。唐刘恂《岭表录异》：“番禺地无狐兔，用鹿毛、野狸毛为笔……其为用与兔毫不异。”欧阳通也采用狸毛为笔。又“昭（治平乐，今广西平乐县）、富（治龙平，今广西昭平县）、春（治阳春，今广东阳春县）、勤（治富林，今广东阳春县西北）等州，则择鸡毛为笔。”“韶山（今广东韶关市）择鸡毛为笔。”鸡毛笔“可以抄写细字”。鸡毛笔之外，又说：“溪源有鸭毛笔，以山鸡毛、雀雉毛间之，五色可爱。”可见制笔的材料、品种很多。当然当时最广泛所喜用的，还是兔毫，毋怪韩愈要给管城子中山毛颖列传了。

柳公权是一代书家，他有一帖云：“近蒙寄笔，深慰远情。但出锋太短，伤於劲硬。所要优柔，出锋须长，择毫须细，取管不在大，副切须齐。副齐则波掣有凭，管小则运动省力，毛细则点画无失，锋长则洪润自由”（《杨升庵外集》录文）。对笔的要求，可以说是很切实而全面的。

唐代科举制度的发展，笔也成为举子重要工具之一。《清异录》载：“唐世举子将入场，嗜利者争卖健毫圆笔，其价十倍，号定名笔。笔工每卖一枝，

则录姓名，俟其荣捷，即诣门求阿堵，俗呼谢笔。”这也可说是笔史中一桩有趣味的故事。

砚 在纸发明以前，已经用砚来和墨或漆了。卫夫人之砚，据她的《笔阵图》说：“其砚取煎涸新石，润涩相兼，浮津耀墨者。”《晋仪注》：太子纳妃有漆砚。据米芾《砚史》：“今人有收得右军（王羲之）砚，其制与晋图画同，头狭四寸许，下阔六寸许……色紫类温岩，中凹成臼。”“又有收得智永砚，头微圆，又类箕象，中亦成凹矣。”“又参政苏文简家收唐画《唐太宗长孙后纳谏图》，宫人於玛瑙盘中托一圆头凤尾砚。”砚的形制，没有後世那样多样化。

柳公权“常评砚，以青州石末为第一，言墨易冷，绛州黑砚次之”（《旧唐书·柳公绰传弟公权附传》）。青州砚分青石和红丝石两类。“青州青石，色类歙，理皆不及，发墨不乏，有瓦砾之象。”“青州红丝石，弥佳，大抵色白而纹红者，慢发墨……纹理斑石赤者，不渍墨，发墨有光，而纹大不入看”（米芾《砚史》）。另一种说法，青州红丝石，“红黄相参，理黄者其丝红，理红者其丝黄，须饮以水使足乃可用，不然渴燥”（李之彦《砚谱》）。《十国春秋》云：“江南主尤重红丝砚。”“歙砚，出於龙尾溪，以金星为宝”（李之彦《砚谱》）。歙砚亦称婺源砚，据宋人洪景伯《歙砚谱》称：“唐开元中，猎人逐兽至长城里，见叠石如城叠状，莹洁可爱，因携以归，刊粗成砚。……至南唐中宗精意翰墨，歙守又献石并蒸砚工李少微，国主嘉之，擢为砚官令。”宋人随笔：“南唐有国时，於歙州置砚务，选工之善者，命以九品之服，月有俸廩之给，号砚务官。岁为官造砚有数。其砚四方而平浅者，南唐官砚也。其石尤精，制作亦不类今工之侈窳。”李之彦《砚谱》载：南唐“李後主得青石砚，墨池中有黄石如弹丸，水常满，终日用之不耗。”因为歙砚是南唐封域之内的产品，李氏自然要对它加以珍爱了。

李肇《国史补》称：“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可见端砚在唐代已很著名。唐诗人李贺有《杨生青花紫石砚歌》，歌云：“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佣刊抱水含满唇，暗洒茱弘冷血痕。”据《端溪砚谱》：端州治高要县，县东三十里有斧柯山，即砚岩也。先至者曰下岩，下岩之上曰中岩，中岩之上曰上岩，自上岩转山之背，曰龙岩，即唐取砚之所。又旧砚谱谓：端溪，水中石，色青；山半石，色紫；山顶石尤润，如猪肝色。李贺歌中的“踏天磨刀割紫云”，当是指山顶紫色之石。“暗洒茱弘冷血痕”，则指鸚鵡眼。僧齐己亦有《谢人惠端溪砚》诗，可知端溪砚在唐代已大量生产。

纸墨笔砚的保养方法，在《云仙杂记》引《文房宝饰》里提到：“养笔以碓黄酒舒其毫（并使其不蠹）；养纸以芙蓉粉借其色（并使其不黧黄）；养砚以文绫盖，贵乎隔尘（後世用漆匣）；养墨以豹皮囊，贵乎还湿。”这几句都是很有经验的话。

纸墨笔砚制造业的发展，促进了唐五代书法、绘画两项重要艺术的进一步发展，宋元明清的书法、绘画艺术水平，就是在这个高水平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来的。

## 第四节 科学技术

天文历法 隋唐五代时期，天文历法方面，也有很大的发展。

浑天仪 东汉张衡曾作浑天仪，制作精巧。前赵光初六年（公元三二三年），孔挺亦作浑仪。北魏太史丞斛兰又仿孔挺旧浑仪作新仪，迄隋行用。但根据遗留的片断材料，好像孔挺所造的浑仪，只含有相当於四游仪和六合仪部分，而没有三辰仪部分。唐太宗贞观七年（公元六三六年），李淳风始铸成附有三辰仪的浑天仪。李淳风评论过去浑天仪的得失时，认为汉以来的仪器，缺少黄道圈，这是不合适的，所以李淳风所制浑天仪，“一曰六合仪，有天经双规，金浑纬规，金常规，相结於四极之内。列二十八宿、十日、十二辰、经纬三百六十五度。二曰三辰仪，圆径八尺，有璇玑规、月游规，列宿距度，七曜所行，转於六合之内。三曰四游仪，玄枢为轴，以连结玉衡游筒而贯约规矩。又玄极北树北辰，南矩地轴，傍转於内。玉衡在玄枢之间，而南北游，仰以观天之辰宿，下以识器之规度。皆用铜”（《新唐书·天文志》）。李淳风所造浑天仪，最外层是六合仪，中间是三辰仪，内层是四游仪，这样，黄道经纬、赤道经纬、地平经纬，都可以测定，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东汉张衡曾造水运浑天仪，但它的制度没有流传下来。唐玄宗开元十一年（公元七二三年），僧一行（俗名张燧）受诏与率府兵曹参军梁令瓚铸造一种水运的铜浑天仪，“圆天之象，具列宿、赤道及周天度数。注水激轮，令其自转，一昼夜而天运周。外络二轮，缀以日月，令得运行。每天西旋一周，日东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九转有馀而日月会，三百六十五转而日周天。以木柜为地平，令仪半在地下，晦明朔望迟速有准。立木人二於地平上，其一前置鼓以候刻，至一刻则自击之；其一前置钟以候辰，至一辰亦自撞之。皆於柜中各施轮轴，钩键关锁，交错相持”（《新唐书·天文志》）。一个木人每刻击鼓，一个木人每辰敲钟，都能按时自动以报时刻，可见这种铜浑天仪，不仅是天文仪器，同时也是准时报告时刻的自鸣钟。

隋文帝即位，命张宾等造新历，宾等依南朝何承天历，微加增损。开皇四年（公元五八四年），下诏施行。施行不久，当时知历者刘孝孙、刘焯并言其失，谓：“验影定气，何（承天）氏所优，宾等推测，去之弥远。合朔顺天，何氏所劣，宾等依据，循彼迷踪。盖是失其菁华，得其糠粃者也。”尤其在定朔方面，“历数所重”，“朔为朝会之首，……朔有告饬之文，……故孔子命历而定朔旦冬至。”“今孝孙历法……欲令食必在朔，不在晦，二（月之初二日）之日也。纵使频月一小、三大，得天之统”（《隋书·律历志》中）。由於隋文帝信任张宾，刘孝孙、刘焯的建议不被采纳，二人也均被斥退。张宾死，开皇十七年（公元五九七年），又改用张胄玄所定历，张胄玄之历学，出於祖冲之，实际隋是用祖冲之历来代替何承天历。张胄玄历冬至起虚五度，後来发觉有差错，到了大业四年（公元六〇八年），加以改订，起虚七度。一直到隋亡，还是用张胄玄历。

唐朝二百九十多年，历法一共改动了八次。唐高祖武德二年（公元六一九年），行用傅仁均的《戊寅元历》，从他开始，才用定朔，这是中国历法上一个很大的改革。什麼叫定朔呢？在唐以前的历法，都用平朔，即一个月月大，一个月月小，南北朝的许多历学专家，对此已经不满意，认为应该用定朔，但当时墨守陈规的势力很大，不易推动进行改革。傅仁均《戊寅元历》

立定朔以後，贞观十九年（公元六四五年）九月後，“四朔频大”，於是一股守旧势力又怀疑历法上有问题，只得又恢复平朔。唐高宗麟德二年（公元六六五年），颁行李淳风的《甲子元历》，称之为《麟德历》。李淳风为了迁就保守势力，仍用定朔，但立进朔法，尽量避免出现一连四个大月，或一连三个月。所以有时把历书上朔日推进一日，使第三个月改成大月，有时把朔日倒退一日，使第四个大月改成小月，这种不符合定朔意义的措施，一直被迫执行着，到元朝才被废除。

开元九年（公元七二一年），命僧一行作新历，至开元十五年（公元七二七年），历成而一行病死。开元十七年（公元七二九年），颁行之，称《开元大衍历》。

《新唐书·律历志》说：“自太初（汉武帝年号，太初元年，公元前四年）至麟德，历有二十三家，与天虽近而未密也。至一行，密矣！其倚数立法固无以易也。”对一行这样高的评价，并不算过头。

僧一行在唐开元初年起草《大衍历》时，派人到各处去测日影长度。在这次测量中，以太史监南宫说在河南平地四个地点进行的这一组，最为著名。这四个地点是滑台（今河南滑县东北）的白马，浚仪（今河南开封市）的岳台，扶沟（今河南扶沟县），上蔡（今河南上蔡县）的武津，地理经度都很接近。从滑县到上蔡，北极高度差一度半，距离相差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唐代长度），夏至日日中八尺高标竿的影长差二寸有余。这样就推翻了汉代以来所谓“王畿千里，影差一寸”的说法。一行根据各地的观测资料，证明根本影差和距离的比例不是固定的。一行开始改用北极高度（即实际上的地理纬度）来计算，由南宫说这一组的测量得出：地差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北极高度相差一度。这数据实质上即地球子午线上一度的长。这数据和近代得出的数据比较起来，虽然误差还很大，但是在他的概念中已包含地球的大小的意义，固然他没有明确地说出来，但在当时它是天文学中的一个新的创造。

一行在《大衍历》里，还有另外一些新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定气”方面。从汉代以来，历法界一直认为太阳在黄道上的运动速度是均匀不变的，一回归年 365.25 日中等速地走了一周天。把一周天分为 365.25 度，每天正好走一度。从冬至时刻开始算起，把一年均匀分作二十四分，每过 15.22 日，称为一气。这样的气，称为“平气”。但实际上太阳在天球上的运转是地球绕太阳公转的反映。地球走到近日点时，速度最快，因而天上的太阳运动速度也是最快；地球走到远日点时，速度最慢，此时天上的太阳也最慢。因此，当平气的春秋分时，太阳并不在黄赤道交点上，每两个平气间太阳走的黄道度数也并不相等。东魏、北齐（公元五三四——五七七年）时人张子信，他居住在海岛上三十多年，专以浑仪测候日月五星，根据他三十多年的经验，他发现一年里面，日月行动的快慢不齐，同时发现了日月蚀的规律。月行的迟疾，汉代已经有人推测出来，而日行的盈缩这是张子信首先发现的。张子信认识到太阳运动的不均匀性，“春分後则迟，秋分後则速”。他在这方面的发现，不但对日蚀的预告帮助很大，同时对太阳运动的规律也有所了解。隋代刘焯撰《皇极历》时，吸取了张子信在这方面的新成果，立盈缩缠差法。但是刘焯认为太阳速度从冬至起逐渐下降，到立春，速度平，又逐渐上升到春分前一日，速度和冬至相等；春分後一日速度最慢，和夏至相同。以後又逐渐上升到立夏，速度平，又逐渐下降到夏至，又是最慢；夏至以後又相反。

这分法和太阳实际运动的快慢规律，尚有距离。僧一行在撰《大衍历》时，纠正了刘焯的错误，认为太阳在冬至时速度最快，以後逐渐慢下来到春分，速度平，继续慢到夏至最慢；夏至以後则相反。这就比较接近地球运动的实际了。一行也认为冬至时最快，没有分辨出近日点与冬至点的不同，这是由於当时近日点和冬至点相差不到九度，所以不容易发觉出来的缘故。

一行在这样基础上，提出了较准确的“定气”概念。把黄道、周 365.25 度从冬至开始等分为二十四分。太阳每走到此分线上便是“气”的时刻。根据观测，《大衍历》中规定从冬至到春分共 88.89 日；太阳行 91.31 度，经过六个气；春分到夏至也是六个气，共 93.73 日，也行 91.31 度。秋分前後和春分前後情况相同。每二气间黄经差相同，而时间间距则不相同。

一行在其《大衍历》草成之後不久就死了，当时有几个墨守陈规的天文历法家，都攻击《大衍历》不够准确。於是就召集在这方面的专家，把《大衍历》来和《麟德历》（李淳风所撰）以及《九执历》（天竺历，由瞿曇悉达译出）比较，结论是：“《大衍》十得七、八，《麟德》才三、四，《九执》一、二焉”（《新唐书·历志》）。说明《大衍历》比起当时中外其它各家的历法来，都要精密。

无论张子信也好，李淳风也好，僧一行也好，他们对天文的观测和历法方面，虽然有所贡献，但也有他们的缺点。主要由於他们不能完全摆脱象数和星算之术，使他们著作中蒙上一幕神秘的外衣。有些甚至为了迎合时主的喜好，故意做出违反科学的结论来，如一行在推演《大衍历》时，认为开元十二年七月和十三年十二月都应该看到日食的，结果却没有看到，一行认为这不是他的推算错误，而是唐玄宗至德感天的结果。这种说法是完全和科学精神不能相容的。

一行在与梁令瓚合作造成黄道铜浑仪，以测量星宿经纬度，他发现了当时星宿位置和古代相比，不独赤道上位置和距极度数因为岁差关系而有差异，同时黄道上的位置也有不同。他测得从牵牛到东井十四宿，去极的度数，都是古测大而今测小，这是星自南而北移动的缘故；从舆鬼到南斗十四宿，去极的度数，都是古测小而今测大，这是星自北而南移动的缘故。一行从这个事实里，作进一步的推断，就知道恒星本身在天上的位置，也是不断地在移动的，并不像一般的说法，认为恒星的位置是永恒不动的，这种移动在今天叫做“自行”。当然当时一行只发现这种恒星自行现象，没有给予这种名称。恒星自行，非经过很长时间不能发觉。在西方，哈雷在公元一七一八年测知天狼、北河、大角三星的黄道度和希腊时代不同，才发现恒星的自行，这时已在一行所测的一千年之後了。

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七六二年），又诏司天监官属郭默之等造《宝应五纪历》行之。德宗兴元元年（公元七八一年）又颁行了《建中正元历》。宪宗元和元年（公元八六年），改用《元和观象历》。穆宗长庆二年（公元八二二年），颁行《长庆宣明历》。昭宗景福元年（公元八九二年），颁行《景福崇玄历》。从《大衍历》以後，历法虽屡改易，实际大体都沿袭着《麟德》、《大衍》二历之旧，只作了小小的修改，改换了历法的名称而已。

五代的後梁和後唐，都沿用唐《景福崇玄历》。到了後晋石敬瑭时，司天监马重绩又更造新历，马重绩采用了唐德宗建中时期术者曹士 所定的《符天历》，後来行之於民间，称之为小历，马重绩改名之为《调元历》。但施行了五年，发现误差较大，又改回来用《景福崇玄历》。後周太祖广顺（公

元九五—九五三年)中,国子博士王处讷私撰《明玄历》,而民间又行用《万分历》。後周世宗於显德三年(公元九五六年),又采用了端明殿学士王朴领衔修订的《钦天历》。五代时,蜀国先後颁行了《永昌历》、《正象历》。南唐也颁行《齐政历》。据宋人刘羲叟说:“前世造历者,其法不同而多差。至唐一行始以天地之中数作《大衍历》,最为精密。後世善治历者,皆用其法,惟写分拟数而已。至[王]朴亦能自为一家……然不能宏深简易,而径急是取。至其所长,虽圣人出不能废也”(《新五代史·司天考》)。可见王朴的《钦天历》,也是在僧一行的科学研究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

**医学与药理学** 隋太医博士巢元方受诏集众医於大业六年(公元六一年)撰成《诸病源候总论》一书。全书共五十卷,分六十七门,列证候一千七百餘论,唯论病证,不载方药。书中对内科、外科、耳鼻喉科、眼科、妇产科、小儿科等各科的病因和病理现象,都作了详细的叙述,可以说是从汉魏以来在病因证候学方面的一部总结性著作,它标志着当时医学界在临床诊断方面的丰富知识和较高水平。

该书对病因方面的认识,在今天看来,有些是符合於科学的判断的。如说患寸白虫(绦虫)的病因,是由於“食生鱼”和“饮白酒(时)以桑枝贯牛肉炙食并生栗所致”(《九虫病诸候·寸白虫候》)。在书里并指出传染病多半是由於外界有害物质所引起的,而且会传染给别人,所谓“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温病诸候·温病令人不相染易候》)。因此强调须要做好预防工作,及时医疗,并加以隔离。书中提到,在传染病中有许多病是和季节性有很大关系的,所谓“皆由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寒暑乖候……则民多疾疫,病无少长,率皆相似”(《疫疠病诸候·疫疠病候》)。它对风湿性关节炎的证候,介绍得很详细。他说:“凡脚气病,皆由感风毒所致,得此病多不即觉……初甚微,饮食嬉戏气力如故。尝熟察之,其状自膝至脚有不仁,或若痺,或遥遥如虫所啄,或脚指及膝胫洒洒尔,或脚屈弱不能行,或微肿,或酷冷,或酸疼,或缓纵不随,或挛急……或胸心冲悸……或腹内苦痛……此皆病之证也。若治之缓,便上入腹,入腹或肿或不肿,胸胁满,气上,便杀人,急者不全月,缓者或一、二、三月”(《脚气病诸候·脚气缓弱候》)。这可以说已经把由於风湿性关节炎而引起心脏病以致死亡的情况,叙述得非常真实了。它对麻风病的各期典型证状,描述得也颇为全面。它说:“凡癩病……初觉皮肤不仁,或遥遥苦痒,如虫行,或眼前见物如垂丝,或隐轆辄赤黑,此皆为疾始起……久而不治,令人顽痺……手足酸痛……身体偏痒,搔之生疮……或顽如钱大,……或如梳……锥刺不痛……眉睫堕落……鼻柱崩倒……肢节堕落”(《风病诸候·诸癩候》)。另外在叙述消渴病证候时,几次都提到消渴病(糖尿病)容易引起痈疽,这种对疾病的观察,也是符合科学原理的。它在介绍漆疮时,还指出有些病患,和人的过敏性有关系。它说:“漆有毒,人有禀性畏漆,但见漆,便中其毒……亦有性自耐者,终日烧煮,竟不为害也”(《疮病诸候·漆疮候》)。此外在书中还用足够的篇幅来叙述妇女杂病以及妊娠、将产、难产、产後等病二百八十余论,他对这些病的病因和证候都作了细致的说明。对小儿科的病因、病理,也一样作了详尽的介绍,而且对孩子的护理工作也非常注意。书中说:“小儿始生,不可暖衣……皆当以故絮著衣,莫用新绵也。”又说:“宜时见风日……天和暖无风之时,令母将抱日中嬉戏,数见风日,则……肌肉硬密,堪耐风寒,不致疾病。若常藏在帟帐之内,重衣温暖,譬如阴地之草木,不

见风日，软脆不任风寒。”并说：“又当消息，无令汗出，汗出则致虚损，便受风寒，昼夜寤寐，皆当慎之。其饮乳食哺……常当节适。……儿稍大，食哺亦当稍增”（《小儿杂病诸候·养小儿候》）。可以说对孩子的护理工作，已经介绍得非常细致而详尽了。在书里还提到剖腹缝肠的手术和拔除病牙的方法。由於时代的局限，无可讳言，在巢氏《诸病源候总论》里，也搀杂有许多迷信和非科学的东西，这是应该加以剔除的；但这并不妨害这一部专著在中国医学史的一定地位。

孙思邈，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东南）人。他大概生於西魏大统（公元五三五至五五一年）末年，历周、隋，至唐高宗永淳末年（公元六八二年），活到一百多岁才死。唐高宗曾给他谏议大夫的官位，他也没有接受。他非常博学，无书不读。《华严经传记》卷五里说他“学该内外，尤闲医药。上元、仪凤之年（公元六七四至六七九年），居长安、万年二县之境。尝与人谈话，说魏齐人物及洛阳故都，城中朝士，并寺宇众僧，宛然目击。”因此唐初修五朝史时，史官往往去向他请教。

孙思邈在幼年的时候，就生过重病，知道医学的重要，他说：“吾幼遭风冷，屡造医门，汤药之资，罄尽家产。所以青衿之岁（求学的年龄），高尚兹典，白首之年，未尝释卷。至於切脉、诊候、采药、合和、服饵、节度、将息、避慎，一事长於己者，不远千里，伏膺取决”（《千金要方序》）。这样辛勤的苦学，医学渐渐入门了。据他自己说：“至於弱冠，颇觉有悟，是以亲邻中外有疾厄者，多所济益；在身之患，断绝医门。”他自己一生，“二遭热痢，一经冷痢”（《千金方》卷十五《脾脏·热痢》），又“数病痛疽”（《千金方》卷二十二《痛疽》），结果都是自己医好的。他说学医的人，不仅要深通古代医书和经方，而且要涉猎群书，五经、三史、佛典、《庄》《老》，要无所不读，知识面一丰富，“则於医道无所滞碍，尽善尽美矣”（《千金方》卷一《序例·大医习业》）。他反对把医道看得非常简单的这种观点，说到“世有愚者，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故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千金方》卷一《序例·大医精诚》）

孙思邈认为做医生必须具有很高的道德品质。他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指人）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後，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嶮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千金方》卷一《序例·大医精诚》）。

孙思邈在唐高宗永徽三年（公元六五二年），已七十岁左右了，整理出他那一部不朽巨作《备急千金要方》三十卷来。又稍後二十多年，快到他一百岁的时候，又把它另一重要著作《千金翼方》三十卷也整理了出来。为什么称之为《千金方》呢？据孙思邈在自序里说：“以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於此，故以为名也。”这两部书，是集唐以前经方大成的总结性著作。宋林亿在《新校备急千金要方序》中说这部书“上极文字之初，下讫有隋之世，或经或方，无不采摭。集诸家之所秘要，去众说之所未至”，给予它很高的评价。孙思邈在采择各家经方以及吸取前人先进经验时，不是漫无别白的，他往往能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譬如南齐时名医徐嗣伯，他

的专长是治疗风眩病，自称是“百无遗策”。孙思邈就把他的验方全部收在《千金要方》里。又如脚气病，“自永嘉南渡，衣纓士人多有遭者，岭表江东有支法存、仰道人等，并留意经方，偏善斯术。……又宋齐之间，释门僧深师仰道人，述支道存等诸家旧方为三十卷”（《千金要方》卷七《风毒脚气》）。孙思邈认为僧深的脚弱方，其中有的是收到一定治疗效果的，因此选择其中“灼然有效”的，收进《千金要方》里来。又如唐高祖武德中，有甄权新撰《明堂图》，对人体针灸穴位，说得较前详细，孙思邈就虚心地向他请教，把甄权的《明堂图》中某些可以吸取的成果，写进《千金翼方》里去。除了前面所讲到的几家被采录以外，还有如东晋安北将军范汪所著的《范汪方》百馀卷，南朝宋徐文伯所著的《徐文伯方》，北齐徐之才所著的《徐王方》，北周姚僧垣所著的《集验方》，凡是有价值的验方，都被他采了进去。这些经方，原书已经散佚，幸亏孙思邈把它转录下来，得以保存留传。由此可见，人们称这部书为魏晋南北朝以来的经方大成，一点也不夸大。

《千金方》虽然也以载录经方为主，但它对疾病证状的诊断，仍是十分准确。如在描述消渴病（糖尿病）时说这病的特点：一，病渴；二，小便数；三，“食乃兼倍於常”，另外就是“日就羸瘦”，可以说已经简括地把糖尿病的特征“三多一少”描述出来了。而且在书中特别指出消渴病患者容易并发痈疽，他说：“消渴之人，愈与未愈，常须思虑有大痈，何者，消渴之人，必於大骨节间发痈疽而卒，所以戒之在大痈也。当预备痈药以防之。”他并说：“消渴病经百日以上者，不得灸刺。灸刺则於疮上漏脓水不歇，遂致痈疽。亦忌有所误伤，但作针许大疮……於疮中变成脓水而出，若水出不止者必死，慎之！慎之！”（《千金要方》卷二十一《消渴》）这种观察都是非常细致而与今天科学的结论相一致的。他对关节结核的观察说：“附骨疽者，以其无故附骨成脓，故名附骨疽，喜著大节解中……小儿亦著脊背”（《千金要方》卷二十二《痈疽》）。这也是和今天的认识能够取得一致的。

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以专章来论述妇产科和小儿科的疾病，并详细地载录了有关妇女科和小儿科的经方。他说：“断脐不得以刀子割之”，这样可以避免“脐风”（破伤风），这也有一定的科学道理。他说母亲“乳儿……视儿饥饱节度，知一日中几乳而足以为常”，说明他已经注意到哺乳的次数和分量。他也主张孩子衣服“特忌厚热”。他还观察和记载了孩子的发育程序，如说：“凡生後六十日……能咳笑应和人；百日……能自反覆（翻身）；百八十日……能独坐；二百一十日……能匍匐；三百日……能独立；三百六十日……能行，此其定法；若不能依期者，必有不平之处”（《千金要方》卷五《少小婴孺方·序例》）。这和现代的观察是完全一致的。

孙思邈在《千金方》里，特别强调食疗，他认为食疗胜於药疗。他说：“夫为医者，当须洞视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後命药。药性刚烈，犹为御兵，兵之猛暴，岂容妄发”（《医心方·服药节度篇》引《千金方》）。在这一指导思想之下，因此他提倡服牛、羊乳，又认为服醍醐（犹今之奶油）可以延年，又说胡麻、白麻，可以益人。他指出瘰疬（甲状腺肿大）除了可服用昆布、海藻以外，还可以用鹿靨（即鹿甲状腺）来治疗瘰疬。又指出猪肝、牛肝、羊肝（含有甲种维生素）可以用来治疗雀目（即夜盲病），麋角（鹿茸）、鹿角可以用来治疗虚弱，这种对食物营养的看法，几乎和今天的认识完全一致。

孙思邈在他的著作里，还特别强调运动的重要性，他主张每日必须“按摩道引为佳”。他介绍了两套柔软体操，一套是“天竺国按摩法”，一共是十八种姿势；一套是“老子按摩法”，一共是四十九种姿势。他说：“但是老人日别能依此三遍者，一月後，百病除，行及奔马，补益延年，能食，眼明轻健，不复疲乏”（《千金要方》卷二十七）。孙思邈能够活到一百多岁，可能与他这种重视按摩和柔软体操有一定的关系。

由于时代的局限，在孙思邈的著作里，也不可能避免地出现大量迷信和非科学性的东西。譬如说，他认为齿病是由于齿病患者在月蚀之夜吃东西的缘故；人被鱼骨哽住喉了，只要说：“鸬鹚！鸬鹚！”骨头就咽下去了。在《千金翼方》最后的两卷，称为《禁经》上、《禁经》下，全部是迷信可笑的东西，如这里面认为疟病是有疟鬼的，只要一念符咒，疟鬼就逃跑了，于是他介绍这一套咒语说：“登高山，望海北，水中有一龙，三头九尾，不食诸物，唯食疟鬼。朝食三千，暮食八百，食之不足，差使来索。疟鬼须屏迹！不伏去者，缚送与河伯！急！急！如律令。”这种可笑的迷信糟粕部分，我们应该加以屏除。

王焘，唐玄宗时，任相州刺史，天宝十一载（公元七五二年），撰成《外台秘要》四十卷。分一千一百另四门，载方六千馀论，这也是带有总结性的一部著作，不过由于他离开孙思邈的时代不太远，因此在验方的搜罗上，很难超过《千金方》。但王焘在编撰这一部书时，无论引用巢氏《病源》或各家经方，都详细注出引书出处和卷数，因此对保存古代经方的原来面目方面，有较大贡献。譬如说用牛肝来治疗夜盲，他注出始于僧深，用猪肝来治疗夜盲，他注出见于《千金翼方》，用羊靨来治疗瘰疬，他注出见于初虞世《古今录验方》，这对于古代医史的研究，提供了更原始的素材。这一部书的编成，不仅对国内有较大影响，同时也影响了日本的医学界。公元九八二年，日本丹波康赖著《医心方》三十卷，其体裁就是仿效《外台秘要》来编纂的。

在验方的传播方面，隋炀帝曾下敕撰集《四海类聚单方》十六卷。唐玄宗又下敕撰集《开元广济方》五卷，在《广济方》里，提到黄连治痢，《医心方》卷十一引《广济方》云：“治杂痢”，“黄连一两，乾薑一两，熟苾一两，附子一枚炬，蜀椒十四粒，阿胶如手大，炙。切以水五升，煮取二升五合。绞去滓内胶，更上火煎胶烊，分温三服。”

唐德宗也下敕撰集《贞元集要广利方》五卷，除了用黄连、当归来治疗赤白痢之外（见《医心方》卷十一），还采用昆布、海藻来治疗甲状腺肥大。

《医心方》卷十六引《广利方》云：疗瘰结气方，“昆布二大两，暖水洗去咸味，寸切，小麦三大合，以水二大升，煮取小麦就，择取昆布，空腹含三五斤，津液细细咽之，日再含。”《广利方》也推荐用犀角来治疗儿童的高烧，《重修政和证类本草》卷十七引《广利方》云：犀角，“治孩子惊痫不知人，迷闷，嚼舌仰目者，犀角末半钱匕，水二大合，服之立效。”

除了由政府来搜辑验方，加以编录，推广到民间以外；唐代的朝士，也有深懂医道的，他们也搜录了不少有灵效的验方，传播民间，著名的有甄权《古今录验方》、杨炎《南行方》、陆贽《集验方》、刘禹锡《传信方》、李绛《兵部手集方》等等。

甄权著有《药性本草》之外，又著有《古今录验方》，惜原书散佚，《医心方》卷三引《录验方》云：“经言诸取风者……此人间庭巷门户窗牖之逐气耳。天无风之日，恒有逐风，人长居其间，积日月，此能虚人肌理，入百

脉，攻入五藏六府，则致病焉。復有野间广泽都亭成迳风，亦不可居卧也。復有眠坐恒使人扇之，亦能生病，但小轻於迳穴中耳。”“古洛阳市有一上贴（收物质钱，猶后世之當舖）家，最要货賣倍集，但货主周年中必得病致死，遂成空癸。……有一乞儿，常出市乞，每歲輒见货主非復舊人，乞儿……便看贴中，唯见货主坐处，背约一柱，有一虫食穴，故最有风贯过，如针头大，正射坐人项，即是风射处。乞儿计病源，一品人坐所，当是其项所对，死当由此。便诣市官，求贴坐之，钉塞此孔，然无复病。”对脑后来风，强调到丧命程度，文字也刻划细致，雅俗共赏。

杨炎，德宗朝宰相，他未入相前，尝贬道州（治弘道，今湖南道县）司马，著《南行方》，原书久已散佚，《本草纲目》卷十七狼牙条虫疮瘙痒下引杨炎《南行方》云：“六月以前，采狼牙叶，[六月]以后用根，生咀，以木叶里之，糖火炮热，于疮上熨之，冷即止。”

陆贄，德宗朝宰相，后贬忠州（治临江，今四川忠县）到驾。“既放荒远，常阖户，人不识其面。又避谤不著书。地苦瘴疠，只为《今古集验方》五十篇示乡人”（《新唐书·陆贄传》）。原书散佚，《医心方》卷三引《集验方》云：“治风，头眩欲倒，眼旋屋转，头痛，防风枳实汤方。”用来治疗。

李绛，宪宗朝宰相，曾为兵部尚书，著有《兵部手集方》。惜原书散佚，《本草纲目》卷十二上人参条引《兵部手集方》云：“饮食入口即吐，困弱无力垂死者，上党人参三大两，拍破，水一大升，煮取四合，热服，日再。兼以人参汁入粟米鸡子白薤白煮粥与啖。李直方司勋于汉南患此两月馀，诸方不瘥，遂与此方，当时便定，后十馀日，遂入京师。绛每与名医论此药，难可为俦也。”

刘禹锡，元和初政，贬为朗州（治武陵，今湖南常德市）司马，后迁连州（治桂阳，今广东连县）刺史，转夔州（治奉节，今四川奉节县东）刺史。他在贬所，著有《传信方》。《本草纲目》卷二十九杏仁条下引《传信方》云：“补肺丸治咳嗽，用杏仁二大两，山中者不用，去双仁者，……连皮尖于砂盆中研滤取汁，煮令鱼眼沸，候软如面糊即成。以粗布摊曝之，可丸即丸服之。食前后，总须服三五十丸，茶酒任下，忌白水、粥。”

上面提到的单方，是人名爵里可以查到的，也有一些单方，只知年代，人名爵里已经无法查考。如《医心方》卷九引唐軼名《拯要方》云：“疗上气逆满，喘息不通，呼吸欲死，救命汤方：麻黄八两，去节，甘草四两，大枣四十枚，夜干如博子二枚，右以井花水一斗，煮麻黄再沸，纳馀药，煮取四升，分四服，入口即愈。”可见用麻黄来治疗哮喘，也极其普遍了。

继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以后，在唐高宗显庆四年（公元六五九年），由司空英国公李绩（即徐世绩）领衔，而实际参加这一编纂工作者有朝议郎行右监门长史骑尉苏敬、登仕郎行礼部主事云骑尉颜仁楚、登仕郎守潞王府行参军吴世哲、太子药藏局丞飞骑尉蒋义方、朝议郎行太常寺太卜令上骑都尉贾文通、兼太子洗马弘文馆学士孔志约、朝议大夫行太史令轻车都尉李淳风、中散大夫行太常正上护军吕才、兼太常寺医丞云骑尉蒋元昌、太常寺太医令许弘感、朝请郎行太常寺太医令蒋李、朝请郎守太子药藏监上骑都尉吴嗣宗、朝散大夫行太子药藏监蒋孝喲、给事郎守尚药局侍医云骑尉巢孝俭、尚药局直长云骑尉许弘真，朝议郎行尚药局直长飞骑尉蔺覆圭、朝议郎守尚药局奉御骑都尉蒋孝璋、朝散大夫尚药局奉御上骑都尉朝豕、中大夫行尚药

局奉御许存崇、中书令太子宾客监修国史弘文学士上柱国高阳郡开国公许敬宗等人。这部《唐本草》，亦称《英公唐本草》。撰成问世以后，全书五十三卷，其中《本草经》二十卷，《目录》一卷，《药图》二十五卷，《图经》七卷。这一部书在编纂之先，先由政府下令“普颁天下，营求药物”，因此“羽毛鳞介，无远不臻；根茎花实，有名咸萃”（孔志约《唐本草》序）。因而所载的药物，又较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增多了一百十四种，一共收录到八百四十四种之多。这部《唐本草》的修撰，可以说是中国钦定药典的集创举，同时它也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制定的药典。可惜这部药典已佚，只在日本保留下《本草经》十卷，是全书内《本草经》部分二十卷的二分之一。但它的主要内容，由于后世修订的《本草》辗转引用，因此大部分还保存下来了。

日本所流传保存下来的《新修本草》十卷，即《唐本草》残存本十卷，其中所引药物，如“犀角，味苦咸酸寒”，“除邪，不迷惑魇寐，疗伤寒、温疫、头痛、寒热诸毒气”。“案犀有两角，鼻上者为良”。如提到“零羊角（羚羊角），味咸苦寒，微寒无毒。主明目益气，起冷去恶血注下，辟蛊毒……安心气……疗伤寒时气”。如“鹿茸，味甘酸温，微温无毒……益气强志……羸瘦，四支酸疼，腰脊痛……泄精溺血”。如“麝香，味辛温无毒，主辟恶气……妇人产难堕胎”。一直到今天，这四种药物退烧用犀角羚羊，补虚用鹿茸，外科把麝香作为引药，皆有特效。又如“牛乳微寒，补虚羸，止渴下气”。“羊乳温补寒冷虚乏”。如“酪苏（酥）微寒，补五藏，利大肠”。“苏（酥）出外国，亦从益州来，本是牛羊乳为之。自省法，佛经并称乳成酪，酪成苏（酥），苏成醍醐，醍醐色黄白，作饼成甘肥”。“然苏有牛苏、羊苏，牛苏胜于羊苏”。“醍醐味甘平无毒，主风邪痹气，通润骨髓……功优于苏（酥）。在苏中，好苏一石有三四升醍醐”。如“阿胶，味甘平微温无毒。[主治]腰腹痛，四支酸疼，女子下血安胎，丈夫少腹痛，虚劳羸瘦……久服轻身益气。煮牛皮作之，出东阿”。如“羊肉，肥甘大热，无毒”。“羊肾，补肾气，益精髓”。如“石蜜，味甘寒，无毒。主心腹热胀，口乾渴，性冷利，出益州及西戎。煎炼沙糖为之。作饼块，黄白色”。“沙糖，味甘寒，无毒，功体与石蜜同，而冷利过笨，甘蔗汁煎作，蜀地西戎江东并有，而江东者先劣今优”。如“胡麻，味甘平无毒，主伤中虚羸，补五内，益气力，长肌肉，填髓脑，坚筋骨”，“久服轻身不老，明耳目，耐肌延年，以作油（麻油），微寒利大肠”。此外也讲到“柏实味甘平无毒，主惊悸，安五藏，益气除风……久服令人润泽美色……生太山之谷”。如“酸枣，味酸辛无毒”，“烦心不得眠”。如“枸杞，味苦寒，无毒，补内伤大劳……坚筋骨，轻身能老，耐寒暑”，“俗谚云‘去家千里，勿食罗摩枸杞’，此言补益精气，强盛阴道也”。如“杜仲，味辛甘平温无毒。主腰脊痛，补中益精气，坚筋骨……久服轻身能（耐）老”。这些药物，到今天还经常服用着，且著神效。

除了由唐政府修撰这部《新修本草》以外，私人在这方面的著作也很多。其著名的，唐初人甄权著有《药性本草》。原书已经散佚，但《本草纲目》引其佚文，如卷五十一上犀角条引甄权《药性本草》说到犀角的功能，“解大热，散风毒……疗时疫，热如火烦，毒入心，狂言妄语”。犀角有退热退烧的独特功能。又在同卷中提到《药性本草》有关羚羊角的功能，说它能“治一切热毒风攻注，中恶毒风卒死，昏乱不识人……治小儿惊痫”。对犀角羚

羊角的作用，比唐《新修本草》介绍得更详细。对胡麻的介绍，也比唐《新修本草》更为详细。《本草纲目》卷二十二引《药性本草》云：“巨胜（即胡麻之别名）乃仙经所重，以白蜜等分合服，名静神丸，治肺气，润五脏，其功甚多，亦能休粮，填人精髓，有益于男子。患人气虚而吸吸者，加而用之。”

孟诜，武则天时，以进士擢第，官至同州刺史。卒于睿宗之世。诜著有《食疗本草》，惜已散佚。《食疗本草》顾名思义，从食疗入手，这是值得人们取法的。《本草纲目》卷三十引《食疗本草》云：“梨，治咳嗽”。“又方捣[梨]汁一升，入酥蜜各一两，地黄汁一升，煎成含咽，凡治咳嗽，须喘急定时冷食之”。又“暗风失音，生梨捣汁一瓯饮之，日再服”。又提到“胡桃……常服令人能食，骨肉细腻光润，须发黑泽，血脉通润，养一切老痔”。《本草纲目》卷二十八引《食疗本草》云：“冬瓜熟者食之佳，冷者食之瘦人，煮食，炼五藏，为其气故也。欲得瘦轻健者，则可长食之。若要肥，则不食也。”

陈藏器，唐玄宗时，官三原县尉，著《本草拾遗》十卷。藏器“博极群书，精核物类，订绳谬误，搜罗幽隐”（《本草纲目》卷一上引），对药物学的贡献也很大。《本草拾遗》原著虽亡佚了，但它很多佚文，被收在《重修政和证类本草》和《本草纲目》两书中，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李洵，著有《海药本草》，记南方海上所产药物及其疗效，记载颇为详悉。原书今已散佚，《本草纲目》中收有佚文。《本草纲目》卷三十一椰子条下引《海药本草》云：“椰树状如海，实大如碗，外有粗皮……皮有浆似酒，饮之不醉，生云南者亦好。”“治吐血，水肿，去风热。”“多食，冷而动气。”又《本草纲目》卷四十三引《海药本草》云：蛤蚧，“生广南水中，夜居于榕树上，雌雄相随，投一获二。近日西路亦有之，其状虽小，滋补一般。俚人采之，割腹，以竹张开，曝乾鬻之。”一直到今天，蛤蚧还被认为是最好的强壮剂。以上各种《本草》，都是药物学方面的重要典籍，可惜原书大半散失，我们现在只能在宋人唐慎微所辑的《政和证类本草》和明人李时珍所辑的《本草纲目》的转引中，窥见其一鳞半爪而已。

隋李春的赵郡安济桥 赵郡安济桥，在今河北赵县城南五里，桥跨洺水之上，是隋大业初年（约大业元年，即公元六五年前后），工匠李春等所造。这座桥从造成到现在已经一千三百多年的时间了，但还是非常坚固完整，两边桥基下沉水平差只有五厘米，这在华北冲积平原上能够这样固定地不往下沉，是很不容易的一桩事情。

安济桥是一座空腔式结构的石桥，空腔式石桥亦称空撞券式或敞肩式，这是石拱桥结构中的一种先进的构造方法。它是在大拱券的两端拱背上，又介以四个空拱小券。安济桥这样的构造方法，是完全有需要的，因为当洺河上流井陉山区多雨的季节，山洪大发，水流湍急，就必须应用这空腔小券，来增加过水面积，使暴发的山洪可以溢空而过。这样做，既减低了上游的水位，同时也减轻了水流对桥身的冲击力量。正如张嘉贞在《石桥铭序》所讲到的：“两涯嵌四穴，盖以杀怒水之荡突，虽怀山（怀山襄陵，形容洪水的泛滥）而固护焉。”而且这种两端应用四个空腔小券的方法，也减轻了桥身的自重（约可减轻五百余吨），同时也大大节约了桥台桥基的尺度与材料。由于桥身的重量减轻和减轻了洪水对桥身的冲击力量等原因，因而大大地增加了桥身的安全程度。空拱小券的应用，是李春的巨大创造，在当时建筑技

术来讲，这一构造方法，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安济桥的奇特之处，就是它的低矢跨的大弧形拱券。这个拱券，由二十八道拱圈并列砌成。桥的长度三七·四五公尺，其拱高（矢）仅七·二三公尺。矢跨比例，仅一比五，这种低矢跨比率，在世界石拱桥中，极其罕见。由于矢跨比率低，桥的坡度非常平缓，便于车马来往。

安济桥大小拱均采用了并列式的砌券方法，大小拱各由二十八道单独的拱券组成。这种并列式的砌券法，有其优点，即在施工时，可以单独施工，由于二十八道拱各自独立，如遇拱石破坏时，不致影响全桥，并可个别抽换嵌补新石，修补方便；如遇桥基发生倾陷时，也不至于影响全桥。但也有它的缺点，即二十八道拱券之间缺乏横向联系，李春在设计时，考虑到了这一弱点，所以他采用了五种方法来补救。一，桥中有“收分”，使外面的拱券向内倾，以防外倒；二，用了五根大铁杆把二十八道拱券拉联起来；三，二十八道拱背上铺了大块“伏石”，借压力与摩擦力拉联；四，在桥两侧用曲尺形的勾石把外面的拱石向内勾着；五，拱与拱之间，用了许多银锭、铁榫拉联。通过以上五种补救方法，桥身自然就非常坚固，弥补了二十八道拱券缺乏横向联系的缺点。

安济桥的造型艺术，也极为优美。由于它采取最低矢跨比率使桥身形成坡势低平的曲线，使人望之有“初月出云，长虹饮涧”（《朝野僉载》）的美感。在大拱背上辟四个小拱，除了有它实际功能以外，在艺术造型上，也打破了原来平淡的三角面，使它更显出玲珑天矫的姿势来。

桥面两侧原有的石栏杆，其雕刻是非常精致的。张嘉贞在《石桥铭序》中誉之为：“是其栏槛华柱，锤断龙兽之状，蟠绕拿踞，睨眄翕欬，若飞若动”，可见十分生动。可是经过一千多年时间，所有栏板，大部分倒塌进水里去了，后世往往用粗糙的石板或砖瓦临时砌成护栏来代替栏板，这和这座雄伟秀丽的拱桥很不相称。解放后，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整工作，把倒塌在水里埋之有千年之久的石栏杆，全部挖掘了出来。这些望柱栏板，雕刻得十分精美，“磨砢密致”（《朝野僉载》），望柱上雕刻着凸起的蟠龙、狮子头，栏板上雕刻着各种姿态的行龙，十分生动。刀法苍劲朴质，布局变化多端，表现出高度的艺术水平。这一修整工作到一九五八年基本完成，经过修整后的安济桥，面貌一新，更显出它雄伟天矫的气魄来了。

**轮船的制作** 据《旧唐书·李皋传》：皋“常运心巧思，为战舰，挟二轮蹈之，翔风鼓浪，疾若挂帆席，所造省易而久固。”《新唐书·曹王明传嗣曹王皋附传》记载这段事，文字更为简省：皋“教为战舰，挟二轮蹈之，鼓水疾进，驶于阵马。”用两个大的轮子，挟船左右，船工在船内以足操作，使轮运转，推动前进，速度可抵帆船和跑马那么快。可惜左右两轮的结构和板片，都是用木材来做的，在水中浸泡稍久，就容易腐烂。大概当时还不迫急需这种轮船，因此这一技术没有机会获得进一步改进。

